

罪恶家族-检察官手记

谢朝平

序

韩忠信

呈献给读者的是一本关于纵欲成灾者的书，记录了权高位重的政府官员，手执法鞭的法院院长、公安局长，财大气粗的厂长、经理，杀人越货的车匪路霸，谎话连篇的骗子，不请世事的中学生，危害社会的赌棍、嫖客、妓女、毒贩、烟贩、票贩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是如何在物欲的诱惑下被扭曲灵魂，走向深渊。他们犯罪背后复杂的社会症结，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广阔的生活画卷在书中尽收眼底。

这本纪实文学真实生动的笔触冷静犀利，所选的案件独特典型，很吸引人。此书既可作为文学作品欣赏，也可以作为资料保存，但书中主人公们给人留下了许多沉重的思索。

毫无疑问，这些人的罪恶并非与生俱来，当初，他们大多曾是我们党我们社会的优秀分子，两袖清风，一身清白。是什么魔力使他们转眼间变成了贪婪腐败、罪孽深重之人？

西方腐朽思想意识的渗透，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法规滞后，打击不力等等固然都是这些罪恶产生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人目迷五色，耳惑五音，放弃学习，不讲政治，缺乏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下，物欲的引诱和对糜烂生活的追逐使他们无法抗拒金钱、权力、美色的诱惑。

无法抗拒诱惑，则无法抗拒灾难。于是，这些不甘清贫、不甘淡泊、不甘寂寞的纵欲者纷纷掉进陷阱、坠入欲望。他们的命运结局向我们昭示一种不可抗拒的规律——权力失去制约必定产生腐败，贪婪而不能自制的人更容易堕落。

书中的罪犯们受法律的惩罚固然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当然也大快人心。但他们的行径和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却警示我们：由贪欲引发的职务犯罪和刑事犯罪是如何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若不清除，我们的改革大业就会夭折，社会就要动荡不安。

打击、预防犯罪，我们已无退路。

犯罪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打击、预防犯罪也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和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强化教育，清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已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因此，在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对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重振广大国民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教育人们，特别是教育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守法纪，克制私欲，洁身自好，防止类似案件发生。

基于这个目的，我将这本检察官笔下的社会犯罪报告《检察官手记》推荐给社会，推荐给广大读者。

但愿这本书能像一道闪电照亮迷途者的心并为其指点迷津。

但愿那处决罪犯的枪声能使贪婪者猛然警醒，使跌入地狱的灵魂呼唤出一个崭新的生命。

但愿社会的每个人以这本书作为一面镜子，以那些反面教员为鉴，从中吸取教训，淡泊名利，抗拒诱惑，好好珍惜人生，珍惜生命，珍惜生活，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注：韩忠信系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目录： 手记之 01 “王保长”告状记 手记之 02 被高利贷吞噬的高利贷者 手记之 03 隧道里挖出一窝贪官 手记之 04 法院院长进班房 手记之 05 死心塌地 手记之 06 捕“虎”记忆 手记之 07 山洞中，那两具冤孽的白骨 手记之 08 烟贩败走“麦城” 手记之 09 成都的票贩子真猖獗 手记之 10 “黑色”备忘录 手记之 11 “李鬼”大闹草兴场 手记之 12 夏娃在“天堂”堕落 手记之 13 圈套 手记之 14 贼和偷脏物的贼 手记之 15 绑架，由法官执行 手记之 16 可怕的“飞龙帮” 手记之 17 巧擒“娄阿鼠” 手记之 18 罪恶家族 手记之 19 放下你的鞭子 手记之 20 阳光下的暴行 手记之 21 赌海茫茫 手记之 22 回来吧，坐台的女中学生 手记之 23 技师的父爱迷失在贼道上 手记之 24 捣翻贼们的“多米诺骨牌” 手记之 25 “烈女跳楼”引发“新闻侵权”案 手记之 26 一个人学生与劳释丈夫婚姻的祭坛 手记之 27 一个“伥鬼”的婚姻游戏 手记之 28 覆巢之下，那朵花蕾凋谢得好早 手记之 29 权、钱、色如“钩” 手记之 30 海茫茫，谁能再造方舟 手记之 31 叔嫂相恋，那家破人亡悲剧的编导是谁 手记之 32 遭遇“强盗” 手记之 33 “西藏人”与“英镑” 手记之 34 请法律评判 手记之 35 “粉”祸 手记之 36 一网打尽 手记之 37 讨回公道 手记之 38 风尘女子难为妻 手记之 39 最后再“捞”一把 手记之 40 贼道上那对大学法律系情侣 手记之 41 检察长在组织保护下撤离 手记之 42 贼车“销‘进刑警队 手记之 43 决不低头 手记之 44 巴山追逃 手记之 45 火中取栗 手记之一：“王保长”告状记——一件诬告案的前前后后 “举报信”成为诬告者政治生命的讣告

这是一个极富有戏剧性的结局——数十封举报信寄出后，手铐没有锁住“腐败分子”的双腕，法律的铁掌却煽在“举报者”的脸上。“举报信”成了“举报者”政治生命的讣告。1994年8月，那个威风八面、不可一世的“举报者”在铁窗里给检察官写信说，我认输了，只求别枪毙我。此时他犹如败军之将，只不知他是否还想得起被他“举报”的“政敌”纷纷落马后，曾有的那份得意……

1994年元旦前后。一封封状告渠县天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党委书记、天星镇镇长张汝和“贪污、受贿27万元”的信件从中央、省、地的各级领导及人大、检察机关纷纷转到了渠县检察院。

案情重大，检察官们不敢稍有怠慢。初查秘密而神速地进行。不久，初查有了结果：信中举报张汝和贪污受贿等问题根本不存在。举报信的署名人均不知此事，据已查实的情况看，极可能是一个诬告案……

检察官们愤慨不已：“决不能让诬告者逍遥法外，诬告必须反坐！”有关领导也指示，要

竭尽全力把诬告者查出来绳之以法，以示法律的尊严……

诬告张汝和的犯罪分子很快被查出。1994 年初春的一天上午，检察院的警车开到了天星开发区副主任王忠荣的小洋楼前。王忠荣始料未及，一本正经地说：“你们莫搞错哟。”

“咋嘛”锁下的手铐回答了他。接下来是依法搜查。搜查出的东西使王忠荣狼狈不已，他把头扭向一边闭上了眼睛。但县电视台的记者却及时摄下了他的罪证——数封诬告信的底稿。一大摞已写好地址、姓名的信封。近百份打印、复印、复写的诬告信。7 万元现金和存款单。六盘全裸性生活磁带。

逮捕王忠荣的第二天，天星镇的几十个村民敲锣打鼓地把“除暴安良”、“惩恶除奸、顺应民心”的两块横匾送到了检察官们手里，表示出人们对铲除“害人精”后的愉悦心情。“王保长”其人其事

在天星镇，说王忠荣的名字，很多人都不知道，但要是提到“王保长”，谁都会恍然大悟：哦，你说的是他哟。

“王保长”这雅号的得来可追溯到十年前，那时，王忠荣在城西乡当乡长。因他时常给村民们“松皮”，公、检、法和县委、县府的大院里也就免不了常有被他打断了手的、打跛了脚的告状者哭哭啼啼。公安局长被哭声激怒了：王忠荣哪像共产党的乡长，简直是一个王保长！因当地正上映《抓壮丁》，“王保长”这官名很快便传开了。

王忠荣并不计较别人叫他王保长。“乡长和保长本身就是同一个级别嘛”。在他看来，只要官职不降、威风不减，叫什么还不一样？

近年来，“王保长”越来越神气了：怀揣对讲机，腰插钢弹枪。屁股上吊根电警棍。一次，一个村民挖水沟时溅了点泥水到他身上，他用枪顶住那村民的脑袋骂道：老子崩了你！

1988 年 2 月，王忠荣向合力村 11 社社长王忠轩借 2 万元钱落空后，6 月便罢了他的社长，并向检察院“举报”王忠轩“有严重经济问题”，检察院查了十多天，结论是：账务清楚，不存在经济问题。王忠荣岂肯罢休，很快又发现了王忠轩的另一问题：他家种的小麦不合质量。一天，王忠荣带着 30 多人将王忠轩家 8 分绿油油的麦苗铲了个精光，之后还罚王忠轩交 200 元钱作为铲麦苗人的“伙食费”。1992 年“严打”时，王忠荣也没有忘记“关照”他的这个本家兄弟。一个“煽动村民在镇建筑工地闹事”（王忠轩当时根本不在家）的罪名，使王忠轩成了公捕大会的“陪斩”。王忠荣还指示治安员把他送到公安局关起来。吓得王忠轩藏在一个亲戚家的窑里七天不敢露面……

“王保长”在百姓面前威风凛凛，但在金钱和女人面前却底气不足。村民们说他见了钱财就眉开眼笑强拿硬要，见了女人就眼直气短浑身酥软。

天星建开发区村民农转非时他大捞了一把；帮人介绍工程他得了“回扣”；单位装璜时他大做手脚；给人安排工作，他索取了不少钱财。现已查明，贪污受贿的不是别人，正是王忠荣自己，而且数额要以数万元计。

钱多了，王忠荣自然也就潇洒风流了起来。1993年10月以后，他闹意见不上班，天天下午都由一位小姐挽着进酒吧逛舞厅，挽他的小姐不仅年轻漂亮，而且一天一换。连渠县城那班花花公子也自叹不如，“王保长老牛啃嫩草，艳福不浅哟……”

“王保长”的艳福是用他人家庭的灾难换来的：一对亲姐妹为在王忠荣那里争宠而打得头破血流；一位女士的先生发现自己的儿子越长越酷似王忠荣，一查，自己果然当了“名誉爸爸”，一气之下与妻子离了婚；另一位先生发现自己戴了绿帽子，气得挥着菜刀要与王忠荣拼命；还有十多个村民故意让王忠荣出丑，半夜里把他从一个女人屋里惊出来，害得他跑掉了一只皮鞋就是这么一个贪恋钱财女色的“王保长”，却偏偏把贪色受贿之类的事情硬栽在他人身上……

为了“鸡头”

1975年，王忠荣由一个小学教师步入政界。此后，他经历了从公社党委副书记、公社管委会主任到乡长、镇长的辉煌仕途。十多年间，在天星镇那块地盘上，他堪称官场得意、威风八面，不仅如此，他那幢价值10余万元的小洋楼，各种高档电器，常叼在他老婆嘴上的红塔山烟，成群的“妻妾”，挥金如土的气派，都足以显示他这个“保长”在天星镇的首富地位。

但王忠荣说，仅仅满足于这些就太渺小、太没出息了。

他历来就很“自负”。1975年当渠东二小教导主任时，他向上级毛遂自荐：自己最适合搞全面一点的管理工作。1978年，当上渠东乡党委副书记后，他叹息自己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后来当了乡长，他仍觉得太屈才，更主要的是，前边还有个党委书记管着，实在不舒服不自在得很。一次，三杯白酒下肚，他慷慨激昂起来：“男子汉大丈夫岂能屈居他人之下？宁为鸡头，也决不当凤尾……”

他不想当乡长这种“凤尾”了。在村干部会上，他插着桌子说：莫说一个小小的乡长，给一个区长、县长老子照样当得潇洒。

虽说如此，但共产党的干部大多是要一级一级提拔的。当不了乡党委书记，就难以当区长，更别指望县长什么了。

这正是王忠荣多年来的一块心病。

事实上，他早就三天两头地进城找“组织”诉说自己的怀才不遇了。逢年过节也总不忘记让人把乡上那辆双排座开进要害部门的大院里，亲自把大袋小包的“小意思”和“心意”扛进自己用得着的人家里。“上边”本来早就答应让他干乡党委书记，但因种种原因，这许诺迟迟未能兑现。

他失望了，开始不满地窥视着周围，见平级的干部上去了，他炉火中烧。见资历不如自己的人成了“鸡头”，他更加愤愤不平。愤恨中，他悟出了仕途不顺的原因是有人挡道。要想上，得先清除这些挡道的障碍！

于是，王忠荣将“作风问题”“经济问题”这两支利箭绷上了暗算“政敌”的弓弩。

首先中箭落马的是原城西乡党委书记罗伟学。某执纪部门的办案人员后来回忆说：看到对罗伟学的检举，把人吓了一跳，又是强奸妇女，又是贪污受贿，简直是十恶不赦了。但查了很久，只发现罗伟学在集体买 18 根树时，每根少交了 3 元钱。

为这事，罗受了处分。1983 年罗伟学调动时，王忠荣得意洋洋地指着他的鼻子说：整你罗伟学的第一个就是我！

那次，王忠荣差点挤上了“鸡头”的位置——“他的人”建议让他主持党委的工作。但据说后来在决定党委书记人选时，了解他秉性的某领导说：此人虽精明能干，但欠缺诚恳踏实，政治品质不好，重用会出问题……结果，王忠荣只主持了两个月党委工作，便被人取代。

但取代他的人很快又因被一举报“查不清的”作风问题“而”滚蛋“了。

也许是为了防止到天星乡工作的书记再有“作风问题”。1985 年，天星乡改镇时，组织部特意选派了全县乡级党委书记中年龄最大资历最老且被公认为作风最正派的肖成文去当镇党委书记。但这并不妨碍王忠荣的“举报”，他避实就虚，多次到县里反映：“肖成文老了，跑不动了”，“不下乡还当啥书记！”

这一箭又中要害。不久，人们风传肖成文要调走了。在村干部会上，王忠荣喜滋滋地说：这次，天星镇的党委书记该姓王了。

1987 年冬天，组织部的文件来了，天星镇的书记果然姓王，不过，叫王金阳。

这个结局犹如一盆冰水浇在王忠荣炽热的欲火上。

他“病”了，“不能上班”，只在小洋楼里听人汇报，答复请示，挥毫批条签字，不断向外发布指示。有人戏称小洋楼是“天星镇第二政府”。王忠荣也因此多了个“王政府”的雅号。

“王政府”身在小洋楼，却总挂念着“鸡头”的事。不久，一封以解放村文盲王 XX 名义发出的“王金阳与解放村党支部书记谢可仲合伙贪污 25 万元”的“举报信”

寄到了上级领导那里。尽管县纪委调查的结果是：“经查不实”，但王金阳最终还是被调走了。

这位当初曾雄心勃勃地想在天星镇干一番事业的书记很不服气，要求组织作出结论并给个说法。一位领导苦笑着说，走吧，老王，不是任何事都有说法的，也不是任何事都有结论的。谁叫你命中带了个小人呢……

王金阳被小人整“栽”了。1983 年以后，天星镇的六届乡（镇）党委书记无一幸免地全“栽”于小人之手——被“举报”，被调走，被不明不白地“驱逐出境”

似乎成了他们的共同命运。后来，连城郊区的那位书记也在劫难逃。1992 年 9 月 27 日，状告“贾 XX 采取若干措施保情妇当区长”的信不仅寄到了上级领导的案头，检举贾 XX

在旅馆乱搞男女关系的信也寄到了他妻子的手中。从此，这位书记在外声名狼藉，在家“内战”不断……

就这样，11年间，15个“被举报者”纷纷中箭落马，王忠荣却不倒翁似的稳坐天星镇，陶醉于“辉煌的胜利”之中。 “人在官场只有手段没有良心”

雨果说，对于个人，惟一的权利是良心。

王忠荣却认为：在官场，要么整人，要么被人整。不想做铁砧，就得做铁锤。人在官场只有手段没有良心。

他的良心的确早就泯灭在不择手段的“举报”之中。对张汝和的“举报”，也许最能表现出他所说的“手段”。

1993年初，王忠荣利用办理开发区征地手续之机，四次为自己违法规划门面，均被张汝和制止，王忠荣为此怀恨在心。

但他并未急着“举报”。他先在张汝和的后院里放了一把“火”。天星开发区刚成立时服多财物都堆放在外边，晚上要人值班守护。一天晚上，轮到张汝和值夜班了。王忠荣给张的爱人打电话说：张汝和太不像话了，下班不回家，陪那些女娃子去跳舞。如果你要管这事，就到我家来。

当晚，王忠荣夫妇俩带着张的妻子去“捉奸”。但到开发办一看，张汝和正同十个值班的同志在一起。王马上说，来晚了，他们肯定跳完舞才回来。你回去好好审一审就清楚了。

回家后，张妻旁敲侧击，哭闹相逼的“夜审”一直持续到深夜两点。不管张汝和怎么解释，怎奈妻子对王忠荣夫妇提供的情报和“证据”坚信不移。从此，一个本很和睦的家庭进入了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的“内战”时期。

冷战的阴云还沉沉地浮在夫妻俩的心空，王忠荣又火上浇油。不久，张汝和等六人去北京落实开发办驻京办事处落户的事。他前脚刚走，王忠荣便把“张汝和与情人去旅游”的匿名信寄给了张的妻子。妻子一个急电把刚抵京的张汝和召回，将匿名信和离婚申请往桌上一拍：签字吧！

第二天，王忠荣及时把“张汝和带情人旅游，要与他爱人离婚”的消息传到县上那些大院里。

见张汝和内忧外患，王忠荣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1993年11月28日，他主动找张汝和“交换意见”说：是哪个这么整你，真缺德！请相信，我决不会整你，不信，我向天起誓。接着，他又“启发”张汝和：你把视线放开点，刘XX副主任对你怎么样？蒲XX副主任会不会整你……

听了王忠荣那些信誓旦旦的表白，张汝和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他四天前的那番表演。

四天前，县里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时，王忠荣听说地区正在考察张汝和，准备提拔。他忙心急火燎地专程赶到城郊区区委书记贾 XX 家收集张汝和的犯罪材料。他似乎已忘记了曾“举报”贾 XX 的前嫌，挑拨说，贾书记，张汝和在城郊当区长时，想把你赶走，他当书记。现在我们联合起来，你在城郊区告，我在开发区告，把他龟儿整进监狱。

遭贾拒绝、批评后，王忠荣仍假借他人名义炮制出了举报张汝和贪污、受贿 27 万元大案的信，并找人誊写。誊写人对王忠荣丰富的想象力惊叹不已。王忠荣得意地一笑：难道没听说过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事实那句格言？

“举报信”寄走后，王忠荣觉得仅仅如此还不够，他又提笔给“尊敬的达川地区人大代表主席”写了一封信，“请领导主持公道，督促查处”。

这封信的署名王忠荣干得更绝：他将文锋村三十八个村民的签名和盖章从另外的材料上一剪下，然后贴在信的尾部，复印后，“三十八个村民写给人大主席的信”便天衣无缝了。

寄完信，王忠荣觉得，还应让更多的人与自己结成同盟。不久，天星镇开村干部会，王忠荣把“举报信”交给文锋村吴 X 说，你把信拿去散发，主要在文锋村发动群众攻击，让他龟儿在天星镇站不住脚。

同一天，王忠荣找到双河村支书刘义方挑拨说：“我们定好了调你女婿周文到镇上来工作，但张汝和不干。你要写信告他。就说周文送 500 元给他，他嫌少。周文只好去广东打工。”

刘不肯写信。王忠荣说：我已帮你举报了，今后有人来调查，你就这么证明。

当天，王忠荣还分别对另几个与自己关系较好的村干部说，举报张汝和的信，上边我已到处发了，你们只管在下边造舆论。上边来了人，要组织人好好证明，只要大家齐心，就可以把张汝和告进监狱。

王忠荣的功夫没有白费，不久，县检察院开始调查张汝和。王忠荣欣然提笔给外地工作的儿子写信说，张汝和与我干仗，我很稳定，以攻为守，他已溃不成军，现在正调查他。‘但结局还很难定……’

1994 年元月 20 日，打听到上级提拔张汝和的事已被“告黄”，王忠荣喜不自禁。他身披军大衣，手端开水杯，一步三晃地晃进办公室，笑眯眯地对张汝和说：“有人给我算过命，说我属狗，主人养好了，可以看家，主人若对不起我，我就要乱咬人。”

他的确像一条乱咬人的疯狗。

王忠荣在“举报”中说：“天星村原支书唐 X 受贿，检察院去查，唐送张汝和 2 万元。经张活动，唐便仍当支书。”案发后，办案人问他，张汝和受贿 2 万元的根据是哪儿来的，王忠荣眨巴眨眼睛说：一天上午，我上班时，在路边听几个不认识的农民说的。

“举报”中还称：1993 年 3 月，沿渡村杨 A 给张汝和送 4000 元，便当上了村支书。

后来，办案人员询问已关在看守所的王忠荣时，他仍有鼻子有眼地说，这笔受贿是杨 A 在杨 B 家与杨 B 商议给张送钱时，杨 B 隔壁的那个女人从墙缝里听到的。办案人员到“现场”一看，杨 B 单家独户，根本没有邻居。“隔壁那个女人”从何而来？且房子四壁皆是砖墙，哪有什么“墙缝”……

王忠荣就这样给张汝和罗列了 17 笔对万元的经济问题。

他将这个“大案”“举报”后，见张汝和还未进监狱，便迁怒于领导。他在笔记本上写打油诗说，要说乱，数渠县，举报信给被告看，谁被怀疑上，断头台上见……

审讯时，办案人员问他哪个领导把举报信给被告看了？王忠荣煞有其事地说，有一天，我到县委去，看见某领导正与张汝和说什么，样子很亲密。我交的举报信某领导肯定给张汝和看了。

到了监狱，王忠荣仍难改“咬人”本性，他恐怕再也摆脱不了自己灵魂深处的那个魔鬼了。
祸根在哪里

王忠荣“举报”十多人，虽查无实据，但有关部门的一些人却认为事出有因。于是这些被“举报”者，或中箭落马、或被调查。或被“搁起”、或被怀疑。一口“黑锅”断送了他们的大好前程。

这种结果对诬告者无疑是一服兴奋剂，这是不是王忠荣多年来越告越起劲的重要原因之一呢？

有的人明明知道王忠荣政治品德极坏，所“举报”的事大多是胡编乱造，但为什么仍一如既往地欣赏、爱护他？有人说那有哈奇怪，个别爱拉帮结派搞权力斗争、搞窝里斗的人，他们正需要王忠荣这种小人，当然会欣赏他。

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臭味相投，也是王忠荣这种小人能生存下去的重要社会环境。

比这种环境更可怕的是认识上的糊涂。一些人，甚至包括一些领导者似乎并不知道诬告的危害性，他们认为，告状顶多是闹不团结罢了。有人甚至说：身正不怕影子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这种“宽容”，无疑在客观上滋纵了诬告。有了这种“市场”和“后盾”，王忠荣这种诬告者还怕什么呢？

诬告而不遭打击，不受法律的制裁，诬告者岂能不越来越猖狂？！
记忆之二：被高利贷吞噬的高利贷者
(一)

即使最平凡的人生，也有难忘的时光。

令原渠县汇西信用社主任蒲平难以忘怀的那段日子是从 70 年元月去云南当兵后开始的。

那时，中国大地内乱的硝烟还未散去，拳头加舌头的“革命”，圣徒和魔鬼的交锋正撕杀得天昏地暗。然而，军营里“学雷锋”“传帮带”等活动那以神奇的力量净化着这块圣地，使军人们的灵魂不断升华。

在这样的环境中，蒲平迅速地成长了起来。入伍十个月就入了党，入党三天后就被团部作为骨干分子抽去参加地方的整党。四年间，蒲平八次受到团以上嘉奖，他的名字列入了重点培养的名册。若不是“林彪事件”，他也许会写就另一个辉煌的履历。不过，退伍后，命运之神依旧很关照他。回到渠江边的登丰村不到三天，学校就聘他当了教师。不久，组织上让他当了汇西登丰村党支部书记，同时被选为乡党委委员、不脱产的乡党委副书记。78年，渠县农行招工，蒲平被优先招为汇西信用社干部，先后出任出纳、会计、主任。到案发前，他二次被县农行评为先进工作者……

相比之下，与蒲平同乡、同岁、同学的刘文才开初那务农当裁缝的经历似乎太平淡了些。八十年代中期，他才“大器晚成”——一个当今最有气派、最为流行的“企业家”头衔使他红遍了渠县。别看他这个统领汇西供销经营部的“企业家”只有五、六号人马，但经营部那门庭若市的景象，镇里人对他流露出的那钦佩、羡慕的目光，县、区、乡的头头们对他那客气的态度，都足以使人感到这的确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

(二)

“企业家”的悲剧正是从他“非同寻常”的时候开始的。

地位有了，名气有了，关系有了，刘文才仍不满足。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己缺的东西太多了——缺小洋楼，缺高档电器，缺大款那一掷千金的气派。当然，更重要的是缺钱，在充满诱惑的世界里，金钱使他产生了一种无法抗拒的欲望。

1987年春节后，刘文才带着赚大钱、发大财的欲望用麻袋拎着经营部34万元公款同一个姓杨的个体户悄悄去做青麻生意。不料那姓杨的见钱起意，坏了良心，在崇庆县城，趁刘文才上厕所时，提起麻袋逃得无踪无影……

丢了34万元，刘文才并不罢休，他像赌红了眼的赌徒想把那几十万“捞”回来。在营山县一个叫刘洪魁的个体户处，他忍痛以15%的月息借款10万元去“捞本”。一年后，“本”没捞回，10万元的借款倒忽啦啦地“长”成了20万元，债主威逼相加，刘文才万般无奈，只得立下字根：如果10天还不清，甘愿以100%的月息接受罚款；半个月交不清，接受150%的月息罚款……

写完字据，刘文才发抖了。虽只读过高小，但他知道这些百分数和时间将会换算出一个什么样的数字来！

他绝望了。1988年9月底的那些天，刘文才老去镇后的码头边，望着滚滚西去的渠江，一种无力回天的感觉油然而生，他甚至想跳进江中，就此了结……

(三)

危难中，时任汇西信用社会计的蒲平向刘文才伸出了“援救”之手。1994年7月2日，在看守所里接受笔者采访时，蒲平回忆说，我一辈子对人都讲义气，老子最见不得那种见利

忘义，敲诈勒索的不平之事。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决定拉他一把……

话中虽充满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爽，但这位“仗义疏财”的“好汉”当时并没有可将刘文才“拉”出苦海的那笔巨款。不过，已将法规和金融政策忘到九霄云外的蒲平自有办法：10月2日，他在两张活期与定期的存款科目日结单上凭空扩大支出，将凭空扩支的3.百万元和2.74万元库款挪借给了刘文才。12月3日，蒲平又以同样的手段凭空扩大支出了7.26万元和10万元。他把这两笔库款像给自己的钱一样交给刘文才说：拿去，把借款还清。

刘文才也并非有恩不报之人，当年年底，他给蒲平“表示了一下”。据刘文才后来交待：蒲平当时的确推辞过，还说刘文才你太见外了。我们是同学、朋友，你何必这样做。刘文才认真地说，你不收就是看不起我这个同学和朋友。蒲平虽很“仗义疏财”，却不愿为拒绝钞票而“看不起同学和朋友”，于是，他收下了刘文才“表示”的那两张“老人头”。以后，他又再次收下了刘文才的“小意思”。（四）

世上很多事都是极容易上瘾的。当官、赌博、嫖娼、吸毒、酗酒……能使人怎迷心窍，以致迷途难返。金钱似乎更容易使人变得贪婪，得过几次好处后，原本很“仗义疏财”的蒲平很快同花花绿绿的钞票产生了感情。这“感情”不仅置换了他从前的“正直”，也抹杀了他同刘文才等人之间的“友情”。此后，他做起了“票子生意”，且表现出了一种可怕的贪婪——蒲平的第二任妻子有一块地基。蒲平、刘文才协商共同在这块地基上建房。刘文才无钱付清4万元的地皮等费用，蒲平答应他：钱可以欠，但要付息。一年后，蒲平从刘文才处连本带息收回了6.5万元。被人收了高利，刘文才虽感到心痛和恼火，但考虑到今后还要同这位朋友“合作”，也只好认了。

有个叫陈东华的个体户找蒲平贷款，蒲将凭证开好后突然谎称账上无钱。他“友好”地告诉陈东华：我可以帮你借，不过，利息高点，每元月息5分。陈答应条件后，蒲平从刘文才在信用社的账户上划款9万元给陈。然后，蒲平再给刘文才写张欠条——这9万元当然纯粹是“借”的，没有利息，更没有高息。而当蒲平把这9万元借给陈东华后，3年便利滚利成了22.5万元。蒲平仍不满足，说自己在组织资金时开支了一万元的小费，陈害怕得罪了这“财神”，连忙认账。90年10月3日，见陈东华拿不出钱，蒲平把自己给刘文才写的9万元的借条收回，将刘文才挪用的公款转账22.5万元给陈东华。这么一倒腾，蒲平不仅无本获利13.5万元，而且很巧妙地把私人借款转嫁给了国家。

1989年初，有个叫王荣华的个体户在蒲平处借款4万元（蒲后来将此款移作了公款），两年后，蒲平连本带息要收回8j万元，王荣华叫苦连天：旧社会也没有这么凶狠的高利贷者！一怒之下，干脆携款一逃了之……

几年来，蒲平挪用公款放贷吃了多少高利因其种种原因，现已无法查清。但从88年10月至89年12月，蒲平采用凭空加大支取款付出和转存银行款不入账等手段从汇西信用社挪用供刘文才个人使用的库款就已高达88.3万元。采访时，刘文才告诉我们：这些钱我都是付了高息的。蒲平则有些悔恨地叹息：当时只想乘机多赚点钱，赚来赚去却赚来了一颗子弹……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五）

1989年3月，渠县农行提任蒲平为汇西信用社主任。难得的升迁不仅没有使蒲平产生

半点高兴，相反，他心中笼罩着一层厚厚的乌云，一种大祸临头的恐怖感使他惶惶不可终日。

一天，刘文才设宴庆贺他荣升，蒲平却鬼火真冒：庆贺个屁，你几爷子在我那里挪了几十万，不填平这个窟窿，交账时露了马脚，别说当主任，恐怕连饭碗也要砸了！

刘文才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然后拍拍胸膛：放心吧，这事我搁平就是了。见蒲平用怀疑的目光打量自己，刘文才越吹越神：我同达地乡镇企业公司（后更名为达地矿业公司）的印XX是铁哥儿。此人很义气，前几年同我搞过联营，这次找他帮忙借点款保险不成问题……

蒲平一听，也不由高兴地举起酒杯预祝刘文才借款成功。喝得面红耳热后，刘文才乘着酒兴赶到达地矿业公司找到印XX。刘文才的这个“铁哥儿”其实并不“义气”，自86年以来，他的公司与刘文才做着“不负责税金、费用和亏损，只提供资金，按月定额分利”的“票子生意”，从刘文才那里稳收每元3至7分的月息，印XX确实赚了不少。这天，听刘文才说要借款几十万元去填蒲平账上的窟窿，这个精得不能再精的高利贷者当即答应，可以提供30万元作为联营款。不过，除每元付7分的月息外，蒲平必须在联营协议上签字担保，并在汇西信用社开具10万元的存折作为我们提供资金的保险……

条件苛刻得不能再苛刻了，但蒲平仍不加思索地接受了。他怕拒绝了这些苛刻的条件会弄不到款去填他账上的窟窿，他怕因此而暴露了自己挪用公款的罪行，他怕因此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结果，他得到的这笔款却成了他走向地狱的“买路钱”。
(六)

旧的窟窿填上了，更大的新窟窿又出现了。印XX将30万元联营款转入汇西信用社的同时就从中扣下了2.1万元的“分利款”，以后，每月利滚利的“分利款”越来越多。比这更令蒲平发愁的是：88年以来，已欠巴山贸易公司、航天工业达县技术开发部、达地矿业公司“联营”款99万元。这99万元每月6万元的“分利款”已令其不堪负重，刘文才账外经营的巨额亏损更使其忧心忡忡。一天，刘文才六神无主地问蒲平：“怎么办呢”？

蹙眉沉思良久，蒲平才阴沉着脸说：“到了这一步还能怎么办，借钱还账是眼下惟一的出路了……”

“谁还愿借钱给我们呀？”刘文才一听借钱就头痛不已。蒲平却不紧不慢地说，达地矿业公司、巴山贸易公司、还有其他几个公司不是想得分利款吗？只要他们肯联营，你仍按从前的条件去借，我可以代表汇西信用社给他们开存单。有了联营款，就不愁还不了账……

蒲平的话很轻松，但他俩都明白：这账只会越还越多，到头来总有一些人的账还不上。

“管不了那么多了。”蒲平像是在给刘文才鼓气，又像是安慰自己，“十个坛子九个盖，总有一个盖不满，先盖一个算一个吧。”

从此，两个想发财，结果被债务的绳索捆绑在一起的“难兄弟”走上了诈骗之路。
“老实”的骗子
(七)

他俩配合得很默契：觉得达地矿业公司的“坛子”应“盖”一下了，刘文才便去找铁

17局的巴山贸易公司“联营”，蒲平则给“联营”单位开具与“联营”款相等的假存折。“盖”上了矿业公司这个“坛子”，他俩又赶紧想法去找达地棉麻站“联营”，用其“联营款”来“盖”巴山贸易公司的“坛子”……

就这样，几年来，蒲平、刘文才一直忙着拆东墙补西墙，用后一个“联营”资金去支付前一个“联营”及“分利款”。到92年元月，他们利用“联营协议”和假存单从达地矿业公司等八个公司“联营”到资金742万元。他们用这些钱去循环填补借债和“分利款”的窟窿，结果，在还债中把218万的高额利息背到了自己的身上。

为堵上恶性循环的“联营”窟窿，蒲平、刘文才采取了“两条腿”走路——挪用和诈骗双管齐下。

1990年5月，见江西信用社再也没有资金可供刘文才等人挪用了，蒲平便以信用社法人代表身份与达川市的印XX等人分别签订《资金引进委托书》，给达川市的印XX出具《授权书》。他还口头委托铁17局周XX等人给江西信用社组织存款。“存款”存入江西信用社的利息远远高于国家存款利息的这一“优惠”政策颇有吸引力。辛辛苦苦攒钱养家糊口的工人、教师、干部和小市民们揣着平时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积蓄，个别官员和商贩们则拎着来得也许太容易的巨款源源不断地前往江西信用社“储蓄”。发高利贷财的美梦竟使人们犯了傻：92年2月，办案人员都已将江西信用社账封了，渠县一官员还乘着夜色悄悄把6万元交给蒲平，那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局当然也就可以想象了。达川市的一干部更好笑：蒲平被收审一个多月后，他居然稀里糊涂地把5千元送去江西交给了蒲平的女人，第二天知道内情后再去索款时，蒲平的女人早将此款拿去还了另外的债主……

持有蒲平开具的假存款单的那30户储户也虚惊了一场：蒲平收款后，将所出具的存单收入联和卡片账全藏在家中，存款不记信用社收入账，将82.35万元存款借给刘文才58.2万元，陈东华15.2万元，郑仕国8.1万元，自己使用8480元。

案发后，30户想发高利贷财的人们围在江西信用社的门外，呼天喊地，后悔不已。他们不再想那诱人的高利，只求能收回本金。幸好信用社依照国家有关法律和金融政策支付了这82.35万元的“存款”和5万元的利息，才使他们免去了“鸡飞蛋打”之灾。

但这82.35万元的“窟窿”，却使江西信用社陷入了绝境。

（八）

对黑龙江省绥化市供销企业总公司农副产品经营部（以下简称绥供农经部）的诈骗是蒲平、刘文才的又一“杰作”。

1990年10月下旬，刘文才对绥供农经部经理郭永奎说：“我公司可购销400万公斤粮食。”

“400万公斤，要好几百万元呢”。郭对刘文才那个只有五、六个人的江西供销经营部的经济实力并不那么相信，他加重语气问刘文才：“你有那么多款吗？”

“怎么会没有款！”刘文才不屑一顾地摆起一副财大气粗状，“巴山贸易公司可组织六、

七十万、达地矿业公司可组织七、八十万、达地农机公司可组织……”刘文才如数家珍般地一口气背出七、八个公司，那口气让人觉得这些公司都是汇西供销经营部的子公司一样。

耿直的东北汉子一听刘文才可组织的款已远远超出了购 400 万公斤粮食所需的资金，便再也不怀疑什么了。11 月 1 日，绥供农经部与刘文才签订了购销 400 万公斤粮食的合同。很快，39 个火车皮，价值 158 万余元的大豆、高粱从黑龙江绥化发往四川渠县。1991 年 8 月，郭永奎见刘文才并未按所签合同付款，余下的几十万公斤粮食再也不敢发货了。

（九）

“财源”断了。刘文才叹息：“太可惜了”。“可惜有啥用，想法把那几十万公斤粮食弄过来不就行了。”蒲平胸有成竹。刘文才则说：“恐怕不容易，没钱，东北佬不会信我的。”“想法让他信……”蒲平轻轻一笑，道出了“锦囊妙计”——“告诉他们，信用社同意贷款 60 万支付货款。”

“灵！这办法真灵。”刘文才依计而行，火速写信给郭永奎，“汇西信用社同意贷款 60 万，11 月上旬即可汇出”。同一天，蒲平也以汇西信用社的名义写信给郭，“经研究，同意在 11 月上旬结汇西供销经营部贷款 60 万元，用于支付你方贷款，请正常业务往来。‘讲端端正正地盖公章。

同时收到两封信，郭仍不放心。带着考察 60 万元是否可靠的使命，他与本公司业务员曹杰千里迢迢来到汇西乡。

对郭的“考察”，刘文才应付自如：接风洗尘，请当地官方人士相陪，以贵宾规格相待。当然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蒲平的出场。一见面，他便信誓旦旦地与郭神侃起来：刘文才的企业大有希望，我以汇西信用社主任的人格担保，信用社永远是他的坚强后盾。提供几十万乃至几百万贷款有何难，现在我已联系了 80 万元，款到即汇给你们……“

这番话果然奏效，郭永奎留下曹杰等款，自己兴冲冲地返回绥化组织货源。后来，郭永奎回忆说：“简直不可思议，蒲平这么忠厚、憨直的人也会骗人。”

是的，这位东北老兄的确是被蒲平的一副“老实相”、一番诚实话很“自觉”地骗进了蒲平设下的陷阱。不过，如果他知道蒲平以前是如何用“老实”的外表，以“定月付给高利息，由信用社办存折，再贷款给其使用”的谎言骗去云南省地矿局顾影渠 30 万元人民币的事；如果他事前知道这个“老实人”把好几个精明人骗得差点跳楼的事；如果他知道经蒲平搞鬼的账目把内行的会计师们都“查得想哭”的事；如果他能知道案发后蒲平是如何“策反”办案人员，要用叨万买自己脑袋的事……这位东北老兄也许不会因蒲平的一番神侃便兴致勃勃地回绥化静候“佳音”了。

哄走了郭永奎，那留下等款的曹杰咋办？不难。数日后，一张由蒲平加盖了信用社转讫章的电汇凭证上那 60 万元的数字，让曹杰这精灵的业务员欣喜若狂。刘、蒲已汇贷款 60 万元的电报飞到了郭的手中。唉，鬼精的曹杰，你咋不细看，那电汇凭证上取款单位的账号 51082 不是绥供农经部 51f084 的账号呢？你咋不想想电汇凭证须经银行转款？那汇西信用社的转讫章有屁用。当然，他更不知道，郭永奎收到他的电报后会马上发出价值数十万元的高粱交给刘文才卖了去填补“联营款”的窟窿。

曹杰的疏忽，郭永奎的轻信，使绥供农经部先后栽进刘、蒲二位设置的陷阱内的货款达 97 万余元之巨。缺席的被告
(十)

1994 年 7 月 8 日，贪污、挪用、诈骗一千万余元的蒲平和刘文才被法院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放高利贷竟被高利贷吃掉，蒲平很不服气。在法庭上作最后陈述时他高喊：枪毙我之前，我要控告用高利贷来盘剥我的那些单位和个人。

有人对蒲、刘二犯的犯罪似乎也很不理解：他们并没有中饱私囊，奢侈挥霍呀？

更多的人则连连叹息：这两个家伙划不来。

但善良的人们是否知道，蒲、刘二犯 370 多万元的犯罪金额中，支付“分利款”218 万元，约占犯罪金额的 60%，这些“分利款”最终的损失都被蒲、刘二犯转嫁给国家。按金融信誉政策规定，“存款者”的本金和合法利息 80 多万元不得不由江西信用社来支付、兑现。是蒲、刘二犯想吃高利贷才使国家受到了重大经济损失。

本案中，那些“分利者”们的心实在太黑。

矿业公司投入“联营款”30 万元，三年时间便分得利息 65 万多元；巴山贸易公司投入“联营款”30 万元，不到一年便利滚利得了 60 多万元；达地棉麻站投入 30 万元，两年便分得“利息”40 余万元；达地农机公司经营部“联营”20 万元，时间不长便“分利”12 万余元……

办案人员曾问某“分利款”的得主：难道你们不知道放高利贷是违法的？！

“违法？！”“分利款”的得主睁大眼睛“警告”办案人员，“莫乱扣帽子哟！”

这位得“分利款”的年轻经理只认得钱，哪管什么法不法。他大概觉得以牟取暴利为目的，为人提供资金从中获取非法收入是理所当然的呢。他也许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所得的“分利款”实质上就是高利贷，在法律上被称之为——投机倒把。

《辞海》中解释说，高利贷是一种贷放货币或实物榨取高利的剥削活动，主要存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然而，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这种封建社会的剥削活动竟沉渣泛起，又堂而皇之地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出现了。一些企业的经营者见利忘义，见利忘法。他们对高利贷的追逐，不仅使蒲、刘二犯的犯罪愈来愈烈，而且也严重地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难道他们不是本案的被告吗？

然而，由于这些经营单位的法人代表几度变更，企业名称。组成形式时有改变，责任分散等等原因，这些高利贷者便成了本案缺席的被告……
(十一)

本案中，还有一些人也许同样应该站在被告席上。

汇西乡政府是直接管理汇西供销经理部的主管单位。其享受了收取“管理费”的权利，却未尽管理责任。倘若他们尽了这份责，刘文才还能如此肆无忌惮地进行犯罪吗？！

本来，金融部门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方法。但奇怪的是，蒲平竟可以一人掌管数本存单，任他随意填写。蒲平凭空给刘文才转款数十万元，营业所明知刘账上无钱却照常转款，稽核员们都“睡着了吗？”更奇怪的是，县联社每年都要组织若干次检查，蒲平的犯罪活动长达五年之久，居然未被发现，反而还七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荒唐！

这一切，是被欺骗，还是工作读职？或是从中得了什么好处今天，当这些也许被欺骗，也许是读职，也许是得了好处的人，依然平安无事地当着官，干着容易被“欺骗”，容易“读职”，容易得“好处”的工作时，它留给我们的思考又是什么呢？
手
记忆之三：隧道里挖出一窝贪官

距达川市西郊 20 公里处，巍峨挺拔的铁山像一面巨大的屏风由东向西逶迤不绝，达巴公路就从这海拔一千多米的“屏风”上盘旋而过。由于山体陡峭，路窄弯多，汽车不但耗时费油，还经常出现车毁人亡的重大交通事故。九十年代中期，达川地委。行署决定投资一亿元，从半山腰开凿一条隧道，以减少事故，节省能源。工程由达县人民政府具体负责。

从这一决定形成那天起，争取承揽工程的勘探公司、基建队、工程处便蜂涌而至，经过数番投标竞争，勘探和隧道开凿工程分别被中国核工业总公司达县勘察公司。283 大队等部门承揽。

签订合同的墨迹未干，社会上就开始风传“有人在发包工程时捞肥了。”1996 年 1 月的一天，在一个朋友聚会的宴席上，酒至半酣，大家聊起了铁山隧道工程发包的话题，聊着聊着，有人愤愤不平地骂开了：妈的，真不像话，铁山隧道还未开工，就送出去几十万！朋友们好奇地追问谁给谁送了几十万？那人不肯往下讲了，只推说自己是酒后胡言乱语。

当时在场的达县人民检察院某女干警从那人的言谈表情中感觉到此话决非酒后胡言乱语，其中定有重大隐秘。事隔几日，达川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长陈世忠、反贪局副局长谭伦贵在听说此事后，也认定此线索极有价值，应深入摸一摸。

“摸”的结果令人吃惊：283 大队为获得铁山隧道地质勘探等项工程，经该大队领导决定，拿出 28 万元去打通关节，并采取虚报禾苗补偿费、民工费、机场平整费的方法，开三张假发票冲平了账务。

三张假发票及有关凭证的复印件摆到达川检察院领导的案头后，两条决定很快形成了：一，成立由检察长邓光德任组长。副检察长陈世忠具体运作指挥、谭伦贵主办的专案领导小组，分院和达县检察院联手侦办此案；二，秘传行贿人，查清 28 万元巨款的去向。
二

领出 28 万元去“打通关节”的乃 283 大队财务科长刘文等人。当侦查人员定下以刘为突破口查出受贿者的初查方案时，他正在千里之外的广汉市开会。为万无一失，专案组分成四个行动小组在机场、汽车站、火车站及刘的住所附近守株待兔，隐蔽布控。经过四天四夜

的守候，2月9日凌晨1点，刘文终于出现在达县火车站。鉴于刘一行数人，第一行动小组只好通知守候在刘楼下的第三行动小组“准备接客”。

半小时后，“客”被接到了距城数公里外的渠江化工厂。惊魂未定的刘文供认：领出的28万元已送出12万元，剩下的16万元存在银行。当追问12万元送给了谁时，刘文拍头搔首地说：真的记不起了。早晨7点，侦查人员在刘文的电话本上发现记有一串姓氏和数字：王5000，张5000，牟3000，唐2000。办案人员多次追问，刘文都辩称：是写下要的。

根据刘的神态，侦查人员断定：这些姓氏和数字一定与送钱有关。果不出所料，经电话查询得知，刘文电话本上记的王、张、牟、唐正好与铁山隧道工程的正副指挥长姓氏相吻合，那“王”乃达县副县长兼铁山隧道工程指挥长王泽珠，“张、牟、唐”乃达县交通局正、副局长张清远、牟川及总工程师唐代全。负责讯问的谭伦贵及达县检察院副检察长马先奎心中有数了，二人一唱一合地故意把“火”烧到刘文头上：“用不着查了，不是刘文记不起这12万元送给了谁，而是根本没送，全被他自己吞了。”“那就由刘文来负这个法律责任吧！”刘文一听急了，大声申辩说，钱肯定是送出去了，不信，去问283大队的王益富、梁光财，有时是他俩与我一起送，有时是我一个人送的……

检察官们笑笑，拧开笔边记边问：那就详细地说说，这12万元都送给了谁？刘文无路可退了，只好交待：在承包铁山隧道工程前后，为了包到工程和收款顺利，283大队派自己与王益富，梁光财分四次给王泽珠行贿4.2万元，向张清远、牟川、唐代全等人各行贿2万元。电话本上记载的仅是一次行贿的数……

接下来，需秘传王、梁二人取证。刘文被秘传后，其妻李某见刘到时未归，便到公安机关报案称刘文被人绑架。王、梁二人因刘“被绑架”而警觉，上下班都始终同人呆在一起，要秘密传唤二人已不可能。侦查人员将计就计，在公安的支持下，着公安服装，以协助调查刘被绑架为由将王益富、梁光财带到了反贪局。毫无思想准备的王、梁很快被突破，作了与刘文一样的供述。至此，王泽珠受贿窝案、串案像一座冰山慢慢浮出了水面。

三

收网开始了。

2月13日7点，达川分院和达县检察院40名干警分三路对张清远、牟川及唐代全的住宅、办公室同时搜查。搜出赃款12万元。三名毫无思想准备的犯罪嫌疑人一触即溃，如实供述了在铁山隧道工程中与王泽珠一起受贿的事实。

在拘留张清远等人时，邓光德等领导正向地委汇报对王泽珠采取行动的事。陈世忠预计：对张清远一伙动手后，难免走漏风声，王泽珠极可能利用这段“时间差”转移赃款。因此，在向地委汇报的同时，陈安排8名身着便装的干警隐藏在王宅周围，对其住宅的楼梯、电梯和住房进行严密监视，凡进出王宅的人都要严加盘查。

果然，对张清远等人的行动惊动了王泽珠。据他后来讲：“那天上午，我一直心神不宁，总觉得有什么事儿要发生。后来，听说在搜牟川等人的家，当时，估计可能还不至于对我动手，但我还是条件反射地赶紧往回跑。”

王泽珠是 9 点回到县政府大院的，见院坝里停着几辆警车，还有陌生人在房子周围转悠，不祥的阴云一下布满了他的心头。他变得脚慌手乱起来，本想从电梯上楼，却急冲冲地往楼梯上爬，爬一阵又折回去乘电梯，进入空无一人的电梯后，他才渐渐镇定下来。想了想，他觉得眼下应先把屋里的“东西”转移走，于是，便用手机通知在某公安局工作的女婿力军马上回家。

20 分钟后，力军急匆匆地赶回王宅，刚进屋，王泽珠便将一个小布包塞给他说：赶快拿走！不明底细的力军夹着布包就走，王泽珠追到门口吩咐：走楼梯，电梯上有人监视！力军叮叮咚咚从楼梯跑下，当他慌慌张张地刚要跨进出租车时，两名检察官挡在了他的面前。力军发抖了，布包从腋下掉落，侦查人员打开一看，内装现金、融资券 29 万元。

自从“要准备打仗”的年代给监狱编号后，至今，人们仍习惯地把达州市城北的达川监狱叫“四零四”。2 月 14 日，王泽珠被刑事拘留后，一跨进这座戒备森严的监狱，他便哭丧着脸骂了起来：狗日的！县政府行管科整老子的冤枉，把我的办公室分在四零四（四楼四号），现在真的关到这儿来了！

办公室的门号成了王泽珠政治生命的归宿，这不过是一种巧合。但王泽珠不能接受这个巧合，转眼间从一个手握大权的县太爷沦为囚犯，从有地毯、空调的卧室住进冰冷阴森的牢房，这种巨大的转变和反差使他不敢相信也无法正视。他痛苦地发现：一个人从天堂到地狱原来只有一步之遥，而自己当初进入“天堂”却是那么艰难。

在贫困的宣汉县，王泽珠度过了苦涩的童年，从达县技工学校毕业后，他曾当过几年装卸工，拉板车时弯腰勾背和扛包时挥汗如雨的样子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刻骨铭心地印在他的记忆中。1976 年，王泽珠从装卸公司调到达县工交部。经过七年的奋斗，他被提升为县委常委副主任。85 年又兼任了钢煤公司经理。1987 年开始任副县长。

本案结束前，王泽珠曾痛心疾首地反省：几十年来，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我的奋斗中，为党和人民的因素少，为满足自己欲望的成份居多。在贫困的日子里，只想有份工作，有碗饭吃，有了工作想当官，当了官又想有专车有私房，有了专车私房还想发大财，“发”了还贪图金屋藏娇，花天酒地。我的一生都在为功名利禄为欲望忙碌着，忙来忙去终于忙了“进来”。

不过，这种忏悔乃此一时彼一时也，刚“进去”时，王泽珠想的是：决不能就这样完了！

多年的官场生涯练就了王泽珠的应变能力和承受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对眼下的情况他作了两种估计：一、行贿人考虑自身利益，不会轻易出卖自己；二、眼下，办案人员好像并未掌握什么证据，只要自己不开口，神仙也难下手。于是，他否定了侦查人员提出的所有问题，甚至一口咬定被挡获的 29 万元现金、融资券全是亲友存放在自己处的。他在盘算：只要顶住办案人员最初那凌厉的攻势，“自己人”总会想法把自己救出监狱的……

王泽珠的“盘算”是有根据的——如果光去听听个别领导对王泽珠那些高度的赞誉，或者只是看看某部门那份关于王泽珠“廉洁勤政”，没有一个缺点，“应予重用”的考察报告，也许很多人还不会相信这种“根据”的可靠性，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形呢——搜查时，

在王泽珠的家里居然抄出了一封检举王泽珠受贿的举报信。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此举报信上还盖有某检察院举报中心的收发章。邓光德、陈世忠等领导气呼呼地责令追查信件泄秘者时，举报信却突然“失踪”了。后来，尽管曾多次追查，但举报信是谁“献”给王泽珠又是谁从专案组偷走的至今仍一直是个不解之谜。能在保密性极强的专案组里将泄秘的信件“处理”掉，且做得天衣无缝，足见此人乃高手。更严重的是，不仅仅检察机关有内奸，王泽珠的人似乎无所不在——在有四道岗哨的监狱里，王泽珠的情妇居然把“纸条”递了进去。后来，连那些足智多谋的侦查人员也震惊了：专案组成员的情况，专案组的行动及外边很多关于案子的事王泽珠在“里边”仍了如指掌为王泽珠说情的更是络绎不绝——当然，大多数只是把电话打进了邓光德，陈世忠等人的家中和办公室。也有人在电话中恶狠狠地威胁：小心你的脑袋！还有人警告陈世忠：这儿是达县，不是你当年查十多个局长的巫溪县，要好自为之！

五

各种阻力、威胁都没能阻止侦查工作的正常进行，现实也很快将王泽珠的侥幸击得粉碎。张清远及几个送钱的人被从门口带过时，他心里一凉：完了，都被抓起来了，看样子他们已把我卖了！王泽珠一下乱了方寸，精心设置的防线开始崩溃。他打算试探性地交待一些问题，看能否过关。于是，他要求见分院领导。当邓光德、陈世忠等人出现在面前时，王泽珠双膝一软瘫倒在地，边使劲地抽着自己的耳光，边讲了在铁山隧道工程中受贿 4.2 万元的事。接着，他一再恳求：望组织能饶恕我一回，望检察院能放我回家去过年……

当知道“组织”并不相信他只有那点事儿且根本没有考虑“饶恕”他或放他回家过年时，王泽珠觉得问题严重了，畏罪的心理使其产生了强烈的抗拒情绪，他缄口不语，拒绝交待。

挡获 29 万元赃款后，除在王泽珠卧室的保险柜中搜到另一个保险柜的钥匙和 7 个笔记本外，再没找到有价值的证据。陈世忠、谭伦贵等人心急如焚，众多的疑点一直困扰着他们：其一，从挡获的 29 万元赃款看，仅有 8.7 万元现金，其余都是融资券，无一张存折，这是一种反常现象；其二，从融资券的时间看，全是近两年的，前几年的一张也没有，时间上存在着断层；其三，王泽珠住宅的保险柜里锁着另一保险柜的钥匙，说明还有一个保险柜未被查获。种种迹象表明：王泽珠可能还转移隐藏了大量赃款。而要从钢嘴铁牙的王泽珠口中掏出赃款的去向已不可能，只能调整侦查思路，另辟途径。

侦查人员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钥匙和笔记本上，他们觉得，王泽珠既然把这两样东西锁入保险柜，说明他的秘密就隐藏在其中。果然，在翻阅笔记本时，侦查人员发现了两个重要线索：一是一本笔记本中有一张记有银行存款时间和金额为 57 万元的纸条，二是另一本笔记本里写有：经干院小云（3）、（4）、（3），银杏王旭（3）、（3）、（4），春熙李明门）等字样的记录。这些名称和数据是什么意思呢？据了解，小云、王旭、李明分别是王泽珠的儿女和妻妹夫，春熙、银杏、经干院是成都市的地名，对（3）（4）（3）等一连串数据，陈世忠、谭伦贵等人推断：极可能是王泽珠以儿女妻妹夫的名字存在成都的存款数，这几组数据相加应为 2.1 万或对万元。而记有存款时间和金额的纸条表明，王泽珠除成都存款外，还隐藏有 57 万的赃款。

这个大胆的推断很快得到部分印证。3 月初，去成都调查的人打回电话说，在省院反贪局的支持下，已在四川省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对面的储蓄所，春熙路储蓄所、王建墓储蓄所查出以王旭等人名义存入的 7 笔存款计 21 万元，同时还查出王泽珠在成都用 14 万元购买的私房一套。至此，查获王泽珠的赃款已达 64 万元。

六

保险柜钥匙和 57 万元的纸条仍是不解之谜。陈世忠分析：爱财如命和亲情观念较强的王泽珠不可能将巨款和保险柜放在感情不完全可靠的情妇或其他人处，而很可能转移到十分信任的亲戚家中。于是，陈世忠让人绘制了一张王泽珠直系和旁系血亲详图，然后把图交给王“过目”并告诉他，如果不讲出存折和保险柜藏在哪里，我们就按图索骥，在你所有的亲友家同时搜查，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找到，查出谁隐藏，就以窝赃罪严惩不贷！

王泽珠听后打了一个寒颤，连连摆手说：别搜了别搜了，那 57 万元的存折藏在李明家的保险柜内……

到李明家查寻时，保险柜已不翼而飞，通过讯问，才搞清楚，案发前，王泽珠听说有人在告自己，便买来一保险柜抬到李家，将 57 万元的存折装入三个信封锁在保险柜里。不久，王泽珠被捕，力军估计办案人员很快就会找到李家，便建议将柜中的存折转移出去。但钥匙已被办案人员搜走，力军决定撬开保险柜。为了不惊动楼下的邻居，撬保险柜那天晚上，李明早早地将邻居请到火锅店吃饭，然后由力军用钢钎把保险柜撬开，将存折转移到王泽珠的老婆处。接着，力军和李明又买来与原保险柜型号、大小、颜色一样的保险柜，准备将旧保险柜的锁换到新保险柜上，想以偷梁换柱之术瞒天过海。他们“天真”地假设：如果检察机关查找到此保险柜时，用王泽珠保管的钥匙打开是个空柜，57 万元的存款便可顺利地保住。但力军这位公安学校毕业的高材生只知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常识，却忽视了保险柜内部结构各有不同的秘密——旧保险柜的锁怎么也安不到新保险柜上。面对两个被撬坏的保险柜，力军、李明无计可施。最后，他俩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找来一辆车，将两个保险柜拉到塔蛇的洲河大桥上推入河中。3 月 8 日，两个被撬烂摔坏的保险柜从 13 米深的河里捞起，成了李明等人窝赃的罪证。王泽珠的老婆也被迫交出了 57 万元的存折。

七

一大摞存折摆在王泽珠面前，侦查人员让他“过目”签字，不料王泽珠从椅子上一下窜起老高，用颤抖的双手攥着存折大声哭喊道：这都是我的钱，这都是我的钱呀！

此时，王泽珠的心态是复杂的。以政治生命和牢狱之灾换来的金钱眼睁睁地被检察官们挖了出来，他感到极度沮丧，同时，对侦查人员也充满了怨毒的仇恨。但在几天后的那份《我的交待》中，他却这样写道：“我是如此贪得无厌，我痛恨不已！痛恨不已！痛恨不已！！金钱毁灭了我的政治生命，毁灭了我的家庭，毁灭了我的人生，金钱是恶魔！我过去所追求的金钱，今天成了我最痛恨的东西，一想到钱我就有气！”写这段文字的纸上留下了几处被笔划烂的痕迹，王泽珠此时此刻的心境可想而知。

当初，王泽珠对金钱却另有一番厚爱。他在一份“悔罪书”中说：连任三届副县长得不到提拔心中有怨气，想弄点钱算了。官不能当一辈子，钱却是一辈子和每辈人都离不了的。当时，认为没有钱就只有受穷，只有过清贫淡泊的日子，相反，有了钱就有了一切。

他只相信金钱的力量。

只相信金钱的人，最后也只会败给金钱。对淡泊、清贫的生活感到痛苦难熬的王泽珠最终以更大的痛苦为代价，重新认识了淡泊、清贫生活的可贵。所以，相信他骂金钱为“恶魔”是发自内心的，相信他对金钱“痛恨不已”也是真实的。因为金钱使他“失乐园”，使他成

了镣铐加身的囚徒。

更使王泽珠惶惶不可终日的是被查出 120 多万元后的结局。那些天，他常向办案人员打听：会不会枪毙我？办案人员告诉他：这得由法院定。王泽珠以为这是办案人员哄他的托词，便一边嚎陶大哭自己“肯定完了”，一边左右开弓地抽自己的耳光。办案人员哭笑不得，只好反复讲政策，讲“坦白从宽”的案例。王泽珠听后觉得有了希望，擦擦眼泪咬咬牙说：我要争取从宽，我要彻底交待！

王泽球开始“吐”了。他说，自当上副县长后，不少人常借故给我送钱送物，开始，还能抵制，但那大把大把的钱诱惑力太大了，大得让人无法拒绝……

不能拒绝诱惑，则无法拒绝灾难。王泽珠“卞水”了。由于他的插手，煤炭供销公司、双龙铁厂、万河铁厂、县交通局先后将 1300 多万元的基建工程都发包给了“很懂事”的个体建筑包工头黄勋。同时，王还四处为黄催收工程款。为了感谢王泽珠的“帮助”，黄勋 91 年到 94 年间三次给他送去 11 万元。

金钱像海水，喝得越多越感到渴。王泽珠自任副县长后，每年都有数万元的“进项”，但他仍感到不满足，只要有会就鲸口大张。钢煤公司何某求王泽珠“帮忙”，送去 8000 元，经王泽珠运作，何某如愿以偿地加入了钢煤公司租赁集团并当上了科长。1993 年，见经协成都公司在达县的办事处买了一台 8900 元的三菱空调，王泽珠说：干脆安到我家里算了。于是，这台三菱空调不仅从此姓了王，而且，连安装等费用也全由办事处支付。据王泽珠交待，仅在达县机械一厂、石门煤矿、地区工交物资协作公司等单位，他就得到了数十万元的“好处”。

讲完这些，王泽珠打住了，并一再申明：这回真的讲完了，再没有隐瞒什么了。

谭伦贵清楚，这家伙又在耍滑头。据外围调查发现，王泽珠在担任磷铵工程指挥长期间，还有重大犯罪嫌疑。2 月 13 日清晨在对王泽珠采取行动前，有人看见县人大常务副主任兼磷铵工程副指挥长孙在乾从银行取出一万元到了王泽珠家，他们之间肯定有什么勾当。于是，谭伦贵“开导”王泽珠：好好想想，抓你那天早上，有谁到你家来过？王泽珠拍着脑门想一阵后说：“县人大孙主任。”“他是不是给你带一万元钱来？”谭利用掌握的情况向其试探进攻。王泽珠愣住了：怎么连孙在乾送钱的事都知道了？他的思维族风般地扫过了脑海的每一个角落，他很快“明白”了：一定是这老东西卖了我！他呆呆地坐在那儿，眼睛瞪得大大的，像要寻找一块盾牌来抵挡这突然而至的打击，又像要看透谭伦贵的真实意图。但到后来，四面楚歌的感觉使他的眼神渐渐变得暗淡起来。绝望中，王泽珠心中燃起了报复的火焰。他暗暗骂道：孙在乾，你龟儿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试探”奏效。王泽珠一气之下将孙在乾和自己同时“检举”了出来。

八

1990 年，达县人民政府投资 7000 万元对县化肥厂进行技术改造，上磷铵化肥的新项目。王泽珠任该工程的指挥长后，嫌原分管该工程的副指挥长“懂不起”，便将孙在乾换上。为感谢知遇之恩，有了“好处”，孙在乾从来都未忘记过王泽珠。自 91 年以来，孙从自己收受的贿赂款中分出 95500 元送给了王泽珠。据王泽珠检举：2 月 13 日，孙送到自己家里的那

1 万元是两年前孙的内弟袁从建包到建设工程后答应给的“回扣”。孙在给这 1 万元钱时，讲某建筑公司王荣忠也给了 2 万元，由于眼下手头紧，以后再送来……

又一条“大鱼”出现在网中，但孙在乾七十年代末任县化肥厂厂长、县计经委主任，1983 年即任达县县委常委，资历、人缘。智商、关系网都在王泽珠之上。加之王案的侦破已使其早有防备，要将这条“大鱼”捕住已非易事。

侦查人员决定从行贿人身上找突破口，抓实证据再动孙在乾。袁从建与孙有亲缘关系，不易攻破，办案人员决定从王荣忠身上打开缺口。分院地方税务检察室的干警以查王荣忠偷税为由将王秘密传唤到分院反贪局。经过一番较量，王荣忠终于供述：为及时得到磷铈工程基建拨款，他同意付给孙在乾 10% 的回扣作为交易条件后，孙当即批条要财会拨款 20 万元。他“回扣”给孙 2 万元……

行贿人王荣忠的交待与王泽珠的检举形成了证据锁链，孙在乾受贿的事实已确凿无疑。按有关法律程序报人大和地委同意后，3 月 15 日，检察机关对孙在乾刑事拘留。邓光德、陈世忠等院领导对其亲自讯问并适时出示证据后，孙在乾不得不交待了自己 93 年以来利用分管财务和设备购买之机，先后 30 次收受广东、江苏、成都等 19 个单位与包工头贿赂并同王泽珠平均分赃的事实。

根据王泽珠的检举，办案人员又挖出了达县特殊钢厂厂长王明先受贿 10 万元案和厂党委书记田仁伟受贿数万元案。

至此，王泽珠特大受贿串案共 9 人落入法网，查实犯罪金额 120 余万元，扣押赃款和非法所得 200 余万元。

1996 年 12 月 12 日，达川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王泽珠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孙在乾、张清远等 8 名犯罪分子也被判处了有期徒刑。

手记之四：法院院长进班房

达摩克利斯剑落到了院长头上

春节后的一天，达川市东城派出所警察唐洪执行任务时偶然发现了正伺机作案的刘福贵，他不禁大吃一惊：这个“三进宫”的主儿，前不久因盗窃 2500 元被判刑 3 年半，怎么又跑到大街上来了，是不是越狱逃跑？唐洪边想边掏出手铐猛扑过去将其铐住。不料，刘福贵大呼冤枉，说法院同意放我，你公安凭啥抓人。

将刘福贵带回一查，人的确是市法院放的。

事情反映到了市检察院，检察长觉得问题严重，马上派人秘密侦查，并让派出所把刘福贵送到市看守所关押。

刘福贵是看守所的老“顾客”，同市检察院驻看守所主任肖德玉自然很熟。1995 年 5 月 6 日放风时，肖德玉“碰”到刘福贵，开玩笑说：刘福贵，这地方你进得来出得去，本事不小呀。刘福贵得意地一笑：这年头，只要有钱，地狱里也能来去自由。接着，他附在女检察官耳边说：肖主任，想法把我弄出去，给你一万元，怎么样？女检察官沉吟道：可以是可以，不过，我这人办法少，你先告诉我，上次是怎么出去的，我才好照着样给你想办法。

刘福贵压低嗓门说：我花 3000 元，由汪叔叔摆平了的。

刘福贵的“汪叔叔”何许人也？此君腆着个啤酒肚并有“专员”、“外交部长”等大得吓人的官名，实际上他只是某招生办公室一个普通的干部。不过，人们仍尊称他“招办江主任”。“江主任”的确有些手段，某考生差 100 多分才上中专线，他硬是把这个考生“勾兑”进了一所不错的学校。这种事一多，人们都说他真是个人物。

汪某人虽是个人物，但当 5 月 23 日晚，坐在达川地区检察院的审讯室接受讯问并明白自己“勾兑”出了一个罪恶时，他瑟瑟发抖了。他擦着虚汗供出了一个让检察官们大吃一惊的人物。“刘福贵给的钱我送给市法院院长王治文后，他让我找医生开了个有风湿心脏病的假证明，刘福贵就放出来了。不信，我打电话与他对质。”说着，他将桌上的电话啪啪地按了一串号码。

电话通了。话筒里清晰地传出了王治文的声音：“哦，老汪呀，有事吗？”“王院长，刘福贵的案子发了，检察院在查，给你那 3000 元哪个办？”电话那头的王治文急了，“老汪，你先承起！”汪国庆叫苦说：“王院长，承不起呀！是不是先弄点钱给刘福贵的女人，让她背起。”王治文立即赞成道：“对，就这么整。我俩弟兄的事好说，两三千元好大个事，今后退你就是了……”

听完王治文、汪国庆的对话，检察官们明白：一桩受贿徇私舞弊案已初露端倪。

5 月 24 日上午 9 时，正在达川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开会的王治文被叫到了隔壁的办公室。推门进去，已等在那儿的检察官马上威严地宣布：王治文，经达川地区检察院批准，依法对你予以刑事拘留！接过拘留证，王治文像突然看到有人为自己贴出了讣告，满脸惶恐地愣在那儿，很久，才喃喃地哀求道：别戴手铐吧，我不会逃跑的……

对王治文住处的搜查整整进行了 8 个小时。把从王治文家及他情妇万红处搜出的现金、存折一盘点，有人高声惊叫了起来：“33 万元！龟儿子，在哪里整这么多钱！”

王治文落网的消息风一样传遍了全城，达城沉浸在惊喜之中。这天下午，市法院开庭审理一桩经济案件，双方正争得面红耳赤，忽听有人高呼：走呀！看检察院抄王治文的家呀！参加旁听的百余人一哄而散，法官只好宣布休庭。王治文刚被拘留，市法院干警自发捐款买来 400 余元的鞭炮。有人提醒说：市里规定放鞭炮要罚款哟。可法官们乐哈哈地答道：罚就罚吧，放了这鞭炮再罚多少心里也舒畅。于是，已两年未听到的鞭炮声再次在达城炸响，时间长达半个多钟头。当天，有人写出了《达城人民齐欢笑》、《皆大欢喜》两首诗。一群退休工人自费复印千余份，坐着出租车在全城散发。诗虽写得不怎么，大街小巷里，人们却争相传颂：“王治文，不是人，吃喝嫖赌玩女人，徇私枉法放罪犯，贪污受贿样样行……”“如今捕了王治文，除掉达城一祸根”

贪得无厌，权力之花结下罪恶之果

王治文有句“名言”：金钱是人的筋骨。

他特别看重这根“筋骨”：洲河宾馆开业时，王治文应邀赴宴。见餐具好看，众目睽睽之下，他接连抓了三套塞进提包。1992 年 7 月，市国土局开档案达标会，参加会议的市法

院副院长王先义和院档案室主任蒲远寿各得了一把价值 5 元的扇子。王治文生气地问怎么不多弄一把？蒲远寿说别人是按人头发的。王治文一挥手表说，不管那么多，快去给我整两把。蒲只好红着脸去向国土局要了两把。可王治文说家里还差两把，自己又去要回两把。久了，市法院的人有了经验：凡遇上承办会议的单位发东西，哪怕只是一个打火机一只茶杯，一个提包，他们都会向其央求：给我们王院长计划一份。

当然，王治文决不仅仅只看中这些小玩意儿。腾达公司在西外征地建房，拆迁时遇到了钉子户。公司经理胡建平急匆匆地去找法院派人强制执行，王治文却先要胡“借”1000 元钱。这位老兄不开窍，“借”了钱还要借条，被王治文一顿好训：格老子，我一个院长，借十万八万的都没人要借条，你这点儿……不久，基建又遇麻烦，王治文自告奋勇，“御驾”亲征。在车上，胡建平价值 600 余元的瓦时针表被其看中，他晃了晃腕上的表说：老子这表都烂罗，胡建平很“懂事”地建议：把你那烂表跟我换嘛。不料王治文不领情地骂道：龟儿子，小里小气的，戴过的表也好意思跟老子换，重买一只！

胡建平买好瓦时针表送去后，王治文又打电话说表进水，是不是重买一只？胡建平搪塞了几次，但王治文仍不时打来电话。此后，每当电话铃响，可怜的胡经理急得直搓手，就是不敢接，生怕是王治文打来的。但他躲过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为解决拆迁遗留问题，胡建平不得不硬着头皮找到王治文家，刚进门，正同人赌博的王治文便拉腔拖调地劝胡建平：搞企业的人不认识几个人怎么行，来来来，搓一会儿麻将，联系一下感情。胡建平见推不掉，只好甩过去 600 元了事。后来，此君对人说：一见到王治文我就心惊肉跳。

其实，胡建平给王治文上那点“贡”又算什么呢。1993 年，某包工头承包市法院卫星接收天线工程，标的仅 3.5 万元就被王治文索去 6400 多元。同年，王治文在市现代用品家具店“买”价值 3000 元的真皮沙发，不但分文不付，还让该店开一张 2000 元的发票到另一公司报了账。在西外花家润家具店。他只丢下一名“有账收不到来找我”便大大方方地拉走 1000 多元的高级家具。市里几个“发”了的劳改释放人员更是挨“斩”的对象：每隔一段时间，王治文便将他们召来赌博，他们中，有人巴不得在王治文面前当“县（献）长”——不想当也不行，王治文从没有输了掏钱的习惯。于是，每次赌博，他都只赢不输。

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权力的“效益”，“窝边草”王治文照吃不误。1993 年的一天，王治文有意将院里决定分给干警孙跃林一套房子的消息透露给了本人。过了几天，见老实巴交的孙跃林不“知恩图报”，王治文一下来了气：把房子分给何某某算了！在旁人“指点”下，孙跃林如梦方醒，忙借 500 元送去，王治文才又改变了他的分房决定。

凭着这种敲骨吸髓的手段，王治文“富”了。钱多生鬼怪。金钱鼓起了王治文的淫欲色胆。他觉得：如今养小老婆已是一种时髦，像自己这种级别的人没有风流韵事实在是很无脸面。于是，他也不管别人乐意不乐意，想将某女士作“小蜜”，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他只好放弃这个“不识抬举”的女人，进入舞厅酒楼的包厢里寻花问柳。那些花枝招展、风情万种的“小姐”着实令王治文神魂颠倒，但只掏男人腰包却无半点真情的“小姐”们也使他感到“美”中不足。于是，他决定找一个固定的“地下夫人”，免得常遭“小姐”们戏弄感情。几经筛选，本院的万红成了他发展的对象。以前，王治文对万红并无好感，主要是有人看见这个 26 岁的未婚女人半夜三更还常在火车站转悠。为此，王治文曾在会上狠狠批评过她。不过，感情上的事是容易骤然转弯和升温的。1992 年初，人们先是发现万红的书中夹有院

长亲书的“人间最美是真情”——为了这“真情”，他们几乎天天关着办公室的门促膝“谈心”，谈得如胶似漆，难舍难分。后来，有人常看见王治文同万红搭肩搂腰地去冯妹食店或李家汤圆店共进早餐，吃完饭又殷勤地给万红揩嘴，不知内情的老板还直夸王院长对他女儿真好。再后来，干警们发现：王院长已无所顾忌地在万红那儿过夜了……

王治文的一个战友知道这事后，劝他悠着点，可王治文哈哈大笑道：老兄，你落伍了，没听社会上的人说，同样是搞女人，高级干部是精力充沛，重用提升；中层干部是情绪激动，注意分寸；一般干部是作风不正，给予处分；老百姓是流氓成性，必须专政。一个层次有一个层次的待遇嘛。

什么一个层次有一个层次的待遇，像王治文这种人每上升一个层次便只会增加一份腐败，多几份肮脏罢了。失去制约，法律成了他手中的面团

王治文最烦开会。当院长 5 年，他极少开会：传达上边的指示他不开会，部署本院的工作他不开会，连干警们认为年头年尾必不可少的会议也未开过几次。传达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院里有领导建议全院开会讨论一下，可他连连摆手道，分庭讨论一下算了，免得到一起说长论短。

身上有事，心中有鬼，自然怕人“说长论短”。这正是王治文极少开会的一个原因。当然，他并不只是用不开会的方式消极地阻止人们的“说长论短”，对敢于“说长论短”的人他从心慈手软。原副院长张某很反对在案子上个人说了算，多次建议加强监督机制，完善案件审判管理制度，由审委会集体讨论研究案子。王治文甚是恼火，略施小计便让其“滚蛋”了。某院领导说了些“杜绝案子审判中的徇私枉法”之类的话，王治文便断定他“不是自己人”，马上将其主管的工作进行了调整。曾任某庭庭长、档案室主任的蒲某对王治文的做法稍有微辞，其职务也被免得精光。被王治文“清理”的人中，最冤枉的要数赵某。此君老爱站在阳台上抽烟，而那阳台正好对着王治文与万红的“爱巢”，王疑其会“说长论短”，便没少给此君穿小鞋。

在整一批人的同时，王治文很注重拉拢“自己人”。刑庭庭长涂盛礼、副庭长王体明（两人已另案处理）对其惟命是从，尽管有贪污、挪用、徇私舞弊等事儿，仍成了王治文的“自己人”；汪某与劳改犯公开赌博被公安抓获闹得满城风雨，但这人“听话”，王治文就把有关方面要处理汪的意见扔到了一边……

经过“整顿”和笼络，极少有人“说长论短”了，于是什么规章制度、什么法院组织法、什么案件审判监督统统成了王治文个人的事，法律也成了王治文等人手中的面团。达川市法院 1990 年以来审理了五千余件案子，却极少开审委会，案子大多数是他个人说了算。在王治文的带领下，刑庭庭长涂盛礼、副庭长王体明等人给罪犯伪造有病证明，将罪犯年龄改小；王治文则亲自给盗窃犯刘福贵寻找监外执行的理由，使其逃脱服刑。在桑春雷一案中，王治文更是肆无忌惮地践踏法律。

1993 年初，市国土局驾驶员桑春雷等三人将某单位一辆东风车偷去卸下四只轮胎卖得 7500 元，被市法院判刑 5 年。桑犯的父母借 5000 元找到某酒楼刘老板，求其帮忙救儿，因王治文常到酒楼吃喝坐包厢，刘老板一拍胸膛答应帮桑家摆平这件事。

一天，刘老板办好酒席，请来王治文、万红、涂盛礼等四人，酒至半酣，适时给王治文等四人各敬上两条红塔山香烟后，刘老板双拳一抱说：各位法官大人，我的亲戚桑春雷遇到了点麻烦，还请你们帮个忙。涂盛礼忙道：判了5年，这个忙不好帮了。王治文也责备说：你娃儿不早球点说，判都判了犍个整嘛。刘老板端起酒杯笑道：这点小事，还能难住王院长？王治文脖子一仰将一杯酒吞下后说：都是兄弟伙，这个忙不得不帮了。说完，他把桑犯的妈妈叫到包厢里面授机宜说，要放你儿子，只有搞个证明。桑犯的妈妈问，啥证明？法院院长像老师教诲学生一样，为桑犯的妈妈指点迷津，讲明路数说：证明你儿子有病，并且是传染病，劳动不得……

经王治文点拨，桑犯的父亲到某医院按“要求”开了个桑春雷有乙肝的证明。桑父将证明交给涂盛礼和另一承办人时，又送上1000元“小意思”，于是，承办人便在判决执行通知书上飞快地写道：有乙肝，暂予监外执行。

不久，不知内情的另一法官仍准备按判决将桑犯送劳改农场。王治文提醒说，桑春雷有病哟。为掩人耳目，他又补充道，查一下再说。这位法官不知其意，真去查了此事，发现桑犯有病是假。不料，王治文对其大发雷霆：傻乎乎地去查个啥，吃饱了没事干！

在王治文的“关照”下，被判5年刑的桑春雷一天刑也未服便又获得了自由。当然，这“自由”是不能白给的。刚放了桑春雷，王治文便把一张3840元的空调发票拿到刘老板处报销。把这钱装进荷包时他又对刘老板张罗说：给我弄一台。29英寸的画王彩电。此后，王治文带人数次到酒楼白吃白喝白玩“小姐”，刘老板叫苦不迭，只好自认倒霉。“肥猪政策”编排出中国式的黑色幽默

王治文贪婪的故事也许应追溯到20年前。那时，他是西藏某部队的一个连指导员。1974年，西藏某县那场叛乱被平定后，王治文成了调查对象——战斗中，他将一块高级手表装入了荷包。1980年转业到达川市法院后，那贪占的毛病依旧难改，当副院长时常干些违法乱纪的事儿。1989年，纪委调查了他的经济问题。不查则罢，一查他反倒由副院长提升为院长。1990年刚当院长，他带人到重庆执行案子时，便把2000元的诉讼费“补贴”给了自己。不久，他帮地农机公司到外地收款，在该公司报得2054元出差费后，又令手下从该公司将票据要回在法院重报。这些事有关单位都查过，但是——有些反腐败的事大多都不幸被这“但是”给搅黄了。于是，王治文不但连和风细雨的批评没挨一句就过了关，反而还有人帮他特批了一级工资，并当了“先进工作者”。

1993年下半年，有关部门组织的调查组又到了市法院，结果，人们除在当地党报上看到有人（消息灵通人士称此人正是王治文）提着高级烟、酒和1000元钱去贿赂有关领导而被拒绝的故事外，群众举报的问题依旧泥牛入海。1993年，又有群众到有关部门反映王治文同万红的事，有人不耐烦了：你把别人在床上抓住了吗？没抓住就等抓住了再来告状。王治文也洋洋得意在法院宣称：你们今天告，我明天就知道。你们告不倒我，老子是不倒翁！

一批可敬可佩的市民和法院干警从未放弃同这个“不倒翁”的斗争。4名干警带着60多人签名的举报信自费数千元上京告状。去年，人代会召开时，法院干警又把举报材料送到了代表手里，有人火了，扬着举报信在会上宣布：市法院不团结，搞窝里斗，这些信纯粹是诬告、是造谣，开会的代表，你们手中若有这种信请自觉交上来。

代表们很纳闷：据掌握的情况，王治文的确有很多问题，这人怎么这样护着他？后来王治文落网，人们才从其交待中搞明白：原来此君得过王的“红包”。

王治文落网后，人们作出了种种假设：如果有关方面认真履行了监督职能，如果管理正常……王治文肯定不能当那么久的“不倒翁”，也不会跌得那么惨。

然而，有人却不失幽默地揶揄：这些人是在搞肥猪政策——猪不肥是不能杀的，腐败分子不彻底暴露有的人是不会允许查处的。

好一个“肥猪政策”，可悲的中国式的黑色幽默。

猪固然是肥了才杀的好，但对有问题的干部怎能采取这种表面保护，实际很残酷的“政策”呢？

人们啊，不要再“喂”出这样的“肥猪”来。
死心塌地

手记忆之五：

监狱里她依然痴情不改

程丽娟对毒贩子吴波的死心塌地在监狱是仍表现得那样淋漓尽致——家人送去 50 元生活费，她分给了吴波一半。狱友请吃一份回锅肉，她恳求看守全带给了吴波。托人买三个包子又求看守转交，看守烦了，不帮她转，程丽娟边哀求边哭诉，并威胁说，如不帮她转交食物给戒毒后急需营养的吴波，她就用绝食以示抗议……

采访时，37 岁仍面容姣好的程丽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女人像祥林嫂——刚在审讯室特制的石凳上坐下，也不管我是不是判刑的人，她便没完没了地哀求：把我多判几年吧，吴波的刑期让我顶，就是死我也要帮他呀……

真想数落她一顿：不自尊自重，为过去的恋人背叛丈夫，为毒贩不惜以身试法，除了为达到某种目的，除了钱，也除了寻求肉体上的刺激，你还会这样痴痴迷迷，要死要活吗？

在后来的采访中，有些事却让我不可思议了。如果说是程丽娟对吴波旧情难忘，但 89 年至 97 年，他俩从未有过接触。是贪图吴波的钱财吗？事实却是：自认识后，程丽娟不仅未用过吴波分文，她反倒为吴波的戒毒贴了近万元。他们更不可能是寻求男欢女爱的性爱。医生说：毒瘤较深的吴波基本上已丧失了性功能。而据程丽娟的丈夫夏斌讲，自 94 年做子宫肌瘤切除手术后，妻子对性生活一直比较冷淡。重要的是，婚后，他们夫妇关系一直较好。夏斌认为，妻子是值得信赖的……

不为旧情不贪金钱不因性爱的程丽娟却用自己的毁灭去为一个毒贩“殉葬”，把悲剧和困惑留给了我们。

17 年前，“高仓健”为少女包扎流血的心

1963 年，程丽娟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也许是沾了城外那长江的灵气，程丽娟天生丽质。清纯的瓜籽脸，水葡萄似的大眼睛及不用节食减肥就“亭亭玉立”的身段使她在江津城内成了小伙子们疯狂追求的对象。

也许是“红颜薄命”那古老的咒语注定了她的人生必然会出现悲剧，程丽娟的初恋就格

外不幸——在拒绝众多优秀的追求者后，她却一头钻进了另一个女人精心设下的圈套。

江津市某局的王刚与刘晓玲是大学同学。在校时，刘晓玲便爱上了风度翩翩的王刚。分到一个局工作后，对暗恋了数年的白马王子刘晓玲更是志在必得。她以帮助同学为由承包了包括王刚的内衣内裤在内的所有衣物的购置和洗涤，并常把王刚请去吃喝。但王刚对这个相貌平平的同学的一片苦心只装聋卖傻地表示：愿纯洁的同学关系万古常春。

刘晓玲当然不愿与王刚只保持“纯洁的同学关系”。但这个颇有心计的女人被拒绝后，不仅没表示不满，反而更周到地照顾王刚，她甚至忍受着内心巨大的痛苦和浓浓的醋意为王刚介绍对象。她欲擒故纵，要让王刚在受“情谊”感化后主动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

程丽娟成了刘晓玲导演的阴谋爱情的悲剧角色。1979年11月，经刘晓玲介绍，程丽娟、王刚这两个不明“导演”意图的“演员”按照自己设计的剧情轰轰烈烈地相爱了。一年后那个寒冷的冬夜里，在程丽娟上班的宾馆里，王刚用山盟海誓和脆地哀求让程丽娟交出了少女的贞洁。不久，她怀孕了，在小城人们鄙视的目光中，程丽娟焦急地催办婚事，王刚却开始冷淡她了。实在推脱不了时，他才答应在程丽娟先堕胎的前提下再于82年春节结婚。

当程丽娟做过人流，喜气洋洋地买嫁妆、布置新房时，这场被人导演的恋爱悲剧已临近闭幕了。一天，程丽娟打开王刚寝室的门，她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在那张准备用来结婚的双人床上。刘晓玲与王刚重叠在一起狂吻着扭动着发出怪异的呻吟像突然挨了一门棍，程丽娟眼前一黑，昏沉沉地倒下了。在医院里，她连续数日高烧不退，谵语中还一遍遍地呼唤着王刚的名字。

王刚再也没有回到程丽娟身边，只托人带了封信，那信中说，爱情不一定发展成婚姻。不要太认真，就当是一场噩梦……

程丽娟却走不出“噩梦”。初春一个夕阳如血的黄昏，她踉踉跄跄地到了长江边。当她紧闭双眼准备纵身融入江中以求解脱忧伤烦恼时，有人拉住她猛喝道：程丽娟，怎么这么没出息！

被送回医院时，程丽娟才渐渐想起将自己从死神手中救下的人是邻居林蓉的爱人，名叫吴波。这个身高一米八的男人，因表情冷峻，气质凝重，姑娘们背地里都叫他高仓健。

此后，吴波又看望了程丽娟几次。程丽娟发现，这个被人称作高仓健的男人不仅风度潇洒，且阳刚而不失温柔，粗犷而又细心。比如，他不知从哪儿摸清了程丽娟的爱好，每次去，除带上程丽娟喜欢吃的零食、水果外，还抱去一大摞她喜欢的杂志。这个善解人意的男人与程丽娟之间似乎有着天然的心灵感应功能，程丽娟的每一个眼神，每一声叹息及喜怒哀乐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像一个高明的医生，细心地包扎着程丽娟流血的心，并精心地调理抚慰她思想的伤痕。程丽娟忧伤烦躁时，他以理解同情的目光默默注视着，直到她平静镇定下来；程丽娟感到沉闷时，他便搜肠刮肚地讲些笑话让她高兴。程丽娟情绪好转时，他会不失时机地讲些如何正视人生，战胜挫折的道理。他让程丽娟明白了：婚姻只能随缘而遇而不应强求。遇到负心郎，更不值得为其神魂颠倒甚至轻生……

两个月后，吴波引着程丽娟终于走出了人生的低谷，她释然了久淤的苦闷，并在心底筑

起了一座坟墓，埋葬了那欺骗自己三年的“爱情”。更令程丽娟感动的是，当自己勇敢地重新生活后，吴波便悄然离去，消逝得好像从未出现过。“债主”南逃，她将自己吊上了情感的十字架吴波帮程丽娟走出了绝境，他家中却因此燃起了“内战”的烽烟。新婚不久的妻子林蓉不理解更不能容忍丈夫对程丽娟的帮助，先是在家中打闹哭骂，然后扬言“要撕烂程丽娟这娼妇的脸，让她知道老娘的厉害”！为了不让程丽娟受伤害，吴波主动断绝了与程的联系。即使在路上远远看见程丽娟，他也都主动躲开。

据吴波后来讲，当时，他的确很喜欢程丽娟。但那只是人们说的比朋友多一点儿，比情人少一点儿的那种感情。虽躲着不见程丽娟，但那张瓜籽脸很长一段时间都占据着吴波的感情世界。他有意无意的把妻子同程丽娟比较，并按程丽娟的穿着去打扮妻子，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每当这种情感折磨得他不能自制时，他便躲在程丽娟上下班的路边偷偷看几眼那个令自己心神不宁的身影。有几次，他还在夜里鬼使神差地来到程丽娟的窗外，望着映在窗户上的熟悉的影于久久发呆……

吴波隐隐感到：自己前生一定欠了这女人什么，此生注定要为她付出代价。他们之间一定要发生什么事情……

事情终于发生了。1989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吴波在一个巷子里突然碰到程丽娟，躲开已来不及了——他也不想躲开，便站在那儿默默注视着几年来令自己魂牵梦索却不能相见的女人，程丽娟迎视着那忧郁、伤感却有几分温柔的目光缓缓走上前，声音哽咽地问：吴波，这么多年你到哪儿去了，怎么一直见不到你？

吴波凄然地笑笑：一言难尽。

程丽娟马上接过话头：那就找个地方慢慢谈吧。两人来到一家酒吧，要了些点心饮料，边吃边谈了起来。他们详细介绍着自己的家庭、孩子及八年来的生活经历，却惟独未将那可能会打搅对方生活的浓浓思念之情吐露出来。

此后，在小城人们惊诧的目光中，他们又约过几次会。据程丽娟讲：当时，在人们的眼中，我俩形同情人，但我们只保持着一种柏拉图式的情人关系，根本没有发展到人们想象的那种地步。

小城里的人们似乎不懂也完全不能容忍“柏拉图”。程丽娟吴波有婚外恋的桃色新闻通过老太婆小媳妇们的嘴很快传得沸沸扬扬。林蓉再次点燃家庭内战的烽烟，吴波从此陷入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的混战时期。两个月后，吴波被林蓉抓着衣领揪进了法庭。这个动作重复几遍后，法官宣布了这个家庭的解体。

吴波的离婚使得另一个家庭也失去了平衡。程丽娟觉得吴波有恩于自己，又因自己而家破人散，自己欠吴波的太多了。为了偿还这笔人情债，她向婚后一直善待自己的丈夫夏斌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但当不明底细的丈夫问她原因时，话到嘴边，程丽娟又咽了回去。这其中的苦楚好难说出口：徇情，定会伤害善良忠厚的丈夫。不离婚，又怎么去回报那个为自己付出沉重代价的男人？在保全家庭和偿还“债务”之间，程丽娟进退两难，惟有以泪洗面……

就在程丽娟彷徨忧伤之时，因不愿破坏程丽娟的幸福，也不愿伤害夏斌，吴波只身去了海口市。

“债主”南逃，程丽娟的心再次受到强烈震撼。她更加不安了：欠吴波的离婚之债未还，“债主”又因自己背乡离井，流落天涯海角。对那无处偿还的“债务”，程丽娟只有将自己吊上情感的十字架……
拷打着良心去“还债”

吴波一去九年没有消息。

九年的时间恢复了程丽娟家庭的宁静和幸福。90年，她辞去宾馆的工作从江津迁到了达州市，与丈夫结束了牛郎织女生活。聪明可爱的女儿仍在江津跟着外婆读书。丈夫是达州市某公司的领导，经常出差在外，程丽娟闲得无聊时，便出去打几个月工，日子过得倒也随意舒心。

97年，回江津过春节时，偶然听到的一个消息使程丽娟的心情一下又沉重了起来：吴波在吸“粉”，且毒瘾较深！

当时，程丽娟就觉得吴波吸毒一定与自己有关。她在心里反复说：一定要帮他把毒戒掉，还了这笔感情债。

8月下旬，在甘肃承包一酒家的程丽娟终于找到了吴波在海口市开饭馆的电话号码。她用颤抖的手拨通了电话，那个熟悉的男音刚“喂”了一声，程丽娟便忍不住声泪俱下地大声责问：吴波，你为什么吸毒？你为什么要吸毒呀！

电话那头的吴波一愣，但他马上知道了这责问自己的女人是谁，“丽娟！你……我……”吴波激动得浑身簌簌颤抖，说话也吞吞吐吐。一时，他真不知怎样回答。告诉她，是因自己飘零异乡，难忍举目无亲的孤独寂寞才吸了毒？或者告诉她，九年来无处倾诉的思念之苦，让自己沦落到了这种地步？但电话中那撕心裂肺的哭声使他明白：如果这样讲了，她会更加悲伤，更加愁肠百结。于是，吴波东拉西扯地讲海口的物价太高，自己饭馆里生意冷淡等情况。不料，还未听完，程丽娟便说：别谈物价和生意了，回江津去戒毒。9月8日我在重庆火车站接你。回江津时，在海口那边买些戒毒药，买药的钱我马上寄来……

挂了电话，程丽娟才想起，这件事怎么向夏斌讲呢？婚后十多年，丈夫对自己尊重信任、恩爱有加。而自己仍对吴波保持这种感情，并要帮他戒毒，这对丈夫公平吗？这不是一种背叛吗？

程丽娟将自己吊在十字架上的情感押上了道德的法庭，狠狠地拷打着自己的良心和灵魂。她觉得自己的做法实在愧对丈夫。

但想到吴波因自己不仅家庭破裂、流落他乡，还成了吸毒者，现在，自己生活幸福，吴波却在毒海里苦苦挣扎，不帮助他脱离苦海，自己的良心此生又怎能安宁？她在心中呼喊：丈夫呀，你能理解妻子的苦心吗？你能原谅我这个感情的背叛者吗？

坚定决心后，程丽娟将自己承包酒店赚的 3000 元寄给了吴波，然后，于 9 月 6 日回达川对夏斌说自己要回江津住一段时间。9 月 8 日，她赶到重庆后便一步不离地守候在火车站出口。

吴波走到面前时，程丽娟被他的样子惊呆了：长长的头发。胡须里隐露出一张苍老而无血色的黄脸，因穿着短裤和背心，那瘦骨嶙峋的手脚及胸背全部暴露无遗。这哪里是十多年前那个虎背熊腰，一表人才的吴波！程丽娟一阵心酸，禁不住潜然泪下。

回到江津，在一个朋友家安顿下来后，艰苦的戒毒开始了。吴波吸“粉”两年，已属深度中毒，从海口市买回的那些戒毒药对控制他的毒瘾根本无济于事。每次犯了毒瘾，他浑身乱抖，气喘吁吁，口水鼻涕直流，脸色白得像纸，吓得程丽娟边哭边替他擦洗。吴波毒瘾犯过后便昏睡不醒，不知所措的程丽娟只好整夜整夜地坐在床边守护着。后来，听说银耳汤可清热解毒，她便天天熬给吴波喝，为了加强营养，程丽娟买水果、买滋补品，变着花样做可口的饭菜给吴波吃，吴波没有食欲，她便像哄小孩样一口一口地喂。带去的 1500 多元很快就用光了，程丽娟又将价值 2700 元的金手链贱卖用于吴波戒毒。

十多天后，虽有一些好转，但吴波对毒品的精神依赖仍未减轻。一天，趁程丽娟外出，他又溜下楼找“粉友”买了些海洛因躲在厕所里偷偷吸，程丽娟发现后，伤心地哭了整整一天。不久，当再次发现吴波偷偷吸毒后，程丽娟抄起菜刀说：吴波，我这条命是你救下的，现在，你不听劝告，我就以死还你一条命，还你的情。吓得吴波夺下刀连连保证不再吸毒。

吸毒者是无理智、无信誉可言的。过了几天，程丽娟又发现了吴波藏在室内的一包“粉”，她不声不响，学着吴波的样子便吸了起来。吴波忙抢过去说：你疯了！我想戒都戒不脱，你还要吸！程丽娟却告诉他：你离婚、吸毒都是因为我。现在，我也吸，有了毒瘾，我俩就扯平了。

因程丽娟的控制，吴波戒毒有了进展，二十多天后，毒瘾基本缓解。吴波准备重回海口市，但怕他回到那边有地方买“粉”又“死灰复燃”，程丽娟坚持把他送到了山东成武县一个朋友处，那儿是一个小县城，没有卖“粉”的。但去后因水土不服，半月后，他们只好返回江津。在吴波信誓旦旦地保证再不吸毒后，程丽娟这才一步一回首地惶然而别，回到了达川。

青海无涯，一对恋人双双跌入了地狱

1998 年 2 月中旬，江津传来令程丽娟心碎的消息：因经不住“粉友”引诱，吴波又在吸“粉”。

程丽娟明白：吴波之所以重陷毒海，是因无人监督才前功尽弃，要彻底戒掉，必须有人在监督的同时对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之从心理上彻底摆脱对毒品的依赖。她认定这个监督说理之人非自己莫属。上次戒毒已去江津等地近四十日，现在自己不可能再去外地，只有让吴波到达川家中来戒毒。但让吴波来家中戒毒，夏斌能同意吗？

程丽娟向丈夫求情了。她告诉夏斌，自己欠吴波的太多，若能帮他把毒戒掉，不仅去掉了自己的一块心病，同时也是功德无量之事。仁慈、大度的夏斌答应了妻子的请求。

2 月 15 日，吴波如约来到达川程丽娟家中。第三天，吴波毒瘾发作，症状反应比上次

在江津戒毒时更强烈，他又吐又拉，抱着脑袋在地上乱滚乱撞。稍缓过气，吴波说：丽娟，最近，我吸“粉”量大，这次又未准备戒毒药，这样硬戒必死无疑，你去帮我买点海洛因，吸时，一次一次地减少用量，缓戒可能要好些。

程丽娟犹豫了，吴波专门来戒毒，如果准其再吸，无异于让他饮鸩止渴。不为吴波买“粉”，且不说他真会“必死无疑”，就是他那痛苦万状的样子，自己也实在于心不忍。思来想去，对吴波的心痛战胜了理智。她同意了“缓戒”。

知道丈夫单位的张平也是“粉友”，程丽娟与吴波坐上出租车四处寻找。在火车站找到后，程丽娟如遇救星般地塞过 110 元要其“弄点粉救个急”。20 分钟后，张平弄来一包“粉”，吴波与张平在一建筑工地的墙边如饥似渴地吸了起来。吸完，吴波向程丽娟乞求：这“粉”太少了，再买一包吧！见吴波那可怜巴巴的样子。程丽娟又气恼又同情，她一边拿出钱交给张平，一边嗔怒道：这次吸了不准再吸了！

当晚，在与张平分享买来的海洛因后，吴波埋怨达川这边“粉”量太少了。他认为做“粉”生意划算。为了既有“粉”吃，又有钱花，吴波、张平决定联合卖“粉”。

18 日，程丽娟听了吴波借钱回江津买“粉”的计划，惊诧得大声吼了起来：你自己被海洛因害成这样，还要买来卖，这不是伤天害理吗？吴波却说，这“粉”光吃不卖实在消费不起，只有以卖养吸，才能维持戒毒。他还一再表示，只要把毒戒掉了，就坚决洗手不干。

程丽娟虽打心眼里不赞成吴波去干这贩毒的勾当，但想想也有些道理：吴波“缓戒”需吸“粉”才行，自己为吴波戒毒花了近万元，现在已提供不出资金，让他买点毒品去卖，也不失以毒戒毒的权宜之计。于是她又给了吴波 1000 元。

程丽娟从同意吴波在自己家吸毒到借钱让其贩毒，她开始从“还债”一步步走向了犯罪，她本想将过去的恋人救出苦海，却被恋人拉进了地狱。吴波从她那儿借钱买回三克海洛因，除留下一部分自己吸食外，将其余的包成 10 包让张平出售。为了方便卖“粉”他还借来程丽娟的传呼，并用程丽娟家的电话联系江津毒贩胖哥，让其在 2 月底的一天晚上送 10 克海洛因到程丽娟家。一个星期后，10 克“粉”被吸食、销售一空，吴波再次打电话让胖哥送“粉”到达川，但胖哥嫌路远，约吴波到重庆市去拿。

也许是嫌单独去重庆太寂寞，也许是怕路上不安全，吴波邀程丽娟同行。程丽娟清楚吴波此行的目的，也清楚自己同去重庆的性质。“那可是犯罪的事，我不去！”她拒绝了吴波的要求。但她的决心很快就被吴波那哀怜的目光动摇了。她担心吴波在路上犯了毒瘾无人照顾，她担心有歹徒抢吴波带去买“粉”的 4300 元钱，犹豫一阵，她还是与吴波一道出了门。从毒贩手中买回 10 克海洛因后，程丽娟感到后怕了。吴波看出了她的心思，安慰说：丽娟，放心吧，我会尽快把毒戒脱的，这些“粉”卖后有了钱，我就去做点其他生意，然后，找个老婆安个家，省得你再为我牵肠挂肚……

吴波的前景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美好。他买回的“粉”还未卖完，3 月 11 日便与程丽娟双双落入法网，4 月 26 日又同时被宣布逮捕。在看守所里，没有人像程丽娟那样迁就他“缓戒”，他的毒瘾居然奇迹般的戒掉了，对此，他感到十分高兴。采访时，在讲了因自己吸毒贩毒而连累程丽娟他深感不安之后，吴波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对朋友贫贱不相忘，

患难不相弃，生死不相背，这固然是人与人之间最难得最宝贵的一种感情，人间也最需要这种感情。但一个人如果被情所困，因情而失去理智，那就是一种感情的悲哀了。他举例说，比如丽娟帮我戒毒的事……

手记忆之六：捕“虎”记忆

荒唐男女

为便于记述，先介绍本文主人公的一段罗曼史。

李虎那段罗曼史发生的时间应倒溯至 1993 年。那时，年方 20 的李虎在达县烟草公司碑庙烟草站就职。烟草站隔壁住着一位新近丧夫的寡妇梁芳。20 岁虽是对异性充满神秘感和青春骚动的年龄，不过，梁芳毕竟是 32 岁的已婚女人，且两人都知道“寡妇门前是非多”，故李、梁虽隔墙而居，天天见面，却也“受授不亲”。

后来，李虎回忆说：“也许我同梁芳前世修有一段缘分，今生才会出现这种事。”他已不记得“缘分”修成的具体日期，但整个过程却历历在目。

大约是 5 月初的一个晚上，百无聊赖的李虎抱着收录机躺在床上惆怅地等待着梦的解脱。梁芳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女的。李虎的情绪一下振奋起来：让坐、泡茶、抓瓜籽。梁芳指着那女人面带难色地说，小李，这是刘 A，我的同学，她急需一笔款，帮忙借点可以吗？

“当然可以！”李虎受宠若惊，像大款一样抓出一迭公款，“要多少？”

刘 A 刚说出数字，李虎便哗哗地数 3000 示递了过去。

为表示感谢，不久，刘 A 在梁芳家宴请李虎，并请梁芳作陪。来而不往非君子。几天后，李虎在梁芳家回请刘 A，梁芳自然又作陪。李虎、刘 A 既已“礼尚往来”，梁芳当然不能老作陪客。于是，不久后的一个晚上，她备下一桌酒菜请来了李虎、刘 A。也就在那天晚上，李虎、梁芳的“缘分”在吃喝中“瓜熟蒂落”了……

也许是怕李虎的风流韵事给烟草公司造成不良影响，或者是因为工作需要，1994 年 3 月，李虎被调到渡市，后又调到更远的麻柳烟草站。但区区百余里岂能隔断他们的“情深意笃”，很多时候，李虎白天在烟草站上班，晚上却乘夜班车“暗渡陈仓”去了碑店。弄“假”成真

达县烟草公司有个规矩：每月 18 号，各区烟草站必须向公司结账交款。

8 月 18 日也不例外。不过，这天出了个小小的意外，一大早，公司那辆“野马”在去麻柳的路上抛锚了。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 5 点，收款车迟迟不到，李虎早不耐烦了。他嘟嘟囔囔地骂道：妈的，老子们卖了一个月命才七、八十元，我要到公司去找李经理，不干了！这种牢骚，站里的人早听惯了，所以，任李虎怎么骂骂咧咧，大家并不理会。李虎越骂越起劲，他拍着一口袋货款对站里的周文忠说：信不信，老子把这钱提起跑他妈的！

周文忠数落说，你娃儿算了，经常吹壳子提虚劲管啥用……

周文忠在数落李虎时，没有注意到李虎那微微发颤的双手和充满贪婪的目光，更没能揣摩出那隐藏在打赌中的罪恶念头。

其实，这念头并不是那一瞬间产生的。李虎到烟草站当合同工不久，失落和不满便紧随而至。他常叹息：这成天与烟草打交道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头！平时，少喝几瓶汽水、少得几元奖金也都会诱发他数日的唠叨和咒骂，他骂公司的人“是一伙混蛋”，骂站上有的人“比希特勒还狠毒”。咒骂中，李虎萌发了报复的恶念：总有一天老子要整公家一蛇，拿回我的那一份！

可悲的是，这种恶念以打赌的形式公开时，却被人们当成了提虚劲的大话。事后，站里的人拍着脑袋后悔地说：当时，还以为他龟儿又是喊狼来了呢，谁知这小子弄假成真，我们竟一点也没在意。

比这“不在意”更可怕的是：这天下午 5 点多，李虎提着 67 万元钱大摇大摆地爬上开往县城的客车时，站里的人仍未在意。直到 8 月 20 日，公司前去收款时，人们才想起已两天未见李虎的踪影，联想起他打赌时的话，大家连呼：完了！这龟儿子把钱提跑了……狂奔

反贪科副科长欧朝江接受任务后，同刘荣等侦查人员立即顶着初秋的骄阳到烟草公司、麻柳等地展开调查。21 日上午，办案人员得到消息：20 日下午 4 点左右，有人看见李虎在达县火车站出现过，烟草公司马上派人前去寻找，却不见其踪影。另查明，李虎有一表兄在成都某单位工作。办案人员分析：下午 4 点左右，达县火车站只有一趟由武昌开往成都的 77 次列车，李虎很可能乘这趟车逃往成都他表哥处。

21 日下午，办案人员乘 77 次列车追往成都。由于火车晚点，侦查人员赶到李虎表哥处时，李虎刚离开半小时，去向不明。至此，侦查暂时陷入僵局。

李虎究竟逃往哪里了呢？原来，8 月 18 日下午，李虎乘车赶到达城时天已近暮色，拎着一口袋钱，他心中充满了亢奋，仿佛看见公司、站里那些“混蛋”和“希特勒”正急得热锅里的蚂蚁，样团团乱转。报复后的惬意和顷刻间“致富”的兴奋使他激动得浑身直颤，想不到这么容易就“发”了，真他妈的应该到总统套房去潇洒一下。早就听说那里有美酒、美味，还有美女……想到美女，梁芳的情影自然又浮现在李虎眼前，这个比自己大 12 岁的寡妇虽算不上美女，对自己却十分温柔体贴。拿走了钱，“混蛋”、“希特勒”们肯定不会善罢干休，眼下，还是先到梁芳那里避避风头吧。想到这里，李虎跳上了开往通江的末班车。

车到碑庙已是晚上 11 点，李虎将钱藏在梁芳的衣柜下，除久别重逢后的亲热恩爱外，两人一夜无话。19 日，经“深思熟虑”后，李虎从钱袋里拿出 3000 元装进衣兜后对梁芳说。芳，为了我们的幸福，我应做点大生意，因此我要出去考察一下。

“大生意？哪里有钱？”这位小情人爱“吹壳子”的毛病梁芳早有领教，她揶揄地笑道：算了吧，我的小虎儿。

梁芳的话激得李虎一下蹦了起来，“钱！大大的有！”激动中，他竟冒出了一句日本话，说完还踢了一脚地上的钱袋。见梁芳用怀疑的目光打量自己，他又补充一句：“这钱都是我

做谷子生意赚的。”

小情人赚了钱，并要“为我们的幸福”“去考察”去“做大生意”，梁芳自然激动不已。一夜缠绵后，20日清晨，她恋恋不舍地将李虎送上了去达城的客车。

李虎的“考察”一开始就出师不利。当天下午，刚到达县火车站，李虎就碰上了烟草公司的一个熟人。瞬间，像野兽突然发现丛林中隐现着猎人的枪口，李虎一下感到了灭顶之灾降临前的不祥之兆，惊恐中，他跌跌撞撞地爬上了开往成都的77次列车。一路上，他心惊肉跳，冷汗直冒。到成都住在表兄家，也老觉得提着枪和手铐的警察正向这边扑来，吓得他一夜未能合眼。第二天一早便匆匆登上去昆明的列车。一上车，李虎见对面不远处坐着的那个穿警察服装的人不断向自己这边张望，吓得转身一连跑了好几节车厢，有座位也不敢坐，找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蹲下，把头深深埋进两腿间，任怎么热，怎么疲乏都一直保持着那个姿势。这时，他才真正理解了读书时没有完全理解的“惊弓之鸟”、“丧家之犬”那些词语。

23日到达昆明，李虎也不敢去观赏诱人的春城景色，马上乘车窜往中越边界处的河口。在河口车站，混入熙熙攘攘的人群后，他那一悬在嗓子里的心，才重新回到了肚里。住进旅馆，昏睡一天一夜，他才想起此行“考察”的目的。到市场上转了一圈，他发现河口正在建设之中，并无什么生意好做。听说离河口不远处的个旧市可做金矿生意，李虎赶去看，也不行，还差点让黑社会的人给“理麻”了……

“考察”失败后的惆怅和背井离乡的愁苦勾起了李虎的思乡之情，他想“芳”了，危难中，他发现自己已离不开这个娇柔万端的女人。于是，他日夜兼程踏上了回归之路。27日晚上11点，李虎又幽灵一样闯进了梁芳家。 猖狂的幽灵

李虎在温柔和惶恐中度过了5天。31日晚，梁芳当包工头的父亲从天津到了碑庙。因在北京被人洗劫一空，昔日挥金如土的包工头向女儿求援了：梁芳，能不能借点钱给我，你妈病了，另外，今年各地普遍遭灾，我准备在江陵老家买点谷子存起来。

不待梁芳回答，因包工头的到来一直感到尴尬的李虎接过了话头：“梁叔叔，要多少嘛！”包工头伸出三个指头，用怀疑的口气问李虎：三千，有吗？

李虎像是怕包工头收回给他“表现”的机会：把手一挥，用很不在乎的口气说，拿五千去用吧！找梁芳取就行了。

接下来，李虎又兴致勃勃地与包工头商议“我给你几万元钱拿去收谷子赚钱”和“帮我在达县南外买一套房子”的事。最后，他提出了一个小小的却令包工头十分不解的请求：“去天津时，请把我带上，我想去打工……”

9月1日清晨，李虎乘车向麻柳赶去。本来，他明知此去有自投罗网的危险，但想起电视里有句台词是“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在临去天津前，他想去体验一下这“危险”与“安全”之间的刺激。更主要的是想去看看那些“混蛋”和“希特勒”是怎样在气急败坏地捶胸顿足，以解这些天来自己东躲西藏、担惊受怕之气。但当天下午在麻柳烟草站杨均处打听到公司和检察院的人在到处打听、寻找自己时，李虎又冒冷汗了，在麻柳呆了还不到20分钟，便忙乘车向达城方向逃窜。

举报电话很快打到了县检察院。欧朝江、刘荣等人分析，李虎一是可能在中途下车，回江阳老家躲藏；二是可能直接进城。为避免失误，欧朝江当即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烟草公司的人带兰胜明等干警在进城的必经之地南外七里沟一带设卡检查，自己带一路直扑江阳李虎的老家。

这本是一个周密的抓捕方案，但还是出现了失误。欧朝江一行在李虎家扑空。七里沟设卡的倒是拦住了李虎乘坐的客车，并上车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检查。但烟草公司的领导在慌乱中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他们派去协助检察院辨认李虎的人并不认识李虎！结果肥正在车上睡觉的李虎从眼皮底下放走了。

下午五点，李虎在县委招待所登记后，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住下不到五分钟便溜了出去。刚出招待所，李虎就碰上小学时的一个同学，两人一番亲热后，相邀去宣汉“潇洒一回”。在去车站的路上，李虎突然想起：公司那些家伙竟敢找检察院的来抓我，应该教训一下那个姓李的经理！他在一个电话亭拨通了李经理家的电话。接电话的女孩儿说李经理不在，李虎恶狠狠地甩下话：“你转告他，李虎不回来了！”便啪地扔下话筒。

3 号中午，从宣汉回到达州市罗江镇时，李虎觉得还应要一要李经理。于是，他再次拨通李经理家的电话：“你是李 XX 吧广口气像将军在问一个士兵。不待经理回答，李虎继续说：你听着，我现在是在昆明的长城大酒店给你打电话。

经理急了：“公司的钱呢？你怎么去了昆明……”

“坐上海至昆明的火车去的嘛，难道这点常识都没有！”李虎像见多识广且腰缠万贯的城里人调侃乡巴佬一样接着说：“别问你那几个小钱了，我已投到了河口的一个制衣厂，是通过黑道投去的。钱恐怕收不回来了！”提高嗓门说完最后一句后，电话另一头的李经理还在着急地说着什么，李虎却得意地说声“拜拜”便挂断了电话。江陵捉“虎”

当晚，李虎回“家”后，梁芳劈头就问：“你那一口袋钱是不是公款？”毫无思想准备的李虎点了点头。梁芳哭丧着脸告诉他：这几天，检察院的和派出所的严公安来了几次，叫我把你带去自首。

“完了！”这消息如五雷轰顶，在罗江用电话戏弄经理后的快感一下荡然无存。他抓住梁芳的肩直摇：“怎么办呀？”

见小情人失魂落魄的模样，梁芳一时也没了主意，过了一阵，才用征询的口吻问：“到江陵藏几天然后再跟爸爸到天津打工如何？”“当然可以！”李虎如遇救星一样同意了梁芳的主意。9 月 4 日晚上 12 点，梁芳带着李虎步行 8 个小时回到江陵乡和平村门社的家中。见梁芳家地势偏僻，无人来往，李虎一下又神气了起来：“哼！让那些检察院的去瞎找吧！”其实，李虎的行动未能逃脱侦查人员的追踪。9 月 5 日，欧朝江、刘荣查明：3 日中午，李虎在碑庙区安云乡出现过。他们推断：李虎在近几天内一定同梁芳有接触。当天下午，欧朝江一行驱车赶到碑庙后，立即对梁芳的住所进行了严密的监视。整整一个通宵过去了，监视人员发现，梁芳家除有一小孩出入外，再也没有其他人的踪迹。6 日上午，才见梁芳从外边

乘车回家。为了不打草惊蛇，欧朝江等人请该区水管站的以查水表为由进屋查看。看水表的出来说、屋里只有梁芳和他的小孩。9月7日，欧朝江再次请电管站的以查电表为由进入梁芳家查看，仍未见李虎踪迹。

李虎是否到碑庙与梁芳接触过？是藏在碑店，还是藏在其他地方。根据已掌握的情况，检察院领导认为：李虎目前在碑庙躲藏的可能性极小，极可能已被梁芳带回江陵老家。检察长批示：白天前去抓捕，罪犯发现后容易逃跑，等到天黑后再行动。

当天晚上，欧朝江同干警张雪岭、兰胜明等人赶到江陵后，在该乡老公安员郑魁元的带领下，悄悄包围了梁芳家的大院。为了稳妥，郑魁元带着张雪岭以求包工头带自己的儿子去天津打工为由先进入了大院。李虎果然在此！此时他正在地坝里乘凉，见跟在郑魁元背后的人有点面熟，便警觉地凑过去问：我们俩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哥子是哪里的？

“我是检察院的，李虎，你被依法拘留了！”李虎还未醒悟过来，一副锃亮的手铐已戴在他的手上。

手记之七：山洞中，那两具冤孽的白骨——一桩亲母杀子杀“媳”案的前后 龙洞白骨

这里是群峰苍莽、山峦连绵的达县梓桐乡昌城村。行走在村里那条弯弯曲曲的机耕道上，若不是偶尔能听到几声鸡鸣犬吠，会让人觉得仿佛是进入了渺无人烟的深山老林……

荒凉的山中岩洞特别多，最有名气的当数后山顶部的龙洞。此洞对于这方百姓无疑是一块圣地，洞外的岩石上赫然镌刻着：清朝光绪XX年间，旱40余日，数百乡民闹龙洞祈雨。俄顷，风雨骤至……

此后，凡遇天旱，人们便用这古老而荒诞的方法祈雨。

1995年夏，达县久旱无雨。地处高山的梓桐乡昌城村更是田地龟裂，禾苗枯黄，村民们自然又想到了龙洞。8月4日，60余名男女老少捧着供品，提着灯具诚惶诚恐地进入了阴森森的龙洞。举行过烧香磕头等仪式后，人们开始闹龙洞祈雨了。

“哦嘿——哦嘿——龙神快降雨哟……”

一小伙子“闹”累了，开始磨洋工，晃着矿灯观赏起洞内那些磷磷怪石和叮咚泉水。突然，他的目光停在一块大石板边：一只老鼠惊慌中钻入洞内，洞口的石缝边闪现着阴森森的莹光。过去一拨弄，小伙子吓得尖叫起来：“啊！人骨头！”

这尖叫镇住了嗡嗡的“哦嘿”声，洞内一片死寂。愣了片刻，大家才惊奇地围过去，搬开石板，拨开浮土，一具尸骨出现了：头部罩着塑料袋和编织袋，肋骨处压着两块铍铁……

“啊！死人啦……”人们惊叫着向洞外逃去。

很快，警车嘶鸣而至。洞内镁光闪闪。两具白骨被刑警们搬出了龙洞。

几天后，侦查有了结果：这是一起凶杀案，被害者系3年前失踪的该村八社村民车步

平和他的姘妇张文芝。凶手和其他案犯全是车步平的亲人！

人们被这个结果惊呆了，噩梦一样的感觉使大家久久无法将凶杀案同凶手联系起来。几个参加侦查的刑警在抓捕凶手时心里还直犯嘀咕：这些憨厚慈善的人怎会对自己的亲人下毒手呢？

然而，生活的悲剧常常发生在人们的不可思议之中。8月8日那个阴沉而燥热的下午，当戴着手铐的李龙珍（车步平的母亲）、李龙孝（车步平的么舅）、车步勤（车步平的妹妹）、李龙明（车步平的大舅）、罗顺平（车步平的姨夫）被押上那条弯弯曲曲的机耕道时，一桩超出人伦常理的凶杀案将大山里畸形的爱与恨和荒诞愚昧的“家法”揭露得无以复加。母爱无方

这曾是一个还算美满的家庭。至今车家那夫妻恩爱、儿女成群、家风敦厚的景况很多当地人还记忆犹新。当时，车家虽然很穷，但李龙珍同丈夫同甘共苦，起早贪黑地编织着生活的希望，用勤劳的双手为年幼的儿女们支撑起了一块晴朗祥和的天空。

可是，这块天空很快就在一场突然降临的灾难中坍塌了。1971年夏天，李龙珍的丈夫下水库洗澡时撒手西去。那年，李龙珍29岁。3个儿女最大的5岁，最小的1岁。李龙珍完全可以再嫁。年轻的寡妇却一次次谢绝了登门提亲的媒人。她要在大山里树起从一而终的贞节牌坊。她要把年幼的车步平、车步勤等儿女哺养成人，以慰祭丈夫的在天亡灵。

从此，一个善良、勤劳的中国式母亲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几个儿女。

没有男人的农家犹如失去支柱的房屋，缺吃少穿的愁苦，孤儿寡母无助的忧伤，人世间的风风雨雨一齐逼向了年轻的寡妇。但20多个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李龙珍硬是用孱弱的身躯将风雨飘摇的车家支撑了下来。案发后，这个好强的女人回忆说：“我如牛负重，为的是争一口气。”她不愿让人看到这个家因没有男人而衰败，她更不愿让没有父亲的孩子孤苦伶仃。

也许是小儿子车步平太酷似早亡的丈夫，李龙珍对其倍加娇宠疼爱。卖鸡蛋攒下的钱，她首先想到的是：“给儿子做件衣服，不能让他太寒酸了。”她常把自己的裤带一紧再紧却让车步平把肚子胀圆。她总担心“饿坏了儿子的嫩肠肠”。在其他方面，车步平这个娇子也总得到母亲袒护：明明是车步平欺负了兄妹，李龙珍却把执行家法的棍棒挥向另两个子女；另两个儿女在李龙珍的驱赶下早早地肩负起了生活的重担，而车步平却从小就在母亲那里获得了不劳动的“特权”。穷困的家境不可能同时供几个子女上学，但为了保车步平这个“重点”，李龙珍不顾女儿那“妈妈呀，让我再读两年书”的苦苦哀求，硬将小学没读完的车步勤拽回了家。为筹备儿子的学费，李龙珍几年未缝过一件新衣，一身衣裤总是补缀不尽。但她无怨无悔，她只希望车步平好好学习，能知书达礼。

李龙珍万万没想到，自己怀着望子成龙的企盼却呵护出了一个好吃懒做惟我独尊的不肖之子。很小，车步平便习惯于皇帝吆喝宫女一样差遣母亲：“把鞋给我提来！”“快给我端开水……”“还未读完初中，他便嫌读书太苦，哭闹着不愿上学，李龙珍只好依了儿子。车步平不肯读书，也不愿做活，只喜欢在外东游西逛，喜欢吃饱喝足后倒头便睡。李龙珍稍有”微辞“，他马上横眉鼓眼，恶声喝斥：”谁叫你把我生在这个穷窝里！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

“

为了有一个“人过的日子”，车步平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并且很有点“名气”。在吕城村乃至梓桐乡，不管谁家丢了东西，都会说：“肯定是车步平那龟儿干的。走，找李龙珍赔去！”于是，车家三天两头便有人上门索要赃物，搅得李龙珍从无宁日。后来，在家乡混不下去了，车步平开始南下去广州打工。但那儿的天上并没给这个游手好闲的浪子掉下馅饼，在广州混一阵后，车步平不得不卖掉从家中带去的被盖、衣物乞丐般逃回。

到广州见过世面的车步平变得益发凶残霸道。一次，邻居的鸭子被盗，气得大骂，车步平出面武力干预不准对方骂人。村妇女主任劝他不要那样，车步平说主任拉偏架，抓起菜刀便去追杀，妇女主任吓得跪地求饶，车步平才把架在妇女主任脖子上的刀收回，说男不与女斗，暂饶了你这颗狗头。

李龙珍此时才醒悟，是自己的溺爱植下了这可怕的祸根，她试图挽救儿子。这个初知《女儿经》的农家妇女耐心地给儿子讲人之初，讲反哺之义，讲跪乳之思，甚至哭着求儿子痛改前非，不要再危害四邻，一度，还曾辅以严厉的“家法”强迫儿子循规蹈矩。

然而，木已成舟，李龙珍的心机全白搭了。她只好流着眼泪去承受儿子作恶后降临给她的那些无尽的羞辱和难以给乡邻赔清的损失。孽子孽“媳”

转眼间，李氏兄妹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李龙珍曾寄希望于找个好儿媳去改变车步平的恶习，她花钱让媒婆为儿子四处牵线搭桥。尽管媒婆们巧舌如簧，但远近的姑娘对车步平的大名早就“如雷灌耳”，纷纷避之不及。好不容易有几个答应上门看看，车步平不知怎么又一下“四大皆空”，断了七情六欲，声称要当一辈子光棍，把相亲的姑娘一个个全轰出了门。

正当李龙珍心灰意冷、万般无奈的时候，车步平却自己耍了个“女朋友”。此人名叫张文芝，出生于一个比梓桐乡还要贫穷的大山里。为了“脱贫”，她选择了梓桐乡西河村虽有点脚跛家境却很殷实的裁缝杜XX为夫，生有一儿一女，夫妻虽不十分恩爱，倒也相安无事。后来，当车步平云游到与张文芝相邻的同学家后，杜裁缝家的宁静便被打破了。

那是1990年夏末的一天上午，车步平正跟同学神侃，张文芝来了。车步平一下被这个白净高挑、颇有几分姿色的少妇迷住了，愣得地盯着张文芝那双撩人的大眼，他感到心神不宁，如痴如醉。还是张文芝善解人意，主动亲热地同车步平谈起了金钱、吃穿和享受，车步平觉得遇到了红颜知己，滔滔不绝地对其大吹自己在广州“打天下”时尽享眼福、口福，吹广州的繁华与酒楼里的灯红酒绿，吹他这些年已挣了很多很多钱，买了很多很多高档衣服和皮鞋，还说好几个漂亮小姐老来缠他，都被他坚决拒绝，那口气俨然如天下第一大款。为了证明自己的经济实力，车步平还特意到乡场的地摊上给张文芝买了只发卡，并请她在馆子里猛吃了一顿。打着饱嗝从饭馆出来，他们二人已如胶似漆相见恨晚。两天后，张文芝撇下丈夫与一双儿女同车步平私奔了。

见车步平带回了个“儿媳”，李龙珍乐得合不上嘴，忙好茶好饭款待。但当知道“儿媳”是已有一儿一女的有夫之妇，且比23岁的儿子还大4岁时，李龙珍气得大骂伤风败俗、寡廉鲜耻，要张文芝马上滚出车家。车步平跨前一步指着母亲的鼻子咬牙切齿，一字一顿地说：

李、龙、珍，格老子、听着，你、敢、把她、撵走，我与你誓不、两立，血战到底！

李龙珍不敢吱声了，只好跑到丈夫坟前呼天抢地痛哭一场作罢。从此，张文芝趾高气扬地在车家安营扎寨，做起了车步平的“老婆”。两人足不出户，成天厮混相守。李龙珍虽十分反感这个“儿媳”，但见这个女人拴住了车步平这匹野马，也就认了。尽管儿子、“媳妇”从不做事，自己忙完了地里的活回家后还要煮饭给好逸恶劳的儿子、“媳妇”吃，还要洗儿子、“媳妇”换下的脏衣物，但她总是任劳任怨。她知道没有了张文芝，儿子又会出去作恶，并且，凭车步平的名声，张文芝一走，他这一辈子恐怕就再也找不到老婆了。

李龙珍决意留住这个不顺眼的“儿媳”。张文芝私奔后，她丈夫曾几次到车家要人，但每次李龙珍都让张文芝躲起来。一次，张文芝终于被丈夫找到，丈夫拉起她就往外走。——李龙珍急忙追去拉住张文芝不放。杜裁缝说，留下可以，但我同她离婚，两个子女她要给 3000 元的抚养费才行。家中已一贫如洗，李龙珍只好四处借钱。实在借不到了，又找人去苦苦哀求杜裁缝少要点……

李龙珍的行动使张文芝在车家身价倍增，她指手划脚地要求李龙珍弄点像样的饭菜，不能老吃那些有盐无油的瓜茄小菜。她斥责李龙珍说：老太婆，不要太抠了，还是拿钱给我买几套衣服！李龙珍卖鸡蛋准备买油盐的钱被她强行拿去“保管”，她还撒娇要车步平带她到城里去潇洒一回……车步平虽豪爽地答应了，但无奈囊中羞涩，有些为难。张文艺提醒说，把给你妹妹准备的嫁妆木料卖了不就是钱了吗。车步平一拍大腿连声说好。趁李龙珍、车步勤下地干活之机，车步平、张文芝把妹妹做嫁妆的木料以 300 元廉价卖掉。车步勤发现后，气得嚎陶大哭，痛骂卖她嫁妆木料的狗男女不得好死。车步平大怒，抓起菜刀就向妹妹劈去，吓得车步勤抱头逃窜，躲到姨娘处一个多月不敢回家。

对这一切，李龙珍仍咬牙忍着，她想用忍让换得家庭和乡亲们的安宁。
“家法难容”

靠容忍换得的宁静并不长久。1991 年 8 月 1 日，李龙珍为防止儿子偷她放在箱子里的 30 元钱，出门前特意将自己的寝室上了锁。中午，回家一看，锁被撬了，钱也只剩 10 元。是谁干的，李龙珍自然明白，但为了家庭的安宁，她努力忍住火气。忍到傍晚，实在按捺不住了，她边砍猪草边问在里屋同“儿媳”打情骂俏的儿子车步平，是谁把锁撬了的？

“是我，哪个嘛！”车步平的嗓门很高。

“那 20 元钱是不是你拿了的？”

车步平的嗓门更高了：“是我又咋个！”

李龙珍也火了：“你个龟儿，偷了钱还恶，小心老子砍你两刀！”

“你砍！你砍！”车步平冲了出来，把脖子往李龙珍面前一挺。李龙珍气得双手直颤，但她并未真砍，而是抓起扫帚向儿子打去。刚打两下，便被车步平“缴了械”，她又抓起门后的锄把，但马上又被车步平夺去挥向了她的肩上、腿上……

李龙珍被打得了，她对儿子的希望和痴情也在飞舞的锄把下被捣得粉碎。“忤孽不孝的东西，你敢打我！”回答她的是继续落在身上的锄把。李龙珍发怒了，披头散发地扑过去，抓住车步平高声叫道：“打死人呀！打死人哟！”

叫声惊动了住在李龙珍附近的么弟李龙孝，他很快冲进了李龙珍家，“你这孽障！连你娘都敢打，简直乱了家法。”骂完，一阵左右开弓，车步平立即血流满面。

正在这时，李龙珍的大弟李龙明去四村七社替人守灵路过此地。李龙珍对其哭诉，并要其帮忙“执行家法，治一治这畜牲”。李龙明这位在乡农机站工作的干部也不由大怒，他将外侄掀到院坝里狠踢一脚，然后喝令：“‘畜牲，跪倒！’”接下来，李氏三姐弟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教训车步平，直到天快黑时，李龙明才想起替人守灵的事，但是，见姐姐还抚着肩和腿呻吟，便对车步平吼道：滚起来，把你娘背到医院去看伤。

一直垂立一旁的张文芝忙将车步平拉起，让他背上李龙珍向山外走去。李龙孝则押俘虏似的跟在后边。

一路上，李龙珍不停地哭泣着，那嚤嚤的哭啼似在倾吐心中的绝望和哀怨，又似在诉说自酿苦果的悔恨和责怪。哭声为茫茫夜色凭添了许多的凄切和悲伤，却无法唤醒浪子的良知。车步平对母亲的哭声越听越烦，到了抓石岩，他猛地放下李龙珍说：嚎啥子！难得背，自己走。说完同张文芝各自往前走了。这一下，李龙珍更加怒火中烧。养儿的辛苦和着绝望后的悲愤一齐涌上心头，恼恨和恶念紧紧攫住了她。李龙珍咬着牙对李龙孝说：“这忤孽不孝的东西败坏了车家的门风，丢尽了车家的脸，家法难容，干脆把他整死算了！”

黑暗中，李龙孝挥挥拳头：“这东西，是该整死他！”李龙珍果断地决定：“这一带没人烟，马上动手。”悲剧发生了一一姐弟俩各捡一块石头追了上去，李龙孝用他那带着血缘和亲情的手挥起石头向外侄后脑使劲一击，车步平只“嗯”了一声便沉沉倒下。李龙珍又骑在儿子身上边用石头猛砸头部边狠狠地骂：“畜牲，叫你没家法，叫你件孽不孝！”当确信“畜牲”已被“处死”，姐弟俩一齐动手将其推下山崖。

一直在一边“观战”的张文芝开初以为李氏姐弟只是教训一下自己的“丈夫”，后来，车步平被推下岩时那“咚”地一声闷响才使她如梦初醒，“不好啦！杀人啦！救命呀……”凄惶的呼叫声在空旷的山谷中久久回响，夜幕却遮掩了李龙孝追上前用石头砸在她头上时飞溅的鲜血。“哎哟！”张文芝一声惨叫，倒在地上，挥着手直求饶。但李氏姐弟仍挥起石头朝她头上一阵乱砸。正在这时，因卖嫁妆木料被车步平赶出家门已月余的车步勤听说母亲被打伤已送医院也随后赶了来。刚才，母亲和舅舅打死哥哥“嫂嫂”的一幕她都看到了，但她没吱声，她平静而解恨地看完了这幕悲剧，心中没有一丝恐惧和同情。当李龙珍往岩下推张文芝的尸体时，她还上前搭手帮忙……

深夜 11 点左右，执行完“家法”的姐弟俩在回家的路上碰到守灵后回家的李龙明。李龙孝恨意未消地告诉他：我们把车步平两口子整死了！

“整死了！整死了咋做？”李龙明有点吃惊，李龙珍也后怕起来，“是呀，整死车步平倒莫啥子，他是我生的，整死了不犯法。但张文芝是别人生的，整死了要犯法呀……”

曾在部队服役 4 年的李龙孝满不在乎地说，找个保险的地方埋了，还犯啥子法！李龙明长叹一声说，也只有如此了。见过世面的农机干部想得更远一些，“今后有人问起，就说在去医院的路，车步平扔下他娘与张文芝私奔到广东打工去了……”接着，他让李龙孝去叫住在本村八社的妹夫罗顺平帮忙埋尸，叫李龙珍、车步勤回家拿埋尸的工具。

在找锄头、背兜、塑料袋等工具时，李龙珍带上了两块铧铁。她要用这铧铁去惩治那件孽不孝的儿子——在李龙珍的家乡，人们常用铧铁去惩治死去的仇人。据说，只要把铧铁压在死者身上，这死者就会被打进 18 层地狱，永远不得超生。

当晚，李龙珍同两个弟弟及妹夫、女儿把执行“家法”的罪恶深深埋进了龙洞。

尾声

用“家法”制裁儿子、“儿媳”的凶手被押上了审判台。经过庭审和激烈的法庭辩论，达川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这桩杀人案作出了如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李龙珍有期徒刑 12 年。判处李龙孝无期徒刑。判处同案犯车步勤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一年执行。李龙明、罗顺平免于刑事处罚。

听完宣判，旁听席上一片哗然，人们纷纷认为法庭对罪犯判得太重——在这之前，凶手所在地的村民们，曾不断成群结队的涌向公、检、法及有关党、政领导的办公室，苦苦哀求法外施恩，对李龙珍等人网开一面。200 多村民还联名上书要求从轻发落李氏姐弟。他们声称：李龙珍姐弟怒杀逆子，事出有因，情理可恕。如将其杀之实在难以平民愤……

庭审结束，当 50 余岁却皱纹铺满脸颊、目光呆滞的李龙珍被押向囚车时，人群中不断有人将钱和衣物塞进她手中，有人跟在身边大声地安慰她，还有人用眼泪和哭声为她送别……

人们把对凶手的同情强烈而毫不掩饰地表露了出来。

但善良的人们，当你们为李龙珍等人奔走呼号的时候，当你们为凶手流下同情之泪的时候，你们是否觉得李龙珍怒杀逆子虽“情理可恕”，但国法难容？你们是否还记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句古老的谚语？你们是否也有一种人性、人情、人伦毁灭后的淡淡悲哀……

别忘了这出因溺爱而导致家破人亡的悲剧，别忘了山洞中那两具冤孽的白骨！

手记忆之八：烟贩败走“麦城”

—

临战前的紧张气氛笼罩着达县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办公室。

橙黄的办公桌上，一部黑色的对讲机发出“嗞嗞”的响声，副检察长兼反贪局长马力、副局长冯化松静静地听着。1 小时前，外出执行侦查任务的洪涛等人用暗语报告：他们已与烟贩接上头，正设法接近目标。此后，对讲机里除偶尔传出“嘎嘎”声外，再无音讯。

10 余名集结待命的干警屏声静气地在室外等候着。反贪局内的空气仿佛完全凝固，惟有墙上的挂钟迈着嚓嚓的脚步，艰难而沉重地走向 1995 年 11 月 16 日 15 时。

在焦急不安的等待中，冯化松几次给几个侦查员打传呼，但均无人回传。最后，马力忍不住抓起对讲机急促地呼叫起来：“洪涛，洪涛，你们在哪里？请回答！请回答！”

对讲机依然默默无语。

此时为下午 15 时。

“怎么了，是他们关掉了对讲机？还是遭到了不测？”一团不祥的疑云在年轻的副检察长心底升腾，弥漫。

马力的担心是有原因的。早在 10 月初，烟草检察室（后改为烟草专卖科）负责人兰吕便得到密报：四川省隆昌县一伙带黑社会性质的烟贩准备将一批假红塔山香烟运到达县销售。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侦查，兰吕等人终于发现了接应这批假红塔山的几个达县烟贩。3 天前，兰吕派人打入了当地烟贩中。今天早上，打入烟贩中的人密报，数名持刀械凶器的罪犯拉着价值 100 余万元的假红塔山、假红梅香烟已流窜到达县，正急于寻找买主脱手。得到消息后，案侦会议很快在检察长办公室召开。这伙罪犯人多势众，持有凶器，并有军人和假公安干警身份掩护，目前尚未查清其姓名踪迹、赃物藏匿地点等具体情况，黄检察长同马力、冯化松等人研究制定了“主动出击，化装密查，人赃俱获”的侦查方案，并决定由反贪局洪涛、王林同前来协助侦查的烟草专卖科张军执行这一任务，同时，让烟草专卖科兰吕、张成雪等人配合，随时接应。出发前，根据烟贩见钱才谈生意的规矩，洪涛等人用帆布袋装了半袋用白纸裁成的“人民币”，再在上边装了 10 多万元真币。此外，他们还在身上藏着对讲机，约定：与烟贩见面后，用胶布贴住对讲机的发射键，院领导可从中听到侦查情况。

15 时左右，对讲机中还清晰地传来洪涛等人有关自己行踪的报告及他们同烟贩的对话，但后来却失去了联系。

侦查小组的三个年轻人在哪里呢？

当马力、冯化松等院、局领导焦急万分时，穿着阔气，手提大哥大的洪涛、张军正坐在一家公司的沙发里叼着高级香烟、品着香茶，派头十足地同本地烟贩刘义接头。

能同刘义接上头真不容易。10 点多钟，洪涛等人找这个尖嘴猴腮的家伙接头时，他装聋作哑地问：“做啥烟生意？你们大概找错了人吧。”后经人引荐，洪涛等人再次找到刘义，他又说明天再谈，洪涛一行走到楼下，刘义才将他们叫了回去。见刘义如此戒备，洪涛指着张军、王林神侃起来：“我们三人是胜过桃园结义的兄弟。张军是我们的老大，鄙人是老二，王林是老三。年前，为争码头，‘废’了另一帮的两个王八蛋，怕报复，只好东躲西藏，跑跑野摊，杀个洞洞鱼。可惜洪涛说这番话时，藏在王林胸前的对讲机突然”嘎“地响了一声，吓得王林忙装着搔痒关上开关。故马力、冯化松等人未能听到部下的这段”经历“。洪涛侃出的”经历“镇得刘义一愣一愣的，洪涛趁机对刘义双拳一抱：“刘兄，今后还望多多关照！”刘义满脸堆笑道：“好说，好说。”

但狡诈的刘义并未轻信洪涛等人。敬烟时，他突然死死盯住王林说：“老三，我好像认识你，你是公安局的！对吧？”王林先是一惊，但他很快明白了刘义的诡计，镇静地推推眼镜哈哈大笑道：“刘老板真会开玩笑，我这样子像干公安的吗？”洪涛接过话头说：“要谈生

意就抓紧时间谈生意，耽误久了，小心真的引来了公安局的。”刘义干笑道：“那是，那是，我去与老板联系。”

刘义在外间打完电话回到屋里说：“走吧，老板让你们去。”说完，带着洪涛一行下楼坐上一辆已等候在楼下的夏利出租车向东城方向急驰而去。上车后，王林悄悄打开对讲机，中断了的联系再次接通。洪涛等人一路走一路故意大声地说：“长廊这条街车真多！”“老车坝怎么又堵车了？”兰吕、张成雪则与几名检察干警乘车随“声”悄悄跟了上去。

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刘义格外警惕，他不断通过反光镜观察后边有无车辆跟踪，快到目的地时，他让车开到另一条路上，见确实无可疑车辆，才对驾驶员说：“快调头，到人民公园。”洪涛故意大声埋怨：“刘老板，到人民公园你怎么不早说？害得跑这么远的冤枉路。”

夏利车在人民公园左侧的老干部招待所前停了下来，刘义将洪涛等人带到了二楼 2 号房间。房间里已有 5 个人，刘义将其中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拍到一边，低声耳语几句后两人便凶神恶煞地守住门口、胖子使一个眼色，其余几人马上如临大敌般地站了起来。胖子突然指着王林沉声骂道：“听说你龟儿是公安局的，想找老子的麻烦，整死你个狗日的。”骂声刚落，其他几个烟贩虎视眈眈地逼了上去，有的去抓王林，有的在腰间摸着什么，还有人恶狠狠地骂道：“捅死他龟儿！”王林意识到，这又是一次恐吓性考验，要沉住气，否则，不但完不成任务，还会有生命危险。他坦然一笑道：“你妈的几个神经病，老子是公安局的还用提着脑袋来做烟生意？”洪涛也骂了起来：“老子跑了几十年社会，还没见过你们这些疑神疑鬼的东西，不做生意就拉倒。老大名三，我们走！”

洪涛等人正要往外走，胖子和瘦子却一下客气起来，边连声说误会，边敬烟倒水。胖子还介绍自己姓杨，巴中人。痞子也自称姓李，是土生土长的老达县。洪涛等人这才搞清，接头的是几个本地烟贩，狡猾的隆昌老板仍未露面。

寒暄一阵后，杨胖子催道：“按规矩，我们验货看钱吧。”“老达县”拿出一包红塔山和一包红梅香烟递给洪涛。洪涛打开烟盒，分别拿出一支抽几口后很内行地评价：“红梅烟胶封工艺稍有些粗糙，红塔山的味道差点。”“老达县”忙赔笑道：“是差点，但不注意是感觉不出来的。”验过货，杨胖子催着要看钱，洪涛大度地表示：“验货看钱是规矩，看吧。”说着将地上的帆布袋打开一条小缝，让杨胖子看里边的钱。杨胖子蹲下身想把手伸进口袋内去翻，洪涛的心格登一下悬到了嗓子眼：要是用纸裁的“人民币”被翻出来就完了！一急，他哗地拉上帆布袋。见杨胖子疑惑地盯着自己，洪涛灵机一动，骂道：“哪有你这么笨的东西，看钱还用去翻？踢一脚不就知道有多少钱了！”说着朝着帆布袋狠踢一脚，杨胖子也傻头傻脑地跟着踢了一下帆布袋。洪涛这才又拉开口袋取出几沓百元币在“老达县”眼前晃了晃说：“暂带了 30 万，生意说成了马上去取。”“老达县”见钱眼开，高兴地催道：“你们准备了钱，证明有诚意做这生意，我们谈谈价吧。”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151 箱假红塔山和 19 箱假红梅烟分别以每条 80 元和 40 元的价格成交。洪涛掏出计算器啪啪地按一阵后说：“共 64 万元，马上去看大货，然后我们再取差的 34 万元。”

王林、张军明白洪涛的意图：趁看货之机找到隆昌老板，好一网打尽。但杨胖子狡黠地朝张军笑道：“老大，大白天看货不太安全吧，现在应考虑的是货交到哪里，你们有仓库吗？”

毫无思想准备的张军被问懵了，先摇摇头，又点了点头说：“仓库？有，有仓库。”这一细微的破绽使杨胖子产生了疑惑，他追问张军：“老大，你们的仓库在哪里？”

张军有些紧张了，一时竟不知怎么回答，望望杨胖子，又望望洪涛。张军的举动更引起了杨胖子等人的怀疑，杨胖子一伙又凶神恶煞地逼向张军。在这紧急关头，洪涛猛地站起狠狠地扫杨胖子一眼说：“杨兄，都是跑江湖的，怎么不懂规矩？打听别人的仓库干啥？想到公安局去报案立功吗？”杨胖子一愣，尴尬地哈哈一笑：“我只是随便问问，随便问问。”

为了稳住杨胖子，洪涛接着话题说：“杨兄，干这种事，生意成了大家发财，整栽了大家都爬不起来，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了，用不着那么费心地来防我们。”“老达县”讪笑道：“对，不要谈与生意无关的事了，赶紧商量交货地点、时间和怎么交货吧。”

商谈了好一阵，交货时间也没有定下来，双方只好定为 17 点再联系。商谈交货地点时，杨胖子、“老达县”提出几个交货地点都被洪涛等人以“太远”、“不安全”等理由给否定了。最后，洪涛说：“最好选在城南的七里沟，那儿既偏僻，又不远。”杨胖子、“老达县”略一思忖，都说可以。但他们却不知洪涛的用意：只要把七里沟的外端一堵，进去的人和车便插翅难飞。

16 时，从老干局的招待所出来，见有人鬼鬼祟祟地跟在后边，洪涛、王林、张军坐上出租车向南城狂奔而去。在金孔大酒楼下车后，他们躲在窗后观察了一阵，确信那两个盯梢者已被甩掉时，这才租车从另一条路返回单位。

三

听过洪涛等人的汇报，黄检察长、马力、冯化松等院、局领导马上汇同烟草专卖科的兰吕等人制定了周密的侦破方案。根据侦破方案，一辆东风牌货车开到了红旗大桥等待，马力、冯化松带 10 余名全副武装的检察干警同烟草专卖科的几名职工潜伏在七里沟附近待命。洪涛一行仍提着装得鼓囊囊的钱袋前去与烟贩接头，一俟时机成熟，即用大哥大通知潜伏的干警出击。

18 时 15 分，洪涛拨通烟贩的电话询问交货时间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杨胖子在电话中说：隆昌老板叫你们过来一个人研究一下有关问题。张军去后，很快打传呼告诉洪涛，对方要求再去一人并带上 5 万元现金。很明显，狡猾的烟贩是要抓一个人质在手中。洪涛、王林都明白，前去作人质，稍有不慎，不仅会使侦破失败，还有丢命的危险。王林争着要去承担这份危险，却被洪涛阻止了。见王林不放心的样子，洪涛拍拍腰间的手枪，轻松地笑道：“有它作伴，放心吧。”说完，接过钱袋，拦住一辆出租车急驰而去。赶到老干局招待所时，洪涛不由一阵暗喜：除“老达县”、“杨胖子”、刘义等几个当地烟贩外，还有几个陌生人在场。他想：这些陌生人肯定是隆昌的烟老板了。果然，“老达县”殷勤地介绍：穿迷彩服的是隆昌肖老板，穿西装的是沈老板，穿黄衣服的是驾驶员张师傅。最后，他指着一个矮子说：“这是肖老板的保镖小庞。”洪涛并不理睬肖老板等人，他虎着脸把钱袋往地上一扔便火冒三丈：“你们跑过江湖没有？究竟有无诚意做这笔生意？你们是要向我交货呢还是要我来做人质？”杨胖子忙解释：“老二，别误会，我们主要是找不到地方。”肖老板也赔笑道：“是呀，找你们来带带路嘛。”洪涛仍很生气：“‘老达县’能不知道地方？再说，带路让我带 5 万元钱干啥？”肖老板被问得瞠目结舌。洪涛提起钱袋朝张军一挥手说：“老大，走，我是做生意的，不当他们的人质！”刚走几步，杨胖子等人赶来劝道：“老二，莫发火嘛！”洪涛见好就收，叹口气说：“你们这些人疑心真大。这样吧，你们派一个人与我同车，其余的人坐

车跟在后边。”说完，他又吩咐张军：“老大，你先到红旗桥与老三坐接货的东风车到七里沟准备一下。”张军会意地点头，乘一辆出租车走了。洪涛也拦住一辆出租车，同杨胖子坐了进去。从反光镜中洪涛发现肖老板等 4 人分乘两辆夏利出租车在后边紧紧跟着。在通往七里沟的岔路口，洪涛同肖老板等人下车站在路边等后面拉烟的车 19 时，夜幕笼罩了南郊的山峦沟壑，晚风吹得路旁的草木瑟瑟作响，令人烦躁不安。繁忙的公路渐渐静了下来，拉烟的车仍不见影子。张军、王林在沟里等得着急了，让驾驶员把车开出沟，洪涛见后问：“肖老板，你们的车是不是出了事？”肖老板胸有成竹地回答：“放心吧，我的车保险得很。再等一会吧。”洪涛听后转身大声喊：“老大，老三，你们还是把车开进沟去等。”倒车时，趁人不注意，洪涛低声告诉张军和王林：“估计拉烟的车就要到了，你们过去后马上用大哥大同马副检察长联系，让潜伏的同志立即出击。”倒好车，张军故意大声对洪涛讲：“老二，等会儿前边有岔路的地方你们向右走。”

19 时 10 分，一辆红色出租车急驶而来，“老达县”等本地烟贩刚下车，一辆某部队的车也随后而至。洪涛不禁一惊：“军车！这些家伙用军车贩运假烟！”他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快步转到车后揭开篷布借着出租车灯光一看，只见铁皮大集装箱上醒目地印着“航空器材”、“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部队专制”等字样。洪涛在心中暗暗骂道：用军车冒充拉航空器材来干这种勾当，这些家伙做得真绝！

“老达县”等人坐上军车进了七里沟。因车里坐不下太多的人，肖老板，杨胖子及保镖只好与洪涛徒步进沟。洪涛边走边听后有汽车进沟的声音，但漆黑的七里沟内一片死寂。他知道，院里的同志还未赶到，必须设法拖住这些烟贩。于是，他故意慢吞吞地走在后边。在沟内的岔路口，明知该向右走，但见杨胖子等人稀里糊涂地拐进左边的机耕道，他也不吱声。走了老远仍不见交货的车，杨胖子这才突然想起他刚才听张军说进沟向右走的话，大家只好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回走。洪涛心中高兴嘴上却直埋怨：“杨胖子，你明明听到向右走，还把我们带到左边来，真他妈的混蛋！”

19 时 40 分，洪涛、肖老板等人终于在七里沟的 507 仓库附近找到运烟和接货的车。见沟外仍无动静，洪涛不由有些急了：是张军、王林未能与马副检察长取得联系，还是接应的车出了毛病？他握了握裤兜里的手枪想：干脆提前动手吧！但他暗暗数了一下，烟贩 8 人，而我们只有 3 人，一动手肯定会坏事。洪涛焦急地告诫自己：沉住气，设法再拖一阵。想着，他一屁股坐在地上说：“漆黑的山沟真把老子走累了。”肖老板道：“老二，你歇一会儿吧，让他们先卸货。”

“老达县”、唐老板等人打开车门准备卸货了。为了拖时间，洪涛大声暗示张军：“老大，这货你要慢慢地一件一件地仔细验，小心有假货。”接着，他转到东风车前，低声告诉王林：“你提着钱袋坐在驾驶室，注意保护那 10 多万元钱，不要出来，外边的事由我应付。”说完，他站到离车 3 米远的黑影处，悄悄掏出手枪。

19 时 50 分，进沟的路上传来汽车马达的轰鸣声。肖老板一惊：“不好！有车！”洪涛站在黑影处大声说：“别慌！是农用华川车的响声。”正说着，一辆警车呼啸着冲了过来。正卸货的“老达县”见势不妙高喊一声：“快跑呀，警察来了！”烟贩子们顿作鸟兽散。这时副检察长马力、反贪局副局长冯化松带人跳下车边鸣枪边高喊：“站住，不准动！我们是检察院的！”吓得军车驾驶员忙钻进驾驶室。当他正准备驾车逃跑时，一支乌黑的手枪顶住了他的脑门。

四

由于天黑，除庞小平和军车驾驶员张德武外，其余烟贩乘着夜色逃掉了。

经审讯，张德武交代：他是某部队的驾驶员。1995年5月，为了创收，他驾驶的车被所在部队以1年4万元的价格租给了隆昌县个体老板唐玉成、沈运忠。

一天，唐、沈二人让张德武帮隆昌农民肖祥荣到福建省云霄县贩假烟。张德武毕竟是懂得一些法律知识的军人，一听运假烟连连说不敢。肖祥荣一拍胸膛说：“怕啥，抓住了，我负责！大不过罚几万元钱了事。”见张德武仍摇头，唐玉成劝道：“别害怕，我们去拉假烟的地方对这种事是持保护态度的，做这种生意的人多着呢，再说，你开的是军车，我们把假烟装在印有‘航空器材’的集装箱里，谁有胆量检查？”

张德武想想也有道理，但他仍不表态。肖祥荣又许诺：“每跑一趟滁工资外再给你1000元的辛苦费，怎么样？”

金钱的诱惑力常常是难以抗拒的。张德武这位已有数年党龄的军人终于将自己的灵魂、良知全部出卖给了魔鬼。他握住肖祥荣的手说：“只要不亏待我，今后一切都听肖大哥的！”

张德武的确很听肖祥荣的话。1995年5月下旬，他同肖祥荣、沈运忠把福建云霄县一个叫阿福的个体户生产的假“红梅”香烟拉到西藏拉萨卖掉；6月至10月，伙同肖祥荣、沈运忠五次将阿福生产的假“红塔山”香烟运往贵州省水城县贩卖，从中牟取暴利；11月15日，他们又从云霄县阿福处拉着假红塔山、假红梅烟来达县，勾结当地烟贩一起贩卖，没料想这一次却闯进了检察机关布好的法网……

11月23日，冯化松副局长带领八名检察干警千里奔袭，直扑隆昌。当天下午便查明：案犯沈运忠正在县医院护理住院的老婆。为了不打草惊蛇，冯副局长决定将其秘密拘传，并以此为突破口，抓捕肖祥荣等人。下午5时，身穿便装的干警高岩慢悠悠地逛到了县医院外科208室门口，在与沈运忠对视的瞬间，高岩故作惊喜地迎了上去，模仿隆昌口音热情地问道：“这不是沈运忠吗！老伙计，咋个到这里来了？”

沈运忠被这个陌生的“老伙计”问得莫名其妙，他警惕地打量着高岩，高岩见状，马上转过头同病床上的唐打招呼：“这不是小唐吗，怎么生病了？”沈运忠见来人认识自己并认识自己的老婆，这才同其握手，让座递烟。但这个曾在某公安局干过的家伙毕竟非等闲之辈，刚闲谈几句，便盯着高岩盘问道：“老兄，你是哪里的，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高岩指着沈运忠哈哈一笑道：“真是贵人多忘事，前年5月1日你同县局领导到我们石碾区检查工作，中午我俩开怀畅饮，我都被你灌醉了。沈老兄真是海量呀！”

沈运忠一拍脑袋，尽管他记不起前年5月1日是否同这位老兄畅饮过，但他仍应和道：“啥子海量哟，这两年也不行了。”顿了顿，沈运忠又警惕地问：“老兄，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高岩叹口气道：“说不得了，我有个亲戚病了，想住院，医生说没床位，不知沈老板你有没有办法？”

沈运忠放心了，豪爽地答应：“这事包在我身上。”说完，便带着高岩向外走去。刚行至

走廊转角处，两名便衣干警上来左右架住沈运忠，高岩亮出拘传证：“我们是达县人民检察院的。”

沈运忠交待：肖祥荣等人仍藏在达县一家招待所里。冯化松马上电告马力，当马力带人赶到招待所时，服务员说，5 分钟前，肖祥荣刚刚离开。

1996 年元月以后，达县检察院又连续组织了几次追逃，除抓获刘义等罪犯外，主犯肖祥荣仍然在逃。

1996 年 3 月 3 日，当人们欢庆元宵佳节之时，马力副检察长、冯化松副局长一行数人再次直扑隆昌。在当地检察机关配合下，包围了肖祥荣的住宅。但狡猾的罪犯早已逃窜……

目前，达县检察院正组织力量准备再次抓捕肖祥荣。罪犯肖祥荣定难逃法网。
手记之九：成都的票贩子真猖獗

出席四川法制报 96 年度通讯工作会议，因故未能订到回达县的卧铺票。4 月 30 日上午 9 点，我赶到成都北站自己购买。

售票厅前，旅客熙熙攘攘，拥挤嘈杂，但票贩子们那“要不要票”的询问声格外悦耳。真怪，“严打”都两三天了，这伙人居然还敢如此明目张胆，毫无顾忌。

报社的一位编辑事先告诉我：千万别买票贩子的票，挨敲竹棒不说，还容易买到假票。于是，在离大厅不到三十米的路上，我冲出不下于三、四十个票贩子的“围追堵截”，来到了专售卧铺票的 35 号窗口。还好，只有 30 余人在排队，四、五十分钟内买到票绝对不成问题。

我花几角钱买份报纸边看边随队伍向前移动。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我才发现买票的队伍向前蠕动了最多不过两米。原来，窗口被几个票贩子把守着，他们不断把“自己人”安排进队伍中。三个急着想赶 65 次的昆明人也乘机“加楔”，却被几个票贩子抓住衣领揪了出来。其中一昆明人气愤地问：“干吗？你们就可以不排队，凭什么？”一穿斑马衫的家伙一拍胸膛：“老子们是车站维持秩序的，就凭这个！”一个光头晃着拳头说：“还凭这个！”其余几个票贩子也捋袖挥拳，骂骂咧咧地围了上去。见动武的架势已拉开，那个昆明人没了脾气。一小个子昆明人很会来事，给票贩子们散过红梅烟后乞求道：各位兄弟，帮个忙嘛，我们有急事回昆明。“斑马衫”放低嗓门说：“先买可以，每人给 50 元，我马上让你们站到窗口去。”

也许是急着要回昆明，也许是 50 元对他们算不了什么，或者是知道这儿的行情，三个昆明人连价都未讲便交了钱。票贩子马上将三个昆明人送进铁栏内，一番猛推猛搯，昆明人全被“塞”到了窗口，队伍却被“塞”退了一节。我不由大怒，挤上前大喝：“干什么，后边排队去！”不料，话音未落，我便被一穿方格衫的家伙揪住了衣领。他将我抓到铁栏外骂道：“你个瓜娃子，找死呀！”“斑马衫”和“光头”等几个票贩子也呲牙咧嘴地对我指指戳戳：“锤你个狗日的！”“弄死你个瓜娃子……”

被这伙人推来搡去，拳脚相加，我真的“瓜”了。但救星很快出现。不远处，站着几个执勤的警察。我奋力摆脱票贩子，跑过去亮出检察院的工作证，讲明情况后，头儿模样的警

察一摆手：“过去看看。”一腰挎六四式手枪的老兄随我到了 35 号窗前。但奇怪的是，“方格衫”一伙不但不抱头鼠窜，反倒嘻皮笑脸地同警察打招呼，还反诬我想“加楔”。警察老兄威严地喝令：“干啥子，都过去！”喝完，票贩子们未”过去“，他自己倒先”过去“了。

我有点不解，更有点快快。但买票要紧，在“方格衫”一伙的嘲笑声中，我重新回到了队伍中。

队伍仍无进展，因为不断有票贩子在窗口“加楔”。转眼间到了 11 点半，而窗口上方写着：售票时间：8：30—11：40。看来，上午是绝对买不到票了。

正着急时，突然来了个退票的，刚巧是到达县的！我喜出望外，边说我边要掏钱。但我还是慢了点。刚才推揉我的那个“光头”一把将卧铺票抢了过去。退票人说他已答应卖给我了。“方格衫”挤过来说：“不准卖给他，否则，哼！”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得退票了不敢吱声了。

我愤然退了出来，一女票贩子从“光头”手中接过票追了过来，“师傅，这张票优惠给你算了，只收 50 元的手续费，拿去嘛。”我一肚子鬼火冒，哼了一声转身便走。“方格衫”在背后冲我嚷道：“瓜娃子，这票你不要，回达县就挤硬座去吧……”
手记之十：“黑色”备忘录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把红、黄、黑三色作了这样的联系：红——权力；黄——金钱；黑——学问，并按所从事的工作，把人分为三个系统，称之为“三维社会系统”，即：把官员、军人、警察等称为以红色为帜的权力系统；把商人、企业家等称作“黄色系统”；把哲学家、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及学子归为“黑色的智者系统”，并把培养“智者”的教师称为最有资格的“黑色阶层”。

同其他“系统”一样，“黑色系统”也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孔仲尼这位“黑色系统”的鼻祖对本“系统”的行为准则早有说道，他主张“黑”、“红”相通，坚决反对“黑”、“黄”相染——所谓“学而优则仕”，“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圣人的理论像一座黑色的金字塔耸立在君子们心间。在两千多年漫长的“黑道”上，他们或牢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教诲，默默地做着学问；或怀着“感时思报国，达兼济天下”的远大抱负，跻身仕途，人朝事君，“谋道不谋食，优道不忧贫”。在金钱面前不越雷池一步者，确也不乏其人。

然而，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不少人心中的金字塔开始倾斜了。一些孔门弟子再也顾不得“君子不言利”的古训，一夜之间，在学校这座圣洁的殿堂里办起了商场，摆出了茶叶蛋。有的把饼干、饭菜和知识搭配在一起销售给弟子，把文凭拍卖兑换成金钱；有的弃“黑”投“红”，另谋他就；有的汇入“黄潮”，经商赚钱。“黑色系统”里的个别“红色阶层”与“红色系统”里的见利忘义之徒，伸出贪婪的黑手在校园趁火打劫……

黑色本是颜色之王。但在生活的调色板上，却出现了黑黄相染的情况。
一阴影

有人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但而今，贫困却像阳光底下摆不脱的阴影，紧紧缠着教师，缠着教育。

据有关资料记载：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 $1/5$ 多，但教育经费仅占 $1/30$ ；1985 年，在 151 个国家中，按人口平均的教育经费，我国占 149 位。解放近四十年来，我国教师队伍增加 35 倍，但教育投资仅比 1952 年增加 7.8 倍；我国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只相当于香港中小学教师的 1%，甚至还达不到抗日战争前中小学教师的 $1/10$ 。三十年代，一个小学教员月薪 45 元，警察 8 元，政府的科长还比不上小学教师。

1986 年，小学、中学教师在全国主要行业的工资排列中，列倒数一、二名。后来，虽明里增加了百分之十，但由于物价上涨，加上其他行业暗中增加工资奖金，教师的实际生活更加窘迫。

1992 年 10 月 30 日《联合日报》载：京城一对夫妇——一个是工程师，一个是中学教师轮流服侍一位住院的老人。当有人问他们何以如此时，回答竟是：“想为孩子上学赚点钱！”他们的回答，除反映而今读书费用高，两个知识分子的正常收入难以栽培一个孩子外，无疑也是告诉人们：教师和其他行业的知识分子的待遇仍然太低，以致连一个孩子读书的费用也不堪负担！

处在这样窘困的位置，“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的教育还神圣吗？“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还崇高吗？

1992 年教师节前，笔者在攀枝花办案，认识了有 10 年教龄的刘力。一年前刘停薪留职外出“跑单帮”当了个体户。

一天下午，我俩在金沙江边散步。小伙子天南海北滔滔不绝，说话时神采飞扬。后来，攀钢的大喇叭响了，在播某领导教师节前深入学校慰问教师，某县又有 17 名教师搬进新居之类的新闻。我感慨道：“教师的地位还是很高嘛……”

他眸子一亮，随即又黯淡下来，一丝幽怨悲苦的阴云浮现在脸上。

“每年的教师节都要宣传一番，热闹一番……”我继续说。

他望着远处的灰云，目光聚成了一口深不可测的潭，“潭”面飘忽着一个悠远沉重的叹息。

“教书一定很有意思吧？”为打破难堪的沉默，我没话找话。

“想知道我为什么停薪留职吗？”他颤抖的声音向我传达出了他微妙的心态。“我们学校去年应拨 14 万元工资，11 月前，乡财政才拨给 1 万多元。学校多次找乡长批款，他总摊说没有，可他们每月工资、奖金、菜篮子补贴一样不少。更可气的是：乡长的侄儿经常到我们学校摆摊卖豆皮串，给乡长讲过多次，他理也不理。一天，他侄儿的摊子挡住了校门，我去干预，乡长的侄儿一拳打得我鼻血直流，并大骂教书匠又翘尾巴了。有关部门叫他赔医药费，乡长的侄儿道：”赔就赔嘛！这么多月没给他们发工资了，就算我可怜他吧！”“我气得

指着他的鼻子发誓：“我也要赚钱，我会比你这个卖三串豆皮就算不清账的家伙赚得更多……”
“讲完往事，刘力仍气呼呼的。”

一种不平在我心中升起：教师为了社会，为了“树人”，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然而他们的奉献并不为人理解，还要遭这样的凌辱。

这是教师的悲哀，也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刘力平静了下来，他将一个汽水瓶像扔烦恼似的扔了出去。“好在我发的誓已实现。”不等我答话，他冲我一笑，问道：“你猜我每月能赚多少？”我颇有兴趣地问：“多少？”他笑着伸出五根指头。“五百？”我感到有点吃惊。不料他却摆摆手说：“不，是五千元。每月贩运三趟钢渣，我就能稳拿这个数。”

趁他高兴，我问：“还打算回去教书吗？”他使劲地摇头，像要摇掉那不愉快的往事：“我正准备辞职，就是讨口也不教书了！”

我愣了愣神，继而道：“教师的社会地位总比讨口的强吧。”没料到却捅响了他的连珠炮：“人们能为长城、大熊猫捐款，可你听说过有谁给教师捐款吗？奥运会上运动员得金牌后，国家奖，单位奖，企业奖，奖钱、奖车、奖房子，一个人可获奖百万元，可参加中学生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比赛金牌得主的教师，有谁给他们发过奖金？！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竟一掷千金，争着去锦上添花，却不肯拔一毛，给穷困的教育雪中送炭！”

我不敢正视他，默默地把目光移向远处那片灰云。我知道，他提出的问题，任何的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

二 “孔雀东南飞”

他就要去“闯关东”了，我到火车站为他送行。

半年前，我在这送走过一个从学校“跳槽”的朋友去深圳，而上次送走的人正是这位“闯关东”者的牵线人。

一家人都前来为他送别。他妻子和一对“双生儿”搀扶着他七旬老母走在前边，我提着他惟一的行李——一个小小的挎包，同他并肩默默地走着。

买好票，开始排队进站，站台上，那只大喇叭里正在播送女歌星张强演唱的《不要走》：“……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不要留下孤独的我……”凄婉、哀伤的歌声回荡在站台这个人间悲欢离合的舞台上，我从他脸上看到了他的内心在战栗。

离别在即，一家人都黯然神伤。两个小儿蔫巴巴地依偎在妈妈身旁服泪汪汪地望着爸爸。他妻子正忙着给气喘吁吁的公婆捶背，脸上布满了愁云。

我打量着这个即将离散的家庭，真想再问他：老母风烛残年，幼子嗷嗷待哺，何必硬要别妻离子，踏上这漫漫天涯孤旅？别忘了，父母在，不远行呀！

可 he 已对我说过，此去正是为了妻儿老母。他还说，他也不想走：“同学数年，难道你

还不了解，当初我是如何向往、热爱教育事业……”

对这，我记忆犹新。学生时代，他人生的路标就是指向教育事业。

拨转他人生路标的是一首小诗。高三那年的一堂作文课上，语文老师为了让我们写好一篇《老师，请听我说》的散文，特意给大家印发了一首《教师之歌》：……虽然 / 我没穿上军装 / 可我一样保卫边防 / 虽然 / 我没站在炼钢炉旁 / 可我一样给长江大桥输送钢梁 / 医生，作家，演员，劳动模范，战斗英雄 / 他们都曾是我的学生 / 我的岗位永不调换 / 我的足迹踏遍四方 / 我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 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那首小诗，使全班同学激动不已。当天他亢奋地对我说：“今后，我们都去考师院，当教师。”我问他：“你的成绩那么好，完全可以考上其他重点大学，读师院，不后悔？”

“后悔？”他一笑，“我愿以毕生的心血 / 种得人类繁花似锦 / 我愿以满头白发 / 换得祖国栋梁成林成荫……”

粉碎“四人帮”后，他如愿以偿。1978年，他同那些扎根农村的知青和满手老茧的青工们一道挤上了自“文革”以来第一次驶向高校的列车。1982年从南充师院毕业后，他登上了川东北某县中学的讲台。

开初几年似乎还顺利。从教第二年，他同邻县一位中学教师结了婚，一年后，送子娘娘一下就给他送来了一对胖小子。同妻儿虽过着牛郎织女般地生活，但有自己热爱的事业，有温馨的家，他满足了。

很快，他发觉生活变脸了。1988年评聘职称时，他名落孙山。虽然教学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但“僧多粥少”，他这个工龄、教龄、年龄都远不如人者，还是被挤了下来。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觉得，职称是对一个人能力、价值的认定，也是教学的合格证；没职称，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价值，就像工厂出的产品没有签发合格证。

当初，他看中的其实还只是职称代表的实际水平。但在当今这个很讲职称的时代，职称带来的物质利益却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与职称紧紧挂钩的，有住房，有工资，有子女户口、家属调动，甚至还要牵涉到书报费、医药费等等。

由于没有职称，他的生活自然产生了不幸的连锁反应。首先是工资少出一大截，不管他怎么戒烟戒酒，节吃省穿，可节约的钱还不够给两个孩子买奶粉。每年，夫妻探亲缴到交通部门的那笔车费，对他无疑是个庞大的数字。每逢学校有几天假，他都渴望同妻儿团聚，但一想到二十多元车费，他心中就发怵。为了不给家庭经济带来更大的困难，他把对妻儿的一腔思念，把心中那份孤独忧伤全倾吐在不断寄出的“两地书”中。但那薄薄的纸又怎能载得下夫妻恩爱和父子情深？又怎能代替得了男子汉在家庭中的支撑作用？

他感到惭愧的是：作为一家之主，没能给家庭带来幸福，让妻子一人一边拉扯两个孩子，一边教学。他很想替妻子分担一部分生活的重担，他不停地跑可能接收妻子的单位，跑人事部门。可人事局的人总是为难地说：小伙子，有高级教师职称的都没能解决呢！他听出了潜台词：你连“中级”都不是，资格还差得远。

后来，不知是“贵人”相助还是借款送情的效力，1991年夏，妻子终于调动到他身边。可一阵高兴后，问题又来了。妻儿来了，老母也来了，那间14平方米的宿舍一下挤进四口人——两架大床和那些破破烂烂的家具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人在其中几乎没有了立足之地。孩子吵闹起来，他俩无法备课改作业；他俩办公时，孩子和老母又无法休息。找了几次领导，领导无计可施。无奈，他只好买来几米花布库一根铁丝将14平方米一分为二，外侧作老人和孩子的寝室兼厨房、餐厅，里边成了他俩的卧室和办公室。每晚，他俩就在那张惟一的办公桌上“各霸一方”。

他竭力说服自己苦熬这清贫的日子。然而，生活的拳头却不时砸向他做人的尊严：几个学生打群架，他对其进行教育，一领导干部的儿子竟蔑视地说：你算老几，初级教师，还想教训我们？

上街买菜，他讲价，大字识不了几个的菜贩子挖苦道：吃不起就别买！

根据学校的统一安排，他布置学生每人交两元班费，一个家长冲进教室，把一张10无纸币一巴掌拍在桌上：“剩下的赏你买包烟！”

恶毒的语言深深刺伤了他的心，生活的石臼将他的理想捣得粉碎。他愤怒，他悲哀，他彷徨：自己热爱的事业离开了职称和金钱竟变得如此一文不值！既然知识贬值，自己受到歧视，何苦还要为她付出“毕生心血”和“满头白发”呢！

他将辞职报告甩给了苦苦挽留的校长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校门。

请不要责备他的不甘清苦和他的不够“高尚”。人都有七情六欲，况且，越是高尚的人，越是看重人格和尊严。

其实，像他那样因收入低微和社会地位不高而英雄气短、纷纷跳槽的教师，并不罕见。据1992年6月3日《四川日报》报道：某地文教部门抽样调查，愿当教师的只占其总数的1/3。1991年，某省有4500多名中小学教师另谋出路，其中大部分是30至40岁的中年教学骨干。1988年5月，福建广德地区850名中学教师集体弃教，致使148所学校相继被迫关门。安徽桐城县11所初中，有8所的校长要求辞职……

《新华文摘》的一篇文章则忧虑地说：某省从1983年至1989年共有9000多名师范毕业生，分到学校的仅4000余人。倘若不是国家采取强制性措施，恐怕中小学教师大部分都会作鸟兽散。

能责怪他们不守“君子固穷”之道吗？谁愿用十多年的寒窗苦读去换一个黑沉沉的前程？谁又肯用自己毕生的心血去换一副“穷酸”相？

我同情他的出走。同时，我也深深地忧虑：教师都像他这样远走高飞，谁来传道授业解惑！望着站台上来去匆匆的人流，一阵失落和茫然涌上了我的心头……

三“黄色”的诱惑

近年来，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从教之路黑沉沉，从政之路红彤彤，从商之路金灿灿。

小学生赚大钱，大学生挣小钱。

拿手术刀不如操剃头刀，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

有人把经商说得更诱人：摆个小摊，顶个县官；办个小厂，超过省长。

朗朗上口的歌谣道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现实：“万般皆下品，惟有赚钱高”的新价值观宣告了知识贬值，教育那神圣的面庞正被金钱的魔力扭曲。

师道无光，斯文扫地，“夫子”中一些人不愿再熬成蜡炬成灰，油尽灯灭。于是，一些人开始为五斗米折腰了。

他们中，有的就地搭棚摆摊，扯起“校园酒家”的幡旗；有的当起“倒爷”“倒婆”，弄来“歪货”兜售给弟子；有的干脆走出校门，涌上“黄道”，汇入“十亿人口九亿商，还有一亿跑单帮”的经商热潮之中。

青年教师刘国华就是前几年随着经商大流“下海”的。他是重庆市中区人，当知青到了大巴山。“扎根”山区十多年，他那大都市人的精明脑袋仍十分灵光。初“下海”时，他停薪留职与校方签合同联办了一个服装厂。说是联办，资金和场地他样样没有，学校仅“联合”了他这么一个光人，而赚的钱却要分给他四成。尽管如此，学校并不觉得吃亏，第一年决算时，他给学校赚了二万多元。正当校长喜滋滋地准备同他再签合同时，他却把一份辞职报告呈了上去——已有近万元资本的他要单干了。

此后，他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经营战略，先把大巴山的木耳、银耳、香菇、药材等土特产运进重庆、武汉高价出售，再从重庆、武汉等地廉价倒来服装、香烟卖给山区的小商贩。三年不到，他就盈利十“方”。现在，他已是拥有六部“康福来”、三部“的士”的车行老板了。他逢人便说：“就是用省长的官儿来换，我也不得干。”

刘国华发了，可苦了他原先从教那个学校的校长。不少教师见刘赚了钱，纷纷缠着校长要经商，有的甚至不等校方同意，申请一交，便扬长而去。“发”了的“黄鹤一去不复返”，有钱人潜移默化地影响无钱人。留下的教师无心思教书，不少人一门心思办商店、当倒爷，教学质量呈一落千丈之势。

但下海的教师也并不都是那么幸运。

同刘国华相比，林冰先生在生意场上就太逊色了。他“全家做生意”，可折腾了五六年，生活水平也没能“胜过县官”。每当同事们问他：“林冰，又赚了多少钱？”他总是按着空空的口袋凄苦地一笑：“多乎哉？不多矣！”

此君文弱儒雅，令他的弟子们五体投地。数篇发表在全国性刊物上的教学研究文章和中教一级的职称更显示了他在校的骨干作用。

八十年代，经商风刮到林冰从教的那个边远山区，他匆忙赶回家中激动地告诉妻子：“你准备一下，我们也要做点生意”做生意？“大字不识几筐的妻子茫然地瞪大了眼。林冰不管妻子是否能听懂，只一个劲儿地讲做生意的重大意义：“这是为了我们一家人能赶上现代生活的节奏，在社会上，在亲友间能有头有脸……否则，我们的日子太寒酸了！”

是啊，一个上有老父，有病妻，下有小儿的四口之家就靠他每月那张“老人头”和两张“大团结”，怎能不寒酸呢。

他有板有眼地介绍自己“考察论证”的项目和资金来源：“周围几个乡场上的鸡蛋一角七左右一个，区场上每个鸡蛋可卖二角三左右一个，除了车费每个蛋可赚五六分。我 120 元的工资全部用于投资可买蛋七百多个，这样算来，赶一个场，就可赚近 40 元，一个月按五个场算，一年就能赚……”他兴致勃勃地计算着，可他那操持油盐柴米的妻子提出：“把工资都买了蛋，家里吃什么？”

“家里暂时克服一下。我背点米到学校自己煮，再带点泡菜、豆瓣就行了。”

“这蛋怎么买、卖，我可算不来账……”

“算不来可买个计算器。”

林冰的“倒蛋”计划就这样开始实施了。不久，他又增加了贩鸡的项目。

开初，因为羞于买卖，或者是为了顾及影响，林冰还只是幕后指挥。后来，见妻子经营无方，并多次算错账找错钱，他急了，干脆赤膊上阵。不管是节假日，还是上班时间，他都携妻带子，背着特制的大兜，倒蛋不止，贩鸡不息，上课反倒像搞副业。最初，他还能勉强备课改作业。后来，有时连上课也找不到他。为此，学校曾扣过他的奖金，可他付之一笑：“小事一桩，不过多贩几斤鸡，几斤蛋！”

然而，林冰任教的学生的成绩越来越差，校长急得直跺脚：“上好一堂课，功夫在课外。”他倒好，课内课外的功夫都用在倒蛋贩鸡上，根本没时间去钻研吃透教材和充实新知识，没心思去构思课堂教学结构。遇上这样的教师，真是学生的不幸，学校的不幸！

四 “风”蚀校园

学校是人类文明的母体，教师“传道授业解惑”，本应“智如泉源，行可以为表仪”。然而，当商品经济的大潮汹涌而至时，校园里也起“风”了。一些“教书匠”在向弟子们高谈阔论“理想”“主义”“奉献”时地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把商品经济简化成金钱第一，把价值观变成了利益得失观，有的甚至把职业当资本，把义务当权力，用“资本”和“权力”去兑换金钱，获取好处。

很快，家长们惊呼：“何止‘三乱’！学校刮的是‘五乱’风厂‘的确，除社会上的”三乱“风外，一些学校还多了”乱发文凭“风和”乱发资料“风。某些为人师表的”灵魂工程师“一改”谦谦君子“的风度，像债主一样逼弟子们交纳名目繁多的费用，像一些城管人员一样想方设法地对学生罚款，像商人一样费尽心机地盘算学生的钱包……师生关系罩上了一

层浓厚的金钱色彩。

1991年秋季开学时，一纸“补习生缴费通知”高高地贴在某校大门口。一群家长和学生仰头用有些发颤的声音轻轻读着：“外籍学生费 300 元，复读费 250 元，超编费 150 元，附读费 40 元，管理费 100 元，早晚自习费 60 元，茶水费 10 元，公物押金 50 元，油印费 23 元……”

一毛算，有人报出了数字：“乖乖！27 个项目，3 100 多元！”人群中立即传出一阵“啧啧”声：“天啊！哪个这么贵！”有人连连惊呼：“读不起，读不起！”

一机关干部模样的人愤愤地挤出人群，冲着垂头丧气的儿子就是一顿臭骂：“你个瘟丧子，当了两年‘补锅匠’，还差你妈三分。你这三分，老子一年多的工资又全栽进去了！”

补习生如此，应届生也不轻松。某职工有两个孩子，分别在两所学校上学。半学期内，他接到了两个学校的七张书面通知和三次口头通知，共交诸如“电扇安装”、“学校基建”、“购资料”之类的款、费 180 多元。1992 年 10 月的一天，他又被读小学的儿子喊去开家长会。会上，校方提出每月向每个学生收取 15 元的作业批改费。他一听，立即惊呼起来：“怪哉！教师改作业还要收费？！‘可老师把脸一’马”，他只好立即点头赔笑应“是”。

对不少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别说花数千元让孩子去当“补锅匠”，就是让孩子从小学读完高中，他们也感到似千钧压顶。在“喂肥几头猪，不够学生读一年书”的叹息声中，不少农民的子女没读完小学便失学了，有的甚至连学校的门也没进去过。有资料公布：在我国贫困山区，每年有 100 多万适龄儿童因交不起书杂费而辍学。据《农民之友》载：1992 年秋季，某镇 2946 名适龄儿童中，有 1920 人是靠打欠条入学的。加上因交不起“五乱”费而辍学的，其数字就更大了。

1991 年秋，某乡学生吴敬上小学一年级不到两个月，家长便接到校方的罚款通知。他放下农活赶到学校，敬上烟问了半天，老师才数落道：“你的孩子不听话……罚 30 元的调皮费！”说话间，老师已“啪”的一声把一张用白纸写成的罚款单放在了家长的面前。

“调皮费？！”家长一愣，心想：“老师的责任就是教育学生不调皮嘛，哪个以罚代教呢？”但表面上，这位家长还是凑上笑脸，用讨好的语气请求道：“吴敬那娃儿不懂规矩，今后，我们一定严加管教，这次的罚款就……”

“今后归今后，先把这次的交了再说！”老师阴着脸，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

家长仍堆着笑脸协商：“农村挣钱难哟，是不是少点……”

“不讲价！没钱就把人领走。”话音刚落，吴敬就被老师推出了教室。

接连三天，吴敬都未能再跨进那间教室。家长急了，只好卖掉家中几只下蛋的母鸡交了罚款。吴敬倒是能上学了，可他家买盐买油的“财路”却断了。

事后，吴敬的家长很气愤：“龟儿没听到过，一年级学生还兴收调皮罚款！”如果他到学

校去看看、听听，也许就不会那么气愤了。某小学规定：迟到早退罚款 1 元，不带红领巾罚款 1 元，打架骂人罚款 3 元……这个学校的一些老师还规定：做错题、回答不上问题罚款 0.3 元，考试不及格罚款 2 元……何况，除学校外，还有不少单位把黑手伸向学生，自立标准或超标准收费呢！某监察局的纠风报告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全县学校超标准和自立收费项目 115 项次，收费金额 441 万元。其中，县超标准 23 项次，金额 112 万元；批准自立收费项目 13 项次，收费 182 万元；乡自立项目 46 项次，金额 125 万元；学校自立项目 25 项次，金额 19.3 万元。

同这自立或超标准收费相比，把资料卖给学生，从中获利就算是比较文雅的了。“教学需要”，“为了学生升学”，谁敢不买？老师把钱赚到了，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加重了，学生学习负担和书包也越来越沉重了。有人称过某校学生的书包，其重量是：一年级 2 公斤，二年级 2.6 公斤，三年级 3 公斤，四年级 3.4 公斤，五年级 3 公斤，六年级 4.5 公斤。有个别学生的书包在 5 公斤以上。一个快毕业的六年级小同学拿出一摞崭新的练习册和复习资料对笔者说：看，这次资料发下来后我们连翻都没翻过，就要当废纸卖了。滥发滥印资料的情况，初、高中更严重。某教育行政部门在一所农村中学调查，学生人均订复习资料、练习册达 23 种，计 55.2 元，最高达 78.7 元，某中学一学生的课桌内竟有各种复习资料 98 本。在“单元自测”、“年段检查”、“半期测验”、“期末考试”、“升学考试”等等名义下，从上到下反反复复发资料，一次次将贪婪的黑手伸向中小学生，把他们父母用血汗换来的钱一分分、一角角地“抠”出来。可以说，每年都有数千名学生被抠出校门。

为“创收”，一些学校甚至别出心裁，想方设法赚学生的钱。某校就拿出了这样的绝招，即学校开一个商店，向全校一千多名学生人人发一个定额 60 元的购物卡，学生或家长买东西，校方商店就在上边填金额。超购不限，但绝对不能低于规定的数字——当然，也不会有谁强迫你买，不过，你的孩子也许会被一个很“正当”的理由赶出教室，还要交出一笔数额不小的罚款；或者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就可以让你那近视眼的孩子坐到最后一排……当你省悟过来，除背地里愤愤地骂几声“学霸”外，将别无他法，只有乖乖地从商店里把你需要的东西买回家。

“五乱”的素材足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东西，但我却压抑地写了这些文字。写这种东西太令人惶惑不安，真担忧“风”会慢慢玷污学校这片净土，真害怕圣洁的殿堂会在“风”里倾斜坍塌！

师者哟，别褻读了那神圣的称号！

五伸向孩子们的贪婪之手

八十年代中期，力俊在川东北某县乐颠颠地干起了中小学教研室主任。

他上任后，大家都盼望被人称作文教局“参谋部”的教研室能有新的起色。但几年过去后，这儿一切依然如旧。每天，太阳当顶，吃了“早饭”，做完家务，“教研”们手提菜篮迈着方步开始上班，到菜市讨价还价一番后再到“参谋部”提劲吹牛。而此时，那心爱而诱人的“资料费”、“试卷款”则是一个常议论的主题。在暗暗窃喜近年收入丰厚的同时，力主任和“教研”们大伤脑筋的是区、乡一些校长和文教助理“人心不古”。例如，对资料层层加价的事就有人很不满意。“教研”们建议：与其让区文办、学校、老师层层再加，不如我们出手时就把价定得让他们不敢再加；有人对个别人赖交资料款的事十分恼怒，主张对其制裁；还有人帮“上边”兜售资料分成太少的事也愤愤不平，多次强烈抗议……

对这类问题，力主任宽容大度地劝告部下们：“别人加点钱是正常的，不要去管，好处一人占点嘛。欠账的慢慢去收，不要逼急了。上边更不要得罪……”

力主任也有不宽洪大量的时候。一次，他从区乡回到“参谋部”后连连大叫：“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有的校长在外地买资料从中得回扣，有几个区还提出不要我们的资料了，说质量太低……”

大家一听，也都觉得事态严重，纷纷献计献策。有人说：“马上向各校宣布，从今年起，统考统统出我们资料上的题！”

有人举一反三：“《时事政治》是初、高中升学考试必不可少的，不买我们的资料，就不卖给他。”

痛恨赖账的人也乘机翻出“老账”：“那些文教助理和校长不把欠的资料款交来，就不给他发考卷，看他个舅子哪个交差！”

“对头，就这么整！”见大家发言难得如此踊跃并能与自己“同心同德”，力主任兴奋地一拍大腿。对企图“虎口夺食”者的制裁方案就这样一锤定音了。

在一致对外的声浪中，偶尔也会因室内的经费开支不民主，资料款去向不明等问题而发生些内讧。有教研员背后还骂力主任把钱贪去吃药。但有人指责骂人的：不是力主任，你买得起彩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你能存那么多钱？真是忘恩负义！

“忘恩负义”者果然想起了力主任带来的许多好处，却仍忍不住顶撞一名：“莫得力主任，不信你还修得起那七、八间房子？”被顶撞者讪讪一笑：“盯我啥子？力主任他们用分的资料钱修的房子还比我多呢。”

5、6月是教研室最忙碌的两月。按惯例，每年5月初，力主任都要召集部下开一个试卷、资料定价会。那“很有搞头”的价格定好后，“教研”们开始甩开膀子大战“红五月”了。写字的“沙沙”声，打字机的“啪啪”声，油印机的“吱呀”声，捻资料的“哗哗”声和偶而爆发出的“哈哈”声，汇成了一曲奇妙的“交响乐”，夜以继日地回荡在那间破旧的小屋里。

忙过一阵后，“交响乐”停止了，领试卷领资料的人潮水般地涌来。“潮水”退去后，力主任同大家一道“三百……一千……两万……”地数着刚“抠”来的钞票，声音兴奋得颤悠悠的……

就这样，数年来，力主任等人在“单元自测”、“年段检查”、“半期测验”、“期末考试”、“升学考试”等名义下，一次次把贪婪的黑手伸进全县十多万中小学生的口袋里，把学生父母用血汗换来的钱一角角、一元元地“抠”出来鼓圆他们自己的腰包。一届届学生被他们“抠”光“抠”穷，每年都有数千名学生被他们“抠”出校门……

对此，力主任“理直气壮”地说：抠学生何止我力使一个人，又何止我们县教研室？地、

县、区、乡、村哪一级不打学生的主意？有的人根本不用动手，钱就到他们荷包里去了呢。

公证地说，力俊讲的是实话。

比如：到 92 年底，某镇的干部们工资奖金全部发齐，而镇里一百多名教师的工资才发至 6 月。校长成天跟在镇长、书记和财政所长屁股后求情，但工资怎么也拨不下来。有人指点“迷津”：让每个老师出 10 元钱去“打点”镇长等人。老师们已数月未发工资了，只好让学生“拉老师一把”。于是，全镇学校在每个学生集资 2 元的情况下把镇长等人“打点”了，老师们的工资才得以解决。

某监察局的纠风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载：……全县学校超标准和自立收费项目 115 项次，收费金额 441 万元。这 441 万元当然是从学生身上“抠”来的，同力主任等人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 1991 年底的《半月谈》载：某贫困山区 12 岁的女孩子卿远香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1990 年，因交不起学杂费，她失学了。她白天喂猪砍柴，晚上拿出珍藏的课本自学。期末考试时，她匆匆干完活跑到学校，在剩下的半堂课里认真地答完了考卷。在考卷的末尾，她含泪写下：“我想上学！”

那些把卿远香这样的学生“抠”出校门的人们，收起你们伸向孩子的贪婪之手吧！
六救救孩子、救救未来

中国教育的背景是严酷的：全国 80% 的人口在农村，大量的学校也是在农村。这些在农村的学校本来就先天不足，加上不堪穷困和地位低下的一些教师跳槽、经商，以及“五乱”风肆扰校园，更使其元气大伤。

有人说：“把教育变成金钱的奴隶，就会使教育成为一台运转紊乱的机器，她不仅会产生次品，而且，她本身也会成为次品。

这“次品”早晚会报复惩罚她的制造者。

其实，1989 年 9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敲响了教育的警钟——全世界 8.9 亿文盲，有四分之一是中国人。

国内有关部门统计的数据是：8 亿农民，有近 5 亿是文盲。半文盲。

更可怕的还是文盲的后备军。据有关资料统计，每年，全国至少有 250 万 7 至 11 岁的儿童不能入学，小学每年有 300 多万学生流失，“全国至少有 3000 万儿童（占总数 20%）没能读到小学毕业，另外有 5 % 的儿童是文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资料则称：1 / 3 的中国儿童所受的教育不满 5 年，而老、少、边、穷地区的情况更加惊人；因交不起书本、杂费，每年都有 100 多万儿童失学。1992 年 6 月 25 日《四川工人日报》载：八十年代，四川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达 42 万人。如果加上“五乱”之风刮走的学生，真不知有多少孩子加入“羊棺”、“放牛娃”和“童工”的队伍！

“黄道”上又增加了多少“童商”、“童贩”！

改革开放的“设计师”早为我们描绘出了本世纪末那诱人的宏伟蓝图：工农业总产值翻数番，人民过上小康生活……

外国人却为我们算了这样一笔账：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中国的教育至少必须达到两个目标：①在这个有四分之一的成人是文盲的国度内进行基础教育，同时培养出足够的工程师、教师。技术员和高度熟练的工人；②必须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培养出 1450 万大学毕业生。

然而，几年前人口普查却表明：将中专、中技、五大生全部算上，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才 600 万。

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四化”靠谁去实现？难道能靠那些“羊倌”、“放牛娃”或“童商”、“童贩”？！

教育的危机不仅仅是失学、脑体倒挂、知识贬值引发的“厌学风”正在全国蔓延，连那些被视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研究生也不乏退学之人。

教育的危机还表现为教师形象的扭曲。1991 年，山东师范大学“中学生生活”咨询处对 1700 名中学生的来信揭秘，竟有 80% 的学生在信中流露出对老师不满。在中学生们眼里，搞“五乱”的老师不过是些“学霸”、“为钞票所奴役的人”。

“五乱”风也污染着学生纯洁的心灵。1992 年 10 月，某校四年级学生秋游时，几个同学向某同学要水喝，这个同学竟提出喝一杯水收费一角钱。事后，家长责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孩子满有理由地答道：老师守着我们上自习课都要收钱，我给别人水喝为什么不能收服务费？有个二年级学生偷了同学的东西，事后老师批评他，可他很不耐烦：“罚款都交了，还啰嗦啥！”在学生的观念中，犯了错误不要紧，也不必改正，只要交罚款就行。金钱万能，已经污染了一部分学生纯洁的心灵。

金钱扭曲了教育的崇高形象，也扭曲了被教育者的心灵。在帮助失学儿童的同时，这类孩子也急需拉一把！

值得欣慰的是：党的十四大再次把教育提到了重要位置。各地也确有一批远见卓识者在认真办教育。

贫困的闽西人说：再苦不能苦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他们明白：未来世界的竞争，将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也就是人才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教育的竞争。他们更懂得：拯救教育，就是摆脱贫困，就是振兴经济。抓好了现在的孩子，也就是抓住了祖国的明天，抓住了中国未来的“四化”。相反，现在的穷教育，也就是明天的穷国家。现在薄待教育，就等于葬送国家的未来！

被称为“中国教育新坐标”的沈阳木兰公司为学校拨款数十万元改变办学条件。他们不仅为学校“输血”，给学校增加造血功能，还扶植学校办企业，每年创利三四十万元。这样既解决了教师子女就业，也解决了教师的福利。

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为救助贫困地区失学青少年，发起了“全国小伙伴手拉手”和“跨世纪的希望工程”活动。海内外仁人志士纷纷解囊相助。1992年6月10日，邓小平同志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希望工程”捐款5000元……

我相信：多一些“闽西人”和“老共产党员”，多一些木兰公司和仁人志士，中国教育的现状是可以改变的。

手记之十一：“李鬼”大闹草兴场

精瘦矮小、面色蜡黄的李光全肯定不像《水浒》中那个膀宽腰圆、满脸炭黑的李鬼，但自他在达县草兴乡白庙子处栏杆设卡、持刀强行“收费”起，过路的驾驶员们便把他叫“李鬼”了。

这“李鬼”本姓陈，3岁时抱养给外乡的亲戚取名李光全，后因与养母不和逃回草兴乡老家，在白庙子处的公路边搭了间茅草房栖身。李光全自幼养成耍横撒赖、装疯卖傻的恶习，故38岁才讨了个老婆。有了家，他却不好好经营。在门前摆个茶水摊，他嫌“赚不了几个钱，莫耽误了老子的功夫哟”。到城里卖了一阵子菜，他又觉得“太麻烦，卖他妈几个钱还要交管理费，太不划算”。与市管会的人大干一场后，李光全回到了草兴。回家后，他依旧无心农事，田里的野草总比庄稼长得好。他说：种啥子田哟，累死累活的，地里那点粮食还不够麻雀吃。

不愿做生意不想种庄稼的李光全却“雄心勃勃”地想发大财。以前在外边“晃”时，见公路上收费站林立，过一辆车就是五元十元的，他由此暗暗盘算：我门前那条公路上通马家等乡镇，下连好几个煤矿、石油钻井队，一天至少要过几十辆车，如果栏杆收费，那收入肯定不得了！

于是，李光全决定建个收费站。

屋外的公路被他挖了个缺口，接着他弄几块石头放在缺口边，然后，找人用红漆在自家墙上写下“收费原因及标准”：“达县草兴乡白庙子李光全贷款1500元修路，修路受伤药费500元，现收费还账。石油局大车10元，本地大车5元，拖拉机3天，牛车2.5元。一切车辆交费可顺利通过，各级政府无权干涉！”

定下“标准”后，李光全把家里晾衣服的长竹杆往公路两边的树叉上一横，再搭个凳子一坐，便正式开始收费了。

开初，驾驶员们说这是私自设卡，不愿交费。有人骂他是“李鬼冒充李奎拦路打劫”，李光全却说：“李鬼就李鬼，这过路费老子李鬼收定了！”说着，往车前一躺，骂道：有胆量就从老子身上开过去！司机自然不敢从他身上开过去，只好乖乖交费走人。

久了，驾驶员们都知道这“李鬼”是个惹不起的主儿，偶遇手头拮据，还要堆起笑脸向其求情：李鬼，今天没带钱，行个方便，过路费下次补上。李光全一脸肃容：“不行，一次是一次的！不过，特殊情况嘛可以灵活处理。”他建议：“车上不是拉的货吗？我这个人好说话，以货抵过路费还是可以的。”说完，也不管别人同不同意，他爬上车就把货往下掀。

不久，李光全的门前便堆起了数量可观的石灰、水泥、河沙。煤炭、石条、砖瓦……

当然，并不是所有驾驶员都那么“乖巧”地任凭李光全“收费”、卸货，也有不信邪的——李光全躺在路上，他就停车闭目养神或到草兴乡报案。遇上这种人，李光全更横——他在“收费站”备下菜刀、木棒、大粪或牛屎，有“抗拒交费”者，他一边用木棒猛敲车门，乱砸玻璃，一边挥舞着菜刀大骂驾驶员：你龟儿找死呀！如果这阵势还吓不倒驾驶员，他就抓起大粪往挡风玻璃上涂，往驾驶员脸上抹。这一招还真厉害，驾驶员们不是投降“交费”，就是被他追得哇哇地满坡乱逃。连宣汉县某派出所的小车在李光全的“收费站”遇上这一招，也无可奈何地赶忙交5元“过路费”了事……

草兴乡政府及当地村社曾多次取缔李光全的“收费站”。见有人断自己的财路，李光全急了。他冲进乡政府，砸玻璃、砍门窗，把屎涂在乡领导的门上身上，挥着菜刀在乡政府的院坝里跳上跳下地大叫：哪个敢不叫老子收费就砍下他的头！

每次，直到把乡政府搅得鸡犬不宁，一片狼藉，李光全才“凯旋而归”。他的“收费站”当然照开不误。不过，在乡政府越来越强硬的干涉下，李光全开始改变策略了：他在路旁捏了两个泥人用红布盖上，再点上些油灯香蜡，说这两个泥人是专管草兴这一方凶吉和财运的菩萨。过往的车辆来了，他虽仍用竹杆拦路，但“收费”的理由却变了：“司机师傅，给菩萨供点香火钱，菩萨保佑你一路平安。否则，你的车要往岩下翻！”为图吉利，司机们赶忙掏腰包。

见“菩萨显灵”，财源滚滚，李光全不失时机地扩大“收费”对象：除车辆外，行人也要收费。商人过路，他说：给钱吧，菩萨保佑你生意兴隆。学生过路，他说：给钱吧，菩萨保佑你考上大学。妇女过路，他说：给钱吧，菩萨保佑你生个儿子当大官。老人过路，他说：给钱吧，菩萨保佑你长寿百年。不给钱者，他就送人一些“你有血光之灾”“你要绝后”“你要短命”之类的咒语，令人心中不快，惶恐不安。

靠菜刀、木棒、大粪的威力和“菩萨”的保佑，李光全的“收费站”收了多少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如果不发生后来的事，他也许还要继续干无本万利的“收费”，但1997年12月4日那件事，却使李光全和他的“收费站”一同完蛋了。

那天上午，隆昌县做蚊帐、床单生意的周声良、吕凤文路过“收费站”时，李光全把洋铲一横说：这公路要收过路费，交钱吧。吕凤文不买账，说：我走南闯北，还没听说过路要交费！周声良也附和：把上边允许你收费的文件拿出来看看就交！虽拿不出“上边的文件”，却没难住李光全，他指着路边的泥人说：不是我收费，是给菩萨拿点钱。你们的生意红火些。可周、吕二人不信“菩萨”，绕开李光全就要走。李光全骂道：你妈的两个外地人真不懂规矩！骂完用瓦块抹上牛屎递过去说，不交费可以，吃了这个就可以不交。吕凤文打掉了瓦块，李光全火了，用洋铲铲起牛屎就往周、吕二人身上抹，吕凤文一气之下扇了李光全两耳光。这一下事情可闹大了，李光全夺下吕凤文800多元的蚊帐、床单藏进屋内后，一手握刀一手持棒冲出来，他将周声良的大挎包砍烂扔下崖去，再用木棒把周声良打得抱头鼠窜，然后揪住吕凤文挥着菜刀威胁道：现在这过路费要交200元才走得脱了，不然，老子一刀砍死你！吕凤文“虚”了，颤抖着说：大哥，我莫得那么多钱呀！李光全说：我让点步，给100元！见吕凤文吓得半天掏不出来钱，李光全一下扯开他的衣服，抢走30元……

当天，李光全正得意洋洋地点数着抢来的钱时，公安局的把他“请”走了。

李光全设卡用的竹杆被人扔到了崖下，“收费站”从此畅通无阻。
手记之十二：夏娃在“天堂”堕落

这是几个真实的故事。我把它讲出来，是为了我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愿他们能从中得到一点教益，特别是在他（她）们也要踏上打工之路的时候……
三陪小姐，守不住的防线

两年前，大巴山某县的苏敏，生下一双女儿后不久，朝思暮想生个儿子传宗接代的丈夫便一脚“蹬”了苏敏。祸不单行，不到两月，她上班的麻纺厂又宣布倒闭。失去了生活来源，苏敏只好带着两个女儿回到娘家。刚满 20 岁的妹妹已在家待业三年，一下又添三张嘴，老小六口的生活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维持，缺吃少穿的阴影从此便时时笼罩着这个悲苦无助的家庭。听人说，广东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天堂，去广东打工也就成了苏敏姐妹身不由己的选择。

到了广东，姐妹俩焦急地发现，那些先期涌来淘金的湘军。滇军川！军、鄂军……几乎淹没这儿的大小城市，在粤西小城 A 县转悠了好几天，黑牡丹舞厅的老板总算看中了这对花容月貌。翩若仙子的姐妹，给她俩安排了工作。

工作很简单，陪客人喝酒、唱歌、跳舞。待遇也很诱人：陪 1 小时 10 元，另有小费。

开初，她俩虽吃不惯那“一股怪味”的粤菜，但舞厅里的感觉却十分良好：悠扬的舞曲，幻化的灯光，迷离的色彩、轻盈的舞步常把苏敏姐妹俩带人梦幻般的意境……

可惜这种意境很快便被惊散：幽暗之中，客人频频把手伸进苏敏的“禁区”，苏虹好几次被人往舞厅旁那间特备的小屋里拉。姐妹俩气呼呼地向舞厅老板告状：“这不是污辱人吗？”

老板却用广东口音很浓的普通话教训姐妹俩：“小姐呀，这儿是开放区啦，像你们那样保守，怎能招来客人？又怎能赚钱啦苏敏不服老板的教训，用四川话回敬道：“你这些龟儿老广，只知道利用外省妇女的肉体色相赚黑心钱，真丧德广老板听不懂川话，气得哇哇直叫：“我要在客人身上赚钱啦，我给钱让你们陪客人，客人想干什么我不管啦！”

姐妹俩从老板的话中掂量出了自己和所有“三陪小姐”的价值及作用：廉价将自己典当给舞厅老板，在灯红酒绿中零售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老板拍卖色相牟取高额利润，靠“小姐”向舞厅一掷千金的客人获得淫乐……

苏敏不愿把自己的人格、尊严失落在这曾被自己视为“天堂”的地方。她告诫妹妹要小心点，别让那些家伙占便宜。

然而，三陪小姐被人占便宜似乎是难以避免的。一天晚上，苏虹被一个色迷迷的胖经理强行按在沙发上，苏敏刚欲过去解救，却被另一个家伙搂住。姐妹俩挣扎着，呼叫着，舞厅里除爆发出阵阵淫荡的嬉笑外，没有人救援，没有人制止，甚至没人同情。在这种地方，不会调情，不坐在客人大腿上撒娇，不勾着客人脖子跳贴面舞，不让客人搂抱捏摸的舞女是不正常、不合格的，也是这个放浪形骸的场所不能容纳接受的。

挣脱后，姐妹俩逃回铁皮房里抱头痛哭。苏虹边哭边喊：“我受不了啦，我想家，我要回四川……”

但回去后无钱无工作的日子又怎样过呢？‘苏敏心如刀绞，她劝妹妹忍耐几天，等另找一份工作就马上离开这鬼地方。

以后几天里，姐妹俩四处托来小城后认识的熟人帮忙找工作，条件是，只要不是舞厅就行。但熟人们都说，现在旅馆、咖啡厅、发廊、浴室的那些打工妹大多是老板弄来出卖色相肉体的，境遇还不如舞厅里好呢！听了这话，姐妹俩再也不敢去动那另找工作的念头了。

姐妹俩仍旧留在舞厅。要生存下去，她们不得不考虑如何适应这儿的环境。渐渐地，她们学会了抽烟，学会了同客人喝“交杯酒”，学会了打情骂俏。缠绵的贴面舞步踩碎了昔日的羞涩，陪人唱“夫妻双双把家还”之类的歌曲更充满了热情。跳得大汗淋漓，唱得喉咙沙哑还要关怀备至地给客人倒水点烟，无话找话地陪客人聊天。心里本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悲哀，脸上却要挤出甜甜的微笑。后来，不规矩的客人在身上捏捏摸摸，她们也能若无其事，佯装不知了。

人格尊严失去后，她们只剩下了一个麻木的躯壳。苏敏姐妹却自我安慰说：“不管怎样，我们总算没有失去女人的最后一道防线。”

但不久发生那件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她们这么自我安慰了。

那是 1994 年初的一天晚上，一个长着广东式肥胖鼻子的厂长一把搂过苏敏，“苏小姐，跟我去住旅馆吧，给你 500 元小费啦苏敏将那好笑的肥胖鼻子持了一把，学着厂长的腔调嬉笑道：“老娘没兴致啦。“说完，留下一个飞吻，溜了。

肥胖鼻子冷笑一声，又一把拉过苏虹说：“这么靓的美人在舞厅里太可惜了，给我当老婆吧，每年给你 3 万元。”

苏虹白他一眼刚要离开，肥胖鼻子却在苏虹胸前乱摸乱捏起来，气得苏虹一下将肥胖鼻子推倒在沙发上，并顺手甩了他一耳光。

肥胖鼻子恼羞成怒，拿起手机，叫来了两个保镖，说苏虹当众打骂污辱他，侵犯了他的人格和尊严，要马上赔礼道歉并付 2000 元的医药费，否则就把苏虹送到公安局。

苏敏知道肥胖鼻子是这个县谁也惹不起的“杂皮”，忙求舞厅老板去调解，舞厅里的姐妹们也纷纷求情，但肥胖鼻子却色迷迷地盯着苏虹说：“想算了可以，但我们得单独谈判谈判。”

万般无奈，苏敏咬咬牙说：“我妹妹还小，我跟你单独谈判。”

那晚，肥胖鼻子和苏敏在旅馆单独谈判了整整一夜。谈了些什么无人知道，但第二天，有人看见肥胖鼻子讨好地陪苏敏喝过早茶后，又在商店里给苏敏买了好几套时装……

不久，肥胖鼻子又来到了舞厅。这次，他没去找苏敏，而是缠着苏虹没完没了地唱卡拉OK、聊天，后来，在跳舞时，他把苏虹拖进了舞厅旁那间特备的小屋。苏敏扑过去使劲敲门，但门一直紧紧地关着……

一个同苏敏姐妹有些过节的云南小姐幸灾乐祸地说：“看来，她们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彻底崩溃了。”
非正常按摩，挡不住的诱惑

1992 年秋，刚从电大毕业的小芳正心急火燎地在家等待分配，碰巧广州 XX 电子科技开发公司到重庆招工。

小芳前去打探情况，招工的一见便说：“小姐这么漂亮，有风度有气质又有文凭，如去了我们公司，完全可以学习操作电脑。每月 1000 元，吃穿住公司包。”

小芳一听乐不可支。父母劝她不要轻信，小心上当。小芳说：打起灯笼都找不到的好工作，还瞻前顾后个啥。悄悄交 500 元报名费后，随招工的到了广州。

上班后，小芳才发觉上了当。公司不开发电子科技，只加工盆盆罐罐之类的塑料用品。加工盆盆罐罐十分简单，自然用不着电脑操作。一心向往学电脑的小芳被那个已秃顶的老板选中做秘书。小芳一见他凸额鹰眼的样子就恶心。她说公司骗人，哭闹着要回重庆。老板说，回重庆可以，缴 2000 元的手续费马上走人。小芳没有 2000 元，只好当了秘书。

老板对秘书很不规矩，经常动手动脚。小芳千方百计躲避，但老板想方设法打她的主意。一个闷热的晚上，老板叫小芳加班，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老板用暴力强奸了她。

小芳哭得死去活来，发誓要去告老色鬼。秃顶老板轻松地说：“告吧，我大不过花 3 万元就能把事搞掂。看你今后怎么活人……”

为了今后，小芳忍气吞声地离开了公司，到离广东 300 公里的 B 县当了发廊妹。

发廊里只洗头 and 按摩。洗头很容易，但小芳不会按摩。老板娘怪怪地笑着说：“阿芳呀，按摩根赚钱的喽，其他小姐每月都能赚七、八千呢。”

说得那么诱人，小芳决定学学按摩。一天，她推开按摩室的门，不由惊呆了：广西来的发廊妹正和客人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她捂着脸跑了出去。老板娘却笑着说：“就那么按摩啦，别忘了按摩一次收 200 元小费。”

小芳不愿赚这种小费。她向一个懂按摩的湖南小姐学会了这门技术，以正常按摩挣钱。每月虽顶多赚 300 元左右，但她在给家里打电话时（她从不写信）却只能告诉父母，自己工作的电子科技开发公司很好，一月领 1000 多元。1993 年 6 月，家里来电说母亲病重，快寄钱。小芳这才慌了，只好向老板娘借 5000 元寄回。

从此，5000 元的借款像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压在小芳心头。老板娘却轻松地开导说：“5000 元算什么呀，搞点非正常按摩一两个月就还清啦。”

后来，老板娘说得小芳动了心：“自己被老色鬼糟蹋过，已是个不洁的女人，为了还账，非正常就非正常吧……”

“非正常按摩”果然赚钱。但老板娘的“管理费”也高得吓人。两个月后，账虽还清，小芳却所剩无几了。她愤愤不已：“卖身钱也要抠一陀，龟儿老广真狠毒！”

她决计改换门庭。听说离B县7公里的XX开发区那些酒楼、宾馆的桑拿浴小姐很赚钱，并且不交“管理费”。前去一打听，果然如此。小芳毫不犹豫地进了一家宾馆。她想：在这儿挣一大笔钱就马上回重庆。

宾馆的桑拿浴在三楼。小芳的第一印象是这儿比发廊更开放、更正规：十多个小姐在公关经理（有的小姐叫她“妈咪”）的指挥下围坐在楼中大厅里恭候客人。来的客人选中一个小姐，交上一笔“水电费”，就可以去单间房里“桑拿”一小时，而小姐则可以从客人处净得200元小费（若客人带小姐外出“桑拿”，小费可以翻番）。

来“桑拿”的客人像逛商场的一样多，有时，一个小姐一天要“桑拿”十几次。小芳上班一星期就得小费八千多元。

“桑拿”的房间里都摆着一张《XX公安局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通告》和一本《打击卖淫嫖娼纪实》的小册子，小芳担心地问妈咪：“公安来抓住了怎么得了？”

妈咪笑道：“傻姑娘，这儿是红灯区，公安从不到这里找麻烦。”

小芳暗想：“既然不找麻烦还放那些通告干啥子？老广真幽默，允许别人卖淫嫖娼又放一张通告在旁边吓人。”

隔了两天，小芳又多了一层“担心”：得了性病怎么办！

妈咪安慰说：“不会的，有关卫生部门隔一段时间就会体检的。”果然，不几天，几个医生来宾馆搞体检，还给每个小姐打了一支抗性病的针药。小芳觉得每针收80元太敲竹棒，但其他小姐都说这一针一本万利，值。

小芳在宾馆平安无事地干好几个月了，据说她存折上已有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但她已改变了赚一大笔钱就回重庆的打算。她说：这么好的条件和环境，不多干几年划不来。地下夫人，胆颤心惊的守望

为寻找阿里巴巴的山洞，19岁的文莉从湖南益阳到了广州。她问先到几天的老乡，什么地方最好赚钱。老乡学着老广的腔调告诉她：“当然是舞厅啦！”

三天后，文莉在“情人舞厅”当了舞女。上班那天，她暗暗定下目标：“挣20万元就回湖南找个老公结婚。”

月满结账时，文莉着了急：跳得腰酸背痛，一个月才2000元，这样算来，跳10年一分

不花才能赚足 20 万，那时自己都成老姑娘了。她寻思：“得另找门路”。

机会很快来了。

一天，文莉陪做钢材生意的大款吴经理跳舞，一曲未完，大款夸奖说：“文小姐，你真美！”

“是吗？”文莉挂着一脸荡人心魄的微笑。

“怎么不是。”大款馋兮兮地形容词连篇，“天造地设般的容颜，冰清玉洁般的肌肤，迷人的身段……”

文莉从大款肩上抽回手捂住嘴吃吃地笑道：“吴老板，太夸奖了。”娇柔万端中更显得别有一番楚楚风姿。

“我很想帮文莉小姐每月再多赚一点。”大款的身子一点一点的贴近了文莉。

文莉用双手勾住大款的脖子，眼神凝固成一个永恒的惊喜，“真的？！”

当然是真的。从那晚上起，文莉开始从事“第二职业”——当大款的“承包夫人”。她的腰间多了一个呼机，并学会了骑摩托。只要呼机一响，她便忙去复电话，然后遵嘱骑着摩托飞快赶到某个旅馆与大款共度良宵。

满一个月那天，大款给文莉发了 3000 元的“红包”。

一天，因刚做成一笔生意赚了不少，大款来了兴趣，“阿莉，陪我去兜兜风啦。”

文莉坐到大款怀里嗲声嗲气地撒娇说：“人家在舞厅上班都快累死了，还要陪你兜风，真不知心痛人！”

大款顿生惜香怜玉之情：“舞厅能挣几个钱，别去了，我在火车站附近买了一套商品房，去那儿上班守房子吧。”

文莉一下逮住大款的脑袋，把一个红红的嘴唇印在他腮上，“你想金屋藏娇哇！”

从“承包夫人”升位到“地下夫人”，文莉一下富贵了许多。一日三餐皆由楼下那家餐厅送到房里。饭后，她或坐在阳台上观赏低空飞往白云机场的飞机，或看一阵电视，或衣裙楚楚，盛装出动，牵着花三千元买来的哈儿狗到街上溜达一圈。有时，也到隔壁那个香港老板的“留守夫人”那里胡吹瞎侃一阵。隔一段时间——特别是快一个月时，文莉会望眼欲穿地盼望大款来给她“关饷”。

大款已很有些日子未来了，文莉十分焦急。一天，隔壁的香港“留守夫人”惊慌地敲开文莉的门说：“不好了，你那位吴经理被他老婆抓住了！”

文莉问了半天，才弄明白：“留守夫人”刚才看见大款的老婆带人把大款和一个女人从他们鬼混的旅馆里抓到街上，那女人被打得满脸是血……

文莉吓得赶紧关上防盗门，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门外一有脚步声，文莉就胆颤心惊地从“猫眼”里往外张望。有几次，在阳台上看见有人向楼上张望，文莉吓得两腿发抖，一身虚汗苦熬了半个月，终于盼来了垂头丧气的大款。追问半天，文莉才知道自己已是大款的第四个地下夫人，禁不住一阵痛哭和数落。大款安慰说：“别难过，虽有好几个，但我最心爱的还是你”爱我，说不定哪天你老婆来将我打死，你也不会管…… “

“她敢！”大款一副大丈夫气概：“一个丑八怪，一个黄脸婆，这么多年连个蛋也没给我下一个。”

听大款痛骂他老婆，文莉忍不住破涕而笑。大款趁机搂过她，“阿莉，给我生一个儿子吧。”

文莉白大款一眼，“儿子那么容易生！”

“我悬奖 3 万元。”

“不嘛，要 5 万元嘛……”文莉摇晃着大款直撒娇。

大款一刮文莉的鼻子，“5 万就 5 万。”但一转念又开玩笑说：“要有奖有惩，若生了女儿呢？”

“生了女儿就 4 万。”

两人一拉勾，“君子协议”达成。

不久，文莉兴奋地告诉大款：“有了”。大款摸着文莉的肚皮问：“是 4 万还是 5 万”？

“争取 5 万吧”文莉得意极了。

大款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为了防止黄脸婆来找麻烦，你回老家生了孩子后再过来吧。”文莉怀疑地看大款一眼，暗忖：“大概又有第五个地下夫人了吧？”不过她同意了大款的建议。

临走那天，大款一个劲地吩咐生了孩子要快打电话告诉他。文莉却在心中盘算：再等几个月来广州时，在大款那里领到的“奖金”和“工资”已接近 20 万那个目标了……

手记之十三：圈套

骗子和骗子们的公司

在人们的印象中，法办诈骗者，保护被诈骗者是司法机关处理诈骗案时不变的基本原则。而本案被骗的达县粮油贸易公司经理庞启茂及业务员徐在江在 1998 年 2 月 20 日却被达县人民法院以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分别判刑 2 年和 3 年。同年 9 月 28 日，诈骗犯何绍先和嘉从荣、赖应强又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和 12 年。诈骗骨干何清顺正在追捕之中。

绵阳市先发物资有限公司的牌子 1995 年在公司成立时挂在绵阳市花园批发市场 23 号。因常干些坑蒙拐骗的勾当，被坑骗者也就难免三天两头找上门把公司闹得乌烟瘴气。于是先发公司成立不久后的一天，只好悄悄转移到迎宾路 78 号的绵阳市百货站二楼。

该公司几个“老总”的历史也都很不光彩。总经理兼出纳何绍先，31 岁，绵阳市游仙区松坪乡人，因在火车上盗窃，1990 年 5 月 1 日被成都铁路法院判刑两年半。副总经理兼会计何清顺，46 岁，在绵阳市地震办工作时因贪污 5000 元被开除公职。副总经理嘉从荣，39 岁，江油市人，1995 年在宁夏某厂行骗，曾受拘役处罚。办公室主任赖应强，34 岁，原在绵阳供电局工作，1987 年因犯事被开除。

这一伙有前科劣迹的人员云集在一起之后多次行骗。1994 年以来，被他们诈骗的广元市粮食局下属某公司、常州某外贸公司、宁夏石嘴山某厂等企业蒙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钻入圈套

1997 年元月 3 日，何绍先率何清顺、赖应强等五人在达州市屁颠屁颠地跑了好几天才有了笔“业务”——当晚，达县粮油贸易公司经理庞启茂带着副经理杜东升、业务科长熊克勇如约来到何绍先等人下榻的双狮宾馆。按策划，何绍先回避了，这段“戏”由何清顺主演。一阵客套后，何清顺点燃烟，呷几口茶便滔滔不绝地演讲起来。他说，先发公司是绵阳市百货站的下属公司，是国营企业。公司的实力在绵阳市数一数二，光高档轿车就有五六部，何总经理坐的是 80 多万元的君王车，几个副经理和办公室主任一人有一辆本田或桑塔纳。他说，本公司专做有色金属生意，做一次的利润都是上百万，有时做点粮食生意不过是为了照顾五粮液酒厂这样的关系户。他说，这次买点大米主要是想与新疆某建设兵团换黄豆，每斤的差价可赚两角左右。他说，如果这次合作成功，以后每个月都可以要 17 个车匹的大米何清顺侃侃而谈的话语中显露出了一种大企业家大老板居高临下的气势，听得庞启茂肃然起敬。这个近年来把公司经营得奄奄一息的经理在心中暗自盘算：先发公司是一个难遇的合作伙伴。首先，它是国营企业，与国营企业打交道总是保险的。其次，先发公司资金雄厚，大米销后收款不愁。第三，合作前景广阔，如果真能每月发出 17 个车匹，对粮油贸易公司无疑意味着财源滚滚、兴旺发达。

想到这里，庞启茂感到一阵难以控制的亢奋。但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大半生的庞启茂很快又冷静下来。细细一想，对何清顺的话也有些疑惑的地方。比如：先发公司既有那么多高级轿车，为什么总经理出差只来了辆铃木面包车？那么有实力，出差为什么住这种中档的旅馆？既然做一次五金生意的利润就是上百万，为什么还要做用大米换黄豆赚差价这种小生意？

当庞启茂变换着问话方式把自己的疑惑提出后，何清顺笑谈风生，一一对答如流。他说：这次本准备乘君王车过来，但临走前车突然被市长借去上成都开会，再者，考虑达川山路多，所以便来了个铃木车。何总出差很反对住高级宾馆，所以只好在这里住下。至于用大米换黄豆赚差价的事，何清顺回答得更有气势，“主要是为了广交朋友，拓宽经营范围和渠道，逐步走集团化经营道路。”

一切都合情合理，无懈可击。庞启茂听后，疑惑一下烟消云散。他喜不自禁地问：不知何经理这次准备收购多少大米？何清顺放下茶杯，略略思忖后答道：暂定一千吨左右吧。杜

东升问：“价格呢？”“由你们运到绵阳，每吨最多 2200 元。”一直未吭声的赖应强开了个价。杜东升等人连连说低了。赖应强讨价还价说每吨再加 10 元，何清顺大度地拍板说：既有幸合作，就是朋友了，朋友之间不应斤斤计较的！干脆每吨 2220 元！

价格刚刚敲定，何绍先推门进来了。他一边热情而不失矜持地与庞启茂等人握手一边道歉说：各位，失礼了，你们达川地区商业局的张局长（该局根本没有姓张的局长）请我吃饭，回来晚了。对不起对不起！落座后，何绍先对何清顺汇报的有关大米购销的事似乎并不关心，听后只微微点点头便津津乐道地讲起了自己在绵阳百货站当站长的老表和自己的公司，公司的实力、公司的轿车及公司在绵阳企业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接着，他又说自己有出口代理权，与广东、福建及香港老板都有往来。边说边拿出一叠名片，直看得庞启茂等人心跳眼热。末了，何绍先才漫不经心地把话题转到大米购销上。“老实说，我根本不愿做大米生意，主要是五粮液、剑南春两个酒厂的厂长与我是铁哥们儿，硬要叫我收购点大米支援他们一下。加之我在新疆劳改农场当场长的姐夫也想用大米去他那儿换点黄豆，这才上达县做点大米生意……”

何绍先讲这番话时，一旁的赖应强等人紧张得直冒汗。什么商业局长请客，什么百货站长的老表，什么五粮液、剑南春酒厂当厂长的铁哥们儿，人家只要一个电话就全揭穿了！

赖应强等人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此时，庞启茂等人正庆幸遇上了财神，哪会去怀疑这财神的真假呢？

对何绍先讲的一切庞启茂虽深信不疑，但该在那份价值近 200 万元的购销合同上签字时，庞启茂深知自己的名字签下后的分量，他握着笔有些犹豫了。

何绍先似乎看穿了庞启茂的心思，拿出手机啪啪地拨通了绵阳的长话。他刚问了句“你是嘉总吗”？何清顺马上向庞启茂等人介绍：嘉副总经理是我们公司管财务的——其时，先发公司那个并未管着财会的嘉从荣副总经理正在宜宾。而在绵阳接电话的“嘉总”张 XX 一听何绍先的口气便知道有“戏”并马上进入了“角色”。“我是嘉从荣，何总有事吗？”何绍先告诉“嘉总”，已在达县收购近千吨大米，马上准备 100 万元。张 XX 心领神会地答道：你们走时我就准备好了。听到这里，何绍先马上把手机递给庞启茂，庞一听，“嘉总”还在说：“这 100 万元一定坚持专款专用，达县的大米一到立刻付款”。庞启茂乐了：1 嘉总，我是达县粮油贸易公司经理庞启茂，那 100 万不会有问题吧？”“嘉总”打断说：庞经理，肯定没问题，我们这么大的公司，别说 100 万元，就是七八百万元也是小菜一碟！

像吃了颗定心丸，庞启茂放心了。他在销售 900 吨大米的合同上飞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接着，他请主管部门领导作陪，在华夏大厦设舞会酒宴盛情款待何绍先一行。大家搂着小姐唱歌、跳舞，品尝佳肴美味，并频频碰杯，互祝首次合作愉快。诱人的“实力”

给何绍先等人钱行的酒醒之后，庞启茂再次意识到了价值近 200 万元的大米直接牵涉到本公司的生死存亡，万万马虎不得。为防止上当受骗，1997 年元月 5 日，庞启茂派公司职工邹学东前去绵阳考察。

邹学东是怎样考察的，现已无从考究。但应该说他在考察时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即先

发公司的实力和该公司究竟是不是绵阳市百货站的下属公司。其实，对后一个问题只需到先发公司的楼上楼下问问就清楚了。可惜，邹学东只在二楼转了一阵便给庞启茂打电话说，对方的公司的确在市百货站二楼，好像很有实力。办公室还挂了很多锦旗。但银行的资金情况未查到。为保险起见，建议叫对方先预付一部分货款。

在不明对方情况的情况下，邹学东的建议也不失是一个保护措施，但庞启茂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担心预收货款会“弄黄”了这笔生意，他更怕得罪了何绍先这尊财神而断了本公司的财路。经过与杜东升等人反复研究，他决定派公司 39 岁的业务员徐在江带职工王春前去绵阳。临行前，庞启茂、杜东升千叮万嘱地给徐交待了几个任务：一，继续考察对方实力。二，若对方提质量问题，抽样送检必须留底样。庞启茂特别强调：要亲自到火车站接、交货，要严格“坐交”，即交一个车匹的取货小票给对方，必须收一个车匹的货款。徐在江点头许诺而去。

10 日上午，徐在江、王春到绵阳后不敢忘记使命，马上对先发公司进行了考察。当发现该公司无一领导在办公室上班这一问题后，在接风的宴席上，徐在江间接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何清顺说：我们办公都在茶楼，工作方式与沿海一样，对部下是手机遥控指挥，下面的人找我们是打传呼。徐在江释然且有几分沮丧：妈的，我们上班天天都要到公司签到！何清顺乘机把在达县给庞启茂讲的那些话像背台词一样又滚瓜烂熟地给徐在江。王春背了一遍，只是临时把“台词”中只有 10 人的公司重新分成了金属科、针纺科、百货科、五交科、粮油科等八大科室，年创利润也一下猛增到“八千万元以上”。徐在江听后惊得伸出舌头半天缩不回去。见徐在江五体投地的样子，何清顺得意洋洋地微笑着。但当听说徐在江、王春来绵阳后就住在先发公司对面的招待所时，何清顺那得意的微笑一下僵在脸上，继而着急地从椅子上蹦起：“你们怎能住那么低档的招待所！我们这么大的单位，怎能在那种地方会客？马上换地方！”说完，不由分说便把徐、王二人用车拉到 5 公里外的邮电宾馆住下。直到案发，王春才恍然大悟：狗日的他是怕我们住近了发现了他们的老底！

当时，他们看到的却是另外的情况。徐在江在“去绵阳的工作汇报”中说：我的确发现何绍先坐的是君王车，嘉从荣坐的是本田，何清顺、赖应强各有一辆桑塔纳。一次，在 XX 酒楼按摩时，我还看到三星级的“先发大酒楼”的装璜设计图……

其实，这些都正是何绍先等人惟恐他考察不到的。何绍先、嘉从荣等人向司法机关供认：君王车是李氏企业的，我们用 800 元租一天，本田、桑塔纳也都是租的，每天的租金分别是 500 元和 350 元。“先发大酒楼”1996 年就准备租农机研究所的房子。由外贸投资 500 万元，我们投资一些钱共同搞，因先发公司无钱投资，所以，一直都是纸上谈兵。我们故意把装璜设计图让徐在江看，主要是想让他相信我们有实力，好打电话叫达县按期发货……

不过，据徐在江讲，真正让他向达县打电话催发货并非只是看到几辆车和一卷图纸，而是他“亲眼看到先发公司的保险柜中有 100 多万元现金”。

那是 1 月 11 日下午，徐在江、王春转街时无意中转到先发公司，因是休息日，办公楼大门紧闭。4 点，徐、王二人刚回邮电宾馆，何清顺打电话催他们马上去公司，何绍先总经理要陪他们吃晚饭。20 分钟后，徐在江、王春赶到先发公司门口与何清顺汇合后却发现：刚才紧闭的大门现在不但敞开着，门口还站着两个表情肃穆的门卫。他们拦住与何清顺同行的徐在江、王春认真盘问他们从哪里来？上楼找谁？并仔细检查了证件，还拿出一本崭新的

来客登记簿让他们填写。王春好不奇怪：昨天正式上班这儿都没有门卫盘查来客。刚才也无门卫执勤，现在怎么一下冒出两个认真负责的门卫？没容王春想明白，何清顺歉意地解释：我们公司是大单位，进出门的规矩严得很，就是市长进去都要登记……

到二楼办公室，听副经理嘉从荣正给公司的一业务员说，你那笔业务 24 万元够不够？不够就再批点。徐在江暗想：先发公司资金真雄厚！正想着，只见何绍先气冲冲地推门而进，见到徐在江、王春劈头便问：你两个来干啥子？徐、王正感难堪，何清顺解释：是我叫他们来一起吃晚饭。接着，何清顺附在徐在江耳边说：达县的生意是我在负责，公司给我准备的货款另一个科室想争去，所以何总在发火。嘉从荣在一旁笑道：这个科室在东北的生意马上就有几十万元的利润哟！何绍先听后“忍无可忍”地大骂起来：你龟儿何清顺狡猾！想要钱就把客人叫来。骂完，气呼呼地到了财会室。何清顺挤眉弄眼地对徐、王二人说：我以前是地震局的局长，在公司他们还是要听我的。边说边叫上徐、王二人跟进了财会室。何绍先公事公办地说：两个科室都是公司的人，东北那边马上有利润，达县的米连影子都没有，我不可能不管！不想在何绍先面前一直唯唯诺诺的何清顺把眼一瞪一下来了劲：这 100 万谁也不能动，否则，达县的货来了我哪有钱付款？何绍先更有“脾气”，他一下拉开保险柜，从“挤”满的钱中拿出两扎在桌上拍几拍说：啥子莫钱，莫说 100 万，就是几百万我分分钟秒都能搞定！接着，又转身对徐在江笑道：钱就在柜里，就只等徐老兄你们的货了。徐在江忙说：我马上催公司把货发过来！

从楼上下来，王春怀疑：他们好像在演戏给我们看？其中有鬼！徐在江却坚信不疑地认为：不可能是演戏，今天的一切都是我们偶然碰上的！

然而，徐在江偶然碰上的这一切却不幸被王春所言中。4 月 18 日，嘉从荣交待：这出戏是何绍先、何清顺精心导演的，当时，公司有人联系业务急需 2 万元都拿不出来，他们却要我当着达县的客人问公司出差的人批 24 万元够不够。那天保险柜里边塞的都是发票，只在外边塞了几万元钱。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让徐在江相信我们有付款实力，骗他催单位发货……

徐在江的确相信了先发公司的实力，在电话中向庞启茂汇报时，他把胸膛拍得当当响：我担保先发公司有实力，放心大胆地发货！
业务员“下水”

徐在江对先发公司的信任多少夹杂了些个人的感情色彩。到绵阳后，他的第一印象是先发公司的人“够意思”。自己一个小小的业务员，一去就受到了隆重的礼遇。何清顺、赖应强 10 日中午在花园小区为自己接风洗尘后，晚上，何绍先又率公司的大小官员在鹏业度假村宴请自己。席间，何绍先诚恳地说：我工作忙，是从不陪客的，今天陪你们是破例。尤其令徐在江感动的是：何绍先总经理自“破例”之后的几天里，几乎天天和何清顺等人轮流着来陪吃陪喝陪玩。乘着“公司的”高级轿车游富乐山等风景区，看绵阳市容，每餐不是山珍海味便是中餐火锅，虽辛苦了双脚和肚皮，却也开了眼界饱了口福。

先发公司的人如此热情豪爽，徐在江深感相见恨晚，有意加深“友谊”。于是，在一次饮茶时，他提议：为了让我们两个公司也为我们个人的友谊万古常存，大家不如结拜成兄弟。在得到何清顺、赖应强的热烈响应后，三人当即以茶代酒，指天为誓地拜为兄弟。此后，何清顺、赖应强分别成了徐在江的大哥和三弟。

徐在江的“大哥”“三弟”待其更热情周到了。除吃喝外，还常在打麻将诈金花时再搞些“小刺激”，连“小刺激”的钱都由“大哥”“三弟”拿，且一拿就是 500 元。赌累了，再去搞点异性按摩或到舞厅的包厢里接着“小姐”“轻松轻松”。每次“轻松”后回到宾馆，徐在江都要喜不自禁地对“留下守电话”的王春说：今天玩得真开心！

比这些更开心的是洗桑拿浴。一天，在包厢里折腾了半天的徐在江意犹未尽，善解人意的何绍先便邀他到某酒店洗桑拿浴，同去的王春不愿洗，何绍先火了，将一扎钱扔在地上说，我何绍先请客，不给面子就算了！何清顺筹忙连拉带哄地把王春劝了进去，但“小姐”要与他“到位”时，小伙子吓得夺门而逃。徐在江则不然，据他自己交待：先后进来三个“小姐”，他都不满意而未“洗”，出去后，何绍先生气了：我花钱专门叫你来做那种事，怎能不做？“边说边推我进去，找了一个小姐要我做那种事……”

就在那天晚上，何绍先又将 2000 元现金塞给了徐在江，并许诺：这次生意成了，给你 3 万元钱和一部大彩电。

吃喝嫖赌和金钱引诱使徐在江彻底下了水。他将公司给他布置的任务忘得干干净净。不到火车站接交大米，不待划款就将 7 张小票交给先发公司提货。达县粮油贸易公司用特快专递寄出的四张小票也“因对方天天陪着，无时间无机会去取而让何清顺收了”。他还多次向公司谎称：“对方马上要汇 50 万过来，”“你们放心，收不到钱，我不回来见领导和同志们。”

就在徐在江信誓旦旦的时候，22 日晚上，一个神秘的女郎打匿名电话告诉他：你们受骗了，先发公司是个皮包公司！当时，他也着实吓了一跳，但转念一想，又骂道：扯他娘的蛋，先发公司那么有实力，怎会是皮包公司？当晚，他照样睡得很香。

更恶劣的是，何绍先提出大米有质量问题时，徐在江不留送检样品，还分别于 1 月 18 日、22 日与何绍先签有关“可重新作价处理”的书面协议。1 月 31 日，何绍先等人将徐在江请到赖应强家，先送他一块价值 600 元的表，再找来一妓女让徐淫乐后，何清顺拿出一份要求对大米作价处理的协议让他抄。案发后，徐在江供称：当时喝了酒，迷迷糊糊的，我就照着抄了一遍。何绍先看后问他的情妇王红：这条子值多少钱？王红说值 5 万。何清顺说：值 5 万的话，给徐二弟 3 万，我要 2 万……

徐在江签下的“协议”为本公司埋下了灾难性的祸根。一个月后，凭借徐在江私签的几个协议，在骗了达县粮油贸易公司的大米后，骗子又将该公司送上了法庭。同样案情两场“官司”

在达县粮油贸易公司的 900 吨大米未完全落入先发公司前，何绍先一伙给急欲收到货款的徐在江、庞启茂等人画了数个大肉饼充饥。在给徐在江演了保险柜里有 100 万元现金的“戏”后，何清顺当晚又许诺：到一车货付 20 万元，到两车付 30 万元。17 日已收到 6 车匹大米，何清顺又是问账号，又是问汇人哪家银行，说马上可汇 50 万至 90 万。但几天过去后，徐在江才发现何清顺又玩了一个“望梅止渴”的鬼把戏。一天晚上，王春向何绍先要货款，何拍着皮包说：马上给你 100 万都可以。何清顺马上“提醒”，给不得哟，绵阳这地方治安乱，叫人抢了咋办？赖应强适时建议：干脆明天一早给算了。第二天，电话传呼都找不到何绍先了。第三天，何绍先却主动找上门，“义正严辞”地提出：大米有质量问题，不签作价处理协议，坚决不付款！徐在江背着公司签了一个又一个的协议，何绍先一伙也把马上

付款的谎言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结果，货款照样拖着未付。

11月25日，只收到10万元货款的达县粮油贸易公司终于慌了。庞启茂派杜东升到绵阳坐阵收款。杜副经理到绵阳的当晚，那个神秘的女郎再次在电话中告诉达县客人：何绍先一伙是骗子，别再上当受骗了！可惜，当何绍先“同意先付100万，筹货收齐再结清货款”，并让何清顺写要款申请，由嘉从荣签上同意付款等字样后时，收款的人们便一下将那个匿名电话忘记了。

在反复被愚弄之后，杜东升才终于意识到此笔生意受骗了。在达县如坐针毡的庞启茂得知上当，惊出了一身冷汗，于28日心急火燎地赶到了绵阳。何绍先却告诉他：先发公司付几百万元货款如九牛一毛。只是这几天出纳为母亲奔丧去了，取不出来钱，出纳回来后马上付款。

庞启茂相信了，悬在喉咙里的心重新回到了肚里。他长长地舒了口气：原来是一场虚惊！但庞启茂做梦也没想到：先发公司的钱都捏在何绍先手中，那个所谓死了母亲的出纳正是何绍先，而他63岁的母亲张桂珍至今仍健康地生活在绵阳市游仙区松场乡日新村四社的家中。

过了一天，庞启茂惊魂未定，何绍先又找上门“协商”大米作价处理的问题。达县粮油贸易公司销给先发公司的900吨大米运出前经质检部门检测，全达到了合同中规定的一级标准。但何绍先等人在搞鬼后一提出质量问题，庞马上就与其签订了“因质量不合格让价18万元”的结算协议，并将最后一批价值39万元的大米小票全数交给了何绍先。然后亲驻绵阳，傻乎乎地等那个“死了母亲的出纳”回来给自己付款。

当庞启茂等人在宾馆里坐卧不安时，何绍先一伙也昼夜不停地忙碌着。三天内，几百吨大米被他们拉到德阳市、广元、成都等地低价销售一空。接着，何绍先像自理自己的钱一样把货款借出去几十万，存60万，给老婆1万，花6万到广州潇洒地走一回，用8700元买了个手机。见庞启茂等人一直在绵阳催收货款，何绍先一怒之下又用大米款给法院交5000元诉讼费，再用5000元请来两个律师，于2月18日将庞启茂告到了绵阳市涪城区法院。何绍先在诉讼状中要求被告方达县粮油贸易公司赔违约金10万元、赔偿原告方直接经济损失31800元，并负责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

2月20日，涪城区法院传唤被告庞启茂3月12日8时到涪城区法院参加诉讼。

以为很快就能收到款的庞启茂等人这才傻了眼，慌忙向涪城区法院提出“合同履行地在达县，涪城区法院无权管辖本案”的异议。3月10日，涪城区法院123号《民事裁定书》“驳回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面对法院的裁定，本案的两家公司有人欢喜有人愁。但随着司法机关对本案调查的逐步深入，“欢喜”和“忧愁”的人都同时落入了法网。如今，诈骗和被诈骗的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这场诈骗犯罪活动，却坑苦了达县粮油贸易公司和公司的几十名职工，近200万元的大米款只收回34万元，加上资金利息和其他费用，该公司仅此一笔生意就又损失210余万元，这对年年都要靠职工集资和贷款维持生存的达县粮油贸易公司无疑是雪上加霜。眼下，该公司无法维持经营，职工发不起工资，企业苦不堪言。

这起诈骗犯罪的受害者还不仅只是达县粮油贸易公司——该公司销售给先发公司的大米大多是该公司“借鸡下蛋”从渡市等五个区粮站调谷子加工的。如今，达县粮油贸易公司“鸡”飞“蛋”打，渡市等区粮站也血本无归，受牵连的企业纷纷陷入困境一伙并不很高明的骗子和两个“被诈骗”的罪犯把几家企业推入如此窘迫的境地，教训是深刻的。人们呵，在经营活动中，骗子时时在算计着你，千万别忘了那个因轻信而犯糊涂的庞启茂，也千万要记住那个因挡不住金钱美色诱惑而与骗子狼狈为奸的徐在江。

手记

之十四：贼和偷脏物的贼

线索来自一个很玄的检举。

3月29日，一个“诈板的”（搞诈骗的）被请进了达县公安局南外派出所。他想将功赎罪，便搜肠刮肚地交代自己认为可能是犯罪的所有事情。讲了半天，见讯问的警察并不很感兴趣，一阵搔首拍脑后，他又说：“我还有达川11地区二招待所厨师邓达茂前不久买了一台25寸的长虹彩电。”讲完这句，也许是他自己都觉得算不了什么，便打住了话头。讯问者对他的吞吞吐吐有些生气了：“拿钱买电视有啥问题？少东拉西扯，老实点！”

“诈板的”怕落个“不老实”，想了想赶紧补充道：那彩电是从王传贵那里买的。顿了顿，他有点卖关子地问：你知道王传贵吗？

没等一脸迷惘的警察回答，“诈板的”便自问自答地介绍起来：王传贵，又名王贵，29岁，达县赵家镇农民。前几年，因盗窃17辆自行车被判刑5年，去年刚“毕业”。据说，出来后又干了好几起大“业务”……

“诈板的”有板有眼地讲了许多有关王传贵的事。但大多是“据说”、“听说”，对王传贵卖给邓达茂的彩电，“诈板的”也只“估计是偷的”。

按说，这种太玄的检举只能当龙门阵听听，但南外派出所所长蒋绍财却觉得“诈板的”讲的情况有一定价值，应该查一下，就把侦查任务交给了所里的何流涛。

崇尚痴迷于福尔摩斯的何流涛看上去文静得有点书生模样，但这文静中却充满着机敏和智谋，在短短八年的警察生涯中，他连破好几起有影响的大案。后来，在介绍自己是如何侦破王传贵等8名犯罪嫌疑人盗窃8台电视、1部电话、1个计时器。若干香烟等物，且案中有案新案套旧案的大案时，何流涛脸上始终漾溢着一种得意的微笑。但3月29日那天，在所长办公室接受任务时，这位一级警司却在心中暗暗叫苦：又摊上了一桩无头公案！

侦破案件总少不了人证、物证，案犯作案时间、地点、手段等等要素，可所长交办的案子这些要素一样也没有——没有盗窃和被盗窃者，没有失盗现场，没有失盗报案等等，惟一知道的只是王传贵将价值4000余元的彩电以1300元卖出，价格便宜得有些离谱，极可能是偷来的。但这仅仅是一种怀疑和推测，而怀疑和推测是无法作为证据去法办王传贵的。何警官明白，一切都须从头开始。

首先急需找到的是王传贵。在人海茫茫的城市里找一个有丰富作案经验且早躲得无踪无影的犯罪嫌疑人无异于大海捞针。何流涛没有盲目地去瞎捞。从刑侦案件中，他总结出一个规律：大凡在社会上晃荡的人，特别是盗窃犯罪分子身边总有那么一群狐朋狗友。这些狐朋

狗友无异于一根根无形的线系在犯罪分子身上。顺着这些线，常常能找到要找的人。

受案的当天，何流涛同他的搭档张思伦、王震宇、胡雪花等人在费了一番功夫后很快摸出了一根“线”——有前科的文鹏知道他的同伙杜新前几天与王传贵有过接触。3月30日，何流涛让文鹏打传呼问杜新：“知不知道王哥在哪里？有个刚从‘233信箱’（看守所）出来的兄弟给他捎了封信。”杜新告诉文鹏：到“达三中”外的茶馆去找吧，他在那儿搬砖（用麻将赌博）。

半小时后，王传贵被请到了南外派出所。这个派出所的常客在明白了被抓的原因后，没有半点惊恐惶惑，而是用轻松的口气给警察们讲了一个故事：一个雨天，在达三中门口，他遇到两个人抬一台25寸的长虹彩电叫卖。经过讨价还价，他用400元买下电视并以1300元卖给了邓达茂……。何流涛追问卖他电视的两个人姓甚名谁，为什么卖电视不把遥控板，发票一起交出来等问题时，王传贵很潇洒地两手一摊说：当时买了便宜，高兴还来不及呢，哪个去问他们是谁，为什么不给发票、遥控板？王传贵拒不交代，留滞盘查的法定时间又即将过去，局里和所里都有人建议，如果找不到证据，就先放人吧。何流涛却觉得，一个明明有犯罪嫌疑的人从自己手中放走，无异于一个猎人放虎归山。于是，他找到所长，要求暂缓放人，在留滞盘查的最后时限内，他再摸摸线索，看能否找到证据。

3月31日上午，何流涛等人找来王传贵以前的几个“兄弟伙”，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王过去的一个同伙交代：春节后，王传贵伙同“秋儿”（周义清）、“晾衣杆”（李洪）、“鱼贩子”（刘东）在达川市西门做过一次“业务”，因分赃不均，在一家茶馆里，“晾衣杆”还砍了“秋儿”一刀。

得到这一线索后，在讯问涉案嫌疑人，布置耳目线人，拉网式搜寻等紧张的侦查中，办案人员又度过了不眠的一天两夜。4月2日晚，终于将在达川市西门赌博的周义清、李洪抓获。周义清、李洪也都有两进宫的历史，深知自己罪孽深重，不老实交代必会从严处理，故落网后，两人很快作了交代。

2月22日凌晨1点，王传贵、周义清、李洪、刘东在达川市西门一家火锅店酒足饭饱后，商议去“摸团鱼”（在旅馆盗窃）。但李洪说旅馆情况不熟，不一定有油水。白天在西门的一个巷子里踩点时发现一个卖录像机的门市很有搞头，不如去“弄台子钱”（盗窃商店的物品）。并说，为了撬那门市的卷帘门，他已将一根钢条放在门市旁的柱头边。王传贵听后，让同伙们在火锅旁等着，自己乘酒兴朝李洪说的录像机门市摸去。找到门市旁柱边的钢条，连门市上的招牌也没看，他便朝卷帘门一阵乱撬。撬开后借路灯往门市里一看，王传贵不觉有点纳闷：李洪那小子不是说是个录像机门市吗，怎么放了一屋子的电视机？他回火锅店领几个同伙去门市一看，才发现被撬商店的隔壁才是录像机门市。周义清说管他妈的，电视机也将就。说着，几人进屋七手八脚地搬出了七台电视机。接着，王传贵找辆出租车先拉走一台20寸的康尼彩电和一台25寸的长虹彩电，周义清、李洪。刘东拉走四台20寸的长虹彩电。一台没看清牌子的电视在往车上抱时外壳被周义清抱脱周义清骂句电视机厂造他妈的耍货，便啪地将电视扔在路旁。

周义清、李洪交代后，带何流涛等人到盗窃门市指认：原来，失盗地是设在达川市红旗路2号的达县五金公司经营维修中心。失主证实：2月22日晚，门市七台电视被盗。接下来，何流涛等人开始了紧张的搜捕和追赃。至4月3日，除刘东漏网外，2月22日特大电

视盗窃案的主犯王传贵、李洪、周义清及为其销赃窝赃的邓达茂、李红卫等四名犯罪嫌疑人纷纷落网。大部分赃物也被追回。同时，还查出王传贵伙同周义清，1月31日盗窃达川市汽车队简某25寸彩电等物及王传贵、李洪3月17日盗窃达川市西圣街陈某电话机、计时器各一部的两件旧案。主犯王传贵见大势已去，也于4月3日晚作了彻底交代。

原来，2月22日凌晨3点，王传贵将两台彩电运到达川；市荷叶街口附近的杨昌洪、杨昌文开的洗车场存放。杨氏兄弟早知王传贵是达城的惯偷，见其深更半夜弄来两台电视，知道来路不正，便拒绝让其存放，并建议王传贵到离洗车场二十余米开外的刘平洗车场去存放电视。王传贵到刘平洗车场后，刘的妻子开玩笑道：你龟儿是不是在哪里偷的？哪个敢帮你存！王传贵仍死皮赖脸地要存，并讲好第二天就来拉走。刘平夫妇纠缠不过，只好让其将电视搬进洗车场旁的木房内。王传贵把康尼抱到房内的楼上，长虹抱不动，他只好放在楼下。凌晨4点，刘平夫妇洗完车四楼上休息时，惊得大叫起来：电视呢！糟了！电视被偷了！刘平的老婆要去报案，刘平拦住说：报不得，电视可能是王传贵偷的，案子发了，我们也有窝赃罪！于是，夫妇俩不敢吱声了。

23日中午时分，杨昌洪、杨昌文到刘平的洗车场神秘兮兮地问刘平：王传贵放在你那里的电视肯定是偷的，你帮他存放难道不怕落个窝赃罪？刘平害怕了，求杨氏兄弟帮忙想想办法，杨昌文拍拍刘平的肩膀说：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把那两台电视给他吃了！刘平苦着脸叹气道：康尼电视被人偷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杨昌洪劝道：偷了就算了，王传贵也是偷的，量他不敢吱声。眼下要紧的是把剩下的那台藏起来，否则，公安查来了，你要坐牢的！这话镇住了刘平，他同杨昌洪、杨昌文将长虹彩电拉到达川市张家湾杨昌洪的一个同学家藏起来，并同意将电视卖掉后三人平分。但这杨氏兄弟却想吃掉刘平那一份，当天又将电视转移到大北街一个老乡处。

2月24日，王传贵去刘平处取存放的两台电视，刘平告诉他电视全被偷了，气得王传贵大骂：老子辛辛苦苦偷来，你狗日的想给我吃了！边骂边打传呼找来他的老表潘长贵，将刘平一顿痛打。刘平无奈，只好实情相告，并从杨昌洪处要口彩电交给王传贵才算了事。王传贵将长虹电视藏到老表朱彦处，潘长贵则在城内以1300元为其找到了买主邓达茂。邓达茂付款后，朱彦从王传贵处收取500元的“存放电视风险金”。朱彦收取风险金的代价是使自己成为窝赃犯罪嫌疑人而受到法律追究。

至此，彩电盗窃案的案情已基本清楚。但王传贵盗窃后存放在刘平处的康尼彩电不翼而飞的疑云却给整个案件留下了一个无法破解的谜。

为解开这个谜，何流涛同他的搭档们讯问了刘平等涉案人员并查看了康尼彩电失盗的现场。刘平的洗车场在一片旧居民房的废墟的前方，废墟的后方是杨昌洪、杨昌文兄弟俩的洗车场，两个洗车场之间的左侧正修建的大楼里住着几个守夜的民工。2月22日晚，王传贵存放康尼电视的那间破木房孤零零地摆在修建中的大楼前，楼上有几个破洞，建房的手脚手架紧靠木房。要进入木房必须经过刘平的洗车场，除此外，只有从木房后边攀沿着脚手架从木房的破洞口进入二楼，否则，正面进入木房就会被刘平发现。

根据讯问和现场情况综合分析，何流涛推断：一、康尼彩电系被人从木房后楼上的破洞偷走。盗窃者能攀上脚手架并抱着电视从原路逃离，说明其人是身强力壮的青年人。二、从洗车场的环境看，两个洗车场正面临街，其余三面是较高的围墙和正修建的大楼，无法出人，

被盗的电视只能从正面运走。三、王传贵 2 月 22 日凌晨 3 点将两台电视存放在刘平住的木房内，据刘平讲：他 3 点半上楼拿东西还看见电视在，4 点发现失窃。可以确定电视被盗的时间在 3 点半至 4 点间。据查，这段时间里，整个车场内只有几个建房守夜的民工，三个洗车的驾驶员，杨昌洪、杨昌文及刘平夫妇。

作出以上判定后，何流涛等人对在场人一一进行了排查。经初步查证，建筑工地守夜的吴军作案可能性较大。此人 26 岁，身强力壮，具有攀沿脚手架上楼作案的身体条件；此人有偷鸡摸狗的恶习，前不久，因偷工地的材料还被扭送到派出所，有作案的可能；电视被盗的当晚与其一起守夜的民工刘某凌晨 4 点起夜时发现吴军不在室内睡觉，直到早上 7 点吴军才背着背兜从外边回来。

吴军被依法传唤。

吴军走进审讯室的一瞬间，何流涛马上从这个壮得像个拳击运动员的民工身上发现无法掩饰的不安和畏惧情绪：抽烟的手在微微颤抖，一双穿着破皮鞋的脚忐忑得不知往哪儿放服神散乱而惶恐。

何流涛用低缓却十分威严的语气询问完吴军的身份、住址。经历后，单刀直入地问吴军 2 月 22 日凌晨 3 点至上午 7 点都干了些什么。吴军一听更慌了神，东拉西扯地回避着，实在遮掩不过了，便咬定那晚一直在睡觉。被何流涛揭穿后，他又谎称那晚后半夜拉肚子跑了几次厕所，所以，同室的民工起夜时未看见他在室内。何流涛轻蔑地问：拉肚子从 3 点一直拉到 7 点？拉肚子为什么别人起夜没在厕所里看见你？拉肚子背着背兜干什么？一连串提问句句击中要害，吴军张大嘴半天合不拢。最后，他沮丧地垂下头说：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我只好老实交代。大概是 2 月 20 日，北街火锅店力老板叫我给他找两包水泥安地板砖。我在他那儿吃过两次火锅，他未收钱，他要水泥我就答应了。2 月 22 日凌晨 3 点多钟，我从工地偷了两包水泥背到了火锅店……

经核实，情况属实。吴军盗窃电视机的嫌疑被排除。

“会不会是当晚洗车的驾驶员所为？”何流涛刚提出这个问题，因窝赃被拘留的刘平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不可能！当晚洗车的三个驾驶员一个是女的，就是给一部电视她也抱不动。另两个男驾驶员洗车时都关着车窗在车内睡觉，根本没出来过……”一个个嫌疑被排除，一条条线索被否认，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数日来的疲惫和毫无进展的案情使侦查员们感到心力交瘁。但何流涛他们并没有气馁，他们用自己深入细致的调查一步步走出疑云密布的迷宫。2 月 22 日凌晨 3 点进入洗车场的女驾驶员叙述说：因与杨家兄弟是熟人，为照顾杨的生意，那晚她先把车开到了杨的洗车场。但杨氏兄弟却推说马上要出去办点急事，让其到刘平那儿洗车。洗车时，女驾驶员一直留意，却未见杨家兄弟出洗车场。刘平证实：“电视失盗后的第二天中午，杨昌洪、杨昌文找我商量吃掉王传贵的两部电视。当我告诉杨家兄弟，康尼电视被偷时，杨昌文马上说：你那楼上的后边到处都是大洞小孔的，偷了活该王传贵背时。但当时我并未告诉他电视放在什么地方，他怎么知道放在楼上的？他也从未到过我住的地方，又怎么知道楼上大洞小孔？”

看来，杨氏兄弟的确有重大盗窃嫌疑，但将其拘传后，杨昌文对以上问题的解释是：“那晚没有给那位女驾驶员洗车是想早点休息，她一走我们就睡了。知道刘平楼上的后边大洞小

孔是前不久的一天，我想解小便，洗车场内又无厕所，到刘平的房子后边方便时看见的。”见何流涛等人不相信自己的解释，杨昌文生气地问：“你们怀疑我偷了电视，但谁看见我在什么时间从什么地方运走的？”

没有过硬的证据，是难以制服杨家兄弟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长期在洗车场外摆麻辣烫的摊主向何流涛等人提供了一个情况：2月22日凌晨5点，他上街卖菜时，看见杨昌文鬼鬼祟祟地背着一个用口袋装着的方形东西从车场出来，把东西往出租车上搬时，杨昌文警告毛脚毛手的司机：轻点，小心把老子的电视碰烂了！

再次讯问，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杨昌洪、杨昌文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的盗窃经过：当晚，王传贵把电视放在刘平处后，兄弟俩见财起意。杨昌洪建议，王传贵也是偷的，我们给他偷了，量他不敢报案。正商量，那个出租车女司机来洗车，杨昌文将其推到刘平那儿，趁刘平夫妇给其洗车时，杨昌文从破木房后的脚手架爬上去，再从壁上的一破洞钻进去，见楼上是一台康尼，他嫌太小，下楼去抱那台25寸的长虹彩电，但抱不动，只好上楼抱起康尼从原路返回。5点多，见刘平熄灯睡后，杨昌文趁机把电视背到街上拦车拉到达州市北十家溪。8点，杨昌洪随后赶到。兄弟俩找一根木棒将康尼抬回家中藏在大柜子里。

4月4日晚，何流涛等人从杨昌文的家中追回了被盗的康尼彩电。

当杨昌文被公安部门以盗窃罪逮捕入狱时，他还直嘀咕：偷偷儿的东西怎么也犯法？

手记之十五：绑架，由法官执行——达县大风铁厂厂长田朋忠被非法绑架拘禁案纪实
拳头加枪械把法律的尊严击得粉碎

夜幕笼罩下的达城一片安谧。从洲河宾馆的舞厅里隐约飘出的舞曲给恬静的小城夜色增添了几分柔和。

舞厅楼下的雅座间里，一桌丰盛的晚餐正进入高潮。席间，江西省萍乡市铁矿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经理付培根与随从罗接发、王宝明及萍乡市全国人大代表、某公司经理沈林（注：未用真名）的下属何向阳轮番向达县大风铁厂厂长兼党总支书记田朋忠敬酒。田厂长已有几分飘然，但耿直的巴山汉子在吞下一杯杯烈酒时，却在心里盘算着如何了结与敬酒者之间的账务：1992年底，前届厂长与付培根的公司及沈林的下属公司签订铁矿石购销合同，由于对方不按合同规定时间供货，故前届厂长欠下付培根公司货款23万余元，欠下沈林下属公司16万余元，尽管自己上任才百余天，但欠账应还钱的道理，田朋忠是懂得的。他举起酒杯诚恳地对客人说：“几位江西老俵，欠你们的钱我厂里准备1994年6月底全部付清。这次，你们来后，我们厂领导专门开了个会，决定提前还一部分，其余部分6月付清。明天是4月18号，银行要大礼拜，取不到钱，19号我们一定取钱还账。为了今后合作愉快，我建议大家干杯广江西老俵纷纷举起酒杯：”对，为合作干杯！“

几只酒杯碰在一起，发出一阵沉重的叹息。

“为合作干杯”后，田朋忠已有些不胜酒力，一看表，已快近20点，便礼貌地提出，

家中有事，要先走一步。几位江西老俵忙说：“我们送你回去。”

来到楼下，田朋忠正要上一辆夏利出租车，付培根说：“那车不行，坐好点儿的。”边说边把田朋忠推上一辆桑塔纳出租车，接着，两边又各上一人把他扶在中间。

也许是因为天黑。或者是因为醉眼朦胧，田朋忠以为坐在两边的是罗接发、何向阳，也就没在意。当车向与他住地相反的来凤路驶去时，他还提醒，错了，我家在背后的方向。坐在驾驶员身旁的付培根说，到前边说句话。快过红旗大桥了，见付培根还没“说句话”，田朋忠又问：“还要往哪里开？”付培根转身一笑：“去加点油。”但过了两个加油站都未加油，田朋忠开始意识到了点儿什么，“你们要把我往哪里拉？”坐在身边的人答道：“有件事找你到前边说清楚。”

田朋忠一听声音不熟，再左右一看，身边的两人人也不认识，他的酒一下惊醒，把头伸到窗边大声吼了起来：“我是大风铁厂厂长，政协委员，他们要绑架我，救命呀！”

刚吼了两声，一块擦车毛巾塞进了田朋忠的嘴里。他刚扯出毛巾，一个黑布口袋又罩住了他的脑袋。他正准备扯黑布袋，两边的人一个用手卡住他的脖子，一个用手堵住他的嘴，腿也被付培根死死按住。在快晕过去前，求生的欲望使田朋忠拼命反抗。挣脱后，他扯掉黑布袋，抓住驾驶员的肩大喊：“师傅，快停车！”但因朋忠哪里知道，这个车号为“四川 654——11226”的出租车驾驶员黄均同另一辆桑塔纳出租车司机郑 XX，早在两天前就已被付培根一伙以 8600 元的重金收买。当田朋忠求救时，黄均反倒把车开得更快。田朋忠求救无望，又去开车门，坐在两边的人一个挥起警棍，一个挥起拳头，朝他的头部、胸部一阵猛击，鲜血从田朋忠的嘴里、额头溅出，染红了警棍，染红了拳头，也染红了驾驶员身后的靠背，腕上的手表也被打烂；田朋忠仍挣扎着大声呼救，持警棍的人掏出手枪顶住他的太阳穴恶狠狠地说：“再吼，就打死你！趁田一愣的瞬间，挥拳头的人用手铐咋嚓声锁住了他的双手，田朋忠暗暗叫苦不迭。”糟了，遇上黑社会绑票了！“

车出达县县界后，田朋忠才发现自己判断失误——身边的两个变戏法似的脱下外衣，露出法院的制服。后来他才搞清：用警棍打他并用手枪顶住他的人叫罗仕平，江西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民庭副庭长；向他挥拳并用手铐铐他的人叫袁祖平，湘东区人民法院法庭书记员。

当时，田朋忠对两个法官的凶残怒不可遏，大声责问：“你们为什么抓我？”罗仕平边用电警棍轻轻地打着自己的掌心边回答：“你厂欠付经理和沈经理他们公司的钱，他们起诉了你，我们拘传你去调解。”

“拘传？”田朋忠更疑惑不解了。凭着普法学习时掌握的法律知识，他知道：审理民事案件，开庭前 15 日内，法庭应将原告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经过两次事法传唤，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方可采取拘传等强制措施。但眼下，自己不但没有看到起诉副本，就连传票也没有一张？一向办事很认真的田朋忠急了，挥着戴手铐的手问：“法官，你们拘传我有法律手续吗？”

“法律手续？老子这个就是法律手续！”罗仕平边骂边用警棍往田朋忠颈上一触。强大的电流使田朋忠浑身一麻，痉挛地闭上双眼时，他悲哀地感到：法律的神圣与尊严已被他们击得粉碎……

两辆桑塔纳出租车日夜兼程向江西狂奔。一路上，满脸血迹处于半昏迷状态的田朋忠双手被铐，不得离车一步。没有水喝，没有饭吃，受尽折磨。在被解救一个月后，他手上的铐痕，脸、颈、头等部位被警棍触打的伤痕犹清晰可辨。

4月19日凌晨5点，田朋忠被绑架到萍乡市湘东区政府招待所。在手持警棍的法警的监视下，田朋忠刚昏沉沉地躺了几小时，便被押往湘东区法院“调解”。

事后，田朋忠向达县检察院的解救人员控告说：“法庭上，我被人押着，没有平等诉讼的权利，罗仕平、袁祖平不准我发表意见，就强令我厂除偿还付培根公司23万元货款外，还要我厂承担他们到达县绑架我的租车费和差旅费4万元。资金利息（高利息产万多元，诉讼费2万元。”

“我要求减去4万元的差旅费，罗仕平指着我说，再扯就再加一万元。”我指出，付培根的公司不按合同规定时间供货，先违约，我厂不应付滞纳金。罗仕平一拍桌子吼道：“付也得付，不付也得付，到了这里不是你说了算。签字！”吼完，将所谓民事调解和法庭记录扔了过来。我刚想看上边写着什么，看守我的法警用警棍‘笃笃笃’地敲着桌子说，叫你签就快签，别自找苦吃！见他们又要动武，我只好签了……“

4月19日晚，“调解”刚结束，戴着手铐的田朋忠在罗仕平等人的强迫下，向达县大风铁厂打长途电话。打电话前，付培根威胁说：“乱讲，小心你的性命！”罗仕平把电话拨到免提位置上后，完全失去自由的田朋忠向厂里打出了马上拿62万元（计划还沈林下属公司22万元）前往江西取人的电话。

对市委、市政法委的干预，法官们不予理睬

田朋忠被绑架后，达县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局组成的联合解救工作组很快到达萍乡市。23日，萍乡市委书记刘南方听取解救小组汇报后，当即向市委主管政法的副书记批示：请尽快妥善解决此事。当天，副书记把解救人质的任务交给了市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邹慧明，秘书长吴德明。

邹、吴二人向湘东区法院交涉：先放人质，再谈还款事。罗仕平等人答复：“谁要我们放人，就先拿钱来，否则，谁说也不行”。罗仕平、付培根一伙不但不遵照市委、市政法委的指示释放人质，相反，还不断转移人质。在田朋忠被非法拘禁的9天里，竟转移地点15处。4月27日转移达4次。罗仕平一伙将田转移到湖南礼陵后，为迷惑解救人员，还强迫田朋忠给其打电话，说自己仍在湘东区。

萍乡市公安局得知田朋忠绑架案后，派员前去要求放人。罗仕平火冒三丈，迁怒于解救人员：“你们不应报告公安局，给我们写检讨，承认错误！”解救人员询问田朋忠的下落，要求见面。罗仕平得意地答道：“田朋忠在我们手里，想见不行，把钱拿来，我们法庭就放人。否则，没有他的好日子过。……”

田朋忠的日子确实不好过。从4月19日晚上起，他吃饭、睡觉、解便等一举一动，少则由五六个，多则由十多个手持枪棍的人看守着。

4月26日，转移到湘东区一个农民家，罗仕平、罗接发把纸和笔递给田朋忠：“给你们

的人写封信，告诉他们钱只能交给湘东区法院，若给了其他人，你就别想回去！”

田朋忠把头转向一边不满地“哼”了一声，罗接发把电警棍往桌上一拍，厉声威胁道：“不信？老子们把你弄到北京、上海，办一个临时身份证磋你三五年，看你信不信！”

田朋忠被镇住了，用哆嗦的手记录着罗接发口授的内容“……你们不要找我，快把钱交给湘东区法院。他们对我很好，不要对他们有非礼行为……”

收好信，罗接发得意洋洋，“他们真要采取非礼行为也不怕。”说着，他从腰间掏出支五四式手枪一晃，“我们有这家伙！”另一个看守也拍着腰间的“家伙”说：“你们的人胆敢轻举妄动，我们就不客气了！其实，解救人员一进入湘东区，罗仕平、付培根一伙就很不客气了。解救人员乘坐的车辆后边，总跟着几辆盯梢的车；解救人员走路、办事，身后总有一伙人幽灵般地跟着。后来，田朋忠获释，解救人员将其伤势拍照，胶卷在相馆冲洗时也被人强行取走……”4月25日，萍乡市政法委郎慧明召集双方厂家及解救人员调解，付培根要挟说：“不准对方检察院、公安局的人参加，否则，我们不参加调解。”

后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一、首先无条件释放田朋忠；二、如数偿还贷款；三、湘东区法院裁定的诉讼、差旅、高利息等费用不付。

4月26日，大风铁厂按协议将款全部付清后，罗仕平仍支使付培根不放人质，让裁决“生效”，他们仍想收取所谓的“败诉费”、“差旅费”和高利息。在正式收据交换临时收据时，大风铁厂代表刚把付培根公司打的临时收据交给市政法委员吴德明，付培根手下一副经理一把从吴手中抢走收据，将湘东区法院开的收据扔下便跑。

经市政法委领导严厉批评，付培根、罗仕平勉强同意大风铁厂派一名代表与田朋忠会面。27日下午，大风铁厂付正顺被带到某瓷器厂厂长家，十多个手提警棍、腰插手枪的彪形大汉如临大敌般地守在屋里屋外。

付正顺进屋后，见田朋忠满脸伤痕，两个年近50的汉子忍不住抱成一团失声痛哭。哭声似在控诉践踏法律者的凶残，又似在倾吐法律被蹂躏后的哀怨，室内充满了悲伤凄切……

5分钟后，几个看守催开了，“快走，时间到了！”两个只顾痛哭的汉子还未来得及说一句话，便被看守们野蛮地拽开……

子夜，人质从阴森森的枪口下走过，田朋忠获释前后，有人威胁，有人宴请，有人强迫写感谢信。4月28日凌晨30分左右，三辆小车和一辆双排座货车载着罗仕平、付培根等二十多名全副武装人员从湘东区排上乡基建队开出，车队在离达县解救工作组住宿的萍乡市矿务局招待所300米处停下。车未熄火，有人轻声喝令：“注意啦，谨防他们趁机来抓我们的人，都准备好！”

车门打开了，田朋忠从第二辆吉普车上走出，借着路灯，他看清了车中那些虎视眈眈的目光和泛着青光的枪支，他快步从阴森森的枪口下走过，朝招待所前的解救人员奔去。

面对解救人员，田朋忠闭上眼直摇头。在加强法制的今天，自己竟被法官非法绑架、拘

禁 12 天，这简直像恶梦一样使他难以置信。飞舞的拳头，顶住太阳穴的手枪，四溅的鲜血，一一在他眼前闪现；警棍放电声，各种辱骂、威胁声也一齐在耳畔响起：“田朋忠，叫你写没有被打、没被拘禁、有自由的材料，怎么还不交来？再不交老子把你铐起！”这是罗接发的喝斥声。也有人以招待贵宾的规格宴请田朋忠。28 日获释后，沈林又邀请他，席间，宾主频频举杯，互诉友谊。这位全国人大代表似乎忘记了自己的下属何向阳曾参与了 4 月 17 日的绑架，他一面给田朋忠敬酒“压惊”，一面慷慨陈词：“罗仕平、付培根他们的做法是犯法的，你们厂不管欠我们多少钱，我们绝不会那样做……”

尾声：
受害者的控告泥牛入海

大风铁厂是达县的国营骨干企业。田朋忠被绑架后，厂内一千多名职工人心惶惶，生产急剧下降，仅 4 月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 30 多万元。这次非法绑架、拘禁受害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影响尤为恶劣。5 月 4 日，田朋忠向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人大及萍乡市检察、法院、人大市委、市府等机关控告了罗仕平、付培根、何向阳等人的罪行，要求依法惩处……

但这些控告大多似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惟有检察机关给受害者捎来希望 6 月 13 日，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给田朋忠复函称：你的控告已转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处理。

7 月 2 日，田朋忠又收到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的复函：……控告已转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调查处理……

但令人遗憾的是，截至发稿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萍乡市人民法院“调查处理”的结果仍是泥牛入海。

田朋忠抚着肉体 and 心灵的创伤，仍等待着法律能给他一剂治疗伤痛的良药……
手记之十六：可怕的“飞龙帮” 恐怖的仰天窝之夜

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大地夜色沉沉。

达县管村乡西边 3 公里处的仰天窝地段，万源市红旗乡的查树根驾车快速奔驰着。刚转过一个弯，突然，一排乱石横在前方公路上唐树根赶紧猛踩刹车，东风车“吱呀”一声尖叫，停在离乱石 3 米远的地方。

查树根把头伸出车窗一看，不由一阵毛骨悚然：黑乎乎的荒山怪物一样蹲在路旁，深谷中隐隐传来野狼的嚎叫。夜风里，树木摇晃，杂草瑟瑟……

查树根颤颤地吩咐身边发抖的妻子：“你在车上别动，我下去搬石头。”

车灯中，查树根刚要向路旁掀石头，眼前的情景把他吓呆了：几条黑影挥舞着棍棒直向自己扑来！他机械地边退边问：你们要啥子！

回答他的先是一拳，又是几脚。接着是一句阴森可怖的喝令：要命就快把钱给老子拿出来！

“没有，没有呀！”查树根可怜兮兮地把自己的衣兜翻给黑影们看。黑影们骂句不老实，棍棒拳脚一齐在查树根身上发出沉闷的“叮叮咚咚”声。

‘啊，啊——’查树根的妻子在驾驶室里吓得高声尖叫起来。尖叫声提醒了查树根：“刘蓉，别哭了，快把钱全部给他们……”

215 元现金被抢后，一黑影狠狠地踢查树根屁股一脚，“滚！”查树根吓得忙一轰油门，抱头鼠窜……

夜色又恢复了沉寂。黑影们重新把乱石垒在路中。

凌晨 4 时，白沙镇建筑公司经理王传华驾着长安车来到高高的路障前，停车后，王催同车的老乡熊文建、侄儿曾祥飞下去搬石头，自己则睁大双眼一边观察动静，一边摸着左衣兜里的 1000 元钱和右衣兜里的 15 万元大额存单，在心里不断祈祷：上帝保佑，千万别出事！千万别出事……

王传华最害怕的情景终于在他的祈祷中出现：几个黑影饿虎扑食般冲向自己的老乡和侄儿，棍棒声里，侄儿的哭叫和老乡的哀求一齐传了过来。“唉哟！我是个学生，打我啥子。”“莫打了，莫打了嘛……”

黑影的头儿一伸手，“莫打就把钱拿来！”

车中的王传华大概突然想起了“舍卒保帅”的妙计，他探出头喊道：“老熊，快把钱交给他们嘛。”他满以为只要曾、熊二人把钱拱手献出，“他们”就不会抢自己身上的钱了。

他错了。那伙人抢走曾、熊二人的 350 元钱后，马上扑向了长安车。王传华慌了，一边按住左衣兜一边声明：“我包包里莫得钱！真的莫得钱呀！”黑影们根本不理睬他的“声明”，七手八脚地把他双手向后拧着，直取他的左衣兜。

当王传华意识到自己“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举动已将 1000 元现金暴露时，他一边挣扎，一边又想起了那个“舍卒保帅”的妙计：让他们抢钱，保存单要紧！于是，混乱中，王传华挣脱右手，从兜里抓出“存单”往裤裆里一塞，然后坐定，任其搜查……

抢劫结束，黑影们让他“滚蛋”时，王传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虽遭抢了 1000 元，但 15 万总算保住了。

他又错了。当王传华犹如惊弓之鸟，驾车一路狂奔到数十公里处的三汇镇取出裤裆里的“存单”时，他惊得差点闭了气：自己慌乱中藏进裤裆里的存单怎么变成了三支红梅香烟？！

他两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

一封情书和两个相同的梦

上午 8 点，达县公安局治安防暴队副队长王树林赶到仰天窝时，抢劫现场的路障已被人拆除。先期到达的管村派出所屈德生、杨华生介绍说：已排查了管村周围所有的可疑对象，尚未发现新的线索。早晨 6 点，派出所的几位同志刚到现场就下暴雨，现场的痕迹皆被冲

掉，只是在离路障 3 米远的路边找到一堆人粪……

王树林一听，马上过去仔细观察起来。屈德生告诉他，解使人用的手纸下雨前已经提取，那上边有几行“天书”一样的字回到派出所，王树林忙让人拿来那张臭哄哄的手纸，如获至宝地细心展开。

这是一张从学生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封底。字写得张牙舞爪，难以辨认，可见书写人心情不佳。

作出以上判断后，王树林开始吃力地逐字逐句辨认“天书”。看着看着，他两眼一亮，但亢奋的亮光里分明还夹杂着一份甸甸的沉重和一份苦涩的惆怅……

几小时后，向局长丁有恒、副局长张瑞鑫汇报时，王树林表露出了自己感情中的沉重的惆怅。“这次抢劫有学生参加，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两个局长也为之一振，心中隐隐袭来一阵刺痛。他俩静静地等待王树林说出下文。

王树林从卷内拿出那张臭哄哄的“天书”递给局长，“这是一封信，准确地说，是一个男学生写给一个女学生的情书草稿。”

“何以见得？”还未来得及看信的张副局长问。

王树林说：“信中有这么一段话，‘我跟你在一个班读书时，表现孬，那是有原因的。我对你好，你是知道的，但你老是回避，难道我真的那么令你心烦？因为一个梦，你到县中读书去了……’显然，自尊心很强的女孩子是不会主动向别人承认自己表现孬的，也不会讨好地问别人‘难道我真的那么令你心烦’的，还有信中字迹的风格，运笔的力度都留下了男性痕迹……”

丁有恒看完“天书”后问：你断定这封情书的作者就是“4.21”抢劫案的罪犯之一的根据是什么？

“主要从信留在现场的时间来推断。”王树林呷一口茶后继续分析道，“据回忆，19 号至 20 号早晨 7 点一直下大雨，20 号 7 点至 21 号早上 6 点前是晴天，6 点以后下了暴雨。情书的字迹无浸湿迹象，表现它留在现场的时间只能是 20 号 7 点至 21 号早晨 6 点前。解便的地方就在公路旁，白天有车辆行人往来，解便的人是不会在这样的时间选择这样显眼的地方的。所以，解便的时间只可能是天黑以后，从大便的新鲜程度看，解便时间极可能是 20 号晚上 12 点至 21 号 5 点。而两次抢劫正是发生在这段时间。作为个人隐私的情书，不可能由他人带人抢劫现场，把它留在现场的只能是情书的作者本人。所以，把情书当手纸留在现场的人便是抢劫的罪犯之一。”

“有道理！”两位局领导完全赞同王树林的分析。末了，丁有恒问：有这个写情书的罪犯的线索吗？“

“暂时还没有不过，完全有把握找到他。”王树林胸有成竹地分析说：那个“因为一个

梦到县中去读书”的女学生至少是个初中生，跟她曾在一个班读书的情书作者也一定至少在读初中，抢劫现场周围只有管村中学。罪犯极可能就在这个学校…… “

案情已基本明了。根据丁有恒的意见，专案组走出了破案最关键的一步——寻找写情书的人。

为避免打草惊蛇，办案人员放弃了直接到管村中学查对字迹的方案。23 日，王树林带人到县中秘密查找收信对象。校方翻箱倒柜找了半天，才查出 1994 年开学时，有一个叫龙芳的女生从管村中学转来县中。

校长室里，龙芳对几个陌生人问她为什么到县中读书的事似乎并不介意，很诚实地说，自己之所以转到县中，完全是因为一个梦。

“梦！”虽早有思想准备，王树林还是一振，“什么梦？”

姑娘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美妙的梦境：蓝天白云，霞光万道，一匹白马奔来，驮起她迎着霞光向蓝天飞去……

王树林连说是一个好梦，蓝天红霞暗示你前途无量，转到县中读书当然是一个正确选择。白马象征白马王子——在管村中学时，你一定有白马王子吧？

问题提得虽然有点令人难为情，但龙芳还是羞涩地答道：有个叫蒲兵的同班同学有那个意思，但我一直躲着他……

“为了一个梦到了县中”，“一直躲着他”——与情书内容完全吻合！看来，这情书作者一定是蒲兵。为了最后证实，王树林拿出信问：这是蒲兵的字吗？

龙芳仔细辨认一阵后说：“不是。有一次他曾帮我抄过一首歌在日记本上，我找来你们看一看就知道了。”

日记本找来后，王树林接过一对照，不由傻了眼：情书上的字的确与蒲兵的字迹不符！

一条本以为很有把握的线索断了。王树林感到犹如一瓢冷水当头淋下。但凭着直觉和多年的刑侦经验，王树林仍坚信还有一个“因为一个梦到了县中”的原管村中学女学生就在校内。

果然，校方在高一某班找到了去年从管村中学私自跑到县中的力霞。这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姑娘。当问她为什么要悄悄私自跑到县中时，力霞讲出了一个令王树林震惊得差点叫出声来的梦：一个红日初升的早晨，天上祥云朵朵，一匹白马驮着她飞向了祥云深处……家里人都说这是个好梦，找个好学校读书，定会前途无量。于是，她在熟人的引荐下，没办手续便到了县中。

听姑娘讲完她的梦，王树林的心都快跳到喉咙里了，他忍不住问：在管村中学要过朋友吗？

力霞大方地一笑：“那边有个于海洋的追过我，我才不干呢，他表现特孬……”

“你认识这是谁的字？”王树林把信放到力霞面前。姑娘马上认出：是于海洋的字。

王树林心中一阵狂喜，顾不上吃午饭就同陈民等警察驱车向管村疾驶而去。“飞龙帮”的覆灭

王树林等人去晚了一步：于海洋已于当天上午去了达川市。

线索又断了。但王树林、陈民等人并未惊慌气馁。他们一面通知万源市 XX 银行保卫科：如发现于海洋前去取款，请协助将其拘捕。一面在学校查找与于海洋关系特别密切又戴眼镜的学生——因查树根报案时说：罪犯中有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子。

当天下午，校方提供线索说，高一一班的杜善州完全符合查找对象的特征，与于海洋长期在一起吃喝、看录像、打台球，关系特别好。

下午 5 点，警察们对其秘密传讯。在强大的法律攻势下，杜善州很快对犯罪团伙的情况和罪行供认不讳——1994 年 3 月 20 日晚，同学们都上教室去了，平时耍得较好的高一一班的周博、杜善州、侯兵、庞川，高三二班的蒲勇、吴三华、杨吉军，高二二班的董华在寝室里一边喝酒抽烟，一边郑重其事地商议着。董华说：“现在这年头，要想吃得开，得建立一个组织。……”周博等人附和道：对头，有了组织，一旦有事，就由组织出面搁平。

“成立组织”的意见统一后，大家开始给“组织”命名。浑名叫“花花公子”的庞川瞑目苦思一阵后问：“叫飞龙帮要不要得？”蒲勇首先肯定，“这个名字安逸！”大家也一阵叫好。

接着，蒲勇等 8 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定了帮规。董华用本子记录着，“飞龙帮宗旨：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帮规：二、小的服从大的。2、保守帮中秘密。3、一人有事，全力以赴……

最后，大家推举年龄最大（20 岁）的蒲勇做了帮主，董华被尊为老二，其他人也依次排了交椅。

此后，“飞龙帮”成员下馆子吃喝，进娱乐厅看录像、打台球，一律“有福同享”。但还没享几次福，这群来自农村的“好汉”从家里带来的那点生活费便全部“弹尽粮绝”。

为继续有福同享，4 月 14 日晚 11 点，从娱乐厅出来，帮主蒲勇带领全体帮中“弟兄”在离学校西侧一里外洗劫了一出租车司机。虽只抢了 50 元现金，但“初战告捷”，大家仍乐不可支，第二天，倾其“帮费”外加抢得的 50 元在馆子里大吃一顿。

4 月 21 日是“帮主”的 20 大寿，为筹集钱财以示庆贺，20 日晚，众人决定“大干一次”。晚 12 点左右，“飞龙帮”7 人（缺庞川）同还未入帮的于海洋在仰天窝设下路障，抢了查树根夫妻后，见“战利款”太少，大家决定再抢一次。凌晨 4 点，于海洋突然肚子痛，到路边去解便。不久，王传华的长安车开过来了……

根据杜善州的交待，下午6点，王树林指挥干警们对“421”抢劫案的罪犯进行拘捕。除杨古军、于海洋逃跑外，“飞龙帮”其余7人全部落网。早晨的“太阳”

“飞龙帮”覆灭了。

9个“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也陨落了。

押送罪犯的囚车嘶鸣而去，留下了家长们捶胸顿足的痛哭和社会各界、党政官员们的一片责备：学校怎么搞的！唉，令人难以理解……

校长、老师们也一下懵了：9个罪犯中有8个团员，5人去年或今年担任过班长，1人现任团支部书记。学习成绩最差的都是全年级的第15名。这些得意门生一下成了罪犯，老师、校长都说，真叫人做梦也想不到！

其实，一切都是应该想得到的。俗话不是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吗？__拘留所里，蒲勇这样回答了我的提问：——作案时害怕吗？抢劫犯法，要坐大牢的，懂吗？

——我们人多，一点也不怕，只觉够刺激，好耍，什么犯法不犯法，当时什么也不在乎。其实，我们也根本不认为是犯法，公安来抓我们时，我们还问要耽误好久，晚上还要上自习，不要影响我们高考复习。听说杨吉军逃跑后还托人带照片到学校去报名参加高考。

——（我很惊奇）难道你们学校没开设法律知识课？

——开了。记得好像学的《宪法》，但课都是考试前教师突击的，考后内容也就忘了。今年上边通知不考法律知识了，我们改学《经济规律常识》，老师说，这门课很有实用价值，考不考都应学好。这年头，经济很重要，有钱就是大哥。

——学校管得严吗？

——还是很严的。尤其要求专心听课，认真完成作业。表现好坏倒不很讲究。老师常说，管你是白猫黑猫，考上大学就是好猫。

——家长对你要求严吗？

——只要考了好分数，父母就什么也不管了。课余时间，我们最喜欢看录像、打台球。

——觉得哪些录像片最好？

——《胜者为王》、《天龙八部》、《蝶血香港》等片子我们特别喜欢。（沉思片刻）看这类片子有时会热血沸腾，自觉不自觉地进入角色。具体地说，看色情片时，就想去找女生耍；看打斗片时，就立志要当一个独霸一方的好汉……我们成立“飞龙帮”就是模仿《胜者为王》《天龙八部》来的……

——还有什么因素影响你变坏吗？

——不知这算不算一个因素。看到一些干部经常在馆子里吃喝，我曾想，他们吃公款是巧取，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豪夺点钱，也来享受一下呢？平时，听说有的当官的贪污几千上万元屁事都没有，我们抢点钱算个啥……

采访其他几个罪犯，他们几乎全这么回答。我又采访了办案人员和一些老师、家长，他们证实：罪犯讲的绝大多数情况属实。

我倒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但“飞龙帮”这些可恨的有罪之人已把一个个严峻的课题提交给了我们的社会和政府，也提交给了我们的学校和家庭。我们的社会、政府、学校、家庭该怎样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法纪教育？怎样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又怎样加强录像影视管理和家庭教育呢！

但愿“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不再陨落。

但愿“祖国的花朵”不再凋零。
蒲家迷雾

手记之十七：巧擒“娄阿鼠”

4月5日。上午11时，正是乡场上的人吃“早饭”的时候。突然达县蒲家镇朱仙街迎宾旅馆传出一声令人惊然的惊叫：“天呀！不得了！”接着，旅馆老板郑映明冲出门，跌跌撞撞闯进镇治安室，连连大呼：“梁治安员，报个案！报个案！我家5000元现金，1000元国库券，525个银元被偷了……”

问了一下细节，“梁治安”感到这是件自己搞不了的大案，忙拨通了县公安局的电话。

一小时后，一辆警车呼啸而至。六七个刑警跳下车马上展开了现场勘查和调查取证。

老板娘介绍说，昨晚住宿的共5人，自称李子政、刘波的与自称胡平、李明的是同时住进的，但他们似乎并不认识。这4人今天上午9点前都先后离开了。自己8点出去帮人办事，丈夫也随后到银行存款，走时让10岁的儿子看家，但丈夫9点回来时，儿子却早跟一个住旅馆的看猴戏去了。因昨晚贩运化肥熬了一个通宵，从银行回来后丈夫插上寝室的门倒头便睡，醒来时才发现床对面桌上的帆布箱被撬了。此间，只有长期住在这儿卖跌打药的赵跛子一直呆在旅馆。

讲到这里，老板娘忿忿地骂道：“肯定是那个跛脚货干的现场勘查却推翻了她的判断。在第一现场郑映明的寝室里，只留下一口被撬烂的帆布箱；向外围勘查时，在屋后的柴草内发现了黑色人造革挎包，包内有一本《青年文摘》，挎包上的指纹与现场留下的指纹相符。显然，挎包是罪犯逃走时留下的。挎包上没有赵跛子的指纹，可暂排除其嫌疑。

刑警们把注意力转向了9点前离开的4人。但老板娘说，对这4人的印象不深，只记得一个50岁左右，其余3个估计在18岁左右，有两个胖胖的，一个矮矮的，还有一个尖

嘴猴腮，贼眉鼠眼，就像《十五贯》中那个娄阿鼠。

刑警问这 4 人的名字是身份证上的还是自己报的？

老板娘说，他们都无证件。下午，丈夫到化肥厂去了，我当时正忙着帮卖化肥，是他几个自己在登记簿上写的。

“说说他们离开的具体时间，行李是不是很重？”

老板娘边回忆边回答：“李子政、刘波走时中学刚上早自习，是 6 点半，胡平离开时我在街上碰到的，看了一下表，是 8 点 50 分。他们都只提着很轻的小包包……”

“还有一个叫李明的呢？”

老板娘被问懵了，眨巴着眼睛问老板，“是呀！李明几时走的？”老板火了，“怪眉怪眼的！我存款去了，哪个晓得？”

“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老板娘直摇头。

“他们的住址？”

老板娘又摇头。老板忙翻开登记簿，“住址”栏里，全歪歪斜斜地写着：农村。

线索断了。挎包、书和几枚指纹虽留在现场，但狡猾的罪犯和失职的老板娘却把本来就模糊的贼影淹没在一片迷雾之中。

刑警队长廖远高恼怒地一拳砸在登记簿上，两眼久久望着窗外远处的村舍和田野，似乎要在那广袤迷茫的乡村找出罪犯。侦查员宋晓明认真翻着那本《青年文摘》，突然，他发现第二页左下角有登记簿上同样字迹的“天生”二字，小伙子眼前豁然一亮：达县地区的宣汉县内不是有个天生镇吗？罪犯会不会是宣汉人！

“不像。”有人提出异议，“天生可能是人名，比如李天生、王天生什么的……”

大家争议开了，又是翻书查图，又是推论假设。争来争去，最后终于从飘渺迷茫的案情里得到了一个共识：不管“天生”是人名或是地名，此案的侦查只剩下以物找人这条路了。

当天订出的方案决定：把侦查方向放在宣汉境内，重点寻找补挎包的匠人——挎包背后的 4 条新缝线痕十分特殊，补挎包的匠人印象一定很深，找到这个匠人再由此寻找挎包的主人。

大海捞针

局领导批准了这一侦察方案。4 月 5 日下午，两辆警车载着专案组沿达县蒲家、魏家、罗江进宣汉境内，从西到北进行搜索。每到一个场镇，侦查员们都提着挎包走街串巷，让那

些补鞋匠辨认。结果令人沮丧：两天后，已搜索过的 5 个区 16 个场镇毫无收获。更令人失望的是，在天生镇挨门挨户转悠了半天，结果是既无人看到过这挎包，更无人知道书中“天生”二字的意思。

有人怀疑了。“挎包会不会是罪犯在外地补的？”

“说不定是罪犯流窜到宣汉偶然弄到那本《青年文摘》……”

刑警队出了名的“犟人”李晋蜀、刘兴吾、宋晓明等人凭着过去的办案经验，对当初的判断仍坚信不疑，寻找补鞋匠的兴趣更是有增无减，三天两夜未睡觉，走路都打偏偏，但小伙子们仍拖着沉重的步子在大街小巷不停地寻找查访。

5 月 7 日，终于出现转机：中午时分，跑得精疲力竭的刑警们在宣汉城北门的一条小巷外坐成一片，准备休息一下再继续寻找。突然，巷内隐隐传出一阵“咚、咚、咚”的敲击声，一看原来是个补鞋铺不知谁说：“看看去。”小伙子们又歪歪倒倒地站起，来到鞋铺。“大叔，这个包见过吗？”

“大叔”接过挎包看了看，肯定地说：“见过。”

“见过？”“真的！”小伙子们一下来了精神。

“大叔”指着背面的补缝线痕无不得意地说：“这几条烂缝就是我补的，怎会不认识？”

“来补包的人认识吗？”小伙子们异口同声地问。

“大叔”摇摇头，但他拍着脑门想了想后指着巷内的解放旅馆补充说：“补包包的是个年轻人，跟住在旅馆里的黄包工头好像是亲戚……”

找到旅馆，包工头黄厚学不在，其妻余中莲见来了一群身穿便衣的人，以为是来谈生意的，忙让进屋问：“……你们是联系修房子的吧？”

“我们是交警队的，今天出了车祸，你看一下，认不认识这个包？”“交警”把挎包递了过去。

包工头夫人一下紧张了起来，“交警同志，我弟弟在不在车上？他出门好几天了。”

“你认不认识这个挎包？”“交警”答非所问地又重复了一遍。

余中莲这才接过挎包，刚膘了一眼便马上嚎啕大哭，“是我弟弟余中志的呀！他在哪里出的车祸哟……”

“交警”仍避开话题劝道：“别急，再仔细认认，别搞错了。”

余中莲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道：“怎会错哟，春节前，我和丈夫打架，弟弟把我拉到

屋里锁起，气不过，我就用菜刀把他的挎包砍了 4 刀。前不久，他才去补好……想不到就出事喽！”

挎包的主人被证实了。从余中莲的神态言语中，刑警们知道余中志行窃后还未到过这里，便严肃地对余中莲讲：“余中志在外地犯了罪，如果到了这里要敦促他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下午，专案组留下一人监视守候，其余分头到余中志的另几个亲友处寻找。夜擒“娄阿鼠”

下午 6 点多，留下守候余中志的警察想起自己还未吃早饭，饿得实在挺不住了，便到离巷口不远的小食店吃饭。恰巧在这时，一年轻人幽灵般地溜进了小巷。几分钟后，又如惊弓之鸟般地狼奔而出。吃完饭刚走出小食店的警察一眼发现那飞快消逝的年轻人，觉得可疑，便追了过去，可那人已逃得无踪无影。到补鞋铺一问，果然是补挎包的人。

黄厚学、余中莲立即被传讯。警察们以政策法律为武器展开了强大的攻势，几番较量，几天顽抗后，包工头夫妇终于败阵了。他们交出了余中志存放的赃物，并供认：7 日下午，余中志来到旅馆，听说公安局在找他，吓得扔下盗来的部分赃物转身便逃。余中莲追上去把几十元钱塞给了弟弟，叫他先到开江县新民乡宝塔村的大姐余中碧家躲躲，待风头过后再逃到广东……

罪犯如果逃往广东，不仅抓捕会更加困难，全案的侦查也会因此而断线。局领导指示：一定要在宝塔村将余中志抓获，并以此侦破“4.5 盗窃案”。

地区公安处的命令传到了开江县公安局：全力协助达县抓获罪犯！

4 月 12 日晚，夜幕刚刚降临，开江县、达县公安局组织刑警、基干民兵 30 多人悄悄包围了宝塔村六组的一座大院。经过教育后愿意将功补过的黄厚学带着刑警宋晓明、李晋蜀乘着月色模进了大院。

“笃、笃、笃”，见宋晓明已经到了余中碧家的屋后，黄厚学轻轻敲响了前门。

“谁！”屋里传出一男子警惕低沉的询问。

“老挑，是我，黄厚学，快开门。”

门开了一条缝，见老挑背后站着个陌生人，门缝里射出了一道怀疑的目光。李晋蜀捅了捅黄厚学的后背，包工头悄声解释：“哦，是这样的，公安局最近到处抓余中志，我准备让这位兄弟把他带到广东躲一下。”

“他藏到别处的，我马上去叫。”包工头老挑刚要出门，余中碧跑出来一把拉住他，打开门对黄厚学说：“快进来，走后门出去。”

这时，绕到屋后的宋晓明不小心一脚踩进了粪坑里，刚要往上爬，突然听到后门“吱呀”一声，他忙拔枪站在齐腰深的粪水里观察，见李晋蜀一行走出三四丈远了，他才悄悄爬上来，准备跟上去。不料，正在这时，余中碧跟了出来，见粪坑里突然爬上来个持枪的人，知道中

计，正要喊叫，宋晓明飞步上前，用枪堵住她的嘴沉声喝令：“别出声！我是公安局的。”余中碧嘟哝一声“完了”，便瘫倒在地，任怎么叫她也不动。

这时，远处又传来脚步声，宋晓明只好从路边的草堆上扯几把谷草把她盖好。刚躲到墙后，只见黄厚学同老挑带着李晋蜀进屋去了，不到一分钟，宋晓明发现路上又闪出一条黑影，只见他边走边东张西望。借着月光，宋晓明看清来者正是迎宾旅馆老板娘描述的那个尖嘴猴腮、贼眉贼眼，像电影《十五贯》中那个“娄阿鼠”的人。“他一定是余中志！”宋晓明边想边掏出手铐正要冲过去，突然，埋在草里的余中碧哗地站了起来，嘶哑着嗓子叫喊：“中志，快跑！有公安！”

余中志像受惊的兔子一样转身就逃，宋晓明大喝一声“站住！”接着，飞快追了过去，边追边鸣枪示警。砰砰的枪声惊醒了沉睡的山村，埋伏在大院周围的公安干警、基干民兵一齐打亮手电，点燃火把，把大院照得通明，四处响起一片“站住！”“逮到！”“余中志，跑不了啦！快投降！”余中志刚逃出大院，被随后追来的宋晓明一把扭住，接着“咔嚓”一声锁上了手铐。

最后的较量

当晚，突审在刑警队进行。

余中志被带进来时，已不像刚才那么惊慌，手铐卸下后，他若无其事地吹了一声口哨，然后轻轻揉着被锁痛的手腕，一对三角眼却贼溜溜地四处膘，神色中揉进了许多的诡异。

身份调查时，担任审讯的刘兴吾问：你曾用过化名吗？

“男子汉大丈夫，生不改名，死不改姓，我从来就叫余中志。”答话时，他望着天花板，好像问话的人就站在上边。

“你为什么要躲到开江？”

“躲——？”余中志故作惊讶地把“躲”字拉长了至少三拍，“到姐姐家要叫躲吗？哼，简直是笑话！”

“那刚才在跑啥子？”

“你们神神秘秘的，我还以为碰上抢劫的呢，怎能不跑？”说到这里，余中志一声长叹，“唉，现在的秩序真糟糕，不知维持治安的人在干啥……”

李兴华、李晋蜀等人气得两眼冒火，但刘兴吾用眼色制止了他们。余中志越说越来劲，“明说，我是参加了普法学习的，法律我懂，公安抓人要有证据，否则也是犯法的……”

刘兴吾轻蔑地冷笑着：“犯法？知道偷盗是犯法吗？知道盗窃巨款该判多少年吗？”

余中志一愣，膘膘刘兴吾，又忙避开那刺人的目光。刘兴吾接着说：“看来你并不懂法，告诉你吧，《刑法》152条规定，盗窃数额巨大的处5至10年徒刑……”

一阵疾风暴雨般的话像石子一样敲击着余中志本很虚弱的心，他打了一个寒颤，眼中闪过一丝惶恐。但他仍故作镇静地架起二郎腿。

宋晓明接过话头问：“知道为什么可判 5 年，也可 10 年吗？”

余中志真诚地摇摇头，宋晓明讲：这要根据情节、数额、态度等来定，主要体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听着听着，余中志把二郎腿放了下来，他两眼发呆，头上冒汗，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占据了我的心。刘兴吾、宋晓明还在轮流讲着，余中志越听越发毛，最后，“扑通”一声跪下了，脑袋捣蒜泥似的直叩，“我有罪，我坦白……”

李兴华抓起笔，“沙、沙、沙”地飞快记录起来。

“我是达县花红乡人，姐夫在宣汉当包工头，我常去，与李子政等人混熟了，后来就跟他们干起了‘钳工’。先交待这次偷蒲家郑映明家的经过。”

“4 月 4 日，李子政说罗江赶场，约我、陈小军、汤代洪去‘发财’。哦，陈小军就是登记簿上的刘波，汤代洪是登记簿上的胡平，我用的是李明的化名，李子政没有用化名。他因强奸‘进去’过，才毕业，有经验，是我们的军师。4 号那天在罗江，运气霉，李子政‘开片子’（注：用刀片割兜）时翻了船，被人打了一顿。我们觉得太晦气，一致决定到蒲家‘摸团鱼’（注：在旅馆内盗窃），出出气、冲冲喜。李子政说他前次‘踩点’时发现旅馆老板郑映明很有钱，还有银元，就偷他……”

“住进旅馆后，我与汤代洪假装不认识李子政他们。晚上，李子政假装到郑映明寝室看电视，后来悄悄摸到我们的房间里说，货肯定在帆布箱里，他说为不引起怀疑，他和陈小军先走，叫我们得手后到宣汉大城找他。5 号早上，李子政他们走后，我和汤代洪装睡懒觉，等机会下手。

“8 点，有人叫老板娘帮忙，老板娘刚走，郑老板又在楼下叫他儿子看屋，莫乱跑，他去存款。老板一走，汤代洪忙下楼用瓜籽哄着老板的儿子看猴戏，我乘机溜进老板寝室，用钳子撬开帆布箱，货果然都在里边，我用一个布口袋装好从后门出去。500 多个银元几十斤重，怕有人追来跑不动，我就把自己的挎包藏在柴草堆里，后来又把钳子扔进河里。凭过去多次的经验，满以为即使你们找到挎包也查不到我们，想不到……”

说到这里，余中志咬咬嘴唇，继续说：“……到了如今，我要坦白从宽！快去抓李子政他们！4 月 7 日分手时，我把大部分赃款赃物给了他们，约定今天上午 8 点在宣汉城北的小巷子汇合，把银元带到广州去卖……”

听到这里，几个刑警互相交换一下眼色，便一齐到了隔壁的办公室，向一直等候在那里的局领导汇报后，当即决定：马上去宣汉将其他 3 名罪犯抓捕归案。

立刻，警铃大作，一道道车灯划破黎明前的夜色，直指宣汉。到城北时，已 7 时 40 分。坐在第一辆没有警灯警铃的吉普车上的余中志突然指着走在前方人群中的 3 个人叫了起来，

“他们在那里！”

驾驶员轰大油门冲了过去，在离罪犯几米远的地方才猛踩刹车，吉普车“吱”地尖叫着向前滑去，3个罪犯转身看时，车仅隔咫尺，吓得纷纷仰面而倒。李子政手中提包里的银元哗哗倒了一地，他边捡银元边骂：“格老子的，瞎眼啦！”“赔钱！赔钱！没说的……”汤代洪坐在地上扯着嗓子高声吼着。陈小军冲过去捅着吉普车的帐篷，“龟儿子，哪个单位的！撞了人还稳起呀……”他还要骂什么，但当从车窗看到那些明晃晃的手铐时，他的声音变了调：“还稳起呀……”边往后退边斜着眼看路，刚要开溜，警察们已扑上前扭住了他们，后边的警车也冲了过来，3个家伙泄气地耷拉着脑袋伸出了双手……

警铃在晨风中嘶鸣，警灯在朝阳下闪烁，风驰电掣的警车载着“娄阿鼠”和他的同伙奔向他们的归宿……

手记之十八：罪恶家族

人心不足蛇吞象。他本想敲开阿里巴巴的山洞，却为全家人探出了一条通往地狱的路这是一个被魔鬼诱人地狱后仍痴迷地追逐魔鬼的家族——由血缘关系牵系着的7个家庭中，有13人像鬼魂附身一样沉醉于假钞生意。1995年至1997年6月，这13人因贩卖假钞全“进去”过。

叙述这个家族的7家13人为假钞而毁灭将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把那个因贩卖假钞而“全家覆灭”的杨树芬一家作为本文的主角，顺着这些“主角”往下看，这个故事也许更简练些。

杨树芬，52岁，七十年代在贵州当兵并入党。八十年代初期，在达县双庙农机厂当车工。那时，凭着微薄的收入养活四口之家，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一家人的衣服总是破破烂烂，两间千孔百洞的瓦房十分扎眼地摆在离街不远处的大路边，将这个家的贫困寒酸暴露无遗。

至今，杨树芬同他的家人仍清楚地记得当时是多么强烈地希望能获得幸福的生活——“有像样点的衣服，有像样点的饭菜，有像样点的房子”。这点“幸福”对能吃苦耐劳的人来说是很容易得到的，几年功夫，杨树芬与小自己10岁的妻子颜福菊便用血汗冲走了贫困的缠绕。1986年底，他们盖起了两楼一底18间砖房。

他们还想更富些。杨树芬在厂里加班加点，颜福菊喂猪养鸡，起早贪黑地劳作于包产田中。如果这样干下去，他们会得到一种可靠而永恒的富有和幸福。但颜福菊那个在达县城里贩卖假烟、假钞后又到云南贩“白粉”的大弟颜福忠，当时却不赞成他姐姐走这条太受苦受累的致富之路。他动员颜福菊：“那几亩田里是刨不出金娃娃的，进城来吧，摆个小摊，收入能胜过一个县官2”

颜福菊听信了大弟的话。1989年，她扔下包产地，带着小学未毕业就再也不肯上学的大儿杨静到了达州市。先是贩菜卖，不久，她在菜摊旁为无事可干的杨静支了个烟摊。后来，颜福菊又摆起了烧腊摊。杨树芬见卖烧腊比自己当车工更赚钱，便弃工进城投靠了老婆的烧腊摊。杨家烧腊日益红火，每年收入在3万元左右，乐得杨树芬逢人便吹：“要想发大财，全家做生意！”

越赚越想赚，大概是生意人的普遍心理——这本是一种无可非议的正常心理，但可怕的

是人不能同时获得财富和明智。1993 年，杨树芬的小儿杨伟小学毕业后也加入到了杨氏烧腊。见人手多余，颜福菊便让杨静跟三弟颜福享学做烟生意。她本想让儿子去敲开阿里巴巴的山洞，不料，杨静却为全家人探出了一条地狱之路。

那颜福享本是坑蒙拐骗之人，他先带杨静到重庆买些假烟到达川贩卖，从中牟取暴利。后觉得这样赚钱不够快，又带杨静到河南跟一个叫朱文化的人学裹假烟。几天后，杨静艺成出师，在朱文化那里批发一批假红梅假红塔山香烟包装，回到达川协起了“红梅”、“红塔山”两家“烟厂”。这“烟厂”的原料和工艺都十分简单：只需一瓶胶水，再从市场上买来攀枝花、红梅两种香烟即可。然后，将攀枝花香烟一支一支地裹贴上红梅烟的皮装进红梅烟盒内。红梅烟则裹贴上红塔山烟的皮装进红塔山烟盒内。“产品出厂”后，再由颜福享成箱批发给烟贩们。几月后一核算，利润大得惊人。杨树芬、颜福菊、杨伟等人见“烟厂”如此有利可图，白天卖完烧腊，晚上也通宵达旦地帮忙造红梅造红塔山……

1995 年初，当杨树芬夫妇正准备放弃杨氏烧腊转产“造烟”时，杨静、颜福享去河南批发假烟包装却空手而归。杨静说：“那个河南人朱文化最近搞假钞了。他给了几千，让我们在这边试销。”说完，杨静拿出一叠假钞得意地在杨树芬眼前晃了晃。

杨树芬贪婪地抓过假钞，看后兴奋得直叫：“这钱印得简直跟真的一样！试销啥？拿出来用！”

1995 年 2 月后的一段时间里，杨树芬、颜福享、杨静等人用假钞到老眼昏花的老太婆那儿去买烟，或到见识不多的菜农那儿去买菜都马到成功。用假 100 元券买包烟买几斤菜便能“赚”回八九十元真钱，乐得这一家子屁颠屁颠地穿梭于达川市的大街小巷去欺骗那些善良老实的人们。

人往往被自己喜爱的东西所伤害。更可怕的是，假钞像毒品一样使这个家族的人都染上了瘾。杨树芬、颜福享等人用假钞“赚”来大把大把的钱后，兜里鼓得使他们对自己追求的那个“幸福”日渐神往起来，他们都暗暗思量：该潇洒一下了。于是，他们都按自己的理解潇洒了起来：杨静想开车，花几千去了驾校。杨树芬雇了个帮工，自己则从使他摆脱贫困的烧腊摊退居下来，时常坐坐茶馆，听听川剧，当起了老太爷。颜福享则处理掉烟摊，在四处贩卖假钞之余，忙里偷闲到舞厅里去“晃”，到酒楼搂着“小姐”当当“厢长”……

杨树芬、颜福享“富”了，还想带动家族的人都“富”起来。于是，杨树芬的侄儿杨勤、杨芳鲜，颜福享的哥们于 XX 等人都聚集于他们的麾下。1995 年 4 月中旬，杨树芬和杨静去河南朱文化处以 10% 的比例“批发”回 2.5 万元假钞后，以 30% 的比例转手卖掉 5 千元又赚了不少，他一时兴起，在家宴请颜福享、杨芳鲜、杨勤和于 XX 等人。几杯白酒下肚，杨树芬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他当兵时走南闯北，见了不少世面，逛了不少名胜古迹。颜福享断下话头叹息道：“姐夫，我们这辈子算白活了，三十多岁还没出过几次远门。”杨勤等人也附和：“是啊，成天在达川这圈圈里转，太没意思了！”

见舅子侄儿说得可怜，杨树芬一时心血来潮，他端起酒杯脖子一扬将一大杯酒饮下后，颇有几分豪爽地一挥手道：“走，我带你们出去逛世界开眼界！”

两天后，杨树芬、颜福享等六人怀揣 2 万余元假钞乘客车沿达成公路分段向成都方向

游去。沿途，每到一处，他们都分头用假钞去买水果兑换真币。在遂宁、内江等地用掉千余元都平安无事，杨静、杨勤一班小青年直乐：这边的人比达川的人还好骗！到自贡“买”完东西，杨树芬等人找一家不错的宾馆安顿下来，开始打牌取乐。那天，不知是杨勤想再立一“功”，还是准备私自出去捞点油水，中途，带着几张假钞悄悄溜到街上，先用两张 100 元的假钞买了点水果和茶叶，见无事，又壮起胆子去买烟，不料，卖烟的老头儿警惕性极高且有一些识别假钞的经验。杨勤被扭进了派出所。几小时后，顽固了一阵子的杨勤供出了同伙。当杨树芬等人觉得杨勤外出数小时未归有些不对头，正准备开溜时，几个警察堵在了门口，1.9 万元的假钞也被当场缴获。

以为能白白得到的东西其实代价是极昂贵的。本欲用去骗换真币的 1.9 万元假钞给杨树芬、杨静、杨勤、杨芳鲜、颜福享、于 XX 六人共“换”来了 19 年徒刑！

家族中五口人突然间镣铐加身的声响并未惊醒已对假钞这个恶魔痴迷成瘾的其他亲人。当杨树芬等人在荣县五通坝监狱悔过自新时，颜福菊的表弟黄兵、向 XX 等人又已开始经营假钞了。黄兵原先在达州市做将白红梅香烟换成黄红梅香烟包装之后再出售牟利的生意，每条烟能纯“赚”几十元他仍觉不满足。杨树芬等人在达川贩卖假钞时黄兵早就垂涎三尺，只是颜福享有些不顾他这老表亲情，黄兵才未能入伙。颜福享等人“进去”后，黄兵发现了颜福享留在家中的记有河南朱文化地址的那个本子。他如获至宝，按地址找到朱文化，以 10% 的比例买回数万元假钞，在达州市以 25% 至 30% 的比例卖出，美美地赚了一笔。

1996 年 3 月，杨树芬的二儿杨伟、颜福享的老婆刘纯及其亲家龙 XX 想去看远在荣县服刑的亲人了。也许是颜福享留下的地址使获益匪浅的黄兵想报答一下，或者是暴富后想摆摆阔，黄兵拍着胸膛夸下海口：“去趟荣县要得了几千元嘛，所有的费用我全包了！”

海口虽夸下了，黄兵却舍不得用自己“赚”来的钱。他怀揣 1 万元假钞带着杨伟、刘纯、龙 XX 上路了。一路上，他们用假钞买东西换来真币，吃香喝辣，住高档宾馆坐高级出租车，倒也十分潇洒痛快。

在荣县探监时，狱中的杨树芬、颜福享同黄兵、杨伟、刘纯一伙流泪伤心后开始以身说法，谆谆教诲黄兵一行要安分守法，不要去搞“那些活路”。黄兵、杨伟、刘纯等边听边点头如鸡啄米。但探监出来，一伙人早将狱中人的劝诫忘到九霄云外。黄兵见使用假钞一路顺利，分析道：再往西就是雅安了，那边的人见识少，更容易上钩，我们不如过去把剩下的 9000 多元假钞全换成真的。杨伟、刘纯、龙 XX 提出条件：换完后，我们要到成都好好“操”一下。

后来，被雅安某法院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押赴石棉监狱劳改时，黄兵才跺着脚后悔不迭地对遭到同样下场的杨伟、刘纯、龙 XX 说：“妈的，当时应见好就收，不该在雅安那个狗日的烟贩那里没完没了地买烟。但当时，他们没有一个人这么想，两轮流用假 100 元券在那个老实巴交的烟贩那里买烟。烟贩开初并未认出是假钞，还喜滋滋的给这些阔买主补钱，后来，零钱补完了，烟贩到别人那里去换，别人告诉他是假钞，烟贩一下子急得直冒汗。但这烟贩挺有心计，见用假钞的有好几人，便不露声色地悄悄跟着黄兵一行，待其住进宾馆，他马上上去公安局报了案。于是，黄兵、杨伟、刘纯、龙 XX 还未来得及去”操“成都便被弄了”进去“。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狡诈的假钞贩子没能斗过机智的警察。这个鬼迷心窍的家族终于为假钞玩儿完了随着杨树芬、黄兵等十多个假钞贩子先后落网，达川市内的假钞似乎少了许多。

但 1997 年 4 月以来，不仅达川市突然又假钞成灾，与达川市一河相隔的达县南外镇的假钞案也日渐增多。那些卖烟卖菜卖蛋的小贩们不时捏着几张假钞哭兮兮地到达县公安局南外派出所报案。

南外派出所蒋所长把抓假钞案的二警务区组长何云松叫到办公室，交换案件线索，布置侦破工作。

不几天，何云松将一个重要线索带回了所里：曾因贩卖假钞被判刑的黄兵、杨静保外就医回到达川市后，伙同颜福菊等人又有贩卖假钞的犯罪嫌疑。根据所领导决定，何云松同他的部下们把侦查重点放在了杨静等人身上。

贩卖假钞“发”了的杨静阔得像个阿拉伯王子。他在达川市北岩村租下的三室一厅的房间里摆着高级音响、25 寸长虹彩电、新飞冰箱、八一席梦思床。他除了在赌桌上打发时光外，便腰挂 BP 机，嘴叼高级香烟，戴一副墨镜，或骑着 8000 余元买来的摩托在街上兜风，或拥着妖艳的女郎在舞厅餐馆钻进钻出。

对那些狐朋狗友，杨静更是大方潇洒。1997 年 5 月初的一天。在某舞厅跳舞时，渠县水口乡 18 岁的王友伟见杨静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地拥着漂亮的女人跳舞，给舞友们又是散烟又是买饮料，忍不住凑过去恭维道：“杨哥，你好发财哟！”杨静得意地掏出一叠钱递给王友伟说：“有财大家发，拿去用吧。”末了，杨静又给王友伟几张假 100 元券悄声道：“不瞒兄弟说，我是做假钞业务的，往后还请多多介绍买主。”

王友伟果然十分卖力地寻找买主。5 月 4 日晚，王友伟在舞厅里碰到一腰挂 BP 机，兜里胀鼓鼓的年轻人，便认定其肯定是“道上”的人，于是想方设法与其套近乎，并掏出一张假钞问愿不愿“做业务”。那年轻人两眼一亮，接过假钞看后问：“你有多少？”王友伟说：“多的没得，十个（万）八个还是有的。”年轻人略一思忖：“得先给老板讲一下。”王友伟生怕生意“黄”了，硬从年轻人那里要来了传呼号码。

这年轻人是南外派出所的小李。5 月 5 日一早，小李将情况向何云松汇报后，何警官为探明虚实并搞清对方是些什么人，马上给小李 300 元让其先去搞点“样货”。很快，小李买回了 1000 元台湾 90 年版的“样货”，并搞清对方的老板是杨静、颜福菊、黄兵等人。

何云松将初查结果汇报后，蒋所长决定：选派所内龚先志与小李前去与杨静等人接头，何云松带张松林、王震宇、胡雪花、黄亚飞、喻少贵等干警暗中保护龚、李二人及“买货”现金的安全，并伺机抓捕杨静一伙。为了便于指挥，蒋所长、指导员谢恩树、副所长段永志等所领导随队行动。

下午 5 点，王友伟打来传呼，催小李马上与老板到市内双狮宾馆去提货。何云松在电话中告诉王友伟：“叫你杨哥准备好，我们马上就到。”

几分钟后，三辆红色出租车驶出了南外派出所，出租车后远远地跟着一辆警车。车队到红旗大桥南端，王友伟又打来传呼，说为安全起见，杨哥决定到荷叶街口交货。何云松马上意识到：荷叶街口行人极多，且常有巡警出现，他们根本不敢在此地交货，肯定是狡猾的假钞贩子在耍以静制动的鬼把戏，想以此来监视考察“买主”，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不会露面或闻风而逃。何云松将自己的想法向警车中的几位领导汇报后，所领导决定以动制静，见机行事。何云松将所领导的意图逐一传达给几辆车内的干警和联防队员，最后走到第一辆出租车旁，叮嘱龚先志。小李接头时要沉着冷静，随机应变。

车队到了荷叶街口，龚先志、小李下车站在路边张望，却不见杨静等人出现。坐在第二辆出租车内的何云松断定：“这些家伙也许正躲在什么角落里监视，发现有警车在附近，他们肯定不会露面。于是，他同张松林、胡雪花下车并暗暗向后边的警车打手势让其往前开。果然，警车开走不久，王友伟不知从什么地方一下钻了出来，拦住一辆出租车开到路边将龚先志、小李叫上车便飞驰而去。何云松、张松林、胡雪花也马上换乘一辆出租车紧跟其后。王友伟让出租车在城里东揭西钻，他不断向后张望。当确信无人跟踪时，才叫驾驶员向双狮宾馆方向开去。龚先志警觉地问：“不是说不在双狮宾馆接货了吗？”王友伟诡秘地一笑道：“龚老板，别多意，这都是我们杨哥安排的，他也是怕公安把你们钩到了。”

到了双狮宾馆，龚先志、小李刚下车，便见几个大汉正站在宾馆门口凶神恶煞、虎视眈眈地审视着自己，周围围的人群中还游荡着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那阵势使龚、李二人明白：自己稍有不慎，这些心黑手辣的亡命徒就会狗急跳墙，到时，不仅自己有生命危险，整个侦查也会失败。想到此，他俩不由一阵紧张。但当发现蒋所长、何云松等人已在人群中四下散开时，他俩渐渐镇静了下来。

王友伟从车里钻出后将双方作了介绍。龚先志这才搞清楚：留小分头的叫杨静，站在他身后警惕地东张西望的分别是庞启扎、李小林、颜波等人。杨静握握龚先志的手阴沉地说：“龚老板，这儿人多眼杂，不是办事的地方，请跟我走。”

杨静、王友伟带着龚、李二人上了双狮宾馆旁的一面斜坡。蒋所长、胡雪花马上提着菜扮成父女的模样跟了上去，何云松、张松林、段永志等人也装成过路人跟在后边。上坡后杨静等人突然拐进一条僻静的小巷，见四下无人，杨静、王友伟猛地从两边夹住龚先志恶狠狠地说道：“狗日的，当老子不晓得，你是公安局的！”龚先志一惊，小李也握紧拳头准备搏斗，但龚先志很快意识到，又是讹诈！他甩开杨、李二人，愤愤地骂道：“龟儿神经病，你们才是他妈的公安，不做生意拉倒，少给老子来这一套！”王友伟见状，上前拍着龚先志的肩膀说：“开个玩笑嘛，何必当真！”杨静也嘿嘿地干笑道：“见你腰里鼓鼓的，我还以为是枪呢。”说着，又顺势在龚先志身上一阵乱摸。龚先志装作发怒的样子问：“搜完了吗？还要不要老子把裤子脱了也搜搜！”杨静忙劝道：“龚老板，别动怒，做这种业务，有点疑心总是难免的嘛。”龚先志接过话头道：“是呀，为了让你没有疑心，干脆把我这提包也看一下。”说着，哗地拉开提包，将几扎钱露在杨静眼前。见到钱，杨静放心了，将龚、李二人带到傍山坡的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里。龚先志以为会在这里交货，不料，杨静把头探出门外观察了一会后诡秘地催道：“龚老板，快走！到另外的地方提货。”杨静、王友伟带着龚、李二人爬上一重坡，又下到一重坡前的一间破瓦房前，再从一张生了青苔的烂木板上走过一条深沟才到了瓦房内。进屋后，杨静关上门，从床上拉出一只破皮箱，拿出四扎 100 元的假钞给龚先志说：“这是 4 万。以后还要的话，打传呼找我就行了。”

龚先志付过 3000 元“货款”后从杨静到双狮宾馆门口去拿另一半“货款”。刚离开破瓦房不远，龚先志见何云松、段永志。张松林等人已守在路边，便悄悄发出了可以抓捕的暗号。待杨静即将擦肩而过时，何云松大喊一声：“杨静，站住！”杨大惊失色，还没回过神来，一副手铐已将他和王友伟铐在了一起。

与此同时，谢恩树等干警在双狮宾馆门口将颜波、李小林等人抓获。

抓获杨静后，蒋所长指挥干警们在杨静的住所里又搜出了一万多元假钞。搜查刚完，十多个凶神恶煞的男男女女堵住了干警们回队的路，骂骂咧咧地要干警们放了杨静，否则就别想走人。何云松等人出示警官证，并警告谁妨碍执行公务就要负法律责任。一个光着上身的胖子挥着拳头吼道：“别以为老子们不懂法，不留下人就别想从这里过去！”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也高声吼道：“他们是吃诈的，给我上广这伙人叫叫嚷嚷地冲向了干警。见情况紧急，段永志等人拔出手枪，威严地喝令：‘站住，谁敢乱来就自食恶果！’那伙人被镇住了，站在原地不敢动弹了，并不断有人悄悄地溜走。趁这功夫，何云松、张松林通过讯问杨静，搞清人群里吼得最凶的是他妈颜福菊及他二舅颜福科等人，便上前将其铐住，其余十多个男男女女一下全作鸟兽散。

当天，干警们共抓获杨静假钞案涉案人员 11 人。

5 月 7 日上午，有人呼响了颜福菊的 BP 机，何云松以杨静的名义回了电话，对方说他是蒲家镇的赵一寿，上次在颜福菊那里进的“货”已卖完了，想再批发 1000 元的一货“3 何云松让赵在双狮宾馆门口等着，他马上就到。十多分钟后，赵一寿在双狮宾馆门口落网。不一会儿，又有人呼响了颜福菊的 BP 机，原来是达县碑庙乡农民李学成也要在颜福菊那里”批发货“。当晚 9 点，何云松等人将李学成诱入颜福菊的住所成功地将其抓获。

5 月 8 日，朱文化从河南几次给颜福菊打传呼。鉴于颜福菊被拘留后态度顽固，何云松只好从看守所提出杨静代回其电话。杨静在电话中对朱讲，他妈到重庆做业务去了，他需批发 10 个（万）货。朱告诉杨静要多少货都可以，同你妈一起来拿。

因为经费问题，去河南抓捕朱文化的战机一再失掉。5 月 17 日，当何云松、张松林、王震宇一行匆匆赶到河南时，朱文化早已逃之夭夭。

目前，杨静、颜福菊贩卖假钞案共拘留收审 12 人，已有 5 人被逮捕移送检察机关起诉。杨、颜家族中的黄兵、向 xx 漏网后正被公安机关追得狼奔。

手记之十九：放下你的鞭子

一、“杀威棒”下的冤魂

A 县山溪乡三村四组村民邹洪 1990 年 8 月 3 日含恨死去。

他面朝窗外，远处是他父母兄弟居住的那座大山，斜靠在山溪乡政府办公室的那张大条椅上。他怒目圆睁，眉头微皱，双拳紧攥，嘴巴大张——似在诉说，似在呐喊，又似在控告……

还差几个月才满 21 岁的他留给人们的表情是死不瞑目。

验尸报告上写着：死者四肢、腰、背等部位均有伤口、瘀痕……颈部有伤痕 26 条……

但致死原因系服毒。

是的，他那年轻、强健的身躯是不会倒在暴力下的。但他自己服下的那一公斤“杀虫霜”却足可以使他死上十遍！

抱着邹洪满是伤痕的尸体，他那风烛残年的父母和两个初谙人世的弟弟呼天喊地，哀哀欲绝。“儿啊，你怎么死得这么冤呀！”“哥哥，你不该死呀广是呀，他怎么就死去了呢？十多小时前，他还欢天喜地地带着两个弟弟到乡上赶场卖香菇，还说等钱赚多了，再盖新房、买彩电，帮弟弟娶漂亮的媳妇……说得高兴了，他抢过弟弟手中的香菇兴冲冲地朝收购站跑去。

不想他的打算竟成了遗恨——他从弟弟手中抢过了死神。

刚到桥头，区工商所协管员陈槐便抓住他，要“无证商贩到乡上说清楚”。对“乡官威仪”邹洪早就目睹耳闻，所以，他一个劲儿地解释自己是卖香菇不是贩香菇，任陈槐怎么抓扯也不肯去“乡上”。陈槐恼怒了，雨点般的拳头砸到了他的头上。当邹洪被打得眼冒金花时，忍不住还了手。但他很快就被陈槐的几个“兄弟伙”打得落荒而逃。

最后，邹洪终归没能逃脱“法网”，被人推搡扭扯到了乡政府。接着，山溪乡副乡长王伦充当了这出悲剧的导演。

王副乡长在一番唾沫四溅的训斥后，勒令邹洪给陈槐写检讨赔药费，并说要视其态度罚款。不知好歹的邹洪却委屈地嘟哝说：他先打人，却不检讨……

几句“嘟哝”决定了他夜赴黄泉的命运。下午三点，王副乡长一个添油加醋的电话打到竹锋区公所后，区里协助王副乡长“理麻”邹洪的两个民警，两个工商干部很快便赶到了山溪。六点，对邹洪的“理麻”在乡政府办公室拉开了帷幕。

“邹洪，给老子跪倒！”按事先研究的“先倒威，再罚款”的方案，区派出所那个被村民们称为“松皮专家”的贺运林在咬牙切齿的一声高吼后，将手铐、警棍往桌上重重地一甩。王伦等几个“陪审”也立即声色俱厉地喝道：“跪倒！”

据某些旧戏，此乃封建衙门审讯时“打五十个杀威棒”的信号，但从未看过旧戏的邹洪大概是被眼前的阵势吓懵了，他直愣愣地站在那里，膝盖一点儿也没有弯曲的意思。于是，王伦、贺运林等五人一拥而上，一阵拳打脚踢外加贺运林手中那根警棍，邹洪终于被人卡着脖子跪下了。他的头被按在地上，那双准备多挣钱盖新房买彩电的茧手也被反铐在背后。

五分钟，十分钟，三十分钟……邹洪跪在那里，不断滴落的泪水倾诉着人生的悲苦和拳脚警棍带来的阵阵巨痛……

晚上八点多，折腾累了的王伦等人解开邹洪吃饭去了，昏暗而空荡的办公室里，孤零零地剩下伤痕累累的邹洪。他又饿又渴，满是血迹的嘴唇裂出了一道道口子；室内的闷热使他不断冒汗，被汗水浸泡的伤口钻心地痛，成群的蚊虫“嗡嗡”地爬在他身上乱叮乱咬。这一切，邹洪全然不知，他本然地坐在那里，泪水无声地淌着，眼光里流露出宁种强烈的愤恨：

他恨王副乡长不辨是非，恨那顿不分皂白的“杀威棒”，更恨王伦、贺运林等人对陈槐的偏袒。

这个从小就生活在深山老林的青年农民至死都未意识到王副乡长和身着警服的贺运林等人的行为是违法的，当然也就不知道法律能保护自己了。当时，他只知道王伦等人吃完饭还要“理麻”自己，自己要付出数百乃至千元的“医药费”和“违法罚款”。他感到委屈，甚至感到无脸见人。他绝望了。

想到死，他不禁打了个寒颤，但屈辱使他还是忍着伤痛，扶着长椅站起来，跌跌撞撞地向外走去……

当王伦等人频频举杯并轻松地议论下一步如何“收拾”邹洪时，本文开头的那个场面已在乡政府办公室发生了。

挥舞“杀威棒”的人受到了政纪国法的处分，但很久以后，大山里那些善良宽容的人们仍怨恨难消。有人疑惑不解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像封建社会那样打‘杀威棒’！而参加过普法学习的山民则议论：“如此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还谈什么法制？”

二、“捷径”

川东北一些人温文尔雅，可以把野蛮的事说得“文明”。比如：他们把打人说成“修理”、“收拾”、“理麻”、“松皮”、“教育”。“排”、“整”，关押人叫“进鸡圈”，用警棍打人叫“转筋”，用绳子捆人叫“背麻”，用手铐铐人叫“戴双手表”等等。

这些“行话”的“创作权”大多属于交通不便的一些区、乡干部和警察，最流行于靠行政命令、长官意志办事的地方，使用最频繁是在法制不健全的日子里。

一位被村民们称为“南拳王”的乡长有句“格言”：“捷径”就在拳下。有人捧场说：这是新形势下农村工作的特点和趋势……

于是，被捧的人和捧的人涌上了这条捷径。他们放弃党宣传、发动、教育群众的思想工作优势，向群众举起了“皮鞭”，挥舞着拳头。

B 县某乡村民刘某因粮未晒干而拖延了两天交粮时间，该乡陈副乡长前去问罪时被刘某“冒犯”了，陈副乡长一拳将刘打倒，把拳头在刘某眼前一晃说：“给老子莫妖艳儿，这玩意随时可以松你龟儿的皮……”第二天，刘某果真不敢“妖艳儿”了，借粮食送到了乡上。事后，陈副乡长对人夸耀说：“这就叫拳下出效果，拳下出顺民，拳下有捷径……”

现代科技的发展开阔了走“捷径”者的眼界。他们开始把目光移向警棍、手铐。前不久，C 县某乡为了“方便工作”和“自卫”，全乡十多个干部配备了八根警棍。乡干部们走村串户，开会办事随时屁股上都吊着根“黑棒”。从此，村民们“规矩”多了，很多人见了乡干部便避让三舍。几千元钱花的值得，使干部们省力、省事、省得拌嘴皮，动辄可打嘛。但是人县县委、县府却严厉批评了他们这种做法并收缴封存了他们的“黑棒”，解除了他们对群众的“武装”。

C 县灵芝乡有一土地纠纷拖了数年。1990 年 3 月中旬，梁副乡长决定通过“捷径”解决这一纠纷，便带着两名治安员去了。对方对治安人员的介入很反感，说他们“像国民党”。梁副乡长同治安员懒得解释，干脆一齐破口大骂，并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打出手。后又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儿及其儿子推搡打骂到乡政府，被“修理”得皮开肉绽的村民用流血的嘴向全乡作了“深刻的检讨”，并被罚几十元的“教育费”。

需要补述一笔的是，从此，在梁副乡长的“辖区”内，颤巍巍地走着一个告状不止的七旬老人。

自从有了“捷径”，群众中的不满、诅咒、漫骂、讥讽、埋怨日渐增多，党群关系出现了裂痕，党和政府的形象被歪曲！一位老农噙着热泪对笔者说：我们这里共产党不见了，国民党的保甲长、乡警丁在横行……

多么令人痛心的现象，多么尖刻的批评！是可忍，孰不可忍？
三、“主”“仆”颠倒

哪怕只有一天工龄的国家工作人员，都能讲出一番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类的道理。

可是，近年来，一些“公仆”却在更换观念并“理顺关系”了：“”主人二权力，公仆二管人，国家干部“统治”老百姓，“不听话”。“犟嘴”，“公仆”将格打勿论，“态度不好”，不尊重“公仆”的是“修理”的对象。

写这篇文章时，笔者曾向某区领导核实该区某乡将一村民铐在树上示众的事实。不想那位领导一听就火：“拖欠公粮态度不好，就是该铐嘛，区、乡干部难道连理麻刁民的权力都没有吗！嗯！你们帮这样的人说话，我们还有法工作吗！哼！”不容分说电话便“啪”地搁上了。笔者不禁愕然。

B 县三乡去年 5 月 20 日一社长强迫村民颜森砍自己包产地边的桐树，颜拒绝后，该社长带三个儿子将其打伤，又扭打其弟颜林。颜还手，双方互有所伤。

事后，“颜家兄弟反对乡领导留玉米行的规定，某社长干预，被其打伤……”的“事实”便报告了乡长张雄，张雄听一跳八丈高：“妈的，反啦！一个小小村民竟敢如此无法无天！”于是，“紧急会议”几分钟后便在乡政府办公室召开了。

“……颜家那两兄弟无领导，这还了得！不把这样的刁民收拾下去，今后还有谁怕我们！……”在威严的气氛中，张乡长挥舞着拳头对两个“刁民”的“罪过”及“理麻”他们的意义讲了半小时。

几小时后，张乡长带着副乡长、武装部长、治安员等人将那两个“无法无天”的村民绳捆镣铐到了乡政府。

当晚，乡政府便传出颜氏兄弟哭爹号娘的惨叫声，后来被“修理”得鼻青眼肿、血迹满面的颜氏兄弟分别被乡长押到病房，双手背在背后跪在某社长的床前，磕响头三个，用嘴衔

其衣袖，以示“悔罪”、“臣服”。

这还没完，被打得不能动弹的颜氏兄弟被乡长用手铐铐在长条椅上睡觉，并在土“鸡圈”里关了六天。

后来，张乡长为此事检讨时说：当时明知事实有出入，但我们认为整两个农民算不了什么，主要想以这件事杀一儆百，提高乡干部的威望……

为了“威望”，“主人”的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在张雄这类“公仆”的手中化为乌有！
四、在执法的名义下

春末的后半夜格外静谧。D县那偏僻的三石乡更宁静得使人仿佛进入了茫茫荒漠。

突然，从三石乡政府传出一阵皮鞭抽打声和一青年男子的惨叫声。

“唉哟！林乡长，求你们莫打啦！我的手都整断了呀……”周围那些听惯了这种毛骨悚然的惨叫的居民心里明白：林副乡长他们又开始“夜战”了。

“你他妈的还叫痛，老子再给你来个‘金蛇缠腰’，让你真痛一下。”

啪、啪、啪……听不见惨叫声了，那有节奏的鞭挞声在宁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脆。

“文三娃儿，整痛了没有？”

“林乡长……没……没有，饶了我吧广文三娃儿吸取刚才喊痛的教训，擦掉嘴角的血迹，说出了违心的话。

“哈哈，妈的，整了半天还没有把你整痛，那就再‘排’几下，看你龟儿以后还敢不敢‘妖艳儿’。”

啪、啪、啪……皮鞭声又急促地响了起来。文三娃儿没有叫，也没有求饶，他从牙缝里挤出来：“我……要告你们……这种违法行为……”

“哈哈哈……”，“哈哈哈……”，夜色里回荡着几个中年男人的狂笑：“老子们这叫执法，不是违法，你龟儿妖艳儿受到法律制裁是罪有应得……”

听！林副乡长多么“理直气壮”，又多么“名正言顺”——执法，这个庄严的词，却被用来掩盖对无辜群众的暴行。在我们处理众多的打人案件中，违法者常把棍棒加身说成是“加强教育”，干部打人说成是“执法”，佩带兰盾的警察、治安员当然更是天然的“执法”者。手铐、警棍是必不可少的执法武器，“将军背剑”。“鸭儿浮水”、“猴子搬桩”、“捆指加楔”等绝迹几十年的刑法也为所谓“执法”而重新出现了！

那些自以为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法者”，打骂群众比打骂牲畜还随便，在他们“执法”的拳脚棍棒下，有七十多岁的老人、十余岁的少年、瘦弱的妇女，还有重疾缠身的病人……

前不久，笔者接待了一个叫罗玉玲的上访者。她胸前挂着一个极大的“冤”字，在女儿的搀扶下颤颤惊惊地走进了办公室。那双干枯得像鸡爪子的手一直抖个不停，嘴唇不住地地痉挛，泪流满面的脸上表情痴呆。我正搬椅子让坐，她却捧出一件满是汗渍的血衣，同女儿“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失声痛哭起来。哭声撕心裂肺，催人泪下。

我惊愕地将她俩扶起坐下，反复劝慰她们。可十多分钟后，她们仍只是一把鼻涕一把泪，仍只有凄切的哭声和表意不明的短语。后来，局里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讲了事情的经过：半年前，罗玉玲邻居的五个南瓜被盗，邻居怀疑是她所为，便告状到关系较好的某副乡长处。这位副乡长派治安员对其进行“法律制裁”，将罗玉玲夫妇捆到乡上打得满身伤痕。那顿毒打使她坐骨神经和中枢神经系统受伤，落得终身残废。后来，搞清了南瓜是他人所偷……

笔者不禁怒火满腔。什么“执法”，简直是在践踏法律！

去年 3 月，某县某乡公安员刘军无手续砍集体的树，被村民吴某阻拦。6 月，吴便因同邻居抓扯成了“严打”对象。

去年 8 月，对县樟木乡某乡长以清查被盗电线为名，无根据拘禁五个村民四十余天，除对其多次毒打外，还强迫这五人给自己背地基。

某县《监察情况》载：去年上半年发生干部、警察、治安员打人 39 件次，死一人，伤十人，残三人……

法制可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进步。但冒牌的“执法者”打着执法的旗号，损害公民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秩序。

不管是谁，以什么理由、方式、手段侵犯公民合法权益，损害党群关系都是党纪国法所不允许的。文中那些打骂群众的干部都已受到国法政纪的惩处。对那些现在还在违法打人的干部，我们要大喝一声：同志，放下你的鞭子！
手记之二十：阳光下的暴行 较量

达竹矿务局门口那块“达县地区公安处第二分局”的吊牌虽已历时多年而显斑驳陈旧，但达城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分局。然而，1992 年春节过后不久，一件搅得小城沸沸扬扬的事却使二分局突然声名大噪。

那几天，先是门口的小商贩们发现：达县检察院的几个大盖帽频繁出入二分局，后来，临近几幢办公楼的人听见分局那边不时传出语气强硬、分贝很高的争论，再后来，有人从窗口看见双方推一推头顶佩有国徽的大盖帽，神色威严地对峙着……

有人猜测：二分局出事了。

果然，几天后，有关“达县检察院在查处公安处二分局副局长罗禄金等人刑讯逼供的问题”这一小道消息在达城传得家喻户晓。于是，名不见经传的二分局一下成了达城人关注的焦点。那些健身球玩得优当咣当直响的老头儿老太太们及行色匆匆的上班族路过矿务局门口，

总要探头往里望望。诸如“罗禄金已同参加刑讯逼供的警察串供”，“有人要求检察院调查取证只能使用中性词……”之类的新闻，被人们“炒”得沸沸扬扬。

1992年3月后的大半年里，人们渐渐听不到有关案情的“新闻报道”了。据说是因为有人说县检察院办这个案子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故意给公安难堪。还说因检察院查二分局后，金刚矿区杀人强奸案件不断，故有人致函上级检察机关，要求停止查办……

这些传闻从照样被前呼后拥、照样威风八面的罗禄全身上得到了印证。“妈的，检察院算老几！”罗禄金和其“贴心”逢人便这样说。

挂念此案已久的达城人的心中多了一份沉重。“看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过说说而已。罗禄金是公安局长哩，怎么查得倒？”也有人不服气，“哼，要不是上头有人替他消灾……”

此话虽系民间传言，但据说“消灾”确有其事。如果把消灾的情况记录下来，那是一个极复杂、曲折、激烈且肯定很能吸引人的章节。但是由于大家都能理解又不能理解的原因，笔者只好让那些能产生轰动效应的情节在本文中成为一串“……”。

不过，可以告慰读者的是，法律是公正的，不管是布衣还是权贵触犯了它，它都会铁面无私，严惩不贷。在地、县党委、政府和省、地检察机关的支持下，经过达县检察院1年零3个月的艰难侦查，1993年5月28日，当达县人民法院以“刑讯逼供罪”把罗禄金、夏新云等人押上审判台分别处以二年和1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时，一个发生在阳光下的暴行终于大白于天下……

私“审”

暴行的祸端源于一则桃色新闻。

1992年春节前后，“驾驶员唐E与女工D有那种关系”的传闻在金刚矿区被说得活灵活现。D的丈夫A气得茶饭不思。2月10日，他向在二分局当警察的哥哥B和妹妹C哭诉了别人议论自己戴绿帽子的事后，兄妹仁气得一跳老高，“龟儿唐E，走，找他算账去！”

“当”，门被踹开了，唐E见身穿警服的B地和A在门口咬牙切齿，怒目而视，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但他仍怯怯地一笑招呼道：“哦，坐，请坐……”

“知道找你干什么吗？”A边问边跨进门里，B此左右相随跨了进去。

唐E迷惑地摇摇头。

“格老子还稳得起也，说，你跟我老婆有没得那种事？”A边骂边通过去，B（在身后摩拳擦掌，步步紧逼。唐E慌了，边退边申明：“哪有这事？老A，莫乱说哟……”

“龟儿还狡辩！”骂声未落，A、B（的拳脚巴掌便劈劈啪啪地落到了唐E的头上、脸上、身上。当唐E被打得头破血流、体无完肤时，A、B、C的父亲——一个多年的老公公安也提着木棒前来助战。在三个公安和一个怒火中烧的汉子的攻击下，唐E连求饶的机会也没有，好不容易才躲到墙角，高高举起手投降，但对方并不“宽大俘虏”，棍棒拳脚仍雨点般落下。被打急了，唐E顾头不顾尾地往床下钻，但马上被A抓着头发揪了出来。“叫

你躲!”B 当胸一拳,唐 E 一下“飞”了出去,“崇”地把衣柜砸了个大窟窿。“快说!你和 D 有没得那个事?”A8 把唐 E 的手反剪着将其按跪下后继续审问。

“没得呀……”已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唐 E 仍不肯“服法”。于是拳脚棍棒声更急更响了。

“别打了,有、有……”唐 E 终于招供。

“老公安”忙叫来矿派出所所长 F。本同唐 E 有些矛盾的 F 像法官一样有板有眼地“开庭判决”了:“……这件事可公了,也可私了。私了大不过老唐给点钱把事搁平;公了么,这种霸占他人妻子的事肯定要判几年刑,法律上,早就有规定……”

唐 E 努力睁开红肿的双眼,愣愣地望着呈叠影状的“审讯者”和“法官”,思维迟钝地在脑海的每一个角落搜寻那从未听说过的“法律规定”。他很着急:此事难道真的就由他们私设公堂这么定案吗?

“是公了还是私了?”A、B 地和“老公安”几乎是同时向他“征求意见”。唐 E 嘴唇动了一下却没说出声来,见眼前那几双拳脚又在晃动,忙答道:“私了,私了!”说完便昏了过去。

私审大获全胜。BC 用糖开水灌醒被“审”昏的唐 E 后,令其写下:“我与 D 有男女关系,一切责任由我负,我和 A 私下和解。”“和解”的结果是一个 B 要价 1 万元唐还价同意付给 8000 元赔偿费的“协定”。

第二天早上,唐 E 那个被人忘了真名而叫外号“洒水车”的徒弟唐厚模见师傅满脸是伤,忙上前询问。唐 E 忍不住老泪纵横,说自己冤枉,挨了黑打还要赔钱,昨晚本想一死了之,但自己又给 A 写了“供词”,死了也要落得不明不白。末了他差点跪下向徒弟留遗言、托孤……

“洒水车”正要把师傅送回家去,AJ 又找上门来,声称昨晚 8000 元赔偿费太低,要重新解决。师傅被 A0 带走后,“洒水车”慌了,忙找到师弟熊勇一起去 A 家要人,但被 B 推出了门。无奈,他俩只好开车去石板乡街上请师母潘某某前来解救。唐 E 的弟弟唐富春认为自己同 B 是战友,可前去调解;唐 16 岁的儿子唐双和 19 岁的侄儿唐宇也坚持要前去看望唐辽。10 时许,几人乘车返回金刚煤矿粮店处,恰巧碰上 A、B 人和“老公安”,唐富春下车说:“B,我们是战友,我哥有什么,可对我说嘛……”A 骂道:“说他妈个锤子!”骂完。一拳将唐富春打倒在地。于是一场混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混战的结果是双方皆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因力量稍有悬殊,AS 伤势略重,住进了医院。唐宇也被 A 用铁棍击成脑震荡,按伤情应住院治疗,但因要“交待问题”,医院自然住不成。疯狂的野蛮

熊勇、唐双等人在险胜 A、B 和“老公安”的同时,便注定灾难要降临了。当天下午 2 点一过,在关押他们的办公室隔壁,研究他们“故意伤害警察”的会议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二分局副局长罗禄金一拳插在桌上,先定下调子:“这个事情要认认真真按案子办,如果刑事案子不够,就按治安案处理……”他说得很果断,也很自信——在他看来,办案完全

像捏泥团，可以任意搓揉、随心捏造。什么叫“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办案者的意志就是准绳……

下午 3 点，审讯开始，罗禄金身先士卒走进了审讯室。“你叫什么名字？”他故作声势地问被他“内定”的“重犯”。

“我叫熊勇。”

“哦——你就是熊勇！”罗禄金倒背着手围着“重犯”猫逗老鼠般地转了一圈，突然，他发作了：“龟儿好大胆，竟敢打我的人！”骂后，一巴掌扇得熊勇眼冒金星，接着，又拎小鸡一样揪住熊勇的衣领直往墙上撞。熊勇刚伸手去解放自己被勒得喘不出气的脖子，小腹又遭到了罗副局长膝盖的袭击……

罗副局长在公安学校读大专时学的那几招还真管用，不大功夫，牛高马大的熊勇便被他“修理”得偏偏倒倒，脸呈土色。

“铐起来！”罗禄金朝熊勇又踢几脚，向部下一挥手。

常爱在领导面前露两手的夏新云、王 G 一听指令，忙扑上前“咔嚓”将熊勇锁住。

熊勇完全被“震”住了，他似乎无法理解：这些执法者怎么这么凶蛮，不问青红皂白便打人铐人……

更凶蛮的事熊勇还没想到呢！正当他愤愤然时，忽听一声猛喝：“把裤子脱了！”见夏新云手持皮带虎视眈眈地盯住自己，熊勇不敢违抗，只好将长裤脱至膝盖处。

“不行，把内裤也脱了，趴在桌子上广夏新云用皮带轻轻击着手掌沉声喝令。

熊勇知道今天是在劫难逃了。不过在慢吞吞地脱内裤时，他心里仍纳闷：要打打便是了，还要脱光裤子？

还没容他想明白这个问题，他已被反铐着接到了桌子上，随着屁股上那啪啪的皮鞭声，阵阵钻心的疼痛向他袭来。

“说，是不是唐 E 支使你们去拉人来打警察的？”

熊勇不识趣地照实情答道：“不是呀，我们是怕师傅有意外才去叫师傅来接师傅的……”

“狗日的，不老实！”罗禄金朝熊勇屁股上猛踢两脚，向夏新云、王 G 甩下一道“给我整”的指令后，忿忿而去。

夏新云、王 G 得令，觉得浑身是胆，他们把熊勇按跪在地上，用皮带边打边问：“你们在石板乡研究了些什么阴谋诡计？”熊勇着急地回答：“确实没阴谋诡计呀广夏、王二人大骂他顽固不化，将熊反铐着的手往上提，熊栽倒在地，夏又问，你打了 B 几下？熊答，打

了一下。

“不老实!”皮带又高高举起。熊勇大概不敢冒犯那皮带,忙承认打了6下,以为这下能“坦白从宽”了,不料夏新云说,好哇,你敢打警察6下,我也用电警棍触你6下。说完,抓起桌上的电警棍在熊勇脸上、手上一阵乱触,触得熊勇哭爹号娘,不停痉挛……

就这样,从下午3点到晚上7点,夏新云、王G边打边审,直到取得了“理想”的供词才结束了对熊勇的审讯。

吃晚饭时,罗禄金特别高兴,3个审讯小组都“战果辉煌”,照这样的进度,晚上便可大获全胜。他一边在心里暗暗庆贺,一边听那位姓刘的部下讲审讯中的趣事:“……审讯时‘告花’(某治安员的外员)踢唐宇没踢着,把鞋踢飞了,脚趾踢在桌子上,痛得他抱脚直乱跳……”

听到此,有人笑得嘴里饭菜乱喷,有人边笑边叫:“歪的……‘告花’打人是歪的……”直羞得“告花”无地自容。

罗禄金用筷头“笃笃笃”地敲着桌子:“格老子,打我手下的人,没得他松活了的!”说到这里,他举起酒杯道:“来,我敬大家一杯,今晚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把洒水车等几个理麻完……”说完,他一饮而尽。

被酒精激发出来的豪壮加倍诱发了凶蛮和疯狂。晚饭后,罗禄金一进审讯室就对唐厚模边拳打脚踢边破口大骂:“你龟儿洒水车是罪魁祸首,格老子把裤子脱子,跪倒!”接着,他对夏新云、王G指示道:“不老实就给我弄,打死他还为国家节约几百斤粮!”

为给“国家节约几百斤粮”,夏、王二人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用皮带抽打,用电警棍把唐厚模触得乱滚乱爬;唐被打昏了,他们大骂其装死,提起反铐的手令其跪下,并将80斤重的石锁压在唐的小腿上……

夏新云用肉刑逼唐厚模招供后,又用这种疯狂的野蛮去“支援”其他审讯小组。到审后双的办公室将其鞭打脚踢后,他喝令:“小龟儿,给你夏爷爷跪倒!”唐双苦苦哀求:“叔叔,算了嘛,我是个学生,才16岁,我错了……”夏新云边用皮带抽打唐双边恶狠狠地说:“认个错就想算了,没得那么便宜,跪倒!”唐双刚跪下,夏又喝令:“起来!”刚站起,他又令其跪下。如此反复若干次。

到另一审讯室,这个29岁的警察又以“夏爷爷”的身份对头上缠满绷带的唐宇大打出手……

后来,矿区的工人们回忆说,那天晚上,皮带打人的啪啪声,警棍放电声,被审者的惨叫声,审讯者的辱骂声直响到深夜12点才停息下来。当晚在附近执勤的干警张某某、徐某事后对人说,听到那些声音,我们身上的肉都直发麻,一个劲地打寒颤……

2月11日,熊勇等6人遭到刑讯逼供。1992年8月2日,法医鉴定:唐厚模全身软组织遭暴力挫伤约5.1%,熊勇软组织挫伤约2.92%……

结束语

亲爱的读者，看到这凶残的一幕，你是感到沉重压抑，还是愤恨不平？或是有更深层的思考？

刑讯逼供这种封建法西斯审讯方式是我们社会主义法制决不容许的。然而，侵犯公民人权，践踏国法的暴行却在阳光下发生了。

这种暴行的发生意味着什么？达县检察院查处此案时遇到种种阻挠、刁难又意味着什么？还有那些为这种暴行的开脱、说情、呼号难道仅仅只是一种感情驱使？

有人劝笔者，不要写这个案子，会得罪人的。

我说，如果我们的执法队伍中只有罗禄金夏新云那么几个违法者，如果包容这种野蛮仅仅只是一个感情问题，如果能担保暴行不再发生，如果法制不再停留在个别人的口头上……我决不愿提起这支沉重的笔去撩开那不忍目睹的一幕。
手记忆
之二十一：赌海茫茫

子夜。凄厉的北风卷着垃圾、灰尘扫过空荡荡的大街，倾诉着不可言喻的悲凉。

洪福木然地漫步在大街上，任腊月的寒风抽打他那瘦削的躯体。他腊黄憔悴的脸上挂满了疲惫忧郁，发红的双眼目光呆滞，脑海里一片空白。在那凝固般寂静的夜空下，惟有那五位数的阿拉伯数字像稀疏的星星在他眼前闪烁。

10000 元人民币！

昨天，妻子要到郊外巡诊，临行前把他俩一月的工资和几年来的积蓄全交给了他，并一再叮嘱：快到医院办住院手续，妈的哮喘病不能再拖了。可是，他拿着钱却鬼差神使地进了那间小屋。几小时后，在啼哩哗啦的麻将声中，10000 元钱全部“献菜”。

自“下海”以来，洪福在赌场已小有名气。今晚本想操个大场合，狠狠捞一把好痛痛快快过个年，但不想桅折船翻，遭此惨败。他慌了，懵了——他实在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怎么会输呢？二十九年的人生旅途他可都是鸿星高照，一帆风顺呀！

七年前，洪福从省财经学院毕业分到商业局，一年多就被提升为财会科长。接着有了佳期如梦、柔情似水的恋爱，月老用红绳把如花似玉的儿科医生任玲牵入了他的生活。一年后，女儿晶晶降临，幸福的家庭更添了无穷的乐趣。那时，洪福雄心勃勃，才华横溢，不仅把科内的工作搞得十分出色，闲暇之余，还常挑灯夜读，与笔墨为友。随着他一篇篇作品的发表，人们钦佩的赞叹也愈加热烈。家庭和事业为洪福支撑起了一个晴朗广阔的天地，他的周围风和日丽，祥云缭绕……

但，当麻将这个销声匿迹三十多年的“国粹”在一夜之间又被国人崇为时尚，并成为燎原之势时，洪福的生活出现了可怕的断层：写字台上那盏台灯熄灭了，带着换换脑筋的初念，他结识了“条、万、筒”；接着，上班时他“打一头”后便打道回府，四处约人“搬砖砌墙”；

后来，几元几十元的输赢已不过瘾，“场合”越操越大。洪福一头扎进赌海，流连忘返。他笃信自己是命运的宠儿，在金钱的较量中，赵公元帅定会暗中庇护。一上麻将桌，他便“四大皆空”，惟有赢钱的欲火烧得他眼红耳热。贪婪与才华结合，罪孽便开始在洪福身上孕育。

终于有一天，老局长用嗔怒而陌生的目光将他曾十分信任的财会科长审视许久后，拍着桌子骂人了：“洪福，你龟儿子哪个搞的，接连三个月都把统计表整错！”原本十分善良贤淑的妻子也“横眉鼓眼”了，家庭里那温馨的柔情渐渐冷却。洪福头顶那片晴空垮塌了下来，落寂孤独从此便像眼前这寒冷苍茫的子夜紧紧笼罩着他。

路灯将疲惫的洪福的影子慢慢拉长又缩短，最后完全融入一片稀疏的树荫。他将脸贴在一棵冰冷的梧桐树上，慢慢闭上了苦涩的双眼，冥冥中，他同妻子关于麻将的争论又在耳边响起。

“洪福，为了妈和晶晶，不要打麻将了吧！”任玲的目光里流露出焦灼和哀求，她不忍心看着丈夫掉进魔鬼的陷阱。

洪福却学着电视里“老外”的样子耸耸肩满不在乎地问：“麻将洪水猛兽吗？你能说它不是愉悦身心，陶冶情趣的娱乐吗？”他爱使用反问句式。

“但把它用作赌博时，它便成为罂粟花和鸦片，就好像强身的人参、补血的鹿茸吃过了量能把人吃死一样！”医生想用药理唤醒鬼迷心窍的丈夫。

“真有那么严重吗？真那么可怕吗？”洪福本想还说：“难道没听说‘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吗？难道那么多人都吃错了药？”但自觉理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任玲仍耐着性子劝道：“我们周围因赌博而夫妻离异，兄弟阋墙，朋友反目的还少吗？洪福呀，不吸取教训，总有一天你也会赌掉才气，赔光家财，赌出后悔的。”任玲的话声调不高，却带着无限的凄楚。

想到这里，洪福禁不住揪着头发直往梧桐树上碰，边碰边声泪俱下：“任玲呀，都怪我没听你的话哟，钱输了妈的病咋办，我好后悔哟！”转眼间，洪福突然又有了主意。“不能这样就算了，我要捞回来！”绝望中他抓住了这根稻草，抹掉脸上的泪水后，他坚定地咬了咬牙：豁出去了！

第二天，洪福没去上班。那个一麻袋高两麻袋粗的赌友刘矮子在电话里帮他给老局长请假说：洪福被自行车撞伤，在医院抢救。当老局长心急火燎地带人逐个医院寻找探望他的财会科长时，洪福正同刘矮子、国产老外、李光头等赌友在“老地方”疯狂对峙，直搓得昏天黑地。只见烟雾腾腾的小屋里，叼在四张嘴上的烟头像浓雾中的红灯在不停地闪动，一双双直勾勾的眼里充满了诡诈、猥琐和贪婪，或痉挛抽搐，或战战兢兢，或抖抖索索的几双手忙乱而机械地拿牌、出牌。小屋里不时响起掷骰子的响声，“啼哩哗啦”的洗牌声和压低嗓门发出的“碰”、“糊啦”的狂喜声，但这，丝毫也不能冲淡那沉闷凝重的气氛。

洪福已连赢数盘，可他心里仍怦怦直跳，浑身的血都涌向脑门。在这不论贵贱、官民同赌的场合，财会科长那雍容矜持的风采早就一扫而光，汗珠顺着紧绷的脸直滚，几次把麻将

搓到了地上。怎能不紧张呢？包里那 5000 元的赌本是自己中学老师托他买彩电的钱呀！

这会儿洪福的手气还不错，要万来万，要筒来筒，实在得心应手。当他又一次摸起一个“三条”时，两眼一亮，变了调的嗓音失声高叫：“自摸！”

“洪福呀，你龟儿今天翻梢喽！”刚从“里面”出来不久的李光头把 30 张“大团结”扔过去时酸溜溜地说。财大气粗的个体户刘矮子也下“耙蛋了”：“洪科长，手下留情哟，我自杀了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哟！”国产老外把钱数给洪福时差点没哭出声来。

洪福一边把到手的钱理好，一边拱手。“‘承让！承让！’”心里激荡着一股难以按捺的快慰。点烟时，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包里刚赢来的一大叠钱，暗暗算道：几个小时，就是我两口子一月工资外加一年奖金的两倍，再糊五十盘是多少倍？如果再自摸几回呢？唉呀，简直是……洪福的二郎腿有节奏地晃悠了起来。

又是数因过去了，赵公元帅突然起了偏心，牌桌上风云突变：一直未糊过牌，刚才还把自己那头黄毛揪得乱糟糟的国产老外连连糊牌，战果辉煌的洪福不是给人“放炮”，就是被人“吃起”。赢来的钱已完璧归赵，帮人买电视的 5000 元也支付得只剩两“皮”。他的二郎腿没节奏地乱抖起来。

又轮到洪福坐庄了，看看手上的牌，除一个发字外，其余都是条子，只差一个么鸡就能糊牌。他为之一振，暗暗寻思：这一盘东山再起，捞回输的钱就不来了。他圆睁双眼，紧盯牌桌，屏住气，充满希望地抓起一个个牌，又皱着眉失望地将牌一个个打掉。后来，他摸一个万字，气得又啪地打出，不料国产老外一把按住，兴奋地高叫：“糊啦！”惊得洪福呆了。半晌，他才颤悠悠地问：“是不是糊了哟？”“哪个不是！”国产老外哗地将牌放倒，大家一看，果然糊了。“真他妈的背时！”刘矮子、李光头嘟哝着把钱甩了过去。“完了！”洪福把最后两“皮”钱扔过去时，恨不得一刀砍下自己那只摸起万字的臭手！

天已很晚了，国产老外想鸣金收军了。但洪福一点儿也没有离开的意思。刘矮子挑逗说：“洪科长，你已弹尽粮绝喽，再来就只有赊账了。”“老子家里还有彩电、组合家俱，赊啥子账！”洪福瞪着红得怕人的眼睛吼。他心横了：不捞回来誓不罢休！

洪福已二十多小时未吃未喝，为节约时间，中午只啃了几块饼干，饥肠辘辘，使他精神难以集中，加之惨败后那剜心割肺的刺激，更使他烦躁，牌也越拿越糟，不是东西南，就是三、五、七。随着国产老外他们一次次“糊了”，“自摸”的叫声，他和妻子苦心经营了五年的家产，顷刻间成了赌友们的囊中之物。

洪福耷拉着脑袋走出那间小屋时，天似乎更黑更冷。他无力地倚在门框上，呆呆地望着茫茫夜空，赢钱的美梦连同自己的灵魂，像一缕青烟，正消散在漆黑冰冷的夜色里……

对面高楼里不时传出呼哩哗啦的麻将声，一种鸦片瘤发作般的折磨使洪福困兽样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四岁的小晶晶守在门口，惊恐、焦灼地打量着他。

“爸爸，不打坏蛋麻将嘛，我不要你去！”稚弱的语音里透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洪福忍不住俯下身去抱起女儿，茫然而急促地说：“爸爸不去，爸爸戒赌……戒赌……”

他戒赌已半个月了。春节的前一天，一伙赌友拿着洪福那晚写的“借条”强行抬走了电视和家俱，任玲痛哭一场后，带着女儿和洪福那咳喘不止的老母跑回了娘家。马年的三十晚上，到处都是耀眼花灯，烟花爆竹纷鸣，可洪福却一个人坐在冰冷漆黑的屋里。那孤独凄凉使他产生了几多懊悔、忧伤。

春节后，洪福到丈母娘家，三番五次“检讨”、“保证”产能把妻子接走。几个舅老馆小姨妹还忿忿地要姐姐“同没心肝的赌棍离婚”。老丈人则怂恿女儿“到公安局告他个死不改悔的赌徒”。洪福双膝一软，扑通一声跪在任玲面前，泣不成声苦苦哀求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样重复了两次后，善良的任玲心一软，终于回去了。

那以后，小晶晶自觉自愿充当了家庭警察，专司纠察洪福的赌博事宜。每天，晶晶都提前离开幼儿班到财会科门口“接驾”。下班后，在晶晶的监督下，洪福犯人一样往回走，不得越雷池一步，否则，那风波便难免了。有一天洪福外出办事，晶晶“接驾”时以为爸爸又赌博去了，沿大街哭着到处寻找。洪福刚回家，便被包围，女儿又哭又闹，骂他是说话不算数的坏爸爸，母亲气得指着洪福直喘粗气而说不出话，洪福急得诅咒发誓，费了许多唇舌，才算真相大白。

任玲用心良苦地给丈夫讲了一则古老的故事。她说：1860年，享誉俄国的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德国巴登沉入赌海，三年输光了所有家财。一天，当穷困潦倒的陀氏在赌场听到别人谈论自己的作品时，他的良心突然被自己作品中透发的良知冲击和唤醒，从此脱离赌海，重新开始创作，于是，才有了《魔鬼》。《白痴》等名著问世……

任玲的故事使洪福感动得指天盟誓：我要做第二个陀思妥耶夫斯基！若进赌场就烂手断脚，不得好死！信誓旦旦，其神态庄严，显得真切动人。此后的十多天，洪福真的没去过赌场，他在戒赌的痛苦中挣扎着。上班时，办公室那啦啪啦的算盘声与搓麻将的声音如此相像，诱得他惴惴不安，神不守舍。晚上，他强迫自己写作，但写了很久才发现纸上写满了“么鸡”“三筒”之类，一烦躁，扔下笔摆弄起女儿的积木，突然觉得那些小木块像麻将，气得他把积木甩得满屋都是。他忍不住要去“老地方”，刚跨出门，一想起陀氏，又退了回来，心不在焉地胡乱翻书。

第十六天，他忍无可忍了。“只赌这一次！”半夜，他趁妻子熟睡后偷偷溜进赌场。不到天亮，他将一张5000元的“借条”留给了赌友。懊悔中，洪福又“成功”地戒赌两天。

第三天半夜，在溜进赌场前他自言自语地发誓：“这是最后一次，再赌就遭五雷轰顶！”很快，赌友们将写着10000元总额的几张“借条”装进了衣兜，并通牒他：没现款不要再去。

洪福急了。这一个月，五万多元钱和家俱、电视全被赌友们鲸吞，母亲病重无钱住院，老师几次索要电视款，赌友们催命似的逼债……洪福用拳头捶着脑袋哀嚎：这日子哪个过呀！他觉得自己正坠入一个无底的深渊。

“我们还年轻，只要你能彻底改了，几万元的债务并不是无底的深渊。”妻子流着泪劝诫洪福。但洪福不这么想，他暗下决心：不把那几个无情无义的王八蛋赢得人仰马翻誓不罢

休！

为此，他忘记了饮鸩止渴的危险后果。那天，洪福麻起胆子在单位的基建账目中动了一番脑筋后，20000 元赌资“筹集”到手。当天下午，他请了病假，猫抓心似的溜进了那间小屋。

也许是赵公元帅被他感化，那天下午，他的手气好得不能再好，不仅捞回了以前输的钱，还略有赢利。晚七点，洪福正赢得热血沸腾，一赌友突然闯进来说：“洪哥，不好了，晶晶为找你，在街上被汽车撞伤，现正在医院抢救！”洪福惊出一身冷汗，扔下快“糊”的牌拔腿便跑。

赶到医院，一副目不忍睹的惨状把他惊呆了：晶晶躺在奶奶怀中已咽了气，头上的血迹尚未完全凝固，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半睁半闭，似乎还有什么事使她放心不下。任玲昏厥在床上，几个医生正手忙脚乱地抢救。老泪纵横的母亲抱着晶晶的尸体在一旁急剧地喘气咳嗽，见洪福进去，老人颤抖地站起来，指着他含糊不清地骂道：“孽障，是你……害死了我的孙女……”老人还想骂，但急促的咳嗽使她透不过气来，她晃了几晃后，扑地倒下，抢救任玲的医生又去抢救老人，但，心脏监护器上的曲线在一阵急剧的波动后，呈现出一条平静的直线，受尽病魔折磨而一直未能治疗的老人带着痛苦和遗恨离开了这个世界。洪福如梦方醒抱着女儿扑在母亲的遗体上大哭起来，边哭边挥着手里那一大叠钱：“妈呀！晶晶呀！现在我有钱了，你们哪个就走了呀？”这时，任玲醒来，她睁眼看见母亲和女儿的尸体，尖叫一声，光着脚冲出了医院……

从此，精神病院里又多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女病员，她常把女儿的积木搓得哗哗直响，边搓边高叫：“糊了！”“自摸喽！”听了令人毛骨悚然。

洪福苍老憔悴了，胡须爬满了他那英俊的脸颊，痴呆的目光遮住了他昔日的灵气。在输光了道德、良心和人格后，他的灵魂已无法安宁——他常做恶梦，梦见自己掉进了无底深渊，走进了冥冥地狱。他觉得末日正向他逼近……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今年 7 月，检察院和公安局查出了洪福贪污 20000 元公款与数次参赌的事实。他的名字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花名册上消失了。接着，一辆警灯闪烁的囚车呼啸而来。在接过警察递来的逮捕证的那一瞬间，一丝悲哀涌入了他的脑际：完了，一切都输完了！“

手记之二十二：回来吧，坐台的女中学生阳洋，你在哪里

达州市 X 中初三四班 15 岁的女学生阳洋离校出走的前两晚上，她妈妈刘芳老梦见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地往下掉，落到地上便钻入土中不见了。刘芳把这个奇怪的梦告诉丈夫阳志坚，丈夫说一个梦有啥大惊小怪的。刘芳却心神不宁，她预感家中有事要发生。

女人的预感常常是准确的，事情果然发生了。6 月 12 日 18 时，刘芳到达市 X 中接女儿回家时，老师告诉她，阳洋下午没有到校。猛然间，刘芳不由得想起了那个身上掉肉的梦，不觉一阵心惊肉跳，样机般地大彻大悟：女儿不就是妈身上掉下的肉吗？肉钻入土中不见了莫非那梦在暗示女儿要失踪！她赶紧往公园的欣乐早冰场跑，她知道女儿常爱到那儿溜冰。到欣乐一看，早冰场倒是有二十多个男女学生和社会青年嬉笑溜冰，但没有女儿的踪影。她

估计女儿可能又到哪家卡拉 OK 唱歌去了，以前女儿逃学，就曾在这种地方找到过。但她慌张地找了十多个卡拉 OK 厅，仍然没有女儿的踪影。难道阳洋被人暗害了？这孩子个性强，结了不少冤家对头，有个女学生曾扬言要找黑社会的哥们儿教训阳洋一顿……想到这里，刘芳又到滨河路的树林、河边和僻静的小巷找了个遍……

凌晨 2 点，当刘芳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离市区十余里外的市建筑公司家中时，到处寻找女儿的丈夫阳志坚也刚刚回来，夫妻俩一见对方表情就知凶多吉少，不由悲从中来，掩面痛哭。

第二天，上班时，同事们发现刘芳神情忧郁，两眼发红，便报告了建筑公司经理，在经理的再三追问下，刘芳含泪诉说了家中发生的不幸。经理听后当即作出决定：刘芳的女儿就是公司全体员工的女儿，如今失踪了，是我们全公司的一件大事，保卫科要抽人协助寻找。从今天起，刘芳工资照发，不用上班，专门去找阳洋，直至找到为止。经理一番话感动得刘芳热泪直流。她深深地向大家鞠一个躬，擦着泪水踏上了艰难的寻女之路。

此后的几十天里，刘芳捏着女儿的照片，见人便问：见过照片上这孩子吗？临别，总忍不住声泪俱下地哀求：就当这女儿是你的亲人吧，见到她可一定要告诉我！寻找中，有时渴得嗓子直冒烟刘芳也舍不得喝一杯水，她省下钱买烟买吃的送人，求别人提供女儿的消息。有个“混混”让刘芳给车费他到南外去找阳洋，明知这家伙可能要骗自己，但刘芳还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几十元全给了那个“混混”……

时间在刘芳的奔波和泪水中一天天流逝，失望也在她的哭声和悲伤中增长。找遍了汽车站、火车站和城内数百家私人出租房及所有旅馆、娱乐场所后，刘芳绝望极了，也伤心极了。十多年来，自己含辛茹苦地把阳洋养大，时时为她操心劳神、百般呵护，原来只养了女儿的身，没能养女儿的心，她连个纸条、电话也不留便一去不再回，把牵肠挂肚的思念和无尽的痛苦留给父母……

刘芳的遭遇引起了达城人的普遍同情。在刘芳每天往返数次的公共汽车上，很多驾驶员和售票员坚持不收她的车费。他们说，嫂子，阳洋就是我们的侄女儿，你安心去找吧，不管找多久，我们的车对你都是免费的。6 月 28 日下午，市公安局的小张正在家中休息，听人说有个像阳洋的女孩进了某宾馆，他马上前去找寻。未找到人，他仍不甘心，守在门口，直至深夜 12 点舞厅散场才离去。一天，得知一个叫刘波的小青年与阳洋接触过，刘芳找到他家。刘波的父母听明情况后，千方百计说服儿子讲出阳洋的去向，并让刘波天天去溜冰场、卡拉 OK 厅、夜总会寻找守候。7 月 14 日，刘波终于发现阳洋出现在某夜总会，他马上打电话给阳志坚。阳志坚夫妇赶到那家夜总会时，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他们扑了个空。失望中，刘芳拍打着夜总会的大门撕心裂肺地哭喊：阳洋，我的女儿，你在哪里！无法逾越的代沟里，抽刀断水水更流

在刘芳苦苦寻找女儿的时候，让我们看看阳洋的过去和出走的原因吧。

在阳家，阳洋无疑是一个“公主”。从阳洋降生到这个世界上，阳志坚夫妇便一直围绕着这颗“明珠”转。刘芳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女儿磨豆浆蒸鸡蛋买馒头，十五年如一日的精心喂养使阳洋身体强壮，才 15 岁就冒出了 1.65 米的个子。阳志坚则更迫切地望女成凤。为了实现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为阳家光宗耀祖的目的，月收入总共不过五六百元的阳志坚夫妇

九年间竟花八千多元为女儿转了四次学。此外，在请家庭教师，买收录音机等学习用品方面，他们更是毫不吝惜。他们把自己的毕生心血和女儿的前途全部押在了考大学这个独木桥上，认定女儿的命运舍此无它。

目标愈高，要求也就愈严。虽然认不得那些弯弯拐拐的英文，也不知三角函数、杠杆原理、二氧化锰等为何物，但阳洋回家做作业时，阳志坚夫妇总是专心致志地在一旁看着。学校的作业本、单元测验的试卷他们更要内行一样逐一检查。红叉多了分数低了，阳洋被打骂教训的“劫难”也就难免了。

《女儿经》和“三从四德”是刘芳教育女儿的主要理论依据。她告诉阳洋男女有别，对男人应时时提防，贞洁是女人的立身之本，要以命相护。为“防止坏人勾引”，对女儿的穿戴阳志坚夫妇一律按“朴素”的标准衡量。上初中后，夫妻俩为阳洋定下了几条不成文的规定：考试不准不及格，衣服不准穿得太艳，不准戴耳环，不准染指甲，不准与男同学耍……

这些戒律中有很多条也许都无可非议。小学时期，阳洋都惟命是从。但进入初中后，随年龄的增长和生活面的扩大，阳洋对父母的教育方法和人生价值取向有些不以为然了。父母与女儿的矛盾渐渐显露了出来，逐渐变成一条无法逾越的代沟。

她们之间的矛盾是从“土”“洋”之争开始的。上初中后，阳洋的审美观极快地发生着变化，她觉得父母太落伍太土气了，更令她不能容忍的是，土气的父母千方百计地想把自己也塑造成一个“土包子”。父母按他们的审美观和打扮标准给自己买的衣服穿到学校去实在太掉价太被人瞧不起了。于是，她为“洋气”而不懈地斗争了。买衣服时，阳洋先是撒娇要求母亲买自己喜欢的款式和颜色，刘芳说：不行，这衣服颜色太艳，露得太多，是奇装异服。阳洋便生气了：那你干脆扯块黑布把我严严实实裹起算了！见女儿赌气，刘芳开始让步，买款式颜色基本接近阳洋要求的衣服。阳洋又嫌面料太差。刘芳马上忆苦思甜，这么好的面料还不知足，我小时候穿的确凉就不得了了！阳洋反唇相讥：你才不知足，秦始皇还没穿过的确凉呢……

阳洋以撒娇哭闹赌气等方式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反抗使想束缚女儿言行穿戴的阳志坚夫妇妥协让步。在束缚和让步之间，阳洋人生航向的座标开始偏移了，她背离父母的道德准则和奋斗目标越来越远。她不仅穿裸露肚脐的马夹和能看见胸部的汗衫，还开始穿耳带环，浓妆艳抹，把手指甲脚指甲统统染成红红绿绿。同时，她还学会了抽烟，专抽红梅以上档次的好烟……

大概就是从那时起，阳志坚当初寄托在女儿身上的希望开始在阳洋熟练吐出的串串烟圈中烟飞灰灭，日渐渺茫。对人生价值和理想标准阳洋自有她的理解。她说，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何必被几本破书折腾得死去活来？人生道路千万条，为啥偏要去挤考大学的独木桥？想“明白”后，她更烦上学，烦考试，烦父母“好好学习争取考大学”的要求和自己学习时他们监工一样的陪伴。从此，逃课去溜冰、看录像，不听讲不做作业上课看小说渐渐成了阳洋的家常便饭。后来，连她自己 also 感到奇怪，怎么一上课就打瞌睡，而一翻开小说就来了精神！

醉心打扮放弃学习后，阳洋开始把她的心思和精明用于撒谎。一次，老师给阳志坚捎信说阳洋一整下午都未到校，阳洋却咬定她坐在教室的柱头后老师未看见。为搞个水落石出，

阳志坚带着阳洋到老师那里对质，她才不得不讲出自己逃课去溜冰的实情。通过这次对质阳志坚还发现了阳洋以交磁带款为由骗 30 元钱等问题。阳志坚火了，在教室门口狠狠扇了女儿几耳光。后来，在“个人档案”中阳洋写道：“我最讨厌的事是考试和家长当着众人的面教训我。”

在突破父母众多的清规戒律后，阳洋向阳志坚夫妇的最后一道禁区进发了。初二后的两年内，阳洋共耍了九次朋友，长的两三个月，短的只有三四天，其中有一位“恋人”阳洋都记不起姓甚名谁了。

对女儿的早恋，阳志坚夫妇再也不肯退让。他们在经济制裁的同时还严格控制女儿的时间和行动。每天中午，阳洋不得走出校门半步，午饭由刘芳从十几里外的家中送到教室里。晚上，由阳志坚到教室门口“接驾”，将阳洋“解押”回家。夫妻俩还四处搜集女儿的“情况”，一有苗头便及时采取措施。具叛逆性格和反抗精神的阳洋对父母的制裁限制自然不肯束手就擒，她发起了更加猛烈的“反击”。1997 年 10 月，阳洋吃下 26 片安眠药，以死抗争，将阳志坚夫妇坚守的最后一道防线彻底摧毁……
拜拜了，自由而可怕的“茶馆”

初一时，因聪明伶俐、勤思好学且考试总能在 70 余人的班上稳居前 20 名左右，老师曾认定阳洋是棵苗子。后来，阳志坚痛惜地回忆说：在阳洋的问题上，女儿不争气，家庭也有责任，但这棵苗子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达市 X 中恶劣的校风“化”掉的！

初一下学期，初三的一个女生向阳洋要 20 元的“孝敬费”，阳洋托人说情，那女生才将这笔“孝敬费”免了。过了不到一周，初二 X 班的张欣又要“借”50 元钱，阳洋说了句没有便重重地挨了一耳光。临走时，张欣留下话：不借钱就永远没有完！幸好两天后张欣因毒瘤发作被弄去强戒并于 97 年上半年死于吸毒，那 50 元的“借款”才有了个“完”。

但初二时初三女生吴雯索要的那笔钱阳洋就没能幸免了。那天，阳洋是被吴雯横眉鼓眼地从语文课堂上叫出来的。吴雯开门见山地告诉阳洋，明天给我 20 元钱！阳洋急了，没有呀！这几天爸爸妈妈限制我的零用钱。吴雯挥挥拳头打断阳洋说，少啰嗦，明天不拿 20 元，后天就拿 25 元，大后天就拿 35 元……第三天，阳洋见这钱越涨越多，忙送去 25 元了事。

钱被敲诈后阳洋忍了。她想，就算是蚀财免灾吧。可是，蚀了财却没能免灾。不久，本班的文婷因与三班的一个女生抢男朋友，在阳洋处借一把水果刀去“倒”那女生的威。击败情敌后文婷老不还水果刀，因要削水果，阳洋从文婷的书柜中自己拿走了刀。文婷骂阳洋狗胆包天，敢翻姑奶奶的书柜。因惹不起这位同学们公认的大姐大，阳洋只好忍气吞声。但文婷仍不肯罢休，在纸条上写道：看不惯谁就要打谁。阳洋忍无可忍了，气愤地问：难道借了东西还想打人？文婷马上找来三个女生将阳洋拖到花园里一阵拳打脚踢。打完还说，敢讲出去就见一次打一次。这次挨打，成了阳洋学生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当时，抚着身上的伤痕，受尽凌辱的阳洋在心中发狠地想：我要报复！我也要当大姐大！第二天，阳洋第一次逃学了，她专程跑到爸爸单位在城里培训班学习的几个女孩子那里与之套近乎，想请这几个女孩子帮助自己实施报复计划。但因耍得开心，阳洋竟忘了自己此行的目的，第三天被爸爸揪着耳朵抓了回去。这样，她的报复计划流产了。

阳洋并未忘记自己要当大姐大的心愿。她知道，凭自己的力量是当不了大姐大的，必须

寻求一种保护和后台。于是，她经常在上地理、历史这些副课时逃课，到旱冰场、录像厅去物色“后台”和保护者。在那些地方，她认识了另几所中学逃学的一群男男女女，并结识了市内一些很有“名气”的“混混”，还同黑社会成员刘X的干儿刘春耍起了朋友……

有了后台，阳洋也充大姐大了。她把班上生性怯懦的胡小凤选作欺负对象。该自己做清洁时，她说，胡小凤，去把教室给我扫了。想买零食了，她招来胡小凤，去，上街跑一趟。吃完饭，她把饭盒往胡小凤手中一塞，快去洗了。胡小凤稍有不从，阳洋便非打即骂……

当大姐大的威风和长期逃课居然不被清查的“自由”使阳洋感到惬意极了。很多时候，只要不是班主任的课，阳洋便会大模大样地溜出教室到旱冰场、卡拉OK等地方去快活几小时。每当此时，她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这学校来去自由，还真有点茶馆的味道。

6月12日下午，阳洋溜出“茶馆”，与另一所中学一个叫兰兰的及市内著名“钳工”王亮、陆军等人玩得忘了时间，错过了父亲的“接驾”。见她着急，王亮建议，别回去了，干脆跟我们去南外玩个痛快。阳洋一咬牙说，不回就不回，干脆连学校也不去了！接着，随王亮等人坐进出租车向南外飞驰而去。车过通川大桥时，阳洋忍不住回头朝学校方向望了望，心中默默念道，拜拜了，自由而可怕的“茶馆”。
外边的世界很精彩，也充满了险恶

阳洋在离校出走四十天后终于回来了——是被她父亲阳志坚从麻辣烫摊上抓回去的。两天后，我和《华西都市报》记者刘建国在阳家见了阳洋。这是一个发育早熟的少女。因穿一件紧身汗衫，体态显得更加丰腴，被描过的细眉下一双有神的大眼无忌地打量着我们，胖乎乎的脸上挂着淡漠的神情。我想象她走在大街上一定没有人会以为她是一个只有15岁的孩子。

让她谈谈出走后的情况，阳洋却意味深长地说，外边的世界很精彩，也充满了险恶。我们追问此话的含意，她并不正面回答，而是若有所思地讲起了40天来的经历。

6月12日晚到了南外，王亮、陆军找好一间旅馆后，从某中学叫来三个女学生及其三个同伙，同去的兰兰见势不妙溜走了，阳洋也想走，但被王亮强行拦住说，敢跑就打断你的狗腿。当晚，同居一室的五男四女中有三男三女各同睡一床。

13日，阳洋与王亮确立了“恋爱”关系。见每顿吃了饭王亮都不买单跟人“打横爬”还吹自己很有钱，阳洋嫌他“晃得孬”，15日便提出不要朋友了，在挨了王亮几耳光后，阳洋又投靠了另一伙“混混”的头儿肖明。这肖明与陈兵、秦光头等人长期与很多女孩子“耍朋友”，并叫“女朋友”去包厢“做业务”挣钱供自己享乐。16日，肖明叫阳洋去坐台，阳洋不想去，肖明说，不坐谁供你白吃？挣不到钱小心老子收拾你。

为了不被“收拾”，17日，阳洋只好同陈兵的女朋友孙娟去XX酒楼坐台。那晚，来“耍”阳洋的是一个40岁左右的胖子。“那胖子好骚哟！”讲到这里，阳洋仍很气恼，“一进包厢他就抱住我想做业务，我连推带躲，他很不高兴，连小费都不给，那晚，我只得了30元台费。”

第二天，秦光头让“女朋友”杜丽给阳洋传授“业务知识”。杜丽是万源人，才14岁多一点，小学未毕业便被父母逼出来挣钱，凡坐过杜丽台的男人都说她是小妖精。“小妖精”

开导阳洋，要干这一行，只有先把身子破了，否则做不成业务。她说，一个处女膜可卖一万元。18日晚上，“小妖精”真找来一成都人买阳洋的处女膜，那成都人只给2000元，阳洋觉得离“行情价”相差太远，便拒绝了。当晚又到XX宾馆，领班让她到按摩房“坐炮台”，阳洋说只坐素台。结果，那晚上一个台也未坐成。以后的几天里运气不错，天天坐串还挣了不少小费。每天下班时肖明都来接阳洋，知道这家伙是冲自己的钱而来，阳洋每次都要将钱藏一半。这样，不久她便有了一笔可观的存款。

好景不长。一天，阳洋刚要到XX宾馆“上班”，爸爸妈妈突然找来了，吓得她赶紧坐出租车溜走。7月底，肖明让阳洋到开江县甘棠镇去坐台。那儿是农村，来耍小姐的大多是当地人。这些人很野蛮，进包厢就关灯，抱住小姐乱摸乱吻。

我问阳洋，在这种环境里“上班”，不害怕吗？

她一脸无所谓地说，只要有钱挣，也没有什么。

我又问，你觉得是课堂上的感觉好，还是包厢里的感觉好？

肯定是包厢里的感觉好。阳洋很认真地说，在那里用不着费心地去想课堂上那些令人伤神的问题，也没人守着我做作业，还能挣到钱。

又是钱！我有点烦她了，为了钱就可以把灵魂躯壳都出卖了！

“我出卖躯壳恰巧就没收钱。”阳洋不客气地回敬了我一句。我追问此话的意思，她似乎恢复了一点少女的自尊，略带羞涩地向坐在一旁的母亲看了看，又难为情地朝我笑笑，才像讲别人的事一样讲起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7月14日，阳洋从开江县口到达川市，当时她已结束了与肖明的“朋友”关系，同一个叫洋芋的混混耍了三天，又在麻辣烫摊上认识了林林。林林劝她不要到舞厅去晃，并给她吃让她住，她认为林林对自己好，便与林林同居了，直至22日被父亲抓回去。

阳洋回来了，我们仍然忧虑

写下这个标题，决非杞人忧天。曾听在成都某医院当院长的妻妹夫说，不少坐台的女大学生常到他们那里治性病。某酒楼的朋友还说，在他们那里“上班”的某师校、技校的女学生有人染上了毒瘤。而公安的一位朋友则告诉我，他97年下半年就在包厢里抓了两名与人淫乱的某中学女生……我相信如果有人作一次专门的调查统计，其数量会远远不止上边那点。

我面前摆着十个女中学生填写的“个人档案”，内容如下：爱好：吃喝玩乐，耍男朋友，干些无聊的事（六人填写）

最向往的地方：美国、日本、舞厅（四人填写）

最喜欢的人：自己的老公（二人填写）

最讨厌的人：所有的臭男人（一人填写）

对Hate（憎恨）的人：我会杀了他（一人填写）

最爱说的一句话：管你球事，你是啥东西（三人填写）

虽只是 10 名女中学生的“个人档案”，但其理想道德观及人生价值取向却可见一斑。我在担忧：这些“爱好吃喝玩乐向往美国、日本、舞厅”的孩子们，还能代表 21 世纪的中国人吗？凭她们的素质，我们的国家在这一代手中又将变成什么模样？

采访时，明知阳洋在市刑警大队被传讯时就表示不想回家，我还是问：如果不被你爸爸抓住，你会回家吗？

她想了想说，也许不会回来。舞厅里有吃有喝，唱歌跳舞睡觉全有人解决，我一个月还挣一千六、七百元钱。真有些乐不思蜀了。

阳洋的话中透出了“占便宜”后的得意和满足。但她可能永远也不会想到，正是那些给他们“便宜”的老板们用廉价的“便宜”将一群无知的少女诱人贼船，使之成为他们的摇钱树。

这些天，因写这篇稿子，我曾专门到几家舞厅观察过，看到那些一脸稚气，乳臭未干的少女们背背小包成群结队地出入舞厅，我就在想，她们是不是学生？即使不是学生，也还是少女呀！伟人说他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人们也常形容她们是祖国的花朵，怎能让“太阳”在八九点钟就陨落？怎能让“花朵”在十几岁的花季就凋谢！“太阳”陨落了，“花朵”凋谢了，我们的国家还有希望吗？

我在心中默默呼唤：回来吧，误入歧途的少女。回来吧，坐台的女中学生……
手记之二十三：技师的父爱迷失在贼道上

本案的主人公无法避免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在他的潜意识里，隐含着一种人生的错误和不幸：28 岁时还光棍一条的顾元超偏偏求儿若渴，在心中顽固地存留着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情结。为了这情结，他两次结婚离婚，经历了婚姻的挫折和痛苦；遭受了腐败厂长的敲诈，遭遇了下岗的迷茫和苦闷。下岗后，这位有着技师职称而无收入来源的鳏夫如牛负重，含辛茹苦地养育着爱子。为了爱子，在“知天命”之年，顾元超迷失于贼道，成了一名囚犯。1998 年 10 月 6 日，在接过法院以盗窃罪对其拘役 6 个月的判决书时，他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捶胸顿足地骂自己不该结婚，不该有那份传宗接代的奢望……他求儿若渴，却娶了个不要孩子的老婆

结婚、生儿育女本是人间饮食儿女们的正常愿望。当初，顾元超也有这种愿望。令他感到悲哀的是自己只生活于愿望之中。七十年代初，顾元超那老爱讲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并率先生有三男四女的父母见儿女们大多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时，开始像热锅里的蚂蚁一样为儿女们张罗婚事。几年间，好心的媒人给顾元超介绍过十多个对象。开初，姑娘们见顾元超虽只是机械厂的一名钳工，但小伙子憨厚正直、朴实勤劳且一表人才，大多有点一见钟情。不过到家中去看两间摇摇欲坠的破瓦房内那群衣衫褴褛、哟哟待哺的弟妹和吃了上顿愁下顿的窘境，姑娘们又一个个知穷而退了。贫穷像驱逐不散的乌云一样笼罩着顾家池一次次使顾元超早早结婚、多多生儿育女的希望变为泡影。

1978 年下半年，终于有人屈尊肯嫁给顾元超了，但为长子婚事已心力交瘁的父母却难以接纳这个叫程秀丽的女人进入顾家。读过几天私塾的父亲说，程秀丽不秀更不丽，倒有些像登徒子之妻，其貌丑陋、矮小瘦弱不说，还长着一双罗圈腿。这模样与英俊潇洒的顾元超反差实在太大……

在家人的反对声中，顾元超却违背父母之意应允下了这门亲事。他担心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他怕失去了程秀丽会错失传宗接代的机会，已被婚姻折腾得神魂颠倒的顾元超穷不择妻了。他劝父母，管他的，人五点没啥，只要她能生儿育女就行。

但这个丑陋的程秀丽并不想生儿育女。新婚之夜，她便开导顾元超说，你父母生儿育女弄得家贫如洗，害得你快 30 岁了才结婚，可见孩子是累赘，我坚决不要孩子！

家庭的境况使顾元超自觉气短，虽说服不了妻子，但他并未放弃要孩子的打算。他将妻子从街道居委会领回的避孕套统统用针悄悄刺穿。不久，程秀丽惊诧地发现“有了”，一检查避孕套，她连呼上当，哭闹着要去搞人流。顾元超以为已生米煮成熟饭了，妻子不过说说气话而已，但过了几天，程秀丽告诉他，肚子里的“东西”已流掉了。

顾元超一听立即气急败坏，与程秀丽发生了婚后的第一次“战争”。此后，他天天吵骂说，喂只母鸡还下个蛋呢，娶个女人不生娃儿要你这女人干啥？若不愿生孩子便从顾家滚出去！程秀丽似乎并不怕滚出去，一年多过去了，她仍未让顾元超当爸爸的愿望得逞。

顾元超变得日益忧郁伤感起来。特别是看到别人的孩子膝下承欢时，他更是心急火燎。他常常忍不住抱抱邻居的孩子，在对别人孩子的爱抚中寄托自己的父爱。他还专程到几十里外的古庙里，跪拜在佛像前虔诚地献上一炷香火，求神录保佑自己能早得贵子。

烧香求神又是一年过去了，顾元超仍未能得到“贵子”。他感到奇怪，很久都未使用避孕用具了，妻子怎么还没有孩子？经暗中观察，顾元超才发现妻子一直在服用避孕药！

家庭“战火”再起。这场因生育权而爆发的夫妻之战进入到快瓦解这个家庭的危险期时，才由程秀丽的母亲出面调停而宣告结束。

不久，程秀丽又“有”了。顾元超一下变了个人似的，见了谁都乐，是男人就发烟，是小孩就买糖，看那样子要是有钱，他肯定会来个普天同庆。在家里，他更是个表现良好的模范丈夫，包揽了全部家务不说，对妻子也常是一片惜香怜玉的柔情。他不让妻子做事，担心太劳累了会导致流产；他不让妻子有半点不高兴，他说孕妇的情绪会影响小孩的性格。他要程秀丽“就像地主婆娘一样给我好好养着”。为了让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能加强营养，他倾其所有积蓄买鸡买肉。听说吃鱼对胎儿有好处，不管有多忙多累，也不管天晴下雨或风吹日晒，他都要挤时间去钓鱼。1981 年 5 月 1 日，程秀丽生下了七斤重的男孩。这个取名为顾然的小男孩的降临并没能粘合本有裂痕的父母关系，相反，顾然成了这个家庭解体的催化剂。生下顾然后，程秀丽以家庭功臣自居，家务不做，饭菜差了不吃，脏了的衣服不穿。更令顾元超不能容忍的是程秀丽不管孩子的吃喝拉撒，顾然尿床了，她视而不见；顾然哭了，她充耳不闻。顾元超出钱让程秀丽给孩子买衣服，她却给自己买了双皮鞋。顾然刚出生几个月，她便常常又打又骂，甚至拒绝给儿子喂奶，害得顾元超只好天天给儿子磨黄豆煮稀饭……

为顾然，顾元超与程秀丽常吵闹打架。每次吵架后程秀丽便迁怒于儿子。母亲的不爱伤害着儿子幼小的心灵，也渐渐使顾然在父母之间形成了鲜明的爱憎。每次吵架，顾然总是站在父亲一边攻击妈妈，阵线十分鲜明、九十年代初，《世上只有妈妈好》的儿歌风行全国，但顾然总唱成世上只有爸爸好，并且，一唱此歌小顾然总是眼泪汪汪……

1991 年，这个家庭因孩子的问题终于解体了。根据儿子的要求，顾然被法庭判给了顾元超。
发廊里的浊水冲走了儿子的母爱

一个不爱儿子的母亲离开了家，顾然的生活中虽然没有了吵闹打骂，但中年失妻幼年失母对顾元超父子毕竟是一种不幸。顾然虽知道妈妈不爱自己，但他觉得：光有爸爸没有妈妈的家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光有父爱没有母爱的爱是残缺的爱。

渴望母爱是人的一种本能。顾然多么想像其他小朋友那样，在静谧的夜晚撒娇地坐在妈妈的怀里数天上的星星，没完没了地问月亮里的人影、白兔，由妈妈牵着进电影院，逛公园……

尽管这一切在顾然的亲妈在时也只是一种奢望，但那时衣服破了，还有人缝补，每天的饭菜还能有滋有味。自程秀丽去后，顾元超又当爹又当娘，家里的一切都乱了套：每天早上起床，顾元超买些东西让儿子胡乱吃后，父子俩便各奔学校和工厂；中午、晚上由顾元超主厨的饭菜不是忘了放油便是多放了盐，不久就把顾然喂得面黄肌瘦。顾然的衣裤破得迎风飘扬了，见父亲忙不过来，他只好自己动手缝补，小手常常被针锥得鲜血直流顾然默默地忍受着生活的艰辛，但他却不能忍受因没有母亲而受到的歧视。一次，他不小心踩坏了邻居一个蜂窝煤，邻居大骂他是“有妈生无妈教的杂种”；因不要同学抄作业，那同学挖苦他“你虽聪明，可惜不是人生的，是像孙悟空那样从石缝里蹦出来的”。这些恶毒的咒骂深深地伤害着顾然幼小的心灵，他哭着求顾元超：把妈妈找回来吧，我要妈妈！好几次，顾然在梦中大声呼喊：抱抱我！抱我呀……

儿子的哭求和呼喊使常望着低矮的屋顶不能入睡的顾元超震动了。这个本欲独善其身与儿子相依为命的汉子知道：儿子渴望母爱了。自己应给儿子找回母爱。

1992 年冬天，经人介绍，一个叫江英的女人走进了顾元超父子的生活。身材高大、模样俊美的江英适年 23 岁，说不清是这个温柔善良的女子同情顾元超父子的不幸，还是看中了顾元超有技师职称可以解决自己户口入城的好处，她毅然进入了那间底矮破旧的房子，充当起了妻子和继母的角色。

顾然默默地观察着这个有些像大姐姐的妈妈。他很快发现后妈比亲妈更勤快，更爱清洁。刚进门，她便洗净了那些黑漆漆的被盖，扫尽了屋角的蛛网灰尘，将一个乱七八糟的家收拾得整整齐齐，并生上一炉火，使这个寒冷的家一下充满了温馨。

更让顾元超感到放心的是：江英待儿子比程秀丽强多了。她用自己以前打工赚的钱给顾然买了新衣裤、新书包，还买来毛线给儿子织毛衣。每天上学放学她都去接送顾然。那年冬天，顾然的脚生了冻疮，每晚，江英用热水给顾然泡洗后，再解开衣服把顾然冻伤脚捂在怀里。依偎在继母的怀里，顾然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他用小手摩挲着后妈年轻好看的脸深情地说：妈妈，你就是我的亲妈！

见后妻呕心沥血地支撑着家，顾元超也抓紧办理妻子的农转非户口。厂长很热情，说，你是技师，按政策肯定是应该解决的。不过，先等等吧，我忙过这一阵一定找人给你办。可是厂长总是“忙”不完，等了一年多；江英农转非的事仍无动静。顾元超找上门，厂长总说，难呀，再等等吧。一次，顾元超提着烟酒又去找厂长，厂长有些生气了；你以为转户口就那么几条烟几瓶酒就行了？得打通很多关节！先拿四五千元来，我去帮你活动吧。

厂里效益不好，离婚结婚又用了一大笔积蓄，顾元超东拼西凑也未能拿出厂长说的那个数，所以厂长也就一直未去“帮忙活动”。几年过去了，江英农转非的事依然渺茫无望，一气之下，顾元超从机械厂辞职应聘到了一家食品公司。这家公司效益也不好，常发不起工资，江英便炒瓜籽去卖，有了积累，又开了一家面馆。虽苦点累点，却把家搞得红红火火充满生气。

但好景不长，95年下半年，面馆被当初答应帮忙转户口的厂长以影响厂容为由给封了。面馆被封，一个家庭的生存之路也就被堵死了。顾元超的收入远远无法维持家庭的起码开支，为减轻丈夫的负担，江英悄悄去发廊“上班”了。当她发现这发廊是肮脏之地准备退出时，却被一个醉鬼强奸。发廊老板以此要挟江英，说江英不在这儿“上班”，就要把这事告诉她丈夫。

江英不想失去丈夫和那个她费尽心血经营起来的家，只好继续“上班”，结果越陷越深，当顾元超发现妻子悄悄在发廊“上班”时，江英已染上了性病。这结局犹如一声惊雷，震懵了顾元超，也震碎了这个家。已上初中的顾然哭着求爸爸不要赶走妈妈，但顾元超愤恨难忍，怒吼着要妻子滚。江英哭着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家……
父爱迷失于贼道，覆巢之下可有完卵

第二次婚变像一盆冰水浇熄了顾元超心中的希望之火，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他又遭遇了下岗。没有了妻子这个家破残不堪了，没有工作，生活更失去了依托。贫困的生活把顾元超塑造得更加沉郁自卑和冷峻，他对人生、对命运、对家庭、对未来心灰意冷，痛不欲生。他恨透了那不按政策给自己女人转户口并封了自己面馆的厂长和拉自己女人下水的发廊老板。他打算与厂长和发廊老板拼个你死我活后再了结此生。当他把家中最后50元钱给儿子压在桌上带着刀准备去寻找仇人时，顾然从学校回家了。见父亲手握菜刀，满脸杀气，顾然似乎明白了什么，他抓住顾元超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爸爸，你要到哪里去？你走了我怎么办！

儿子的哭声惊醒了顾元超，是呀，自己与人拼了命，留下14岁的儿子怎么办？如今，妻子走了，工作没有了，钱财没有了，四十岁的人就只剩下这么个儿子，他才上初三，今后谁供他吃穿供他上学？谁给他找工作？自己不是为了这个儿子才落到这一步吗，现在怎能扔下他不管！

想到儿子，顾元超的心软了，他放下刀，抱着儿子痛哭起来。他抚着儿子的头说：然儿，爸爸不会扔下你不管，好好读书，爸爸就是拼掉这条老命也要供你念大学！

从此，顾元超父子相依为命。在贫困和磨难中长大的顾然很懂事，知道家中困难，生活全靠父亲打工维持，他把住校每月需要的300元主动降到200元。一次，听邻居说，爸爸很多时候都是每日两餐，有时还一天吃一顿，一个月难得吃一次肉。顾然知道后，他开始压

缩自己的生活费用，原来每星期吃一次肉改为半个月或一个月吃一次肉，每天早餐也被省掉，每隔半月，他用节省下的钱割一两斤肉，悄悄给父亲留在家中。冬天到了，见父亲仍穿着双破凉鞋，顾元超将自己准备买绒衣的钱给父亲买了双棉鞋。捧着儿子买回的鞋，顾元超热泪盈眶，感动不已。

更让顾元超欣慰的是儿子每学期都能捧回一张名列前茅的成绩单，老师说顾元超天资聪明，只要努力，今后考上大学是不成问题的。为此，顾元超又高兴又着急，供儿子上中学他都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了，今后怎供得起他上大学？97年，顾元超考上了高中，需各种费用1500元。为筹积这笔费用，这年5月，顾元超便前往广东打工，结果，由于视力不好，晚上加班画图出了误差，造成了材料损失，不但未领到工资，还赔了一笔材料损失费。身无分文的顾元超只好偷偷爬上回达川的火车。查票的来了，他便钻到座位底下躲着，饿了，他便一个劲地喝开水。回家后，还未恢复长途归来的疲惫，顾元超马上又投入紧张的打工：冒着烈日到火车站帮人扛行李，到工地上安水管粉墙壁，走家串户修热水器修电风扇，累死累活地干了两个月，顾元超才为儿子挣到了400元的学费，他急得团团转。

见父亲为难，顾元超流着泪说：爸爸，我不上高中了，我也和你一起去打工。顾元超心如刀绞，怎能不让儿子上学呢？自己当初不就是为了有个儿子能传宗接代，光宗耀祖吗？为了顾元超，自己经历了那么多风波曲折，吃了那么多苦，遭了那么多罪才把儿子拉扯大。现在正是儿子能不能成才的关键时刻，怎能让他去打工而毁了他的前程？

顾元超开始砸锅卖铁了。他卖掉了家里仅有的大衣柜，卖掉了自己稍好点的衣服，然后又去医院卖血。医生见他枯瘦如柴，面色蜡黄，怕出人命，任顾元超怎么求情也不敢拍他的血。顾元超无计可施了。他忧心如焚，常坐在门口发呆，为儿子的学费他似乎一下苍老了许多。

古人说，饥寒起盗心。一天，顾元超发现邻居开着门出去了，突然，一个邪念攫住了他：何不趁机偷点钱给儿子做学费！

后来，顾元超交待说：贫穷使我失去了气节，当时，罪恶感和对金钱的强烈渴求折磨着我，真是痛苦极了。我不敢相信，一个技师竟会萌发盗窃的念头，更不敢想象走上盗窃之路后的结局。但想到儿子读书需要钱，如果我凑不齐这笔款，他也许会失学，会因此而断送一个美好的前程。为了儿子，明知我将步入地狱，但我还是壮着胆子进屋，从邻居的箱子里偷了1600元的存折也许是罪恶感造成的恐惧，也许是良知犹存，他只从存折上取走儿子还差的学费1100元，给邻居留下了500元。1100元给顾元超带来了6个月的劳役之灾。

顾元超被捕后，顾元超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他不能接受这个耻辱的现实。在顾元超的心目中，父亲是善良正直勤劳质朴的，怎么会一下由一个技师变成盗窃犯呢？当知道父亲是因为自己上学而沦为盗贼时，他更是心如刀绞，恨自己拖累了父亲，后悔自己不该上高中，害得失去了最疼爱自己的父亲。顾元超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忧郁暴躁，三个月内为些小事竟与同学连续打了几次架。成绩也不断下降，还常逃学游荡于电子游戏厅、录像厅等场所。

顾元超在监狱里知道这些情况后十分着急，这位技师忧心忡忡地说：覆巢之下可有完卵？但愿在出狱时我的顾元超没有变坏……

手记之二十四：捣翻贼们的“多米诺骨牌”

8 个小时过去了，讯问毫无进展。达县公安局一级警司刘涛和他的搭档喻少贵、赵静等人烦躁地不断抽烟，审讯室内烟雾腾腾。

那份只记了个开头的讯问笔录十分扎眼地摆在桌上，上边写着：讯问时间：1998 年 4 月 5 日。

被讯问人：杨家权，男，27 岁，小学文化，住达川市西外镇塔坨村一社，农民，1992 年因盗窃被判刑一年半，1995 年因盗窃被判刑半年，1998 年 4 月 5 日因盗窃嫌疑被拘留……

这“三进宫”的经历告诉人们：不管是盗窃还是对付警察，这个叫杨家权的都是一把“老手”。

眼下，这“老手”嘟嘟囔囔地抗议警察“平白无故抓人”，还说，拿不出证据就坚决不回答任何提问。他说得很严肃，也很自然，那坚定的语气和不屑的表情不由让几位讯问者在心里直嘀咕：这个贼道老手把“活儿”做得干净？或他真已改邪归正？抑或掌握的情况不准？

《警察与小偷》中有句台词说，最熟悉小偷的人是警察。虽未打过交道，但杨家权对刘涛来说也算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了，早在一年前侦破王传贵特大彩电盗窃案时，杨家权的贼影便映入了刘涛的脑海。此后，他为杨家权记下了这样一份罪恶档案——“上路的”（在客车上扒窃的）王某交待：去年春天，杨家权曾在一个学校做过一次大业务。与杨家权关系甚密的刘某供称：杨家权不仅搞“唱歌跳舞的”（偷彩电），还偷过不少“小滚滚”（偷摩托）。而李美洪则准确地交待出了杨家权在达川市小红旗桥。61 队等地“做烟、酒业务”的时间、地点及赃物去向……

杨家权对自己干的这些事概不认账。审讯从一开始便进入对峙状态。

僵持中，刘涛再次仔细地审视坐在对面的杨家权。这是一个相貌平平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年轻人：长长的中分发型把无肉的长脸和特别尖的下巴显得更瘦，嘴、鼻、耳等器官虽无什么特别的特征，但扫帚眉下那双黑少白多的三角眼却能让人过目难忘。此刻，刘涛发现那双三角眼正忙碌地向室内、门口等处膘来膘去，而浓黑的扫帚眉则紧锁不展，天气并不热，污浊的汗珠却不断从长脸上滚下……

这些在常人看来极不起眼的情况却使刘涛两眼一亮：这家伙表面镇定强硬，但内心却紧张恐慌！他是想用沉默来遮掩罪行。眼下，应加快审讯速度和频率，使其无暇思考对策。于是，刘涛再次发起攻击。讲法律，讲证据，讲刑法有关只要证据得力，本人不认罪也可判刑的规定，讲坦白从宽的例子。

渐渐地，杨家权不那么满不在乎了。他坐直身子，听得很专心，那双三角眼还不停地转来转去，后来，他突然举起手叫道：报告刘警官，我要彻底交待！顿了顿，他慢慢道：去年 5 月 10 日，我在黄泥确偷过两部自行车，卖给了火电厂张哥。他越说声音越小，头也垂得更低，后悔得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经核实，这“诚恳”是虚假的。去年5月10日，黄泥硫根本无自行车被盗。而火电厂的那位“张哥”一听便嚷嚷开了：碰到个鬼么哪个的，哪个龟儿才买过他的自行车！

杨家权的撒谎使刘涛心中更有了底。再次提审时，他不恼不火地问：杨家权，你已“进去”过几次，也应是个明白人了，想用偷自行车这种治安案件来胡弄我们一下就算了？

杨家权脸色骤变，眼中充满了戒备。他分辩道：刘警官，你这就冤枉好人了，我可是老老实实讲的，我肯定没有干过“大事儿”……

凭经验，刘涛知道，大多数被讯问者都有一种因畏罪而防御抗拒讯问的本能，当其神经都集中在他的主要防御点上时，正面的强攻往往事倍功半。此时的讯问技巧应是：干扰其兴奋中心，使其精力分散，然后再突然直捣其松懈的防御点。

于是，刘涛改变了追问方向。“杨家权，你平时与哪些人接触最多？”

漫不经心的语气和不牵涉实质问题使杨家权紧张的神经逐渐松弛下来，他拢了拢大分头答道，与周一清、李美洪、曹志平，还有王传贵等人打交道的的时间多些。

知道这几个人现在在哪里吗？

听说在广元、万源等地劳改。

知道他们为什么事劳改吗？

“因为盗窃……但他们的盗窃绝对与我无关！”杨家权似乎察觉到了问话的意图，赶紧反攻：“你总不能因为我与他们有往来就认定我也是盗窃犯吧！”

刘涛并不理会杨家权那些不打自招的辩解，仍顺着审讯思路继续往下讲：杨家权，犯罪可以保密，但不保险。你想想，几个人作案，现在，你那几个兄弟都栽了，谁不愿坦白从宽少坐几年呀，你真要把立功赎罪的机会都让给他们？

听着听着，杨家权心里发毛了：是呀，别看大家常在一起吃喝嫖赌、称兄道弟，但到了关键时刻，说不准谁都会互相出卖而“立功赎罪”。96年腊月30晚偷彩电的事当时不就差点被周一清给“抖”出去了吗？

那晚，达川市内戒严，杨家权不敢出门。凌晨2点，长期在一起“做业务”的周一清、李美洪到家里把杨家权叫醒，说他们在达一中弄了四台51英寸的黄河彩电，李美洪个子小抱不出围墙，要权哥出山帮帮忙。杨家权一听便吼了起来：你们吃豹子胆啦！城里正戒严，多危险。周一清得意地说，权哥，这你就不懂了，最危险的时候，其实最安全。杨家权同其出门后，见外边月黑风高、寒气逼人，整个达城都进入了梦香，不觉暗喜：现在果然是“做业务”的好时机！但为了谨慎起见，他带着周、李二人先在城里转了一圈，见戒严的武警、公安确已撤走，并探听到达一中大门口值班室内已鼾声大作，这才从铁门翻进去，七手八脚地将彩电从围墙上抱出。凌晨5点，杨家权同父亲杨XX将二台电视运到大坝乡销赃。几天后，又将另二台卖给大竹的亲戚，共获赃款2800元。原本说平分此款，但李美洪前要去钱

时，杨家权为独吞此款，谎称周一清已将他们二人的钱拿走。因未得到钱，不明底细的李美洪还砍了周一清一刀。周一清当时就发狠地怒骂：老子不把他杨家权“抖”出去就不是人养的！

想到这里，杨家权打了一个寒颤。他盘算：与其被人卖了，还不如自己立功赎罪。他抬起头，见刘涛、赵静、喻少贵正紧盯着自己，目光中透出的威严像一把把锐利的钢刀刺来，他打了一个寒颤，慌忙把头低下，但他的表情却发生着变化：脸渐渐涨得唯红，额头的青筋暴得老高，后来，他忍不住再次抬起头膘膘赵静等人，又盯盯刘涛，嘴微微动着，但没发出声来。

刘涛领悟了杨家权这一连串表情的内涵：这家伙要“吐”了，但他不愿当着众人的面讲。

果然，当刘涛用眼色支走赵静等人之后，杨家权扑通一声跪在刘涛面前把头在地上磕得咚咚响：“刘同志……不，刘叔叔……不，不，刘警官！”杨家权急得不知该怎么称呼这位外表和善却又厉害得令人生畏的警察。情急之下，他从地上爬起来，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才说，是这样，刘警官，我是有一些事儿，但我不想坐牢，我家里有老婆孩子，我这脚前不久又被人整断了，到监狱里受不了那罪。这样吧，帮我消消灾，给你 3000 元……

“3000 元？”刘涛看看门口，又审视杨家权半晌才说：“钱这东西好呀，但要我替你消灾，你得把实情先告诉我，看我能不能消得了这灾。”

杨家权疑惑地看了看刘涛，又眨巴着三角眼想一阵后才可怜巴巴地说，刘警官，我的小命就捏在你的手心里，我把“唱歌跳舞”的事儿讲了，你可要讲信用！

刘涛递过一支烟，杨家权猛吸几口后，开始讲起 96 年腊月 30 晚的“事儿”。

核实追赃的情况证实杨家权的交待基本属实。但凭直觉，刘涛认为杨家权还有盗窃摩托的重大嫌疑。

这种直觉是有根据的。首先，杨家权会开摩托。其次有人看见他曾多次骑着不同的摩托在城内兜风。更重要的是杨家权的“档案”里已有偷“小滚滚”的线索。

5 月 10 日，将杨家权从拘留所提出后，刘涛开门见山地告诉他，你“唱歌跳舞”的事还未交待完，我又了解到你还有偷“小滚滚”的事，这样一来我可不敢保证今后能宽大你。杨家权一听急了：刘警官，你可要讲信用！我家里有老婆孩子，我这腿……

刘涛打断说，讲信用可以，你把偷摩托的事讲清了，结案时，我一定建议给你一个宽大的处理。否则……，说到这里，刘涛戛然而止，表情冷峻地审视着杨家权。

杨家权受不了这种审视，他避开刘涛的目光，不停地喝水，不断地要烟抽。刘涛发现：杨家权端茶杯拿烟的手抖得越来越厉害。他知道，这家伙心里的“鬼”又在“打架”了。

他耐心等待着。杨家权喝下三杯水抽完第五支烟后，将烟蒂在烟灰缸里使劲捏熄，发狠地说，我全讲了，刘警官，你可要讲信用帮我哟。

他说，我前次交待的偷二辆自行车，实际是两部摩托车。去年 3 月的一天晚上，我与李美洪在市天然气公司的楼下，将一辆嘉陵 125 型摩托的丝尾线扯断，硬搭起火骑出来，扔掉牌照后，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横冲直撞几个来回才骑回家藏起来。后来，以 1800 元卖给了么塘乡的孙 XX。5 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同李美洪、曹志平在月亮食品厂又用同样的方法偷了一辆鹿城牌 90 型摩托，以 1800 元卖给了渠县安北乡一个姓李的。钱全被我们几个赌博、坐包厢耍小姐、吃喝挥霍完了。

经查实，杨家权的交待是真实的。杨家权也因自己交待了真实的“事儿”而天天让看守催刘涛给他“办从宽的手续”。这位自以为高明的贼道老手却没预料到自己的“多米诺骨牌”已被警察捣翻——提赃时，么塘乡孙 XX 买下的嘉陵 125 型摩托因无牌照和行车执照等证件，被河市派出所扣押。办案人员取证时，派出所的内勤告诉他们：杨家权还卖了一台五羊 125 型摩托给河市镇何 XX，因无证件，也被所里扣押。

从河市提赃回去后，杨家权立即被提审。刘涛刚问了句“你卖给河市镇何 XX 的摩托是从哪里来的”，杨家权惊得一下从椅子上蹦了起来，两眼直愣愣地盯着曾希望为自己消灾的人，在心里暗暗地骂道，妈的！想他帮我消灾，他倒把灾给我越弄越大了。他恨得把牙咬得格格直响，但又不敢不讲，他怕前“功”尽弃，他怕同伙讲了自己“劳而无功”。在恨和怕的折磨下，他无可奈何地交待说，卖给何 XX 那辆五羊是 97 年 9 月底的一天晚上同燕富奎从达川市工商局车库里偷出来的。

这燕富奎乃渠县涌兴人，23 岁，97 年 9 月因与达川市 19 岁的窃贼陈秀章在达川市某商店偷布匹被判刑半年（陈被判一年半）。98 年 4 月，燕富奎刑满释放后在达县大礼堂外摆了个配钥匙的摊子。5 月 12 日，他被“请”了进去。从警察的问话中，他知道杨家权也已“进去”了，是因与他一起偷摩托的事儿被发现了，但他不知道是哪一次被发现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觉得偷五羊 125 型摩托的“活”做得很干净，不可能“穿帮”，于是，便交待了他认为杨家权可能已“吐”了的那辆摩托。他说，的年 8 月 15 日，我与杨家权进城赏月。后半夜，街上的舞厅里还隐隐约约传出一阵阵歌声，我们想进去找个“鸡”耍一耍，但又没有钱。杨家权说，他以前看见达县防疫站的院内停有一辆嘉陵 150D 型摩托，弄出来卖了，耍二十个“鸡”都用不完。我表示赞成，便与杨家权溜进了县防疫站，刚要偷摩托，有个人从外边回来，他很警惕地查问我们深更半夜在干什么。杨家权急中生智，说我们得了性病来找医生弄药。那人放松了警惕，不耐烦地说，得性病该背时，弄药明天来！说完便上楼去了。他走后，我俩说，你们的摩托遭偷了才该背时！我们边说边笑着把摩托弄了出来。当晚，我俩把那辆摩托以 1850 元的价卖给了宣汉姚 Xx。交待完偷摩托的事，为了证明自己的老实，燕富奎还交待了自己 97 年 9 月与陈秀章将地区电力公司库房价值 9000 余元的漆包线偷出卖给某废品收购站的事。

同一天，在川东监狱服刑的陈秀章被提审，见“老账”被翻了出来，他只好交待。令办案人员意外的是，陈秀章不仅交待了偷漆包线的事，还交待了 97 年 9 月的一天，他与杨家权在张家湾家属院内偷过一辆嘉陵 125 型摩托，以 1000 元的价销给了复兴乡张家坪二社的黄 XX。当天晚上，接过燕富奎、陈秀章戴着手铐受审的照片时，杨家权的眼睛再次发直了，很久，他才回过神来。他将刘涛叫到一边悄声说，刘警官，这样再挖下去不是要我的脑袋吗！别再问了，公家该怎么罚款就怎么罚，我再赞助你私人 5000 元！

刘涛用手势制止住杨家权说，得这么多脏钱，要是被纪检。检察发现了，我这一辈子也就完了。即使不被发现，我也觉得亏心，提心吊胆过日子反倒受折磨，还是安心领我每月那几百元吧，虽然少，但细水长流。你就不要操心赞助我的事了，还是把你的事讲清楚争取宽大处理吧！

一席话让杨家权沮丧之极，也害怕之极，他实在不甘心输得太惨，不讲，又怕真“严惩不贷”。权衡犹豫再三，他只好吞吞吐吐地交待了与陈秀章偷 125D 型摩托的事。接着又交待了 97 年 9 月伙同燕富奎、曹志平在地区罐头厂偷过一辆雄风牌 100 型摩托。

刘涛、赵静一听，不约而同地相互看了看：燕富奎这小子隐瞒了偷雄风牌摩托的事！事后，他们说：当时，我们乐得差点叫了起来，杨家权“一不小心”又讲了一辆我们没有掌握的被盗摩托！

那辆雄风牌 100 型摩托被盗出后，杨家权、曹志平连夜租一长安车运往平昌销赃。为不让长安车驾驶员知道得太多，在到平昌与达县交界的碑庙，杨家权便打发走长安车驾驶员，自己骑着“雄风”向平昌驶去。到平昌笔山区凤凰乡，摩托出了毛病，怎么也修不好。当时，天漆黑，四周又没人烟，二人连推带拉把摩托弄出两里路才在路旁不远处看到一打米房，又饿又累的杨家权、曹志平钻进打米房暂时歇息。

打米房老板林作奎是一个摩托车迷，听杨家权说摩托要卖便有些爱不释手。更重要的是，通过察颜观色和旁敲侧击，他发现这雄风摩托是辆赃车。所以，当曹志平与他讲价时，林作奎狠狠杀价：“最多只给 300 元！”气得杨、曹二人差点没背过气。但夜色沉沉，肚中饥饿，囊中羞涩又人生地不熟，他俩只好无奈地答应。林作奎乐颠颠地打开钱匣子，但把所有的毛票都清出才凑齐 150 元。杨家权无可奈何地骂道：算他娘的！150 元就 150 元。你给我们弄顿吃的，再找个地方睡一晚。

后来，燕富奎问“雄风”卖了多少钱，杨家权没好气地吼道：锤子的个钱！摩托被公安收了。不幸被杨家权言中，后来，林作奎的“雄风”因无户照真的被当地派出所收了，“糊涂”的派出所所有领导又将此车以 2000 元出售。赃车“雄风”至今仍泥牛入海无消息。

“雄风”被杨家权“不小心”讲出之后，他扳着指头一算，不禁吓了一跳：已有六辆摩托，四部电视了，还能宽大吗？他哭着问办案人员自己会不会被敲“沙罐儿”（枪毙）？办案人员把修改后的《刑法》翻给他看，见一般盗窃无死刑，他才放了心。不过，他连呼上当，再也不肯开口了。办案人员只好另辟途径。5 月 20 日，刘涛等人前去广元提审李美洪、周一清、王传贵。三犯除对杨家权等人交待的盗摩托等事供认不讳外，不知底细的李美洪还交待：97 年 5 月的一天晚上，他同曹志平、杨家权在张家湾电力公司家属院还偷了一辆嘉陵 125 型摩托，骑往管村销赃时因无有关证件，在马踏洞一带被达川运管所没收。杨家权还壮起胆子托人去取，幸好运管所人员不徇私情，杨家权才未得逞。

提审在至诚劳改农场 18 监区服刑的曹志平时，摸不着头脑的曹志平又供出了一个新情况：97 年 6 月的一天，他和杨家权、燕富奎在达州市大北街一带闲逛，见一汉子骑辆红色嘉陵 125 型摩托在一巷口停下，连摩托车钥匙未取便急匆匆上楼去了，杨家权向曹、燕二人使个眼色，三人骑上摩托，一踩油门飞驰而去案件侦查结束前，办案人员到西外派出所查杨家权的户口时，派出所的同志又提供线索说：这家伙还偷过他姑父彭大钟 29 寸孔雀彩电

和一台富丽单放机，价值七千余元。审讯时，杨家权交待说：当时是曹志平主张去偷的，我想姑夫的彩电都偷出来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就算是姑父给我表示的心意吧。

顺着这个线索，刘涛等人又挖出杨家权与曹志平在 61 队百货公司库房旁偷一台 17 寸虹美彩电及杨家权伙同李美洪在达川市小红旗桥一烟草门市内盗窃价值一万余元香烟的旧案。至此，杨家权为首的七人盗窃团作案 15 次，盗窃价值 12 万余元的特大盗窃案宣告圆满侦破。98 年 6 月 20 日，杨家权、燕富奎等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归案，周一清、李美洪、曹志平等罪犯也已从服刑地押回达县，准备重新审判。

手记之二十五：“烈女跳楼”
案发笔端

引发“新闻侵权”案

1999 年 8 月 16 日。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

绵阳市物价局干部宋伟诉《华西都市报》、《游仙报》、《四川法制报》及作者陈和平、周奇侵害名誉权案的庭审在这里激烈地进行一整天后，审判长征求双方意见：愿不愿接受法庭调解？宋伟的律师刚回答愿意调解，被告方却马上答道：拒绝调解！审判长只好宣布：本案另期宣判结果……

这起在绵阳市闹得沸沸扬扬的侵权案，缘起 1998 年 11 月 27 日、30 日和 12 月 29 日，《华西都市报》、《游仙报》、《四川法制报》分别以《一女抗暴、跳楼摔残》、《跳楼保清白》和《反抗强暴女跳楼，撞了南墙始回头》为题，发表了绵阳市作者陈和平、周奇同时发给三家报社的稿件。

三篇稿件涉及的主要新闻事实是：去年 11 月 17 日晚 9 点多，女青年郭元芬被宋伟的同学肖军邀去与宋伟见面，宋请郭吃串串香、喝酒聊天 5 小时后以谈急事为由将其请至百仕特娱乐城二楼。趁郭元芬进厕所之机，娱乐城老板伍 X 等人关灯走人，反锁大门。郭从厕所出来后，宋伟动手动脚，企图强奸她。郭为保清白，于凌晨 3 点左右毅然从二楼窗口跳下，导致腰椎体压缩性骨折，属重伤 8 级伤残（目前，腰部全靠安人体内的 8 根钢筋和 4 颗螺丝才能挺直）。

宋伟在他的诉状中称：三家报社刊用的文章“随意编造情节”、“称原告为色狼”、“严重失实”、“诽谤了原告……”，要求被告在报纸上以相同的版面用相当的面积为他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赔偿名誉损失费的万元……

侵生存权？侵名誉权？

涪城法院。法庭舌战紧张激烈。

宋伟表情焦躁，一言不发地坐在原告席上，当他的律师手忙脚乱地招架着 5 被告的轮番进攻时，他却不时转过头去向左张望——引发本案的另一名“主角”郭元芬就坐在离他不远的旁听席上。尽管腰身伤残，但郭元芬那不俗的气质月 B 好看的瓜子脸让人觉得她仍不失是一个漂亮迷人的女人。她偶尔用轻蔑的目光斜视一下原告席，布满血丝的眸子里涌聚着难以尽叙的悲哀和愤怒樵怀的脸上笼罩着灰黄色的阴云。映衬出此刻她内心的灼痛。一位旁听记者事后说，当她拄着拐杖出现在法庭上时，让人无由来地觉得“红颜薄命”那句古老咒语的恶毒。

郭元芬的法庭证词等材料长达 16 页。证词细致地讲叙了宋伟是如何将她骗进百仕特娱乐城，如何在吃串串香、喝酒时奉承讨好她，并送给她 200 元钱；后来，宋伟又是如何以“有要事相商”将她骗进包厢后喷着满嘴酒气向她扑来，将她按在床上乱摸乱吻，她又是如何在愤怒中跳下楼去的。

其他证人的证词也向法庭叙述了这么一些事实：1998 年 11 月 18 日，郭元芬的亲人以“强迫卖淫”向涪城区公安分局城西派出所报案。19 日晚，一直不敢露面的宋伟在得到郭的亲友保证不打他的承诺后，到医院看望郭元芬、送钱 400 元，并表示愿负责所有医疗费用。次日，宋伟又给郭送一花篮，并在郭的 CT 检验单“亲属意见”一栏里签字。不明就里的医生告诉郭的这位“亲属”：郭元芬的腰椎已摔成粉碎性骨折，如果手术不成功，可能瘫痪。宋伟害怕了，他哭丧着脸对郭元芬说：要是你真瘫了，我要坐牢，那样的话，我只好到外地躲几年！在场的王成、尹波等人也证实：“那个戴眼镜的人（宋伟）一再向郭元芬哀求：你不要告我，干脆给你钱一次性了断，不然，我会丢工作、老婆也会提出离婚，还要坐牢，我给你跪下了……”

宋伟的同学尹 X X 证实：1998 年 11 月 19 日，宋伟找到他说，有一个女子从楼上摔下来摔伤了，能不能找你的熟人魏 X（给郭元芬作手术的医生）帮忙摆平？尹 XX 不愿“摆平”这样的事。宋又求尹去魏 X 那儿打听一下，郭元芬的腰治好需要多少钱，并让魏 X 与郭谈一下私了的事。魏 X 也证明：尹 XX 给我讲后，我叫郭元芬他们去谈一下。

看来，众多的证词似乎能说明宋伟与郭元芬跳楼有关，至少能说明宋伟多次到病房求郭放一马，求郭私了是一个可疑之点。被告方质问：你来伟无鬼，三番五次跑到病房求人私了干啥？

对于被告方的质疑，宋伟和他的律师并不解释，只斥为造谣，说是被告方想继续侵害原告名誉权而编造的“虚假事实”。

在原、被告为那“虚假事实”争论不休时，旁听席上的人们则费心在想：宋伟为什么不起诉为两位作者提供“虚假事实”的郭元芬？

的确，从三家报社“侵权”到 1999 年 6 月中旬的半年多时间里，宋伟表现得出奇的平静——没有交涉，没有反驳，更无抗议之举。

后来，他解释说，没有把郭元芬列为侵权被告，是因她犯了诬告罪。诬告罪比侵权严重多了，他为什么不告前者而告后者？诬告事实成立，两名作者三家报社侵权事实还跑得脱吗？

宋伟说：当时看到这几家报纸的文章，我很气愤。本想打官司，但先是老婆为那篇文章闹离婚，后来又觉得惹不起报社，打官司的事就拖了下来。后来，单位扣了我的福利和奖金，错过了升职加薪的机会，连国家计委和省局也知道了此事，这些促使我患上了焦虑抑郁症。我越来越觉得那几张侵害我名誉权的报纸像贴在五指山上的如来佛的帖子重重地压着我，成了心中揭不掉的耻辱，所以，我决定花 14000 元请律师打官司。105 天后，突然冒出两个“关键证人”

1998 年 11 月 26 日被派出所留滞盘查时，宋伟在他的“说明”中这样讲当晚的情景：约凌晨两点，郭酒喝多了，我扶郭元芬到了百仕特伍老板的休息间，我让她躺下并给她揉背，然后去看人搓麻将，随后在楼梯边的沙发上睡觉。凌晨 3 点左右，有人喊开门，我醒后一看，原来是郭元芬。门已被反锁了，她要从 5.3 米高的窗口往下跳，我拉住她，自己用床单从窗口用了下去打电话找人来开门。吊下去时，看见街上有两个骑三轮的……

显然，如果真有宋伟所说的那么两个骑三轮的人，那无疑是本案的重要目击证人——他俩至少可以证明宋伟从窗口吊下时，郭元芬还在楼上，即郭元芬不是被宋伟逼得跳楼，而是她自己不慎摔伤致残的。

然而，这样重要的证人在前期的侦查中却一直没有出现过。办案者中有人说，宋伟那娃在讲鬼话，深更半夜，哪有骑三轮的？即使有，一晃而过，也不可能注意到他娃从窗口吊下时的那些情景……

宋伟的“鬼话”却成了突破此案的关键。案发 105 天后的 3 月 3 日，两个关键证人不仅出现了，还丰富了宋伟被盘查时没能讲到的情节。不过，办案人员在找到这两个关键人物的同时一个大大的疑问也留在了他们心中：宋伟当时看到的是两个骑三轮的，但为此案作证的怎么变成了两个菜贩？

据两个菜贩讲：1998 年二月 18 日凌晨两点左右，他俩从高水自由市场买好菜来到百仕特娱乐城旁边的临江贸易市场大门外等开门进场。其中一人坐在临街处，能看到百仕特娱乐城那边的情况，凌晨 3 点左右，雾很大，临街坐的菜贩看见 15 米外的百仕特有一男人从二楼窗口吊下来，然后，对楼上窗口的女人说，你等着，我去打电话。这个找电话打的人高约 1.60 米，留长发，体形较瘦，穿黑皮夹克，系花领带，戴眼镜……后来，那“眼镜”在街上转一阵又回到楼下对窗口的女人说，没找到电话，你先把包包和皮鞋扔下来。那女人扔下包和鞋后，也顺着窗口往下吊，不知什么原因，她一下斜爬在地上，无法动弹，那“眼镜”喊一辆的士把那女的送走了……

关于两个菜贩证明宋伟在楼下叫郭元芬扔鞋扔包的情节与宋伟 1998 年 11 月 26 日在派出所所讲的情节有些不同，他当时的说法是：我吊下楼后，看了一圈，没有电话，就又回到百仕特一楼，看见郭元芬顺着床单往下吊，等她落地时，一时站不起来，称腰杆受伤……

对此，五被告在法庭上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事情发生在凌晨 3 点，且有大雾，相隔 15 米外的菜贩能把当时的情节看得那么清楚？当事人宋伟 8 天后都记不起当时他与郭元芬的对话和叫郭扔包包扔皮鞋下楼的细节，两个与此案毫无关系的菜贩相隔 105 天后还能记得那么明白？人们的记忆随时间、环境、年龄等因素而变化，即使对同一事物的记忆，也会各有差异。然而，两个菜贩在 105 天后对宋伟的穿戴长相及高矮胖瘦记得一模一样，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被告方不相信当时有那么两个菜贩在场，便去找这两个菜贩，但他俩都出远门了，其中一个菜贩的妻子说：宋伟叫我们作证，说以后给钱，但至今还未给。

一直在临江贸易市场守大门的刘保安证实，市场夏天是 4 点至 4 点 30 分开门，冬天要 5 点才开门，菜贩们大多是提前 20 分钟左右到门口等开门进场。刘保安说，冬天天气那么

冷，只有傻瓜才会两三点就到门口等开门。
证据？

是证据不足还是不要

不管被告方信不信，也不管被告方服不服，两个菜贩的证词还是一锤定音，作为定案的重要依据收入了郭元芬跳楼案的卷内，并将其作为重要的“认定依据”之一。也正是凭着这些“重要证据”，绵阳市涪城公安分局于1999年3月22日拟定了“涪公刑不字（1999）of号《不予立案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

《通知书》称：郭元芬1998年11月18日提出控告宋伟强奸一案，经我局审查认为无证据证实……决定不予立案。

接到《通知书》后，郭元芬气愤地说，办案的在判定罪名上偷换概念！我们报案明明是宋伟“强迫卖淫”，他却说我们指控的是宋伟强奸。

绵阳一位律师幽默地比喻说：这好比抓住小偷去告诉警察，自己被偷了，警察却说你没有被抢劫而放走小偷。那律师问：强奸无证据就能证明宋伟不存在强迫卖淫的事实吗？

一纸违背报案人意愿也混淆了罪名的《通知书》不仅使嫌疑人轻而易举地过关，也为宋伟1999年6月18日诉新闻单位侵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郭元芬不服。她提出：本案在侦查阶段有鬼！有人透露：执法部门的个别人干了一些与身份不相符的事。11月24日，传唤嫌疑人肖军到案时，某执法部门一位领导亲自“护送”肖军到城西派出所，并找该所领导“谈话”“了解情况”。因该领导的“关心”，肖军未被进一步采取强制措施，先期被留滞盘查的肖XX夫妇也于25日被取保。肖XX被放的第二天，宋伟“坦然”而胸有成竹地“投案自首”。其结果可想而知——宋伟的供词天衣无缝，滴水不漏，侦查自然也就“没有证据”。四天后，宋伟获释。

更有甚者，有人竟敢用欺诈的手段干预侦查。26日，宋伟归案不到6小时，某警官竟装着撞人审讯室，谎称已获所领导同意，要“与宋伟单独谈谈”……

郭元芬觉得“在公安的办案人员那里找不到公道”，便把希望寄托在检察机关。但市检察院5月17日的《不立案理由审查意见通知书》中也说，宋伟强奸（未遂）一案无证据。

究竟是宋伟“强奸（未遂）无证据”，还是个别人不要证据？

郭元芬以为，当晚在与宋伟搏斗时，大衣袖子被宋扯破、扣子被扯掉，大衣上有宋伟的指纹，这总算证据吧？可当她把这一证据提供给两家执法人员时，皆被认定“没用”。

据贾林、王成等四人证实：他们曾主动到某执法部门要求证实宋伟到病房“私了”等情况。办案人员说，不要你们作证！后来，办案人员建议郭元芬，你最好与宋伟“协商解决”。郭元芬奇怪了：宋伟犯了国法，我们私下能“协商解决”得了吗？她不同意“协商解决”。贾林等人又到另一执法部门要求作证，但在坐了两小时冷板凳后，被人极不耐烦地赶了出去。她怒目苍天，“谁为我主持公道”

1999年7月26日，靠两根拐杖支撑腰身和行走的郭元芬满怀期盼地将被扯破的大衣和几十页证词及一份《刑事附带民事自诉状》呈送到涪城区人民法院某法官面前要求立案。法官冷冷看她一眼，不表态。郭元芬苦苦哀求，想动之以情，感动法官。法官不耐烦了，吼道：你抱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有啥用！郭又说了许多好话，法官仍铁石心肠，不为所动。从法院出来，郭元芬伤心极了：整整半年多了，别说讨回公道，连个立案的地方也找不到！她悲愤至极，一路落泪一路大声哭喊：老天呀！你为什么不长眼？我被人害得这样惨，他们硬说无证据，不准我告状！天理何在！公道何在！当今包公你在哪里！

郭元芬遭到的冷遇还不只是在这样的“衙门”里。案发不久，在执法部门个别人处多次碰壁后，郭元芬及家人开始捏着《申诉书》奔走于绵阳市的一些部门。他们相信党，相信政府。但个别代表党和政府的人却对他们很冷漠。好不容易找到“有关领导”，领导却总说忙，过几天再来。等再去了，又让她们去找某某部门的某某人，某某人却说，你们找错人了，这类事应该去找妇联……

当郭元芬感到绝望时，有人点拨她：人大是监督公、检、法的，权力大着呢！去试试吧。郭元芬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把申诉递到了市人大。郭元芬的信引起了人大领导的重视，1998年12月25日，市人大执法监督室向市公安局发函，强调“申诉材料如果反映属实，公安机关必须严肃查处，并将查处结果一个月内书面报告我室。”市公安局、涪城公安分局领导也非常重视，层层批示，并责成分局刑警大队牵头，组成了专案组。但案件的侦查在个别人的运作下，很快出现了拒绝郭元芬一方提供证据的苗头，于是，就形成了“无证据”的调查报告，分局依据这个报告，作出了不立案的决定，市检察院也形成了相应的法律文书。

对公安、检察机关的决定，郭元芬很理解。他说，公安局领导和检察院领导是想把案子查清的，但个别办案人员带着偏向取证，执法部门的领导又不可能亲自去落实那些证据是否真实可靠，这一切都是个别办案人员造成的！市里和市公、检、法的领导还是关心这个案子的。

绵阳市的领导的确很关心这个案子，特别是郭元芬跳楼案引发的“侵权”官司更引起市里有关领导的关注。两次开庭，市人大都专门派出代表旁听了庭审。全国人大代表、绵阳市人大副主任吴因易主动关心此案，并翻阅了大量相关材料，他表示，一定要对此案的审判加强监督。

但愿人大的监督能使本案进入依法办案、秉公执法的正轨。 “为了治伤，为了打官司，我当小姐去！”

公安通知不予立案后，郭元芬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人们在背后对她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有人还公开劝她，算了吧，郭“小姐”，公安都说“小姐”是干那事的，不存在强奸！

腰身已残的郭元芬仍在受到伤害，这种心理上的伤害远远大于生理上的伤害。案发后，告状无门，治伤无钱，郭元芬连累带气，脾气日渐忧郁烦躁，把未能付到公道的责任都归咎于丈夫张永忠。张永忠本是一个性情豪爽的山东人，平时从不爱在人前低三下四，但为了妻子的事，他常到一些部门去给人敬烟赔笑脸，连郭元芬都不忍心丈夫那样对人点头哈腰却还常被人训得可怜兮兮的。5月的一天，郭元芬终于忍不住向丈夫发火了，大骂张永忠窝囊，没出息，连一个本有理的公道都付不回来。张永忠被骂急了，哭着赌气跑到外地打工去了。

一去便杳无音信。

丈夫出走后，郭元芬不仅失去了关爱、护理的人，还成了讨债人的“出气筒”。债主们威胁说，不还账就拿走所有的东西，还要找黑社会把她摆平。吓得郭元芬在 3 个月内搬了两次家，那些破旧的家具和不多的衣物虽值不了多少钱，但真被人拿走了，再买就难了。

出院时，医生反复告诫她：你的腰到 1999 年底取钢筋前后都处于危险期，如果恢复得不好可能会造成终生瘫痪，所以你必须坚持服药。可是，郭元芬无单位无工作又无收入来源，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哪有钱去支付那每天 40 元左右的药费？想到年底取钢筋时还得 5000 多元，郭元芬就觉得有一个巨大的东西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更令她痛苦不堪的是，因无钱服药，她的双腿已开始明显萎缩，腰部的巨烈疼痛也时时刻刻折磨着她，而这疼痛又迫使她时时刻刻被这样一些问题折磨：如果我今后真的瘫痪了怎么办！那时，我又怎么生活？又有谁为我讨回公道？讨不回公道，我这一辈子又怎样心安？可治伤和打官司都需要钱，自己一个残废人，到哪里去挣这一笔钱呢？

被这些忧虑和愤恨折腾得心力交瘁、日夜不安的郭元芬终于痛下决心：为了治伤，为了打官司，当小姐去！即使是遭人践踏，被人凌辱，我也要挣钱保住身体。只要不瘫痪，不管告状无门的日子多么遥远，打赢官司的希望多么渺茫，我都要坚持告下去，打下去！即使是死，我也要找来钱打赢官司再死！

郭元芬在一种明知不可为却偏要为之的病态心理驱使下步入了“小姐”行列。在昏暗的包厢里，郭元芬夜夜都在用心中流出的血和眼里耻辱的泪水为自己的“公道”祈祷……郭元芬，你那夜为何要撞车来死

在公安、检察机关“不予立案”后，郭元芬决计找律师到法院打刑事附带民事的自诉官司。但找了好多家律师事务所，都无人敢受理她的案子。好不容易找了个叫陈兰的律师接了案子，但过了不久，陈律师退回郭元芬 500 元的代理费，说这案子已钻进了死胡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陈兰不敢接，却有个叫刘 X 的律师“勇敢”地接了郭元芬的诉状，他满有信心地说：这案子莫问题，凭我的关系，到法院立案打赢这场官司是不成问题的！郭元芬相信了，她将贾林等人外出打工时所写的 6 份证明材料原件全部交给了刘 X。刘 X 接材料不久后便喊“黄”了，他说法院不受理，等找个机会再送去。郭元芬托人到法院打听，才知道刘根本未去送过自己的案子！郭元芬看出了刘律师不会有这个“机会”，便主动打退堂鼓说：法院不立案算了，你把那几份证明材料退给我吧。刘一会儿说，材料不在了，我找到后马上还给你；一会儿又说，好像你已把材料拿回去了，后来，干脆说，你好像没有给我材料……

证明材料原件“丢了”，刘律师在郭元芬心中成了又一个不解之谜。

就在郭元芬悲愤绝望到了极点之时，6 月中旬，又一个“行侠仗义”的人物出场“帮忙”了。此人叫伍 X，这伍 X 身边常有一伙社会上的“混混”。他与郭元芬虽只有几面之交，却热心得一副两肋插刀的样子，他对孤独无助的郭元芬说：你的遭遇太可怜了，老子这人最看不惯欺负人，你的官司我管定了！我在区里。市里都有人，打这官司不会花一分钱！接着，他与郭元芬一起分析案情和以前屡屡受挫的原因，还要“把所有的材料都带回去好好研究研究”。生性豪爽的郭元芬以为遇上了知音，忙将余下的材料一页不剩全给了伍 X。可刚隔了一天，伍 X 却告诉她：这官司没有 5 万元搁不平。郭元芬被“5 万”吓得连连摆手说：这官

司不打了！不打了！我连吃饭弄药治腰伤都没钱，哪来5万元！把材料还我吧。伍X狡诈地问：不打官司了还要那些废纸干啥？我帮你烧了算了。郭元芬以为伍X是开玩笑，不想，当郭上门去索要材料时，伍X真的“帮忙”将所有材料付之一炬！

就在伍X烧了材料的一个星期后，《华西都市报》、《游仙报》、《四川法制报》及作者陈和平、周奇分别收到了宋伟诉其侵害名誉权的状子。

烧了材料，伍X似乎仍不放心。一天，他找上门对郭元芬说：你这官司肯定没有希望，不要找你那些熟人再去打这官司了，把你的电话本给我。说着，趁郭元芬不注意，他一把抢过电话本丢入了火中，郭元芬还未从惊愕愤怒中醒悟过来，伍X又一把夺过她的传呼边砸边说，我帮你砸了，免得那些打官司的人来找你的麻烦……

7月初的一天晚上，郭元芬被人约到了某宾馆。郭刚上二楼，便遭到约她的人一阵没头没脑的拳打脚踢，被打懵了的郭元芬正要逃离，突然不知从哪里一下钻出6个年轻人，约她的人一挥手表说：把这个婆娘摔下去弄死！几个家伙得令后七手八脚将郭元芬抬起就要往楼下扔，幸好被围观者制止……

想到自己被人逼得跳楼致残又告状无门，无怨无仇的人如此三番五次地欺负自己，郭元芬悲伤极了，也愤怒极了，她挣脱拉她的人，边撕心裂肺地尖声哭叫着边跌跌撞撞地扑向迎面开来的一辆奥拓车。奥拓一声怪叫，在离郭一米远的地方停住了，郭元芬爬起来又扑向一辆桑塔纳，那桑塔纳吓得一个急转弯，差点撞在街旁的栏杆上，郭元芬接着发疯般地扑向第三辆小车，小车又停住了，郭元芬爬到车前，边把头在车上碰得叮咚直响边哭问驾驶员：你停住干啥呀！为什么不撞死我呀！一个当时在现场的教师后来回忆说，郭元芬的哭叫声在夜色里传得很远很远，那哭叫声里充满了凄苦悲凉，仿佛是被烈火焚身之人的痛苦万状的哀号……

舆论监督还可以走多远？

宋伟诉三家新闻单位和两作者侵权案的庭审结束了。一审法院两次开庭，4个多月后才作出“新闻侵权”判决，但原被告双双不服，2000年12月，二审法院仍在费心地给双方调解。旷日持久的审理早已淡漠了人们对本案输赢的关心，只有那些参加过旁听的数家报社、电台、电视台的新闻记者们还在思考和忧虑：舆论监督与新闻侵权的界限应该如何界定？舆论监督还可以走多远？

其实，对于侵害名誉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早有界定：“文章的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失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这里的“基本内容失实”，不是指个别或少部分事实失实，更不是在不尊重事实的基础上用了几个刺耳的词语或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是侵权，而是指至少有70%以上的失实才算侵权。《四川法制报》等新闻单位认为：宋伟诉新闻单位侵权案，完全是滥用诉讼，新闻单位报道的主要事实是存在的，属实的，很多事在侦查取证、采证时虽缺乏全面、公正，但法庭大量的举证、质证已还了郭元芬跳楼案的本来面目。宋伟以为捏着一纸法律文书就能否定本来的事实真相，就认为是新闻侵权，就诉诸公堂，就以为能赢官司，其实不仅仅是他对侵权界定的理解把握不准，更重要的是他对这场官司的动机不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自知之明。他口口声声称自己的名誉权被侵，其实，当初宋伟在凌晨3点还与一个女青年纠缠不清时，已违反中纪委不准党政干部进入营业性场所的规定，宋伟就应想到自己的“名誉”，就应有承担由此而产生的后果的思想准备和勇气。

行使舆论监督的新闻单位被推上法庭的可悲处境说明我国的法治还不健全，新闻无法可依的局面已给舆论监督造成了太多的隐患和尴尬。所以，新闻单位呼吁《舆论监督法》和《新闻法》尽快出台。没有法律为依据，没有法律作后盾的舆论监督在监督意识淡薄、在到处都是“老虎屁股”的环境里是走不了多远的！
手记之二十六：一个人学生与劳释丈夫婚姻的祭坛
方蓉的丈夫章平死了，是被老鼠药毒死的。

当天，方蓉被抓进了看守所。42 天后的 6 月 22 日，因其投毒杀人的证据不足，方蓉被取保候审。从看守所出来，方蓉表情僵化、目光痴呆，逢人便问：章平的骨灰呢？

回到家中，方蓉更是触景生情，一行热泪断线似的涌出，良久，她才猛醒，扑到妈妈的肩上撕心裂肺地哭道：妈妈！结婚时没钱，我们连合影照都没一张！章平说过，结婚一周年时一定要补一份结婚照。再等几天就是一周年了呀……

母亲知道，女儿不仅仅是因不能与丈夫补照结婚照而伤心，她更多的是为因丈夫的死亡而导致自己苦苦寻觅追求的婚姻也随之死亡而悲哀。
金屋藏娇的父亲像一团阴云
笼罩在她婚恋的心空

方蓉的家在四川渠县岩峰区一个群山环抱、地处僻远的乡场上。七十年代中期，乡场边那两间千孔百洞的瓦房和一家人总是补缀不尽的烂衣服及老是饿肚皮的日子编织着方蓉的童年。但这些并没能影响这个家庭的和睦与温馨。方蓉的爸爸方有财是一个拥有老实、忠厚、善良、勤劳等等优点的中国式父亲，他与妻子相敬如宾，对儿女更是百般呵护。这个一生与泥巴打交道，靠到达川打工下苦力养家糊口的汉子常常唉声叹气不无遗憾地教育方蓉说：我没有文化，才在农村成家过这种苦日子。你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今后在城里找份轻松工作，找个好对象……

那时，方蓉很受感动。沐浴在浓浓的父爱中，她深深感受到一个男人对家庭，对妻子儿女的重要性，并由此产生了少女最初的婚恋观点。高二时，她在日记中写道：爱人，不需要他多么富有或有多有地位，只要他能将温情渗透你的生命，与你在人生旅途相濡以沫，风雨同舟足矣！对父亲所说的“好对象”，方蓉则理解为：必须是一个没有劣迹，对妻子绝对忠诚的男人，必须像父亲那样爱妻子儿女，必须有一个铁饭碗……

然而，1988 年发生的那场差点毁灭了这个家的变故却动摇了方蓉刚刚形成的婚恋标准。

变故是悄悄进行的。最初是到达川市打工的方有财常常数月不归，打工的钱也不拿回家，连方蓉每月在学校必需的 40 元生活费都不给了。后来，家里人才知道，方有财在达川市某厂打工期间，承包几起工程赚一大笔钱后，便与该厂一个小自己十多年的女工“相爱”了。结果，他所赚的钱全被那女人以“爱情”的名义接管。那女人见方有财能赚钱，为了独吞这笔钱财，她逼方有财离婚。母亲带着方蓉上门去求那女人看在三个小孩可怜的份上，不要破坏这个家庭，却被那女人连打带推赶了出来。方有财在一边看着那女人欺负自己的老婆，但不制止，还恶狠狠地骂老婆是贱人，是自找没趣，活该！

方蓉被方有财没有人性的言行惊呆了，她心里充满了愤怒和不解：天啊！这就是我那忠厚善良、老实巴交的父亲吗？这是我那满手老茧、一身汗臭的父亲干的事吗？连一个脸膛黝

黑、表情木讷的农民都玩弄感情，欺骗为他生育了三个儿女的女人，这世界上还有什么男人可以信赖？

父亲彻底摧毁了女儿对男人的信任，从此，方蓉拒绝和男人接触。在重庆市某大学读书期间，她没有儿女情肠，只是埋头书中，潜心攻读。几年过去了，她的感情世界虽然一片空白，却成了全年级有名的才女。对这个一脸清秀、灵气十足的才女，男同学们频频射出丘比特之箭，但都被方蓉用一脸的冷漠和不屑挡了回去。她婚恋的心空笼罩着一片难以驱散的阴云

蓦然回首，理想的丈夫存在于劳释人员中

1992年7月，大学毕业的方蓉被分配到达州市某厂当技术员。一晃数年过去了，但她在情感世界里仍固守着一座空城。那时，虽有无住房、工资低等烦恼的困扰，但她成天忙工作，钻研业务，有了空或看看书，或倒头便睡，日子倒也过得充实自在。

可惜这种舒心的日子并不长久。1995年春节，下岗的遭遇搅乱了方蓉竭力维持的那片宁静的心田。没有家庭可依附的她生活本就孤独无援，一下子又没有了单位，她完全失去了后盾和依靠。

无家可归时，方蓉这才有些懊悔了：如果有家有丈夫，也不至于下了岗没有落脚的地方，更不至于在下岗后连个安慰的人都没有！她终于意识到：自己该走出那片阴云找个丈夫成家了！

虽急欲成家，但方蓉仍未降低那“对妻子绝对忠诚”的择夫标准。父亲与母亲的那场感情危机使她禅机般地大彻大悟：男人无忠诚可言。男人的忠诚都是在女人的约束、驾驭下产生的。于是，在审视经别人介绍的那些对象时，方蓉把首要标准定位在是否能约束、驾驭对方上。

有人给方蓉介绍了个干公安的，小伙子牛高马大，一表人材，对方蓉也很有意。但方蓉想，我妈连个农民都约束不了，我能驾驭这个公安吗？刚见了一次面，两人中断了联系。不久，有人给她介绍了一家公司的副经理，还未见面，方蓉就联想到如今的商人大多有养“小蜜”的“嗜好”，于是，她赶紧退避三舍。后来，厂里的姐妹又给她介绍了个技师。技师老实本分，一看就知道是那种“听话”的角色，按方蓉的标准，此人无疑是最佳人选。但那人皮肤有点黑，外表有些木讷，方蓉无由来地想起了父亲那黝黑的脸膛与木讷的外表，接触越多她越觉得这技师肯定也是父亲那种表面老实暗中花心的男人，使果断地打发掉了这技师……

转眼间方蓉已是27岁的老姑娘了，但她的婚事仍在这种挑来选去中没有结果，好心的媒人们仍百折不挠地操心着她的婚事。1998年3月的一天，厂里一位老大姐又给她介绍了个男朋友，媒人说，小伙子叫章平，29岁，以前在某厂工作，现在搞个体了。方蓉听后很理解地说：其实，现在我也不在乎对方是否有铁饭碗了。在这改革的年代里，再好的单位说不准哪天就让你下岗了。国务院那些人饭碗就够铁了，不是也分流下岗了吗？我十年寒窗，好不容易进城找了份工作，现在下了岗，还不如那些个体户呢。媒人见方蓉如此豁达，索性把章平92年因抢劫而被判刑5年的事讲了出来。方蓉听为一愣，接着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不行不行！当初我就决定不找有劣迹的人，劳改过的怎么行！媒人却很有耐心地说，先去看看再说嘛！接着，又讲了章平有勤俭、诚实等等优点，还说章平的父亲已病故，母亲也已改

嫁，现在他一个人住一室一厅。

吃尽无住房之苦的方蓉被说得有些动心了，最后答应媒人去看一看，去时，章平正在农贸市场卖冰冻鸡爪，他留给方蓉的第一印象是：瘦，模样一般，略显得矮了些，没有男子汉的大方，见到方蓉竟面红耳赤，撩起围裙不停地擦手。当时，方蓉想，爱一个人得先崇拜他。这章平有什么值得崇拜的呢？随即扯扯媒人的衣袖就要离开。不想那章平竟推着小车跟了出来，并热情邀请媒人和方蓉到家里去坐坐。在媒人的撮合下，方蓉去了章平家。屋子收拾得还算干净整洁，窗户也一尘不染。方蓉这才对章平有了点好印象。

此后，章平又频频约方蓉去家里耍。接触不久，方蓉发现章平对自己有一种崇拜感和依赖性。每次见面，尽管方蓉对章平生意上的事并不怎么关心，但章平总是要把诸如是卖鸡爪好还是卖鸡腿好，可不可以做些其他生意这类问题不厌其烦地向方蓉“早请示晚汇报”。从章平那毕恭毕敬的态度中，方蓉知道：这是一个自己完全能够驾驭约束的男人。

但后来了解到的情况却令方蓉凉透了心。一天，章平告诉她：自己只有初中文化，有癫痫，还有抽烟喝酒赌博等恶习。虽然章平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一定能改掉这些恶习，也能治好病，但方蓉仍决定趁早退出这场危险的感情游戏。当她委婉地提出要分手时，章平一下茫然地站在那里，眼里露出绝望而可怜的目光——事后，方蓉回忆说，那痛楚的目光似乎告诉我，只要我离开他，他的一切也就完了！方蓉的决心被这目光动摇了。临出门时，她告诉仍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的章平说，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再说吧。

一个月后，方蓉“考虑”明白了。但家人们一致反对这门亲事。她弟弟愤愤地说，荒唐！一个女大学生跟劳改释放人员耍朋友，简直比林黛玉跟焦大耍朋友还荒唐！母亲也说，跟一个劳释人员能有什么前途？此时，对章平有劳改劣迹的问题，方蓉已有了全新的观点。她对家人说：一般的人办事总是瞻前顾后，怕这怕那，但劳改出来的人则不然，他们没单位、没政治地位，没依靠，更没人看得起，这种一无所有、没有退路的处境逼迫他们在求生的路上去拼去闯。闯成功了，便会从地狱升到天堂；闯失败了，大不了仍是一无所有。所以，为了生存，他们这种人更少顾忌，更有胆量，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这些人大多都会成功。方蓉举例说，我们地区目前最有钱的几个个体经营者几乎都有过劳改的经历。所以，我并不觉得跟章平结婚就一定没有前途。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方蓉告诉家人，即使今后章平讨口，我也愿给他背背兜！

“女人是弱者，但我的妻子是强者”

在人们惊讶不解的目光中，方蓉与章平于 1998 年 6 月底结婚了。婚事办得冷冷清清，毫无喜色。没有人送礼，没有人祝贺，方蓉把自己的被盖衣服抱进章平家，他们的终身大事就算办完了。

在倍受冷落的处境中，方蓉却对小家庭的未来充满信心——这信心缘于自己对这个家和章平的驾驭能力及章平对自己的真诚感情。婚后，当方蓉准备按自己的计划去改造丈夫的恶习，以此达到驾驭约束丈夫的目的时，她发现自己的“驾驭约束”对十分尊重珍爱自己的丈夫来说显得实在多余。一天，方蓉从渠县娘家回来，刚要开门，忽听屋里有人说，章平，趁你老婆不在家，到舞厅找个妹儿耍耍。原来是章平的那班狐朋狗友又来拉丈夫“下水”，方蓉正想进去阻止，却听章平说，兄弟们，以后安排这种节目就别再来叫我了。有人打断说，章平，有老婆就不出去了？家花没有野花香呀！章平却提高嗓门说，那些野花算什么？她们只知道骗钱，是些上不了档次的女人，我老婆是大学生，是高层次的女人！

那一刻，方蓉终于明白：爱才是一个人驾驭约束自己行为和战胜自身恶习的真正力量！有这种力量的人，还用别人刻意去驾驭约束吗？

章平也有这种力量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1999年2月，方蓉在渠县一个农村小学找了份代课的工作。方蓉妈在达州市某厂承包了几张台球桌，让章平去守。章平独自在家很无聊，一天，他忍不住又去了赌场，把经营台球收的2000元输了个精光。方蓉知道后并没有简单地责怪章平，而是把他接到自己教书的地方住了五天。章平见妻子每天都要从家到学校间5里远的小路上往返四趟，忙完了上课的事又忙着煮饭、洗衣，夜深人静了，还要在灯下备课改作业。这样辛苦一个月仅能领200元。章平不安了。他十分惭愧地对妻子说，方蓉，我知道错了，我一个晚上就输掉你10个月才能挣到的辛苦钱，你骂我吧！方蓉温和地说，人非圣贤，谁能无过？你若能知错就改，就是我最大的福分了！章平激动地说，方蓉，有你这样的女人，我什么都能改！

从此，章平真的再也没有去过赌场。

在引导丈夫改正恶习的同时，方蓉不遗余力地与丈夫一道进行家庭经济建设。未去教书前，她天天与章平推着小车到菜市场卖鸡爪，后来又学着卖菜、卖西瓜，只要能赚钱，再苦再累的生意她都做。她还计划，等赚了钱，就开一家餐馆让丈夫经营，自己还是去搞教育。为了做生意，她把结婚时母亲给的1600多元钱全给了丈夫。女人天生爱美，方蓉有时也真想打扮一下自己。5月初，学校放了几天农忙假，方蓉难为情地对母亲说，妈，放假这几天我来帮你经营台球，钱暂借我，我想买一件衣服和一支口红。但200元钱到手后，方蓉又舍不得了，她把钱全数交给了丈夫。

方蓉的行动深深感动了章平，他对人说，别人都说女人是弱者，但我妻子是强者！不管是做人还是做生意，她都是我的精神支柱。

家破人亡，是谁设下了婚姻的祭坛

章平、方蓉恩爱有加的日子没能维持多久，章平母亲吴秀英的介入打破了这个家庭的温馨和宁静。

吴秀英是达川地区某厂退休职工。92年，老伴因章平坐牢的事连病带气，撒手西去，吴秀英一怒之下另寻老伴，重组家庭。1997年，章平释放回家，吴秀英的心情却越来越沉重，儿子患有癫痫，又找不到工作，快近30岁了仍光棍一条。每次去章平那儿，看到儿子形单影只，郁郁寡欢，她就忧心如焚。后来，方蓉与章平相恋，吴秀英自然欣喜若狂，还从后夫处搬回和儿、媳同住。谁料想，旧式公婆与现代大学生儿媳之间无法沟通的“代沟”很快显露出来。

婆媳间的矛盾是通过各自的生活习惯、生活态度表现出来的。比如：见方蓉洗手打肥皂时仍开着自来水，吴秀英关上水并严厉地说，打完肥皂再开嘛，怎么不知道节约呢！又如，章平、方蓉晚上正兴致勃勃地看电视，吴秀英会怒气冲冲地关了电视并吵道：有啥看头嘛，浪费电！再如，方蓉如果吃一个鸡爪鸡翅什么的，立即会遭到吴秀英“寸口吃断江山”之类的喝斥。

方感对此十分反感，吴秀英却依旧不厌其烦地教育着儿媳。不久，她又为儿子与方感发生了夫权与妇权之争。吴秀英看不惯儿媳把什么都推给儿子做，更不能容忍儿媳在儿子面前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她担心老这样儿子会成为肥耳朵。所以，在后来经营小菜生意时，尽管章平自愿一个人每天四五点钟出门去接菜，让老婆多睡一会儿，可吴秀英却不允许。她会毫不客气地对睡觉的儿媳吼：起来了！起来了！一起去接菜！

在这场日渐激烈的婆媳之战中，吴秀英不但没能同化、改造儿媳，相反，还激化加深了婆媳和母子矛盾。在母亲与老婆间，大多数男人都是顺妻的。章平更是如此，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方蓉一边与母亲针锋相对地干。在与儿子的吵骂中，吴秀英常常被气得嚎啕大哭。屡屡受挫后，吴秀英改变策略，她避开家庭冲突，不断到厂里那群老太太小媳妇中去攻击方蓉。很快，关于“方蓉好吃懒做，没有家教”之类的闲言杂语反馈到了方蓉的耳中。章平一怒之下，要把吴秀英“驱逐出境”。年初，他给自己的姐姐写信说：……我也不想把我的家及我今后的人生道路毁灭。母亲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一切都在为我这个宝贝儿子，现在，她还逼我与方蓉离婚，我不要妈为我操这个心了，让她到你那里住三年，三年后再到我这里住。我也是30岁的人了，也想有个温暖的家……

为了“温暖的家”，一场积怨已久的冲突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农历正月初六，外出拜年时，章平要换条裤子，方蓉开玩笑说，穿得再周正你还是那个孬样子。吴秀英一听立即“接火”道：老娘那儿子漂亮得很，可惜娶了你这么个孬婆娘！一句玩笑招来公婆责骂，方蓉心中鬼火直冒，忍不住与其对骂起来。吴秀英气急败坏，冲进方的卧室抓起录音机便摔。方蓉也不甘示弱，狠狠将吴秀英推倒在地……也许正是这场冲突导致了后来的悲剧。因制造这场悲剧的凶手至今仍无法确定，本文只能如实地叙述当时的情景。5月10日8点左右，吴秀英去自己退休的厂公安科报案，说儿媳要投毒害人。8点30分，学校放假回家的方蓉与章平吃过早饭后，去了母亲承包的台球场，中午未回家。据吴秀英讲，下午两点多给章平热了早上剩的稀饭，章平吃了很快就口吐白沫，不治而死。她咬定“那饭里的毒药肯定是方蓉早上走前放的，她想毒死我，结果被章平吃了。”方蓉却说：“早上根本未煮稀饭，是热的头天的干饭，是吴秀英以为我中午会回家吃饭，结果被章平误食……”邻居们则推断，在母亲与老婆的矛盾中，章平难处，只好服毒自杀……

章平死于谁手，死于何因等等问题也许会永远成为不解之谜，但有一点人们是明白的：一个女大学生从择夫的误区进入挚爱的正轨，下嫁给一个低学历劳改过且疾病缠身的男人，这既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勇敢，更是人与人之间真爱的自然流露。可惜，这种难得的真爱很快演绎成了一出悲剧！方蓉失败了，她能战胜自我和世俗的力量去与章平结合，却未能逾越婆媳的代沟去延伸她的幸福。她被推上了婚姻的祭坛……

清官难断家务事。对方蓉与吴秀英之间的是是非非，本文不想说也不能说，因为一说就有“错”。但行文至此，仍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副广为流传的对联：女无不爱，媳无不憎，劝天下家婆，减三分爱女之心而爱媳。妻何以顺？亲何以逆？愿尔等人小，将一点顺妻之意以顺亲。

手记之二十七：一个“伥鬼”的婚姻游戏 18

岁，人贩子将她变成了“伥鬼”

柔媚娇俏的林静是那种出现在哪里都会引得男性神魂颠倒的女人。早在学校时，她身后那群狂热的追求者们便有同感：“一见她那两弯似蹙非蹙的柳叶眉和一双似喜非喜的含情目，

就令人心猿意马……”如今，尽管她已过而立之年，尽管五次失败的婚姻和数次情感游戏曾给她带来许多不快，但岁月的风霜和婚姻、情感的烦恼却丝毫未能改变她的天生丽质。相反，随着阅历的增长和时间的点化，唐代人视之为美的丰满端庄及现代男性追求的那种“性感”在她身上越来越显露出来。

有人说美貌是一张可能进入天堂的通行证，林静高中时的班主任刘强早就预感自己这个学生的美貌会成为一种灾祸。“她太贪慕虚荣了！”这位满头花白的老师还清楚地记得十多年前的一些事情：林静嫌送自己上学的农民父亲穿着太土，竟对同学讲，父亲在城里工作，送她上学的是邻居。高三时，班上有个女生买了条漂亮的裙子，连缴伙食费都困难的林静为了与其攀比，她悄悄去医院卖血买了套时装……

对这个美貌出众的学生，刘老师无可奈何地叹息：一个女人太漂亮又太贪慕虚荣，那么，悲剧也就难以避免了。

1988 年，林静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大学，她一下觉得昔日上大学当城市人做有钱人穿时装吃香喝辣的理想破灭了，自己已无脸再生活在养育了她 18 年的家乡。同时，心高气盛的林静也不甘心就这样一辈子生活在穷乡僻壤，她坚信在那繁华的城市里一定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自己应到那个天地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怀着一腔雄心壮志，毕业后一直不肯出门的林静在 1988 年秋末的一个早晨带着母亲卖鸡蛋存下的 5 元钱，悄悄搭上了去达州市的客车。她想去找在城里某建筑公司工作的表叔给自己找份工作，但不巧表叔出远差了。人海茫茫，举目无亲，盘缠已所剩无几，林静感到了一种惶恐和迷茫。她本想马上回家，又怕家乡人耻笑，于是，只好在市内瞎转悠，试图先找份临工，解决迫在眉睫的吃住问题。倒是有家小面馆缺洗碗工，但林静觉得自己丢不起那份脸。天快黑时，林静急得不知该怎么办，此时一个少妇过来与她攀谈起来。当知道林静想找工作时，那少妇说，小妹妹，算你运气好，我就是职业介绍所的，我们所里正需要人，我看你挺合适，只要我们所长过一目，你就可上班了。

那天晚上，尖嘴猴腮的所长刚一“过目”便当即宣布林静被录用，并设宴祝贺。从不喝酒的林静被“所长”和少妇灌得人事不省，第二天醒来时才发现自己一丝不挂地睡在“所长”身边。林静抓扯着“所长”大哭大叫，“所长”凶相毕露地骂道：老子是人贩子，再闹，把你卖到河南去！林静吓得不敢吱声了。

人贩子见镇住了林静，又安慰说：你这么漂亮，我怎么舍得卖呢？这样吧，今后，你到外边去找些妇女来，事成之后钱也有你一份。停了停，人贩子又恶狠狠地威胁：你若不从，我就把你与我睡的事传到你家乡去！

林静几乎没有犹豫就妥协了，她想：失身的事若传出去，自己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吗？

从此，林静在生命的花季走入了生命的极地，她晚上陪人贩子睡觉，白天，像神话中被老虎吃掉的人变成帮助老虎害人的伥鬼一样，在达州市的车站码头引诱妇女儿童上当受骗。直到 1988 年底，公安机关布同追捕这一犯罪团伙时，林静和她的主子们才作鸟兽散。城市户口、时装和房子的“等价交换”

林静依然不肯回家，很快就有了一个城市户口。

在城郊某蔬菜社征用建房土地时，林静的表叔与该社社长成了朋友。社长的侄儿吴长海 25 岁仍未婚娶。林静找上门后，表叔一下来了“灵感”：如果把表侄女介绍给吴长海，不仅可解决朋友之任的婚姻困难，同时也可圆林静有城市户口的心愿。他将这个想法告诉表侄女。林静虽嫌吴长海相貌平平且大自己 7 岁，但想到这次婚姻可以实现自己当城市人的理想，还是硬着头皮应允了这门亲事。很快，吴长海走“后门”弄来了张结婚证。1989 年春节前夕，林静正式成为了达州的城市人。

婚后的日子里，吴长海对美貌的娇妻体贴入微，百依百顺，下地干活进城卖菜这类事，他从不让林静沾边，只让妻子煮煮饭或干点家务。吴长海满以为这种养尊处优的日子既可表达自己对妻子的疼爱之情，又能永葆娇妻的美貌。但他却没料到供奉在家的美貌比金银更容易引起盗心。吴长海所在的蔬菜社，住着不少外地来达州的生意人，在城里开有一家时装店的浙江人乔平安租住的房子就在吴长海的隔壁。那乔平安本是好色之徒，对林静早已垂涎三尺，见林静常一人闲居在家，便对其动了心思。趁吴长海不在家里，乔常借故上门拜访，攀谈中，乔平安轻而易举地发现了林静爱慕虚荣，便投其所好，将一套套时装拱手相送。贪慕虚荣和享受的人性弱点使林静无法拒绝诱惑，在接受衣物和恭维的同时，她接纳了乔平安这个情夫。她想，管他呢，社会上不是有人说，商品社会连肉体、灵魂都可以作为商品出售吗？她不知道，在一次次零售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换来的时装很快便成了她这个小家庭消亡的祭品。林静高档时装的增多终于引起了吴长海的疑心，一次，林静在与乔平安鬼混时被吴长海双双抓获。忍受不了这种屈辱的吴长海一怒之下与林静离了婚。1990 年 2 月的一个雨天，林静与她这次婚姻的“剩余价值”——一大箱时装被扫地出门。

住在又黑又潮湿的旅馆里，林静痛楚地感到：一个只有城市户口而无住房的城市人犹如漂浮在水面的无根之萍。

她暗暗确定奋斗目标：得想法弄套房子！

已快身无分文的林静搜肠刮肚地做起了无米之炊。愁苦之中，她想起了建筑老板伍光明那火辣辣的目光。那是去年夏天在表叔的家里，因其身材矮而被人戏称为“武大郎”的包工头伍光明见到林静时，一下呆在那儿，眼睛盯在林静丰满的胸脯和白里透红的鹅蛋脸上，接着，又是端茶又是递名片，一个劲地说：“林么妹今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当时，林静压根儿就没正眼看过这个只有自己肩高的“武大郎”，但现在，她不得不屈尊向那个又黑又矮、满嘴金牙的包工头求援了。林静在电话中用哽咽的声音娇滴滴地向包工头倾诉自己走投无路的悲惨遭遇。十多分钟后，英雄救美的伍光明屁颠屁颠地赶来了。一进门就大骂吴长海不是个东西，把林么妹逼到这种地方来了。接着，用车把林静接到他市里的一套空房里。

房子共 120 平方米，不仅装璜一新，而且家具电器一应俱全。包工头见林祥喜形于色，便不失时机地讨好道：如果林么妹不嫌弃，这套房子就算伍大哥送给你的吧！林静抓住伍光明的手激动地说，那就谢谢伍大哥了！

世界上白送的东西其实代价是很昂贵的。为了这套新房，林静给“武大郎”当了两年的地下情人并为其两次坠胎。

为了工作和遗产，她一嫁再嫁

当地下夫人的日子很舒适也很无聊，虽吃穿无忧，但无所事事成天伴哈叭狗、波斯猫度日的空虚却令林静难以忍受。后来，她回忆说，我简直成了“武大郎”关在笼子里的一只金

丝鸟！更严重的是林静发现“武大郎”在外边还养了一只“金丝鸟”。对此，林静却十分平静，她没有悲伤，没有抗争，甚至没有以两年多地下夫人的身份表示一下愤慨。她明白，自己从来就没有喜欢过这个丑陋的“武大郎”，与其苟合不过是为了一套房子，现在自己与“武大郎”之间的“等价交换”既已完成，就没有必要再把这场情感游戏进行下去。林静当机立断作出了另一种抉择：趁“武大郎”对自己还未完全恩断情绝，借助他的力量再找份工作，以解除此生的后顾之忧。于是，她缠着伍光明给自己找份工作。伍光明被缠不过，只好把林静找工作的事推给了同自己关系密切的某建材公司供销科长刘佳禄。

刘佳禄时年 30 岁，人生和事业都正如日中天，惟一令他感到不满的是家里那个黄脸婆。林静的出现，更坚定了他离婚的决心。于是，他一边发动了离婚大战，一边办理林费参加工作之事。不久，他打通层层关节，让林静在本公司当上了库房管理员。林静知恩图报，在填用工表格的那天晚上，她将自己献身于刘佳禄。在介绍这段经历时，林静解释说，我曾委身于很多男人，但大多是出于某种目的，而我与刘佳禄的感情却是真实的，他年轻能干，有地位会挣钱。重要的是，我当时也想找个可以托付此生的丈夫。

还真是天遂人愿，刘佳禄终于以净身出户为代价结束了他的婚姻大战，1992 年 6 月，林、刘结为伉俪。

新的丈夫和新的家庭并不像林静想象的那样美好。按林静的设想，新家应该是现代化的，伍光明“赠”的那套房子应重新装璜，21 英寸的电视应换成 34 英寸，冰箱、洗衣机也该换代了，丈夫和自己更应重新“包装”一下，否则，会被单位同事和邻居看不起的。而这一切，都需要钱，可刘佳禄离婚时已耗得弹尽粮绝，自己与丈夫一月那点工资简直是杯水车薪。家庭建设与经济危机形成的冲突使林静陷入了新的苦恼，这苦恼不仅冲淡了新婚的喜悦，更刺伤了林静虚荣和攀比之心。见谁买了衣服首饰，谁置了新家具，她就埋怨丈夫：真没用，你看人家多有出息！林静还“点拨”丈夫：你咋那么呆？像钢材这种紧俏建材，为啥要白卖给那些包工头？刘佳禄“茅塞顿开”，多次向人索贿。林静通过丈夫终于得到了 15 万元钱，而刘佳禄却于 1993 年底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到手的 15 万元被检察院没收了，寄托终身的丈夫也被关进了大牢，林静伤心至极。虽然曾是那么爱恋为自己解决了工作并为满足自己的“幸福”挣“回十多万元的丈夫，但林静却不愿在等待中耗去自己的 12 年青春，她用一纸离婚申请结束了与丈夫的”恩爱“……

孑然一身的林静为逃避孤独和烦恼的侵扰，开始在赌桌上消磨时光，在哩哗啦的麻将声中，林静认识了第三任丈夫孙德财。孙德财是一个快近 60 岁的糟老头儿。这个丧偶多年的老家伙极精通怜香惜玉之术，但林静对他那过分的殷勤却厌恶至极。她曾多次冲着趁洗牌之机摸她玉手的孙德财横眉瞪眼地大吼：老不落教，恶心！一次，有“麻友”开玩笑说：林静，财神找上门还往外推干啥？知道吗？这老东西曾是风光一时的煤老板，银行的存款少说有 100 万！

“麻友”的玩笑改变了孙德财在林静心中的印象和分量，也改变了林静对这个春心不老的老煤老板的态度。称呼也由孙大爷变成孙大叔最后更正为孙大哥。林静与“孙大哥”的关系日渐密切起来，有人看见她常小鸟依人般地搀扶着“孙大哥”在滨河路散步，有人看见她依偎在“孙大哥”怀里看电视。1994 年 5 月的一天，孙德财终于乐颠颠地携孙女般的“林夫人”把喜糖散给了那伙“麻友”。

婚后，林静对孙德财很体贴也很柔顺。女人的柔顺往往能获得男人的怜爱，尤其是孙德财这种传香惜工的老男人，对娇妻更是呵护有加。只可惜好景不长，孙德财婚后的身体日渐虚弱，每况愈下，到1996年8月，孙已病人膏肓。丈夫病重期间，林静常以泪洗面并日夜衣不解带地精心护理，深受感动的孙德财叫人立下遗书，将110万元遗产分给了林静60万，而他的独生女儿只得到了50万元。

1997年底，孙德财命归黄泉，远近闻名的富婆林静又成了“快乐的单身汉”。婚姻游戏的报应，到美国继承遗产的丈夫是个诈骗犯

孙德财撒手西去后的一年里，林静不肯再论婚嫁。27岁的寡妇不愿再婚，让人想到贞节。林静却解释，90年代的女人还有什么贞节可言，我不是不嫁人，只是想多享受几年生活的潇洒，有滋有味地做女人。

她喜欢唱卡拉OK，歌唱得可以和电视里的那些“星”们媲美，还迷上了跳舞，探戈、伦巴、迪斯科等娴熟、优美的舞姿常令那些新潮的少男少女们望尘莫及。就在那一脚去一脚来的舞厅里，林静在婚姻的冷宫中尘封了一年多的春心又开始复苏萌动了。

那个令林静怦然心动的白马王子叫胡鹏。胡鹏给林静的第一印象是帅而且忠厚。当时林静对这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并没有引起注意或者说并没有什么兴趣，甚至连胡鹏主动邀请她跳舞，她仍表现出一种白天鹅般的骄傲和矜持。但几曲下来，林静那白天鹅般的优越感顿时倒塌。征服林静的是胡鹏那“无意”间的侃侃而谈。他说，自己清华大学毕业后分在重庆一家合资企业，前不久炒了老板的鱿鱼，准备回达州市开发自动净水机的新项目；他说，不是吹牛，凭自己的学识和能力，把这个项目搞成后一年赚个五六百万绝对不成问题；他说，自己一直忙学业和工作，现在28岁了还孤身一人；他说，我姑姑在美国芝加哥，无儿无女，前不久要我去继承她的遗产，对这事我一直犹豫不决，去吧，舍不得丢下将要在达州开发的新项目，不去吧，姑姑一个人在美国又怪可怜的……

听着听着，林静眼睛发亮了，脚下的舞步不觉有些迷乱，分手时，她竟有些依依不舍了。那夜，林静一直睡不着，躺在床上想胡鹏的经历，想胡鹏将要开发的新项目，当然，想得更多的还是他在美国的那个姑姑。她甚至想象自己将如何在芝加哥那地方火一把，成为举世闻名的华侨，成为达州市民茶余饭后的话题。后来，想得头都痛了，她在心中骂道：完了，胡鹏这小子把老娘给迷住了！

后来的几次约会中，林静发现胡鹏老是闷闷不乐，眉宇间总是带着忧郁和愁苦。反复追问，胡鹏才长叹一声道出自己的苦衷：姑姑又来电话催他去美国，还要他在国内结婚后再去美国，说美国的女孩太开放太无人情味，还是大陆的女子善良、本分。漂亮，又会居家过日子。胡鹏愤愤地说：太过分了！太苛刻了！我一时到哪里去找她说的那种女人，她以为我多么想去和那些美帝国主义分子生活在一起！我准备打电话告诉她，不去美国了！

林静再也忍不住了，她以开玩笑的方式坦露了隐藏多日的心愿：你姑姑要你找的女人，你看我……我能不能成为一个人选？林静的毛遂自荐使胡鹏有些受宠若惊，他抓住林静的手激动地问：小林，你真愿随我远离家园，漂泊异乡？林静搂住胡鹏的脖子把脸贴在胡鹏的脸上表白说，到美国去纵有千难万险，我也愿随你生生死死在一起！

两人的恋情急剧升温。1998 年初秋的一天，他们的结婚照挂上了新房，接着，胡鹏忙着给姑姑写信告诉自己已与林静完婚，并到有关部门办理出国手续，订购机票。林静也准备变卖房产，与亲人告别。

就在胡鹏宣布一星期后便可启程的时候，却不料风云突变。那天，胡鹏愁眉苦脸地告诉林静：姑姑来电话说，她接到我们即将赴美的信后，考虑到我们今后的发展前途，准备在芝加哥买下一家餐馆，但她倾其全部家产目前尚差 5 万美金，如果不及时交齐这笔钱，原餐馆老板将按合同把餐馆另售他人并不归还姑姑已交的 10 万美金的押金。你看，这怎么办！怎么办！

林静听后沉思片刻说，这样吧，我这些年有些积蓄，先拿去解燃眉之急。胡鹏愁容顿开，连说谢谢。林静把 45 万元的存款单交给丈夫时娇嗔地说：一家人本应风雨同舟嘛，还说什么谢谢？

胡鹏拿着存款单走了。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林静急得团团转，正准备去报案时，公安却找上门来，要她说出曾多次在重庆、成都等地诈骗数百万元的胡鹏的去向。林静听后两眼一黑，双腿发软，一下跌坐在地上半天说不出话来……“蹬”了小白脸，谁是她追求的下一次“爱情”

只当了 20 多天丈夫的胡鹏像一记重拳彻底摧毁了林静的出国梦，也动摇了她多年来得心应手地驾驭男人的信心。但她并没因此而放弃驾驭男人的爱好。在感情的洞穴里蛰伏一段时间后，婚姻带来的伤痛还没完全消失，林静于 1999 年 2 月便又闪电般地与某单位的一个小白脸结婚了。那小白脸比林静小 5 岁，无权无势无房产更无钱，人们很不理解林静这次婚姻的意图。而据与林静关系甚密的某女士透露：林静看中的正是这小白脸的年轻英俊和风流潇洒。

2000 年春节之后，林静与小白脸又离婚了，是她“蹬”的小白脸。林静直言不讳地说：回顾几次婚姻，我什么样的男人都见识过了，也得到了户口、房子、工作、金钱，但那些男人要么又老又丑又土，要么一身铜臭气，要么是江湖骗子，我被他们玩弄够了，我也要耍耍男人来弥补我不幸的婚姻……

目前，林静正在物色新的对象。她说，我还要追求爱情，还要结婚，因为我还年轻。

是的，林静还年轻，今年才 31 岁。但她追求的下一次“爱情”又是什么呢？
手记之二十八：覆巢之下，那朵花蕾凋谢得好早

到看守所采访她时，已是案发数月后的“五一”节了。

刚在管教室特制的石凳上坐下，见我在打量她，她娇媚地笑笑，一双水灵灵的大眼迎视着我的目光，最后，竟放肆地朝我挤挤眼，油腔滑调地请求：班长（犯人对管教人员的称呼），今天是五一，赏支烟抽吧！我在心中暗暗骂她本性难改，但为了她能配合采访，我把烟递了过去。她伸手接烟时，纹在左臂上的一条长龙和一朵花蕾闯入了我的眼帘。也许是看出我厌恶的眼神，她忙缩回左手，用右手接过了烟。

点上烟，她眯着眼大口大口地吸着，烟雾很快笼罩了她那俊秀娇嫩的脸庞。我趁机告诉她，我不是班长，是个写文章的，想把她的事儿写出来教育其他人。像被什么烫了一下似的，她猛地睁开眼拿开了叼在嘴上的烟，惶惶不安地问：把我卖淫、吸毒、抢劫、伤害他人的事儿都登在报上？我点点头。她瞟我，狠狠抽几口烟后请求道：能不能不用真实姓名？就用我蕾儿的小名吧！

我问：是哪个蕾？

她用手边比划边说，花蕾的蕾。

我感到一阵悲哀：她才 15 岁，的确是一朵还未绽放的花蕾。但这花蕾凋谢得好早！

我答应她的请求后，她放心了，又发狠地吸起烟来。烟雾中，我发现一串晶莹的泪珠在滚落……

蕾儿说，我悲剧的序幕在我还未出世前便由我的父母拉开了。

蕾儿的父亲邱安出身于达川某市一个小市民家庭，他为人憨厚，老实本分。由于家境贫寒，刚进初二便辍学，在家待业数年，快近 25 岁时街道居委会突然说他是知识青年，强行给了个上山下乡的名额。在“接受再教育”的几年间，邱安惟一的收获就是找了个叫吴雪的老婆。这吴雪虽系农家女儿，但天生丽质，美貌出众，初中毕业前追她的人便成群结队。可吴雪讨厌那种世俗而毫无诗意的结合，她追求浪漫的婚姻，发誓要找一个既有风度又潇洒的男人。不料月下老人却给她安排了一个大她 8 岁矮她 3 公分且其貌不扬的邱安。许多年后，吴雪还愤愤不平：若不是为了当城市人，打死老娘也不会跟着他！

1983 年回城后，邱安到某餐厅当了厨师，吴雪则贵夫人一样闲居在家。看不起丈夫的吴雪一方面用丈夫挣来的辛苦钱养尊处优，一方面暗中继续寻求着她那“浪漫有诗意的恋情”，多次红杏出墙使得邱安忍无可忍。1989 年，这个小家庭终于不可避免地解体了。吴雪将 6 岁的女儿蕾儿和 4 岁的儿子小宝扔给丈夫，嫁给了一个重庆人。

我问：蕾儿，妈妈去了重庆，想她吗？

蕾儿扔掉烟头，愤然道：鬼才想她！她对我好狠哟！

也许是受了裹着“三寸金莲”的母亲的影响，吴雪“男尊女卑”的意识特别重。蕾儿出世后，她逢人便叹息自己命苦，生了个赔钱的贱人。若不是邱安的母亲坚持，吴雪差点把女儿送了人。两年后，吴雪生下儿子小宝，从此，“贱人”与儿子的轻重在吴雪那儿更加明显。尽管家中并不富裕，但小宝仍有许多电动上汽车之类的玩具，而蕾儿上幼儿班时求买个书包吴雪也不允许，结果，邱安上山下乡时的黄挎包一直伴着蕾儿度过了三年的幼儿班。小宝自幼十分淘气，打烂了家中的东西或把什么弄丢了，挨打受罚的总是青儿。吃东西也常常是小宝吃过了才允许蕾儿吃，吴雪说，这样能培养女儿爱护、关心他人的美德。有一次，吴雪打麻将回来见生病的小宝未吃东西蕾儿就先吃了饭，她对女儿劈头盖脸就是一阵暴打，打得蕾儿嘴、鼻流血，手上、腿上青一块紫一块。那一次，蕾儿伤心极了，离家出走数日不归，后被吴雪抓住，打得遍体鳞伤不说，吴雪还用剪刀剪女儿的头发。蕾儿跪在地上哭着哀求：妈

妈，别剪呀！剪了我怎么出门见人呀！吴雪却用腿压住女儿的身子，揪住头发边剪边用粗鲁的脏话骂道：就是要把你个小骚货剪成秃头，免得出去勾引男人！在女儿的挣扎哭叫声中，吴雪用锋利的剪刀剪光了女儿的满头黑发，也剪断了她与蕾儿的母女之情。从此，母亲、母爱在蕾儿幼小的心灵中彻底死去了。采访蕾儿的邻居时，不少人回忆说：那女孩好可怜，常被她妈锁在屋里哭，哭过了又嘶哑着嗓子唱《小白菜》，她老重复“两三岁上死了娘，弟弟吃面我喝汤”那几句歌词，联想她的遭遇，听她那撕心裂肺的童音，常令人忍不住掉泪……

讲到这段往事时，蕾儿泣不成声，怎么问也不肯再谈下去。我理解她的内心感受：一个没能得到亲娘温暖反受重男轻女的母亲轻蔑、摧残的女儿，她会对给自己人生留下太多阴影并带来悲剧的母亲产生感情吗？

我只好变换一个话题：蕾儿，当初你是否有过什么理想抱负？蕾儿边擦眼泪边不以为然地答道：我并不是天生的坏女孩，怎么会没有理想抱负？

父母离异时，蕾儿的去留成了双方争论的最大焦点。邱安无力带两个孩子，吴雪更不愿接纳这个“贱人”。青儿像一个不值钱的包袱被父母推来推去。在蕾儿无处可去时，年近七旬的婆婆收留了孙女。她说：营儿，别怕！就是讨口。我也要把你养大成人！此后的几年间，婆婆为蕾儿撑起了一片光明的蓝天，蕾儿终于有了几年幸福的童年。婆婆原是教师，她不仅无微不至地在生活上关心蕾儿，还天天晚上辅导孙女学习，教育她学好本领，长大报效国家。在婆婆的教育熏陶下，蕾儿心灵深处迸发出了最朴素最现实的理想之光：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今后找份好工作！

这也许并不能算伟大的抱负却成了营儿学习的动力。在五年级前，她的成绩一直处在班里的前几名。老师们都觉得她聪明可爱，很有前途。可惜好景不长，1993年，婆婆病故，蕾儿头顶那片蓝天顷刻间轰然坍塌，她的“理想之光”也随之烟飞灰灭。

婆婆去世后，蕾儿又成了一个有爹有娘的孤儿。96年秋天，蕾儿该上初一了，可她的父亲邱安却为女儿的抚养费、学费、监护等等问题愁肠百结，一筹莫展。他所在的饮食店效益一天不如一天，常常发不出工资，自己的生活尚且难保，两个孩子的生存更令他伤透脑筋。他只好把求援之手伸向了蕾儿的姑姑、么姨和外婆。

外婆收留了苦命的外孙女，让她到附近的某厂子弟校上学。学费、生活费则由蕾儿的姑姑、么姨帮补。

终于可以上学了，雷儿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她根本无心学业，常常旷课逃课，考试老不及格，读了一年书，到校时间不足三个月。

我不明白蕾儿当时的心态，“有了学习条件为什么不珍惜？”

蕾儿长长地叹一口气，冷笑道：看透了，没意思！

小小年纪看透了什么？是什么使她感到没意思？我揣摸着问：是母亲的虐待，父母的离异使你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深重的伤害？是家境的贫困使你的生活过早地蒙上了忧愁的阴影？还是远离家庭、亲人，寄人篱下的生活使你感到孤独自卑，前途无望？

蕾儿点点头，说这些原因都有。

“你逃课旷课后都干什么去了？”

曹儿笑笑，眉飞色舞地讲了起来：我和几个成绩差的同学经常溜到厂里的舞厅唱歌跳舞，偶尔还干干“三陪”——陪别人唱和跳，以此换来一顿饭或一包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不仅学会了抽烟，还学会喝酒，一次能喝半斤。有一次，我与另一个女同学把一个老板灌得钻到桌子下边不敢出来！诈金花、打麻将也是那时学会的，别看我们年龄小，有时手气好，赢三五百元是常有的事……

我打断了蕾儿绘声绘色的描述，“长期逃课老师不管？”

蕾儿又要过一支烟，点燃后狠吸几口才答道：班主任管了几次管不住，就骂我们是耍火药，是害群之马不上课更好，最好退学，免得影响其他人。老师这样一说，我还真想退学，回去给爸爸一讲，不想他说，你已快 13 岁了，自己的事自己拿主意，读不读随便你。于是，我真的替自己拿了主意，退学证都未办就再也没有去上学。

退学后，蕾儿曾在邱安承包的饭馆里帮忙卖了一阵票，但她生性好动，加上以前野惯了，在饭馆呆不上一小时就六神不定，如坐针毡，总要想方设法扯谎溜出去玩。97 年 5 月左右，蕾儿在外边“晃”时认识了猴子、刘天棒、肥猪等混混，这三个家伙经常请青儿等四个十三、四岁的少女去溜冰或看黄色录像，还以谈恋爱为由，把畜儿、汪莲、吴莉、程静等带去开房间群居。汪莲等三名少女先后都被猴子等人糟蹋。

我感到很吃惊，问，蕾儿，录像厅允许你们这点年龄的少女进去看黄片？你们在旅馆里群居也无人管？

蕾儿白我一眼，那眼神分明是在责备我少见多怪。她说：只要给钱，谁会不允许？又有谁来管？这城里的录像厅、宾馆酒楼都这样，交了钱，你干什么都可以，被抓住了，大不过罚款了事。

蕾儿的话让人感到阵阵揪心。的确，我们这个城市娱乐场所的“污染”已到了严重的地步！每逢中午或晚上，随便到酒楼、舞厅、茶室、发廊等娱乐消费场所看看，你会发现那些乳臭未干的少女们正成群结队地去这些地方“上班”。在阴暗的包厢里，“祖国的花朵”是怎样在遭受蹂躏、摧残。

青儿就是在这种环境中“下水”的。

蕾儿告诉我，被拐卖后猴子曾对她讲：当初把她们几个少女带到录像厅、旅馆等地方去“晃”只不过是让她们适应环境，其目的则是在蕾儿等人适应并迷上这种环境后，好将其拐卖到广东操皮肉生意。而这一切，是音儿等少女做梦也想不到的，当初，她们还觉得请自己吃喝玩乐的猴子等人够意思。所以，听猴子一伙说广东比达 J；I 更“好耍”，她们信了。猴子说到广东保证能找到挣大钱的工作，她们便欢呼雀跃地随其去了。到了广东潮州，猴子等人不但天天带蕾儿等人逛街买衣服买化妆品，还给一种“让人轻飘飘的”烟抽，日子

过得倒满舒心。蕾儿以为真的到了金钱垒造的“天堂”，却不知自己已掉进了罪恶的圈套。过了几天，蕾儿等人发现不抽猴子给的烟就十分难受。再问他们要，猴子等人却学着广东腔说，小姐呀，知道这烟多少钱一支吗？一百元啦！里边有粉呀，要抽就到舞厅酒楼陪客挣钱自己买吧！蕾儿等人这才知道上当，她们不愿干这份“工作”，但又受不了毒瘾发作的熬煎，只好去“上班”。每天上下班，猴子一伙都到舞厅、酒楼门口接送，把少女们坐台的钱全部搜走后。才发给她们一支“烟”抽。

开初，蕾儿等人坚持只陪唱歌跳舞不陪睡觉，但猴子一伙嫌那样挣钱太少，强迫四少女卖淫。汪莲、吴莉不从，从舞厅逃出，结果在火车站被猴子一伙抓住，当晚就以每人 3 万元的价格将两个不满 14 岁的少女卖给了潮洲附近的农民。蕾儿和程静吓坏了，但她俩明白，如果不逃走，结果肯定会更惨。“经过一番策划，在汪莲被卖后的第三天晚上，蕾儿和程静带上当晚坐台挣的钱，躲过在酒楼门口监视的猴子一伙，从后门溜了出去。这次她俩吸取了汪莲、吴莉的教训，没有去火车站，而是打的直奔郊外，然后再乘夜班车去了南海市。

到了南海市，蕾儿、程静兜里的钱所剩无几，两人一商议：觉得只坐“素台”连吸粉都难以维持，反正已“下水”了，不如干脆破了身子“做业务”，挣足了钱再回达川。决心一下，两人马上到舞厅找客人谈价。一听说她俩才 13 岁，怕惹出麻烦，客人们都回绝了。第二天，蕾儿与程静花 100 元找人办了一个 18 岁的身份证，然后在脸上涂上厚厚的胭脂，使人看不清本来面目。当晚，在一家宾馆里，一个做五金生意的老板用 2 万元买断了蕾儿的贞操。老板离开后，青儿哭得昏天黑地，把那两万元钱扔得满地都是……

从此以后，蕾儿“做业务”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每天都要“做”好几次，每月收入大多在 4 至 6 万元。一年多竟挣了近 70 万元。她手上、脚上、脖子上戴着金光闪闪的链子，还配了 BP 机，买了一万多元的摩托罗拉手机。

我感到十分惊奇：你一个做那种事的，买手机干啥？

蕾儿告诉我：有一次，一个什么局的科长“耍”她时，拿出手机炫耀说，这手机是别人赞助的，如果愿意当他的“三奶”，便赞助给她。蕾儿不屑地说，科长，别以为你们当官的才能玩手机，姑奶奶只需做 5 天业务就可以玩一部更好的手机，还犯得着给你当“三奶”？5 天后，她果然有了一部 308 型的“掌中宝”。

我又问，你挣六、七十万元都做了些什么？

蕾儿两手一摊，一耸肩，都消费了！她说，吸毒每天要用 200 多元，长期住的都是 200 至 300 元的宾馆，还有买衣服、化妆品、吃饭等等……

“你后来为什么要回达川？”

蕾儿一下愤然起来：真他妈的倒霉！去年 6 月初，有个家伙与姑奶奶做业务，不但不给钱，反抢老子 8 千多元，还差点要了我的命！真是吓死人。第二天，我就赶紧坐飞机往回跑……

回达川时，蕾儿尚有 5 万多元现金。为了显示自己“衣锦还乡”，她多次宴请以前那班

狐朋狗友，还新结识拉拢了一批“混混”，因一下适应不了无男人的生活，她花钱养了一个比她大 6 岁的“小白脸”。“小白脸”也是个吃喝嫖赌之徒，加之蕾儿天天到赌场、茶楼去“消费”，不久，钱被挥霍一空。

蕾儿感到无钱的日子一天也过不下去，但她又不愿在本地“做业务”，于是，便发动那伙小混混去偷——蕾儿的邻居们感到很不理解：不晓得蕾儿那女娃子哪里那么大的魔力，她只需一个电话，一大群十来岁的娃儿便屁颠屁颠地跑来了。他们十分卖力地去为她偷。在外边偷不到，就把家里的钱和东西偷出来供奉蕾儿。那段时间，到这院子里找小孩的，来向青儿索要被偷钱、物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搅得整个大院没有安宁。

小混混们偷技不高，大多偷不到什么，有的偷点钱还惹来不少麻烦。蕾儿感到：光靠一群小混混偷是不行的，还得去抢。有的小混混听说要抢，不免有些怯场：我们只有十四、五岁，抢得了吗？蕾儿骂道：胆小鬼！抢不了大人还抢不了小孩？抢不了男人还抢不了女人？

为了“练练胆量”，音儿决定先去“实习实习”。98 年 8 月 18 日，蕾儿带上 14 岁的“蛮子”、“臭虫”在城里四处转悠，寻找抢劫对象，但一直不敢下手，后来，“臭虫”说公园门口常有小孩子打电子游戏，肯定好抢。于是，三人乘出租车到了公园。一下车，果然有几个小孩在打电子游戏，蕾儿一挥手，让“蛮子”和“臭虫”“上”，两个小混混立即冲上前揪住一瘦小孩，要他把钱交出来。那瘦小孩还未明白过来，蕾儿已把一把明晃晃的水果刀架在他脖子上。瘦小孩吓得尖叫起，蕾儿用刀背狠狠敲打瘦小孩的头并威胁：不把钱交出来姑奶奶一刀捅死你！瘦小孩不敢吱声了，蕾儿与“蛮子”“臭虫”乘机将其身上的 20 元钱搜出，然后扬长而去。

初战告捷，育儿“感到很刺激，很过瘾，也很兴奋”。她带着两个“手下”到麻辣烫摊上共享“战利品”。蕾儿边吃火锅边给“臭虫”“蛮子”鼓劲：这次虽效果不太理想，但也算是旗开得胜了！今后，大家要勇敢些，多做点大业务。

几天后，见风平浪静，蕾儿再次出动抢劫。吕月 27 日，她带着几个混混到溜冰场，经过一番观察，某中学的女学生李倩被蕾儿选为抢劫对象。她走上前拍拍李的肩膀：喂，姐们儿，借点钱用用！李倩看几个混混围了过来，立刻明白有麻烦，转身想走，蕾儿抓住她恶狠狠地问到底借不借！李倩反问：我认都不认识你，为啥要借钱？蕾儿不待其问完，便狠狠地李倩一耳光。李倩也火了，冲上前与蕾儿扭打成一团。抓扯中，蕾儿的项链被扯断。她气急败坏地大叫：反了！敢扯姑奶奶的项链！李倩被人拉开后刚要走，蕾儿追上去用事先准备的刀片朝她左脸就是一刀……

事后，法医鉴定李倩脸上的伤为重伤。蕾儿也为自己的疯狂付出了代价。8 月底，人民法院以伤害罪和抢劫罪判处蕾儿有期徒刑 4 年。

采访结束时，蕾儿托我给邱安带信，说她知道错了，求父亲原谅她，去看看她。她还特意让我告诉邱安：她已被毁了，千万要教育好弟弟小宝，别让他到社会上去晃，目前的社会环境太容易使人变坏了，尤其是青少年……

费了很大周折才找到邱安的家。门上挂着一把大黑锁。过了两天，我又去了一趟，铁门仍被那把大黑锁紧锁着。邻居告诉我：女儿出事后，邱安很气愤，也很失望，他说现在只有

把希望寄托在儿子小宝身上了。而这小宝初中还未毕业就不肯上学，邱安却说，由他吧，天生一人，必有一路。为了帮儿子走好这“路”，邱安前不久去了青海打工。他说，他要为小宝攒一大笔钱。邱安走后，14岁的小宝长期“放野牛”，天天早出晚归，与几个混混搅在一起。邻居叹息说：看来这小宝“进去”也是早晚的事哟！

没找到邱安，我觉得应找小宝谈谈，尽一点执法工作者教育青少年的职责。可两次我都未能等到小宝回家。第二次，一热心的邻居带我到小宝常去的地方找，沿途，我看见一群群的少男少女们或在录像厅“看片”，或在游戏机前如醉如痴，或叼着烟勾肩搭背地在街上闲逛，或在旱冰场溜冰……当时，我着急地想，这些孩子的父母怎么就那么放心自己的子女出入这些场所呢？这些孩子该不会像蕾儿那样“出事”吧……

那天下午，邻居带我找了很多地方，依然没找到小宝。在回家的路上，我心中不由生出许多感慨：不是说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吗？为什么“花朵”被野草淹没，被虫害侵袭而没有多少人为其除草灭虫？为什么有那么多父母不关心或不知道怎么关心自己的“花朵”？邱安真能为小宝踏出一条“路”来吗？假如有一天，他挣回很多钱小宝却“进去”了，他的钱给谁用？又假设他挣回很多钱却根本不够小宝挥霍他又怎么办？

邱安，你已毁了一个女儿，应亡羊补牢了！回来吧，邱安，你的儿子需要你！
手记之二十九：权、钱、色如“钩”

命运之神常会对那些胆大妄为之徒发出警告和暗示。早在龚羽西还未任万源市农村信用联社（以下简称万源市联社）主任前，有自称“半仙”者便预言：此人若继续在万源搞，40岁左右必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坎子”……

“半仙”的这次预测快被人们忘记时，那“坎子”果然悄悄降临了——并且，“坎子”还是两道——1996年和1997年，龚羽西两次被调查。但那“坎子”并非“不可逾越”那么严重，在“自己人”的帮助下，龚羽西毛发未损地轻易跨了过去。龚羽西信了“半仙”的话，此后，他频频去川西的成都活动，还在成都买下了房子，准备到那里去“发展”。

不过，“半仙”毕竟只是“半仙”。他未能预测到的是：2000年5月下旬，当达州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大要案侦查处的侦查员们出现在万源市时，龚羽西生命历程中第三道“坎子”出现了。

当时，龚羽西在心里恨恨地骂：狗日的“半仙”，不是说只有一道“坎子”吗？

6月1日，龚羽西被“请”进了达州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9月15日，达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商业受贿37.9万元（此案中，龚羽西非法所得46万元，且未合龚包养6个情妇和若干“流莺野雁”等费用）的龚羽西移送起诉。2001年3月30日，有立功、自首表现的龚羽西被判刑5年。

良心与欲望交战，对腐败者的羡慕诱发了他压抑多年的权欲

龚羽西祖籍重庆巴南。其父毕业于某公安学校，援藏回川后又支援山区到了万源，一直兢兢业业干到退休。几十年来，正直清高，不善人际交往的老人看不惯宦海沉浮，仕途险恶，也痛恨官场的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他认为：无论任何年代，最卑鄙的人总是出自权门。正

因为如此，老人要求龚羽西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要压抑欲望，淡泊功名利禄，要无私奉献。这种官为卑和“奉献”的教育后来虽被龚羽西讥为“如同老和尚教育小和尚女人是老虎一样可笑”，但当初对龚羽西无疑产生了一定影响。八十年代末期，腐败日渐猖獗之时，龚羽西愤愤地骂“权力是终极的春药”。

权力具有改变一切的巨大魔力。后来，被龚羽西诅咒的权力在使他“幡然醒悟”的同时，也诱发了他对权势的向往和追逐。1980年，到万源市农业银行工作后，龚羽西有了更多机会了解权力的魔力：为了多涨一级工资，为了多领几元钱的奖金，人们在领导面前竭力奴颜媚骨，阿谀奉承。某单位一干部为了爬上副局长的位子，天天请局长吃喝，与局长结干亲家，还让自己的老婆陪局长睡觉。更让龚羽西震惊的是那些大权在握者们的腐败：用公款大吃大喝，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贪污受贿，赌博、嫖娼。养“小蜜”成风……

那时，龚羽西愤怒地骂这种人叫“狗官”。但骂过之后，他又常把自己的父亲同那些“狗官”比：老人家一生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算够有党性和良心了，但到头来，不受重用，无权无势，好多长工资提拔之类的好事都与他无缘，这党性和良心又有什么实际意义？由此，他有些羡慕那些官员们了：“看人家过得多滋润，权中自有黄金屋，权中自有颜如玉呀！”

龚羽西心中那“官为卑”与“奉献”混合浇灌的根基土崩瓦解了。对腐败的羡慕开始逐渐诱发他那被压抑了多年的权欲。特别是他的几个朋友都当上银行领导后，龚羽西更渴望跻身官场。他吸取了父亲干事不会办事的教训，一方面把工作搞得十分出色——他当会计股长三年无一差错，当办公室主任时把宣传本单位的文章发表到了中央级报刊。另一方面他尊重同事，尊敬领导。1995年，万源市农业银行与万源联社分家时，龚羽西终于紫云东来，官运亨通，被提升为联社主持工作的副主任。1997年转为主任。“底线”被突破后，权力成了他捞钱的“道具”

以主宰者的心态和身份俯视着万源市联社的几百号芸芸众生，龚羽西终于体验到了权势显赫、名位炙热的感觉。但那时的他还不是那种利令智昏之人。上台不久，有个包工头带一大迭钱到他办公室说：龚主任，一点小意思，略表祝贺，请笑纳。

龚羽西脸一沉：笑纳什么？想把我整“熄火”呀？

龚主任，收下吧，我这人讲义气，不会对其他人说的。那老板还想把钱硬塞过去。不料，龚羽西火了：别把人看扁了，我好歹也接受了党这么多年教育，想拉我下水，没那么容易！

那时，龚羽西的确不想“下水”。他在会上信誓旦旦地讲：我一定廉洁奉公，遵纪守法，坚决做到不该吃的不吃，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要的东西不拿，不该贷的款坚决不批……

也许说假话是一些官员的“基本素质”。不久，有人发现：不该吃的他还是吃了，不该去的地方他还是去了。龚羽西解释说，人在官场，身不由己，有的地方实在是推不脱呀。“为难”之中，龚羽西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底线：最大限度也就是吃一顿，要一下，得点小礼品。但那受贿的事，就是把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收！

这条“底线”没过多久也被龚羽西突破了。1996年春节前的一天下午，个体老板唐X来

到了龚羽西的办公室。关上门后，唐老板边把 5 万元放在龚羽西的办公桌上边说，龚哥，快过年了，给你拜个年。见唐老板一下拿出那么一大堆“拜年钱”，龚羽西紧张得说话都有点语无伦次了：“这是干啥？唐老板，要不得哟！”他想把钱推过去，但那显得软弱无力的手被唐老板轻轻按住了。正在这时，有人敲门，龚羽西不由自主地一下把钱推进了办公桌的抽屉里……

收下这笔钱，龚羽西整整一下午都在心惊胆颤中度过，他几次准备打电话通知联社纪检人员把钱拿走，但一触摸到那一迭迭厚厚的钱，他心中就一阵狂跳一阵亢奋，拨电话的手发软了。犹豫中，他把 5 万元一张一张地铺放在那张大办公桌上，然后躺在老板椅里眯缝起眼久久地欣赏着。最后，他咬咬牙决定：收下！下不为例。

有人说，世界上最容易上瘾的毒品是金钱。只这么一次，龚羽西就再也没能“下不为例”了。他从此陷入了金钱的圈套并被其牢牢“套”住，变得日渐贪婪，手中的权力成了他换取金钱的“道具”。

在龚羽西的受贿活动中，刘德双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在舞厅的厮混中，他与龚羽西成了铁哥们儿，当起了帮人贷款的掮客，从中获取 2.8 % 的贷款月息和贷款户的“小费”。为了使龚羽西那支一挥就能批数十万数百万元贷款的笔挥起来，刘德双常在贷款户那里讨价还价地为龚羽西要些“小费”。1997 年初，福源饮料厂想贷款 100 万元，刘德双说贷这个数龚哥的小费底价是 10 万元，对方只给 6 万，刘寸步不让。最后，对方只好以送现金 3 万元，给优惠券 5 万元成交。达州市人民检察院在移送起诉意见书中认定的 81.8 万元受贿款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中，刘德双为其争取来的“小费”达 21 万元。

万源市联社系统内的基建、装璜是龚羽西发财的另一个渠道。有个常与龚羽西打交道的建筑老板说，那家伙简直是雁过拔毛，一见到他就让人不由自主地捂住自己的钱袋。老板举例说：1999 年上半年，太平信用社要装璜，我去联系，龚羽西刚巧要去北京，他叫我先借给他 1 万元，回来后把工程包给我。从北京回来，他又说工程被人包走了，要我拿钱去搁平，其实，我知道当时工程并未包出去，我只好又给他 2 万元，并叫他不用还那借的 1 万元，但他还暗示我给少了……

龚羽西也常吃些“窝边草”。1999 年，太平信用社马正奎听说联社职工要统一自购工作服，便去龚羽西那儿揽生意，但龚羽西一本正经地说，这生意本单位的人做，不太合适吧。第二天，马正奎送去 5 万元，龚羽西笑笑指着马正奎说，你娃还算懂事！几天后，龚羽西在会上力荐马正奎做这笔生意。有人说，本单位的人做这笔生意是不是不大合适。龚羽西反问：有什么不合适？有好处不给单位职工难道还要让外单位的来赚这个钱？在龚羽西的坚持下，生意被马正奎挑去了。他用 420 元一套的成本买回 489 套工作服，以 850 元一套的价格卖给联社的职工，联社职工怨声载道。有了钱，一个情妇五个“情妓”若干“流莺野雁”纷纷投怀送抱而来

“情妓”是万源人对龚羽西几个情妇的叫法。他们解释说，龚羽西包养的六个情妇有五个都是舞厅、发廊、按摩房“做业务”的，这种操皮肉生意的人以色换钱，不是有“情”之妇，只能叫做情妓。而在舞厅、发廊、桑拿浴里与那些流莺野雁只发生一两次性关系的，万源人叫“吃快餐饭”。采访时问龚羽西有多少“快餐饭”，他先是略显尴尬地摇头笑笑。后说，记不清了。我问，听人说，少不了一个排，真的吗？龚羽西避开话题说，其实我同她们中的

几个还是挺有感情的。我笑他滥情主义，多情种子，见女人就爱，还叫真情。

其实，龚羽西曾有过一段真情故事。21年前，龚羽西同后来成了他妻子的张正英同时被分到了万源市农行大竹河营业所。“他那时见了女孩子就脸红，耍朋友很久连吻都不敢接。”如今已被丈夫伤害得心力交瘁的张正英总忘不了当初那个纯真的青年。那时的龚羽西性格内向、木讷，头发耷拉在额前，个子不高，面目不俊，根本看不出后来那种风流潇洒的影子，但小他6岁且活泼漂亮的张正英仍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沉的情都投在了当时并看不出有什么远大前程的龚羽西身上。她说，婚后的前十年他对我一直很好，从不要我干重活。若要出差，他总要把水、煤、米准备好。中午我睡午觉时，他就干洗衣打扫卫生等活儿。他对我说，我虽不富有，也不潇洒，但我的温柔能透过你的生命，与你相濡以沫地度过漫漫人生旅途……

后来，龚羽西不甘于在家操持那些锅碗瓢盆了，张正英十分理解丈夫，她用自己的柔弱之躯承担起了全部家务和抚养孩子的责任，让丈夫全身心投入工作，争取进步。1996年，龚羽西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了万源市联社副主任的交椅。

那时，张正英很高兴。她没料到，丈夫升迁的通知书会演变成这个幸福家庭的讣告。

大权在握，龚羽西的厄运也翩翩而至了——权力、金钱、美色同他结下了解不开的灾难之“缘”。张正英清楚地记得，从当副主任起，龚羽西就说忙，常接连几天几夜不回家，打他的手机不开，打传呼不回。有次，张正英因胆结石痛得在地上乱滚，住进医院后龚羽西也未去看一下。那时，张正英以为丈夫真的在忙工作，总原谅他。直到有一天，龚羽西把某单位一个叫王莹的女人写给他的那些“相见恨晚”，“你是我灵魂最后的梦”的情书和“如果爱是一只沉默的铃铛，我就是四季不断的柔风”之类的情诗交给张正英并逼其离婚时，这个一直独守空房却忠实地为丈夫守家养女的善良女人才如梦方醒，她有些“侮叫夫婿觅封侯”了。龚羽西却逼她：别死皮赖脸了，缘分已尽，离吧！

龚羽西以为月下老人额外给他白送的那个女人后来却让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王莹的丈夫发现龚羽西与王莹的关系后，给龚羽西指出两条路：一是从主任的职位上“下课”，二是挖掉龚的两只眼或砍下他的两条腿。当时，已财大气粗的龚羽西既爱江山又爱美女更不会让人挖眼砍腿，他利用关系把王莹调到外地，每天上下班都让单位保卫科的干部接送，并请黑社会威胁王莹的丈夫。不料，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要非报此仇不可。加之王莹反戈一击，常到单位去闹事，龚羽西只好屈尊前去与王莹之夫谈判。最后，据说是以龚羽西付出10万元（王莹讲，谈判时龚只同意3万元）的“脱笼费”而结束这场在万源城闹得天翻地覆的“夺美之战”。

王莹离开后，1996年下半年，仍不回家的龚羽西依然是“吃饭基本上有人请，喝酒基本上有人送，工资基本不用，老婆基本不动”。他“动”的大多是舞厅、发廊的“小姐”。一次，龚羽西到达州市开会，趋同寝室住的人熟睡之机把一桑拿女带回去睡，被那同住的人一顿臭骂。龚羽西对“小姐”情有独钟，主要是同王莹这种有夫之妇“耍”给他留下了切肤之痛，所以，他决计只“耍”无根之萍的“小姐”。但“快餐饭”吃多了，龚羽西也有些烦了。那些“小姐”虽见面笑嘻嘻，搂着像夫妻，掏起男人的腰包却心狠手黑。更可恶的是不知哪个“小姐”还给他染上了难以治愈的性病。所以，他决定找个固定的“地下夫人”。

在某酒楼的舞厅里，梁琼“小姐”被龚羽西相中。包养半年后，龚羽西嫌其“素质太差”

——主要是他与“很有气质，很有味道”的金铃“小姐”又一见钟情了，便“借”给梁琼 2 万元“感情补偿费”将其打发。

与金铃苟合后，龚羽西以为自己找到了感情的归宿，却不料，王莹与金铃这两个不同职业不同层次不同性格的女人却为了同一“目标”给他带来了相同的麻烦与烦恼。本来，龚羽西对金铃已算够“爱”了，相识不久，龚羽西便在万源市内给她租房购置家具电器，后来，又弄一发廊让其经营，单位来客龚羽西都带到那发廊里“消费”，金铃开发票去龚羽西连看也不看便挥笔签字，让其大赚轻松钱。龚羽西还带她到北京、成都、重庆等地游玩，给她买高档衣物。而龚羽西对她的要求只有两个：一是不准与其他人“好”，二是不准给自己家里添乱子。但金铃这个风情万种的女人却不甘寂寞，她不但与其他人“好”给龚羽西戴“绿帽子”，还常打电话到龚羽西家逼张正英与龚离婚，引得龚羽西后院起火。龚羽西忙用 5 千元钱去求金铃“停火”，金铃却并不把那 5 千元钱当回事，她已发现龚羽西给人贷款一次就能“赚”这 5 千元的十倍二十倍，她要龚羽西离婚，自己名正言顺地当龚夫人管理龚“赚”来的钱。

金铃过高估计了自己在龚羽西心中的位置，其时，龚羽西对金铃已厌烦了，又包养了按摩小姐兰英。金铃知道后威胁龚羽西：如果不马上断绝与兰英的关系她就不客气了！龚羽西并不怕金铃的不客气，仍同兰英如胶似漆。于是，一个为了掌管金钱什么都不顾的女人和一个为了女人什么都不顾的男人之间的冲击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金铃常如人无人之境地冲进龚羽西的办公室大吵大闹，缠得龚羽西寸步难行，即使联社保卫科出面干预也无济于事。龚羽西被闹烦了，1999 年上半年，给金铃一笔“脱笼费”（据知情人讲是 8 万元）让人强行将其送出了万源市。

金铃走后，一个叫吴姬的湖南“小姐”和一个叫肖莲的“三陪”妹又相继送怀投抱而来。直到被捕前，龚羽西一妻二“妾”，舞厅、发廊那些叫不出名的流莺野雁也纷纷争宠。龚羽西对朋友说，身边蝶飞凤舞、妻妾成群，感觉好极了！

本案反思：权力者的悲剧总是监督失灵后产生的悲剧

1996 年，任万源市联社副主任不到半年，权力、金钱、美色便似无饵之钩把龚羽西牢牢挂住，牢狱之灾也紧紧相逼。

1996 年，万源市联社小桥营业所凭一张存单复印件引入虚假存款贷出 300 万元，造成严重损失，小桥营业所副主任王存书被判刑 4 年。但人们议论：王存书不过是替罪羊，贷 300 万元，没有龚羽西同意，王存书敢吗？这也许只是一种推测，但人们的推测却在联社的一次微妙的人事调动中得到了证实：王存书刚判刑，他那个并无特长也非骨干更无特殊贡献的儿子便从条件较差的乡村营业所调进了联社营业部。在联社的人事调动中，破例照顾一个劳改人员的子女，这是绝无仅有的。

1997 年，龚羽西又有一次有惊无险的遭遇。有关部门查出：龚羽西得了万兴铁厂 2 万元“小费”。但后来，又说龚羽西早把那 2 万元交单位“小金库”了。有人一听这个结论就愤然道：编“龙门阵”！

也难怪人们不信，龚羽西从 96 年至 97 年间受贿已数十万元皆未交“小金库”，为何惟独把万兴的 2 万元“小费”入“小金库”？对此人们议论纷纷：如果那两次龚羽西被认真

查处，他还能继续受贿数十万元吗？如果他那年就被查办，万源市信用联社还会因他受贿而乱贷款造成 2600 多万元无法挽回的损失吗？如果他那年下了台，他还能用那么多受贿款去养那么多情妇和连他自己都记不清的“流莺野雁”吗？如果他那年“栽”了，顶多也就判刑二、三年，也不至于承担现在这 80 多万元受贿和巨额财产不明的刑罚……

如此看来，一次不管是出于哪种原因的“捉放曹”，不仅会贻害国家，也会害犯罪者本人。

其实，龚羽西在小桥、万兴案件后仍有“回头是岸”之机——当然，这种改过必须有本人的幡然悔悟和一种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可惜，为了金钱和女色而不惜失去自由的龚羽西并没有那份悔过自新的明智。而没有一个令他不能贪不敢贪的监督制约机制则使已有两次化险为夷经历的龚羽西膨胀出了更大的贪心和胆量，也积累了更多的经验，结交了更多的“自己人”。所有这些，实际上把龚羽西推入了更为凶险之门。

本来，万源市联社有严格和多层次的监督制约机制。在外部，它接受本市有关部门及上级有关部门的直接领导和监督，在万源市联社内部，有稽核科，在领导班子中有总稽核，有监察纪检等种种监督，且单位有种种严格的规章制度。但这些制约机制和规章制度在万源市联社却统统奇怪地失灵了。小桥、万兴案件发生后，有关部门连让龚羽西作检讨的底气都没有，只劝他写写“说明”。但龚羽西直到 2000 年 6 月 15 日被捕时都未写那份“说明”。据龚羽西讲，他在万源市包养“情妇”，有关领导是知道的，但却无人制止或警告他这种败坏共产党形象的行为。更有甚者，在龚与王莹的事败露后，有人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帮龚将王莹调到了另一个城市工作。龚羽西常在开会时带上情妇金铃，有人竟在会议上帮其安排单间住宿。更奇怪的是，群众举报龚羽西的信件居然全落到了龚羽西手中。一次，龚羽西在大会上扬着一迭举报信得意洋洋地说：干脆送到我这里来算了嘛，反正都要转到我手上来，何必浪费时间和邮票？

在瓦解了外部部分制约机制的同时，龚羽西也彻底捣毁了内部的监督机制。他拒绝集体领导，将单位的人权、财权和规章制度统统玩于股掌之中。1998 年，长期充当龚羽西贷款受贿掮客的刘德双想贷款，给当时负责批贷款的联社副主任袁 XX 送钱 1 万元被其拒绝。刘告到龚羽西处“，龚愤愤道：不识抬举！让他下课！不久，袁批贷的权果被龚羽西免掉。在万源联社，本有一个姓黄的基建员专司全市各营业所的基建和装璜，但龚羽西嫌其“不懂事”，调换其工作，花 600 元在外单位聘了一个有其名无其实的基建员。全市基建、装璜权从此全部落入了龚羽西和他当包工头的弟弟龚 XX 之手。龚 XX 也因此万源市联社有了“副主任”之称，有的“基建工程”龚副主任“实在忙不过来时，收了”转包费“其他包工头才能去做。旧院区营业所有个主任不信那个邪，100 万元的基建工程未通过”龚副主任“就承包了出去。龚羽西暴跳如雷，又是派人查旧院的账，又扬言要把那主任调走，吓得那位主任忙给龚羽西送”道歉费“3000 元了事。

龚羽西不仅拒绝其他人的监督，连身边一些关系较好的人的忠告他也一概拒绝。有个驾驶员见他常在开会时把情妇带到会上同住，便婉转地劝他注意点影响。龚羽西骂这位驾驶员嘴巴讨厌，不要其为自己开车了。龚羽西在单位认的同姓兄弟龚 X，对他忠心耿耿，为“情技”的事常帮他扯谎遮掩。后来，因劝他在女人问题上要检点些，龚羽西与其翻了脸，让这位兄弟停职两个月，并将其逐放太平镇营业所。

比龚羽西拒绝监督更可怕的是人们监督意识的麻木和对腐败的那种见怪不怪的认可。有人欲贷款 10 万，找龚羽西数次皆被其以“研究研究”婉拒。联社一干部知龚羽西批贷“不见鬼子不挂弦”的秉性，建议那人“出点血”——将要送的 500 元全换成 5 元券用信封封好送去。那人依计而行。龚见其掏出一鼓鼓囊囊的信封，果然二话不说便批贷 10 万元。本单位干部认可了龚羽西的腐败并给人出谋划策行贿，实在可叹可悲！

龚羽西耍“情妓”在单位也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一次，到大竹河营业所开会，吃饭时，不少人公开称金铃为嫂子，并频频向“龚大哥和金铃嫂子”敬酒。那天，龚羽西高兴得喝醉了，当众躺在金铃怀里睡觉，有人忙安排地方让“金铃嫂子”和龚羽西休息。当时，有人偷笑，被人喝斥：笑个球，这种事现在正常得很！

真不知是该指责人们的麻木，还是该悲哀人们道德水准的退化。对腐败，对丑恶现象，人们的“习以为常”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现象！

龚羽西已无可救药地“去”了，“斯者已逝也”，但“来者犹可追”。我们的金融部门实在应该好好审视一下：本部门的领导岗位是不是有龚羽西那种被权、钱、色“钩”住了的人，实在应该检查一下监督制约机制是否在本单位坚强有力，实在应该问一下本部门的职工们对腐败、对丑恶是否也“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不注意这些问题是极其危险的，要知道：无限制无监督的权力，毁掉的不仅仅是占有者，还会给国家造成成千万上亿元的损失；另一方面，如果人们都麻木，都“习以为常”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党，这个民族也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手记之三十：海茫茫，谁能再造方舟
铁窗前，送行的女人是情敌

先介绍本文的几位“主角”——胡鹏，川东某县“梦雪发廊”个体老板。孟雪，胡鹏的前妻。刘晓琳，胡鹏的现任妻子。

孟雪与刘晓琳曾是水火难容的冤家对头。为那个花心难改、脚踏几只船的胡鹏，孟雪差点把硫酸泼向刘晓琳……

不过，那已是 1998 年的事了，眼下——1999 年 8 月的一天，孟雪因曾与本文的另一位“主角”文小刚一起贩毒，被判劳改 5 年，刘晓琳前来为她送行。在那道界定人间善恶和隔断囚犯自由的铁窗前，孟雪动情地叫一声“刘姐！”便快步迎上前，隔窗与刘晓琳把手紧紧握在一起。还未开口，孟雪已是泪眼涟涟，声音哽咽。刘晓琳也流着泪劝慰孟雪，不想泪眼人劝泪眼人，越劝越伤心，劝着劝着，两个女人禁不住泣不成声，痛哭起来。那心碎形毁的情态，那用真诚的泪水清洗过的感情，催人泪下，令人心中心中隐隐痛楚……

看望时间到了，刘晓琳才止住哭，边将自己带来的一大包卫生巾、肥皂和 200 元钱交给孟雪，边说：雪儿（孟雪的小名），对方方（孟雪的儿子）你尽管放心，我一定把他当亲儿子一样教育培养。到了劳改农场好好改造，争取减刑早点出来。前不久，我与胡鹏开始搞汽车运输，你与胡鹏创办的“梦雪发廊”暂时转租给了别人，今后你回来了，我们马上把发廊收回让你经营……

如此情深意笃，哪像情敌？这两个女人是如何使情敌关系演绎为感人至深的真情故事？是惺惺惜惺惺，还是人性善良的本性和博大的胸怀？抑或是眼下流行歌曲唱的“女人何必为

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的父亲常教孟雪背“人之初，性本善”和“三从四德”之类书籍。虽然在读初中时孟雪对那些深奥的之乎者也仍一知半解，似懂非懂，但长期耳濡目染却使她有了一种浸透骨髓的儒家“性善”思想和“从一而终”的忠贞烈女意识。善良而柔弱，极富同情心并总爱把自己的同情和帮助施舍于人构成了她性格的基调，但对人同情帮助时不分是非的人性弱点则难免使这种美好的性格成为她人生悲剧的根源……

这种性格背景形成的悲剧似乎注定要发生在她的婚姻方面。

1989年，因家庭经济困难，高中尚未毕业，17岁的孟雪便辍学进城去学理发。花季的孟雪清纯可爱：长长的睫毛，灵动秀美的大眼睛，滴血似的红唇。她的美貌很快吸引了小城的小青年们。头发胡须还不长他们就急不可待地到发廊找还是学徒的孟雪理发修面。不久，县银行有个小伙子开始追求她了。对爱情婚恋懵懵懂懂的孟雪挡不住小伙子的殷勤和热烈，去了几次小伙子的家。有一次去时，正赶上小伙子的父母在吵架——好像是小伙子当局长的父亲学“陈世美”在闹离婚。孟雪想，有其父必有其子，父亲是“陈世美”，儿子岂能对女人从一而终，白头偕老？

追求从一而终的孟雪毅然拒绝了小伙子，痴情的小伙子仍常到发廊纠缠，师傅只好介绍孟雪到她师弟胡鹏的理发店学艺。

那天，孟雪与师傅走进胡鹏的理发店，一幅破败的景象尽收眼底：地上已黑得看不清木板的纹路，墙上的镜子布满了灰尘，几块油渍渍的毛巾乱七八糟地挂在黑糊糊的门边。店里没有顾客，大病初李、面容枯槁的胡鹏正躺在那把吱呀作响的老式理发椅上打盹……

到这种地方学艺？孟雪的心凉了半截。师傅看出了她的心思，说，师弟的手艺本来不错，但由于他本人太懒身体又不好，才搞成这样，你若不愿留下就同我回去另想办法……

善良仗义和极富同情心的性格却使孟雪觉得：这个失意落魄的小老板急需人帮助，自己应伸出援助之手。

孟雪留了下来，一边学艺，一边竭尽全力帮助胡鹏。她把理发店收拾得焕然一新，所有的熟人都被她拉来成了小店的固定顾客。一有空，她就礼仪小姐似的站在门口招待客人。生意红火起来后，孟雪又建议胡鹏将隔壁的房子租下来，建成小城第一家规模很大的洗发屋，并兼营吹风和理发工具……

经过几年的惨淡经营，胡鹏的荷包鼓了起来，买了住房，还存款10多万元，那枯槁的脸在孟雪的照料下也日渐红润起来。对这一切变化，胡鹏由衷感激并爱上了漂亮能干的徒弟。他在理发店外挂上了“梦雪发廊”的牌子，在孟雪20岁生日的那天晚上，胡鹏向徒弟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见孟雪羞得满脸通红，低头不语，已很了解徒弟婚姻观的胡鹏忙说，孟雪，嫁给我吧，我会一生一世呵护你，一生一世只爱你一个……

孟雪答应了这桩婚事。新婚之夜，孟雪小鸟依人般偎在丈夫怀里说：胡鹏，从今以后，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了。妻子的柔顺，唤起了胡鹏的怜爱，他指天盟誓：放心吧，我

若对你三心二意，电打雷劈！

后来，夫妻关系发生了裂变，孟雪猛然省悟：真正的爱不需要誓言和诅咒，用誓言和诅咒表示的忠诚是靠不住的。1995 年，孟雪生下儿子方方后，不知是胡鹏忘了自己的誓言和诅咒，还是善于经营的老婆赚来的钱唤醒了他心底沉睡了多年的淫欲，他不怕“电打雷劈”，与麻纺厂一个“小姐”鬼混在一起。直到有一天，孟雪在属于自己的那张床上撞见胡鹏与那位“小姐”时，她才如梦方醒：原来花心的丈夫拒绝从一而终！

面对丈夫的背叛，柔弱的孟雪只是用哭声表达内心的悲伤。自知理亏的胡鹏忙向妻子悔过认错，表示不再犯类似的错误，如若再犯鬼神不饶，不得好死。

丈夫的诅咒使孟雪获得了一种微妙的心理平衡。她原谅了丈夫，用宽恕的针线缝补着夫妻关系的裂痕，用无微不至的关心去唤回丈夫放纵的心。

胡鹏的诅咒和孟雪的关心未能约束住胡鹏的花心，不久，孟雪又发现丈夫与常来发廊洗发的女人有染。这次，善良柔弱的孟雪连责问花心丈夫的勇气也没有了。她跪在胡鹏面前喃喃道：是不是我做得不好，你才去找其他女人？你说嘛！说了我今后改……

孟雪的软弱不但没能使丈夫回心转意，相反，竟增添了胡鹏拈花惹草的胆量。孟雪受伤的心灵还未从巨大的痛苦中复苏，他又无所顾忌地与另一个 19 岁的姑娘勾搭成奸。他恬不知耻地说：我喜欢女人是花而不是果实。孟雪虽风韵犹存，但生过孩子的女人毕竟已是昨日黄花，多了富态，少了清秀……

孟雪忍无可忍了。1997 年底，她盛怒之下，离家去了广州。同病相怜，怎挥得起报复的刀片

在广州一家发廊里，孟雪凭自己的技术很快就谋到了一份收入颇丰的职业，生活虽安定了，但对儿子的牵肠挂肚，对家的眷恋，对花心丈夫的愤恨交织在一起折磨得她日夜不宁。后来，她又不断听到胡鹏日嫖夜赌的消息。孟雪气累交加，病倒在床。达川在广州打工的一个女友去看她，同去的还有一个 19 岁的达川老乡，叫文小刚。文小刚对孟雪很有好感，隔几天便买些东西去看她。孟雪出院后，文常到发廊找她洗头，请她吃饭。有一天，文小刚突然把孟雪拥入怀中激动地说：孟雪，我爱你！

孟雪惊得边推边嚷：这怎么行？我比你大 7 岁，并且，已有了丈夫。文小刚仍把孟雪紧紧抱住说，孟雪，年龄并不是影响我对你真挚情感的障碍。主要是你觉得这样对不起丈夫。既然你丈夫那么不在乎你，再三再四地背叛伤害你，你为什么还要为他守那从一而终的贞节牌坊？

文小刚的话勾起了孟雪郁积多时的悲愤，她坚守了多年的“三从四德”的堤坝顷刻间轰然坍塌。她在心底建起了一座埋葬花心丈夫的坟墓……

胡鹏虽然在孟雪心中死去了，但一旦面临要割断一纸结婚证维系的婚姻，孟雪的感情却是矛盾的。1998 年春节前夕，孟雪听说胡鹏又在追一个叫刘晓琳的女人，胡鹏也几次捎信催孟雪快回达川离婚。尽管孟雪已同文小刚“好”上了，但那从一而终的幽灵又从她心底的

那座坟墓里爬了出来，使她醋意大发，怒火中烧。她觉得以前与胡鹏鬼混的那些女人都只是逢场作戏，骗点钱财而已，并不直接威胁自己家庭主妇的地位，而这个刘晓琳却要将自己取而代之，实在太可恨了！愤怒之中，孟雪瞒着文小刚带上从熟人那儿弄来的一瓶硫酸和一把理发刀片赶回了达川，她要让刘晓琳用自己的血去祭奠夺人之夫的野心。

回到小县城，孟雪在旅馆住下后便四处打探刘晓琳的住处。听说刘晓琳每天下午 6 点前都要到县妇联幼儿园去接孩子，孟雪直奔幼儿园门口等候。她用围巾蒙住了自己的脸，准备作案后能跑就跑，跑不了就割腕自杀……

在幼儿园门口，通过他人认出刘晓琳后，急于报复的孟雪却被刘晓琳那令漂亮女人都会嫉妒的秀美和高雅的气质震撼了，但被震撼的同时，孟雪心中报复的火焰也熊熊燃烧起来：“正是这张秀美的脸和她那高雅的气质迷住了胡鹏，否则，胡鹏早到广州来接我了。现在，这个可恨的女人还要取代我，简直太可恶了！”想着想着，孟雪从挎包里取出硫酸，缓缓迎了上去。当孟雪正要往硫酸泼向刘晓琳时，她看到：刘晓琳左手牵着一个 4 岁左右的小女孩，背上背着一个男孩，而那男孩正是自己日夜牵肠挂肚的儿子方方！

那一瞬间，孟雪的心被强烈震颤了，“刘晓琳背着我的儿子，而让自己的女儿走路，我怎忍心用硫酸去泼她！”但不把硫酸泼出去，又实在难消心中的怒气。孟雪不知所措地呆立在那里，直到刘晓琳带着两个孩子过去了，她才拿定主意：这女人对我儿子还不错，单从这一点看，她还有点良心，先不给她泼硫酸，等有机会，用刀片放她点血，警告一下算了！

但当晚在一个朋友处听说了刘晓琳的情况后，孟雪不仅动摇了要对刘“放血”的计划，还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同病相怜之情。

刘晓琳出生于重庆市万县的、一个农家，1993 年高中毕业后嫁给了一个搞建筑的包工头。包工头只读过三年小学，刘便长期帮丈夫管理账务，应酬谈判、签合同等业务。由于刘晓琳的全力操持，包工头赚了好几百万元。刘晓琳生下女儿后，包工头以照顾女儿和父母为由，把刘晓琳留在了家中，自己又找了个 17 岁的“女秘书”。后来，“女秘书”怀孕，逼着包工头扯了结婚证。刘晓琳知道后，气得要去告发包工头的重婚罪。可包工头的父母双双跪下求刘晓琳放过他们的儿子。善良的刘晓琳只好流着泪含恨在离婚申请上签了字，然后带着女儿流落到了达川地区某县，以卖水果维持生活。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又要进货又要摆摊，实在力不从心，百般无奈的她只好到酒楼当服务员。一次，胡鹏去酒楼喝多了酒，醉得不省人事，便同人一起把他送回了家。刘晓琳到幼儿园接女儿时经常看见胡鹏也在接他儿子方方，当晚，就把无人照顾的方方接到了自己家里。事后，胡鹏见刘晓琳漂亮且有风度，便对其动了心思，先是以感谢之名请刘晓琳吃饭，后来又常以发廊太忙求刘到幼儿园帮忙接方方，接触一段时间后，他向刘晓琳挑明心事，并多次说孟雪已同文小刚“耍”起了，他与孟雪离婚是早晚的事。但刘晓琳却说，自己也遭受过伤害，不愿再去伤害一个不幸的女人，在孟雪未离婚前，她是不会与胡鹏确定什么关系的……

知道了这一切后，孟雪痛苦地自问：对这个与自己一样善良一样不幸的女人，我还挥得起报复的刀片吗？

第二天，孟雪怀着复杂的心清回到了广州。

救情夫，痴情女

坠入深渊

火车到广州已是凌晨回点，孟雪连给文小刚打了几个传呼都不见回电话，她赶回与文小刚租住的小屋，发现文小刚口吐白沫，脸色发紫地躺在床上。吓得孟雪哭着连背带拖地把文小刚弄进出租车送到医院。

文小刚是注射海洛因中毒。医生说，再晚一两个小时送来人就没救了。

孟雪听后如五雷轰顶：天啊！文小刚吸毒？接触两个多月了，自己怎么不知道！惊惶之中，孟雪眼前不断闪现出电视中那些因吸毒搞得家破人亡的故事和吸毒者痛苦不堪的惨状。跟这样的人在一起，自己不是还未脱离虎口又入火坑吗？孟雪决计马上离开文小刚。

就在孟雪准备悄悄离开时，病床上文小刚的一阵呻吟唤起了孟雪善良仁慈和极富同情心的本性。她甚至责怪自己：文小刚吸毒再不对，但在他最需要人帮助时我怎能扔下他一走了之呢？

孟雪留了下来，精心护理着文小刚。文小刚感激不已，出院后，在自己的左臂上纹了“Xue , hove you”（雪儿，我爱你）几个大字。他说孟雪给了他第二次生命，非要孟雪马上回去与胡鹏离婚不可，然后他俩结婚，他要报答孟雪一生一世。这些举动和话语感动了曾多次下决心在文小刚出院后就马上分手的孟雷。她留了下来。她要再造方舟，帮助文小刚脱离毒海。

1998 年的整个夏天是一个动人的季节。几个月里，为帮助文小刚戒毒，孟雪辞去了发廊的工作，卖了自己价值 5000 多元的金首饰，当掉自己的高档衣服，她在蒸笼般的厨房里为文小刚熬解毒的银耳汤、绿豆汤，想方设法给文小刚弄好吃的滋补身体，陪文小刚四处散心。为了向文小刚表示自己愿与其生死与共，7 月底，孟雪还专程赶回川东与胡鹏办了离婚手续……

然而，孟雪的一切心血都白费了。文小刚的毒瘾屡戒屡发，后来，他竟要求孟雪让他暂时以贩养吸，今后再慢慢戒掉。

孟雪明知这是一条危险的犯罪之路，但文小刚的现状使她产生了一种明知不可为却偏要为之的病态心理。她侥幸地想：不一定一贩毒就会被抓住，等文小刚戒毒后，就坚决不干贩毒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了！

为了赚更多的钱，1998 年 9 月，文小刚带上 100 克海洛因回到川东某县孟雪家中进行贩毒活动。不久，广州的毒贩又送来 100 克海洛因让文小刚卖。11 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文小刚要出去送“货”，但早上洗碗时，一个好端端的盘子突然破裂。孟雪觉得预兆不好，便阻止文小刚随身带“货”，她让文小刚先去联系好买主，然后打电话通知，她再把“货”送去。孟雪计划得很周密，但当她带着 20 克海洛因出现在贩毒现场时，还是被几个一拥而上的便衣警察抓住。不远处，戴着手铐的文小刚一脸惶恐，浑身颤抖地站在那儿。接着，警察在孟雪的家中搜出了 70 多克海洛因……

孟雪知道，文小刚所贩的毒已达到杀头的数量，爱帮助人的性格使她决定救情人于危难之中。在押解途中，趁汽车颠簸之机，孟雪凑到文小刚耳边说：别怕，就说那 70 多克海洛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果然，审讯时，文小刚把所有的“事”都推得干干净净，而孟雪则以一问三不知伴着痛哭流涕对抗审讯。这起重大的贩毒案陷入了久侦不破的窘境。惺惺惜惺惺，“情敌”再造方舟

进入看守所后，孟雪仍牵挂着文小刚。她担心情夫在审讯时说错了话，担心他毒瘾犯了受不了那份苦，更操心监舍里的条件、生活太差，把文小刚的身体拖垮了。进看守所后，孟雪家里每月都给她交 400 元左右的费用，但孟雪舍不得自己用，她让监管干部全转给了文小刚。

孟雪的“仗义”未能让文小刚及其家人领情。为了活命，文小刚不仅把贩毒的事全推给了孟雪，还“检举”孟雪是老毒贩子。当初竭力反对儿子与孟雪往来的文小刚父母则通孟雪家卖房子去“活动”，救文小刚出狱后，他们对孟雪的母亲说：是你女儿连累了我家小刚，孟雪应当承担这一责任。未达到目的，文小刚的父母恼怒地拿走了文小刚以前送给孟雪的衣服。

孟雪知道后，心情恶劣，伤心至极，她柔弱的性格可以承受国情夫而蒙受的牢狱之灾，可以承受失去自由失去亲人的痛苦，却无论如何也载不动这种无情无义、恩将仇报的卑鄙行径。她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太虚伪太可怕了：当初，自己同情、帮助胡鹏，一有了钱，胡鹏就背叛了自己；后来，以赤诚之心对待文小刚，不想又当了一回救蛇的“农夫”，活在这些薄情寡义的人中间有什么意思。于是，孟雪想撞墙一死了之，幸好被同监舍的女犯救下。

当孟雪的灵魂在茫茫苦海中迷失方向痛苦挣扎时，1999 年 4 月的一天，有人来看她。在那道阴森的铁窗前，孟雪一眼看见是前不久与前夫胡鹏结婚的刘晓琳。尽管自己也很同情刘晓琳的遭遇，知道是胡鹏主动追刘晓琳，但孟雪心中还是升起了一股怒火：这女人与自己最恨的男人结婚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她决定拒绝与刘晓琳会见。

就在孟雪转身离去时，刘晓琳轻轻喊了一声：雪儿！声音亲切柔和，像在呼唤自己的亲人。孟雪的心猛一收缩，不由自主地把目光移向刘晓琳，她看到了一双诚挚而热情的眼睛。孟雪禁不住又想起在幼儿园门口看见她背着方方的情景，耳畔又响起了儿子那“刘姨给我洗澡、洗衣服，对我好”的称赞声。孟雪有些感动了，她苦笑着对刘晓琳点点头，然后缓缓走了过去。

刚说了几句问候的话，刘晓琳便问：“听说你在案子上不配合？那样对你是不利的！”

孟雪长叹一声，摇摇头，接下来很久不说话。在伤感的沉默中，刘晓琳在孟雪的眼中探寻着她的心思。然后，她平缓而充满感情地说：“孟雪，我知道你是个善良和重情义的人，这很难得。但是，如果像善良的农夫和东郭先生一样去救毒蛇和狼，那就是善良和重情义的悲哀了。后来，那善良的农夫和东郭先生不是被……”

“别说啦！”孟雪猛地打断刘晓琳的话。显然，刘晓琳的话触动了她，两行热泪顺着她的腮滚滚流下……

当天，孟雪向办案人员交待了案情。6 月底，法院审理了这桩已拖了 7 个多月的贩毒

案。开庭那天，刘晓琳买车票带着孟雪的儿子、母亲、哥、嫂等亲人到庭旁听。休庭时，刘晓琳抱着方方挤进群，安慰十分伤心的孟雪……

过了几天，知道孟雪情绪很不稳定，刘晓琳又去看看守所看望。见面后，对哭成泪人一样的孟雪，刘晓琳没有更多的劝慰，临别时才说，雪儿，人生在世难免遇到些坎坷磨难，要输得起，要坚强些！有个美国人说，一个人可以被消灭，却不能被打倒。

孟雪停止了哭泣，抬起头用明亮的大眼睛深情地望着这个昔日的“情敌”。

7月中旬，刘晓琳又去看望了一次孟雪。孟雪的情绪好多了，刘晓琳还未开口她便叮嘱道：刘姐，这些天我老在想，你是个善良人，对胡鹏，可千万别再像我那样一味地宽容迁就他，你要管住他两点，一是别让他与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打交道二是别让他赌博……

刘晓琳被感动了。她把手伸进铁窗与孟雪紧紧握在一起（注：采访时，孟雪说，她那个花心的前夫还要在小县城里为人处事，所以，不要写他们的真实住址和姓名；免得给前夫和刘晓琳的生活带来不便。根据孟雪的要求，作者隐去了所有的人名和他们所在的县名。）
手记之三十一：叔嫂相恋，那家破人亡悲剧的编导是谁

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这场悲剧中最触目惊心的一幕：1999年9月29日那个风高月黑之夜，四川省达州市所辖的万源市丝罗乡个体老板孙代福被人杀死在家中，其妻罗代沛也被五花大绑并用胶布封嘴，商店的400多元钱被洗劫一空……

警方的侦查和民间的猜测初期统统在图财害命的思路下进行，人们查找凶手的目光也坚定地集中在与孙家有仇或有吸毒赌博等恶习的人身上。然而，2000年4月16日，受害人的胞弟孙代平，妻子罗代沛及孙代平的朋友王波一家三口的名字却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出现在达州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中……

亲情、爱情、友情是美好的。但一种纯真的叔嫂之情是怎样在“爱情”的引诱下演绎成夫妻反目、兄弟仇杀的洪水猛兽的？朋友与朋友的父母又是怎样在“友情”和“父子之情”的驱使下沦为杀人帮凶？

这悲剧中的恩怨是非给人们留下了太多太沉重的教训。失职的丈夫成全了叔嫂的“两小无猜”之情孙代福在兄妹6人中排行老三，早年在黄钟酒厂工作。比他小7岁的妻子罗代沛天生丽质，虽从不刻意打扮化妆，但朴实文雅的风韵中却显示出一种特殊的漂亮。罗代沛的勤劳贤淑在当地更是有口皆碑。婚后，见公公婆婆年事已高，她便与丈夫主动负担了供小叔子孙代平读书。每月，她与丈夫节吃省用，总是早早地将生活费用寄给孙代平，有时手头不方便，她就回娘家借贷从不误给小叔子寄钱。后来，罗代沛怀孕了，孙代福买了几斤她极馋的桔子，她忍住馋给孙代平带去了一半。她说，代平正长身体，学习又费脑，可不能亏待了他。

罗代沛的贤淑赢得了丈夫和公婆的好感。但后来她为孙家生了个女孩，这令丈夫和公婆痛心疾首。公婆哀声叹气，拂袖而去，以前性格豁达开朗的孙代福对妻子一下变得“深沉”起来，眉宇间总带着忧郁般的严肃，目光中那不屑一顾的漠视总是毫不掩饰。他天天去“忙”工作，把家务和带孩子的事全推到了罗代沛身上。

受到冷落的罗代沛惟独得到孙代平的敬重和帮助。这个外表憨厚老实却善解人意的小叔子从不叫罗嫂子而称之为“三姐”。1987 年初中毕业后，孙代平本可在丝罗街上打工挣钱，但他见“三姐”实在太忙太累，便主动去黄钟帮着带孩子做家务。有弟弟帮忙，孙代福就更“忙”了，常“忙”得不归家，留下罗代沛与孙代平相依相伴。罗代沛在酒厂附近的农民处借了些土地种植饲料喂猪养鸡，孙代福总让孙代平与罗代沛一起去耕种；罗代沛利用厂里的空闲时间去周围场镇收香菇做生意，孙代福也派弟弟用自行车接送，甚至连接送罗代沛回娘家的事，孙代福也让弟弟“代劳”……

罗代沛在默默忍受丈夫的轻慢和不近人情中渐渐习惯了小叔子成天与自己“鞍前马后”地出双入对。善解人意的孙代平对“三姐”也越来越体贴入微，殷勤有加。他从不让罗做重活脏活，用自行车接送罗代沛时，他宁肯自己累得气喘吁吁也决不让“三姐”下车走路。有时，孙代平回丝罗需要多住些天，他一定会挤时间赶回 12 公里外的黄钟为“三姐”劈好柴挑好水后再回到丝罗。

长期的关爱与呵护难免产生出感情来。讲述这种情感时，罗代沛、孙代平在万源市看守所两次不同时间的审讯中竟不约而同地使用了“两小无猜”这个词。他们说，那时，他们如同亲姐弟般的感情确实是纯真无邪的。他们举例说，罗代沛的肾有毛病，小便频繁，与孙代平在地里干活时常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解便。次数多了，罗便有些烦，后来，要解小便时，她干脆向小叔子说声“转过身去”，便原地“方便”起来。十八九岁的孙代平虽觉有点尴尬，心中却从无邪念。

1990 年，医治孙代平肛门处的漏管时，罗、孙二人“两小无猜”的感情发展到了极至并渐渐开始越轨。那年春天，孙代平在黄钟做了漏管手术后，罗代沛天天为其洗衣煮饭，端水倒尿，有时还亲自为小叔子擦洗伤口。第一次，孙代平死活不让“三姐”洗“那种地方”的伤口，罗代沛嗔怒地朝他屁股拍一巴掌说，我是你三姐，害什么羞嘛！一个月后，孙代平病愈，孙代福让他回丝罗去养一阵。临走时，孙代平竟有些恋恋不舍了。他眼睛红红的声音有些哽咽地对罗代沛说：三姐，我不想离开你！罗代沛一边给小叔子收拾东西一边劝道：弟弟，都快 20 岁了，总不能老跟着三姐吧。听话，回去养一段时间再过来。罗代沛一发话，孙代平立即像幼儿园的乖男孩一样使劲点头。临行前，孙代平脸憋得鲜红，两眼久久地盯着罗代沛，几次欲言又止，罗代沛奇怪地问：代平，想说啥呀？扭捏了许久，孙代平才咬咬嘴唇说，三姐，我……我想亲你一下！罗代沛被小叔子的要求震惊了，愣了半晌，才不自然地笑笑答应：可以。她指指左脸颊补充道：不过，只准亲这里！孙代平使劲地点着头走过去，咽了口水后把嘴唇轻轻吻在罗代沛的左脸颊上。

这一吻满足了他们的情感欲望，也拉开了他们人生悲剧的序幕。浪漫的“柏拉图”泛滥成灾

载着孙代平离去的客车捎走了罗代沛的满腔爱意，也给她留下了无尽惆怅，她一下陷入了不可名状的落寞之中。

好些天过去了，罗代沛依然心事重重，坐卧不宁，她忘不了与小叔子在一起时的欢快与喜悦，更忘不了那一个深情的吻。她觉得孙代平的影子老在眼前晃来晃去，忙不过来时，她总要习惯地喊：代平，快来帮三姐一下！吃饭时，还好几次把孙代平的碗筷摆上桌，然后，

对女儿说，去，叫么爸吃饭了。孙代福诧异地打量着罗代沛问：你丢魂了，人家早走了你还总是忘不了！

丈夫的话说得罗代沛心跳耳熟。她这才明白：自己已不可救药地喜欢上小叔子了！但她马上觉得这是一个不合人伦常情的念头，真那样，怎对得起丈夫！何况，小叔子小自己 7 岁，他干的一切都不过是出于对自己这个“三姐”的尊重罢了，怎能胡思乱想？

她在心底努力清除着那个不洁的念头。

据孙代平后来讲，那次短暂的分别他也是一样相思一样难受。当时，孙代平的嘴上已长出毛茸茸的胡须，一种本能的不可抗拒的冲动开始在他的血管里喧嚣奔腾。过去在学校时，那蒙昧的性意识一直笼罩迷惑着他，他老对女性想入非非并暗恋着一个女生，带着膨胀的对性的迷惑他到了罗代沛的身边。嫂子的关爱一下把他对异性的迷惑和暗恋吸引了过去，不过，在人伦道德的约束下，出于对罗代沛的感恩与敬重，孙代平的迷惑和暗恋一度曾真的变成了一种纯真的“两小无猜”之情。但因对罗代沛过分依恋而诱发出的那个临别一吻却勾起了他人性中渐已沉寂的野性，使他心猿意马，想入非非。回丝罗养病的十多天里，孙代平魂不守舍，度日如年。当时，正好他的漏管复发。于是，他趁机回到了黄钟。这次，叔嫂相见，他们都显得激动异常，对视片刻，二人就情不自禁地拥抱、接吻起来。由此，罗、孙二人“两小无猜”的纯真情感在维持了 3 年多之后开始越轨了。

越轨之后他们也曾想悬崖勒马。那是孙代平漏管复发回黄钟后的第三天，罗代沛认真地告诉小叔子：代平，我们只能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见小叔子用茫然疑惑的目光盯着自己，她解释说，保持像柏拉图式的那种精神恋情关系，只能爱在心里。也许是见小叔子一下接受不了这个“柏拉图”，过了不久，罗代沛又放宽条件说，浪漫点也可以，比如，说说情话，写写情书什么的，但最多只能接吻拥抱，当然，还可以抚摸……

那以后，罗、孙二人的确在柏拉图式的防线内驾驭着自己的感情。当着外人，他们循规蹈矩，慎重矜持。背地里，他俩却形影依依，情意浓浓。那情话，那狂吻，那拥抱抚摸虽是偷偷摸摸却日渐热烈，情感的潮水越来越汹涌澎湃地拍击着他们那道脆弱的防线。

终于有一天，这防线裂开了一道口子。1990 年国庆节，一位常到孙代福家玩耍的职工惨死于车祸，孙代福前去奔丧的那天晚上，罗代沛觉得室内的耗子特别活跃，疑是那死者故地重游，不由一阵毛骨悚然。半夜里，惊恐万状的罗代沛叫醒孙代平，要他睡到自己身边。孙代平听后像受到电流触击一样震颤起来，语无伦次地说，干这种事，三姐，哥哥知道了……罗代沛娇嗔道：谁叫你干什么事？只不过喊你睡到一起给我壮壮胆而已！

那晚，叔嫂同枕共眠，除接吻拥抱外，他们的确未干什么，甚至到 1991 年底，他们的情感游戏仍然活动在柏拉图式的防线内。但这一夜对孙代平却是刻骨铭心和情感发生蜕变的一夜。后来，他交待说，以前，我就觉得柏拉图式的恋情是圣人们玩的情感游戏，这游戏太高尚，太折磨和考验人，我这种凡夫俗子接受不了这种折磨与考验，那一夜与三姐睡过后，我就在心里想：让他妈的柏拉图见鬼去吧！

从那一夜后，只要孙代福不在家，孙代平便要罗代沛鬼混，提出看裸体等下流要求，罗代沛每次都半推半就地满足了小叔子的要求。终于，多年来一直迷惑着孙代平的那个“性”

被他从嫂子身上一层层地揭开了神秘的面纱。1991 年的一天晚上，趁孙代福外出之机，罗、孙二人的柏拉图式恋情的防线终于被他们自己彻底摧毁。孙氏家族家破人亡并殃及王波一家三口的悲剧正式开始了。

悲剧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悲剧的色彩——只那么一次，罗代沛便有了身孕。两个月后，出差归来的孙代福一再追问，罗代沛在遮掩之中不慎泄露了天机。知道弟弟干出了这种败坏人伦常理的事，孙代福气急败坏，当即扣下孙代平在黄钟酒厂打工的 200 多元钱，逼罗代沛去医院打掉了罗、孙二人那柏拉图式恋情的“种子”，然后，将孙代平一顿臭骂，责令其写下不再与罗代沛往来的保证书后，将其从黄钟驱逐出境。不能沟通的亲情终于反目成仇

孙代福的气急败坏和处理方式是可以理解的。一个男人，尤其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碰上这样的事能这样去处理恐怕已算是很克制和冷静了。

遗憾的是，孙代福没能以克制和冷静的态度去处理罗、孙二人的“善后事宜”。

有人认为，罗、孙东窗事发后，孙代福有两种较为明智的选择。

一是举家远离与妻子有染的孙代平（至少可以呆在黄钟不回丝罗）。心理学家说，距离和时间能冷却最炽热的情感，能医治人心中的伤痛。离得远了、久了，罗代沛、孙代平想保持不正当的关系就没有了机会和时间。时间久了，孙代福受到伤害的心也许真能治愈。可惜，孙代福当时似乎根本没有考虑这种选择。

第二种选择是搞好沟通，用宽恕的针线缝补夫妻、兄弟之间的裂痕。人与人之间需要沟通。夫妻之间、兄弟之间、叔嫂之间也是如此。人与人之间也是可以沟通的，更何况有血融于水的兄弟关系和夫妻感情作纽带。只要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相信没有解不开的结。如果孙代相当时选择了沟通的话，他不难发现：从罗、孙的感情历程看，二人当初也并不是以淫乐或结婚为目的——1987 年至 1991 年他们仅仅发生了一次性关系。此外，二人也曾有悔改之意，也曾想割断这种有违伦理道德的关系——1992 年至 1998 年 12 月之间，他们基本上已恢复了较正常的叔嫂关系。在这期间，罗代沛、孙代平多次向孙代福忏悔，表示愿改过自新。采访时，孙代平说，我们毕竟是血融于水的亲兄弟呀，谁愿这样继续去伤害自己的骨肉同胞？此时，孙代福如果能用宽恕的针线去缝补夫妻关系，在家中尽好丈夫应尽的职责，外人还能从妻子那里打开感情的缺口乘虚而入吗？如果他真的消除了与孙代平之间的隔阂，孙代平不继续伤害骨肉同胞也未必就是假话。

可惜的是，孙代福拒绝了妻子和弟弟的忏悔，他“不相信这对狗男女能改过”。他暴怒地对孙代平吼道：你能改，除非天下的狗都不吃屎！此后，孙代平又托人去孙代福那里沟通，但孙代福仍然拒人千里之外——他堵死了所有的调解渠道，他拒绝沟通！

有人曾为孙代福的这种做法叹息不已；拒绝忏悔，拒绝沟通，这无异于为渔驱渊，逼人成仇！

1992 年，孙代福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与妻子双双离开黄钟酒厂，在丝罗街上离孙代平住处不到 300 米的地方修建新房，开起了商店。当时，他也想到了继续让妻子与

孙代平在一起的后患，房子修好后，他向孙代平“建议”，为了你的前途，到外地去打工吧！孙代平明白哥哥是不放心自己留在“三姐”身边，要将自己逼出家门。但是，内心有愧的孙代平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一“建议”。此后的三年间，他虽在万源市的平溪、青花、旧院等地打工，但为了让哥哥不再怀疑自己，他极少回家。他想：一个是同胞哥哥，一个是自己所敬爱的三姐，只要他们能过得安宁幸福，自己不去打扰也罢。

罗代沛没能像孙代平想象的那样幸福安宁。孙代平与妻子的事像一股越烧越旺的无名火，时时灼痛着孙代福的心，性格越来越忧郁寡欢的他用阴沉哀怨的眼光漠视着妻子，以受害者的身份居高临下地对待罗代沛，两人的感情每况愈下。一提起孙代平，孙代福就横眉鼓眼，摔盆砸碗，有时还将罗代沛打得鼻青脸肿。不堪忍受的罗代沛曾多次提出离婚，但孙代福死活不肯。想到自己有愧于丈夫，想到女儿，想到名声和面子，罗代沛一次次放弃离婚的念头，小心翼翼地维系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面子和名声终归还是被孙代福败坏无遗。一次，罗代沛的妹妹、妹夫到丝罗做客，一件小事惹怒了孙代福，他趁机发作，把“罗代沛偷小叔子”的丑闻闹得路人皆知。

与此同时，被“曝光”后的罗代沛感情深处也筑起了一座埋葬这个家庭和丈夫的坟墓。她又开始思念那个善解人意，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小叔子了。她甚至后悔以前还不够放纵，还不够大胆，要死要活地爱了三年多才与孙代平有一次两性关系。

她生出了与小叔子重温旧梦、报复丈夫的恶念。1998年冬，罗代沛向孙代平表白说：自你哥哥把我俩的事传出去后，我就不对他报什么希望了。在这世界上，我最爱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女儿，一个是你！我这后半生就全靠你了，你是我灵魂最后的梦。接着，她问孙代平：如果我和你结婚，你敢不敢？罗代沛的话令孙代平激动得一阵颤抖，想到眼前这个女人因自己而被弄得臭名远扬，想到哥哥对她的漠视和不原谅。他不由愤慨地大声答道：敢！冲他对你的恶劣态度，我什么都敢！觉得不解气，孙代平最后又补充道：他再对你不好，我杀了他都敢！

一把难合标准的尺子量断了兄长性命

1994年后的几年间，与罗代沛基本断了往来的孙代平也曾要过五、六个女朋友，这些女孩子大多与他同居过，但他却没有选中一个。不是女孩子们不漂亮温柔，也不是女孩子们条件不好，更不是女孩子们看不起孙代平，而是孙代平把罗代沛当作了一把衡量自己求偶标准的尺子——女方的高矮胖瘦他要用这把“尺子”去衡量，为人处事他要以这种“尺子”作比较，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他要用这把“尺子”去对照，甚至与这些人发生两性关系时，他也会想到他的那把“尺子”。结果，这把“尺子”量断了他所有的姻缘。

孙代平的心被罗代沛牢牢占据着，没有女人能走进他的生活。后来，孙代平倒是看中了一个酷似罗代沛的姑娘。但当那姑娘去丝罗时，有人偷偷向她泄露了孙代平与罗代沛的事，那姑娘马上不辞而别。事后，孙代平一直怀疑是孙代福泄露了自己的“天机”，于是，心中又多了一颗仇恨的种子。

孙代平怀恨去了河北，与人承包挖煤。一次，煤井塌方，孙代平的右手被砸断两根指头。孙代平为了多得赔偿费，打电话叫罗代沛与她在法院工作的亲戚去河北找厂方打官司，可孙代福却兴灾乐祸地说：报应发了吧！来帮你打官司？收尸还差不多。后来，罗代沛抚着小叔子伤残的手声泪俱下地说，我本想不顾一切地来护理你，但你哥哥坚决不准。谁叫我们只是

叔嫂关系呢？这些话如火上浇油，孙代平对哥哥的仇恨也就更加强烈了。

1996 年，孙代平去北京、广州等地打工，但由于手已伤残，很多时候都找不到工作。1998 年底，他只好回到了丝罗。回丝罗后，怀着对哥哥的仇恨，他再次与罗代沛勾搭成奸。每次与小叔子亲热之后，罗代沛都会潸然泪下向孙代平诉说孙代福是如何折磨她，她是如何想脱离孙代福，她又是如何对孙代平魂牵梦绕、日思夜想。并说，如果不是想到女儿和代平弟，自己早就自杀了！孙代平听后心如刀绞。他咬牙切齿地说，老子总有一天要杀了这王八蛋！

1999 年 4 月，怀着一个罪恶的计划，孙代平向罗代沛要了 300 元钱再次去了深圳。9 月 26 日，孙代平与他的好朋友王波悄悄潜回丝罗藏在家中。在这以后的两天里，孙代平迟迟没有动手。他后来交待：其实，在杀孙代福之前的那两天里，我心里斗争很激烈。他毕竟是我亲哥哥，小时供我读书，初中毕业后又与他住了好几年，要杀死他还真下不了这个决心。但准备不干时，又想到他因三姐生了女儿就冷淡三姐，什么事都让我与三姐一起去干，与三姐有了感情后我们也想断，但他不肯原谅我们，对三姐不好，逼我外出打工，把手整残了，连找份工作都艰难得很，还把我们的丑事闹出去，害得我找的对象也吹了……想到这些，所有的悲哀和长久的怨恨一齐涌上心头，我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在不停地鼓动自己：杀死他！否则，你永无出头之日！于是，我终于下定了杀孙代福的决心。

29 日凌晨 3 点，当孙代平与王波带着水果刀和银头蒙面从街后爬上孙代福家二楼的窗口时。他再一次犹豫了，在窗口呆了好几分钟没有进入室内——他心中害怕，他的决心在一点一点地动摇。采访时，他这样讲述那几分钟的内心活动：……趴在窗口往室内看，我想起了在这里与三姐第一次发生了性关系，想起了我常在这里与三姐幽会，想起了三姐在这里给我带来的欢笑快乐，想起了三姐在这里向我倾诉三哥对她的漠视与折磨，想起了要与三姐结婚的目的。于是，我咬咬牙，与王波跳进了室内。

响声惊动了孙代福，他开亮灯跳下床与王波扭打起来，孙代平冲上前朝孙代福头上就是几锄头，将其打昏在地。这时，罗代沛被惊醒了，大声叫了起来，孙代平扑上前堵住她的嘴，罗代沛乘机抓掉孙代平头上蒙面的布，见是小叔子，就再也不吭声了。这时，孙代福醒了过来，摇摇晃晃地往起爬，孙代平接过王波手中的刀，朝孙代福的脖子就是几刀，孙代福鲜血四溅，当场毙命。罗代沛站在旁边平静地目睹了这血腥的一幕，她没有阻止，没有惊叫，甚至没有表情。

杀死孙代福后，孙代平一膝跪在罗代沛面前说：三姐，我是为你才干的这一切，你快点拿钱让我们跑！收好罗代沛拿出的 400 多元钱后，孙代平并没有马上逃走，他用绳子捆住罗代沛，再用胶布将其嘴封住。见其气喘吁吁，孙代平歉意地说：三姐，不这样，别人会怀疑你的……

第二天，警察来了。罗代沛死死咬定“是两个蒙面人干的。自己当时吓昏了，醒来时已被捆住并堵了嘴”。她想保住小叔子。但警方还是查出了蛛丝马迹。有人把警方的怀疑泄露给已逃往广州的孙代平，他本可闻风而逃，但他对帮凶王波说，我不能逃，我逃了三姐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已害过她一次，这次绝不能再害她了！10 月 10 日，他直奔警察布好的天罗地网而来。

当天，孙代平落入了法网。几天后，帮凶王波及有包庇嫌疑的罗代沛及王波的父母的名字相继出现在万源市检察机关的批捕决定书上……

手记之三十二：遭遇“强盗”——一个家族被毒品毁灭的悲剧

三个破碎的家庭，六位忧伤的老人，两个可怜的孩子

这就是那个曾拥有近百万元资产的牟家贵老板的家吗？

破败不堪的小平房没有窗户，凹凸潮湿的室内散发着浓烈刺鼻的霉味。除一台十八寸的电视外，没有其他家电，没有家具，甚至没有一只箱子。看不清颜色的被盖衣物胡乱地堆放在那张惟一的木床上，发黑的棉絮从被套的破洞中露出。床的周围横七竖八地摆着不知装了些什么的编织袋。结满蛛网的日光灯打不开，阴暗长久地笼罩着这个家庭……

即使如此，这个破烂的家还不全属于牟家贵，房子、木床是租的，连那张吱呀作响的饭桌也是借的。那曾享誉一方的雪棉牌卫生纸虽仍在离“家”十多米外的厂房里生产，但那些原料都是赊来的，曾为牟家贵带来过巨额财富的整个卷纸厂都已不属于牟家贵了，属于他的只有一身因劳累过度而留下的病痛。在众多疾病中，最折磨牟家贵的是肺气肿，越来越重的肺气肿使他枯瘦如柴，面如土色。医生说，再不好好治疗，说不准哪天就会突然出事。牟家贵也怕“出事”，早就想去医院，但他已无力支付医院的费用，只好在那些江湖游医处弄些药吃，实在不行了，才在家里输点液。

牟家贵病后，他年近 60 的老伴苏占惠不仅要以其那瘦弱拘接的身躯苦苦支撑这个家，还要照顾 4 岁的小外孙女。外孙女的爸爸胡坤因吸毒被判 3 年强劳去了资阳，她的妈妈——苏占惠的女儿牟明玉也因吸毒被关进戒毒所。牟家贵与苏占惠几次商议要把外孙女送到她爷爷家去，但前些年胡坤把两个老人的积蓄全骗去吸了“粉”，年过 70 的亲家和亲家母皆疾病缠身，朝不保夕。听亲家说，他老两口的“机动资金”只够买一口棺材，百年之后，就得看谁有幸能“捷足先登”去享用这口棺材了。这种境况，怎忍心再给亲家雪上加霜？牟家贵夫妇只好把外孙女留了下来，这样一来，苏占惠的负担就更重了。每天，她不到 5 点就起床把丈夫的药、饭等事弄好后，便送外孙女到很远的城北去上幼儿园。8 点前，再到他们那快倒闭的卷纸厂与几个雇来的临时工一起生产卫生纸。中午，忙完了家里，她马上急匆匆用三轮车拉着卫生纸满城去跑销售。下午 6 点前，再赶到幼儿园接回外孙女。有时，累得腰酸背痛的苏占惠还得利用晚上的空闲到她另一个亲家陆继元家去看看自己 5 岁的孙女。苏占惠的儿媳陆小莉因挪用公款 4 万多元作毒资被达州市某县检察院查处，从 2000 年 10 月起，她将在成都的一所监狱里度过 3 年的铁窗生涯。儿子牟兵也因吸毒被公安局追得东躲西藏。苏占惠维持快要倒闭的纸厂和照顾丈夫、外孙女已力不从心，只好把小孙女送到亲家处。

苏占惠知道，亲家陆继元的日子也不好过，老两口也都 60 多岁了，一生的积蓄全被自己的儿子牟兵和儿媳陆小莉连偷带骗地弄去吸了毒。每月的退休金只有 300 多元，家里添一个外孙女已难以维持生活了，前不久，他的儿子陆勇因无钱买“粉”在抢劫一妇女的金项链时被抓进了看守所，亲家母悲愤交加，积郁成疾，住院借了一大笔钱。看守所里的陆勇几次捎信说“里边”吃不饱，叫送钱去，陆继元只好借债给儿子送去几十元。钱虽不多，但对已陷入困境的陆继元一家来说，几十元钱的分量无异于一座大山那么沉重。每次到陆家，苏占惠都想好好劝慰一下亲家和亲家母，但看到一家老小那穷苦凄惨的样子，想到自己的女儿、女婿、儿子、儿媳和亲家的儿子被判的判、关的关、逃的逃，特别是想到孙女、外孙女四五

岁便失去了父母的关爱，失去了家庭，没有一个健全幸福的童年，苏占惠心中就感到阵阵刺痛，劝慰亲家时常常是未语泪光流……“试试吧，吸着挺好玩的”这一试，试出了3个瘾君子

几年前，牟家贵在他所工作的达州市某县造纸厂倒闭前，花3000元买断了他44年的工龄。一同下岗的工人们还未从最初的惶惑埋怨中解脱出来，牟家贵已利用自己在纸厂干过各个工种的特长和与县内外众多纸厂熟悉的优势，在全县办起了第一家卫生卷纸厂，他的爱人苏占惠、大儿牟川、小儿牟兵、小儿媳陆小莉、女儿牟明玉、女婿胡坤先后加盟，把一个小小的卷纸厂搞得红红火火。由于专事销售的牟兵、陆小莉、胡坤、牟明玉等人的努力，他们生产的雪棉牌卫生卷纸先后销售到了万县、渠县、营山等地，销售利润每月大多在三至五万元之间。干了两年后，牟家贵已有了近80万元的积蓄。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不可能在得到金钱财富的同时拥有明智。对于有的人来说，钱多是一件危险的事。

在销售活动中，几千几万的钱常常经过牟兵的手，他渐渐有了大款那种财大气粗的感觉和一展财力的冲动。他说，他要活个轰轰烈烈，风风光光。于是，他吆三喝四，交朋结友，常出没于灯红酒绿的酒家歌厅醉花卧柳，寻欢作乐，对那些“小姐”们一掷千金，对那班哥们儿他更是出手大方。“小姐”和哥们儿都称赞说，牟哥仗义疏财，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不久，牟兵又迷上了麻将。不过，他赌技不佳，屡赌屡输，但他却越输越赌，于是，赌友们赞他有气魄有风度，是赌场大侠。在一片称赞声中，牟兵体味到了有钱人的潇洒和威严。不过，老被人索取和盘算，牟兵初时的兴奋和热情渐渐开始消退，在“小姐”和赌友们的称赞声中他觉醒了过来：那些龟儿是想整老子的钱！他觉得这种“男子汉”风度和“大侠”的豪爽实在无多大价值和意义，他说，真正的享受应该是独特的时髦的和刺激的。他的那伙玩友中马上有人说，吸“粉”最刺激，只要一吸，就周身舒服，飘飘欲仙，没有烦恼，没有痛苦，想什么就来什么。玩友们建议说：牟哥，试试吧，吸着挺好玩的。

牟兵也曾听说过“粉”的厉害。但在玩友们的一再怂恿下，他想探究一下“粉”那奇特神秘的感觉。他告诫自己：只试试，坚决不能上瘾。点燃玩友赠送的“烟”，还未吸完，牟兵便觉得头晕想吐。他骂玩友：你他妈的骗人，难受死了，还说好玩！玩友马上扶他躺下说，牟哥，躺着别动，闭上眼睛试试看。牟兵照着玩友们教的去做，果然不难受了，还真有一种舒服和飘然欲仙的感觉在体内弥漫开来。他不由心中一阵暗喜：这“粉”真神！此后，又吸了几次，牟兵便把当初那“坚决不吸成瘾”的决心忘到了洼爪国——其时，他已成瘾了，只要一天不吸，便浑身无力，哈欠连天，鼻涕眼泪直流。从此，他每天都想法瞒着家人从销售卫生纸的款中弄出一笔钱去买“粉”。1995年秋的一天，牟兵的小舅子陆勇偶然发现牟兵和几个粉友在吸粉。牟兵害怕了，如果陆勇把此事告诉了他姐姐陆小莉那岂不坏了大事！粉友们劝道：牟哥别担心，让陆勇也吸不就没事了？于是，粉友们把愕然离去的陆勇拉回劝道：陆勇小弟，试试吧，吸着挺好玩的！陆勇开初不敢“试”，但见姐夫牟兵在一旁沉默不语，就“试”了起来。这一“试”，很快就上了瘾。陆勇没有钱，只好跟姐夫跑销售，在牟兵那儿讨一口“粉”吸。于是，牟兵每天得从卫生纸的销售款中多弄一个人的“粉”钱。

在这期间，牟家贵的女婿胡坤也在用销售卫生纸的款偷偷吸粉。这胡坤比牟明玉小5岁，早在广东打工时就是瘾君子了。他说，老子不看牟家有啥钱能吸粉，才不会跟大自己5岁的女人结婚哩！结婚后，他利用搞销售之机，把收回的款统统拿去买粉。牟家贵是一个文盲，

记不了账，更算不来账，销售中的收进支出全凭胡坤、牟兵说了算，等到后来牟家贵的大儿子牟川发现胡、牟二人收回的销售款有问题时，70多万元的销售利润已被牟兵。陆勇及他们那伙粉友在袅袅白烟中烧掉了。错中错，以吸劝夫君，姑嫂同坠茫茫毒海

牟家贵一怒之下将几个儿女一齐赶出了他的卷纸厂。三个儿女离开时，都从牟家贵那里得到了一套生产卫生卷纸的设备的一份启动资金。肺气肿已很严重的牟老汉气喘吁吁地对儿女们吼道：你们各自谋出路去吧！成龙升天，成蛇钻草，搞好搞孬都与我无关！最后，他愤愤地补充道：搞孬了别进老子的家门！

中国那些善良、宽容的父母们都有包办儿女一生的传统习惯，儿女不肖就拒之门外显然只是一句空话。牟家贵的初衷是想以“扫地出门”来迫使牟兵、胡坤戒掉毒瘾，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被他赶出家门的三个儿女，除大儿子牟川到渠县认真办厂成了远近闻名的个体户外，牟兵、胡坤不仅未能戒掉毒瘾，反倒将牟明玉、陆小莉“发展”成了“粉友”。在吸掉了牟老汉买给他们创业的机器设备及启动资金后，四人又一齐回到牟老汉处偷骗他最后的一点“剩余价值”。

最先返家的是女儿牟明玉和女婿胡坤。1997年上半年，领到牟家贵配发的机器设备和启动资金时，牟明玉也曾打算好好干一番，并趁机帮助丈夫戒掉毒瘾。她想背水一战。她没把卷纸厂建在达州市境内，而是建在重庆市。她的想法是：如果离父母太近，胡坤的依赖性太大，不利于戒毒，只有走得远远的，胡坤无依赖无退路了，才会真正戒毒干事业。不过，接下来的事实却无情地告诉牟明玉，这只不过是她的一厢情愿。到重庆后，没有了家人的约束管教，胡坤更加肆无忌惮，他把厂里所有的业务都推给牟明玉，自己则用岳父给的启动资金去买粉，还逼牟明玉回家向父亲要钱供他吸毒。牟明玉略有微词或不从，他便拳打脚踢。牟明玉哭着苦苦哀求丈夫看在夫妻和女儿的分上不要吸毒时，胡坤也曾被触动过，他揪着自己的头发敲打着脑袋痛苦地告诉妻子：你以为我不想戒？你以为戒毒那么简单？牟明玉不解地问：戒毒有什么难？不吸不就成了！胡坤无奈地摇摇头苦笑着说：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你试试就知道毒瘾是怎么回事了！

不想，胡坤的一句玩笑竟让牟明玉动了心思，她突然异想天开：我也去吸毒，以毒攻毒，以错劝错，用自己吸粉的行动去震惊唤醒丈夫，再用自己戒毒的毅力和榜样作用去感动教育丈夫，使其同自己一起脱离毒海。

牟明玉真的吸粉了，并很快有了毒瘾。悲哀的是：她不仅未能从毒海中拯救起自己的丈夫，相反，她也在毒海中从此留恋忘返，成了丈夫的粉友。胡坤夫妇当时本来就已山穷水尽，又增加一人吸毒，不仅资金亏空，夫妻二人吸毒后无心思也无精力去经营他们那摇摇欲坠的卫生纸厂，更加速了它的倒闭。1997年初夏胡坤干脆将机器设备卖掉，把剩余的钱吸完后，夫妻二人又搬回牟家贵家，死皮赖脸地向父母要些钱或偷厂里的纸卖钱来维持吸毒的费用。

也许是周围有一批依赖于牟兵的“粉友”和承担了陆勇吸粉费用的缘故，在胡坤、牟明玉“吸”掉机器设备之前，牟家贵分配给牟兵的机器设备和办厂资金早就被其吸得精光。毒资告尽之时，牟兵又信誓旦旦地对他岳父陆继元说：“如果能给我借几万元钱，我一定使厂子起死回生！”陆继元信了，以自己的房屋作抵押向人借贷3.5万元交给了女婿。没过多久，3.5万元便被牟兵一伙“吸”得干干净净，牟兵又怂恿陆勇以学开车为名骗取陆继元3000

元。不久，陆勇吸毒被公安抓获，陆继元只好借款 3000 元将其保释。几番折腾，陆继元家大伤元气从此萎靡不振。

丈夫的所作所为早就伤透了陆小莉的心。最初发现牟兵吸毒时，陆小莉就决心帮自己的丈夫戒掉毒瘾。她曾停薪留职了她在某粮站的工作，回家与丈夫一道给公爹的厂里跑销售，寸步不离地跟着牟兵，不准其吸毒。她曾跪着求丈夫远离毒品。她曾以死相威胁逼丈夫戒毒。对妻子的一片苦心，牟兵也曾感动过，他指天盟誓：再吸就电打五雷轰！他无数次跪求妻子最后原谅他一次。1997 年上半年，牟兵甚至还主动去戒过毒，但不到两个月，又毒瘾复发。一次次帮丈夫戒毒失败后，陆小莉绝望了。她决定放弃无谓的努力。1997 年 4 月，陆小莉愤然离开丈夫回单位上班。

陆小莉离去后，被人侍候惯了的牟兵因失去了生活拐杖而无法自理，更令他心急火燎的是他当时吸粉已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所吸的粉全是在毒贩处赊来的。毒贩告诉他：如不尽快把欠的钱拿来，不但要断他的粉，还要找人把他的脑袋砍下来当夜壶。惊惶之中，牟兵把筹积毒资的黑手伸向了陆小莉销售粮油的公款。1997 年 6 月初的一天，他找到妻子后以从未有过的“温柔”和“真诚”说：小莉，以前是我不好，不但未给你带来幸福，还让你处处受委屈。你离开后，我终于醒悟了，我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这个家！所以，我这次决心一定把毒戒了！见妻子用疑惑的目光打量自己，牟兵声泪俱下道：“小莉，你若信不过我，我愿以血盟誓！”说着，抓起菜刀就要朝自己手上砍。

陆小莉吓坏了，忙扑过去夺下菜刀。陆小莉也感动了，她抱住丈夫失声哭道：牟兵，别砍，我信！我信得过你！

见妻子的情感被自己征服了，牟兵这才把自己的目的裹上一层甜言蜜语娓娓道来：“小莉，我不能让你再吃苦受累了，我想把卷纸厂重新搞起来！”见妻子仰着泪眼专心地听着，牟兵越发言辞激昂：不是吹牛，凭我对卷纸加工的技术，凭我经商的经验，凭我的关系，只要有启动资金，我三五个个月赚他个十万八万的不费吹灰之力！对丈夫那说了无数次的弥天大谎，陆小莉再次信了。6 月 3 日，她从粮站开具一张介绍信，到县植物油厂提走 6 吨菜油卖给某个体户，将获得的 4.2 万元公款一分不留地挪用给了丈夫……

不久，牟兵告诉陆小莉，那 4.2 万元全抵粉款了，能不能想法再搞点。陆小莉一听，两眼一黑，差点晕倒，她抓住牟兵的衣领欲哭无泪地惨叫道：天啊，那是公款呀！你叫我怎么办？

牟兵推开陆小莉扬长而去。

陆小莉愤怒了：牟兵，你再吸，我也要吸！牟兵满脸不屑地说：吸吧。有粉的时候别忘了给老公留一份！

一筹莫展的陆小莉想以小姑子牟明玉的方式挽救丈夫那被白粉摄走的灵魂。一天，她拿出几百元钱叫陆勇去帮她买点粉。已无法挣脱白粉泥沼的陆勇哇的一声哭了：姐姐，吸不得呀！一染上就是死路一条呀！陆小莉咬咬牙，沉声喝道：快去！买回来也有你一份！已快犯瘾的陆勇一听有粉吸，也顾不得姐姐这是往火坑里跳了，拿起钱便跑了出去。

几天后，陆小莉离不开白粉了。

陆小莉染上毒瘾不久，她单位也开始追收那被挪用的 4.2 万元公款。牟兵这才真的有些慌了，他甚至真正意识到，再不脱离毒海会毁灭了自己和妻子，会毁灭了这个家。他再次下定决心：一定要戒掉毒瘾。1997 年 7 月，牟兵带着陆小莉到湖南娄底市某卫生卷纸厂打工戒毒……

清纯女人沦为强盗、骗子、淫妇

1998 年 2 月，当牟兵和陆小莉回到达州市某县时，脸上那被白粉折磨的憔悴和无精打采已一扫而当，夫妻二人白白胖胖。红光满面。牟家贵喜不自禁，忙专门开了个家庭会，表彰牟兵夫妻迷途知返，号召仍在偷偷摸摸吸毒的女儿、女婿要好好向牟兵夫妇学习，改邪归正。为了表示奖惩分明，牟家贵特意安排牟兵、陆小莉继续给厂里跑销售，而安排胡坤夫妇到车间去干活。

牟家贵的奖惩分明无疑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这个无文化的老头儿并不知道毒品对人体生理和心理的严重摧残，不了解吸毒者对毒品的那种顽固依赖性和难以戒断的心瘾，所以，他也就不可能料到儿子、儿媳的毒瘾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死灰复燃。事隔 5 个月，当他发现儿子、儿媳在销售产品中收款后，伪造客户笔迹写出的数十张欠条时，他苦苦经营的卷纸厂里又有 20 多万元在阵阵白烟中化为了乌有。

牟家贵怒不可遏，把儿子、儿媳一顿臭骂后，将其“放逐”到车间干活。

对于这次复吸，陆小莉后来是这样回忆的：说实在话，我是真不愿再沉溺于毒海之中。不管怎么说，受过中专教育的我还是知道羞耻二字的，更何况毒品对人的那种下地狱般的熬煎折磨早使我心力交瘁，生不如死。回顾平生，我这人生性胆小怕事，自幼清纯善良。在老师眼里，我是一个好学生，在父母心目中，我是个孝顺女儿，婚后的头几年，我也不失为一个好儿媳好妻子好母亲。但自染上毒品后，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堕落得那么鲜廉寡耻，为吸毒，连父母亲人也坑蒙拐骗，最后发展到偷盗卖淫，挪用公款……

也许是人性未泯和还存在着那么一点羞耻之心，陆小莉也曾试图摆脱毒品。复吸后，为了戒毒，陆小莉曾让她的父母把她捆在床上，锁上门并用木条钉牢窗子，但毒瘾发作后，那骨子里似有千万只蚂蚁在啃噬的奇痒使她痛苦难忍。她泪水鼻涕齐下，号哭呻吟不止。她将指甲深深嵌入自己的肉中直至血流不止，用头把墙撞得咚咚直响，最后用一个纤弱女子所不应有的力量挣脱了绳索，用血肉模糊的拳头砸断了窗上的木条。逃出去后，陆小莉再次跪倒在毒贩面前……

从此之后，陆小莉的人性再次恶变。她已适应习惯了人们漠然鄙视的目光。她与牟兵、牟明玉、胡坤强住强吃在牟家贵家不说，几人还常狼狈为奸，向牟家贵强索毒资，牟若不给，几人便合伙去偷牟销售产品的欠条，然后只收 50% 的钱就把欠条交给客户。有时，几人还合伙偷厂里生产的卫生纸卖。牟兵与陆小莉撬开卷纸厂的后窗，偷走数万元的产品以二分之一的价格出售。偷骗不行时，陆小莉又出“奇招”——她对公爹说，我怀孕了，无钱引产。牟老头儿信以为真忙掏腰包。几年间，牟家贵的近百万资产被几个儿女偷骗得所剩无几。老头子插着自己的胸膛怒吼道：我是遇到了一伙强盗呀！愤怒中，他再次将几个“强盗”扫地出门。

被公爹赶出家门后，陆小莉把筹集粉钱的脏手伸向了其他亲人和朋友。一次，她偷走牟川 3700 元现金，牟川以为是自己儿子所为，对其大打出手，陆小莉还若无其事地在一旁劝侄儿“坦白从宽”。不久，她又将其价值 4000 元的大彩电偷去，被发现，偷钱之事才真相大白。后来，她越偷胆量越大，越偷“技术”越精：她到邻居家去转一圈，1100 元钱便成了她囊中之物；她到同学的烟摊上坐了一会儿，同学的几条烟便不翼而飞。亲人们都怕她了。连她的母亲见她去了，也连忙把彩电搬进屋锁好，但陆小莉仍不会空手而归。回家时，她进厨房“捎”走了母亲的一包盐巴拿到毒贩那儿去换粉。

1999 年底，牟兵被公安局收审强制戒毒，在亲人处成了过街老鼠的陆小莉更陷入了绝境。偷、骗的路都被堵死后，为了维持每天 100 多元的粉款，她终于抛开羞耻之心，开始“开发”自身。到 2000 年 3 月，因挪用公款东窗事发被达州市某县检察院抓获前，究竟同多少个男人上床，她的肉体在那些嫖客们那里究竟换来了多少钱，她都记不得了。但有一点她却十分明白：这期间吸粉的钱大多是从这个渠道来的。在达州市某县看守所谈到这段经历时，泪流满面的陆小莉泣不成声地说：简直是一场噩梦！

牟氏家族和亲戚中的 5 名瘤君子以家破财尽和银铛入狱的悲剧结局换来了陆小莉的噩梦初醒，那已被关押了 100 余日的牟明玉，那为毒品人狱的胡坤、陆勇，那至今仍在毒品诱惑中惶惶不可终日的牟兵的噩梦也被这代价惊醒了吗？他们还会去付出更沉重的代价吗？

但愿牟氏家族中的 5 名怎君子早日从噩梦中醒来别再做噩梦！也愿天下所有的人都别做这种噩梦！
手记之三十三：“西藏人”与“英镑”

10 月 30 日中午，达川至平昌的 XX 次客车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缓缓驶出达川火车站。车上 30 多名乘客大多是从火车站前一专门从事“批发”的客车那儿“批发”来的，这些刚从 9 次特快上下来的返乡打工者们边收拾行理边嘟嘟囔囔地埋怨搞批发的“可恶！”“骗人折腾人！”一中年妇女因“批发”者少补了 10 元钱而操着川音十足的普通话大骂：他娘那 X，把钱骗去吃药！

车至国粮大厦，一戴礼帽穿灰卡克衫斜挎小黑包的青年人在前方招手。车未停稳，那青年便边嚷着“阿古嘟赌，阿古嘟赌”边冲上了车，吵吵闹闹的客车里一下静了下来。坐在引擎盖上的一“小胡子”大声问：他说的啥子？第三排的一年轻人接嘴说，哦，是个西藏人！我在西藏当了 5 年兵，听得懂他的话，他是说……“当兵的”话未完，车后一“长发”质疑：西藏人？那个礼帽倒有点像，但电视里西藏人都是穿一只袖子露一个膀子，他哪个两只袖子都穿起？坐在“当兵的”右边的一“平头”解释：这都不懂，人家是入乡随俗嘛！没容得大家想明白这个问题，“当兵的”已拉着“西藏人”的手用夹杂着达川口音的普通话与之攀谈了起来：我曾在你们西藏当过兵，我俩也算半个老乡了……

“金珠玛米呀咕嘟！”“西藏人”激动了起来，他边拥抱“当兵的”边“呀咕嘟，呀咕嘟”地嚷嚷个不停。车内有人说，真的是西藏人！《洗衣歌》里不也有“金珠玛米呀咕嘟”那句词吗？那意思好像是解放军好。听了乘客们的议论，挨着“平头”的一中年汉子激动得胀红了脸，他紧张地望着“当兵的”和“西藏人”，站起想说什么，但“平头”用阴森的目光盯着他，低沉而凶狠的吼道，坐好！那中年汉子坐下不敢吱声了。

那边，“当兵的”又在用生硬的普通话问：老乡，大老远到四川来，是做生意还是旅游观光？“西藏人”连比带划地伊哩哇啦一阵后，“当兵的”翻译道：哦，他说，他的家在与印度交界的藏南，改革开放后，他家养了 800 多头牦牛和一万多只羊，与印度人做生意赚了一百多万英镑，这次到四川来是为了拜菩萨……

引擎上的“小胡子”又发问了：西藏人，你们那儿有活佛，哪个跑到四川来拜汉菩萨？

“西藏人”听不懂“小胡子”的四川话，一脸茫然。“当兵的”忙用“达川普通话”一翻译，“西藏人”听懂了。接着，又是一阵伊哩哇啦。“当兵的”翻译道，他说，他讨了个漂亮的阿娇——也就是我们四川人说的婆娘，想生个阿农——也就是想个儿子。为了显示诚意想得到阿农，就到四川来求汉菩萨了。“西藏人”的怪异行径令车内人一阵哗然，大家议论纷纷。

“当兵的”很义气，一拍胸膛说：老乡，我们平昌佛爷洞的菩萨灵得很，保证能保佑你得个阿农，下车后我带你去佛爷洞！

“西藏人”激动了，边嚷着“金珠玛米呀咕嘟”边与“当兵的”拥抱并从小黑包里掏出一张外币塞给“当兵的”，“当兵的”吃惊地推辞道：你送我 100 英镑！这哪个要得！推辞一阵后，“当兵的”说，盛情难却，老乡这样吧，我也送你 200 元人民币做纪念！说着，把两张百元券硬塞给了“西藏人”。

“小胡子”挤过去要过“英镑”边看边问：当兵的，这英镑花花绿绿的，值好多人民币哟？乘客中也有人问：我们只认得上边那个 100，是不是真的哟？

这时，坐在车门口的一小伙子站起来接过“英镑”说：我是平昌银行的，我晓得 100 英镑可兑换人民币的 0 元，至于是不是真的，我这儿有验钞机，一验就知道了。说着，“银行的”从行李架上取下一精致的小黑包，从中拿出一验钞机，边把“英镑”塞进验钞机边对几个伸长脖子围观的乘客说，真的！你们看嘛，这是金属线，这是防伪头像，假不了！

“平头”大声嚷嚷，狗日的当兵的，你 200 元换西藏人 100 英镑，等于用 200 元换了人家 650 元哟！“长发”挤上前嚷道：当兵的，给西藏人说一下，我也用 200 元换 100 英镑！“西藏人”似乎听懂了“长发”的四川话，边摇手边伊哩哇啦地嚷着，看样子是不愿换。果然，“当兵的”翻译道：老乡说，他是来求菩萨的，不是来换钱的。不过，如果有谁诚心诚意帮他求菩萨保佑他得个胖胖的阿农，他就愿意换。

“长发”忙双手合拢，弓着腰对“西藏人”道：老乡，我求菩萨保佑你得个胖胖的阿农！“西藏人”高兴了，接过一长发“200 元人民币后从黑包里摸出 100 ”英镑“给了”长发“。

“小胡子”、“平头”等人也纷纷用人民币换了“英镑”，并让“银行的”帮忙检验。“银行的”一边检验一边嚷嚷，真的！全是真的！英镑是世界上防伪最好的货币，哪个伪造得出来？

车内的人大多动心了，大家挤过去纷纷双手合拢求菩萨保佑“西藏人”生个胖胖的阿农，

以得到思准换取“英镑”。“平头”旁边的中年人再次想站起来说什么，但再次被一脸凶光的“平头”镇得不敢吱声。人们没注意到这一情景，仍不停地双手合拢，弯着腰向“西藏人”祝福。坐在“当兵的”背后的两小伙子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换得了18张100的“英镑”，那个上车时骂人骗钱吃药的中年妇女与丈夫商议：100英镑可以换650元，我们也换200英镑！不待丈夫表态，她已捏着400元人民币挤进了人群。一老太婆好不容易挤进人群，又双手合拢念念有词地表演一番后才换了两张“英镑”，但挤出人群时，她失声惊叫了起来，我的钱包不见了！一打工妹换了10张‘：英镑“犹嫌不够，又递过一叠钱，但”西藏人“却不给她”英镑“了。她想找”西藏人“说理，”长发“说，惹不得哟！西藏人身上有刀，少数民族杀了人不犯法的！打工妹吓得一下跌坐在座位上不敢吱声了……

在一片吵吵闹闹中，车不知不觉地到了铁山隧洞下边的弯道上。换“英镑”的人终于渐渐少了起来，一直帮人验钞的“银行的”这才忙里偷闲地掏出打火机对“西藏人”说，老乡，我用这个换100英镑可以吗？“西藏人”好像不懂似的边伊哩哇啦地嚷着边换给了“银行的”100“英镑”。“平头”忿忿道：狗日的！用一个打火机换别人650元，整西藏人的冤枉，老子要收拾你！“银行的”“吓”得忙叫停车，车未停稳便“逃”了下去，“平头”边骂边追出去。“长发”急了，大叫，不得了！要出人命！那“平头”8弟兄有6个都坐过牢，说杀人就杀人，快去看看！说着同“小胡子”追了下去，“西藏人”同“当兵的”也伊哩哇啦地跳下了车。惊魂未定的人们朝车后望去，却见“银行的”、“平头”、“西藏人”等6人正勾腰搭肩地朝山下走去。坐在“平头”旁边一直憋红脸的中年汉子站起来吼道：看个球呀，你们上当了！我也曾这样买过英镑！‘，后来到银行一问，才知是秘鲁币，100秘鲁币只值人民币几元钱……

车上的人如梦方醒，“完了！打一年工就只剩这十几张秘鲁钱了！”“老子中午连饭都舍不得吃！”那老太婆愤愤地骂道：“狗日的杂种，钱包肯定是他几个摸去了的！”上车时骂人的中年妇女边朝后张望边骂，还让老娘保佑你阿娇生个阿农，老娘求菩萨保佑你几个龟儿子断子绝孙……

客车喘着粗气，载着一车骂骂咧咧、后悔不迭的乘客驶进了昏暗幽长的铁山隧洞……

手记之三十四：请法律评判——《四川法制报》遭遇“安岳新闻侵权官司”前前后后总编们强调：“舆论与监督”要体现客观、公正、民主的原则

这起新闻侵权官司是从安岳县引起的。后来，很多人都称之为“安岳官司”。

要讲清楚“安岳官司”，得先讲清《四川法制报》“舆论与监督”这个栏目诞生前后的一些事。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四川法制报》总编辑曾庆余敏锐地感到：新闻事业的春天来到了。他觉得，作为报社领导，应抓住机遇，加快本报的改革，加大舆论监督力度，促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1998年元旦后的那次部主任会上，曾总编结合省新闻通气会的精神向与会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要大家踊跃发言，共同策划一个能更有声势和力度的舆论监督栏目。

总编把题目出了，会场上却迟迟没有人发言。曾总又循循善诱地引导，但仍和者甚寡。大家避开总编诧异的目光，一个劲地喝茶抽烟，刻意把自己掩藏在烟雾之中。会议气氛多少有些尴尬。

曾庆余理解大家的苦衷。近几年来，各媒体都在舆论监督方面做了不少探索，诸如监察哨、犀牛角、曝光台、群众来信这些栏目也的确发挥过较大的威力。但有谁能想象得到这“威力”中包含了新闻人士的多少汗水、眼泪和伤痛？有多少人知道这“威力”又是以什么样的代价换来的呢？是以记者、编辑遭受恐吓殴打辱骂为代价，以媒体遭遇的无数个“侵权”官司为代价，以被监督者充满怨毒仇恨的目光换来的！

曾总编觉得：在舆论监督中，不屈不挠的精神固然可贵，但我们没有那么多本钱，没有那么多精力，更没有必要再去遭遇那些沉重的“代价”。面对有难色的部主任们，他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能不能以既符合有关规定，又能使被监督者接受的方式操作？比如以公开调查的方式来操作。”顺着这个思路，曾庆余大胆地设计着一种国内新闻界尚无先例的监督模式：“选择有价值且可信度较高的批评信件公开登报，在其后加一个‘编后’要求下级有关部门和单位对信的内容进行核实，让被批评者或他的上级单位也有说话、辩解的机会，并让他们公开回答批评者提出的问题。用这种客观、民主、公正的方式来开展舆论监督工作也许会少许多麻烦……”

总编的话赢得了与会者的赞同，大家紧蹙的眉头展开了：“这个方式好！”

但取个什么名称呢！

有人建议叫“监督岗”，有人说取个“舆论监督”……

副总编说，“舆论监督”是非常明确的批评栏目，体现了新闻单位的批评观点，显然不符合民主、客观、公正的原则。依我看，不如在“舆论监督”之间加一个“与”字，把“舆论”和“监督”分成两个部分。接着，贾副总编打比方说，这也有点像法院打官司一样：“舆论”的来信或群众呼声在前一部分充当“原告”的角色，刊载时，报纸栏目不对其做任何评议，只客观披露：“编后语”在后一部分体现“监督”作用，报社扮演“公正裁判官”或监督人的角色，对所刊载的来信、群众呼声中反映的问题不带任何主观色彩和倾向性，只要求被群众来信所批评的即扮演“被告”角色的一方依据事实和法律，针对“原告”提出的问题公开、书面回答本报及读者。同时，在“舆论与监督”栏目设置“回音壁”，刊登“被告”方的辩解词或认错书或反批评意见……

后来，“安岳官司”出现时，有不少报纸喝彩：好一个“与”字！它区分了纯批评和公正、客观、民主的舆论监督。好一个“舆论与监督”！在探索“公开调查”这一新闻改革课题及以民主方式进行舆论监督中诞生在《四川法制报》上……

这个在尚无新闻法可依时由《四川法制报》探索改革的栏目在舆论监督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某县收了农田基本建设费时不公布账目。“舆论与监督”一披露，那里的父母官赶紧叫人将账目上墙。

——一个教师被人伤害，告了 4 年无人立案，自诉到法院也未被受理。《四川法制报》上，那教师一封《我无故被打，公安政法部门为何不受理此案？》的短信刊载了才几天，便引起当地党委和政法部门的重视，公安部门立即立案侦查，随即法院也受理了。

——某县法院执行庭庭长将执行庭的牌照长期挂在他亲戚的车上，执行时用高价收取租车费，院领导多次劝阻无效果。有人将此事写信告到“舆论与监督”，引起院领导的重视，庭长赶忙收回牌照。后来，法院院长拿着报纸到县财政说，你们看，我们院执法到外边租车的事都上报了，怎么办？财政局长觉得这事太丢脸，马上回复：给你 10 万元买车！那院长不由感慨万千：我劝阻了数次无效果的事，要钱买车几年办不到的事，报上一个“豆腐块”一下全解决了。这“舆论与监督”真好！

“舆论与监督”的确好：一年多来，它共刊出 150 多期。知道 150 期是什么含义吗？它等于化解了 150 个社会矛盾，也纠正了很多违法行为。还通过公开回函对其中 40% 反映不实的来信予以了解释、澄清，消除了对一些人误告和错告的负面影响…… “正直的共产党员”举报：安岳有人非法购买选票当乡长

“安岳官司”中的原告也属于那获益匪浅的 40% 之列。

1998 年的乡镇换届选举刚刚结束，有人分别向县人大、地区等机关反映：“安岳县鱼龙乡政府汤泽光指使该乡响水村人大代表李胜富、陈友贵以 50 元、100 元、200 元、500 元不等的人民币在该乡代表中非法购买选票 30 张，使不是乡长候选人的汤当选为乡长”。这一消息还在民间传得沸沸扬扬。不久，《四川法制报》“舆论与监督”栏目收到了安岳县一封署名“鱼龙乡一名正直的共产党员、正直的乡人大代表”的“举报”，该“举报”内容与安岳民间传闻完全一致。《四川法制报》觉得事情重大，应当请有关领导部门对此事进行调查，如有则查处，没有便可消除群众的怀疑和舆论对汤泽光等人造成的不良影响。3 月 5 日将该信以“安岳有人非法购买选票当乡长”为题刊登在“舆论与监督”栏目里，并在“编后语”中要求：“请安岳县组织部、安岳县人大常委会对此事进行调查、处理，并给本报一个公开的回复。”

3 月 23 日，安岳县人大、组织部以安人函（1999）03 号文件回复《四川法制报》称：……阅贵报 3 月 5 日在第一版“舆论与监督”栏目中登载的题为“安岳有人非法购买选票当乡长”一文后，我们非常重视，……立即会同县委组织部和县人民检察院有关领导研究调查……

检察机关调查的结果是：没有证据证明鱼龙乡在选举过程中有违法行为。

4 月 8 日，《四川法制报》收到这一回函后，当即在“回音壁”中以“所谓‘破坏选举’之事实并不存在”为题刊登出来。

当《四川法制报》的领导和编辑正为本报又给 3 名被错告的人澄清了不白之冤而感到轻松欣慰之时，却突然于 4 月中旬接到了安岳县人民法院的一张传票。那传票上说：那 3 个被你们澄清了不白之冤的人告你们侵犯名誉权，来吃官司吧，按时出庭！

开庭前，有人断言：这官司报社输定了！

不知是有人真能神机妙算，还是其他原因，《四川法制报》刚接到汤泽光等人的起诉状副本，社会上便有人断言：这官司报社输定了！

这种据说是相当可靠的“预言”像浓浓的阴云，沉沉地浮在《四川法制报》的编辑、记者们的心中，大家难免暗暗着急。怕给报社惹来麻烦的人给曾庆余建议：曾总，是不是找人给安岳法院做工作，让他们动员汤泽光等人撤诉？有人觉得这样太费事，不如直接找原告“勾兑”，给点钱让他们主动撤诉。还有人说，干脆请律师代理算了……

“绝不私了，绝不采取不正当手段向对方施加压力，也绝不找律师代理这场官司！”平时待人随和的曾庆余一反常态，连着说出了三个绝不。见部下们愣了，他解释说，这正是用法律检验我们以公开调查方式进行舆论与监督的新闻改革是否成功的一个大好机会。我们应主动让法律检验，请法律评判。为啥要去“勾兑”去给别人施加压力？办法制报的找律师帮忙打官司，那是法制报的水平吗？

曾庆余说得十分轻松，报社上下的心却提到了喉咙里：“舆论与监督”这个栏目到了让法律决定生死存亡的时候了……

5月28日8点，曾庆余带着“舆论与监督”栏目的主编张清和记者部副主任李德章在新闻界同仁及旁听公民们复杂的目光下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了安岳县法院民事审判庭。

9点开庭。庭审意图在审判长的把握下有条不紊地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质证进行得顺利而平静。双方唇枪舌剑的激战是从法庭辩论开始的。对于事实双方都不否定，但对于事实本身表现的方式即以“公开调查”这种方式发表群众来信是新闻舆论监督还是侵害名誉侵权的问题却产生了截然相反的观点。汤泽光、李胜富、陈友贵和他们的两位律师坚持认为：报社刊登未经核实的群众来信，没有履行对来稿真实性的核查责任，使有损原告名誉的内容传播社会，报社应对因此而产生的侵权后果负责。《四川法制报》辩称：报社核实的义务是以公开调查的方式进行的，且对其中涉及的人和事，按规定要求有关组织查清回复后便于4月8日将结果在该报的“回音壁”栏目中以“所谓破坏选举事实不存在”为名刊登了出来。这样的结果不但澄清了读者的疑惑，也卸下了安岳县民间舆论扣在3原告身上的“黑锅”。被告席上的曾庆余幽默地说：原告先生们，你们不但不感谢我们，还以怨报德、恩将仇报，太不近情理了吧！

可汤泽光等3人不领这个情。他们说，那个结论是安岳人大作出的，并非你报社调查的，如果人大不调查不答复，你报社能登出那么个结果吗？即使后来登出人大回复函算是澄清事实的结果，但这之前算什么呢……总之，反正你们侵权了。给我们造成了精神打击和身体损失（有一原告举例：“我被气出了胃病和感冒”），名誉重于泰山，比生命还重要，报社必须赔偿我们3人70余万元！

为了展示自己的“辩才”，某律师还反复声色俱厉地质问：如果有人写信反映中央xxx领导人的问题，《四川法制报》是不是也要在“舆论与监督”栏目里刊登？

太不像话，把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同党和国家领导人扯在一起来误导！被告生气了，“审判长，我抗议！”

审判长不表态。抗议无效……

双方做过最后陈述后，都把目光集中到审判长身上：听法官怎么说吧，他说的才算数！

下午 6 点过，审判长宣读的那份长长的“安岳民初字第 300 号、301 号、302 号”民事判决书的最后一页里终于有了结果：被告侵权；判令被告登报向三原告赔礼道歉；赔偿三原告精神损失费共计 6400 元，其他损失 1500 元并承担诉讼费计 300 元。

一审法院同意了 3 原告的观点——不认可“公开调查”这种监督形式！

一个不被理解的真理在这儿变成了错误……

汤泽光等 3 原告与他们的律师在记者们不停闪烁的镁光灯下为自己战胜了这个“错误”而喜形于色，互致祝贺。

曾庆余等三人在人们复杂的目光中冷静而不失风度地向法庭表示：不服！接着，他们自信而含蓄地向满脸堆笑的原告及其律师投去意味深长的一瞥。那目光似乎说：笑到最后的人才是笑得最好的人，二审见！

终审判决：新闻监督未侵犯名誉权

虽然自信，但输了官司的“自信者”背后的隐痛及那忧郁沮丧却无法被这种“自信”掩盖。安岳新败的阴影已让《四川法制报》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更兼某同行用兴灾乐祸的镜头把他们在安岳“大败而归”的影响扩大到了全省全国，那无形的压力和尴尬可想而知。但是，宣传民主法制的《四川法制报》始终没有怀疑过法律的公正，更没有怀疑过“舆论与监督”那深厚的生存土壤和强大生命力。

在坚定而又难免有一点儿忐忑不安的心情中等待了两个月零 8 天后，8 月 5 日上午 9 时，曾庆余同他的部下李德章又坐到了资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庭的“上诉人”席位上。二人用适度的微笑向到庭的新闻界同仁及旁听公民投去自信的目光。变成“被上诉人”的汤泽光等人及其律师也依然满脸堆笑地向他们的支持者们边点头边挥手地走进了法庭。那神态似乎在告诉旁听的人们：他们已赢了这二审，到资阳无非是来例行公事，来拿官司获胜的判决……

然而，二审的庭审却没有凭空想象的那种偏向。当某律师又老调重弹地质问：如果有人反映中央 XXX 领导人的问题，《四川法制报》是不是也要刊登时，审判长立即制止：请被上诉人不要把本案同党和国家领导人扯在一起对上诉人进行误导！

看得出，审判长段大明将案情吃得很透，在双方提出理由和答辩后，他便很准确地归纳出了本案的焦点，在听取上诉人关于一审将 3 月 5 日刊登的来信同“编后语”割裂开来，将 3 月 5 日的来信同 4 月 8 日的“回音壁”割裂开来，从而将公开调查错误定性为公开侵权的辩论意见后，法官们对汤泽光等人的老调重弹仍然耐心地听取。没有偏向，没有主观色彩，没有一点“暗箱操作”。

事后，有位两次旁听的记者感叹：同是一个案子，法官对法的领悟不同，竟作出了截然

相反的判决！真是一个层次有一个层次的水平，一个层次有一个层次的标准……

在双方舌战完毕调解未成功后，审判长宣布：本案择日宣判。

二审在开庭两小时后休庭。

9月2日，资阳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该院认为：《四川法制报》“舆论与监督”栏目采取公开调查的方式发表群众来信，同时附“编后”要求安岳人大和组织部调查处理此事，并公开答复来信反映的问题。该“编后”并未对该来信发表自己的评论以引导读者对被上诉人做出不当评价而侵害其名誉权。相反，“编后”让一般读者知晓该来信仅为投信人之反映而非最终调查结果，足以阻却读者轻信该来信内容之真实性而对被上诉人做出不当评价。因此，从整个事件的全过程及名誉侵权的构成要件来看，《四川法制报》报社并未对汤泽光等3人构成名誉侵权。

故终审判决如下：撤销安岳法院的一审判决；驳回汤泽光、李胜富、陈友贵3人要求报社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皆由汤泽光3人承担。

蓉城庆祝“雷区突围”成功，新闻同仁欢呼：这是中国新闻改革道路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四川法制报》在“安岳官司”中最终获胜使得各路同仁为之振奋。川内的《四川日报》、《蜀报》、《商务早报》、《天府早报》等数家报刊电台和香港的《明报》、《南华早报》及外地一些报纸纷纷报道了这一新闻。成都的报纸热烈祝贺《四川法制报》“雷区突围”成功。多家报纸一致认为：“这是中国新闻改革道路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是中国新闻史上值得重重记上一笔的胜利”

在一片欢呼声中，人们也听到了曾庆余那略微有些激动的画外音：这场官司的胜诉，标志着我们开创的一种批评模式的胜诉。法律评判了我们，我们经受住了法律的检验……

为这场官司胜利激动的不仅仅只有新闻人，市民、政府官员、法官和广大读者也纷纷以不同的方式表示自己的庆贺和看法。

四川省政法委秘书长邢沪生说：新闻监督有其重要性、必要性。政法部门要多理解支持新闻单位进行舆论监督。资阳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昌荣针对一些媒体所讲的法律对新闻保护倾斜论，强调：《四川法制报》最终赢了这场官司，不是法律保护倾斜的结果，而是他们的作法本身就没有构成侵权。一个在《四川法制报》社外卖菜的农民看了“安岳官司”的消息后说：“舆论与监督”肯定会赢，因为我们老百姓喜欢！

这场官司的输赢虽不是因“老百姓喜欢”而定胜负，但它的结果至少反映和代表了民意。

“安岳官司”虽然赢了，但新闻人的路、“舆论与监督”的路还很长很艰难很曲折，“侵权”官司也肯定还有很多，说不准哪天哪位记者哪家报刊又会因“侵犯名誉权”而被弄“立起”，但只要我们善于监督，敢于监督，正确行使监督权，就没有度不过去的“坎”。新中国建立50周年来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依法治国这个大环境毕竟已给新闻监督开拓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手记之三十五：“粉”祸

眼前这个女毒贩真是倒霉透了。

贩毒时，她筹 20 克海洛因去卖，却被“上线”整了 3 克的冤枉，15 克“药”刚卖出去不到两分钟便落了网。办案人员笑话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倒霉蛋！

如果仅仅如此，她还算不上“倒霉蛋”，比这更倒霉的是她那个家以及她深爱的女儿们发生的一连串事情。这些事情对她沉重的打击在她站在看守所管教室门口怯怯地呼“报告”时，我便一眼看出：愁眉紧锁，目光散乱而迟钝，才 47 岁头顶已一片花白，苍老憔悴的脸上布满了伤痛和无措。鼻翼两侧各一颗醒目的黑痣——相书上说，那叫泪痣。苦命相！

在桌子对面的小石凳上坐下后，我让她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她背书一样喃喃道：犯罪嫌疑人，卢英，女，达川地区 XX 县原物资供应公司会计，1996 年下岗后开歌舞厅当个体老板，1999 年 8 月初因贩毒被法院判刑 7 年……

“背”完这一段，泪珠已断线般地从她眼中纷纷滚落。“我前世作了恶，这世遭报应！大女儿吸毒……死了，大女婿扔下女儿当了毒贩，小女儿为吸毒去偷、去抢……被判刑。我也……我好命苦呀……”这个精明能干，在小城里曾名噪一时的女老板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她哽咽着诉说一件件令人心碎的往事…… 追求“潇洒”，恶婿拉开悲剧序幕

卢英与文家俊结婚后一直想生个儿子，送子娘娘却接二连三地给他们送来了文玲、文华、文静三个女儿。在物资供应公司当采购员的文家俊长期在外东奔西忙，三个女儿全由卢英拉扯大。九十年代初，大女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时，文家俊才听说文玲参加工作到汽车修理厂不久便同本城的田达在耍朋友。那田达绣花枕头一个，不仅没职业，还脾气暴躁、游手好闲，在小城里是个出了名的混世魔王。怎能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历来对女儿们百依百顺的文家俊、卢英坚决反对他们的婚事。无奈人长得漂亮又极爱虚荣的文玲说，田达仪表堂堂，既潇洒又有男子汉气概，能找到这样的对象已是高攀了。若家中反对，她就出家当尼姑就到峨眉山跳舍身崖。

那是一个年轻人成天把“男人爱漂亮，女人爱潇洒”的歌儿挂在嘴上的年代，既然女儿这般至死不渝地要追求那个“潇洒”并认定非田达不嫁，文家俊夫妇只好接纳了他们并不满意的田达。

婚后，田达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常无事生非。特别是文玲生了女儿后，田达说文玲故意生女儿断他回家香火，三天两头不是打文玲出气，便是摔盘子砸碗，闹得一家人不得安宁。

当初追求“潇洒”的文玲为自己这份浪漫的婚姻给家庭带来的不幸而后悔不已，并有了离婚的想法。但卢英认为婚姻非儿戏之事，不能因一点小事说散就散。相反，她和丈夫竭力维持着女儿的婚姻。一次，田达高兴了，说他想开车跑运输为家里赚钱。卢英忙倾其家中的 3.5 万元积蓄买了辆华川牌汽车。文家俊也利用自己当采购的所有关系为田达联系货源，并在达钢买氧气让田达拉回去卖。每月，运输和卖氧气能尽赚五千元左右。田达原说赚了钱都交家里，但后来钱大多被他攥在手中。有了钱，田达更加“潇洒”起来：他不仅在舞厅包厢的“少姐”面前出手大方，在赌桌上更是一掷千金。据说他还悄悄地吸上了一种叫“白粉”

的“药”，每天要一两百元。后来，他嫌开车太辛苦太不自由，便自作主张卖掉汽车换来一辆摩托成天在城里拉上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四处兜风。玩腻了，他干脆连摩托也卖掉在家里“静养”起来。

对田达的所作所为，文家的人一直忍气吞声，卢英还时常用金钱和好吃好喝去安抚田达，并出资让女儿到街上摆摊卖小吃，以增强田达小两口的经济实力。但田达却认为让他老婆上街摆摊卖小吃太丢人现眼，将小吃摊的锅碗瓢盆砸得一塌糊涂。卢英指责了几句，田达将结婚时卢英给文玲制的嫁妆全部烧光。卢英忍无可忍了，指着田达大骂起来，不料田达冲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打得卢英血流满面。事后，文玲虽认真地闹了一阵离婚，但考虑到离婚会对女儿造成伤害，只好将离婚事宜缓期执行，以观后效。

田达却并不思悔改。不久，为点小事他打伤文玲，文家俊心痛不过，责问了几句，田达大骂他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一拳将文家俊左眼打伤致残。

田达的暴行激怒了文家老小。文玲与其离婚之事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就在闹离婚那段时间，田达干脆公开地吸上了“白粉”。离婚后，又干起了贩毒的勾当，虽被抓获，但不知怎么又逃脱了法网。不过，恶人终有报应。就在采写这篇稿子时，听说田达因吸“粉”过量，患上了什么绝症，已快不久于人世了。为觅真爱，文玲嗜毒踏上黄泉不归路

一场婚变使文玲总走不出痛苦的阴影，她与田达曾共同生活过的家及小城的一切都时常使她触景生情，引发着心中的伤痛。她决定离开这个伤心地。92年春节后，文玲南下广州，在一家酒楼里当上了服务员。不料，本想摆脱痛苦的文玲从此却陷入了更大的痛苦。抛家别子、背井离乡对她这个第一次出远门的少妇来说，那离愁别恨和对女儿对父母妹妹的牵肠挂肚就已令文玲惆怅忧伤不已了，更兼身在他乡为异客，举目无亲，语言不通，无处化解心中凄凉的孤独悲苦，再加之每天上班十多小时带来的腰酸腿疼，还常常要承受前来吃喝玩乐者中那些不轨之徒轻佻的侵扰和老板的训斥辱骂，她又怎能心情舒畅？

在文玲陷入苦恼烦躁之中，渴望得到安抚保护和一份真爱时，一个男人走近了她的身边。此人叫毕志豪，重庆市人。毕志豪对靓丽高挑的文玲几乎是一见钟情。这个26岁的小伙子像对自己小妹妹一样关爱着文玲。文玲该休息时，他准会搁下自己的事到酒楼去听文玲倾诉心事，或陪她在广州市满城游逛，并常给文玲买些金项链、金戒指之类的高级礼品。他向文玲承诺：我要让你在真爱和幸福中度过一生……

文玲陶醉了。但这个痴情的女子却没料到，那从天而降的“真爱”却把她推入了更加苦难的深渊。

毕志豪对文玲无话不说，他却隐瞒了自己的罪行：三年前的一场械斗中，他致人伤残。逃到广州躲官司期间又吸上了“白粉”并干起贩毒勾当。半年后，当知道这一切时，文玲惊呆了。她曾试图离开毕志豪。但她却发现自己已陷入爱河不能自拔了。对这个令她爱得死去活来的男人，文玲只好强装肃容地警告他：不准再贩毒，并马上戒毒。否则，我们的关系一刀两断！

吸毒者是没有理智的。在文玲专门请假帮毕志豪戒毒那两个月里，他对戒毒一直阳奉阴

违。一次，文玲在厕所里将正在吸毒的毕志豪抓获，她上前去夺“白粉”，毕志豪却用背挡住门不让文玲进。文玲伤心极了，她泪流满面地抓起菜刀喝道：毕志豪，再不放下白粉，我就死在你面前！说着，挥刀便要砍自己，吓得毕志豪忙扔掉白粉，扑通一声跪倒在文玲面前连连说：文玲，快放下刀，我不再吸了，再吸你就劈了我！

毕志豪的戒毒在许诺和假话中日复一日，几十天过去了，戒毒毫无进展。文玲上街买菜，他仍会趁机溜出去买“药”，躲进厕所偷偷地吸。文玲绝望了。一次，她搜出毕志豪藏在鞋中的白粉后，一气之下，学着毕志豪的样子吸了起来。吸了十数次有瘾时她才对毕志豪说，我也已有瘾了，现在，我俩一起戒，戒得了我们就一齐好，戒不了我们就一齐完蛋！

毕志豪一听心上人以自我毁灭的方式帮助自己戒毒，一下拥着文玲痛哭起来：文玲我已毁了，你还吸，你这是何苦呀！文玲默默地流着泪。她边替毕志豪擦泪边平静地说，志豪，为了幸福的明天，让我们一起战胜这可恶的白祸吧！

白祸之瘾并不是那么好战胜的，加之文玲与毕志豪一直不愿去戒毒所，躲在家里悄悄地戒显得更加艰难。特别是文玲吐得苦水长流，更要命的是她觉得每根骨头里似乎都有虫子在爬，使人奇痒难忍。毕志豪惺惺惜惺惺，忙去弄来“药”救心上人脱离苦海。文玲本想拒绝，但她的意志终于未能挡住那白色魔粉的诱惑……这样“戒”了数次后，文玲的信心终于丧失殆尽。毕志豪也趁机大开“吸戒”，于是，一对恋人在毒海中越游越远。

两个人吸毒，很快就经济告急。于是，毕志豪不仅自己重操旧业，还将自己的心上人也带入了贩毒黑道。

1996年春节前，毒瘾越来越大的文玲周身发肿，神志也越来越不清，说话颇三倒四，她这才慌了，赶紧回到达川家中戒毒。为了避开女儿每年春节回家时在本城结识的那些“粉友”，卢英把文玲带到了巴中地区的平昌县去戒毒。

在平昌的那些日子里，文玲极其消沉，生理上和心理上都痛苦不堪。她在给毕志豪的信中抄写着这样的词句：“……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瞞！瞞！瞞！”不过，在卢英的精心照料和严格监督下，戒毒进展很大。到7月上旬，毒瘤明显缓解。但身上发肿等病状仍不见好转，卢英只好将其带回本县治疗。

回家后，为了防止文玲再与那些“粉友”接触，卢英天天寸步不离地守着女儿，但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7月11日上午，卢英冒着酷暑陪文玲在城里转了一上午。中午，卢英因得不行，便躺在床上休息。事后，卢英回忆说，其实，那天出事是有些预兆的，天气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文玲特别烦，在屋里踱了一阵后说她要出去一下，十分钟就回来。我心里明白应该跟着她，但浑身无力，腿抬不动，眼睛也睁不开，最后竟一下睡着了。这一睡就是两个多钟头，直到女儿出事后报信的邻居间人家中摇了好一阵才把我弄醒。邻居说，文玲中午出去便犯了“粉”瘾，忍不住径直去找过去的“粉友”。“粉友”给她打“药”时过量了，当场就把文玲给打“睡着”了。“粉友”以为睡一阵就会好转。不料，文玲脸色苍白，气息奄奄，“粉友”这才吓得连背带拖地把文玲送进了医院。医生说是海洛因中毒。

卢英跌跌撞撞地赶到医院时，医生正七手八脚地在抢救，天快黑时，文玲总算醒了过来，吃力地睁开眼，噙动着嘴想说什么。卢英忙把耳朵贴过去，只听女儿断断续续地说：……满

洒靠不住，……告诉妹妹，千万别追求……潇洒，也千万别沾白粉……

此言似血，却成了一个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少妇的遗言！
刺激，文静偷盗抢劫入牢狱

因寻

文玲的遗言并不被她的么妹文静记取。

文静的名字与她的性格恰恰相反——泼辣且野，野得像个男孩。更要命的是这“野”女孩的逆反心理特别重。越是别人说做不得的事她偏要做。读初中时，班里有个谁都惹不起的“恶姑奶奶”，可她偏要惹，经过几次头破血流的恶斗，她终于制服了“恶姑奶奶”，成了全校闻名的“大姐大”。投身社会后，听人说“白粉”沾不得，她却不信那个邪，一次，竟英雄好汉一样当众吸了起来……

这种偏执性格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在文玲死去几个月后，法院的布告终于把文静的名字“贴”上了墙。那布告上说，文静因犯盗窃、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

文静居住的那个小城的人们怎么也想不通：这么靓丽一个女孩，妈是老板，家庭条件又那么好，干啥去偷去抢呀？

还未从失去大女儿的巨大悲痛中复苏过来的卢英却并不为么女儿的结局感到奇怪。她十分明白：文静“出事”只是迟早的问题。

文静初中毕业后，她觉得家庭像牢笼，太沉闷，发誓要出去闯世界，寻找新感觉和新刺激。结果，被人贩子将她拐到广州的一家舞厅，差点被老鸨逼着去“接客”，幸好卢英及时得到信息，很快前去将她解救出来。

这次被拐骗的经历虽使文静着实吓了一跳并安分了一段时间，但见到的那些灯红酒绿也使她觉得外边的世界的确很精彩，也的确很刺激，萌发了“应该南下广州，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念头。

去广州得先弄一笔钱。文静多次向父母谎称自己想借几千元钱做点生意，并强调：今后一定连本带息还清。不料，文家俊。卢英并不那么好骗。不但不借钱，反而警惕地把所有存折和现金全都藏了起来。文静借钱落空，气得直骂，但又别无它法，只好按捺住性子等待机会。

机会很快就来了。一次，文家俊忙不过来，让文静帮忙去某厂收一笔欠款。文静高兴得差点笑出声来，收到2000元钱后当天就乘火车直奔广州。

一年后，等文静操着广东腔回到小县城时，卢英除了听女儿说她在那边找了个香港人又蹬了之外，还发现跟香港人接触过的女儿身上有了很多不对劲的地方：成天哈欠不断，老是昏昏欲睡，还常神秘兮兮地与文玲以前那些“粉友”搅在一起，放在家里的钱也突然不明不白地不见了。卢英不由暗暗怀疑：莫非这女娃子在吸毒？问了几次，文静钢嘴铁牙，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吸毒。卢英信不过，把她关了起来。结果，不到半天，文静就原形毕露，脸色腊黄，吐得差点把肠子都呕出来……

卢英气得痛不欲生，她放声大哭自己命苦，三个女儿就有两个沾上了“白粉”，哭过后，她和文家俊商议着要把文静送到戒毒所。但文家俊说那儿戒毒很苦，如果戒了以后再犯，还会送去劳教。卢英觉得，如果真的那样，女儿的名声、前程岂不是全完了？最后，两夫妇决定还是让女儿在家里戒。当时，卢英和丈夫开的舞厅生意很好，无精力管文静戒毒的事，就让自己的母亲和文家俊的母亲在家监督文静。两个 70 多岁的老太婆岂是文静的对手？老人在前门守着，她从后边的窗子跳出去；老人们守在屋里，文静撒谎上厕所转眼跑得无踪无影。卢英带文玲到平昌戒毒那段时间，文静就更放肆了，家里完全成了她那伙“粉友”的吸毒场所，家里放钱的房门三天两头被她撬开，两万多元钱被洗劫一空。卢英价值七千多元的首饰也被文静偷去卖了，连家里的大彩电也被文静叫来两个“棒棒”抬去用 400 元当掉……

接下来，更可怕的事发生了：当文家俊加紧防范，家中无什么可偷时，文静把一双贼手伸向了邻居。一天，她撬门入室，盗走邻居收录机等物。过了不久，文静囊中羞涩，又要“饿粉”了。在毒瘾快发作前，文静匆匆喊上一个 30 岁的“粉友”，手持刀片，到外边去“想办法”。在一条小巷里，正巧碰上“粉友”的情敌，于是，两人以那“情敌”勾引了“粉友”的男人，要求赔偿损失为由，动手动脚地抢那“情敌”的项链、耳环。那“情敌”护住项链不放还大喊抓强盗，文静亮出刀片在那“情敌”脸上比划边恶狠狠地威胁：再不放老娘把“盘子”给你划了！“情敌”被镇住了，手一松，项链被“粉友”一把扯下，文静便乘机将“情敌”手指上的戒指掳了下来。

在毒瘾发作前，文静终于用项链、戒指换来了“白粉”，同时，也换来了 9 年牢狱之灾……报复“粉友”，卢英“前仆后继”成毒贩

大女儿命归西天，小女儿犯罪坐牢后，文家俊家并没能安静下来，两个女儿的阴影时时折磨得一家人心中生痛，她们那帮“粉友”也不时来搅动这个本就令人伤感的家庭生活：不知文玲。文静“出事”的纷纷前来约她们吸“粉”，知道“出事”的缠着文家俊夫妇说：文玲、文静以前的“药”肯定没用完，行行好，让给我们吸吧！重庆一个姓刘的毒贩几次打来电话问要不要“药”？还有几个毒贩上门劝卢英：你两个女儿那么多“粉友”，这可是些财神！你何不从我们这儿进些“药”去卖？肯定赚大钱！

对这些吸毒者和毒贩子，卢英开初一直采取回避态度，被缠得不耐烦了，便发一通火，大骂一顿了事。但那伙人似乎一点也不怕人发火骂人，骂过之后，过几天又会嘻皮笑脸地找上门来。1999 年初，一个叫“鬼脸”的吸毒者再次打电话要卢英“看在与你女儿是粉友的份上，帮忙弄点药救救急！”卢英答应了。她在心中暗暗发狠：你这些狗日的，以前常与我女儿一起吸毒，把我女儿一个给“吸”死了，一个“吸”进了监狱，现在还要来缠，老娘就给你们买，让你们也吸死！

除这种报复心理外，卢英贩毒当然还另有所图。据她后来交待：贩毒还可以从中赚些钱，弥补文玲、文静以前吸毒时给家里造成的经济损失。在这两种心理的驱动下，卢英于元月底找到文玲以前“以贩养吸”时的“上线”老吴，赊 20 克“药”拿回了家。

当天下午，“鬼脸”买“药”来了，一称，老吴给的 20 克“药”只有 17 克。卢英不由鬼火冒：龟儿老吴，骗老娘那 3 克药去买棺材！卖给“鬼脸”15 克“白粉”后，卢英一算账，不由一阵亢奋：从老吴那儿赊 170 元一克，而卖给“鬼脸”却是每克 220 元，转手就

赚了七、八百元！

当卢英边点着一叠叠崭新的“老人头”边盘算今后怎样把“业务”做得更大时，门突然被人一脚踢开，接着，几个便衣警察一拥而入。

卢英发财的美梦刚开了个头便结束了……

手记之三十六：一

网打尽

“黑洞”被一个“误会”的举报揭开

坐落在渠县天星镇的中国储运重庆公司川东分公司渠县页岩机砖厂常年烟遮雾罩，给人一种难识庐山真面目的感觉。曾在川东分公司担任过领导的李素珍、赵权等人一直觉得有一个神秘莫测的“黑洞”存在于机砖厂那烟雾缭绕之间：该厂生产繁忙，生意火红，可上缴利润却数年增长甚微，赚来的钱似乎全部消失在这“黑洞”之中。); 怖分公司的几任领导都曾想探探这“黑洞”的深浅：他们亲临该厂蹲点，组织人马查账，找有关人士了解情况……可是，那烟遮雾罩的“黑洞”密不透风，水泼不进。要不是 1998 年来自“黑洞”中的那场“误会”的举报，人们的种种怀疑也许将永远只是一种无法印证的幻觉。

对“黑洞”的那次致命的举报的确是一场“误会”。页岩机砖厂的质检员唐昌尧与上任厂长王子恒（副县级）关系较好，多年来，每到春节前后，唐昌尧都能从王子恒掌管的“小金库”中得到数万元的好处。但王子恒 1996 年底离任后，接任厂长和“小金库”的掌管者李书林 1997 年春节却未给唐昌尧什么好处。他忍着性子从春等到夏，从夏盼到秋，眼看又要到 1998 年春节了，仍不见动静。唐昌尧断定是李书林那老小子要断自己的财路，一怒之下，于 1998 年初冬的一天把李书林等人弄虚作假，瞒产贪污的事儿举报到了川东分公司党总支书记李素珍那儿。举报后，唐昌尧仍不解气，在一次吃喝时，壮着酒胆，质问李书林为什么不给自己“好处”。李书林反问：“1997 年的‘好处’大家都还没有分，难道要给你一个人开小灶？”唐昌尧知道自己误会了，忙跑到李素珍处要求：我误会了，不举报了！

这场举报风波并未因唐昌尧的“误会”和“不举报”而停息，重庆公司和川东分公司 1998 年 3 月对唐昌尧举报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清查。这次清查只在经济上对王子恒一伙形成了重创，随后渠县人民检察院的介入，则给了王子恒一伙毁灭性的打击。在检察长黄绍金的指挥下，经过舒建新、陈建平、罗成安、刘文健等办案人员一年多艰难的侦查，该厂那个吞噬 347 万余元公款的“黑洞”终于被逐渐揭开，该厂从厂长到质检员的 7 名管理人员也在渠县检察院掀起的那场反腐风暴中全军覆灭。2000 年 5 月底，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贪污私分 28 万元的第一任厂长王子恒有期徒刑 15 年，判处贪污私分 23.8 万元的第二任厂长李书林有期徒刑 13 年，贪污私分 10 至 19 万元的质检员唐昌尧、厂党支部书记王波、厂会计廖宗泉、副厂长邓光鸿、销售科长晏泽普分别被判处 6 至 10 年有期徒刑。“内部考核”给我贼心给我胆

王子恒、李书林等 7 人当初“性本善”。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有 4 名党员，3 人是转业军人。农民的朴实、憨厚和党内与部队的严格教育形成了他们良好的政治素质与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初到机砖厂时，他们虽大多过着“吃稀饭了泡菜”的日子，但他们的灵魂深处却从没有过与党离心离德的念头或要贪污腐败的想法。人们还记得，渠县页岩机砖厂从 1987 年创建到 1990 年一直亏损，建厂时的 7 个股东有 5 股退股，把一个负债累累的烂摊子丢给了王子恒等人。危难之时，王子恒、李书林等人挺身而出，他们爱厂如家，惨淡经营。他们把自己的钱垫到厂里开支不收一分利息。他们常与招聘的临工们摸爬滚打在工地上，经

受着烟熏火烤和日晒雨淋，搬砖、出窑、运煤、上车，什么苦活脏活都干，却很少有人去领额外的补贴，有时加夜班干饿了吃夜宵的钱也都坚持自己掏。对此，渠县人民检察院的案件侦查终结报告中特意写道：1992 年，王子恒任厂长后，与行管人员齐心协力，狠抓管理，使机砖厂扭亏为盈，当年就盈利 10 万元……

令人遗憾的是，渠县机砖厂扭亏为盈的 10 万元却成了该厂从辉煌走入“黑洞”的“买路钱”，创造辉煌的王子恒等人也从这个“黑洞”坠入了罪恶的深渊。对于这样的结局，重庆公司和川东分公司的头头们痛心疾首地说，想不到，真是想不到啊！

其实，祸起萧墙，种豆得豆，川东分公司当初的头头是应该想到这个结局的。如果没有他们那个诲淫诲盗的“内部考核”，悲剧还会发生吗？

1992 年底，王子恒等人扭亏为盈 10 万元时，除了自豪与骄傲外，对金钱并无非分之想。他们把 10 万元利润一分不少地上交后，川东分公司的头儿们却高兴得头脑发热了，大笔一挥批给了王子恒等行管人员 5.6 万元奖金。从未见过这么多钱的王子恒后来回忆说：捏着那张支票，我的手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可公司的头头拍着王子恒的肩说：老王，干得不错嘛，该奖该奖！头头们还说，发这么多奖金，公司不好摆账，你干脆自己搞点隐形效益，另做一套账对付税务审计纪检等部门，把自己该得的那一部分奖金留下，我们分公司知道这个账就行了。

头头们面授机宜的话使王子恒耳热心跳，惶恐不安。后来，他交待说，分公司的头头们实际上是叫我们把含有国家税费和应上交国家的利润截留下来私分。那时，我家里很穷，很需要钱，但我要去截留这些属于国家的钱，我实在是既无那分贼心也无那种贼胆。我经历过好多运动，知道干这种事是要坐大牢的！

当时，公司的头头好像看出了王子恒的心思，劝慰他说：别担心，从 1993 年起，我们川东分公司下达个文件，这样就合法了。

果然，“川东分公司内部考核办法”于 1993 年 2 月下达到了下属的 4 家企业。该“办法”在考核指标中对渠县页岩机砖厂下达了全年完成利润 49 万元的任务，在“奖励”中则规定：超产部分由其自行处理，川东分公司不再分成。那意思十分明白：渠县是我川东分公司的天下，我只要出个文件就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就是超越任何组织的圣旨。只要机砖厂交上 49 万元，其余部分你机砖厂是装私人腰包还是拿去干别的什么，我川东分公司一概不管，什么国家税费什么国家利润都统统不在话下。王子恒在后来的交待中说，金钱的诱惑力是巨大的，收到这份“内部考核”后，趁机整国家一坨的贼心和贼胆油然而生。我想，怕什么，出了事有这个文件顶着哩！

就在收到“内部考核办法”的当天，王子恒连夜召集当时的副厂长李书林、办公室主任邓光鸿、供销科长晏泽普等人开了个“诸葛亮会”。王子恒抑制着内心的激动说，各位，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呀！我们要趁这个机遇好好搞一下。请大家出谋划策，看怎样才能搞得既把内部考核给的优惠政策用足，又可避免被有关部门找麻烦。王子恒的话感染了每个与会者，会场气氛一下活跃了起来，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发言。有的说，在装载机使用、页岩运费上打主意，有的说多造工人工资或者销售只开收据，不开正式发票。有人建议：干脆隐瞒产量，销后把钱存入小金库……

王子恒“集思广益”，一一采纳，决定先照这些办法试行一段时间再逐渐完善。就在那次会议上，王子恒还对“小金库”的账务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和严格的管理。副厂长李书林被任命为小金库的会计，办公室主任邓光鸿任出纳。“积累”达到一定数额存入银行，存单交王子恒保管。不久，王子恒发现邓光鸿有挪用“小金库”资金的嫌疑，当即撤其出纳之职，更换为厂会计廖宗泉担任。

王子恒的“小金库”试行两个月后，财务上实现的利润远远超过了川东分公司下达的计划比例。王子恒果断决策：上边的利润是多少我们的报表和账上就反映多少，多余的部分弄到一边。但当年的效益实在太好，增大成本的方法用完了却始终把账上“多余”的利润套不完，会计廖宗泉没办法了，只好把销售收入压一部分不上账。王子恒觉得“这样整要不得”，忙又召集李书林等人开会研究如何解决超利润问题。还是老中专生李书林有办法，他说，最好的办法还是搞砖，不报收入。因为这样搞，把生产中的煤炭等各种费用都搞进去了，实施起来又方便，又不易暴露发现。但是其他方法还是要继续搞，如果全部拿砖出来会造成产量不正常，容易被人发现。与会者一致同意李书林的意见。有人夸奖说，龟儿多读几年书的人是不一样！

从此，每月 20 号扎账前，廖宗泉和李书林先“平衡”一番后，报王子恒确定隐瞒的产量，由此形成了平衡做账法的第二套账。1993 年，王子恒等人以少记收入，多记支出等手段从厂财务账共套取资金 62 万余元。1994 年又以同样的手段套取 76.7 万余元进入“小金库”。这 139 万余元公款，王子恒等人按职权和在作案中“贡献”大小进行了分配。因有川东分公司“内部考核办法”的庇护，司法机关在查办此案时未将这 139 万多元算入犯罪金额之内。制造这一“考核办法”而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川东分公司的头头们除受了几句“政策水平差”的指责外也毫发未损，他们照样升官发财，照样平安无事，他们很差的政策水平 1995 年以后的几年间仍诱发着下属企业一些人更大的犯罪野心，他们埋下的祸根继续在渠县页岩机砖厂膨胀、蔓延……

贪婪的欲望像越喝越渴的盐水

川东分公司的头头们也许是察觉到了渠县页岩机砖厂的油水太大，故在 1995 年的“内部考核办法”中要求其“全年完成所得税后利润 50 万元”。王子恒盘算过，税后利润也不过多几十万元，根据当时的生产销售情况是完全可以完成并还会有“剩余价值”流入自己的“小金库”的，但那样一来，“小金库”不但要“损失”几十万，以前搞的那些“事儿”有可能还会被人怀疑，有可能出现川东分公司以后每年加码的情况。那样一来，“小金库”就没有多少赚头了。过去两年间已从“小金库”中得到丰厚“好处”的王子恒对金钱的兴趣正浓，对金钱物欲的贪婪正像越喝越渴的盐水——得到了财富反而更加渴望财富。此时要其“金盆洗手”，实在无异与虎夺食。果然，在川东分公司将“考核办法”交职代会讨论的会上，王子恒发表了强硬的反对意见，他强调只能接受税前利润 50 万元的任務，“否则，一切免谈。”

由于王子恒的坚决反对，川东分公司 1995 年的“考核办法”在职代会上未能通过。

在川东分公司的头头们看来，不搞一个考核办法，就不能表现自己的政绩，就无法体现自己的领导权威，因为王子恒的反对而不能下达一个文件更是有失体面的事情。为挽回自己的权威和面子，当年 2 月 25 日，在职代会上未能通过的考核办法还是以川东分公司党总支部委员会的名义下发了。

重庆总公司见到这个“程序不合法的考核办法”后，立即予以纠正，通知停止执行。王子恒幸灾乐祸地说，让他们狗咬狗吧，我们自己搞自己的。他要求“大家要节约，要多挣，多挣一分，我们就可以多分一分”。1995年，在王子恒的指挥下，他们的“小金库”从渠县页岩机砖厂共套取厂财务资金 97.7 万余元。年底，王子恒在自己的办公室召集李书林、晏泽普、邓光鸿、廖宗泉开会研究私分时，王子恒在强调了按职务高低和贡献大小分配的原则后，又提出自己的儿子王 XX 是家属工，也要参加分配。这一提议使与会者面面相觑。见大家不吱声，王子恒很恼怒，狠狠地干咳了两声，李书林一伙赶紧附和可以可以。在王子恒的儿子得了一万元后，为了平衡其他关系，一个姓郑和姓刘的也多分了几万。气得李书林会后出门便骂：龟儿太猴了！自己分的钱要最高数，他儿子还要占一坨，真他妈的太那个了！

骂归骂，气归气，正如邱吉尔那句名言说的那样：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骂过气过之后，王、李二人又狼狈为奸，勾结作案了。1996年2月，李素珍任川东分公司经理后，着手改组机砖厂的班子，将王子恒调任川东分公司副经理兼机砖厂党支书。“小金库”的权柄落入了李书林手中。王子恒虽退居二线，但他仍“垂帘听政”。这一年，李素珍虽严格管理，李书林等人仍按王子恒的旨意以种种办法与其周旋抗衡，硬是从厂财务账上“虎口夺食”34万余元。

1996年底，赵权取代李素珍任川东分公司新一届的经理。随即，社会上开始风传王子恒将被免去机砖厂党支书的职务。真如此，那意味着王子恒将被彻底挤出机砖厂这块风水宝地。那段时间，王子恒正好听说李书林等人分钱未给自己考虑，不由气不打一处来，他放出话说，要捞大家捞，“小金库”的存单老子就不拿出来了！李书林等人慌了手脚，忙采取补救措施。首先，李书林、晏泽普等人轮番宴请王子恒，信誓旦旦地向王表示：即使你走了，我们对你的心也永远不会变。接着，当王子恒被免去党支书后，李书林等人马上将1996年所搞的“小金库”款给王子恒分了2万元，并给其子王XX也分了1万元，以实际行动向王子恒表达了忠心。最后，在王子恒即将出任农用油料供销公司副经理前夕，李书林、晏泽普等人多次向王子恒建议：赵权上台，人事上肯定要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你把余下那60多万拿出来分了算了，免得节外生枝。王子恒终于被说得回心转意了。1997年元月23日上午，王子恒、李书林、晏泽普、廖宗泉、王波到晏泽普的寝室里进行了这树倒猢猻散前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分赃。王子恒咬咬牙将自己几年来管理的67万余元存单全部交出，李书林也如同抠肉一样从自己掌管的“小金库”中拿出16万元的存单堆在桌上。面对83万多元的存单，大家紧张激动得不声不响了，只知道瞪大眼睛发愣。后来，还是王子恒首先打破了这难堪沉默，他一如既往地强调分配要按职务和贡献大小来处理，要照顾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李书林附和说老厂长说得对，大家发表意见，好好平衡协调一下。一番勾心斗角的“协调”后，以王子恒分得18万元，李书林16万元，晏泽普12万元，廖宗泉、邓光鸿、王波各10万元，唐昌尧5万元，厂里其他人员分得数万元结束了分赃。在大家喜滋滋地把存单装入腰包时，王子恒开始处理这次犯罪活动的“后事”，他说，这件事就告一段落了，小金库的账没有用了，李厂长和老廖你们把它统统撕下来烧了。账烧掉后，王子恒还觉得有些不放心，他叫王波拟写了“渠县页岩砖厂根据川东分公司93、94、95三年对该厂上缴任务后的利润可作自行分配的文件精神，按其职责对历年结余进行分配属实”的说明，五个在场人分别在“说明”上签字后，王子恒又反复叮嘱：我们已是一条船上的人了，大家今后要管好自己的嘴，不要出去乱讲，否则，一出事就会被人一网打尽，落得个全军覆灭。也许是此话太不吉利，渠县页岩机砖厂7名管理人员后来果真被检察机关一网打尽，落得个全军覆灭的下场。

权力拒绝监督必然腐败

对渠县页岩机砖厂的问题，李素珍 1996 年任川东分公司经理后即着手进行了清理整顿。她首先将常与分公司抗衡的王子恒调离机砖厂，给了他一个有职无权的分公司副经理职务。然后，将下属各部门的会计集中到川东分公司统一办公做账，对下属各司、科、厂的财务开支统一为一支笔审批。试图以此强化监督力度，扼制住机砖厂那个无底“黑洞”继续扩大的趋势。但李素珍的措施并未能监督到和控制住机砖厂的局势，1996 年底，王子恒调走后，继任厂长李书林变本加厉地经营巩固着机砖厂的“小金库”。砖厂会计廖宗泉到分公司办公后，李书林重新确定“小金库”的账由邓光鸿担任会计、晏泽普任出纳。为了瞒着分公司搞更多的隐形效益，李书林煞费苦心地搞了三套账：第一套是机砖厂真实的账目，也是对外绝对保密的账目。第二套账是将第一套账分成三块而成。即：应给分公司上交的利润；分公司允许机砖厂截留的“奖金”部分；机砖厂以瞒产、扩大支出、收入不记账等手段“积累”起的资金。第二三部分皆属李书林等人的私分资金。第三套账由第二套账中的前两部分组成，这一套账是给分公司和外边看的，第一、二套账则是除机砖厂的 7 人外对谁都要保密的。这三套账果然厉害，费了不少心思要查机砖厂问题的李素珍还未来得及搞清机砖厂账务的子丑寅卯，便于 1996 年底匆匆卸任了。

1997 年，赵权任分公司经理分管砖厂，李素珍任分公司总支书记。赵权也曾试图查清机砖厂的问题和制止李书林等人继续搞鬼，但李书林、邓光鸿等人仍按以前的方法套取资金和做账。1997 年以少记收入、多记支出等手段共从厂财务套取 62.2 万余元。只是这笔进入“小金库”的资金还未来得及私分便东窗事发。当时，李书林为了不让赵权了解掌握机砖厂搞隐形效益的底细，叫邓光鸿做了一本 39.49 万元的假账应付 1997 年底赵权来厂清算隐形效益，并以此账与赵权结清了当年的隐形效益，与实际套取的隐形效益 62.26 万元隐瞒少报 22.76 万元。赵权蒙在云里雾里，不知东南西北。

1997 年底，有知情人向川东分公司党总支书记李素珍反映了 1996 年和次年煤炭购进有假。1998 年 3 月，重庆公司组织人员带着对分公司经理赵权的离任审计和调查砖厂问题的目的到了渠县。重庆公司经理庄何也亲自带队到渠县组织分公司领导和砖厂有关人员开会。会上，庄宣布，砖厂的问题要搜集证据，要追查前三年的问题。王子恒听后脸色突然变得苍白，小便失禁打湿了裤子。他慌忙搜集了分公司历年下达的“考核办法”，安排李书林等人认真读，同时以砖厂的名义拟定一个文件，对其私分的公款进行辩解。并要求大家统一“分钱是根据分公司的文件，那些钱该我们得”这一口径……

王子恒一伙的行为使我们不禁又想起了权力失去制约必然产生腐败那句名言。如今，在拒绝监督的人最终受到了比监督更为严厉的打击的时候，我们也很自然地要联想到另一个问题：那些允许犯罪分子搞隐形效益并制定“内部考核意见”为其犯罪大开绿灯，致使 347 万余元（其中 142 万余元属国家税费，205 万元属公司）公款流入“黑洞”的人在这一犯罪活动中应承担什么责任，应受到什么处罚呢？
手记之三十七：
讨回公道

一场历时 7 年的民事官司经市、地、省三级法院先后 6 次审理后终将被颠倒的黑白重新扭转时，虽激动不已但却已无胜利者喜悦的燕本志首先想到的是：给达州市人民检察院民行处的检察官送一面锦旗！

做锦旗的老板的要价超过了燕本志手中那捏得汗津津的 50 元毛票，他不得不在市区内连跑了四家订做锦旗的门市——要是在七年前，几十元钱对做生意并有一辆出租车的燕本志

肯定算不了什么，但一件小小的经济纠纷案已将燕本志拖得身心疲惫，潦倒贫穷——穷得囊中羞涩，家徒四壁，穷得他为做一面小小的锦旗而犯愁而几元几角地与人讨价还价。

跑到第五家，燕本志终于找到了一个愿以 50 元做一面锦旗的老板。

2001 年元月中旬的一天，燕本志把那面写着“为民伸冤，清正负责”的锦旗送到了为自己讨回公道的检察官手中。

商海险恶，是谁埋下冤案祸根

同达川市（文中的达川市现已改为通川区，达川地区已改为达州市。下文仍用旧名）内那些遭遇下岗后用自行车推着“下岗牌卤鸡蛋”沿街叫卖的人相比，燕本志 1993 年从达川地区电子工业公司下岗后给自己寻找到的职业是令人羡慕的——他当了经理——一家自己命名为达川地区惠丰物资贸易公司（下称惠丰）的经理。

不为外人所知的是，该公司自成立之日起便陷入了无法摆脱的窘境：由于缺乏资金，刚办完执照就面临着倒闭的危险。危难之中，在某银行工作的朋友说，他可以帮忙解决资金。但朋友帮忙时附带了一个条件：让他的亲戚郑三奎进惠丰合伙经营，掌管人、财等方面的工作。

燕本志欣然应允。让郑三奎掌管惠丰的人权财权等于实际架空了自己这个经理，但燕本志心知肚明：别人有钱，操纵管理惠丰乃天经地义之事。于是，1993 年 4 月初，惠丰在燕本志交集资款 1.1 万元，郑三奎交集资款 16.4 万余后正式启动，主要经营家电等物资。郑、燕二人集资款额的悬殊和无合同无规章形成的松散联营方式及郑、燕二人的同床异梦、离心离德，导致了惠丰经营中的混乱无序。三个月后，郑、燕的矛盾便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惠丰也随之宣布散伙解体。

惠丰存在的三个月没有产生什么经济效益却在它运行到第 12 天时便遗留下一件打了 7 年的官司。

引起这场官司的人叫周志全。这个时年 38 岁当时在达川市内专做“串串”生意常干些坑蒙拐骗的开县人，在惠丰开业的第 10 天，他大模大样地来到了有些冷清的门市，与郑三奎、燕本志等人搭上讪后，他说：农药在开县陈家乡那地方好卖得很。不是吹牛，凭我的人缘关系和推销能力，十万八万元的农药，保证一两星期内就卖完！

周志全的话打动了郑三奎、燕本志，二人一合计，决定做这笔业务。4 月 12 日，郑、燕二人以惠丰的名义与周志全签订了超越经营范围的农药销售协议，合同约定：由惠丰提供 10 万元的农药给周志全销售。为保险起见，惠丰还让周志全提供了一个叫周国才的纸箱厂老板担保。27 日，周志全、周国才在与惠丰签订“为确保 10 万元农药款安全收回，周志全、周国才愿以开县私房抵押”的补充协议后，从达县农药分装厂拉走郑三奎赊来的价值 9.88 万元的农药。数日后，燕本志受郑三奎之托前去开县收款时发现，周志全把农药拉回陈家乡后，全部拿去抵了自己过去所欠的债务。郑三奎得报，与燕本志等人在开县追款无果，好不容易才从周志全抵债的债主处收回价值 3 石万余元的农药退还给达县农药分装厂，还欠 60640 元的农药无法收回。1995 年，农药分装厂起诉郑三奎，郑以自己的物资作价 75000 元偿还了此款。

1993年10月23日，郑三奎、燕本志联名向原达川市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周志全、周国才违约拖欠贷款。达川市法院予以立案。

11月见日，官司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郑三奎的一纸民事诉讼状将达川市法院8天前立案时同是原告的燕本志告上了法庭。诉状称：1993年4月12日，原告与燕本志、周志全、周国才三被告达成经营农药协议，由原告给三被告提供近10万元的农药销售。4月27日，三被告到达县农药分装厂提取由原告购买的价值近10万元的农药后，拒不付清下欠的货款6万余元。故请法院判决原告的如下请求：一、三被告偿还所欠原告的农药款6万余元及资金占用利息等；二、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8天前已决定同意对郑、燕二原告提起诉讼的案件立案的达川市人民法院又突然同意变更诉讼关系，将燕本志列为了本案第一被告立案审理。

原告窝里反，一场没有预计到的灾难降临到了燕本志的头上，骗得6万余元农药的周志全、周国才却被“凉”在一边坐山观虎斗。一审二审，燕本志连连败北

令燕本志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自己明明是本案的原告，怎么转眼间就成了被告？达川市人民法院在接受郑三奎的诉讼请求并于11月1日变更诉讼关系后，为什么直到7个多月后的1994年6月15日才给自己诉状副本？法官为什么要如此明目张胆地违背诉讼法规，帮郑三奎对自己进行迅雷不及掩耳般的攻击？

更令燕本志始料不及的是，在收到起诉状副本的第三天，达川市法院的法官在未对案件调查，郑三奎也未交财产担保的情况下就单凭郑三奎的一纸“财产保全申请”扣押了他那价值13.5万元的夏利牌出租车，迫使出租车20天无法经营。

虽然对这场违法的突然袭击愤恨恼怒至极，但燕本志并不把这场官司当回事。他以为：惠丰的实际法人是郑三奎，农药是自己与郑三奎一起以惠丰的名义卖给周志全的，郑与自己间根本不存在买卖农药的依据，郑三奎告惠丰把农药卖给周志全造成损失，岂不等于郑三奎告他自己把农药卖给周志全造成了损失？燕本志乐观地断定：郑三奎无中生有地挑起的这场诉讼根本不堪一击，他甚至估计郑三奎会不战自败。当然，燕本志也充分预计到了法官执法水平、社会风气不正等因素对案件审理的影响，且作出了最坏的估计：“即使法官歪起屁股判，顶多也只能把那6万多元的损失给郑和我各判一半……”

7月21日开庭前，燕本志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某法官。并说，自己的律师也同意这种观点。不料，那法官一听火冒三丈，指着燕本志的鼻子吼道：格老子少嚣张！别说你请个律师，就是请个七师八师，郑三奎与你这案子也是购销关系！

燕本志以为是自己不会说话惹得法官生气，法官怎会未审先判呢？但开庭后，尽管燕本志以大量的事实表明自己不是本案的被告，尽管他反复阐明自己与郑三奎属合伙经营关系而非购销关系，尽管他坚持投资多分红多承担损失也应多，尽管他极力呼吁结束这场错误的诉讼，共同追究本案的真正被告周志全、周国才，但是。一审的判决结果仍然应了那位法官的那些“气话”——达川市人民法院（1994）达市法经初字第24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燕本志系工商登记的惠丰负责人，燕称郑三奎是惠丰实际法人无事实根据；郑三奎把从农

药厂买来的农药卖给燕本志属实，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成立；故判令：惠丰负责人燕本志偿还原告郑三奎农药款 60640 元并支付货款利息及 2310 元诉讼费和 1000 元活动费……

接过判决书，燕本志愤然道：我不服！某法官轻松而不失幽默地一笑说：不服又怎样？搬起石头打天去吧！

燕本志知道自己的“石头”打不着“天”，但他仍于 1994 年 12 月 23 日向原达 j 门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上诉状”。

达川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燕本志上诉案时已是 1995 年 5 月 3 日了。二审的气氛似乎比一审更紧张更激烈。法庭上，燕本志、郑三奎及他们的律师们围绕燕本志是不是本案合格的当事人，郑三奎在惠丰的实际地位、权力，郑、燕之间是否构成这批农药的购销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当庭举证和唇枪舌剑的争论。燕本志认为：因郑三奎注入了大量资金已成为了惠丰的实际法人，而自己只有七分之一的投资，在惠丰的地位已从名义上的法人变成了一个弱小合伙者和一般管理人员。他举例说：惠丰招聘人员，确定员工工资，支付货款进货，报差旅费等都是由郑说了算；9.88 万元的农药也是郑同意并决定以惠丰的名义卖给周志全的，所以造成的损失应由郑、燕按各自的投资多少分担……

郑三奎和他的律师除竭力否认燕本志列举的事实外，还指责燕将“被上诉人郑三奎与上诉人燕本志之间，上诉人与周志全之间的两个农药购销法律关系混为一谈。”并认定：“郑、燕之间的农药购销关系完全可以从燕本志以惠丰的名义售给周志全农药推断出来。”

二审法院完全支持了郑三奎的意见。原达川中级人民法院（1995）达地经终字第 26 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惠丰的法人系燕本志，该公司对外的债务应由燕承担，惠丰与周志全间的农药购销事实成立，法律关系明确，郑三奎与周志全不是直接的农药购销关系，上诉人燕本志的理由不能成立，故判决：一、驳回燕本志的上诉；二、燕本志应返还郑三奎农药款 60640 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23 10 元，其他诉讼费 500 元由燕负责。 申
诉，冲破缉拿之网顽强地申诉

一场无端降临的官司使燕本志本就十分脆弱的家庭经济雪上加霜。那个空壳的惠丰公司垮了，生意已无处可做。虽有一辆出租车，但时时都担心会被法院强制“执行”去，营运时鬼鬼祟祟，有些地段根本不敢跑，故每日基本上处于亏本状态。二审期间，燕本志原先所在的达地电子工业公司怜其一家人生活无着，将燕招回公司任保卫科长。可二审的判决一下达，燕本志不得不采取两条应急措施：一是把他那辆夏利出租车藏了起来。在未得到公正的判决前，他觉得自己的车不能成为这场歪曲法律公正的官司的牺牲品。二是燕本志辞去了公司保卫科长的职务。他不服二审的判决，他要集中精力、集中时间去申诉，去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有朋友劝燕本志：现在的官司，打的是权，打的是钱，是一场经济政治的较量，你一无权势二无钱，就认了吧。

燕本志说，对这个遭人左右、被人“包装”了的官司，我坚决不“认”！这个外表温文尔雅却性格倔强的巴山汉子很欣赏美国人海明威的那句名言：一个人可以被消灭，却不能被打败。他预计：这场官司到头来法院也许还会判自己输，但只要自己不屈不挠地抗争过，输

赢也都无怨无悔了。同时，在连输两场官司后，他仍对法律的公正性深信不疑。他以为：金钱和权势在某些时候也许能影响案件的审判，但这些因素并不能在所有的时候都决定官司的输赢，官司胜负的决定权虽不完全在案件的某个当事人手里，但捍卫真理，维护法律尊严的勇气却存在于每个公民心中。很多时候，官司打的是事实，打的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精神。

燕本志虽信心十足，勇气可嘉，但他却不敢公开也不能自由地去讨他所追求的那个真理和公道。二审判决一下，达川市法院的几个法官就闻风而动，准备强制执行；公安局的某警察也提着手铐加入了这“缉拿”队伍之中。燕本志知道，如果被抓住，这公道就讨不成了。所以，在法官们集结力量准备对他“强制执行”前，他闻风而逃，在平昌、大竹、达钢等地四处躲避，同时加紧准备申诉材料。不久，他又悄悄去了成都。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接待室，他反复哭诉哀求，要求省法院能立案再审这桩错案。听说人大能监督法院的执法活动，他又跑到省人大找到某副主任申诉自己的冤情。这位副主任查看了燕本志提供的有关证据后，在其申诉上作了批示。1995年6月初，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省人大领导的批示，通知达川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尽快复查燕本志申诉案。

6月中旬，达川中级人民法院告申庭对燕本志申诉案立案，该庭向达川市法院告申庭发出了对燕案暂缓执行的通知。8月初，燕本志得知消息后回到达川市，结束了3个多月有家难归的日子。

不料，燕本志在达川市一露面，就招来了麻烦。那天，刚回家的燕本志正准备洗澡，有人敲门，门一打开，一个面露凶光的汉子便挤进屋，凶巴巴地问，郑三奎的货款你怎么解决？燕本志知道来者不善，他冷静地答道：货款的事有法院，不用你管。那汉子冷笑道：得人钱财，替人消灾，我怎么不管？

燕本志明白：不尽快摆脱这汉子还会有麻烦。他转身想离开不料，他走到哪里，那汉子便影子一样跟到哪里。很快，郑三奎也带着一伙人赶来，郑一个电话，又呼来了达川市法院几个喝酒喝得走路都晃悠悠的人。有法官一见面便口齿不清地骂道：燕本志，你龟儿……子，终，终于回来了，案……子的事，怎么办？燕本志答道：案子我在申诉，申诉下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管你妈的申……申不申诉，跟我走一趟！”燕本志被连推带读到达川市法院后，有人马上拿出手铐就将其铐住。燕问：我又没犯法，凭啥铐我！有人把拘留证一拍说，院长早签字了，老子找你几个月，你现在才冒出来，签字！闻讯赶来的电子公司领导 and 燕的亲友们忙求法官别铐人，并到告申庭找来中院暂缓执行的通知。某法官一看说，中院是建议暂缓执行，我要铐就得铐！结果，燕本志真的被铐了两个多小时后才被放出去。

之后，燕本志和他的出租车在达川市内有了一段可自由露面的时光。可惜好景不长。1996年5月21日，达川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达中法经监字第28号通知书再次结束了燕本志和他那出租车的自由。

那份长达三页的通知书说：燕本志，本院对该案进行复查，证实原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都是正确的。你对该案的再审申请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条件，原判决予以维持。

5月21日后，市法院有人又准备“强制执行”，燕本志也就又过上了背井离乡有家难归的日子。他先是在平昌、大竹等地与寻找他的人捉迷藏，后来又去成都，轮流到省法院、省人大等部门申诉。当时，燕本志已负债累累，申诉的费用和他家人的生活完全靠亲朋好友资助和四处借贷。为了节约钱，他找最便宜的旅馆住，喝白开水就大饼。到有关单位申诉，他大多是走着去，极少坐车。后来，回忆这段艰难的日子时，燕本志说：在异地他乡的旅馆里，每当人静夜深之时，总要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思乡思亲之情，每每念及冤案逼得自己妻离子散，天各一方，而申诉之路又渺茫无望，我就愁肠百结、心如刀绞！他在一首诗中写道：飘泊年复年，回首泪不干，人间岂独悲死别，更有伤心生难见。怒目苍天问明日，何时申我冤！

燕本志的不幸遭遇引起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领导的同情和重视，此案的进展大大加快。1996年12月12日，省高级法院的川经监字第83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原判将农药款的责任判令给燕本志全部承担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令达川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再审又再审，越审越糊涂

拿到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通知书时，打了三年官司的燕本志已到了无米之炊的地步。为了还上访时欠下的债，他不得不将价值10多万元的出租车以4.3万元的价格贱卖掉。不料，卖车不但亏了本还惹来了祸事：1997年初的一天，达川市法院来人以擅卖保全物品之名将燕本志铐在法院的铁栏杆上，当晚又进行了关押，直到燕的爱人交出卖车还剩下的2.5万元款并交500元罚款和100元的执行费才将其放回家。

被强制执行了这一笔钱后，燕本志再次陷入了经济困境，没有钱交水电气费，没钱买米买菜，读书的儿子无钱交学费，逼债的人接连不断……

困境更加激发了燕本志申诉到底的决心。他不相信法律是个别人手中随意捏拿歪曲的面团，他坚信正义真理自在人间，他满怀希望地奔走上访于有关部门。在申请和等待的焦虑中，燕本志盼来了达川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审民事判决书。

这份1997年最后一天下达的判决对事实的认定明显地发生了变化。判决说：“……（惠丰）门市开办后，郑三奎对人员进行了分工，确定了每个人的工资待遇”。这就是说。判决认定了惠丰的实际法人是郑三奎而不是燕本志。判决书还认定：“燕、郑二人于1993年4月12日与周志全签订了农药销售协议，同月27日，燕、郑等人将农药提出交与周志全、周国才返回开县销售……造成60640元损失。”也就是说，判决否认了“郑三奎将农药销售给燕志，燕再卖给周志全，造成60640元损失”的事实，这批农药系郑、燕二人共同经营。

事实清楚了，判决结果却令人不解。判决说，……郑、燕在经营中的债权债务应共同承担。……未收回的60640元农药款及资金利息由燕本志、郑三奎各承担一半，7500元案件受理费各负责3750元。

这样的判决结果，一审时燕本志就估计到并曾主张这样解决过——一审开庭后的第二天，燕本志劝郑三奎撤诉，60640元的债务先平摊，两人共同去周志全处追回农药款再说。当时，郑三奎也同意了，但达川市法院的某法官却强硬地坚持要燕本志付清60640元后才能撤诉和认定为合伙纠纷。燕本志气愤地问：那不等于郑三奎与我真的是购销关系？于是，本能和

解的一场官司被这位法官“逼上梁山”。

打了4年多官司，6万多元的农药款连本带息增加到了11.5万余元，诉讼费7500元，按判决，郑、燕将各负责6万多元。燕本志想：如果是这样，仍等于一审的判决结果，这几年的官司不等于白打了？现在，为打官司，人变老了，工作丢了、家搞穷了，孩子的学业耽误了，岂能仍然接受这不公正的结局！

1998年4月，燕本志选择了一条请求检察机关抗诉的道路。抗诉，还弱者一个公道

找检察机关抗诉这条路是达川市法院一些好心的法官们指出的。当时，数次受挫的燕本志对官司的胜出几乎已到了绝望的地步，他觉得这场受人编排操纵的官司已找不到出路，也走不到尽头。这场官司已搞得他一贫如洗。身心疲惫。对于不幸的人，生命只是一种累赘，他甚至想到了死。但有法官劝他，你这案子找检察院抗诉还是有希望的。见他满怀狐疑，那法官举例说，开江县有个叫王子见的农民因收不到煤厂的转包费而告上法庭，一审判错，二审又判错，重审重判错，检察机关抗诉后，再诉再错判，最后在达川地区检察分院民行处唐高兴处长等人的支持下，王子见终于打赢了耗时5年的官司。

法官说服了燕本志，他半信半疑地去了达川地区检察分院民行处。当把案情的有关证据展示完毕时，燕本志从唐高兴、程继先等检察官那愤怒的目光中看到希望。

那之后，检察官们虽十分关心并认真办理着燕本志的案子，但抗诉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事隔数年，取证困难，调卷更困难。8个月后，检察机关才从法院调出了卷。检察官们通过阅卷结合调查取证的材料，得出了“此案判决适用法律不当，确有错误，实体判决显失公平”的结论。

1999年1月19日，达川检察分院向四川省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提请抗诉报告。

但抗诉很快遭到挫折——因有人提出燕本志和他的律师在庭审过程中陈述了“利润对半分”和“利润共同分配”两种不同意见，省院的抗诉遇到了麻烦。消息传来，燕本志彻底绝望了，他失声痛哭，悲愤欲绝。案件承办人却劝慰他：老燕，此案肯定有问题，别灰心，我们共同找证据再抗。

1999年3月，检察官们多次找法院法官了解庭审情况，获取相关证据，发现所谓燕和他的律师在庭审过程中陈述“利润对半分”和“利润共同分配”的两种意见，卷内均无旁证证明。

根据《民法》35条规定，该案诉讼双方在协议的约定无据可查的情况下，应按照合伙人出资比例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即郑、燕应按出资16.4万元和1.1万元的比例承担60640元的货款及资金利息的损失，而不应是判决中确定的各打50大板。据此，检察分院的案件承办人专程去成都汇报案情，后经达川地区检察分院检委会讨论，于1999年4月28日重新向省检察院递交了申请复议报告。

1999年8月10日，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

2000年7月14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并判决：一、撤销达川市人民法院（1994）达市法经初字第246号，达川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95）达地经终字第26号、（1997）达中法经监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及（199）达中法经监字第18号通知；二、未收回的60640元农药款及资金利息计75000元由郑三奎承担69868元，燕本志承担5132元；三、案件受理费7500元郑三奎承担6000元，燕本志承担1500元。

然而，燕本志还在为此案奔波不停：被达川市法院强制执行走的2.5万元交“执行回转申请书”数月了，达川市法院仍未予理睬，更未予行动，被强制执行去的2.5万元仍在无望的追讨之中。而当初那些不知是无意还是故意办错此案的法官们升的照样升了，受重用的照样被重用着……

手记之三十八：风尘女子难为妻

在笔者按动相机快门的那一瞬间，杨铃突然低下头。用头发遮住了脸庞——她不愿把那张不失秀美却有着三条蚯蚓似的刀痕的脸暴露给人们。她说，这三条“蚯蚓”是她心中无法消逝的痛苦和耻辱，更是她永远的恨。

自2000年3月这三条刀痕形成后，杨铃曾数次到四川省大竹县公安局和检察院，“要求严惩用刀片毁容”的前夫唐毅。而因这三条刀痕已被关押了8个多月的唐毅却自始至终都一口咬定那三条刀痕系杨铃想嫁祸于人而自伤，并以“农夫和蛇”的故事自喻自嘲。

2001年4月12日，大竹县人民检察院以“唐毅故意伤害一案的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撤诉，将案卷退回大竹县公安局。

美貌的姑娘太虚荣，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1980年，杨铃出生于大竹县一个工人家庭。当煤炭工人的父亲和种田的母亲虽没能创造出令杨铃满意的生活环境，却给十多岁后思想和身体都早熟的她留下了漂亮的容貌：丰腴高挑。皮肤白皙、笑脸妩媚，长长的睫毛下，明亮的凤眼默默含情。

有人说，漂亮是女性的资本和优势。杨铃很注重发挥自己的“资本和优势”。开初，她觉得电影演员很风光，小学还未毕业就想报考电影学院。后来，进城时见那些女大款挺神气，又要求父母让她去做生意。她坚信上帝既给她生了一副一般的模样，就一定会给她一份不一般的生活。她甚至设想她的白马王子也肯定是比尔。盖茨那种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像个英国绅士一样的大款。

现实很快将杨铃憧憬的浪漫之梦击得粉碎。16岁那年，杨铃按自己的标准在同班同学中选中了一个“白马王子”，但还没容她品味出“爱情”的滋味，便被父亲棒打鸳鸯。怀着对父亲的憎恨和“挣钱发财、出人头地”的“大志”，杨铃离家出走。在大竹县城，杨铃遇到了左右手各戴两颗金灿灿的大戒指的刘德荣。刘德荣请杨铃吃了一顿海鲜，还将一叠百元券塞给了她。当晚，又把她带进一家豪华舞厅。在轻曼的歌声和迷离的灯光里，刘德荣拥着杨铃翩翩起舞，一边讲叙自己“恋爱受挫，至今未娶”，一边巧妙地表达他对杨铃的爱慕之情。他说如果有杨小姐这种美人相伴，即使千金散尽也心甘情愿……

杨铃陶醉了。那天晚上，她半推半就地留宿在刘德荣居住的旅馆。向这个交往不到半天的男人献出贞操时，杨铃只觉得一股幸福的暖流在身体中激荡。只可惜，这“幸福”来得快，

去得也快。两星期后，当刘德荣不再到杨铃所住的旅馆留宿时，她才从服务员处得知：刘德荣不仅已有一个 5 岁的儿子，而且还在外边养着 4 个“地下夫人……”

幸福的潮水梦幻般地消退后，杨铃深感失落彷徨。她曾想到过回家，但她怕家乡人耻笑，怕父母从此小看自己。不回家，今后的日子又怎样混呢？旅馆的服务员建议她去饭店端盘子，但她觉得太丢人，再说，端盘子怎么能端出自己当大款的理想呢？苦恼忧伤之余，她常用刘德荣给她的钱把自己灌醉。一天，杨铃醉倒在旅馆外，朦胧中，她知道有人把自己扶回了房间。醒来后，杨铃才知道，扶自己的人叫余刚，在广州开有一家服装公司，这次是回大竹招工的。闲聊一阵后，余刚不经意地问：不知杨小姐有无熟人愿到我们公司，包吃包住，工资每月 2500 元，干得好还可以分成。

杨铃动心了，多日的忧愁一扫而光。她急切地问：余老板，你看我行吗？余刚说，如果是杨小姐，我愿每月给 3000 元。杨铃激动得差点拥抱余刚。想到能到大老远的广州挣大钱，杨铃决定回家把这喜讯告诉给父母。但余刚说，杨小姐既已是本公司的员工了，我怎好意思让你空着肚子回家呢？走，吃完饭再说。当天晚上，余刚和他手下的朱三林频频向杨铃敬酒“祝贺”，很快将其灌得不省人事，等她醒来时，已上了去广州的火车。后来，杨铃才知道，余刚是怕她回家被留住，故意将她灌醉带走。

到广州吉隆镇好几天了，仍住在旅馆里，杨铃着急地问：怎么还不到服装公司上班呢？余刚哈哈笑道：可爱的傻小姐，你看我像开公司的吗？朱三林补充说：我们大哥开的皮肉公司，你就准备接客吧！杨铃知道又上当了，气得哭着大骂骗子。余刚却满脸真诚地说：小铃，在大竹一见面我就爱上了你，目前，我正与老婆闹离婚，等离了就马上与你结婚。我会好好待你，让你过幸福的生活……

经余刚三番五次甜言蜜语的欺骗，杨铃想，在这远离故乡。举目无亲的地方，也只有依靠余刚了，便与其同居起来。不料，她掉进了一个更深的陷阱。一天，杨铃正依偎在余刚怀里看电视，门被余刚的老婆一脚踹开，杨铃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便被打得鼻青脸肿。接着，余刚的老婆用刀逼着杨铃恶狠狠地威胁：你勾引我男人，不赔一万元的精神补偿费老娘就一刀砍死你！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得瑟瑟发抖的杨铃只好按余刚等人的“劝告”给其写了张“借条”，这张“借条”成了杨铃的卖身契。第二天，余刚愁眉苦脸地与杨铃“商议”还债的事，他建议杨铃先去接客，挣钱把账还了，再与他结婚。杨铃这才看清了余刚的险恶用心，坚决拒绝了他的“建议”。余刚恼羞成怒，一改往日的温和文雅，对杨铃劈头盖脸就是一阵乱打。接着，又带来一个嫖客强迫满身是伤的杨铃接客，杨铃刚说了个不，余刚猛地抓住脚将杨铃头朝下悬在窗外威胁道：敢不接客老子把你扔下去摔死！吓得周身乱抖的杨铃终于屈服了。从此，她天天在旅馆里被余刚等人监视着接客。回忆这段经历时，杨铃泣不成声地说：那真是过的地狱般的日子，每天都要接 2 至 5 个客，挣的钱却全被余刚搜走……在“义气”的怂恿下，他将爱情和恋人一齐出卖

杨铃遇到当时正在广州吉隆镇一家鞋厂打工的大竹老乡唐毅时，已是 1997 年 2 月下旬了。当时正值春节，“客人”不多，余刚与朱三林等人押着杨铃去看电影。在电影院门口，朱三林碰到了在大竹时熟识的唐毅，听朱三林介绍几人都是大竹老乡，唐毅忙掏出仅有的几十元钱给大家买烟买水，还给杨铃买来了糖和瓜籽。这件小事，让杨铃看出了这个高瘦文弱的小伙子身上的侠义之气，就在这一瞬间，一个求助唐毅逃离虎口的计划在她脑海里产生了。进场时，杨铃挤到唐毅身边说，过两天，你到我们住处来，我有要紧事对你讲！

从杨铃那哀怨悲苦的目光和神秘急切的语气中，唐毅预感这个沉默寡言的姑娘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或重大不幸。果然，两天后刚一见面，杨铃便一下跪在唐毅面前哭道：唐哥，救救我啊！听完杨铃的哭诉，唐毅怒不可遏地骂道：真是一伙禽兽不如的家伙！他安慰杨铃，这件事我管定了，我一定救你出来，把余刚一伙送进公安局法办！

当天，唐毅到吉隆镇派出所报了案，但当他带着公安人员去营救时，余刚等人已带着杨铃逃得无影无踪。原来，余刚见杨铃被唐毅约出去，怀疑唐会告发他们，故杨铃一回去，便将其挟持逃走。

过了一个多星期，杨铃从黄埔区托人给唐毅带信说：她已逃出来躲在一家旅馆，余刚正带人到处找她，请唐毅前去救助。唐毅闻讯后约上几个工友赶到杨铃藏身的旅馆，将其救回吉隆镇。给杨铃安顿好住处，见她脸色很差，唐毅以为她病了，便建议她去看医生。杨铃哭着告诉唐毅：她曾去过医院，医生说她得的是性病，至少要 1000 元才能治好，但自己吃住无着，哪有钱治病？

对杨铃的处境，唐毅十分同情，马上到厂老板处借来 1000 元钱交给杨铃说，先去治病，等病好了，我再想法送你回大竹。

唐毅救出自己又借钱为自己治病，感动之余，也勾起杨铃对这个义气随和，善解人意的男人的好感。她暗自思忖：若能跟这种人结合，此生就有依靠了。后来发生的事更坚定了她对唐毅的追逐——就在杨铃的性病快治好时，她的身体却发生了异常反应，每天早上，她都呕吐不止。开初，以为是感冒，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她怀孕了。接二连三的打击，使杨铃痛不欲生，她跑到顶楼遥望着家乡的方向默默流泪。当她正准备纵身跳下结束生命时，闻讯赶来的唐毅一把抓住她喝道：杨铃！又不是你的过错，为什么要寻死！杨铃再也忍不住了，她抱住唐毅失声痛哭。那撕心裂肺的哭声和心碎形毁的情态令唐毅潸然泪下，他拍着杨铃的肩头安慰道：放心吧，既然把你救出来了，就是砸锅卖铁我也会把你的事管到底！

听了唐毅的话，杨铃膝盖一软跪下连磕几个响头后才认真地说：唐哥，我这条命是你救下的，如果不嫌我身子脏，我求你救人救到底，让我永远跟着你为你当牛做马吧！唐毅一听慌了，忙扶起杨铃说：小铃，别乱说，快去医院堕胎。杨铃一听又跪下说，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了！唐毅只好告诉她：你跟我是不可能的，我已有女朋友了。杨铃以为唐毅哄她，又伤心地哭着冲向顶楼的栏杆，唐毅手足无措，只好随口答道，好，好，今后，你就……跟着我吧！

唐毅当时的确已有女朋友，名叫龙小瑛，四川邻水人，也在广州一家玩具厂打工，前不久到广西一带推销产品，要两个月后才回广州。唐毅与龙小瑛确定朋友关系以来，关系一直很好。漂亮端庄，心地善良的龙小瑛生活十分节俭，但她常用省下的钱给唐毅买烟买衣物，还经常挤时间到唐毅处帮其洗衣服。唐毅也尽心地呵护着龙小瑛。一次，厂里的工头打了龙小瑛，唐毅知道后心痛不已，马上赶去找厂方评理，硬是让工头赔偿并道了歉才罢休。在珠江边，在羊城的公园里，到处都留下了唐毅、龙小瑛这对恋人的倩影。他们二人商定：再打两年工，等有了一定积蓄，就回四川完婚。

杨铃堕胎后，唐毅把自己与龙小瑛的感情都告诉了她，但杨铃并未放弃自己对唐毅的追

求。她认为：爱是自私的，也是不择手段的，这么好的男人，只有傻瓜才会放弃。她公开对唐毅说：我一定要把你争取过来！

唐毅曾试图拒绝这种不道德的“争取”。半月后，当杨铃的身体康复时，唐毅买票让她回四川，杨铃却边把票撕得粉碎边大哭道：你现在不要我当初为啥救我？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说着，就要往楼顶跑。唐毅拉住她耐心地说：别这样，杨铃，我已有女朋友了，怎能再跟你在一起？我只想帮帮你。杨铃蛮不讲理地说不行，反正我生是你唐毅的人，死是你唐毅的鬼！

唐毅怕出事，只好让杨铃暂时留下。这一来，杨铃有了更多的机会实施她鸠占鹊巢的计划。她抓住唐毅义气豪爽的性格和对自己同情的心理，常在其面前撒娇，问一些“你心痛我吗？”，“我死了你会不会伤心？”之类的问题。在外人面前，她故意与唐毅十分亲密，用唐毅的钱给唐毅买礼品，缠着唐毅挽着她的手散步……

在杨铃精心的磨缠下，唐毅终于坠入情网，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善用稚气掩盖心计且不乏炽热感情的女人。在“义气”的怂恿下，他下定决心：挽救这个多灾多难的姑娘，不让她再受欺凌伤害，让她在我的庇护下挺起胸膛做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但另一个姑娘那纯真的面孔却使唐毅不断在感情深处拷问自己：龙小瑛有什么不好？她哪一点对不起你？你为什么要选择了一个风尘女子而伤害一个心地善良的姑娘？你真的能割舍得下与龙小瑛两年来的真诚情感吗？

在同情与恋情，义气与背叛的选择之间，唐毅的灵魂倍受折磨，日夜不宁。当他最终决定要与如果拒绝就可能导致其走上绝路的杨铃结合时，他又为自己对龙小瑛的背叛深感愧疚难当，一种罪恶感使他老觉得自己再也无法面对这个曾为他和龙小瑛留下了太多美好记忆的城市。于是，他选择了躲避。

1997年5月，在龙小瑛出差返回广州的前一天，唐毅神色暗然地带着杨铃悄悄离开了广州。他在留给龙小瑛的信中说，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回到了老家四川。在那里，我会乞求你忘记我——你生命中应该唾弃的过客和感情的叛徒。如今，放逐在时间里的爱已找不到归路，两年的感情到此已走到了尽头。这对你是一种伤害，更是一种不公，但请相信，这种伤害不是蓄意的，完全是一场说不清楚的意外。但不管怎么说，我负罪的灵魂都只有永远跪倒在你善良的心地里接受鞭挞和审判…… “山穷水尽了，我们的感情还能存在吗？”

回大竹不久，唐毅收到了龙小瑛一封信。令唐毅深感意外的是，在信中，龙小瑛没有被抛弃者那种捶胸顿足的恼怒，也没有被伤害后的伤心和委屈，甚至连一句指责的话也没有。信中只是平静地说：爱与不爱都是一个人的权利，婚姻也完全是一种缘份，这些都是强求不来的，只能随缘而遇。爱一个人，我只会永远都祈祷你能过得比我好！但凭一时义气确定终身大事，我也难免替你担心，担心你们在那种背景下仓促建立起来的感情是否真实，担心你们的缘份是否可靠？你们结合是否能够幸福？好自为之吧，我为你祝福……

龙小瑛的洒脱大度使唐毅如释重负。对龙小瑛的那些担心，他已没有那份理智再去认真权衡审视。他只是想：我在杨铃落难时救了她，她才拼命地追求我，这种感情肯定是真实的，这种缘份也肯定是可靠的。于是，唐毅开始张罗结婚了。当时，因杨铃还不满18岁，所以，

未能领到结婚证。但他们仍“结婚”了，同居在一起像模像样地过起了夫妻生活。

不过，正如龙小瑛担心的那样，唐毅与杨铃的结合并非他们当初想象的那么浪漫和幸福。从广州回川后，那段悲惨的遭遇渐渐在杨铃记忆中模糊并褪成一个幽幽的梦，她真实的面目开始在唐毅面前暴露无遗。唐毅引用一名人的话叹息说：美貌是一层面纱，它常常用来遮掩许多缺点。唐毅领教到了这些“缺点”的可怕：“结婚”的红烛还没有点燃，杨铃一个简单的要求便在唐毅家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为显示自己在家中的地位和尊贵，也为了在邻居们眼里有面子，杨铃要求唐家必须给自己五千元的“迎亲费”。唐毅的父母居住在大竹县某镇，由于子女多，又年老多病，所以，唐毅的父母并无多少积蓄，只给杨铃买了套衣服。杨铃大骂两位老人太抠，提出结婚暂缓，说着就要出走。但亲友们都已前去吃喜酒，百般无奈，唐毅只好给杨铃作揖下跪地求情。唐毅的父母也连连保证，这“迎亲费”今后一定如数补上。杨铃却对唐毅的父母耿耿于怀，婚后从不叫一声爹娘，还老吹枕头风，说父母太脏，生活不能适应年青人，要唐毅提出与其分家。唐毅觉得刚结婚就分家，有点太不近人情。但杨铃威胁，不分家我就另找出路。唐毅只好在结婚半月后便与父母分了家。

分家后，为了维持生活，唐毅到镇上做些小生意，但赚点钱大多让杨铃拿去买了衣服、口红之类。她还常在家里埋怨唐毅没出息，挣不了大钱，穷得让她在人前人后抬不起头。杨铃怀孕后，立即向唐毅“约法三章”：不能再吃得那么简单，要常买些鸡、鱼、蛋、肉重点保证她身体的需要；她不能多干活，家务事唐毅要多担当些；不能惹她生气，不能让她太操心。她还要求唐毅每天挤出一定时间陪她去散散步，聊聊天。杨铃说：“那样，既有利于肚里的孩子，又可以增进夫妻感情，还可以体现一种浪漫的生活情趣。”唐毅当时虽诚惶诚恐地全答应了，但实施起来却令杨铃很不满意。因唐毅四处欠账太多，后来再借钱就很困难了。鸡、鱼、蛋、肉不能经常得到保障，外边的事家务事全落到唐毅一个人身上，使他根本挤不出时间去陪杨铃散步、聊天和体现浪漫生活的情趣。为这些，常惹得杨铃生气哭泣。每当此时，唐毅都只有耐着性子劝杨铃对待生活要实际些，不要追求那些虚荣和所谓的浪漫。杨铃哪里听得进去，常常不等唐毅说完，她便又哭又闹地砸锅摔碗，搞得家里鸡飞狗跳。对这一切，唐毅虽后悔不已，但他都忍了。他想：也许是杨铃年龄太小不懂事或者是因怀孩子才显得如此浮躁吧。以后她会慢慢懂事的，就凭我在她落难时救了她这一点，我们的感情也会好起来的。

但还没等到杨铃懂事，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便彻底摧毁了他们的感情基础。1999年夏天，唐毅到杨铃的母亲家帮忙割谷子，白天太热，只能晚上干活。唐毅从头天傍晚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5点，实在困得不行，唐毅便坐在田边抽烟，不想刚抽了几口便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手中的烟蒂引燃了田边的柴草，烧毁了一大片山林。事后，林业公安对其罚款3500元。小家庭本来就已债台高筑，又被罚款，无异雪上加霜，家中连买油盐 and 给小孩买奶粉的钱都没有了，还要面对登门催账的债主们。更令唐毅难以忍受的是，在家庭经济的极度困难中，杨铃表现出的那种浮躁。她成天哀声叹气说这日子没法过了，哭闹着要与唐毅散伙。唐毅劝杨铃看在广州救援时的感情上要共渡难关。不料，杨铃反唇相讥地问，一个大男人把这个家搞得山穷水尽了，我们的感情还能存在吗？一句话问得唐毅瞠目结舌。他隐隐约约预感到：自己当初以出卖另一个女人的感情为代价选定的这个“妻子”迟早会弃他而去！一个不肯回头的三陪女，一张被毁容的脸

杨铃对唐毅的背叛是有一些先兆的。1999年9月初，杨铃不再在家里摔东西和哭闹了，有时甚至还主动做些家务，并建议唐毅在家里带孩子和操持家务，让她出去打工挣钱改变家

庭经济状况。唐毅未接受“妻子”的建议：自己呆在家里，让一个女人去打工养着，唐毅做不出这种事。更重要的是，他不放心“妻子”一人外出闯荡，怕“妻子”再被坏人所骗。

见唐毅不同意自己的意见，杨铃开始一个人频频回娘家，常常一去就是数日，每次回来，她都会带回些口红、护肤膏和一些时髦的衣服，说是她妈给钱让她买的。有一次，杨铃还从娘家“借”2000元钱让唐毅去还账。杨铃的娘家并不富裕，突然给这么多钱引起了唐毅的怀疑。一天，杨铃又回娘家后，唐毅随后跟了去。结果，杨铃并不在娘家，唐毅这才知道杨铃前段日子回娘家 and 娘家给钱都是子虚乌有之事。几天后，杨铃从“娘家”回来，在唐毅严厉的追问下，杨铃不得不承认她拿回家的钱和她所买衣物的钱都是她在大竹城里的舞厅当三陪小姐挣来的。唐毅气愤地问：你怎能去这种肮脏的地方？难道你忘了在广州受的那些凌辱了吗？不料，杨铃理直气壮地说，在大竹坐台不跟广州一样，这儿的先生不一定都要“做业务”，坐台得的小费也不会被人搜走。条件这么好，我为什么不去挣钱？杨铃的辩解激怒了唐毅，一气之下，将杨铃狠揍了一顿，并威胁，再去那种地方，就打断你的腿！

杨铃并未被吓住。五天后，她又悄悄溜出家门。唐毅不得不把女儿寄养在父母家，借债外出寻“妻”。一个多月里，他忍着一腔怒火和悲愤，从大竹县城寻找到各区乡，全县所有的舞厅。发廊、酒楼几乎都让他找了个遍，好不容易在XX区一家夜总会发现了杨铃，但被人报了信，她又闻风而逃。唐毅估计杨铃还会回去，便在XX区“守株待兔”。第三天，唐毅果然在那家夜总会的包间里把正同“先生”鬼混的杨铃抓住。此时的杨铃已买了手机、传呼，浓妆艳抹，穿得很露，嘴里还叼着香烟。见“妻子”变成这样，唐毅悲愤不已，拉住她大声说：走，跟我回去！不料，还未能出夜总会的门，便被杨铃在该区派出所当联防队员的“朋友”带人堵住，说唐毅绑架妇女，要将他抓去治罪。趁人推读唐毅之机，杨铃再次逃走。那天晚上，唐毅被人打伤，身上的钱也被搜走。没有钱住旅馆，他只好在冰冷的屋檐下蹲了一晚。

过了几天，杨铃终于回家，但她把一张“离婚申请”扔给唐毅便头也不回就走了。1999年12月下旬，某法庭根据杨铃的申请，以其未到法定婚龄为由解除了唐毅与杨铃的婚姻。二人所生女儿归唐毅抚养，杨铃一次性付女儿抚养费3000元。

法院的判决实际上只是解除了唐、杨二人的违法婚姻。当时，杨铃坐台虽挣了不少钱，但她却拒不支付法院判决的抚养费。2000年3月初的一天，唐毅在大竹县城一家舞厅里找到了杨铃，要求她支付法院判令她应给女儿的抚养费。可杨铃打着阿欠说：我的唐哥呀，我现在染上了毒瘾，已朝不保夕了，哪还有钱付抚养费？如果你还可怜我，就让我到你那里去戒毒，等戒了毒我们再复婚重新开始。我以后再也不要到舞厅里去了……

后边发生的事因无他人在场，唐毅、杨铃在向大竹县公安局和检察院的办案人员讲叙时各执一词。据唐毅讲，他虽十分痛恨杨铃的自甘堕落，但见她染上毒瘾，他不由又动了恻隐之心。她毕竟与自己“夫妻”一场，还有一个女儿，自己怎忍心她就这样下去？于是，他答应让杨铃回家去戒毒。到了家里，唐毅又觉得杨铃说以后不再去舞厅和复婚的话有些不可信。杨铃说，如果你不信，可以把我的头发剪了，那样，我就无法去坐台了。唐毅果然剪了杨铃的头发。唐毅说，估计杨铃叫我剪头发只是说说骗我而已，不想我真的动手剪了。于是，杨铃恼羞成怒，用木板猛击我的头部，打得我鲜血直流。杨铃的反复无常和歹毒激怒了我，我用剪刀朝她手上狠狠扎了几下，并大声骂她如此不要脸，还不如把你那张脸划烂！可能是杨铃怕我会用剪刀杀了她，果然发疯似地尖叫着抓起桌上的刀片朝自己的右脸颊连划三下。

而杨铃则对办案人员说，脸对一个女人来说就是生命，就是她生存的本钱，即使让我去死，我也不会用刀片划脸的。这三刀是唐毅划的，他划我的脸时无人在场就想抵赖，我坚决要求严惩他！

杨铃脸上的刀伤是谁所致至今尚无定论。但唐毅、杨铃的邻居们对这场悲剧的是非曲直却看得明明白白。采访时，有人建议把这篇文章的标题定为“农夫和蛇新传”，但有人却纠正说，应叫陈世美误救中山狼。这出悲剧的主人公们似乎也都从那血淋淋的结局中多多少少悟出了一些人生的真谛。唐毅告诉笔者：助人为乐固是一种美德，但江湖义气是绝对不能做婚姻和感情的基础的。谈到虚荣这个话题，杨铃若有所思地说：想来，平平淡淡才是真那句歌词还是很有道理的。

当时，笔者琢磨：杨铃是否听说过“一个对淡泊生活感到痛苦难熬的人，他（她）往往会以更大的痛苦为代价重新认识淡泊”这句格言？
手记之三十九：最后再“捞”一把

在达州人的印象中，四川省华川汽车厂党委书记、厂长（正县级）郝光林最后一次出现在电视中的样子很“酷”：一大群人前呼后拥着他在数十辆崭新的汽车前站定，他左手叉腰，右手手指点点，目光坚定自信，神情踌躇满志……

那之后，常被新闻关注的郝光林从荧屏、报纸上消失了。不过，不为外人所知的是，他仍有过出现在摄影镜头前的经历：2000年7月15日，面对摄影机，他老泪纵横，捶胸顿足地向达州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的侦查员们交待自己为追求一种“幸福而高贵的生活”收受他人9万元及伙同他人侵占46万元的事实。在逮捕证上签完字，他清楚地意识到咱已追求的“幸福生活”彻底结束了。

他想起了福楼拜的一句话：幸福是一个债主，借给你一刻钟的欢悦，叫你付出一生的不幸。
光环层层笼罩时，忘记过去的他渐渐开始背叛

一篇文章里曾这样表述郝光林在农用汽车研制方面的重要作用：早在80年代初期，他就以技术员身份研制农用汽车，没有他也许就没有华川汽车厂，没有他也许川内农用汽车制造的历史就会延后许多年或者就会出现空白……

应该说，这段文字并非虚假之词。相反，文章未能提及的是：1982年，郝光林不仅在被人称为“五十年代骡马店”的筑路机械厂（华川汽车厂前身）里研制了第一台双排座川路牌汽车，而且，就在同一年，还在那个“手工作坊”里研制了获省交通厅优秀产品奖的沥青混合搅拌机。走上领导岗位后，他又带领华川人制造出了“华川牌”农用汽车系列产品，为华川汽车厂写下了辉煌的一笔。

郝光林也因创造了华川的辉煌而被层层光环笼罩。他“出事”后的2000年8月28日，某单位在致达州市人民检察院《关于请求对郝光林同志从轻处理的函》中是这样记载郝光林的辉煌的：郝光林1970年毕业于成都工学院。1983年6月入党，高级工程师，担任四川华川汽车厂厂长兼党委书记18年。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把一个原只有几十人的“手工作坊”式的小厂发展成为现有1600余人的具有现代化生产水平的企业，仅固定资产一项就

由 1983 年的 84.85 万元增长到现在的 16416 万元；资产总额原来不足 200 万元，现在已达 3.2 亿元。企业先后向社会提供各种农用车近 7 万辆，累计实现产值达 20 亿元，实现税、利 2.8 亿元，比建厂初期增长了数百倍，为国家、企业和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此，郝光林多次获得上级部门的表彰：1981 年以来多次获四川省交通系统、地区优秀企业家、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88 年、1989 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分别授予“讲理想、比贡献”竞赛活动先进个人和四川省劳动模范；1992 年被表彰为四川省第五届优秀企业家；1993 年被地委、行署授予“有重大贡献科技工作者”、“地区科技拔尖人才”；1992 年被国务院批准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0 年当选为达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

等等等等。

这段文字除将当时的犯罪嫌疑人后来的罪犯误称“同志”外，其他内容无疑都是准确真实的——郝光林的确创造过辉煌，也的确被辉煌的光环层层笼罩。令人遗憾的是，荣誉和花篮蒙蔽了郝光林的理智，顶顶桂冠成了沉重的包袱压矮了他的身高和人格。那些令他目眩脑晕的光环最终酿成了郝光林人生的悲剧——辉煌既成了他的进身之阶，也成了他滑入无底之渊的根源。早在人们向郝光林献上鲜花、大唱赞歌的时候，就有人议论：老郝这人忘本了。

“忘本”是从一些人们不经意也是人们认为天经地义的“小事”开始的。

成都的一家大报上刊登了郝光林在某高校一掷百万元的长篇报道；华川的工人们发现以前与自己同甘共苦的郝厂长已太迷恋那辆公爵王牌高级轿车；更让工人们叹为观止的是郝光林装璜一套房子就花了七八万元，室内的工艺品、高级电器达数十万元之巨，一套茶具就是 1.7 万元；他还帮女儿支付了十多万元的房款，并在达州市悄悄买了十多万的房子……

本来，企业发展了，资助教育，领导坐坐好车，住住高级房子享受享受是无可非议的，但知情者却透露：给某高校资助是因郝光林的女儿及另一副厂长的孩子到该校去委培，这就有些假公济私之嫌了。他那三套房子及三套房子的装潢，他的那些工艺品、高档电器，他那些极讲究的吃穿用，他那几十万元的投资入股，即使他工作这 30 年的薪水一分不用也没有那么多。有人问，这一切难道都是他卖血换来的？

善良纯朴的工人们则站在另一个角度看待郝光林的问题。有人说，且不说他那些钱的来源，仅是他屁股底下坐栋楼，一顿吃掉几头牛，就足见他忘本了，他是忘记了自己过去吃野菜住山洞的日子……

那段日子对辉煌后的郝光林的确早就遥远陌生了。只是在“出事”后，感怀往事，他才又想起了那伴他长大的野菜、山洞。抚今忆昔，忏悔自己腐败变质。失去了自由，不由悲从中来，他流着泪给指挥侦办自己案件的达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世中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回顾那段曾被自己遗忘了的往事：他父母是 40 年代在逃荒中结合定居宣汉的。因生活所迫，父亲早逝，郝光林与瞎眼母亲及年幼体弱的妹妹常年野菜充饥，旧衣百结。为了求知识，找出路，解放后，郝光林靠妹妹背沙砸石子挣来的钱和政府的甲等助学金勉强读完了高中。1965 年，考上大学后，他的衣食住行则全由政府承担。那时，他很感动，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郝光林，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

也许是基督所说的每个人内心都藏有一个魔鬼的原因，人是极易在这个魔鬼的怂恿下变化的。曾遭苦难折磨，曾只为寻求一个有吃有穿的生活而奋斗，曾发誓要好好回报社会和人民的郝光林，在层层光环笼罩后，他内心深处藏着的那个魔鬼蠢蠢欲动了——那魔鬼使他渐渐忘记了自己苦难的家史，使他忘记了自己是怎样由一个穷孩子成长为企业领导，使他忘记了当初要把一生献给党的誓言……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郝光林正是在“忘记”中背叛了自己的历史，背叛了自己的信仰，背叛了恩重如山的共产党。为党和人民献身的热情冷却后，见有的人一沾官就“发”，有的人一搞企业——哪怕是要倒闭的企业都能富，郝光林那沉寂了几十年的心湖慢慢卷起了飞溅的浪花。一直视钱财如粪土，从不看重功名利禄的郝光林不甘于清贫淡泊了。在讲排场，追求“高质量生活水平”中，他渐渐醉心于车子、房子和票子。为了给 32 岁才得到的宝贝女儿及娇妻“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他把权力、党性连同自己的灵魂分期出售给那些急于承包到工程的包工头们，却换取包工头为他免费装璜房屋，去接受那些冲他职权送来的“馈赠”，去收取维持他的“高质量生活水平”的费用。从 1994 年后的短短几年间，郝光林这颗耀眼的)！陈北企业“名星”也同时成了经济上的暴发户。于是，他一边头顶光环，一边在追求“幸福”中踏进了监狱之门。固守多年的防线里攻入了一伙送郝光林下监狱的“朋友”。

当初，郝光林对金钱物欲的诱惑是清醒的。他说，人的一生不过日食三餐，夜眠八尺，何贵之有，何富之有？流芳于世的惟有事业和理想。对那些腰缠万贯，大把花钱的包工头，郝光林常保持着戒备和警惕，准确地说，他打心里看不起那些除了有钱便一无所有的包工头。他认为，这些人无文化、无内涵、无人格，谈吐举止俗不可耐却附庸风雅、混迹官场，专用金钱去巴结权贵，拉人下水。自己一堂堂厂长根本不屑于与这样的人为伍。知识分子的清高和官场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使他拒包工头们于千里之外，这种无法改变的距离感使那些在华川搞了多年基建的包工头们一直走不进他的感情世界；正因为此，包工头们对郝光林敬畏有加。有个叫华贵的包工头在华川搞了一千多万元的工程，几次想请郝光林吃顿饭，但都被郝光林拒绝了。一年春节前，华贵买了些烟酒悄悄送到郝家，但郝光林不但让其进门，还狠狠教训了他一顿。华贵愈发敬畏和感动了，此后，每年春节时便叫农村的老婆熏些猪肉。趁无人时悄悄提去放在郝的门口后转身便跑。

这种情感还不仅仅存在于华贵。有个叫林波的包工头在华川搞了多年建筑，也想更好地同郝光林搞好关系，便以郝的女儿的名字存 4 万元钱，硬将存折塞给了郝光林。郝光林吓得叫了起来：你龟儿送这么多钱，想把我送进监狱哟！林波说，你知我知，怎么会呢？不想，郝光林把存折“啪”地拍在桌上说，你要送这个就别想在华川电工程了。一句话吓得林波忙揣起存折走了……

如果这样的事情能延续至今，郝光林肯定会以另外一种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的故事也一定是教育激励人们廉洁自律的好素材。

但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但是”却偏偏出现了一——在郝光林固守多年的防线里，攻入了一伙送他下监狱的“朋友”。于是，那个一直对党忠心耿耿，恪守“君子谋道不谋富”的郝光林终归未能逃脱晚节不保、腐败堕落的结局。在耿直正派、清正廉洁的伪装下，他把人性中的高尚与卑鄙、正直与贪婪、纯洁与肮脏向世人展示得淋漓尽致。

在中国，送礼行贿的高手恐怕非包工头莫属了。李洪云、刘华夫妇便是这样一对高手。包工头们给郝光林行贿屡送屡被拒时，李洪云夫妇却坚信：没有不沾腥的猫。于是，他俩迂回进攻，选郝的妻子章勉玲为贿赂对象。那时，章勉玲还并不认识李洪云夫妇。1994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敲开门时，被人称为“见面熟”的刘华自报家门说，郝夫人，我们是郝厂长的朋友，在厂里搞工程，感谢郝厂长的大力支持。刘华边说边把1万元塞过去附耳道：这是点小意思，请郝夫人笑纳！

一个陌生人送那么多钱，章勉玲当时也吓了一跳，她把钱推过去说，这怎么行，老郝是不准收别人的东西的！刘华笑了，我们与郝厂长都是老朋友了，怎么还是别人呢？郝夫人给我们点面子吧！

虽丈夫有不准收礼的规矩咱己也并不认识丈夫的这些“朋友”，但金钱的诱惑力似乎更大于丈夫的“规矩”，金钱的力量似乎也更容易拉近陌生者的距离。章勉玲想，送钱人既是丈夫的朋友，怎好不给面子呢？她边收好钱边说，那就不好意思了。李洪云夫妇忙说，朋友之间有什么不好意思？今后还望郝厂长多关照！

事后，章勉玲把李洪云夫妇送钱的事告诉了郝光林。郝光林并未指责妻子，沉默了一阵后，他才模棱两可地叫妻子今后注意点。章勉玲领会了“注意点”的含意——丈夫那十多年一成不变的“规矩”已开始松动了。那之后，受人钱财心存感激的章勉玲多次吹“枕头风”说：刘华那两口子怪好的，今后还是多关照关照别人。“枕头风”吹昏了郝光林的头脑，吹软了他的耳根，吹掉了他的规矩和原则。不久后，在装璜10号楼时，郝光林暗中帮忙把工程“关照”给了李洪云夫妇。

郝光林的新房子也就在10号楼。装璜时，李洪云夫妇格外精心施工，不惜血本地超标准数万元，还从重庆花1.1万余元给其买回一台热水器和一台影碟机，并做了书桌、书橱等家俱。这期间，刘华也常去陪章勉玲坐坐，打打麻将。一去二来，那关系很快热络得非同一般了。刘华夫妇不再叫章勉玲为郝夫人而改叫章姐，郝光林也成了他们的“郝哥”。1994年夏天，刘华又乘机邀“章姐”及其女游览云贵风光，用金钱和“感情”加重了自己在郝光林心中的砝码。这样一来，李洪云夫妇在清高傲气、过去根本看不起包工头的郝光林那里的印象也渐渐好了起来。不久，郝光林把9号楼的基建工程又承包给了李洪云，刘华不失时机地暗示：今后一定重谢。章勉玲怕“重谢”出事，问郝光林怎么办。这次，郝光林再也不暧昧犹豫了。他躺在沙发上仰头长叹一声说，都快60岁了，收吧！

夕阳近黄昏的悲哀牵动了她内心深处曾不时隐现的危机：再等几年就该退休了，那时，无权无势，想“挣钱”也没有机会了。于是，他决定，趁在位之机最后“捞”一把！

从此之后，郝光林几乎是无所顾忌地收下了他的那些包工头“朋友”们以各种名义送来的钱物，仅在李洪云夫妇处就收取了91万余元。

那个以前屡送屡遭拒绝的华贵也观察出了他以前敬佩畏惧不已的郝厂长“已有些开通了”。在相继承包到3、7、8号楼工程后，1995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华贵把2万元送到了郝光林家里。想想以前曾多次拒绝过华贵，郝光林当时似乎不好一下急转弯，又故作姿态地拒绝了一番。案发后，据郝光林讲：当时，华贵都急得快哭了，我心一软，便把2万元收下了。“后来，林波等人送来的钱，郝光林也都这么”心一软“就收下了。据他自己讲，

他共收了 28 万多元这种钱。因有些包工头难以找到等原因，侦查机关只认定了 9 万元的受贿。
垂帘听政于“福达”，膨胀的贪欲蒙蔽了他的理智

如果说李洪云等包工头以朋友的面目瓦解了郝光林的防线，使其失去了抵御糖弹进攻的警惕和能力，那么，面对“福达”时，膨胀的贪欲则已揭开了他的伪装并撕碎了他的良心，使他毫无理智地大肆攫取侵占股东利益。

“福达”全名“达州市福达塑胶有限责任公司”。它的前身系原达州市蜀东塑胶股份公司，其中集体股占 40%。多年来，“蜀东”就那么要死不活地存在着。1992 年底，华川向外招标采购汽车配件，郝光林和华川厂厂长助理、副总工程师鲜崇政到蜀东厂考察时，郝光林却对这个并不理想的合作伙伴“一见钟情”。他兴致勃勃地对蜀东厂的厂长况庆作讲：合作后，产品华川包销，蜀东厂肯定只赚不赔！但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厂房要搬迁，二是况庆作必须辞去蜀东的厂长。案发后，郝道出了这两个条件的原委，“搬迁主要是考虑安全。要况辞去厂长主要是蜀东有集体的股份，想挣钱与集体搅在一起既不方便，又容易出事。要搞就我们几个私人投股，搞个民营的”。郝光林知道搞集体要犯法，但他却错误地认为：民营的钱再怎么“赚”也不会有什么。所以，达州市人民检察院后来查出他与人合伙侵占股东 46 万元时，他特别注意纠正讯问笔录中的“分了”二字——他只承认他们是“得了”那些钱，而不是“分了”那些钱。他辩解说，“得了”是得私人的，“分了”有私分公款的意思，私分犯法，得私人的钱有什么呢？不合理罢了。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在郝光林的操纵下，况庆作辞去了蜀东的厂长，一个完全民营性质的“福达塑胶有限责任公司”很快另开炉灶，陆续为华川生产起了汽车塑料泡沫、汽车仪表台等配件。郝光林、鲜崇政等八名华川厂领导及骨干入股 18.8 万元成了“福达”的股东，郝光林还动员包工头李洪云入股 15 万元。其时，正值达州市（原达川人民检察院侦查原达县副县长王泽珠受贿案期间，从其家中抄出了 100 多万元。郝光林不由闻风丧胆，惶惶不可终日，觉得家中的钱应转移一下，便叫李洪云借去了 15 万元。但李洪云拿钱后未写借条，久了，章勉玲不免担心：今后，他不认账怎么办？情急之下，郝光林干脆通知李洪云：借那 15 万元不用还了，干脆用你在福达入股的 15 万元抵。这样，郝光林不仅巧妙地收回了款，还成了福达最大（20 万元）的股东。最大的股东本应当董事长，但害怕暴露自己入股数十万的郝光林不敢去任那个职，入股仅几万元的况庆作渔人得利，捡了个总经理兼董事长当。

郝光林不任福达的董事长，并不意味他放弃对福达的控制。一方面，坐在董事长宝座上的况庆作自知自己这个“老板”恰似清末的儿皇帝光绪一样，仅是一个傀儡和摆设，他背后有一个“垂帘听政”的郝光林。在看似局外人的郝光林面前，他永远只有低三下四，矮人三分。案发后，郝光林也交待说，新产品开发。上项目、扩股、分红、经理、副经理的工资确定等重大问题，况庆作都要给我和鲜崇政请示。我实际上是“福达”的头儿。另一方面，郝光林虽口口声声鼓励况庆作放心大胆地干，但实际上他并不信任况庆作，他动员他的好朋友李中文（鲜崇政的姐夫）去福达当副经理掌管账务，监视况庆作的经营和经济收支。这样一来，福达的实权仍牢牢地操纵在郝光林手中。

在郝光林的苦心运作下，加上华川包销产品这一重要因素，福达的产品开发及销售利润飞快发展，除股东们年年获得可观的红利外，况庆作、李中文还将卖出的边角废料，销售中别人不要发票的钱及销售中的营销费提出来建起了“小金库”。1997 年春节前，况庆作用他当人大代表时给他发的那个“红本子”记好当年小金库的 10 万元账去请示郝光林怎么处理。

郝光林晃着二郎腿拖腔拉调地指示：考虑的范围不要太大了。老鲜（崇政）在福达做的事多，股金不多，分红也少，应给他多分一些，你和中文具体运作很辛苦，也应多分一些。我嘛，我这个人贪，只要 2 万就行了。那口气好像是用自己的钱奖赏别人一样。郝光林知道：小金库的钱毕竟不是自己的，而属于 30 多个股东。所以，当得知况庆作和李中文都记了账时，他马上肃然道：记啥账！那账不能留！谨防出毛病，毁了！以后把钱处理了都要把账毁了！根据郝光林的指示，况庆作烧掉了记在“红本子”上的黑账。1997 年至 1998 年两年间，他们共毁掉了侵占 27 万元的罪证。

1997 年，况庆作、李中文从小金库中尝到甜头后，更加卖力地去“丰富”小金库，使小金库的钱日日见涨。郝光林当机立断：不要等年底再处理。干脆一年搞两次。所以，从 1998 年开始，年初和 7 月都是郝光林、鲜崇政等四人“丰收的季节”。每到这个“季节”，只要郝光林手一挥，说个“照旧”，况庆作就会屁颠屁颠地把各装有 2 万元的“红包”分发给郝、鲜、李和自己。几年间，属于“福达”股东们的 56 万元人民币流入了郝光林一伙的小金库。郝光林、鲜崇政、况庆作、李中文各侵占 12 万元。

随着郝光林案侦破，鲜崇政、况庆作、李中文及在工程承包中曾受贿 2 万元的华川副厂长周荣鹏（副县级）的名字也都与郝光林的名字一起列入了检察机关的起诉书中。“油干灯尽”岂是腐败的“资格”

设想一下，如果一个普通平常的贪官受贿 9 万元，与人合伙侵占 46 万元被查出，他会怎样？可以肯定，他不吓个半死，也会规矩老实一阵子——他至少不敢“理直气壮”地跟“政府”摆“资格”和讨价还价。

郝光林则不然。被检察机关查办，他觉得十分委屈。他在给达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世中的信里及另三份材料中写道：“在华川任厂长这 18 年，是我人生旅途最辉煌的 18 年，无疑也是充满酸甜苦辣的 18 年。我为华川的生存和发展呕心竭虑，几乎是付出了全部时间和精力。”“18 年，有成绩，更有辛劳，现在熬到了油干灯尽，周身是病，如果不能从轻处理，退休费、医疗费没有了，我的后半生怎么过？我辛辛苦苦奋斗了一生，后半生连基本生存条件都没有，我无论如何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郝光林的意思十分明白：自己有功于华川，就有“资格”在包工头处在“福达”弄几十万元钱用用。你司法机关大惊小怪地追究，我不能接受。

什么样的“事实”郝光林才能接受呢？他要求：司法机关在追究刑事责任需监押时，千万不要把他送到看守所，而采取特殊的方式。他的“特殊方式”概定为“取保候审”。他还羞羞答答地提出：“一种对政治生命（包括党员、干部、各种荣誉、工龄、事业）的珍惜之情，对将来的企盼，都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原来，犯了事，他不但觉得自己有“资格”不接受处罚，还想凭“资格”保住党票、官票及他头上的那一道道光环。他知道：只有在党票、官票、光环的罩护下，他才能“大有作为”，才能有“资格”干他想干的事。离开了党票、官票和那一道道光环，离开了“资格”，他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不是了，就一文不值，就无法生存……

认为“有贡献就有资格腐败”的还不止郝光林。采写本文时，有人问笔者：郝光林在华川修了那么多房子，造了那么多车，把企业搞得红红火火的，弄点钱算什么，何必穷追猛打？

有人还说：郝光林当 18 年厂长贪占几十万元已算廉洁的了，比他大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贪官多的是，你们检察院何必跟他过不去？

某单位也致函检察机关说：郝光林政治立场坚定，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能够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为人正直，作风正派……是企业和社会各界倍受尊敬和爱戴的优秀企业领导者……鉴于郝光林曾为企业、地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并且企业目前处于十分困难中，迫切需要郝光林同志的威望以及与现有配套厂家、经销商的关系做一些积极性的工作，为此，特呈请市检察院对郝光林同志尽量从轻处理，以利于企业当前生产经营正常进行！促使企业早日走出困境，再创辉煌！维护企业及社会的稳定！

已三五普法了，竟有人说出这样的话，真不知是普法者的尴尬还是这些学法者的悲哀。对受贿 9 万与人合伙侵占 46 万的腐败分子，该怎样“尽量从轻”？还能“轻”到判他个无罪，来继续发挥他的“威望”？如果不能，难道就会不利于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企业就会走不出困境？企业和社会就会不稳定？当前，我国正在依法治国，法治的观念首先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法治是不允许有凌驾于法律之上或置身于法律之外的特殊公民的。不管你的地位多重要显赫不管你的贡献多大，在法律面前你只是一个普通公民，触犯了法律就必须依法制裁。如果因为你官位显赫，贡献大就“网开一面”，那么，任何人触犯了法律也都可以找特殊的理由来法外开恩，这样一来，法律岂不成了一纸空文？

其实，有功之人是否有“资格”腐败，触犯了法律是否可以“网开一面”的问题，早在解放初期惩办刘青山、张子善和前不久处决成克杰、胡长清的枪声中就已有明确的答案。讲地位、讲贡献、讲作用、讲社会影响力，他们会比郝光林差吗？但法律仍坚决地对他们说了“不”。这是因为法不阿贵，法律无情，这是因为“法律是用鞭子做成的”！
手记之四十：贼道上那对大学法律系情侣 第二次遁出牢狱
她与男友又回到了久违的大学校园

跨进川东某市看守所那道乌黑森严的铁门时，四川某大学法律系二年级学生薛花并不害怕也不沮丧，她满不在乎地对狱友说，等着瞧！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出去——这绝不是薛花吹牛，也不是她能神机妙算，而是她有这种经验和把握——两年前，刚读高一的薛花因盗窃近 5 千元的钱物被关进看守所不到两个月便被取保候审了。可能是谁开了法律一个玩笑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取保候审半月不到，薛花就成了川内某大学法律系学生。

薛花上大学，人们很纳闷：一个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不在家里好好呆着“候审”，怎么摇身一变就成了“天之骄子”？还去攻读曾给她找过麻烦的法律？是想学法懂法，重新做人？还是想藐视嘲弄一下法律抑或是如薛花所说准备毕业后通过关系到政法部门找点事儿混混？因为一切都还未能实现，在大学里“候审”了近两年而无人过问的薛花伙同男友齐军盗窃他人 11 万多元现金又被当场擒获，她当初攻读法律的目的也就不得而知了。

有一点却是明白无误的——薛花真的又出去了。2000 年初夏，川东某执法部门以涉嫌盗窃罪将其逮捕，夏天还未过完，该部门又说：实施盗窃的从犯齐军撬开钱柜盗出 11 万元现金刚要逃离，楼下有人来了，于是，齐军把钱放在大门边，然后藏到厕所里被人抓住。故认定：齐军的盗窃属犯罪中止。

从犯“犯罪中止”，该案主犯薛花也就顺理成章地“免除处罚”了。于是，薛花、齐军

这对情侣在 2000 年那个闷热得令人焦躁不安的盛夏里又双双走出看守所回到了他们久违的大学校园……

2001 年 8 月初，当川东某上级检察机关干预此案时，薛花。齐军的犯罪事实才大白于天下。父母离异，薛花得到了她渴求的“自由”空间

薛花的父母都是认不了几个字的农民。没有文化的父母对儿女的希望值偏偏极高。薛花讥讽说：因自己无文化成了农民，他们就把一腔希望全赌到了女儿身上，那架势，简直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成为居里夫人。正是在这种望女成凤的心理支配下，薛花的父母关心女儿的学业胜过了关心女儿。但无文化的父母对儿女学习的关心却只能局限在看考试分数上，每次分数考得高，他们就高兴，就给薛花煮个鸡蛋或弄点好的吃；分数考少了，鸡蛋没有了，好吃的没有了，有的只会是棍棒伺候。薛花回忆说，这种境遇，是我童年的一种残缺，也是一种局限人性自由的牢笼。

但她的父母却坚信：棍棒之下出好人。他们说：小学时，严加管束，薛花便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人”；后来，薛花倒是“自由”了，但成绩一落千丈还屡屡行窃犯事。

薛花却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父母的离异。她断定：他们不离婚，我肯定不会搞成这样。她的讲述甚至使人相信：父母离异的家庭不可避免地会造就出盗窃、抢劫等种种犯罪。由此，薛花更加怀念小时候的时光。那时家里更穷点，却充满温馨和快乐，父母舐犊情深，他们为自己支撑起了一片晴朗的天空，天空里阳光灿烂。大概是 11 岁左右，薛花那美好的记忆渐渐开始褪色了。穷则思变的父亲办了一个煤厂，随着生意日渐火爆，薛花的“天空”出现了乌云，先是父亲“忙”得不再过问她考试的分数了，甚至“忙”得很久难得见上一面。后来，父母间的“内战”开始由闭门吵闹升级为打得鸡飞狗跳，日渐频繁、激烈的“内战”将家中昔日的温馨一扫而光。薛花读初一那年，父母抓扯推揉着走进了法庭，随后，那个护佑薛花 11 年的家解体。

很快，父亲被另一个年轻的女人“收容”。而母亲却守身如玉，10 年未嫁，她怕有了继父会委屈自己的女儿。母亲的良苦用心并未能减轻这次婚变对女儿的伤害，面对破碎的家，薛花心灰意冷，伤感不已：父母恩爱十余载尚反目成仇，人世间还有什么真情实意？一个好端端的家说散就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可言？一种希望破灭后的悲哀像一团浓重的阴影笼罩着她稚嫩的心灵。她开始狐疑地窥视着眼前的一切，过敏地揣摸着社会、人生和生活。她总觉得理想和现实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追求和奋斗都是毫无意义的，不如自由自在地及时行乐，纵情享受。

另一方面，父母的离异，给薛花造成了她所渴求的“自由”空间。1995 年读初二时，薛花从乡下转学到了城里。她住在学校，除了去领取每月的生活费，她极少到父亲的那个新家，也很少回母亲那儿。这期间，如果有谁再唠叨要她“好好读书”之类的“废话”，她就干脆一连数月避而不见。她说，她要摆脱那扼杀自由的枷锁，无拘无束，开开心心地生活。

初中的后两年薛花的确过得很自由也很开心。班主任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同学们都管他叫“贤惠外婆”。“外婆”只管“授业解惑”，至于弟子中有谁旷课，谁的表现怎样，他很少去管，即使偶尔说说，也是和风细雨，不痒不痛。薛花说，鬼大爷才怕“外婆”。“不怕”外婆“的薛花更自由自在了。起初，虽常常不作业，但她还能人在曹营心在汉地听听

课。后来，薛花觉得这样貌合神离地坐在教室里无异于坐牢。于是，她开始逃学了。常旷课到街上瞎逛，到旱冰场溜冰，到娱乐城蹦蹦床。在那些地方，她认识了本校和外校的一伙玩友，他们便搅在一起或打麻将搞“小刺激”，或进舞厅载歌载舞，或到茶馆闭吹胡侃……

薛花在舞厅、溜冰场、娱乐城、麻将桌上度过了宝贵的初中时代，她的成绩也可想而知地糟糕透顶。薛花的同学回忆说，自初二起，她的功课好像从来没及格过。对此，薛花却毫无悔意，她甚至还有几分庆幸得意：没有母亲“要好好读书”的唠叨，没有父亲“考不及格老子棍棒伺候”的威胁，更无做作业时搔耳抓腮的苦恼，日子过得舒舒服服，无忧无虑。如果不出后来那件事，薛花本来还可以这样自由而潇洒地读完高中甚至大学，但贼道上的一次失手使她险些长久地失去了这份自由和潇洒。“取保候审了，当大学生去”

1995 年从乡下初中转学到城里的中学，薛花的视野豁然开阔，现代化城市的繁荣华丽，城里人的富有潇洒，特别是班里那些少男少女的靓丽帅气，都令她眼花缭乱，望尘莫及，老觉得自己完全是一个刘姥姥进大观园，土气、寒酸得让人自惭形秽，无地自容。

女性的最大弱点就是容易为优裕的生活所诱惑。像刘姥姥的薛花并不甘于当刘姥姥。她给自己鼓气：我爸爸好歹也是个老板哩，老板的女儿岂能就这样土气穷酸？从进城那天起，她就暗下决心：我也要洋气，我也要像城里人一样潇洒，我也要受人崇拜。

薛花选择了几个最洋气的女同学和最潇洒的男同学作为自己效仿的对象。刻意地学着洋气的女同学走路、说话，学着她们的发型、服饰精心打扮自己，学着潇洒的男同学的举动表现自己。洋气的女同学穿了件时装，第二天，这新潮的时装也一定会穿在薛花的身上；洋气的女同学吃了什么时尚的零食，她马上就会溜到街上买回这种零食。见那些男男女女三五成群地去溜冰、去舞厅、去茶楼，她也学着大姐大的样儿吆三喝四地叫上一帮人到那些地方去尽情放纵。每次结账时，她都会学着帅哥们的样儿，朝老板打一个响指，然后眼也不眨一下地甩出一叠钱说，买单！偶尔有人争着付钱，她会把脸一沉：看不起人怎么的，我爸爸好歹也是个大款哩！喜得那帮玩友赞不绝口地说，薛花的适应能力真强，才从乡下来几个月就已完全脱俗，变得洋气潇洒，一点乡下人的影子也没有了。

“洋气”和“潇洒”是要靠金钱供养的。但薛花的父亲每月给她的生活费用也就只有那么三四百元，用这点钱去支撑她的洋气和潇洒无异于杯水车薪。于是，她避开继母暗中要求父亲追加拨款，其父不大主张女儿打扮得花枝招展，担心给小孩子家的钱太多会出事，更害怕后妻盘查他的“金库”，故薛花在父亲那里总难如愿以偿。她又到母亲那里去撒谎说，学校里要交什么费什么费，历来疼爱女儿的母亲信以为真，赶紧一一照付。后来，薛花的“把戏”被母亲识破，她唯一可以捞“外水”的路也被堵死了。薛花并未因此而放弃她对“洋气”、“潇洒”的追求。她壮起胆子把手悄悄伸进了父亲的钱包，头几次她只拿了几十元，父亲未发现。后来，她索性把父亲的钱包洗劫一空，当父亲气急败坏地追问她时，薛花还若无其事地诱导父亲是不是在外边把钱弄丢了。父亲还是从她新买的高档皮鞋和口袋里的零食上发现了蛛丝马迹。但钱已被薛花“潇洒”光了，父亲只好狠狠揍她一顿出气了。

那之后，父母们都开始戒备薛花了，薛花再想在家里弄到钱似乎已不大可能。但这也并未使她不继续“潇洒”——她“傍”上了一个叫刘婷的同学。刘婷的父亲是一个很有钱的包工头，刘婷身上常有几百上千的零用钱，而这刘婷不仅大方义气，而且对钱的管理也是马

马虎虎。利用刘婷的这些特点，薛花不仅常以她的甜言蜜语和殷勤哄得刘婷慷慨解囊，还常常趁刘婷“马虎”时自己动手去掏这位朋友的钱包。2000年4月那次案发后，刘婷才说：“薛花偷我不下于50次约一万元钱。她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是看在朋友的份上才没有跟她翻脸，再者，我也不在乎她每次偷那点钱。不想她越偷越胆子大，后来，竟与人合伙份我家11万多元。如此看来，我当初对她的一再迁就原谅其实是害了她。”

就在偷刘婷家11万多元那次，薛花曾在刘婷家住了近一个月。一次，她说漏了嘴，告诉刘婷：初二时，她还在一个叫王莺的同学家偷过1万元。那次，王莺的家长不忍心让薛花小小年龄就去坐牢，所以也未报案。这些善良的“东郭先生”们的姑息养奸使薛花在那条罪恶的贼道上越走越远。1997年6月的一天，已读高一的薛花与吴娅等人到一个同学家去做客，趁机顺手“捎”走了同学家的1000元钱和金项链、手表、皮衣等物。这次，薛花似乎有些不走运，公安局把她和吴娅请了“进去”。但一个多月后，不知怎么又放了出来——据说她在哪个要害部门里“有人”——尽管有人，薛花也没能走得很利索。从“仓”里放她出去时，有人告诉她，这是取保候审，并拿出刚修改不久的刑法给她念道：第56条规定：被取保候审人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在传讯时及时到案……

给薛花宣布这些规定的人显然是说了些废话。那之后，再也没有谁传讯薛花到案。薛花取保候审半月不到，她便给高一的同学打电话说，取保候审了，当大学生去。

同学以为自己听错了，惊诧地问：什么！到哪里当大学生？

我们的学校在成都，我读的是这所大学的法律系，欢迎来做客！听着薛花那洋洋得意的口气，同学仍不相信：你高中才读半年，怎么能读大学？再说，你这次的事儿，大学里的政审过得了关吗？

薛花用嘴角那儿笑一下说：你真是榆木脑袋！当今的事，只要有钱，什么过不了关？她告诉同学：学校每学期收5000元，另加800元一年的住宿费，其他一概不管。“信仰、理想、道德统统是金钱的孙子”

薛花十分喜欢她的新学校，校园周围全是电子游戏厅、录像厅、舞厅、茶馆。大一时，薛花是这些地方的常客。她告诉仍在川东某市读高中的同学：这儿娱乐休闲比你们那方便多了。但她“有些不习惯学校的住宿和生活”，于是便搬出去与人合租了间房子。她听不懂那些深奥的法学理论，也不愿去记那些枯燥的法律条文，所以很少去听课，常在租来的房子里与人打麻将度日。不久，租房的对面又搬来了几个法律系的男生，男生们常到薛花等人的麻将场上参赌，一来二去，几对男女便吃住不分家了。

有个叫齐军的成都小伙子，当时刚好与前女友分手，苦闷中，薛花主动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于是二人一拍即合，开始同居。他俩把家里寄来的钱合二为一，像模像样地过起了小日子。高中的同学知道薛花与齐军同居的事很吃惊，“你才19岁，还在读书哩，怎么能那样？”薛花不屑一顾地说，真是一群上老冒，少见多怪，大学生同居太正常了，这叫时髦！

上大学快两年薛花才考试及格3门功课。有较好的朋友曾问：薛花，光讲时髦，光打麻将，今后拿不到毕业证怎么办？薛花很有把握地告诉朋友：只要有钱，没有拿不到的毕业证。朋友仍担心：没有真本领，今后哪个单位要你？薛花反问：现在那些端铁饭碗的公务员

和坐铁交椅的官员，有几个是凭本领？于是，对未来，她很乐观也很自信：进党政部门当领导可能暂时有困难点，但进政法部门找点事混混是绝对没问题的。

闲得无聊时，薛花、齐军与他们那伙麻友也常要高谈阔论一番，理想、信仰、道德等话题丰富了这伙无聊男女苦闷的日子，同时，无聊的争论也使他们对理想、信仰、道德蒙上了层层阴影——他们觉得这都只是一些美好的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他们举例：官场上那些最爱勾心斗角包养情妇最多最爱捞钱的人最爱用理想、信仰、道德去教导别人，其实，他们的信仰、理想、道德都是用贪婪、虚伪和不择手段捞取的金钱铸造的，他们是最不道德最无信仰、理想的人。由此，齐军和他的玩友们得出结论：理想源于金钱，道德依赖于地位，信仰只有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相当的时候才可能产生。薛花说得更绝：金钱是爷爷，信仰、理想、道德全是金钱的孙子！

也许是认定了这个“爷爷”的重要性，薛花、齐军一直在一个唯利是图的轨道上行驶。他们放弃学业，到商场打过工，自己鼓捣过服装生意。1999年6月，薛花、齐军还筹借一笔钱煞有其事地回到川东某市开了一家冷饮店并兼卖时尚饮食螺丝。但川东人似乎不太新潮，让本想以螺丝来大赚一笔的薛花、齐军亏得一塌糊涂，元气大伤。于是，二人只好打道回府，在成都干些倒卖袜子内裤之类的小生意。齐军、薛花并未从中吸取教训。1999年10月的一天，二人在打的回学校的“小窝”时，心血来潮，突发异想：“何不买辆出租车来拉客！”当晚，经过一番令其心跳加速的论证，第二天，薛花、齐军便四处筹款。结果，薛花在父母处“借钱”碰壁，齐军也只在父亲那里弄来了1万元，但这点钱只够买一只出租车的轮胎。于是，二人苦心策划的出租车生意还未开始便流产。不能买车了，薛花也不主张齐军去还钱，她说，难得弄到这么多钱，先用用吧。此后的日子里，他们又有了一段“高质量的生活”：二人每天出必打的，吃必名饮食，进舞厅必豪华处。城里玩腻了，又到成都附近的风景区名胜去逛了一趟。这样一下来，齐军在父亲处“借”的一万元已所剩无几了。儿子、“儿媳”如此奢侈，齐父大怒。2000年春节前，老人开始向儿子逼债。其实，齐父本只想通过逼债来教训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儿媳”，不想，“儿媳”却为他策划了一场更大的灾难。“为了还债，为了我们的幸福，让朋友再做一次牺牲”

2000年3月上旬，薛花从成都四川东某市找款还债时，她的朋友刘婷说，我的父母到外地治病去了，家里就我一个人，怪孤独的，薛花，你反正没上课，来陪我一段时间吧。

正愁无处躲债的薛花欣然应允。此后至4月7日案发，薛花一直吃住在刘婷家。3月28日，一个偶然的时机，薛花发现了刘婷父母的卧室里放有很多钱。她心中怦然一动：何不弄来还债！她本想自己动手，但凭着到法律系后零星地听到的那些法律常识，她知道应让其他人动手，自己要做出不在现场的假相。于是，趁刘婷上班后，薛花在电话里向齐军透露了自己的计划。齐军吓了一跳，“那怎么行！刘婷不是你的朋友吗？”薛花咬咬牙说，为了还债，为了我们的幸福，亲爱的，让朋友做一次牺牲吧！想到自己欠父母的1万元债，齐军答应了。但他仍不放心，询问怎么干才能万元一失。薛花告诉他，一切都不用你操心，到时你过来就行了，我自会有办法。

4月2日，薛花偷配了刘婷家防盗门、木门和其父母卧室的钥匙，然后三次催齐军带上榔头、凿子、手套等工具前去作案。4月5日，齐军如约到了川东某市，住进了薛花以王良之名在某宾馆已开好的房间。当晚，薛花向刘婷谎称去父亲家而到了齐军的住地，将已配好的三把钥匙交给齐军，并画了一张刘婷家房间布局的草图，教作案方法。齐军担心用钥匙

开门进去作案，别人会怀疑薛花，因只有她能接触钥匙。薛花便决定：那就在得手后把门都弄烂，造成一个破门而入的假相！临离开时，薛花告诉齐军，进刘婷家还有一道铁门的钥匙没有弄到手，到时，我想法把铁门虚掩上就行了。

4月7日，薛花又觉得还是把铁门的钥匙搞到手稳妥点。于是，当晚在舞厅里趁刘婷不注意时，她偷走了铁门钥匙。23时，薛花兴奋地给宾馆里的齐军打电话说，机会来了，今晚24时刘婷要去上海，我把铁门的钥匙放在刘婷家外的花盆里，你用后放在原处，我再找机会在刘婷去上海前把钥匙放回她的包里。快去，干完后必须在23时30分离开现场，我和刘婷在23时40分左右回去……

在宾馆潜伏了3天的齐军接电话后，带上作案工具马上乘出租车赶到了刘婷家。在花盆里找到钥匙打开铁门后再上楼依次打开刘家的防盗门、木门，最后进入刘婷父母的卧室，用凿子三下两下便把放钱的三个抽屉撬开，然后把11万元现金装入一纸袋。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齐军干得很从容，他以为薛花已把一切都策划得天衣无缝，不会有什么麻烦。但他做梦也未料到的是，从他打开进刘家的第一道铁门时，“麻烦”就已找上了他——刘婷的舅舅王强从外边回家，发现有人在开他姐姐家的铁门，他知道姐姐姐夫不在家，也知道外侄女刘婷等会儿要到火车站赶车去上海。当时，他本想过去盘问开铁门的年轻人，但又怕是刘婷的同学帮忙拿东西。他想离开，又觉得不放心。于是，便躲在楼下张望。王强发现那年轻人上楼进屋后，未开灯，过了一会室内还传出撬坏东西的响声。他知道有问题，便把齐军忘了从铁门上拿走的钥匙取掉并将门锁上，然后叫来大楼的门卫。二人正准备上楼，齐军提着一袋钱出来了，见到紧锁的铁门和铁门外的王强二人，又惶恐万状地逃回室内……

23时40分，刘婷同薛花准时回家，准备拿上东西马上去火车站。进屋后，见到被反绑的齐军，薛花的脸一下变得鲜红。少顷，她跪下抱住刘婷的腿声泪俱下地哀求看在多年朋友的份上不要报案。朋友的行径使刘婷愤怒了，她甩开薛花冲进卧室拨通了公安局刑警大队的电话。

手记之四十一：检察长在组织保护下撤离

这是一个已被岁月尘封了10年的故事。

旧事重提，不是为了回忆，而是想告诉人们反腐斗争的艰难和险恶。
横刀立马

位于川东边沿的巫溪县城极小。有人试过，一支烟未抽完便逛遍了全城。

巫溪虽小，却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清澈见底的大宁河从嶙峋苍莽的崇山峻岭中呼啸而来，穿过巫溪县城奔长江匆匆而去。它身后那无数的奇峰怪石像一个个冷峻的历史巨人，目睹和见证着小城的盛衰成败。汉末刘秀与王莽在秀登城鏖战时的呐喊，春秋时的宁厂盐泉运盐的骡马的嘶鸣，蜿蜒于大宁河边的十里古镇和那绝壁峭崖上残存的古栈道，把这座小城曾经有过的许多喧嚣和繁华变成一个个苍凉的记忆留在了这片土地。只是后来，历史在那深山的紧闭和沉寂中迟滞了，变得贫穷和落后。到80年代末期，全县40多万人口，住房靠岩洞，照明用松油。红土豆填不饱肚子，全家人合穿一条裤子的情形还随处可见。

穷则思变。80年代末，当巫溪县委县府决定在全县兴修水利发电时，温饱尚无保障的村民们仍勒紧裤带积极响应，靠借贷和卖粮卖蛋积攒29万余元去修建高楼电站。为用好这

笔钱，县里成立了有计委、水电局、科协、农委、畜牧局、开发区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工程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工程承包、手续审批等。没料到，这个小组的人从中贪污受贿 5 万余元。5 万元钱在经济发达地区也许并算不了什么，但在 80 年代，尤其在巫溪这种贫穷山区，农民要卖多少粮多少蛋，要少穿多少衣裤才能凑起这么多钱呀！自己忍饥挨冻积累的钱被贪了，村民们愤怒不已，纷纷把惩处这伙贪官的希望寄托在巫溪县人民检察院。

巫溪县人民检察院位于城东的半山腰，因其位置在全城最高而被人们戏称为“巫溪县最高人民检察院”。当时，该院虽装备简陋，条件艰苦，但却是一个被高检院记功的先进单位，在群众中威信极高。巫溪人一遇不平之事便说：走，到检察院去找检察长陈世中！

陈世中，巫溪县文锋镇宝塔村人。小时候，因家中太穷，他总是夏天一双赤脚，冬天一双棕袜套草鞋。上午到 5 里外的镇上读书，下午还要到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后来到塘坊中学读高中时，每个星期也只能从家中背些红土豆到学校充饥。亲身经历的穷苦和耳闻目睹广大农民的贫困与艰辛，陈世中对人民群众的同情怜悯从小就深深融入了巫溪这方朴实厚重的泥土之中，生长出了一种他年要为民办事的抱负。陈世中高中时的老师傅觉高赞赏自己的这位学生“处穷迫之境而无厌世之想，以饥寒之身而怀济世之心。将来若步人仕途，定是清正为民的好官”。

正如师言。1990 年 3 月，刚过而立之年的陈世中走上检察长岗位后，便在养育他的这方净土里耕耘播种自己的灵魂，将生命用来实现伟大的目的。他 * 年前掀起的那场反腐风暴的震撼力至今还强烈地存在于巫溪民众之中，由此而对其产生的惦念经过时间的沉淀和堆积，更像岩石般坚硬。2001 年 9 月，去巫溪采访时，人们纷纷告诉笔者：在巫溪，有两个人的形象永远都不会从老百姓心目中消逝。一个是修路架桥，大兴水电改变巫溪落后面貌的县委书记兼武装部政委董家琦，一个是在巫溪掀起反贪风暴的陈世中。当年被陈世中查过并曾扬言非斗垮陈世中不可的某局长也说：回想起来，反腐败还是要陈世中这种人才行……

据 1990 年 7 月 11 日的《万县日报》记载：3 月 21 日，接到高楼电站受贿案的举报后，陈世中当天就带领干警四处暗访知情人，寻找侦查线索。到相邻的陕西省镇平县、湖北竹溪县取证时，公路被洪水冲断，无法通车。他便带 3 名干警骑着两部摩托车在两个县奔走了七、八天。到海拔 2000 多米的红池坝开发区调查那天，摩托车坏在了荒无人烟的大山里。当晚，寒风呼啸，野狼嚎叫，陈世中与干警们在饥寒交迫中打着手电边修摩托边驱赶狼群……

苦战一个月，案情基本查清后，陈世中没有也无法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相反，他震惊不已——12 名副局级以上的干部陷入了高楼电站受贿案！陈世中既痛心又迷惑不解：这些曾经战天斗地，挑战穷山恶水的官员怎么一下都卷入了受贿的浊流？是市场经济把人与人的关系简化成经济关系的结果？还是权力使人渐渐失去温厚纯朴的美德，使这些官员丧失良知而贪婪地去吞噬农民卖粮卖蛋攒下的血汗钱？

有人警告陈世中：查这种案子，也许将成为你反贪生涯中的“滑铁卢”——弄不好会落得个丢官甚至丢命的结局。对功名利禄，陈世中历来就无所求。与那些争名于朝，夺利于市的人比，他有一种无欲的超脱和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潇洒。所以，他也就不在乎查处此案后可能产生的政治风险。他说，如果因查这伙人丢了官，我父母还有三亩多包产田，我可以回去种地。丢了命，只要为老百姓挖出了蛀虫，即使是死我也心甘情愿……黑云压城

从表面看，对红池坝开发区主任林兵、电力公司经理姜尚财（注：文中所有被查者皆用化名）等 12 名官员立案侦查后的情形并不像陈世中当初想像的那么严峻，而是“形势大好”。姜尚财等人“进去”后，全城上下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到检察院表示祝贺支持的人更是络绎不绝。6 月 5 日，巫溪县委还专门召开了案情通报会。那次会议，本来只通告了县级机关和各区、乡科级以上的干部，但城里的工人去了，居民去了，乡下的农民也去了。只能坐几百人的大礼堂挤得满满当当，大礼堂外的窗户上爬满了人，礼堂外的三边坝子里也挤得水泄不通。会议主持者只好临时把高音喇叭牵到大礼堂外。当年在礼堂外“旁听”会议的一位居民至今还记得“那次会议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是掌声——人们用掌声把通报案情的陈世中迎上了主席台，又用掌声把他送下主席台。会场里的人在鼓掌，礼堂外的人也在使劲鼓掌，真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掌声背后却充满了激烈的较量。早在案件初查时，巫溪县检察院从上到下便被卷入了一股强劲的说情风中。采访时，提到那次“人情攻势”，该院好几位干警都用到了“门庭若市”这个词。他们说，在办公室里有人找，在家里有人找，走在路上有人找，坐在车上有人找，认识的人要找，通过转弯抹角的关系也要找。害得我们上班要把门关着，走路见了熟人要赶紧躲着，电话长期被拿起来搁着。

陈世中更处在这股说情风的中心。县里有人暗示他：“世中呀，你还年轻，组织正考虑提拔你哩，要注意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哟。”某实权单位的人关心说：“‘陈检呀，你的亲戚都在农村，该解决一下了。’”

陈世中对这些把职权用来同法律作交易的人充满了轻蔑鄙视，仍没听见似地查案。

有人想“硬上”了。有位领导用仿佛是很随意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在电话中说：“世中同志，当前最大的政治可是安定哟！”陈世中也用很随意的语气问：我们办案不正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吗？某领导还怒气冲冲地让人带一张纸条去责问：陈世中，你谁都要查，我们这些当领导的还有没有一点尊严！陈世中不服这个领导的无端指责，也噙噙地写张纸条回敬道：傲慢的尊严是一种得不到支持的尊严。真正的共产党人，自己的所作所为应不怕法律评判！

高楼电站案的嫌疑人也纷纷“自救”。他们中有的写“说明”说自己在工程中得几千或万把元钱不过是点辛苦费罢了。更多的官员则把自己装扮成“正其谊而不谋其利”的谦谦君子，强调那些包工头给自己送钱完全是出于一种友谊。他们满脸委屈：在朋友处得点钱怎能往受贿扯呢？这分明是陈世中整人，想踩着别人往上爬嘛！对这些“说明”和解释，陈世中付之一笑说：让他们跟法律去解释和“说明”吧！

对方火了，有人打电话威胁：“陈世中，小心你的脑袋！”陈世中 7 岁的女儿也常能听到“小东西，老子两把捏死你，扔进大宁河去喂鱼！”的骂声。陈世中的爱人毕宗玉走在街上除常常会遭到恶狠狠的辱骂外，有时还会遭到一块不知从哪里飞来的石头的袭击。后来，袭击公开化了。一天，陈世中与毕宗玉上街办事，一个罪犯的家属带着几个地痞边骂边用石块乱砸陈世中夫妇。情急之下，陈世中拉着妻子逃进了派出所。那伙人仍守在外边辱骂，扬言要把陈世中“摆平”。后来，县公安局派人才将其解救出去。

事后，陈世中向县里的一位领导汇报了自己因办案而遭到的威胁和报复，要求县里出面整治执法环境。不想那位领导却说，你是副县级干部，姿态高些嘛，何必跟老百姓一般见识？

陈世中惊住了，他怎么也不相信此话会是出自那个平日里口口声声要坚决支持检察机关反腐败的领导口中。他更搞不明白，对那些威胁报复执法者的人，怎样才能算得上高姿态！但有一点陈世中心中却十分明白：这位领导的心态折射出了太多彼此矛盾的印记。平时，这位领导痛恨腐败之心是真实的，他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干部“出事”也是真心的。但检察院一下捅出个 12 人受贿的窝案，这种用人失察之过叫其如何面对 40 多万父老乡亲？又如何向组织交待？于是，个别并不腐败的领导的利益与 12 名腐败官员的命运奇怪地结合了起来，形成了巫溪县特殊时期特殊的“政治生态平衡”——一种关系到权力、关系到“圈子”利益和能使整个“圈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生态平衡”。而对竭力破坏这种“政治生态平衡”的陈世中，个别领导会支持他吗？也许还巴不得有人能用武力治治这个不识时务不听招呼的家伙哩。

那之后，巫溪检察院的执法环境更恶劣了。在干警遭辱骂抓打的关头，陈世中别无他法，惟有挺身而出。1990 年 8 月的一天，20 余名不法之徒砸了检察院的吊牌又围攻抓打办案人员。陈世中冲入群大声喝道：“住手！案子是我决定并亲自办的，与干警无关，你们要打要杀冲我来！”那伙人立即对陈世中围攻殴打，几名干警冲入群，手挽手地把陈世中留在中间保护起来，任那些野蛮的拳头砸在自己身上。副检察长谢作正跑出去找到一县领导请他去解围。不料，那领导一听，马上叫她去找一把手解决，边说边钻进小车说他要下乡。谢作正急了，一把抓住那位领导说：“你们平时大会小会都说要支挣反腐败。现在，我们需要你支持，一定要去制止那些闹事者！”那位县领导恼怒不已，本想发作，但想到这个文弱的女子不是被闹事者逼急了，也不会在领导面前如此泼辣，便只好软下来说：“谢副检察长，那伙人不但在检察院闹，还常到县委、县府搅得鸡飞狗跳的，我们也有难处呀！”谢作正一听，不禁愣住了。她终于明白了，在会上高喊反腐败谁都做得到，一旦要付诸行动，却是多么艰难！她只得松开手，那位领导的小车逃难似地开跑了。谢作正边往回跑边想：危难时刻，别人可以害怕可以躲，但我们检察官不能害怕不能躲，否则，反腐败就没指望了，老百姓就没有依靠了。她准备召集干警自救，赶走这伙冲击检察机关的不法之徒。当她气喘吁吁地爬上那已被砸得桌翻凳倒，纸飞灰扬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时，正遇上闻讯赶来的上届老检察长吴光忠。见陈世中和干警们被人围住殴打吐口水，老检察长怒不可遏。他往凳子上一站大声喝道：“住手！你们这班目无法纪的家伙，欺陈世中是领导不能还手，就在这里胡闹。我已从检察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也是老百姓了，你们再胡闹，老子今天就跟你们拼了！”

那伙人终于被盛怒的老检察长镇住。在吴光忠的逼视下，一个个灰溜溜地走了。“举报”风波

巫溪县某局局长洪岭认为：善于“告状”是政治舞台上的一种技巧，长于“告状”则等于掌握了复仇的武器。1990 年 5 月，洪岭运用他的“技巧”和“武器”，将一支“莫须有”的恶毒之箭绑上复仇的弓弩射向了陈世中。

案件侦查初期，见县水利工程领导小组的局长、经理们一个个都“进去”了，洪岭惶惶不可终日。这个从来都坚信在政治上只有头脑没有良心的政客，在极度的害怕和恐慌中把自己乔装成一个宗教式的忏悔者，带着 2000 多元受贿款到检察院找陈世中和谢作正痛哭流涕地自首。当时，因管理发票的干警不在，陈世中和谢作正使用临时收据收下了赃款并让其日

后到检察院补正式发票。洪岭却不去补发票，而将收据复印后四处状告陈世中“白条收款，大肆贪污”，“编造事实，制造冤案，陷害了一大批干部。”那次，万县地区检察分院、纪委等部门对洪岭所“举报”的问题进行半个多月的调查后认定：陈世中“大肆贪污”属于乌虚有。陈世中指挥侦办的12名局级干部在高楼电站及相关工程中受贿的案件事实清楚，定性准确，且12人受贿的金额大多已达到刑法规定的判刑标准。

有人不服这个“标准”。案子拿到地区一个会议上研究时，有人认为：“陈世中太过分了，在被立案侦查的12人中，有四、五人的受贿金额都不过才2000多元，怎能为2000多元就毁掉一个干部呢？”地委分管政法的副书记陈光国、地人大主任张洪国等领导仗义执言，据理反驳：在巫溪那种穷地方，别说受贿2000元，就是受贿200元都该查。想想吧，父老乡亲在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情况下，卖粮卖蛋积攒这些钱时，将会忍受多少寒冷和饥饿？巫溪那12名干部连这种钱都要贪占，这样的人难道还不该“毁掉”吗？

对陈世中的“举报”并未因检察、纪委的定论和地、县有关领导对本案的支持而终结。洪岭“举报”的余波未尽，巫溪县某局干部孙光之的“举报”又开始了。据1992年8月14日的《万县日报》载：孙光之自1990年7月以来，分别以“觉望”“明旺”的化名书写检举信6封，诬告巫溪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世中收受西宁电站隧道工程技术员陆辉贿赂3000元，掩盖陆受贿一万元的罪行……、孙光之的“举报”再次惊动了有关部门。四川省人民检察院、万县检察分院纪检组联合到巫溪对“觉望”“明旺”的“举报”进行了认真调查。结果，发现“举报内容纯属捏造”。调查组立即对这起诬告案展开调查，孙光之正准备寄出的几封“举报信”成了他诬告他人的罪证。孙光之落网后，牵出了他那个在巫溪县某部门当头儿的哥哥孙光财。后来，省院对涉嫌诬告的孙光财立案侦查，孙光之也被法院判处了6个月的拘役。

巫溪那场“举报”风波告出了一个反腐败的勇士，却伤害了陈世中的母亲。在孙光之“举报”时，有人专程到陈世中的父母处报信说：“陈世中整人，有人本来要杀了他报仇，但还没来得及动手，他却因受贿被抓进了监狱……”陈世中的父母爱子如命，哪里能经得住这种消息的刺激？特别是母亲听说儿子又是要被人杀又是已被关进监狱，气急之下，当场晕了过去。那之后便患下了严重的忧郁症，逢人便说：“我那儿子完了，有人要杀他”陈世中为啥要去受贿哟！“

卑鄙的诬告者们对母亲的伤害深深刺痛了陈世中的心。父母膝下只有他一个独子，为把陈世中培养成人，老人们含辛茹苦，熬尽心血。上高中时，实在无钱交学费，父母便卖了家中惟一值钱的一块柏木板。陈世中是个孝子，参加工作后，常挤时间帮父母干些农活。母亲虽无文化，但她知道儿子是国家的人，在为老百姓做事。陈世中每次回家，母亲都生怕影响了儿子的工作，总是早早地催陈世中快回单位。知道儿子办案有危险，虽提心吊胆，但母亲认为这是为民除害的好事，总是鼓励他好好干。

如今，母亲被逼成病，陈世中怎能不悲愤痛苦？在那些晦涩的日子里，浓浓的乌云沉沉地浮在陈世中的心空，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凄伤和惆怅：自己一个农民的儿子，在党的培养下走上了反腐败的领导岗位，只想认认真真查处腐败分子，保护人民利益，为什么会遭到重重阻力并殃及父母呢！

困惑中，人民群众的信任爱戴也塑造了这个川东汉子的坚毅和无畏。陈世中常常想起办

案车陷入泥坑的那个雨天。开初，找村民们帮忙谁也不理会，但当知道他就是“抓贪官的陈世中”时，一百多个村民纷纷涌来了。他们用柴草垫在泥泞的路上，然后冒雨帮他推车。陈世中忘不了，在办案人员遭到围攻后，县委政法委书记谭长生的那种愤怒，“陈世中和检察院的干警有个三长两短，我第一个不会放过有的人！”陈世中对原巫溪广播局局长徐天良这位朝鲜战场上的一级战斗英雄更充满了感激之情：查案时，他担心陈世中和副检察长谢作正等人遭人暗算，常悄悄跟在他们后边当“保镖”。还有电力公司那位老工人，硬要把他抓小偷单位奖的50元钱交给检察院作办案经费……

人民群众用信任和爱戴传递给陈世中的巨大力量融入他那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性格后，使他在侦办高楼电站受贿案时别无选择，惟有义无反顾地勇猛直前。经过数月的艰苦努力，整个案件终于全部胜利侦查终结。

但检察官们用证据和心血铸成的铁案并未能得到个别人的认可。因为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原因，11名受贿的干部中有数人不仅未被法办，而且还毫发未损地继续占据着他们曾用来收受贿赂的职务。这样一来，陈世中和他的同事部下再次陷入了困境，几个办案人员的亲属被人无故地调整了工作并被扣发了工资和奖金，案件主办人员李寿国在某企业上班的妻子则被人借故弄下了岗。被查的那伙人开始四处“强烈要求陈世中纠正错案，返还赃款，公开道歉”。要“狠狠收拾陈世中”的威胁也在复仇者们磨刀霍霍的行动中一步一步地实施……

“麦城”救援

当灾难扇动着巨大的翅膀盘旋在巫溪上空，将危险和绝望渐渐逼近陈世中时，原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龚读纶向他伸出了救援之手。早在陈世中侦查12名局级干部受贿窝案时，龚读纶便一直关注着自己手下这员年轻骁勇的战将。后来，“举报”信铺天盖地飞来，陈世中陷入谣言掀起的浪谷中。龚读纶派人去巫溪查明真相，还了陈世中一个清白。但此后的一年多，巫溪的执法环境并未能改变。他听省院一位到巫溪的干警回来讲：陈世中送客只能送到检察院大门口，过了那道大门，就有遭人袭击的危险。部下因严格执法而陷入仇恨和报复的困境，龚读纶心中涌起了隐隐的疼痛，他在考虑：该保护这个并非败于敌手而在诬告陷害和处处受刁难受威胁中搞得心力交瘁的部下撤离那块他曾恶战过的战场了。

1992年，省院举办检察官培训班时，龚读纶专门挤时间召见陈世中，告诉了组织准备将其调离的决定，并鼓励陈世中尽快振作起来。他说：当失败不可避免时，失败也是伟大的。一个人可以被消灭，却不能被打败。龚读纶的话使陈世中感动不已，两年多来遭受的不公和委屈顿时烟消云散。他激动地对龚读纶说：请把我派到阿坝、甘孜这些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一定干出成绩为组织争光！

龚读纶没有把陈世中放到阿坝、甘孜，他找到离巫溪较近的达川分院检察长邓光德说：你们要妥善安排陈世中，如果你们安排不了，省院出面。爱惜人才的邓光德欣然同意接收陈世中。

撤离前，陈世中对那些因办案而遭报复的干警展开了紧急援救。几个月前，他已给万县分院领导汇报，将副检察长谢作正调到了分院任办公室主任。省院决定调离后，他又亲自出面沟通，使几个干警家属的工作、奖金等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去成都帮李寿国的爱人“活动”调动时，他那被人逼成忧郁症的母亲病情加重，两次在大街上走失并差点跳大宁河自杀。干警们都劝他到医院陪陪母亲，但想到李寿国一家那愁苦的面容，陈世中将母亲托给爱人照

顾，自己去了成都。1992年初冬那场雪好大，成都的大街小巷都积满了厚厚的雪，陈世中接连好几天用自行车拉上省院税检察室主任王德川到省国税局汇报和求情。省国税局领导感动地说：难得一个检察长如此关爱自己的部下，李寿国爱人的调动，我们就破例解决吧！

1992年12月26日，陈世中调入分院的调令到了巫溪。因有事，陈世中委托县国税局长何福银将有关手续带到万县地区检察分院和组织部办理。当天下午，何福银刚出发前往万县，陈世中即将调走的消息便在巫溪不胜而走。几名人大代表到县人大说：陈世中不能走，我们要继续选他当检察长！有人还提出：如果实在要走，我们就给他立块碑，以彰其功德。县人大主任陈克义知道陈世中调走的消息也很生气，打电话到县委组织部追问：我们还未免陈世中的检察长，你们凭什么给他办调动手续？马上去把手续追回来，巫溪的人大代表还要选他当检察长！县委组织部某副部长只好打电话到80多公里外的尖山镇，让人将何福银乘坐的车截住。知道副部长要追回调动手续的意图后，早就为陈世中的处境鸣不平的何福银在电话中对其撒谎说：陈世中的调动手续早就让人带到万县去并已办好了。副部长信以为真，只好作罢。

1992年12月31日凌晨5点，一辆只装了半车坛坛罐罐的东风车停在巫溪县“最高人民检察院”下边的街口，院里的干警们都流着泪悄悄为自己的检察长送行。事前，陈世中向部下们发出了最后一道命令：不准泄露自己离开巫溪的具体时间——他担心自己离开前会惊动了两种人：一种是要报复自己的那伙人，一种是曾多次上门苦苦挽留自己的那些父老乡亲。但车到文锋镇，陈世中还是被眼前的情景惊住了：一大群村民黑压压地站满公路两旁，默默向东风车招手。车到夹道欢送的人群时，有人终于忍不住高声喊道：“陈世中检察长，一路平安！”接着，几乎所有的人喊了起来：“陈检察长，一路走好！”“陈检察长，常回来看看呀！”

后来，陈世中回忆说：那一瞬间，热泪一下模糊了我的双眼，脑海里不由地浮现出了当年瑞金人民送别红军长征时“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的情景。但他没有敢让车停下去与父老乡亲们“叙情”，他怕停下来会动摇他离开这方生他养他的热土的决心。

东风车缓缓驶过夹道欢送的人群，辗过这方深情的土地，辗过一个轰轰烈烈而又多灾多难的年头，向西边的达川呼啸而去。

手记之四十二：贼车“销”进刑警队——达州检察官捅出一桩警匪勾结抢车杀人案 开江2000型桑塔纳被枪，驾驶员被杀，一个手机号码将案件线索牵到内江

2000年元月8日晚，寒风呼啸，夜色茫茫。一辆黑色2000型桑塔纳亮着大灯从达县向大竹县方向狂奔。这辆J4515769号出租车的驾驶员李正成是个健谈的人，他边开车边对副驾驶座上的“吴哥”和后排的“孙哥”、“刘哥”说，自己从开江县粮油加工厂下岗后，只好跑出租车养家糊口，他还得意地告诉客人，自己这辆车就是震惊全国的重庆虹桥事件主犯著江县原县长张开科的私人“坐骑”。张被判刑后，拍卖他的车时泊己花十几万买下了这辆车。

“吴哥”等人对李正成的话似乎并不感兴趣，阴沉着脸一声不吭。见客人心不在焉，李正成谈兴索然，便不再吭声，只管开车，他没有注意到寂静的车内正膨胀着一种不祥的气氛，“吴哥”那阴沉冷峻的眼神里隐藏的凶光和杀机越来越咄咄逼人。

车到大竹县城郊，“刘哥”喊停车解便。李正成刚一踩刹车，后排的“孙哥”突然用钢

丝勒住李正成的脖子使劲往后拉，副驾驶座上的“吴哥”挥拳朝其猛击，“刘哥”也上前接头，李正成一边用手拉开脖子上的钢丝一边哀求：“别这样，你们要钱我给就是了！”“孙哥”恶狠狠地答道：“谁要你的钱，老子要你的命！”

杀死李正成后，“吴哥”驾车慌忙逃窜。车至安岳县龙台镇龙台大桥时，三名凶犯把李正成全身脱光推入河中。22天后，安岳县公安局龙台刑警中队的“死者情况说明”称：元月30日，龙台刑警中队……在大桥下的河里发现一男尸，据现场目击者说，死者可能是龙台镇一乞丐，加之尸体一丝不挂，我们认为不是刑事案件，故未对尸源进一步了解，也未作法医鉴定，只拍了照，因相机出故障，照片曝光，所以无照片存档……

当龙台刑警中队违反刑诉法规定，未立案侦查，未尸体勘验甚至连照片都未保存一张便将李正成当乞丐火化时，达州市开江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文华剑、副大队长杨克六及熊联福、王汝波等人正在达州市及周边县市所有的收费站、停车场、洗车场四处艰难地寻找李正成和他的出租车。当侦查员们感到山穷水尽之时，一个意外的线索给侦查带来了转机：李正成的一个朋友说：元月8日那天，李正成曾用手机给他回过一个传呼。调出李正成朋友的手机话费单，查出李正成回电话的手机号码是“13608256481”。顺着这个手机号码查下去，文华剑等侦查员不禁大吃一惊，持机者系内江市公安局东兴区分局刑警大队民警蔡启光！

蔡启光对自己手机出现在凶杀现场讳莫如深。2月初的一天，在内江市刑警支队办公室里，当开江县公安局的同行追问此事时，蔡启光拍着脑门“回忆”了许久，才“恍然大悟”道：哦，想起来了，我的手机那段时间与孙应炳换着用。开江同行步步紧逼，“孙应炳是什么人？与你是什么关系？他现在在哪里？”蔡启光说：“他是一个个体户，平时，我们常找他提供案件线索，近来已很久没看到他了……”

文华剑等人断定：孙应炳是“1.8”抢车杀人案的重点嫌疑人，必须马上将其抓捕归案。得知蔡启光有个叫吴铃的情妇同孙应炳的关系特别好，于是，刑警们打算找这个女人问问。不想，2000年2月27日，在吴铃走进内江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那一瞬间，案件竟有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收获——刚进屋，吴铃的手机响了，只听她问：“哦，孙哥呀？你在哪里？找我有何事？”吴铃的电话内容使侦查员们激动地预感到：一定是孙应炳打来的！果然，等吴铃接完电话，侦查员们才不露声色地问：小吴，是孙应炳给你打来的电话吧？不知底细的吴铃快嘴快舌地答道：“是他，他个龟儿叫我到资阳的春都茶楼去打麻将，哪个空跑几十公里去打麻将哟！”

一个多小时后，长途奔袭而至的文华剑等人在资阳春都茶楼将孙应炳抓获。孙应炳交待，他就是在开江出租车上参与杀害李正成的那个“孙哥”。根据孙应炳的交待，“1.8”凶杀抢车案中的“刘哥”刘先富也于不久后在内江市内他的“豪公梦”酒楼里被擒获。孙、刘二人交待：元月8日晚在大竹郊外抢车杀人的还有吴驰（坐在出租车副驾驶座的“吴哥”）。在这之前，他们与吴驰、彭艺在领取2.2万元“耳目费”后，还为东兴区分局提供过一部2000型桑塔纳脏车的线索。现在，那辆车已改成警车，是X副局长的专车。这次在开江抢的脏车在领取1.5万元“耳目费”后已销给了内江市公安局东兴区分局城区刑警中队。

案发后，受害人李正成的亲人多次去东兴分局城区刑警中队索要被抢车辆，城区中队于2000年3月14日强行收取“为挡获其被抢的2000型桑塔纳而支付的耳目费用1.5万元”后，将车归还。

2001年2月中旬，在四川省公安厅有关领导的督促下，东兴区城区中队才极不情愿地将“耳目费”退还给了受害人。主诉检察官富一语中矢“内江买赃车的警察有鬼，孙应炳一伙也还有漏罪”

孙应炳、刘先富落网后，“1.8”抢车杀人案真相大白，虽然凶犯吴驰在逃，案中也还有很多细节一时难以查清，但有关方面还是准备尽快结案起诉这起曾在开江引起不良影响的恶性案件。

2001年2月初，该案移送到了达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处主诉检察官刘东泓处。阅卷后，年轻的主诉检察官惊奇不已：劫匪好大胆，竟敢把赃车卖给公安！这种反常现象也使刘东泓敏锐地从另一个角度思索着案件中的一个疑点：“孙应炳一伙为什么敢把赃车再一再二地卖给东兴区分局，东兴区分局和城区刑警中队为什么要买这种赃车？明知赃车来路不明他们为什么不立案侦查？”联想到孙应炳、刘先富交待东兴区公安分局蔡启光及城区刑警中队罗智祥等人亲自选择接赃车地点而不对交车人采取行动，还照常给其“耳目费”等等疑点，一个刘东泓极不情愿想的念头顽固地闯进了他的脑际：警匪勾结作案！

为证实自己的判断，刘东泓2月中旬去开江提审了两次为东兴分局提供成都、开江赃车“线索”的孙应炳。虽然孙应炳一口咬定成都赃车是别人偷来的自己未参与，并摆出一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架式，强调自己提供线索与公安的任何人绝对没有关系，但从其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的供词中，刘东泓还是听出了隐藏在案件中的一些奥秘。他明白，孙应炳的态度之所以如此顽固，是因为同案的吴驰、彭艺在逃，目前无法弄清成都赃车的来源及东兴分局两次在孙应炳处购买赃车背后的内幕。他意识到：如果就此草草结案，把在开江抢车杀人的主凶孙应炳一枪毙，那么，“成都赃车”和东兴分局购买赃车的内幕将永远成为一个不解之谜。于是，刘东泓对案件承办人说：本案不能就此了结，内江买赃车的警察有鬼！孙应炳一伙也还有漏罪！

达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世中和分管刑检的副检察长陈耀华同意刘东泓对本案的分析和判断，并决心揭开这起购买赃车背后的黑幕。2月下旬，陈世中指示刘东泓向省院写了专题报告，并派起诉处长雷聪和刘东泓到四川省人民检察院专门汇报本案。达州的报告和汇报惊动了省里有关部门，3月7日，四川省公安厅督察、纪检等部门组成调查组赴达州检察院听取案情介绍和建议。接着，省公安厅作出决定，在达州市公安局和开江公安局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侦查成都赃车案，并限期抓获案犯吴驰、彭艺。3月中旬，省公安厅有关领导亲率专案组，坐阵内江指挥办案。

内江市公安局内也有人在为此案着急忙碌着。东兴分局的败类蔡启光等人早在案发之后便企图杀人灭口。2001年3月27日，刘先富交待：孙应炳的姘妇熊艳芳从开江放回来后找到我说，以后如你被抓住了，开江和成都的事都往吴驰身上推。老蔡（蔡启光）他们去抓吴驰时会把他打死的。老蔡让小罗（吴驰的情妇）带路去抓过吴驰，可惜没找到人。

专案组的到来挫败了蔡启光等人杀人灭口的计划。因反复搜捕都未找到彭艺，内江警方分析：这家伙吸毒，会不会已被关进了戒毒所？于是，专案组对市内所有戒毒所进行了排查，果然，4月3日，内江警方在戒毒所找到了彭艺。

4月11日，根据举报和排查，内江警方得知吴驰出现在资中情妇处的线索。内江公安局刑警支队熊晓华立即带人赶往资中县城市控，上午8点半，在资中县西街三道拐将吴驰抓获，并当场缴获自制64式手枪一支，手雷一枚。刑警大队长用“奖励”激起孙应炳一伙抢车的贼心和贼胆

吴驰、彭艺落网后，刘东泓当初那“成都赃车背后还隐藏着孙应炳一伙的漏罪”的判断得到了证实，但检察官们并未就此罢休，检察长陈世中对起诉处长雷聪和刘东泓说：“内江买赃车的警官肯定有鬼，你们要提前介入，不管费多少时间和精力，都要揭开警官买赃车背后的内幕”。

副检察长陈耀华组织起诉处干警制定审讯方案后，5月10日，雷聪、刘东泓、夏其生、陈汝萍一行5人赶往开江看守所，对关押在此的孙应炳等四嫌疑人讯问。

开初的审讯几乎是一无所获，孙应炳等人对抢车杀人之事大包大揽，拍着胸膛担保蔡启光等警官与赃车线索绝对没有关系。雷聪、刘东泓等人不急不躁，不厌其烦地给孙应炳一伙讲“坦白从宽、立功赎罪”的政策，并把报纸上厦门走私案中论罪该杀国有立功表现而被轻判的赖水强、赖昌国兄弟的案例让其一一细读，并把“检察机关将在严打整治斗争中严厉打击黑势力保护伞的决定”给其“过目”。干警们的苦心没白费，5月15日，孙应炳一伙在交待自己罪行的同时，也把内江市公安局东兴分局刑警大队长王平、民警蔡启光、张余富及城区刑警中队中队长罗智祥等人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罪行和盘端出。

八十年代中期，蔡启光、孙应炳同在内江武警部队服役。时任中队长的蔡启光对自己手下军事素质较好的班长孙应炳格外偏爱，1987年还帮忙把孙安排到四川省供销干校。1995年，孙应炳因抢劫被判刑6年出狱时，已转业到东兴分局的蔡启光对自己昔日的这个部下热情依旧，偏爱有加，他不按公安部门“严格挑选，局长同意并备案”的规定，把孙应炳“发展”为自己的“耳目”。常与其沆瀣一气，干些敲诈勒索、抹红吃黑的勾当。有了钱，二人吃喝嫖赌，无所不为。1999年，东兴分局刑警队抽调蔡启光等四人成立了“创收组”。孙应炳知道后将蔡启光请到茶楼祝贺道，蔡哥，创收组可是个肥缺呀！蔡启光却叫苦说：肥个屁呀，XX派出所才肥呢，用一万多元就买了台奥迪赃车。我们局里的X副局长也想要辆好点的2000型桑塔纳，你留意一下，有无这种线索。我们王（平）大队说了，有这种车，按车价的10%—15%奖励线人。

孙应炳得令后，找到曾与自己在同一劳改农场服刑的“牢友”吴驰说：“你会开车，知不知道谁有赃车卖，东兴分局要。”吴驰摇头说没有，孙应炳启发说：东兴分局警察张全富亲戚的车被抢了，几个月连一点线索都没有，现在这种事太多了。吴驰听后立即一拍大腿：妈的，我们也去“弄”辆车给东兴分局！

1999年6月初的一天，孙应炳谎称有贼车线索了，刑警大队长王平及蔡启光、张全富便把孙应炳约到茶楼包间里，王、孙二人讲定“耳目费”后，孙应炳提出钱一定要兑现，并且他们的人一个都不能抓。王平说：“你放心，这事由蔡启光安排。”不久，孙应炳邀约蔡启光一起到碑木镇去钓鱼，在途中选择了交车地点，明确了警车停放位置，孙应炳等人驾车逃跑、弃车及人员逃跑的路线等，同时约定了联络暗号（打传呼加代码）。

与蔡启光等人把一切筹划好后，吴驰、孙应炳找上吸毒人员彭艺于6月29日带着钢丝、

封口胶带、安定针剂窜到了成都。为给驾驶员造成他们是旅馆住客的假象，孙应炳在假日酒店前找好由程伟驾驶的川 AE8067 号枣红色 2000 型桑塔纳，吴、彭二人再从酒店内出来乘车去德阳。车到德阳附近，吴驰谎称下车解便，程伟刚一停车，吴便一拳将其打昏，接着三人用钢丝勒程的颈部，见其不能动弹了，才捆住程的手、脚，并用胶带封住其嘴、眼，还给她注射安定针剂，然后将其抛在公路边。

三人驾车返回内江后，将车停放在刘先富租住的门面内。孙应炳与蔡启光约定交车时间在 30 日晚上。当天下午，孙应炳带吴驰查看了交车地点，告诉吴警车停放的位置和弃车、逃跑的路线。当晚交车前夕，孙恐警方假戏真做，又先与彭艺乘出租车去查看蔡等人是否按约定的地点设卡和停放警车。彭艺怪孙应炳胆小，孙应炳说，你知道个屁？警车只有停在叉道口的另一条路上，我们才有逃路，如果他们在叉道口设卡，我们就无路可逃了。当孙看见警车停放的位置离路口较近，便躲在出租车内给几十米外设卡处的蔡启光打手机说：老蔡，我朋友来探路，他说你们的车停得离路口太近了，往后挪一挪。电话刚完，孙应炳见警车果然后退到了碑木铁路桥下，这才放心返回市中区，和吴驰等人驾车前往交车。当车驶到交车地点时，见叉路口右边的铁路桥下警车亮着警灯，孙应炳用手机给蔡启光发了暗号后，只见蔡启光扛着一块“打击车匪路霸检查站”的牌子冲上公路立在路边，孙驾车向叉路口左边的公路“逃窜”，警车鸣着警笛开始追赶，当车行至下一个叉路口时，孙应炳点燃事先自制的燃烧瓶甩在公路中间（孙交待：这样一是防止警方假戏真做，二是使戏演得更加真实）。接着，孙、吴弃车向山上“仓惶逃窜”，蔡启光等人在后面边鸣枪边高喊：“站住！往哪里跑……”

过了一会儿，见孙应炳等人还未露面，蔡启光又打电话问：“你们在哪里？还不回去？”孙应炳喘着粗气答道：“我们在山上。”彭艺在一旁骂道：“狗日的，把老子的皮鞋都追丢球了！”

第二天，孙应炳到刑警大队与王平等人一番讨价还价，王平答应给孙应炳 2.5 万元的“耳目费”。孙应炳以“曾建”这个化名从张全富处分几次领走 2.2 万元。分赃时，只分得 1000 元的彭艺怀疑孙应炳吞了独食，威胁说：“不把老子那一份给齐，我就去自首，要坐牢大家一起去坐牢”孙应炳吓得赶紧给彭解释：是因公安经费紧张，有钱后再付。为使彭艺相信，孙应炳还打电话将蔡启光、张全富叫到刘先富的茶楼”证实“这一情况。蔡启光帮孙应炳”证实“后训彭艺说：“大家都是道上混的朋友，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矛盾？动不动就要去自首？”“有蔡、张”证实“，彭艺只好作罢。罗队长要车心急，凶犯再次被“逼”上抢车杀人之路

孙应炳一伙到开江县抢车杀人的直接起因是其在一起大米诈骗案中被内江市公安局东兴区分局城区刑警中队中队长罗智祥抓住了“尾巴”，但早在这之前，孙应炳等人就已欠下了罗智祥的“情”。

1998 年冬天，在孙应炳的永东夜总会，有一小姐与嫖客睡觉时，小姐的传呼、存折和几百元钱被全部盗走。孙应炳勾结内江黑社会头子郑兵敲诈嫖客，被城区中队拘留，经蔡启光、张全富多次向罗智祥求情，孙应炳被释放。出看守所后，蔡启光教导孙应炳“今后要与罗队长多多联系”。罗也训斥孙应炳：不要眼光高，只给分局提供线索，有什么线索也要给城区中队多提供。但孙应炳此后并未与罗“多联系”，也未提供线索，于是，1999 年 8 月，当孙应炳等人诈骗大米再次落人罗智祥之手时，罗智祥就不大客气了。

那次，孙应炳与吴驰、刘先富同一个叫陶眼镜的在城里临时租一间门面房，摆一个磅秤，又摆了几个桶，桶里装满杂物，只在表面装点大米，给人留下此处在做大米生意的假象。然后，陶眼镜骗安岳县一个体户拉 10 吨大米到他们“门市”，卸下米后，由陶带那个体户去吃饭，孙应炳等人则趁此机会将 10 吨大米运到孙的战友处低价销售。干完这一切，孙打电话让陶眼镜甩掉个体户，那个体户回到“门市”后，孙等人早人走屋空……

城区中队拘留了孙应炳，经蔡启光、张全富求情，罗对孙只作了罚款 3000 元的处理。那张白条收据上写着：“今收到孙应炳支持刑警工作经费 3000 元。”收了孙应炳的“支持费”，罗智祥还给了他一个“任务”，“你给东兴分局提供了一台赃车，给我们也提供一台，要 2000 型桑塔纳！”

之后，罗智祥及该中队王 XX 遇到孙应炳又多次追问过此事。一次罗遇见孙应炳还威胁：“你们几个诈骗大米的事还没有完，你说的车子，我不要了！”孙应炳见状，找到吴驰说：“看来不给城区中队弄台车，他们就要追究我们骗大米的事。怎么办？”吴说，那就弄吧！因罗智祥曾生气说不要车了，孙应炳怕弄回车罗真不要，便决定先收几千元的“定金”。过了几天，孙应炳提出“借钱”之事，经罗同意，张全富从城区中队借 3000 元交给了孙应炳。不久，孙应炳、吴驰帮内江市黄华江到开江县找人收账时，乘坐了开江县李正成驾驶的 2000 型桑塔纳出租车，并向李索要了名片。返回内江后，孙应炳立即向罗智祥报告“有赃车了”。罗忙把孙叫去说：“我和张全富、王 XX 要到高粱镇办点事，你一起去，顺便选一个交车地点。”在车上，孙与罗谈好车价，孙又进一步要求：“绝对不能抓我们的人。”罗说：“你放心，按照上次大队的方案来办。”车到田家后，孙、罗、张、王一起选择了一个叉道口作为交车地点，明确了警车停放地点和贼车逃跑路线。弃车地点，并约定了联络暗号（打传呼加代码）。

2000 年元月 7 日，孙应炳、吴驰、刘先富三人潜入达州市开江县，打传呼联系上李正成后，为了不引起李怀疑，孙应炳让刘先富、吴驰先到达州市内等着，他搭乘李正成的车到开江郊外的金山寺，花 300 元求寺内神灵保佑他们此行能顺利成功。不料，刚出寺不久，一只麻雀撞在了车上，十分迷信的孙应炳觉得不吉利，在达州市内一餐馆吃饭时，他提出放弃这笔“业务”，刘先富也提出到重庆另抢一辆，吴驰却坚持说：“说好回去就交车，现在空手回去，怎么向罗智祥交待？马上就要过年了，没有车，又要被他龟儿整得鸡飞狗跳的！”

孙、刘二人无计可施，只好按原计划行事。于 11 日晚在大竹县郊外实施了抢车杀人。

返回内江，孙应炳一伙按事先与罗智祥商议好的方案，在公路上与罗智祥演了一阵警车追劫匪的戏，便弃车落荒而逃。

第二天，在刘先富的“豪宫梦”茶楼包间里，张全富、罗智祥将 12000 元现金和孙借 3000 元的借条交给了孙应炳，并说剩余的钱以后再付，孙以“曾建”的假名出据了 15000 元的收据。东窗事发，蔡启光通知凶犯：开江那边寨子发了，你们快去“跑滩”吧

2000 年 2 月初，蔡启光被叫到内江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询问后的当晚，就打电话告诉孙应炳：为赃车的事，开江那边查来了！孙应炳知道后，立即给刘先富、吴驰、彭艺打电话报信，随后逃回重庆市丰都县老家躲藏。在丰都，孙应炳打电话问蔡启光开江查得怎样了，蔡告诉他：正在查你用过的手机，今后不要用这部手机了！在通知孙应炳后，蔡启光越想越不放心，又与张全富打电话把吴驰约到市内“月儿湾”的转盘处。一见面，蔡启光便说，开江

那边案子发了，你们快去“跑滩”（内江土话，躲的意思）吧！接着，蔡启光、张全富又争先恐后吩咐吴驰：我们的电话可能被监控，今后千万不要与我们联系！当晚，吴驰把蔡、张二人的话转告给了刘先富和彭艺，接着，几人作鸟兽散，逃到了外地。

落网后，对抢车杀人的动机，吴驰说了一段令人吃惊的“心里话”：我们一是为了钱，二是因为蔡启光、罗智祥他们多次要这种车，同时也是为了和公安搞好关系，因为我与孙应炳等人的大量犯罪行为被他们掌握着，怕他们找麻烦。为此，他们提出要车的要求后，我们千方百计满足，以此寻求公安的“保护”。

孙应炳说得更透彻，抢车卖给公安最保险，他们不但不会查我们，出了事还会“保护”我们。

6月初，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法纪处已将向劫匪购车并为其提供“保护”的王平、蔡启光、罗智祥、张全富等人逮捕。经审理，四川省人民检察院认为，王平等嫌疑人与孙应炳抢车杀人案同案，应交由达州市人民检察院并案审查起诉。10月9日，王平、罗智祥、蔡启光已被押解至达州等待法律的审判。

手记之四十二：决不低头

杨正国虽然一再把“自强”“自信”的人生信条和不向磨难低头，不屈服于权势的倔强性格表达在他那“自强化工厂”“自信化工有限公司”的厂名之中，但他仍是个顶让人看不起的人——原达川地区某局的一官员曾说：弄垮他龟儿汤正国比按死一只蚂蚁还容易！

也难怪别人小看他。那矮小黑瘦的外表就已容易令人瞧不起了，何况他还是个瘤子！走路来右脚跛得十分厉害。采访时，与他同行，每走一步，笔者都担心他会突然失去重心而倒下，但他那残疾的右腿却一次次坚韧顽强地托起他倾斜的身躯照直朝前走……

在达州市，知道汤正国的人不一定了解使他成了跛子的那场伤病，也不一定清楚“魔鬼”追逐过他的那段经历和他从炼狱回归社会后是如何含辛茹苦，潜心研制了两种化肥。但知道汤正国的人肯定会知道汤正国为他的那些化肥而与原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和宏旺公司进行的那场历时3年的官司……

生命的低谷里，创业之歌好悲壮

14岁那年，右腿的骨髓炎迫使汤正国离开了他深爱的书本和课堂。由于无钱医治，他从一个活蹦乱跳的翩翩少年成了残疾人，成了“汤跛子”！

严酷的现实把汤正国塑造得沉郁、自卑和冷峻。但勤思好学、耐劳、要强的性格基调在遭受磨难之时成了他挑战人生的支点。伤病未愈，汤正国便突发异想。他说，我要为全国的农民发明一种肥料。在校时，他学过用牛粪种5406菌种和蘑菇。化学老师说，利用这种化学原理还可以造出有机复合肥。于是，病居在家的汤正国找些瓶瓶罐罐鼓捣了起来。

汤正国的雄心被父亲斥为孺子狂言。说，你能造出肥料，国家那些科研单位都该关门了！瓶瓶罐罐被扔掉了。父亲先后求人让汤正国到乡畜牧站煮饭、抓药，到乡蚕茧站打工。但他心不在焉，一次次被炒鱿鱼。父亲一气之下不管他了。汤正国乐得个自由自在，无师自通地当起了修锁修钟修伞兼补锅补鞋补盆子的“小炉匠”。他想以此赚钱办肥料厂。

1980年，汤正国只身来到达县城，承包了县政府等6个单位的垃圾清理工作，每月能

赚 300 元。忙不过来时，他还雇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帮手。这个叫陈汝先的女帮手一年后成了汤正国的妻子。

苦干一年多后，汤正国又买来一辆车给建筑工地拉沙运石头。在陈汝先的操持下，他们还办了一个豆油厂，一个粮食加工厂，并开了一个生意挺不错的饮食店。汤正国盘算过：照这样干下去，再过两三年泊己研制化肥和办化肥厂的资金就基本上差不多了。

结果，事与愿违。1986 年，汤正国的两厂一店“兵败如山倒”，不仅亏光了老本，还欠下了近一万元的债务。

数年心血付之东流，汤正国万念俱灰，多年来积存下来的疲惫一齐向他袭来。他奋斗的浪花开始退潮了。他想：还研究什么化肥办什么化肥厂！为这些玩意儿，我成天埋头于书本，奔波于生意场，从未体验过人生的乐趣。现在也该出去看看外边的世界，享受享受人生的幸福了。

欲望蒙蔽了汤正国的理智，魔鬼开始追逐他。想享受人生幸福的汤正国 1987 年到河北保定市郊区姐姐家玩耍时，从家乡给那边的光棍们“带”去了 10 多个姑娘。怀揣数千元“感谢费”的汤正国到北京、天津等地逛一圈刚回到达县，公安便找上了门。他以拐卖妇女罪被关进了看守所。

铁窗生活使汤正国的灵魂得到了净化。法律像一道闪电照亮了他迷失的心空。不久，因情节较轻，表现较好又是残疾人，汤正国很快被保外就医（后因有立功表现，1997 年刑期被全部减除）。1990 年出狱后，他立即把目光投向了被人们抛弃的垃圾。早在县政府清理垃圾时，他就发现垃圾堆里常长着一朵朵状似彩云的霉菌一爱动脑筋的汤正国想：这菌既然能在垃圾堆生长，说明垃圾中含有供植物生长的丰富营养。他把霉菌配上化学试剂放在玻璃瓶中培养，长出菌丝后经化验，其中含有磷、氮、钾等微量元素和有机物。汤正国兴奋地想。达县城每天至少要产生 200 吨垃圾和粪便，如果把这些有害物变成有机肥，既可减少环境污染，让人们生活在干净卫生的环境中，又可以使自己要造的肥料不愁来源，且造价低廉，能更好地造福于广大农民，这岂不是一举几得的好事！

汤正国一头埋进了有机肥的研究中。经过一年的艰苦研制，以垃圾为主要原料的多效有机肥终于于 1991 年上半年被汤正国研制成功了。经原达川地区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所化验，该肥含氮 12%、磷 12%、钾 4 %、有机质 12%、微量元素 1.4 %，有肥土松壤、稳兜、壮秆、多穗、粒实饱满的作用，并有杀土虫、旋心虫、稻瘟病和化释青苔等作用。研究成功的肥料被汤正国取名为“庄稼宝”牌多效有机复合肥。

“庄稼宝”研制成功了，汤正国也进入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弹尽粮绝之时，一直支持丈夫研制肥料的陈汝先再次挺胸而出。她卖掉了家里所有的谷子，将 500 元钱默默塞到了杨正国手中。汤正国用 200 元在达城的北门外租了一间 9 平方米的房子作住房兼“生产车间”，用 180 元买了台架子车作运输工具，剩下的钱买了些大米、豆瓣作全厂人马的“粮草”。“庄稼宝”的试产就这么开始了。

开张大吉。1992 年，除还清了借款，交了所有费用还纯赚 12 万元！接着，在县政府和残联领导的关心下，财政借给了汤正国 5 万元。有了钱，汤正国修起了厂房，增添了设备，

并亮出了“自强化工厂”的招牌。

1995年3月，中国产品专利十年成就展在北京海淀区举行。在3000多名专利申请者中，汤正国的“庄稼宝”牌多效有机肥一举获得国家专利金奖。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得知后，亲自接见了 him。“邓主席称赞他为社会贡献的不仅仅是一种发明，还有一种宝贵的精神。

汤正国并未因此而满足，在“庄稼宝”牌多效有机肥获奖后，1998年他又发明了综效磷氨，并于当年6月开始试生产。不料，自试产开始，汤正国和他的“综效磷氨”便遇到了灭顶之灾。
技术监督局的官员说：老子非把汤跛子整垮不可！

汤正国遇到的“致命克星”是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和达县宏旺磷化有限公司。

达县宏旺磷化有限公司（以下称宏旺公司）与汤正国的自强化工厂（以下称自强厂）同在达县河市镇与原达（2000年更名通）西外镇接壤的阁溪桥。两厂仅一条马路相隔。

宏旺公司是已有多年的历史的老厂，设备先进，资产雄厚，其产品在原达川地区及周边省、市销路一直较好。1998年初，见厂旁边又冒出了个与自己抢饭碗的“综效磷氨”化肥，宏旺的头头脑脑们如临大敌，恼怒不已。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有人建议：收拾“自强”！

但宏旺公司的头头们明白：同是企业，宏旺以什么身份或者说有什么资格去收拾别人“自强”？

有人说：“找地区技术监督局，我在那里的关系铁得很广如今，宏旺公司究竟是怎样把一个行政执法部门拉上了扼杀“自强的战车，作为国家监督职能部门的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为什么要”滥用职权，与经营者相互串通，直接参与不正当竞争活动“（法院判决书），因种种原因，已无从考证。但有一点却是明白无误的——宏旺公司与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的关系的确很”铁“——宏旺”收拾“自强厂时，只那么一挥手，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法制科科长杨洪洲。该科干部刘兵等人便朝自强厂一拥而上——很有点江湖人两肋插刀般的义气。

1998年6月22日，宏旺公司有人转悠到自强厂河市镇吴仕华的肥料销售点上，拿出一个写着地委某某领导名字的空信封说，某领导叫我们来收拾汤跛子，勒令你们不准再卖综效磷氨。吴仕华不服“勒令”，顶撞了几句，来人骂道：不找人收拾你，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来人只一个电话，杨洪洲、刘兵等人便屁颠屁颠地赶到了几十里外的河市镇。二人两眼一瞪，朝吴仕华一指道：胆大包天，把肥料给他封了！

封肥后，杨洪洲、刘兵等人又到自强厂抽样（5月3日至6月22日，共抽样3次）。一时间得自强厂鸡飞狗跳。

开初，汤正国以为是厂里的人不小心把杨洪洲等人得罪了，过些日子气消了也就算了。不料从6月22日至7月2日，刘兵、杨洪洲等人坐着宏旺公司的小车分别到达县的堡子、石桥、石梯、大树、管村等区的肥料销售点威胁销售“综效磷氨”者：自强厂的肥料是假的，

再卖，全部封存没收！

后来，也许是杨洪洲等人觉得到各销售点去堵自强厂的肥太费劲，便想“从源头上解决问题”。1998年7月2日下午，杨洪洲、刘兵一伙人再次窜到自强厂，见工人们还在热火朝天地生产，便拿出大哥大劈里啪啦地乱按一通后，怒气冲冲地大声讲道：公安科吗？快来人把这里的人抓走！正在生产的十多个工人一听害怕了起来，扔下工具一哄而散。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7月30日下午，杨洪洲、刘兵再次闯入自强厂，杨气势汹汹地骂道：不准你们生产还要生产，不听老子的行政命令，执迷不悟，老子把肥料和厂全封了！汤正国的爱人陈汝先再也忍不住了。这个不懂得弱者在强者面前总是有罪的女人哭着质问：太过分了！你为什么要这样把残疾人的企业踩着干！杨洪洲手一挥说：老子不管啥子残不残疾人，非把你汤跛子整垮不可！

当晚，杨洪洲、刘兵伙同宏旺公司的人在达城的红旗桥头拦住开江县回龙乡农机站从自强厂拉肥的车，威胁货主和驾驶员：再到汤跛子那里去拉肥，就把肥料和车全部没收！当晚，宏旺公司还有人把电话打到开江县农业局和开江技术监督局，举报自强厂生产的肥料是假的。并若有其事地说：自强厂已被封了，人也被抓了，今后别再去那儿买肥了……

杨洪洲及宏旺公司的人的所作所为毕竟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多次“收拾”，多次威胁，汤正国的自强厂却依然在生产在销售。杨洪洲似乎有些泄气了。8月28日，杨将汤正国及宏旺的人通知到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疏通意见，握手言和”。会上，大家都表示今后井水不犯河水，业务上加强合作，相互协助。杨洪洲也为“过去的误会而表示遗憾”，并退还了前不久从自强厂强行提走的产品样品。“和解会”上，大家似乎前嫌尽释，一派祥和景象……

然而，2000年3月，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庭审时，事实却证实：1998年9月9日前后在达县、开江等数县、市四处张贴、散发和邮寄侵害自强厂名誉权并致使其蒙受数十万元损失的那张《现场处罚决定书》就是1998年8月28日两厂负责人握手言和时，原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杨洪洲交给宏旺公司人员的。汤正国拍案而起：法庭上见！

这张《技术监督现场处罚决定书》（以下称《决定书》）最早出现在达县渡市乡白腊坪罗秀珍的肥料销售点。

1998年9月9日一大早，罗秀珍捏着一张复印的《决定书》找到了自强厂，刚见面便怒气冲冲地责问汤正国：汤老板，你好黑！汤正国以为对方开玩笑，把脸一抹，嘿嘿笑道：是有些黑，但肌肤黑白乃父母所赐，没办法呀！罗秀珍一脸肃容道：别装聋卖傻，我是说你造假肥坑人心太黑！说着肥那张《决定书》递了过去。

一看这张署着1998年8月1日的《决定书》，汤正国立即懵了。只见那上边写道：……综效磷胺、多效有机肥违反了《四川省标准化监督管理条例》十六条规定，……给予下列处罚：1.责令综效磷胺停止生产，多效有机肥标准按规定备案。

2.罚款100元……

看着看着，汤正国觉得血直往头上冲：综效磷胺、多效有机肥怎么违反了标准化规定？自强厂被责令停产并罚 100 元钱我怎么不知道？是谁这样无中生有地跟我一个残疾人过不去？他甚至怀疑这份《决定书》是谁冒名伪造的，但“四川省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的公章就威风凛凛地蹲在《决定书》的右下角，前边“行政执法人员”一栏里还签着杨洪洲、刘兵的名字。汤正国这才意识到，这已不是一般人“无中生有”或一般人跟他过不去了，这些人是“行政执法人员”，代表着一个行政执法单位或者说代表着国家在向他——汤正国的自强厂行使着行政执法。现在，代表着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也代表着国家的杨洪洲不仅现场处罚了自强厂 100 元，还责令了自强厂停产。这就等于说，自强厂必须关门——当然，《决定书》还给了汤正国一条出路——如果“不服此《决定书》，可在 15 日内提出行政复议，或向达川市人民法院起诉。”但《决定书》的最后一句却实际上已把自强厂推上了绝路。“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起诉，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也就是说，8 月 16 日之前你汤正国可以申请复议或起诉，但眼下已是 9 月 9 日了，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随时都可以找法院对自强厂进行查封等强制执行手段……

汤正国的心不由一下提到了嗓子里。情急之中，汤正国又飞快地把《决定书》看了几遍，他的情绪渐渐镇定了下来——《决定书》中有多处破绽：无编号，无被处罚单位，无生产、销售地点，无被处罚者的签字。无送达执行等情况！他兴奋地告诉罗秀珍：这《决定书》有鬼！可罗秀珍却生硬地说：技术监督局都那么说了，证明你的肥料才有鬼！我要退货！

要求退货的还不止罗秀珍。1999 年 7 月 10 日，达县人民法院的第 729 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原告（汤正国）4 处客户终止履行多效有机肥的销售共 1880 吨，按合同价减去成本价利润损失 533240 元。原告 7 处客户退货（综效磷胺）共 278 吨，共损失 143456.3 元。

两项损失之和为 676696 元！67 万余元对一个大企业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小数目，但对一个残疾人和他刚起步的小厂来说，不啻为灭顶之灾。

1998 年 9 月 9 日至 10 月底的那些日子里，自强厂基本处于自动停产状态。汤正国成天忙于救“灾”——刚在厂里退完客户的货，又要到达县、开江等县的售肥点去向工商部门解释“制造销售假肥被地区技术监督局处罚的问题”，打发完因自强厂受“处罚”而要求离厂的工人，又得去应付得知“自强厂被勒令停产，即将倒闭”的消息而前来逼款的债主……

坏消息还在不断传来：宏旺公司的人还继续在各县、市的肥料销售点散发、张贴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的《决定书》。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的杨洪洲、刘兵等人还在四处查封自强厂的肥料。还有可靠消息说，宏旺厂还准备在报纸上狠狠“坏”自强厂一下——1998 年 10 月 7 日，《四川质量报》上的一则广告证实了这消息的可靠。那则以宏旺公司三名相关人员之名刊登的广告说：达县某化工厂因无标生产、销售假综效磷胺，已被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查处，责令其综效磷胺产品停止生产，并处以罚金……

这则广告对汤正国的影响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2001 年 4 月 6 日，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说：1999 年 1 月 20 日，技术监督局 1998 年 10 月 1 日现场处罚决定被撤销后，由宏旺公司先前散发现场处罚决定书所引起的对自信公司的侵权行为仍在继续，营山县立山区农资经营站 1999 年 9 月 25 日《为农服务指南》第二期、敬告农户公告中载有“达县自强化工厂生产的综效磷胺不达标不出售”等内容……

这则广告还未见报之前，在各种重压之下，汤正国就面临着两种抉择：一、向宏旺和技术监督局屈服，不再生产综效磷胺。二、用法律的武器同侵害自强厂名誉并给自己造成巨大损失的人斗争。

屈服，不是汤正国的性格。他认为，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决不能向想征服自己的权势者低头。他曾权衡过与侵害自己的人斗争的利弊，并从其他案例中看到了自己能斗赢那些滥用职权者的希望：1996年，达县种子站在陕西购3吨“秦丰牌”秦油M号种子，其中的2吨的确存在违法行为，但查处此案时，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因“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系事实不清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而输了官司。在自己这件案子上，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的违法行政远比“秦油二号”案有过之而无不及，还能赢不了官司？

要与侵害自己的人斗争，汤正国也深知自己与对方力量的巨大悬殊。对方不仅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企业，还有一个握有自强厂生死大权的技术监督局，特别是后者象征着权力，代表着官方意志。人们常说，饿死不讨饭，屈死别告官。弱与强斗，民与官斗，这都是犯忌之事，那结果也大多是不言而喻的。技术监督局的个别人惹不得、更告不得，他们是管产品质量的，没有招惹，别人尚能给你来一个“莫须有”，几乎把自己辛辛苦苦才发展起来的企业搞垮。若去告了，把关系搞恶化了，岂不是惹火烧身，自找倒霉？那样一来，自己的厂今后还生不生产？自己发明的那些肥料还不想在达州这地方生存？要想自己的企业能继续生存，自己的厂子能继续生产，就得委屈求全，以屈求伸——退一万步讲，即使官司能打赢，技术监督局的个别人也不报复，但打官司费钱费时伤神，一个人在还未到走投无路之时，选择打官司是极蠢且极危险的。

汤正国不想愚蠢地去冒这个危险。他想到了眼下人际交往中最时髦的一个术语：“勾兑”——湖北的一个卖假肥的老板用1.3万元钱不就把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下属的质检所的两个工作人员“勾兑”得敢给他的假肥填“合格”吗？但想到该案被达州市检察院查处的结果，想到“勾兑”中那种卑劣无耻的交易，汤正国放弃了“勾兑”……

经过反复思考，汤正国选择了一条中庸之道——他想求和私了——通过缓和自己与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不协调的关系”来调解自己与宏旺公司的矛盾，以期达到三方“和平共处，一起求财”的目的。

于是，在发现《决定书》后的9月10日，汤正国便怀着诚意去找地区技术监督局某领导。局里有人说某领导没空。某领导没见着，还被人奚落了一番：“汤跛子，听说你最近又发明了一种什么肥料，产量不错吧！”“汤老板，整发了财，别忘了请我们喝杯酒哟！”

对这些热嘲冷讽，汤正国都忍了。他想：韩信那么出名的人物都还有胯下之辱呢。第二天，他又去找某领导。明明其他局领导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办公，可有人说：某领导正在开办公会。第三次去见某领导，汤正国吸取了前两次的教训——他找人先探听好，某领导的确在办公室里时才赶紧赶去求见——但不等汤正国靠近，某领导的门长了眼似地文一下关上了。有人告诉他：汤老板，某领导不在，回去吧。

此后，汤正国又去找了某领导三次，结果，又吃了三次闭门羹。

六次求见遭拒绝，汤正国那颗自尊的心产生出了抗拒的激情，半个多月来因达川地区技

术监督局带来的厄运而积下的怒火和着数次受辱郁积胸间的怨气一下喷发而出，朝着技术监督局的大门，他高声喊道：不愿谈我们就法庭上见！

为了表示要顽强生存下去、要与滥用职权者一决胜负的必胜信念，9月16日，汤正国把自己的自强化工厂更名为自信化工有限公司。

9月18日，汤正国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悲壮把状告宏旺公司和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的诉状交到了法庭。
三家法院六次庭审，是非曲直皆有评判

这场官司的漫长、曲折和复杂不仅仅是因为双方力量强弱的悬殊、各种势力的介入及处于弱势的汤正国一直坚持的诉讼请求所致，还因为汤正国对案情判断及诉讼策略的失误。

汤正国太自信太乐观了。他以为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串通宏旺公司参与不正当竞争人证物证俱在，只需告到法院就能一战克敌，稳操胜券。他拒绝旁人先告地区技术监督局违法行政。滥用职权，再打民事官司要求赔偿的建议。他说，可以一审终结，直接打要求赔偿的民事官司。他甚至准备请记者去法庭拍摄下对方认错赔款的镜头，以解数月来窝在心头的怒气。

在1998年9月18日呈给达县人民法院的那份两页长的诉状中，汤正国语气强硬地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宏旺公司）及第三者（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

1、立即停止侵害，公开在《通川日报》上登报道歉，恢复原告名誉。

2、赔偿因被告名誉侵权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46万元（当时的退货损失为46万元，间接损失共达67万多元）
3、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不料，1998年10月中旬达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的代理人一招“二两拨千斤”便轻而易举地就避开了汤正国来势汹汹的攻击。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的杨洪洲、刘兵在法庭上不紧不慢地答道：技术监督局依法行政、何罪之有？何侵权之有？为什么要赔偿你汤正国46万？即使你汤正国要告我们违法行政，这行政官司也不应由达县人民法院受理，我们局的所在地在达川市，所以，这官司的管辖权在达川市，而不是在达县……

达县人民法院民庭只好宣布休庭。汤正国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告上法庭的被告面带讥笑地冲他点点头昂首挺胸而去。望着对手大模大样离去的背影，汤正国在心底恨恨地说：我们还会再见的！

怀着愤怒的心情，汤正国于1998年11月15日把不服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决定书》的诉讼交到了达川市人民法院。达川市人民法院受理后于当年12月下旬开庭审理。这次庭审，汤正国以大量的证据据理力争。法律的天平终于偏向了这个一直处于劣势的弱者。1999年1月20日，达川市人民法院作出的（1998）达州行初字第232号《行政判决书》称：本院认为，原告生产、销售的综效磷胺是地科委下达给该公司98年度的重点科技项目，处于试产试销阶段。多效有机肥采用的是企业标准，经有关质检部门检验为合格品。多效有机肥自1992年以来已多次在达县技术监督局登记备案，且于1998年9月8日经四川省技术监督局考核审查，认为原告对本厂生产的多效有机肥具有出具该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的资格，并发给了资格证。故原告生产、销售的综效磷胺、多效有机肥是合法的，依法应受到法律的

保护。被告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的现场处罚缺乏事实依据，现场处罚又不现场送达当事人，对原告现场处以停止生产，超越了现场处罚的范围，违反了法定程序，属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其具体行政行为应予以撤销……

据此，达川市法院判决：撤销被告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 1998 年 8 月 1 日对原告责令综效磷胺停止生产、多效有机肥标准按规定备案、罚款 100 元的具体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 100 元，其他诉讼费 200 元，由被告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负担。

达川市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下达后，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一直沉默无语。上诉期已过数月，该局才提出申诉。1999 年 7 月 11 日，达川市人民法院的（1999）达川旧监字第 1 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告诉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你局对该案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决应予维持。”

在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徒劳无益地申诉的同时，1999 年 4 月，达县人民法院恢复了对汤正国、陈汝光夫妇状告宏旺公司及第三者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侵权赔偿一案的审理。有到庭旁听者回忆说：那是一场辩论相当激烈的庭审，原告、被告、第三者的代理人们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法庭上充满了紧张、激烈的气氛那次庭审，作为被告的宏旺公司辩称：原告根本不具备磷胺生产条件，以低劣的掺合肥，并以被告生产的磷产品在农民心目中的良好形象，缀加“综效”二字误导消费者，坑害农民。不是被告侵害了原告的名誉，而是原告坑害了消费者。所以，被告印发的第三者作出的《决定书》对原告不构成侵权，更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的代理人杨洪洲等人在庭上只是反复述称：第三者作出的《决定书》是合法的，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而汤正国和他的律师则依据达川市人民法院的 232 号行政判决书，强调由于被告和第三者的行为，使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残疾人企业的合法权益，判令原告要求其登报消除影响、赔款 65 万元的诉讼请求。

达县人民法院的这次庭审似乎也一点没有顾及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的情面，在 1999 年 7 月 8 日下达的（1999）达民初字第 729 号《民事判决书》中，达县人民法院认定：原告依法生产销售的多效有机肥和生产、销售的综效磷胺，应通过市场机制得到认可。故该产品的试产试销是符合规定的，依法应受到法律保护。第主者在执行职务中违反法定程序，滥用职权，对自己作出的《决定书》既未现场送达，又未向社会公开，就给予被告。被告以广告形式复印散发，致原告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第三者和被告的行为对原告已构成侵权行为，应予承担损害赔偿赔偿责任。第三者作为国家监督职能部门与经营者相互串通，将未向社会公开的《现场处罚决定书》交给被告，实属直接参与不正当竞争活动，对原告合法权益构成侵害，应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被告为了自己生产和销售的产品，运用不正当竞争手段抵毁原告产品，应立即停止侵害，并向原告赔礼道歉。

达县人民法院还判决：一、被告单位立即停止对原告的侵害，并向原告赔礼道歉。

二、第三者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一次性赔偿原告单位直接经济损失费 146296 元。

三、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一次性赔偿原告名誉损失 30000 元。案件受理费 5040 元，其他诉讼费 2500 元。合计 7540 元，被告承担 2500 元，第三者承担 5040 元。

达县人民法院的这次判决引起了原、被告不满，双双提起了上诉。

汤正国在上诉中认为：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但损失数额不应是一审认定的 146296.30 元，而应是 677164.30 元。责任划分不公正，一审只判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承担经济、名誉损失 176296.30 元的数额过低，宏旺公司不承担赔偿费，实在太偏袒。故要求“被告与第三者共同赔偿自强厂损失 677164.30 元，赔偿自强厂名誉损失费 20 万元”。

而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在上诉中则认为：“虽上诉人的执法行为在程序上存在错误，但不能说工作错误就是故意串通所致”，“上诉人的工作失误是实，但直接参与不正当竞争却系不实之词”，该局以此断定“原判不公正……”云云。

原、被告上诉后，直至 2000 年 3 月，已由达川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更名的达州市人民中级法院才开庭审理。这次庭审，双方的辩论焦点已转到了是否是滥用职权，行政执法部门是否与企业串通参与不正当竞争及赔偿数额、赔偿责任划分等方面。中院这次开庭，也引起了新闻界的关注，达州电视台、《达州日报》、《达州广播电视报》的记者们蜂拥而至，旁听庭审。有人对此不满，将电视台胡 XX 骗出法庭，推搡到电视台台长处，台长大怒，那伙人方才将胡放掉。

这次庭审后，中院曾于 4 月找汤正国与已更名的达州市技术监督局的某领导等人调解过，但某领导却一再坚持本局无错，不承担责任。汤正国质问：怎么无责任？那个《决定书》是谁搞的？章是谁盖的？某领导骄横地答道：公章这种萝卜圆圆哪里都有！法官有些看不过了，问：某领导，怎么不懂法？某领导听后快快然，随即拂袖而去。

此后，庭审的结果进入了漫长而渺茫的等待之中。在这令人心焦的等待中，庭外的表演却空前地热闹了起来。与本案毫无关系的单位和人们兴致勃勃地介入了此案——有给汤正国鼓劲的，有强调决不能让市技术监督局给一个个体户赔钱的，有人给法院方面施加压力，有人写建议要把“不安分的汤正国重新弄进看守所关起来！”还有人还致函某单位威胁：“如果法院敢判汤正国赢官司，工人将进城游行请愿……”

这期间，中国残联几次致函达州有关领导，关注着此案的审理结果。2000 年 7 月，中国残联的律师飞抵成都了解案情，达州市委、市府及达县县委有关领导也纷纷出面积极协商解决本案……

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达州市中级法院终于重新启动审判程序，将此案发回已更名的通川区法院（原达川市法院）再审。2000 年 10 月 11 日，通川区人民法院将此案再审后作出了（2000）通川行再字第 01 号《行政判决书》。

该判决书除认为 232 号行政判决把“综效磷胺”认定为合格产品证据不足，应予纠正外，再次认定了“原达川地区技术监督局的《处罚决定书》超越了现场处罚的范围，违反了法定程序，属滥用职权，其具体行政行为应予以撤销。”

此后，案件又进入了令人难以忍耐的沉寂之中，但暗中，人们却仍在加紧活动并加大对相关部门的压力。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1 年 4 月 6 日作出的终审判决送达到汤正国手中时已是 4 月下旬了。判决撤销了达县法院的 729 号判决，但基本上认定了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判决，只是赔偿者和赔偿金额上略有变化：由达县宏旺公司赔偿汤正国直接经济损失 61994 元，间接经济损失 10 万元，“并于本判决生效十日内在《四川质量报》上向自信公司赔礼道歉”。汤正国诉“达州市技术监督局与宏旺公司串通参与不正当竞争应进行民事赔偿”的问题，法院认为：技术监督局超越现场处罚范围，违反法定程序，侵犯了自信公司的合法权益，但该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应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解决。汤正国要求其民事赔偿，“本院不予支持”。

对此，汤正国一方面向达州市检察院申请法律援助，一方面向法院重新起诉了达州市技术监督局行政侵权。他说，那些滥用职权对企业侵权的人不受到处理，我会一直告下去！
手记之四十四：巴山追逃

一次次从法网中脱逃之后，李波曾狂妄地叫嚣，想抓住老子的人还没有出生！

可眼下，当他利用万源市地税局征管员的职务之便携 26.7 万元保险金狂奔两年之后，却被万源市检察院的干警们在大巴山的密林中擒获。2001 年 8 月 26 日，他被检察机关送上审判台，并被判处有期徒刑 6 年。

对这样的结局，李波服。他说，检察官抓我时妙计丛生，的确比我智高一筹。不过，他补充说，头几个回合我还是略占上风。
引蛇出洞

其实，李波所讲的“略占上风”的那几个回合不过只是一次次侥幸逃亡成功而已。

1999 年 4 月 3 日，万源市检察院的侦查人员发现李波有经济问题正准备对其采取行动时，李波闻风而逃。此后，他如惊弓之鸟，在福州、广东、北京、成都等城市狂奔猛逃。逃亡中，语言不通，水土不服，户口查得紧等问题已令李波头痛不已，更使他感到要命的是万源市检察院的追逃人员总像影子一样跟在他的后边。刚到一处躲藏不久，追逃人员便跟踪而来，有两次都险些被擒获。从此，惶惶不可终日的李波得了个奇怪的恐惧症：怕警车、怕戴大盖帽的，怕人敲门，他甚至怕别人对他多看几眼。一次，在成都的一家商场里，有人指指点点地向李波走去，吓得他连跑了好几条小巷。此后，每逃一处，住上十天半月，李波便要换住处。在一个城市里住三五个月，他就要溜到另一个城市。落网后，李波交待：总有一种草木皆兵的感觉，害得我吃不下，睡不好。夜里老梦见各式各样的手铐和阴森森的监狱，好几次都被恶梦吓得直哭……

2001 年春节前，李波潜回达州市躲在通川区肉联厂后的民房里。达州离万源市只有 150 公里，很危险，但李波看一部侦探片时记住了一句台词：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更重要的是，李波满以为一年多过去了，万源市检察院反贪局的人已被他甩掉或者已放弃抓他了。于是，李波在那间阴暗的出租屋内隐姓埋名，深居简出，只有当夜色笼罩城市时，他才会像一只贼头贼脑的老鼠从阴沟中东张西望地溜出来买些方便面之类的食物又赶紧跑回去。

李波准备就这么“安居乐业”地住下去了。但不久后的一天晚上，他正准备出门采购食物时，眼前的情景吓得他差点晕过去：不远处，万源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钟代平带人正向出

租屋包抄过来！李波魂飞魄散，慌忙跳窗而逃。

这次擦肩而过之后，李波重新销声匿迹，万源市检察院反贪局四处明查暗访仍渺无音讯，只了解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有人看见李波“失踪”前曾跟他的亲戚杨明辉（化名）在一茶楼商量如何“跑路”的事。也就是说，杨明辉肯定知道李波的去向。有人建议：把杨明辉抓来一审就知道李波的去向了。万源市院检察长蹇明海反问：假如杨明辉不交待又怎么办？

蹇明海的担心是有道理的。那杨明辉与李波感情极深，加之此人很讲江湖义气，嘴又特别硬，即使有证据证明他帮李波逃跑，讯问时他也不一定承认。但如果不通过杨明辉，追查李波的线索也就断了。于是，蹇明海与反贪局长钟代平定下了引蛇出洞之计。

2001年3月27日，钟代平“碰巧”在茶楼里遇到了杨明辉。一番寒暄后，杨明辉坚持一定要请钟代平喝茶。二人就着一杯清茶，一盘瓜籽，很投机地聊了起来。聊着聊着，杨明辉转弯抹角地把话题扯到了李波的事上，钟代平满脸不屑地说：他李波再怎么跑也逃不出我的手心。他跑到成都、深圳等地我知道，他在通川区肉联厂后边租民房藏了近半年我也知道，现在他藏在哪里我仍然知道。眼下，我手上有个案子还未完，等这案子完了，我看他还跑不跑得脱！

几句话说得杨明辉心惊肉跳。他断定：既然李波逃成都、深圳等地和在通川区肉联厂后租民房藏半年的事钟代平全都清清楚楚，证明他知道李波现在藏在哪里的话大概也不是谎言。在茶楼与钟代平握手道别后，杨明辉想：得尽快通知李波转移。在选择通知方式时，杨明辉放弃了电话联系。他看过不少侦探小说，他怕钟代平那“不慎失言”的话万一是圈套，让自己给李波打电话时落下个通风报信的证据。于是，他决定亲自往李波的藏身处跑一趟。

3月29日清晨，负责监视的干警传来信息：杨明辉去了巴中市通江县芝苞乡。奔袭

李波的社会关系等静态资料迅速汇总到了检察长蹇明海处。资料表明：芝苞乡是李波的老家，家中还有二爸、么爸和爷爷等亲友。根据种种迹象，蹇明海断定：李波就藏在通江县芝苞乡。

蹇明海、钟代平站在一张大地图前寻找着芝苞乡的位置。二人发现，这个南接达县北邻万源的小乡场在大巴山西麓，此地全是崇山峻岭，处处崖险水恶，重岩叠峰。当地人说，在山路上行走，“上山碰鼻子，下山撞勾子”（屁股），要到这种地方抓一个逃犯谈何容易。

钟代平建议：化装进山抓捕李波。化装侦查是万源市反贪局常用的一种手段。钟代平曾化装成做香菇生意的商贩，深入广州的一工厂追逃，与该厂一伙厨师结成了“铁哥们儿”，并从这些“铁哥们儿”处访查出了贪污26万元的万源市烟草公司仓库保管员牛晓英的情夫刘某的情况，通过跟踪刘某，一举将潜逃三年之久的牛晓英抓获归案。

但蹇明海检察长不同意用化装的方式进山追捕李波。他说：在那封闭的大山里，去几个陌生人，用不了一顿饭的功夫就会家喻户晓，对已成惊弓之鸟的李波反倒会造成惊动而使其逃窜。

经过反复权衡，蹇、钟二人决计长途奔袭，乘夜色进入芝苞抓捕李波。

29日上午10点，一辆桑塔纳警车载着钟代平、王勇、罗强离开万源，风驰电掣地向500多公里外的通江驶去。到达通江县城时已是晚上8点过了，与通江县检察院派出配合的几名干警会合后，一行人又匆匆赶路。在大山里转了两个多小时，到达芝苞乡刚好23时。

芝苞乡建在一面斜坡上。当晚正好停电，乡场上一片寂静，街道两边那些高高矮矮的房子里不时传出轻微的鼾声。钟代平一行到乡政府敲了好一阵门，才找到了当天留下值班的副乡长和几名乡干部，一打听，知道李波的二爸李运全（化名）就住在街的最北头，爷爷及么爸住在离乡场3里地的六村一社。一乡干部睡眼惺松地嘟哝道：找个李波何必这样大动干戈？他就在李运全家，白天，他还到街上送过一个从万源来到通江城里去。乡干部的话使钟代平一行兴奋不已。一合计，大家马上赶去李运全家。钟代平先安排干警把李运全的房子围起来，再让副乡长敲开门进屋搜查。但屋里没有李波。钟代平等人马上对李运全进行讯问，李运全只字不吐。估计李波不会走远，为防夜长梦多，钟代平等人决定把李运全带到乡政府讯问。刚出门不远，一辆摩托迎面而来，骑摩托的年轻人从行人的手电光中发现了李运全，忙停下问：全叔，这么晚了，还要到哪里去？李运全气呼呼地嚷道：他们要找李波，我到哪里去找嘛！不知底细的年轻人快嘴快舌地告诉李运全：李波就在街上，他刚才坐我的摩托到供销社打电话去了。钟代平一听，马上令干警们熄掉手电，快速赶往乡供销社。谁知又扑了空，供销社管公用电话的人说：李波打电话后已朝下街方向走十多分钟了。

干警们迅速沿街分头搜索。钟代平与王勇搜索到街的尽头，只见两个人影一头钻进了路旁的厕所。王勇说，肯定是李波，但冲进去把那两个吓得瑟瑟发抖的人揪出来一看，却不是。钟代平问他们跑什么，那两人说，他们在茶馆里赌博出来，见有人打着手电过来，以为是公安抓赌，所以吓得钻进了厕所。

其实，就在钟代平、王勇抓住两赌徒时，李波与他们近在咫尺。原来，钟代平一行到芝苞乡政府时，当天早上得到杨明辉情报的李波刚好上街，准备打电话再印证一下杨明辉的情报。钟代平等人到李运全家搜查时，李波正在供销社给万源的另一个消息灵通的“哥们儿”打电话。钟代平等人赶到供销社时，李波已去茶馆，准备与人诈金花搞赌博。但赌博场上多了两人，李波便叫另一个人陪他出去转转。因为刚才在电话中了解到万源市检察院反贪局正在准备抓他，所以，当李波在转路时听陪他的人说晚上有警车来过，一种不祥之感立即袭上了他的心头。他正要问警车开到哪里去了，突听十多米远的黑暗处有人说：这家伙刚才还在供销社打电话，怎么一下就不在了？李波一听，吓得往后一退，踩响了地上的瓦片，几支电筒立即照住了他，有人边冲过来边喊：抓住他！李波在这里！李波撒腿便跑，后边一群人紧追不舍，追过街后的叉路口，李波突然消失在浓浓的夜幕之中。

眼前的叉路一条通往通江县城，一道通往李波的老家六村一社，钟代平分析：李波不可能向通江县城跑，很可能是逃往了老家。于是，指挥干警们上车便追，追了一阵，不见李波的影子，便指挥大家沿公路两旁的密林搜查。到凌晨5点，仍无结果。估计李波就藏在路边的某处丛林中，一条计策涌上了钟代平的脑际。他让干警们原地分散潜伏，让二辆警车拉着警笛向通江县城方向开去。他想以此给藏在暗处的李波造成抓捕的人已走的错觉，让他来自投落网，但直到第二天上午8点，李波都没有露面。钟代平的守株待兔之计落空了。以动制静

天放亮时，追逃的干警们才发现，自己埋伏的地方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沟壑，一边是刀砍斧削的悬岩，路边全是茂密的灌木丛。过路的村民说。这山里别说躲个把人，就是隐藏千军万马也难发现。钟代平不信邪，让副乡长组织十多个民兵在路旁的林木中搜查。结果，到门点，除捡到李波跑掉的一只皮鞋外，连个人影子都未发现。

其实，李波一直都藏在离钟代平等人潜伏不远的路旁。29日晚，当警车快追上时，李波急忙往路旁的树林中一钻。钟代平等人四处搜索时，李波藏进了一个被杂草遮掩的石洞里。后来，钟代平等人研究让警车开走，人留下设伏的话都被他听得清清楚楚。30日中午，见搜山的人全部撤走了，李波才从石洞中爬出来逃回老家。

李波满以为抓他的检察官们会一去不返了，谁知，还未能把一碗饭吃完，便又听见汽车声响起，他吓得连爬带滚地躲进了屋后的树林里。李波发现，一群检察官在他老家的屋前屋后到处寻找，他还听见有人在规劝爷爷、幺爸让他出去投案自首。警车走后，他才又溜回去狼吞虎咽地吃那碗剩下的饭。吃过饭，正准备睡一会儿，给他放哨的爷爷上气不接下气地闯进屋说：快！检察院的又骑摩托来了，李波吓得叫一声“我的妈呀”，便又逃进了屋后的树林里。躲在树林里，李波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在安排人守住四周的路口。还有人在大声嚷嚷：要注意隐藏，不要暴露了自己蹲守的位置。李波更吓得不敢动弹了。

其实，这是蹇明海、钟代平等人使用的以动制静之计。组织搜山时，钟代平注意观察了四周的地形，通往六村一社的公路两旁都是悬崖绝壁，李波不可能从这些地方逃走，唯一可能的就是逃回了家。钟代平思忖：李波藏在到处都是树木草丛的地方，要搜到他很难，但他要逃走却十分容易。如果让其逃走，再抓他就更难了。只有镇住他，使其不敢外逃，再想法抓捕。

钟代平用手机向蹇明海汇报情况后，蹇明海指示：以动制静，用不断袭扰和布控的假象给李波及其亲友造成一个四周已全被封锁的感觉使其处在一种兵临城下，已无路可逃且不敢外逃的恐惧之中。

钟代平依计而行。这一招果然奏效，30日晚，当钟代平只安排当地一治安积极分子监视李波家动静其余人全部乘着夜色悄悄撤回通江县城休整时，李波爬在草丛中又冷又饿却一动不动不敢动。而他的亲友们也全都处在草木皆兵的恐惧中，不敢给李波送衣送饭。事后，李波交待说：当天晚上，周围一点动静也没有，但越没有动静，我越害怕越不敢乱动。我总觉得我的周围也许正潜伏着一个个一动不动的检察官……回马枪

3月31日，李波的爷爷等人经过多次打探，当确信周围已无人埋伏时，才到树林中把李波悄悄找回。接着，有人从芝苞街上传来令李波完全放心的消息：昨天晚上，检察院的人已全部向通江县城撤走了。李波不由又恨又气：妈的，四处设防堵路原来是虚张声势！他爷爷担心其中是不是有诈。李波满不在乎地说：能有什么诈？那伙人采用这种法子，一定是找不到人时气极败坏，以此吓吓人而已。想到此，他不由一阵得意：检察官，还是没有能斗赢我李波吧！

为了万无一失，李波吩咐从乡上来送信的人：回去给我好好盯着，只要一发现来了警车或陌生人，就赶紧租摩托过来报信。接着，他盘算：晚上老子要到芝苞街上痛痛快快地喝一

顿，庆贺一下我再次脱险。

当李波得意忘形时，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行动完全处在检察官的操纵之下。检察长蹇明海在电话中指示钟代平：使用以动制静之计将李波镇住后，只要他一露面，立即快速杀回马枪这种欲擒故纵和杀回马枪的计策看似不太保险，实践中却是十拿九稳。在成都抓捕涉嫌挪用 30 多万元后潜逃的中国航天长征机械厂销售员崔乐军时，崔将自己隐没于大都市的茫茫人海之中，与追逃人员捉迷藏。钟代平等人欲擒故纵、从成都撤回达州。得到崔又出面活动的情报后，追逃人员千里奔袭，直扑崔在成都的藏匿点，一举将其捕获。抓捕潜入山林之中的李波使用此计无疑也是正确的。31 日中午，得到负责监视的治安积极分子汇报李波已回家的情报后，钟代平带着王勇、罗强从通江县城乘车飞速扑向芝苞乡。芝苞街上帮李波监视追逃人员行踪的那个人还没反应过来，警车已朝六村一社呼啸而去。

就在抓捕即将成功之时，却不料发生了意外：在一个弯道上，警车轰的一声翻到了几米高的坎下。好险！卡住警车的那棵柏树下边就是 150 多米高的悬崖！摔得满身是血的王勇、罗强从车中爬出，费好大功夫才将已摔昏迷的钟代平弄醒。刚睁开眼，钟代平便边揩嘴里鼻子里流出的血边对王、罗二人说：你俩活动一下，看还能不能动，还可以坚持的，就跟我去抓李波！说着三人相互挽扶，跌跌撞撞地向芝苞乡六村一社跑去。

半小时后，李波被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三个满脸是血的检察官惊呆了。半晌，他才回过神来，对着那副冰冷的手铐伸出了双手……

手记之四十五：火中取栗——达州市张绍顺、易显富虚开 2.73 亿元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纪实

火中取栗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寓言：猴子骗猫取出火中的栗子，栗子取出后被猴子吃了，猫不但没吃着，反而把脚上的毛烧掉了。本文的主人公——原达川地区西南商业总公司经理张绍顺也像那只猫一样为几个广东人火中取栗，虚开增值税 2.73 亿元，虚开增值税额 4638 万余元。与那则寓言不同的是：贪利的张绍顺不仅从中得到了 20 多万元的“栗子”，还变成“怵鬼”将渠县康华公司易显富等几人拖入了罪恶的深渊。致使易显富被判死缓，易的副经理冯加乐被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怵鬼”的结局也十分不妙——经过 5 年的三次审判三次上诉后，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定张绍顺死刑。2001 年 12 月 30 日，张绍顺被五花大绑地押到了达州市西郊火葬场外那块常被选作刑场的空地。

枪响了。在罪犯倒下的同时，发生在四川的这起最大的虚开增值税发票案终于画上了句号。
潮阳那个闷热的夏夜，至今仍令人惊心动魄

张绍顺跑了。

这个只初识字却有着达川地区（现改为达州市，文中皆用达州市）西南商业总公司经理头衔的家伙吸取了他过去在渠县木材公司犯案很快被检察机关抓获的“教训”，1994 年 11 月，达州市国税局多次收到外地要求协查他与广东潮阳市张耿南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函件，正准备对其清查时，他却于当年的 12 月从达州市悄悄“消失”了。直至 1995 年 5 月 17 日，案子才交到了达州市检察院——5 个多月时间，张绍顺完全可以不慌不忙地逃到这个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躲藏起来。

当由杨静平、唐名全、李雪冰、余强等检察官与税务人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正一筹莫展时，奇迹出现了：1995年5月初，渠县检察院在协查渠县康华公司给湖北新春县某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等问题时，时任渠县检察院副检察长的黄绍金与反贪局副局长代志坚等人经过几天几夜的监控，终于于5月20日将刚从广东虚开增值税发票归来的康华公司经理易显富、副经理冯加乐及张绍顺的业务员毛冰一举抓获。易显富等人供称：他们去广东潮阳虚开增值税发票系张绍顺“引荐”，张现仍在广东潮阳市的峡山镇。渠县检察院在抓捕毛冰时出现了一点意外：当时，毛冰正在邮局给广东的张绍顺打电话，电话刚接通，侦查人员便动了手，这一行动估计惊动了张绍顺。

得知这一情况后，达州市检察院和渠县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当机立断，押着熟悉张绍顺等人又愿立功赎罪的犯罪嫌疑人冯加乐直扑广东潮阳市。5月29日下午，杨静平、唐名全、代志坚等人由冯加乐带路，潜入潮阳市峡山镇张绍顺承包的新盛酒店附近秘密踩点时获知：九天前，毛冰未打完的那个电话引起了张绍顺的怀疑，吓得他一溜烟跑到汕头去躲了起来，见无动静，29日上午刚回到峡山镇，正准备带上情妇另逃它处，这一情报使杨静平、代志坚等人兴奋不已，他们一边派人在酒店周围布控，一边布署抓捕。

30日凌晨2点，峡山镇仍热浪逼人，当辛劳了一天的人们成群结队地进入舞厅茶楼开始夜生活时，唐名全、杨静平、代志坚、苏建新等7名干警与潮阳市峡山镇前来协助的4名干警却荷枪实弹地押着冯加乐分两路悄悄围向新盛酒店。酒店里飘出阵阵嘻笑和音乐声，看来，一切正常。正准备行动，峡山的几名干警却着急地用难懂的广味普通话向杨静平等人吼着什么，连比带划地“交谈”了半天，达州的干警们才搞明白，峡山的同行们是在指责他们未把手枪上膛。峡山检察室主任老刘沉声喝道：以为你们手中的枪是摆样子的吗？这里黑恶势力手中的刀枪可不是吃素的！其他几个峡山检察干警也低声告诉说：前不久有四个兄弟省、市检察干警到当地逮捕人犯，不仅人未抓走，反被恶势力扣住打伤，并被缴了枪。后来，动用武警才将其解救出来。达州的检察干警听后，忙稀哩哗啦将枪上膛，峡山的4名干警这才按原计划上前敲门。

敲门声使酒店内的嘻笑音乐戛然而止，变得死寂。峡山的干警用本地话喊道：开门！查户口。喊了半天，仍无人理会，酒店内的灯也一盏接一盏地熄灭了。为了防止张绍顺趁机脱逃，干警们果断地破门而入。见一下冲进这么多持枪的检察官，酒店里嫖宿的男男女女吓得尖叫着东躲西窜。干警们由冯加乐带路，直扑张绍顺居住的房间，但房间里只有张绍顺的情妇邱兰在床上吓得周身乱抖，干警们只好对整个酒楼逐一搜查。李雪冰在三楼一间客房遇到一持重庆身份证的汉子，见其名字叫张泽雄，李正准备还身份证时，发现那汉子神色慌张，再一搜，从“张泽雄”的钱包里搜出了张绍顺的身份证，叫来冯加乐一辨认：“张泽雄”正是张绍顺！

在峡山检察室，干警们连夜突审，根据张绍顺的交待，代志坚带3名干警与峡山的4名干警立即奔赴40里外的颇岗镇农村抓捕同案嫌疑人张汉武、张忠强父子。峡山的同行告诉代志坚等人：颇岗镇黑恶势力大，此去只能速战速决，抓住人便走。到了张家，为了减少麻烦，代志坚让干警方凯从围墙翻进张汉武家打开院门，干警们刚冲进院子，张家的一群男男女女手持刀棍怪叫着冲了上来。不过，面对8支乌黑冰冷的枪口和干警们那冷漠得如同枪口一样的脸，张家的人不得不怯怯地放下刀棍，眼巴巴地看着两副锃亮的手铐锁住了张汉武、张忠强父子的双手。

代志坚等人不敢蛮战，对张家搜查不到 20 分钟便匆匆撤离。尽管如此，似乎还是晚了些，周围听到响动的人正打着电筒手持武器叫喊着从四面向张家赶来，有人还企图用石头拦住检察官撤退的后路。代志坚等人忙强行将张汉武父子推进车，向外冲去，拦路者手中挥舞的刀枪车灯中寒光闪闪……禁不住“利润”诱惑，酒色攻击，张总将 4 本增值税发票拱手给人“代办”

1995 年 6 月的抓捕并未能将张绍顺虚开增值税案的案犯一网打尽。该年 8 月，达州市检察院再次组织力量奔赴广东潮阳抓捕，仍然无果。达州检察机关只好将黄炳坤等人的案卷材料移交广东潮阳市有关部门查处。

在案件侦查和起诉阶段，达州市检察院的承办人杨静平、向可成等人注意到：黄炳坤、李行龙、张炳南等人在本案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1994 年 6 月，黄、李二人从广东潮阳市窜到达州市寻找有增值税发票的单位供其进行犯罪活动。那时，张绍顺的西南商业总公司成立还不到一年，公司只有一间外人根本找不到的办公室，据公司的会计毛某回忆：公司从无账，后来为应付税务才建了个假账。公司虽注册资金 180 万元，但无人见到过一分钱，公司一年多只发了四个月的工资，还是挪用别人的木材款发的。黄炳坤、李行龙找到“西南商业总公司”门下时，张绍顺竟无钱招待这两个自称可以与其“做业务”并让其发财的客人。还是黄、李二人善解人意，刚见面，他俩便从张绍顺总经理那把咯吱乱叫的破椅子及张总抽的一元多钱一包的劣质香烟上看出了西南商业总公司的窘境。二人见机行事，反宾为主把张绍顺请到了一家高档的酒楼里，以海鲜山珍、名酒名烟款待。饭饱酒足，又接着保健桑拿，还包了包厢让张绍顺与一小姐尽情欢娱。据张绍顺讲：那天，他们让老子潇洒得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后来，张绍顺有些沉不住气了，主动对黄炳坤讲：老黄呀，你们如此仗义豪爽，我也给你们实话实讲，我这公司一无钱二无货，可没有什么业务与你们合作的哟！黄炳坤并不在意，打着哈哈说，张总呀，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别说什么钱不钱的了，我们与你打交道。主要着中了你这个人！

在短暂的接触中，通过几件小事，黄炳坤、李行龙的确“看中”了张绍顺——刚见面，黄炳坤把一盒“三五”烟伸过去让张绍顺拿烟抽，张竟从中抓出了两支，还自我解嘲地说“好事成双”。唱卡拉 OK 时请了三个小姐，张绍顺一见就心神不定起来，还不懂“规矩”地当着黄炳坤、李行龙的面把小姐们这个搂一阵，那个“啃”几口。从张绍顺那些粗俗的举动中，黄、李二人心中暗喜：好哇！此人不但贪财好色，且头脑简单，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对象！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在张绍顺“玩”得哈欠连天时，黄炳坤这才直奔主题说张总呀，你们这里生意不好做，还不如到我们那边去搞中转，包你发大财！一听能发大财，张绍顺的眼睛一下亮了：“中转？怎么搞法？”黄炳坤介绍说：只要有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增值税发票，到广东去，不要“头钱”就能赚大钱。李行龙补充道：一本增值税发票少说也能赚七八十万元！张绍顺的眼睛瞪得更大了：七八十万元？黄、李二人拍着胸膛说：张总，我们广东人最讲信用，决不骗你，要是不信，你可先跟我们去广东考察了再做，考察的一切费用由我们负责！

那一瞬间，张绍顺虽然知道广东人说的那种不要“头钱”的生意是犯法的，他的脑海里甚至还闪现出渠县检察院当初查处自己时的那一幕，但他却着魔似的被“一本增值税发票至少能赚七八十万元”那句话牢牢吸引住了。仅有的一点小学数学知识的他飞快地在心里盘算：两本能赚一百五六十万元，三本能赚两百多万元！四本能赚……

激动之余张绍顺又怕商场凶险，决计还是去广东考察一下再说。他想：反正考察费用又不用自己掏。

在广东“考察”的那些天，黄炳坤、李行龙和那个自称香港顺兴贸易有限公司驻深圳业务代办张耿南左右不离地陪张绍顺出入汕头、潮阳市等地那些灯红酒绿的歌厅赌场，大把大把地花钱供他吃喝嫖赌，直“考察”得张绍顺乐不思蜀。后来，还是黄炳坤“提醒”他：张总，该回四川弄增值税发票来做业务了！

回到达州，在黄炳坤等人的经济援助下，张绍顺动用各种关系和手段，于1994年7月1日，向达州市某国税局申请购买了五本增值税专用发票。12日，张绍顺携本公司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增值税发票及发票购买证等，随黄炳坤、李行龙等人乘飞机前往汕头潮阳市肿岗镇张耿南处。在接风宴上，趁几名小姐用酒把张绍顺灌得不知东南西北时，张耿南试探着提出了一个谁都能看出是圈套的问题：“张总，你是否可以把所有的证件和增值税发票交给我来替你代办？”张绍顺听后，只那么犹豫了片刻，便搂过一个小姐狠亲一口说，要得，代办就代办，省得老子自己操心劳神！张耿南马上吞下一杯酒后豪爽地说：张总，你如此相信小弟，小弟也决不会亏待你！你只提供有关证件和增值税发票，我们联合经营，所获利润，我们兄弟俩各分50%。接着，一伙人又乘兴签了协议。后来，张耿南一伙的确按“协议”给张绍顺分了50%的“利润”，但这“利润”通过张耿南的“代办”，已大打折扣。据张绍顺讲：分给我的也许只是五分之一的“利润”的50%了。

后来虽然吃了哑巴亏，当初那些“攻关”之类的麻烦事却全是张绍顺在办。本来，税务机关对增值税专用发票有严格的管理规定，一般是不能带到外省市去使用的，但7月下旬和8月上旬，张绍顺两次飞回四川，擅自在营业执照上增添了皮革、陶瓷等经营项目，在某国税局申请补办了年度纳税包干10万元等事后，硬是办妥了西南商业总公司在广州、深圳等地使用增值税发票的证明手续。再赴肿岗镇后，张绍顺将增添了营业范围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盖好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章的空白公文便笺连同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交给了张耿南，并伙同张耿南、黄炳坤、李行龙等人从8月至10月，以“头大尾小、鸳鸯填写、倒卖空白发票”等手段，为湖南、广东、陕西等省、市43家企业虚开87份增值税发票虚开增值税2.24亿元虚开税额3812万余元。没有货物的张绍顺、张耿南一伙像几个魔术师，对方需要药材，需要羊毛，需要皮革，他们都应有尽有，只需大笔一挥。为掩盖自己的罪行，张绍顺还利用张耿南等人在广东为自己虚开江苏、山西等省的增值税（进项）发票23份，于1994年11月向达州市税务局申报进项税款3218万余元。

张绍顺与张耿南的“合作”并不像黄炳坤当初许诺的“一本增值税发票就能赚七八十万元”那样诱人，他冒死为张耿南一伙提供了四本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所有证件，而张耿南一伙仅给他分了19万元的“利润”。

19万元刚刚到手，张绍顺就无可挽救地失去了家园和自由，成了流亡异乡的幽灵……“怗鬼”抛出“利润”的诱饵，不费力地把几个贪财者拉上了贼船

如果张绍顺不太急于得到更多的“利润”，他也许不会那么快就暴露于检察机关的侦查视线之内。1994年12月，他潜逃前在重庆花钱办了一个叫张泽雄的假身份证，逃到广东潮阳市张耿南家后，张安排他去潮阳市峡山镇承包了新盛酒店。那时，张绍顺风声鹤唳，惶惶

不可终日。他最怕戴“大盖帽”的人，一见到穿检察服的就双腿直哆嗦。一次，两个武警到酒店吃饭，张绍顺以为检察官找上门来了，吓得从后门溜出去就是一阵狂奔……

离乡背井的凄凉孤独，逃亡中的惊惧恐慌，使张绍顺痛苦烦恼不已。为了化解这种痛苦，他常去舞厅酒楼“耍”娼妓使自己“轻松”。但他运气不佳，很快就得了性病。治病时，张绍顺认识了同在医院治性病的重庆籍打工妹邱兰。二人同病相怜，一见钟情，很快如漆似胶起来，从此，张绍顺也就有了一个较为固定的流亡夫人。

后来，日子一长，特别是邱兰的出现，张绍顺逐渐适应了逃亡生活，也逐渐把那些夜夜让他做恶梦的检察官忘到了一边。1995年4月，他又开始动起了“用增值税发票发财”的心思。他明白，自己虚开增值税发票时被人操纵，“利润”大多落入了张耿南一伙的腰包。这次，他决计自己来操纵一切，以保证能得到更大的“利润”。几经筹划，张绍顺把在新盛酒店打工的毛冰派回了四川老家。

毛冰，渠县天星镇人。他十分熟悉渠县康华公司的情况，该公司的业务经理冯加乐，大字不识几个，是一个地道的乡下人，经理易显富40来岁，因伪造公章、拐卖妇女而被判过9年徒刑。1994年9月，易显富找几个同他一样没有本钱却想发财的人凑起了一个“康华公司”。为解决康华公司在工商、税务办有关证件时的“注册资金”，易显富故伎重施，刻了好几个子虚乌有的公司公章，然后再由这些“公司”盖章向易显富等人写了53万元的“借条”。为了像模像样，易显富还找了一个只读了两年小学的李姓女子当他的女秘书。“李秘书”本来是冲着钱才来屈尊当“小蜜”的，见易显富的公司成立几个月了还未做成一笔生意，就嚷着要辞职。就在此时，毛冰找上了门，对易显富等人说，你们在渠县这小地方坐井观天，怎么赚得了钱？冯加乐反唇相讥道：有没有本钱能赚到的钱吗？毛冰挤眉弄眼地问：那就看你愿不愿赚这种钱了？易显富忍不住反问：放着不要本钱的钱不赚，谁会那么傻？

见易显富上钩，毛冰这才说：你们公司有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完全可以购领增值税发票到广东那边去搞代购代销。只要有一本增值税发票，不出钱就可净赚二三十万元，搞得好还可以赚四五十万。易显富听后激动得抓住毛冰的手问：真的！毛冰回答说：还会有假？我们的老板不仅能让你赚钱，还包你往返的机票和所有开支。

易显富生怕毛冰变卦，当天就到税务局以康华公司的名义领购了一本25份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月19日，易显富带着“李秘书”、冯加乐等人随毛冰去了峡山镇新盛酒店。张绍顺的款待倒是很热情，但易显富却从这热情中感到了不妙：所有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合同章、公章都被张绍顺强行拿去“验证”。没通过自己允许，张绍顺便在康华公司的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上用钢笔添上“陶瓷、药材、塑料、皮革”等经营项目。利润分成也与毛冰当初讲的“一本增值税发票能赚二三十万元或四五十万元”相差甚远。张绍顺告诉他：“最多只能给你分利润的3%，发票怎么开全由我去联系”。发票不由自己开，易显富坚决不干。他倒不是怕别人把发票拿去乱开，他主要是担心别人拿去头大尾小地开，算利润时自己吃亏，所以，他坚持发票到哪里自己就跟到哪里。但张绍顺自有办法对付，知道易出来时未带身份证，他便把“业务”联系在深圳。这下易显富傻眼了，他早就听说进深圳要办边境证，而没有身份证是办不成边境证的。无奈之下，他只好派冯加乐一起去监视“业务”情况。但大字不识几个的冯加乐不但未能监视什么，反而吃里扒外——在深圳开发票时不仅接受张绍顺的“贿赂”3699元，还偷偷将一联增值税发票以2800元的价格倒卖给张汉武。这一切，易显富一直被蒙在鼓里，浑然不知，后来，还是“李秘书”发现了其中的一些蛛丝马迹。这下，

易显富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了，他借口张绍顺等人所开发票有头大尾小的情况，吵着不干了，要回四川去。张汉武等人劝道：易经理，还是合作吧，开完了这本发票总少不了要赚好几万，总比空手回去强。易显富想了想咬咬牙说：也要得，反正来都来了！

自4月下旬到5月15日，易显富带去的25份增值税发票被自己与张绍顺、张汉武等人开出或由张绍顺等人“代办”开出23份，其中开废3份，其余20份为湖北、深圳等省市的十多家企业开出票面金额4860多万元，税额8265168元。“业务”结束时，张绍顺给易显富、冯加乐分“利润”8万余元。张告诉易显富，自己只得了一万多元“利润”。易显富当时就骂了起来：你龟儿太黑了！什么都是你在办，鬼才相信你只得了一万多元！

易显富、冯加乐为了隐瞒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又出资1.58万元让张汉武等人买来湖南、内蒙等地的增值税发票7张及相关的经营凭证，企图回渠县后虚开进项税用于抵扣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销项税款。不料，他们刚回渠县就被张网以待的检察官逮捕归案。

潮阳，与张绍顺同案的几个犯罪嫌疑人结局如何？

2001年12月29日晚，在对张绍顺执行死刑的前夜，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与达州市人民检察院的公诉人最后一次到看守所提审张绍顺，核实有关情况。张绍顺对自己因贪财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的罪行供认不讳，也自认为罪该一死。但他说：“我会死不瞑目——因为引诱并共同参与犯罪的黄炳坤、李行龙、张耿南、黄亚明、张汉武等人至今仍逍遥法外。只枪毙我，就不叫执法公正！”

检察官也谈到了同样的问题。侦办此案的杨静平、代志坚等人说，黄炳坤、李行龙等人专门到内地引诱教唆并与他人共同虚开增值税发票，这种犯罪更恶劣，危害更大，更应依法严处。

但令人遗憾的是，广东潮阳市的几名重要犯罪嫌疑人至今仍逍遥法外。杨静平担心：这几年那几个家伙不知又与人虚开了多少增值税发票！

有人在着急地想着这样一个问题：达州检察机关不避艰险到数千里外将张绍顺等人绳之以法，后来，黄炳坤等人的案子已移交潮阳市有关部门，潮阳市有关方面这么多年为什么连几个已暴露的犯罪嫌疑人都抓不住呢？

责怪潮阳有关部门也许不太公平——也许是那些犯罪嫌疑人太狡猾太难抓，也许是那几个家伙早逃到了外地，也许是潮阳那边有比这更大的案子，有关部门顾不上黄炳坤等人……

在逃的已无可奈何了，达州市检察机关赴广东抓获的肿岗镇的张汉武、张忠强现在又是如何处理的呢？代志坚等人介绍：张汉武父子本与张绍顺、易显富同案，抓住张汉武后，我们坚持要带回四川与张绍顺、易显富案一并审查起诉，但潮阳市有关方面提出由他们处理。后来，我们多次去函和打电话查询潮阳对张汉武父子的处理结果，都泥牛入海……